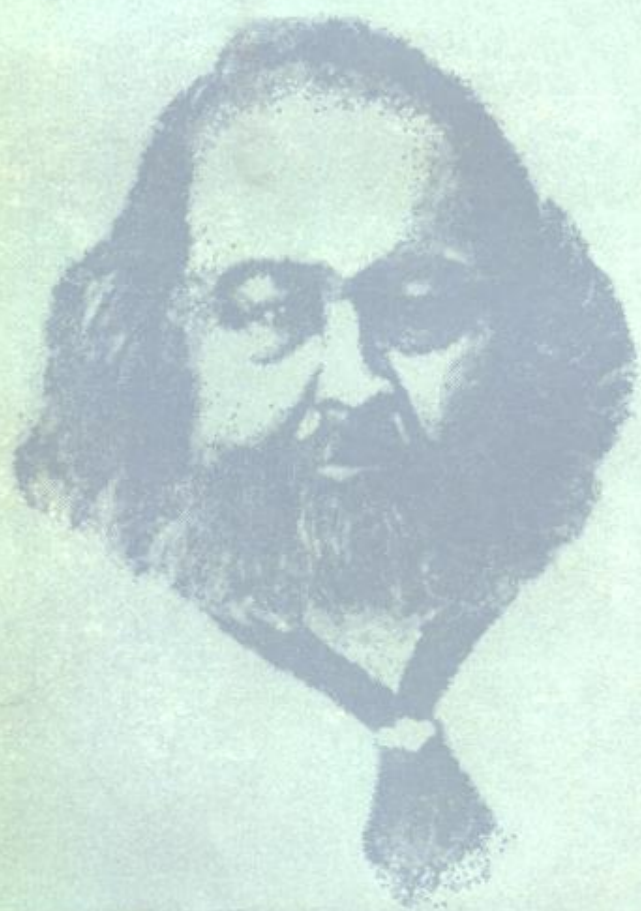


# 巴枯宁传

〔英〕爱德华·哈利特·卡尔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巴 枯 宁 传

[英]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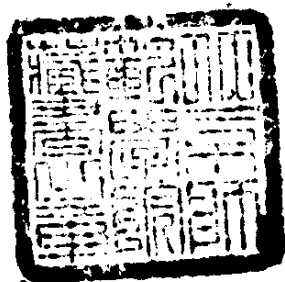
宋献春 王兴斌 卢荣基 译

D155.1.2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5146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51462

## 译 者 的 话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是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他的活动遍及欧洲主要国家；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深远；他在第一国际中的分裂和阴谋活动给当时的欧洲工人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多年来，巴枯宁本人的著作在一些国家不断再版；研究巴枯宁的专著和巴枯宁传记亦相继问世。

本书的作者爱德华·哈利特·卡尔是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以研究苏俄史著称。他于1892年6月28日生于伦敦，就学于剑桥大学，曾在英国外交部任职。后历任《泰晤士报》助理编辑、威尔士大学学院国际政治教授、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政治学导师、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评议员、巴利奥尔学院评议员等职。他的传记体著作，除本书外，还有《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1931年）和《卡尔·马克思》（1934年）。他的历史著作《苏俄史》（1—9卷，1950—1971年），在欧美有相当影响。

本书是一部传记，也是研究巴枯宁的专著。作者以比较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叙述了巴枯宁的一生；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和分析；对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以及马克思主义和巴枯宁主义之间的斗争亦有所阐述。书中还提到了第一国际成立前后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涉及到关于政治、经济和哲学的各种流派及其主要观点和代表人物。本书对研究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对研究第一国际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历史，都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当然，我们不能希望本书对巴枯宁本人以及巴枯宁的思想作出科学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作出正确的评价。特别要指出的是书中某些地方还歪曲了马克思反对巴枯宁的斗争。相信读者能识别书中的错误观点，有分析地阅读。书中关于巴枯宁青年时代的风流韵事等，我们作了一些删节，有的地方加了一些注释。

参加本书翻译的同志有：卢荣基（1—8章），宋献春（11—22，25，27—32章），王兴斌（9—10，23—24，26，33—34章以及参考书目）。全书由宋献春负责审订；王兴斌负责译注以及一些引文的校订，并通读了全部译稿；赵华智等同志协助审阅了部分初稿。在译校过程中，还得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一些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

1983年12月

# 目 录

## 第 一 卷

### 浪漫的青年时代

- 第一章 叛逆者的诞生**.....3  
父母及少年时代。 彼得堡。  
年轻的一代。 弃职还乡。
- 第二章 爱情与形而上学**.....21  
斯坦凯维奇和娜塔丽。 同胞之情。  
康德和冥想生活。
- 第三章 浪漫的盛夏**.....30  
莫斯科。 米哈伊尔和塔蒂安娜。  
费希特式的幻想。
- 第四章 严峻的现实**.....39  
别林斯基与现实。 浪漫的拙劣模仿。
- 第五章 兄弟姐妹**.....47  
吕波夫的悲剧。 瓦瓦娜的解放。
- 第六章 黑格尔与别林斯基**.....53  
黑格尔与复兴。 现实的和合理的。  
与别林斯基的决裂。
- 第七章 出逃**.....67  
标记时期。 莫斯科丑闻。  
柏林的魅力。 出逃前夕。

## 第二卷

### 革命的冒险家

第八章 两个世界之间.....	91
柏林世界。 普列姆希诺庄世界。 孤身欧洲。	
第九章 告别哲学.....	106
黑格尔与革命。 破釜沉舟。 海尔维格与逃跑。	
第十章 逗留瑞士.....	117
瑞士天堂。 负债与名誉。 魏特林与共产主义。	
第十一章 巴黎的生活.....	127
布鲁塞尔和巴黎。 马克思与蒲鲁东。	
俄国的回忆。 赫尔岑、屠格涅夫、别林斯基。	
第十二章 革命的前奏.....	142
自由和波兰。 重返布鲁塞尔。	
第十三章 1848年.....	153
火已点燃。 德国的冒险。 布拉格和斯拉夫人。	
普鲁士的放逐。	
第十四章 一个革命者的信念.....	173
《告斯拉夫人书》。 抛弃资产阶级。	
斯拉夫人的解放。 俄国农民。	
第十五章 失败.....	188
阴谋与乐观主义。 巴枯宁在德累斯顿。	
德累斯顿起义。 失败和被捕。	

### 第 三 卷

#### 入 狱

第十六章 萨克森和奥地利的铁窗生活·····	207
萨克森监狱。 萨克森的审判。	
布拉格和奥尔米茨。 奥地利的审判。	
第十七章 俄国·····	220
《忏悔书》。 监狱内外。 上诉和流放。	
第十八章 西伯利亚的冒险·····	236
结婚。 穆拉维约夫。 周游世界。	

### 第 四 卷

#### 复 出

第十九章 初到伦敦·····	253
奥塞特公寓。 英国的联系。	
斯拉夫人、德国人、意大利人。 回忆。	
第二十章 政治野心·····	273
观点与阴谋。 旧教派。	
俄国农民。 土地和自由社。	
第二十一章 波兰·····	288
起义前夕。 巴枯宁上阵。	
沃德·杰克逊号的航行。 后果。	
第二十二章 瑞典插曲·····	306
瑞典人和芬兰人。 凤凰饭店的宴会。 退出。	
第二十三章 佛罗伦萨·····	319
意大利印象。 会见马克思。 巴枯宁建立兄弟会。	

第二十四章 那不勒斯.....	332
-----------------	-----

慷慨的公爵夫人。 国际兄弟会。

退出意大利。 安冬妮。

## 第五卷

### 巴枯宁与马克思

第二十五章 和平和自由同盟.....	349
--------------------	-----

日内瓦代表大会。 巴枯宁加入国际。

巴枯宁退出同盟。

第二十六章 同盟的诞生.....	367
------------------	-----

第一次运动。 国际兄弟会的解散。

巴枯宁在汝拉。 同盟加入国际。

第二十七章 巴塞尔代表大会.....	383
--------------------	-----

日内瓦的准备。 巴塞尔代表大会。

争论和反驳。 巴枯宁退居洛迦诺。

第二十八章 涅恰也夫事件.....	398
-------------------	-----

冒险家的胜利。 权宜之计种种。 羞辱和分手。

第二十九章 里昂的惨败.....	417
------------------	-----

普法战争。 “英勇的上校”。

里昂的革命。 逃跑。

第三十章 同盟的势力.....	435
-----------------	-----

瑞士的分裂。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何谓同盟。

第三十一章 马克思和巴枯宁的斗争.....	449
-----------------------	-----

备战。 海牙代表大会。

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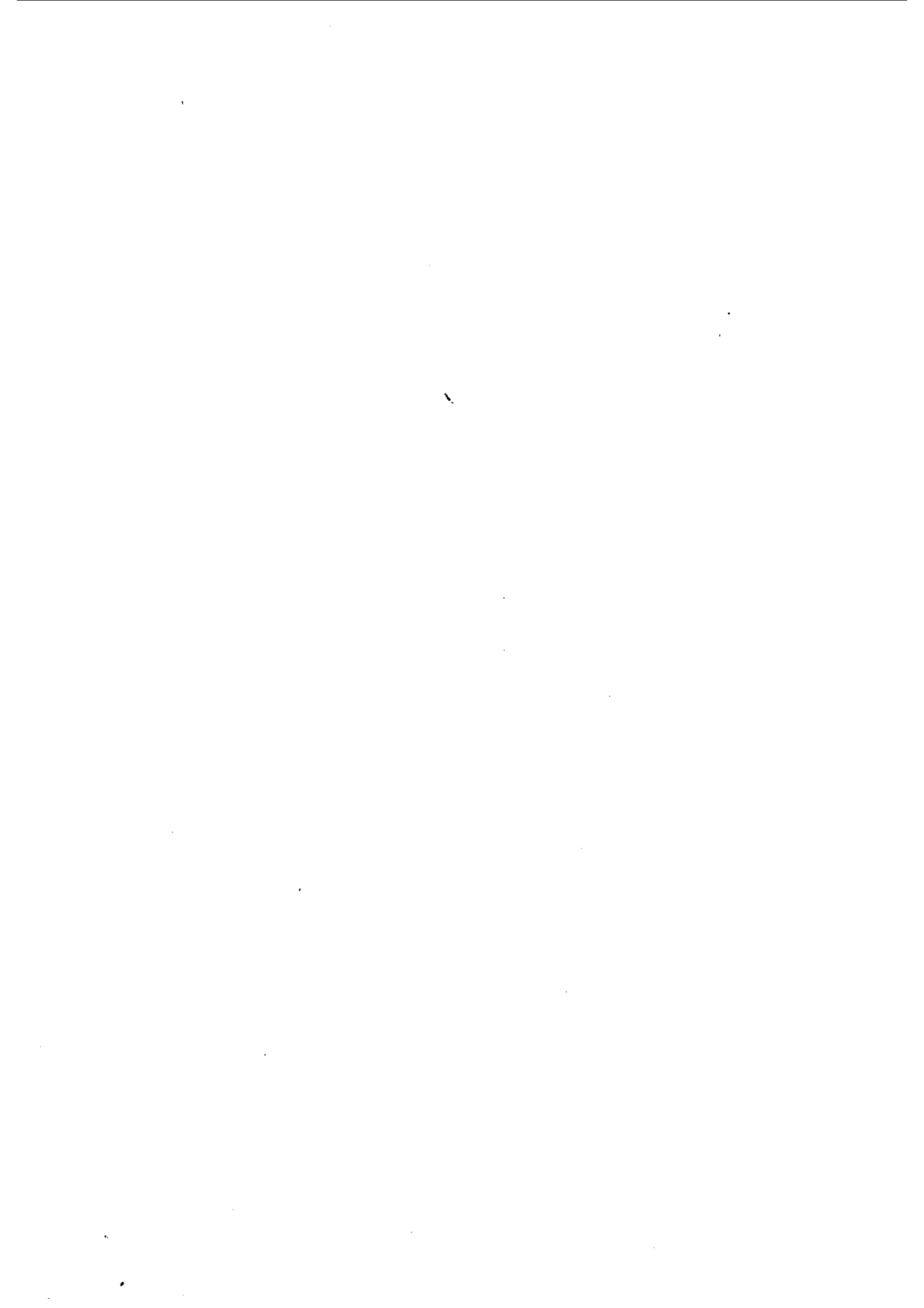
## 第 六 卷

### 暮 年

<b>第三十二章 最后的计划</b> .....	471
苏黎世移民。 斯拉夫阴谋。	
重返洛迦诺。老将解甲。	
<b>第三十三章 巴郎娜塔</b> .....	490
意外的收获。 喜剧和悲剧。 巴郎娜塔的结局。	
<b>第三十四章 “房产主”之死</b> .....	505
巴枯宁在洛迦诺。 疾病和衰弱。 最后几个星期。	
<b>参考书目</b> .....	520

# 第一卷

## 浪漫的青年时代



# 第一章

## 叛逆者的诞生

在特维尔省境内，莫斯科的西北150英里的地方，当年有一幢——至今依然存在——高大而宽敞的十八世纪的平房住宅。它的建筑样式是由意大利建筑师引进俄国的仿古典风格，是典型的俄国乡绅的住宅。整个产业很大，名叫普列姆希诺庄，这幢房子是庄园的一部分。这是一座拥有“五百人”的村庄，俄国在十八世纪和其后很长的时间内，通常是按庄上的男农奴的多少来计算土地的多少的。普列姆希诺庄地处景色宜人的丘陵地带，没有俄罗斯大平原那样肥沃，可也不像俄罗斯大平原那样极其单调。这所住宅正好座落在向奥苏加河——庄园风景的一大特色——倾斜的树木繁茂的林荫地上。奥苏加河河面宽阔，水流徐缓，流入伏尔加河的支流特维尔查河。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期，普列姆希诺庄的生活就象奥苏加河的河道一样，怡静而又开阔，倾向省府特维尔，也倾向更加远方的伟大的俄国城市莫斯科城。彼得堡和离彼得堡更远的地区是它的前哨和门户，是遥远的、陌生的、难以想象的地方。

1779年春季，普列姆希诺庄传到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巴枯宁手中。此人的家庭在莫斯科贵族的历史上曾长期处于受人尊敬的但并不显赫的地位。米哈伊尔·巴枯宁曾官至叶卡德琳娜二世朝廷的“参议院大臣”。他辞职回到普列姆希诺庄时，仍然军容大振。虽然他似乎并无政治抱负或学术造诣，但在后代人心

目中，并非没有留下名望。家史上曾称他体格魁梧、膂力过人、性格刚烈。根据记载，他只凭一块木板就单枪匹马地赶跑一伙强盗，一次还将一个失礼的马夫从马车的座厢举起来扔进河里。

米·瓦·巴枯宁有三男五女。长子选择仕途，次子从军，三子亚历山大体质文弱，天资聪颖，似乎不象乃父。他九岁时——就在他家即将定居普列姆希诺庄时——由于健康的原因，父亲决定由一位家庭教师陪同他到气候比较湿润的意大利去求学。他在帕多瓦大学修业期满，毕业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用拉丁文写成，题为《论小人物》，一个世纪以后，这篇论文仍保存在家庭档案中。他后来几年的生活情况不得其详。他外出旅游过。据一个材料说，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时他就在场。他曾一度在俄国驻佛罗伦萨和驻都灵公使馆供职，并且是都灵学会的成员。年近三十时，他才回国。不久以后，即1803年，老米哈伊尔·巴枯宁去世，其遗孀为纪念他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教堂，为普列姆希诺庄增色不少<sup>①</sup>。

几年来，生活平静无事。亚历山大·巴枯宁经管田庄，在普列姆希诺庄与孀居的母亲以及三个未婚的姐姐过着悠闲的生活。他们都以虔诚而名闻乡里。亚历山大·巴枯宁扩建了住宅，扩建了两幢厢房，用陶立克式圆柱在房屋正面建一门廊，以作装饰。但是，当他年过四旬时，发生了一起出人意料的转折。毗邻的巴克伏基诺庄园主保罗·波尔特拉特斯基和一个姓穆拉维约夫的世代贵族之家的寡妇结了婚，婚后，于1810年夏天便将妻子及其十八岁的养女瓦瓦娜·穆拉维约夫接到巴克伏基诺庄。瓦瓦娜美丽、活泼而又穿戴入时，使亚历山大·巴枯宁如同别人也感到惊羨一样，一见倾心。这位冷静的中年单身汉生平第一次经受富有浪漫

---

<sup>①</sup>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1—9，83页；斯切克洛夫编：

《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5—26页。

色彩的爱情的痛苦。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四岁，但无碍于终成眷属。他们于当年秋天结了婚。两人到特维尔度过冬天，沙皇之妹叶卡德琳娜女大公爵曾在那儿设有一个不大的公爵府。度过短暂的社交欢乐生活以后，这位年轻的妻子就在普列姆希诺庄定居下来，开始养儿育女（婆母和姐妹们都知趣地退居别处），在大约十五年的时间里，几乎是一个接一个地生。

这个家庭的结构是很不寻常的。头两个是女孩吕波夫和瓦瓦娜，分别袭用祖母和母亲的名字起名。接着生了米哈伊尔，按祖父的名字起名，是家庭传说中的参孙<sup>①</sup>。接着又生了两个女孩，塔蒂安娜和亚历山德拉。稍过一段时间以后，又连续生了五个男孩：尼古拉、伊利亚、保罗、亚历山大和阿列克斯。孩子们长大后，他们很自然地分成两群，每群五人，米哈伊尔显然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就性别来说，他是年龄较大的一群中唯一的男孩，处于独特地位。就年龄来说，他在由五个弟弟组成的年轻的那一群中最大。很快就表明，他的性格使他适于起着出生排行所赋予他的支配地位的作用<sup>②</sup>。

当巴枯宁家的孩子一个个出世的时候，俄国和欧洲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瓦瓦娜刚出生三个星期，吕波夫尚未满一周岁时，拿破仑就率领大军进入莫斯科。米哈伊尔出生时——俄历1814年5月18日<sup>③</sup>，当时拿破仑被囚禁在厄尔巴岛<sup>④</sup>。战胜的盟国，其中也有亚历山大一世的俄国，占领了巴黎。但这种转败为胜的史诗般的事件，在普列姆希诺庄引起的轰动并没有巴枯宁十二岁时俄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事件那么大。1825年12月1日，亚

---

① 参孙，《圣经》中的英雄，据说他有非凡的力气和胆量。——译注

②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12—17，30，32页。

③ 公历为5月30日，即巴黎和约签订的日子。

④ 意大利半岛西部的小岛，拿破仑在1814年被囚禁于此。——译注

历山大一世去世。三个星期后，好闹事的绅士和军官在彼得堡起事，其目的不是革命而是立宪，这就是十二月党人起义。姓穆拉维约夫的大家族深深卷入这一事件。五个为首的后来都被处绞刑，其中一个就是瓦瓦娜·巴枯宁的远房兄弟。她的两个堂兄弟（都曾常到普列姆希诺庄作客）都是策划这次起义的一个秘密团体的创始人。

这些事件的发生，都给亚历山大·巴枯宁这个一家之长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在外国度过了二十年，这二十年通常是一个人的成型的主要时期。他在意大利所受的教育一定会使他在当时俄国拥有土地的贵族中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人物。这些贵族之所以能出人头地，不是靠什么艺术和学识的造诣，而是靠可以为所欲为的势力以及可以横行无忌的能耐。他对十八世纪欧洲自由和人道的传统略知一二。据传他对亲眼目击的意大利和法国的革命暴动，还抱有某种同情。但当年岁稍长以后，他就改变了这一切看法，而陶醉于普列姆希诺庄的森林田野、蜿蜒的小溪、春天的夜莺、野生的玫瑰和盛开的樱花这一切美妙的景色之中。光荣地击退拿破仑的入侵重新激起了他的爱国心。十二月党人起义吓得他目瞪口呆，一个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会发生造沙皇的反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子女长大成人时，他写了一首以奥苏加河为题的长诗，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看法。在开头一节里他写道：“普列姆希诺田野的主宰，我忠诚的朋友，我子女的保姆。”在关于普列姆希诺庄的许多抒情描写中，诗人阐述了无懈可击的正统政治观点。他忿怒地回忆起青年时代“在人人好斗的国度里”听到的“美妙的蠢驴大合唱”。他得出结论说：“从那时起，我就痛恨老虎和驴子的音乐。”他怀着焦虑的心情和明显的良心上的痛苦谈及农奴制度。这个主题是回避不了的，因为“神圣的俄国依赖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础”。但他不赞成把“奴役”这个名称草率地和农奴制度联系在一起。尽义务是相互的，

土地占有者是“孤儿的保护人”。真正的自由存在于“各个庄园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农奴无权抱怨他不是主人，正如奥苏加河无权抱怨它不是伏尔加河一样<sup>①</sup>。

这就是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父亲的并非没有吸引力的形象。由于亚历山大宽厚仁慈，有文化教养，天资聪颖，热爱家庭和子女，但缺乏想像力，又具有被吓破了胆的自由派所特有的那种保守的狂热，他就不会对年轻人叛逆的本能或革命的抱负怀有天然的同情。他对子女的疼爱是很明智而又有远见的，据他长子证实说，他“一贯溺爱子女而且慈祥和蔼”。但他实在不能理解他们会有与自己不同的见解和爱好。然而，尽管他态度严峻，刚愎自用（他已年近花甲，而子女尚未长大成人，他这种态度可以得到某种谅解），但他还是得到甚至是最富叛逆精神的子女们的永久的尊敬。

〔多年以后，米哈伊尔给他的信中说〕您是我们的导师。您唤醒了我们心中对美好事物的感情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这种爱至今仍把我们兄弟姐妹紧紧地永远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您的教导，我们定会是平庸之辈。您点燃了我们心中酷爱真理的神圣火花，哺育了我们心中引为自豪的独立和自由的感情。您这样做，是因为您钟爱我们，因此我们衷心爱戴您<sup>②</sup>。

米哈伊尔母亲的性格则更不鲜明，也更不引人注目。一个做母亲的，其年龄实际上和大孩子相近而不是和丈夫相近，本来是会站在孩子们一边来反对父亲的，或者不管怎样要在两代人之间充当调解人，这本来是可以预料的事情，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每

---

①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4卷，8—11页。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7页，第2卷第189页。



当父亲和孩子们之间发生争论时，瓦瓦娜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丈夫一边。她相信他是一贯正确的，这个信念她一刻也没放弃过。和她的丈夫一样，她对孩子们精神上的需要和愿望没有更多的同情，内心也更不温和。米哈伊尔晚年时写道：“一个虚荣自私的女人，子女都不爱她。”据一个目击者说，在他风烛残年时，曾把自己“破坏一切的狂热说成是母亲的影响造成的。因为她专制独裁似的性格激起他对任何束缚自由的东西都深恶痛绝。”瓦瓦娜是个贤妻，但并不能算是个良母<sup>①</sup>。

这些潜在的性格和见解方面的对立，并不妨碍家庭里那种牢固的和睦传统的发展。巴枯宁家孩子们在后来的来往信件中还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他们在那里度过童年的美妙的田园环境。亚历山大·巴枯宁是个严于律己的人，教育孩子有点斯巴达式的简单朴素的味。说这所俄国乡村住宅是豪华的这种说法不过是人们的凭空想象而已。巴枯宁家孩子生长的环境是优裕的，但并不豪华。《奥苏加》的好几节都比较真实地赞颂了普列姆希诺庄的简朴：

房屋宽敞，但没有镶木地板。我们既无昂贵的地毯，也无别的什么祖传的摆设，甚至连玩牌的桌子也没有。在餐室的一角放着一架旧式的大座钟，它和我的年龄一样大。另一角有古老的常春藤，拔出了又长又阔的穗子……。餐桌上没有细瓷器摆设，只有几个普通的碟子和孩子们明亮的眼睛……。旁边就是会客室，里面挂有我们伟大沙皇的肖像<sup>②</sup>。如果有人不以忠诚的目光来瞻仰他，那他就没有一点俄国人的气味……。一张无背长沙发和几把雕花椅子用花毡罩上，只有在盛大节日时才把罩子取下。然而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7页；埃尔：《北方通报》（1858年5月），第179页。

② 十分明显，在他年轻时，叶卡德琳娜女皇在位，但当写这首诗的时候，叶卡德琳娜已死了三十年。

到了傍晚，全家人就像蜂群一样聚在一起，此时此刻，我就乐不可支。

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没有碰到什么麻烦。他们从母亲那里受了启蒙教育。《奥苏加》里有一首动人的四行诗写道：“门一打开，地板天花板就颤动，三个孩子突然出现在妈妈面前，告诉她，他们学会了功课。”他们长大一点以后，父亲就开始教他们历史（也许有人认为，是带有浓厚俄国爱国主义的色彩）、地理和自然科学，在复活节的前一周，他给他们读福音，解释教义和教堂的礼仪。家里有法文、德文家庭女教师（也许还有英文、意文女教师，因为亚历山大为自己的孩子会讲五种语言而感到得意），还有其他学科的家庭教师。女孩子学弹钢琴，米哈伊尔学拉小提琴。合唱是他们喜爱的一种才艺和娱乐。即使是那些完全在家里受教育的女孩子也都成了聪明、文雅、博览群书的女子，能熟练地用两种或三种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亚历山大·巴枯宁从卢梭的著作里学到要相信教育，他的教育方法是一点也不马虎和华而不实的<sup>①</sup>。

然而，比正规教育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年来年轻的一代人之间形成的亲密无间的团结。孩子们——不分男女——都具有同样热情和敏感的天性。对家庭的热爱使他们团结在一起。普列姆希诺庄的风景给他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即使生活环境驱使他们分开以后，也是如此。

〔保罗后来写道〕我们生长在俄国的土地上，但头顶上却是明朗的意大利的天空。事事如意，天底难寻。

米哈伊尔在一生中最不走运的岁月里，仍然能从蜿蜒曲折的奥苏

---

①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31—33，36—39页。

加河开始，追忆过去的往事。草地牧场，他们玩耍过的那个池塘中心的小岛，老锯木厂以及厂主在厂边小溪里捕鱼的情景。清晨在花园里漫步时见到树叶上悬挂着的蜘蛛网，春天在月光下的散步，樱花盛开时节兄弟姐妹们合唱《月光曲》，为瓦瓦娜的家雀举行隆重的葬礼，德文家庭女教师博尔切特为此写的墓志铭，冬天围着火炉阅读《瑞士家的鲁宾孙》——对巴枯宁家的任何一个人来说，这一切都可以用一个金光闪闪的词来概括，那就是普列姆希诺庄<sup>①</sup>。

这些不见经传的日子一直延续到1828年秋天，当时米哈伊尔十四岁半。作为长子，他注定要入伍。于是决定送他到彼得堡，他可以在那里为翌年进入炮兵学校作准备。自孩子们出生以后，米哈伊尔外出是普列姆希诺庄的第一件大事。对于女孩子们来说“最美好的岁月”已失去其光辉，对米哈伊尔本人来说孩提时代已告结束。

\* \* \*

在等候次年进炮兵学校期间，米哈伊尔在彼得堡寄宿在姑父母家里。姑父尼罗夫曾任坦波夫省省长，对年轻人的需要简直是一无所知。他损害了米哈伊尔的自尊心，因为硬要他朗读《舍提—米内》这一本编造民族圣徒功绩的传说集。这本书曾在俄国托儿所里很受推崇。尼罗夫认为，这是一本对年近十五岁的青年人很有教益的书，并劝米哈伊尔相信书里的每句话。巴枯宁后来承认，他对天启教的真义第一次丧失信念正是这次规劝造成的。被迫和不熟悉的人在一起使他感到很不高兴，因为远离了那些“他不知不觉就爱上的亲切、熟悉的面孔。”姑父母两人都是管教很严的人。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米哈伊尔才于1829年秋考取了

---

①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390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105页，第4卷第223—224页。

炮兵学校。

米哈伊尔十六岁了。整个孩提时代，他都生活在一群对他羡慕的姐妹当中，所以他养成了喜欢发号施令和要别人服从自己的习惯。然而他对同年龄的男孩子却并不如此，因为他在同伴中并不显得出类拔萃。虽说他身材魁梧，但却不像他同名祖父那样膂力过人。他见人腼腆，而且缺乏男性。

〔几年以后他写道〕我的心灵和思想迄今仍是纯贞无暇的，未沾染任何邪念。我在炮兵学校很快就发现生活中的黑暗、丑恶和卑鄙的一面。即使我没有堕入我常常目睹的邪恶之中，但无论如何，我很快就习以为常，不再感到厌恶和吃惊了。我很快就养成了撒谎的习惯，因为一个巧妙的谎言在学员中间非但不算恶习，反而会得到一致的证实。

这一天真的自鸣得意的自白比其表面价值要小得多。米哈伊尔的士官生生活中人所共知的仅有的例外还是在经济方面。他东挪西借——一生都不放弃的一种有趣的习惯——并给借款者票面高得多的期票去换取现金。在炮兵学校三年期间，他债台高筑——除了他父亲在彼得堡的朋友替他悄悄地还掉的钱以外——总数竟高达一千九百卢布。他虽然自以为学到了一些高等数学的知识并善于舞文弄墨，但学习成绩并不出人头地。他吹嘘说，他每次考试前一个月才准备功课，到时通宵达旦地开三个星期的夜车，以抱佛脚。这种别具一格的学习方法，加上他本来就有些天赋，使他在第三学年末通过了毕业考试，并于1833年1月在公报上宣布为炮兵掌旗官<sup>①</sup>。

这位年轻的掌旗官仍需到炮兵学校上课。但既然取得了委任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10—111页，第2卷第106—107页。

状，他就可以任意选择住处。他三年以后又回到姑父母尼罗夫家里，感到又得到了自由，并已长大成人。只有一件事尚未得到，但在离校后不到一个月也得到了。他爱上了一位比他年龄稍小一点的远房表妹玛丽亚·沃叶柯夫，那时她正在彼得堡过冬。米哈伊尔每天都到她家里去。玛丽亚做针线时，他就高声读书给她听。他们争论究竟是艺术还是音乐对人类贡献更大。还讨论一些微妙的问题，如“爱情、情操、感情、敏感（我们小心地把它和伤感区别开来）和其他许多问题”。他们似乎并没有那么抽象地谈论爱情。玛丽亚对于这种高尚的求爱方式显然也未表现出什么不快。当他们一起外出进行社交活动时，他责备她卖弄风情，这也没有使她不快。四旬斋时，他为她朗读《马赛庸之书》。她复活节前一周第一次参加圣餐仪式，身着白色服装，他就在教堂里看着，“欣喜若狂地为玛丽亚和自己的家庭祈祷。”一次，他们一起去参加音乐会，听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贝多芬已成为米哈伊尔最喜爱的作曲家）。他听音乐时的面部表情，使玛丽亚吓了一跳，觉得他象“要摧毁整个世界”似的。玛丽亚肯定是个有领悟能力的青年女子。但不久就被她姑母带到乡下去了。在一封长达二十四页的信中，米哈伊尔向他姐姐瓦瓦娜倾诉说：“彼得堡已成为一片沙漠”。初恋的罗曼史就这样中断了，再也没有恢复<sup>①</sup>。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一个预备进炮兵学校的十五岁孩子和业已离校的近十九岁的成人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米哈伊尔对此感受很深。而其姑母尼罗夫却无动于衷，她仍然认为对她答应照管的内侄进行纪律约束是自己的权力和责任。当她听说米哈伊尔追求玛丽亚·沃叶柯夫时，她不仅反对，而且还规定未经允许不得外出。米哈伊尔当然不理这一套。于是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姑母尼罗夫乘机责备他在学校负债的事。米哈伊尔掉头就走，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78—79页。

发誓永不登门。既然米哈伊尔·巴枯宁是以一位伟大的叛逆者而不是以了不起的多情男子在历史上赢得了地位，那么就可以认为在他一生中第一次反抗比初次恋爱是更为重要的事件<sup>①</sup>。

大约就在他愤然离开尼罗夫家的同时，他奉命去夏训营地。这是一件幸运的，或者说是有意安排的巧遇，因为他正无法在彼得堡生活下去。8月份撤营后，他就会有足够长的假期回乡探亲。这是激起他内心感情的天赐良机。野外的营地生活本身就有恢复生气的作用。一天晚上，他阅读赶时髦的诗人威尼维提诺夫的诗歌，便沉浸在悔悟、爱情和万事和谐的心情之中。

〔他后来给他父亲写信说〕美妙的夜晚，满天的星斗，微微颤动的神秘的月光，这位伟大的、高尚的诗人的诗句都深深地打动我的心弦。心中的悲喜交集不可言状。啊！此时此刻，我多么纯洁，多么高尚。我感到心胸无限开阔，充满了对上帝创造的美好世界、对全人类、特别是对您、母亲和姐妹们的炽热的爱。

他毕恭毕敬地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承认了他和尼罗夫家的争吵和借款数目。他的年薪，其中包括房贴，只有七百卢布，故无力偿还债款而只能仰仗父亲。

1833年8月，他回家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近五年以来，他离开熟悉的风景如画的普列姆希诺庄、奥苏加河以及岸边一大片低矮的房屋，生活在陌生人当中，过着异乡的、不舒适的、不惬意的城市生活。家里人正在吃饭时，他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一一和他们拥抱。当他们仔细端详，从这个成年人身上认出他们过去熟悉的孩子的相貌时，他们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他后来写道，“这种感情只能感觉，无法形容”。每个人都感到无比的高兴。溺爱孩子的父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108—109页。

亲对这个青年的债务并不介意。他偿还了急于要还的六百多卢布的债款，其余就不管了。这些债主也许命该如此。十年后，他们还想讨债，那时他们连米哈伊尔的影子也见不到了。长子的债主向亚历山大·巴枯宁催款不再是什么新鲜事<sup>①</sup>。

\* \* \*

米哈伊尔回来和家人团聚是家史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这位年轻的叛逆者，由于在彼得堡的胜利而受到鼓舞，就在普列姆希诺庄内“揭竿而起”。很明显他是作为姐妹们的领袖和保护人而上阵的。在他回来三个月之前，听说他大姐吕波夫和一个姓雷纳的男爵订了婚。雷纳是驻扎在附近的一个骑兵团的军官。米哈伊尔当时并未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情绪，虽然也曾恳求姐妹们告诉他“这一件和我密切相关的事的详情。”现在他回到了普列姆希诺庄，很快就觉察到吕波夫对未婚夫的态度上有点不正常。他就盘问瓦瓦娜和塔蒂安娜。她们都私下告诉他，吕波夫不爱雷纳，但顶不住父亲要她和雷纳结婚的压力。米哈伊尔生来有强烈反抗性，犹如吕波夫生来就有屈从性一样。他自己本人就不能忍受姑母的专横行为，也决不容忍父亲专横地对待吕波夫。他自命为家庭年轻一代造反的头目，极力向吕波夫怂恿说，违抗父亲的意旨，拒绝雷纳的婚事是神圣的义务。公开而又尖锐的对立造成了两代人的隔阂，吕波夫苦恼地，犹豫不决地徘徊于他们之间。也许斗争的双方没有一个人考虑她的感情，或者想到她暗中所受的痛苦之深要超过他们每一个人，虽则这场决定她命运的斗争是因为她引起的。至于那位男爵的感情，则根本无人想到。

这不仅是一场两代人之间的斗争，而且也是两个世纪之间的斗争。如果说米哈伊尔没有在与玛丽亚·沃叶柯夫的热恋中神魂颠倒，那是因为他仍保持着一种浪漫主义热情的高尚概念。十九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109—110页。

世纪三十年代，浪漫主义即使在发展很慢的俄国也风靡一时，米哈伊尔首先把这种气息带到了普列姆希诺庄。一成不变的法律和陈旧的习俗不再能限制人的义务，人的本身天赋才智的义务应尽其能发挥出来，用青年人的眼光和哲理来进行判断，人所能得到的最高成就莫过于爱，爱是人生在世的最高使命。没有爱就是对圣灵的犯罪。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吕波夫犯这种罪。

对于出生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亚历山大·巴枯宁来说，所有这一切纯粹是极度的疯狂。他不仅对孩子们起来反诘他的决定大发雷霆，而且也不能理解他们的意图。他是十八世纪最有文化教养的人的代表，非常疼爱自己的子女，根本不相信什么激情。他相信冷静而谨慎的判断，却忘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即决定和瓦瓦娜·穆拉维约夫结婚——既不谨慎也不冷静。他得出推理性的结论说：让吕波夫嫁给雷纳是为他钟爱的长女带来幸福的最好机会。他认为要是由吕波夫自己决定，她一定会遵从父命的。在一个不涉及他个人而是他和女儿之间的分歧问题上，别人却来进行干涉，这使他既伤心而又惊讶。这种无法理解自己子女的感觉简直使他怒不可遏。

虽然“可怕的一幕”已经过去，米哈伊尔已回到彼得堡的岗位，但风暴并未就此平息。远离家乡并没有挫伤这位年轻人的热情，他继续写信责问吕波夫和父亲，对这门不公正的亲事提出异议，他还把吕波夫写给他的亲笔信寄给父亲，用以说明她并不爱雷纳。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把顽固的姑母尼罗夫拉到年轻一代一边，她也写信给她兄弟反对这门亲事。亚历山大·巴枯宁由于遭到四面夹攻，只好低头认输。他已六十五岁了。在精力和毅力方面都不是这位倔强长子的对手。因为他太钟爱孩子，最后还是不愿和他们顶牛到底。忍受了四个月的精神痛苦之后，吕波夫终于在12月获允解除婚约。那位男爵永远从普列姆希诺庄消失了。他的名字只不过是记在家史中的一件大事罢了。



〔米哈伊尔四年后给他父亲写信说〕我们普列姆希诺庄的生活是雷纳来的时候变化的。这种变化是肯定要发生的。那时，今昔之间的对立太尖锐，我和姐妹们都深有体会。我们兄弟姐妹一直衷心地爱戴您和母亲——是的，是衷心的爱戴，因为除了宗教信仰以外，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比您们更高尚的了——您们也和我们兄弟姐妹共享幸福和快乐……。可是您们突然地把自己和他们分开了，破坏了那种受人赞扬和羡慕的普列姆希诺庄无比和谐的气氛……。我们曾把您们看成钟爱子女的典范，所以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明白您们为什么要和吕波夫过不去。

风暴过去了。父母和子女又和好如初。但他们的精神面貌却发生了变化。孩提时期的看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父母绝对正确的信念和孩提时期的玩具都一起扔掉了。在米哈伊尔的一生中，对任何其他权威都要逐一加以审判。找出其弊病、宣判其灭亡的时期将要来临<sup>①</sup>。

\* \* \*

米哈伊尔已年近二十岁，转眼间已是成人了。回到彼得堡以后，他写信给普列姆希诺庄的姐妹们说，他发现人有“两方面的能力：一是体力，二是智力”。他渴望得到多方面的知识，努力钻研“俄国历史和俄国统计资料”。一反在炮兵学校做学生时那种腼腆、抑郁的常态，逐渐意识到自己不寻常的吸引力。姑母尼罗夫已经被他争取过来了。并且又在巴结尼古拉·穆拉维约夫，这是穆拉维约夫家族中当今最有名的人物。1833年秋天，米哈伊尔几乎每天都到他在彼得堡市郊的庄园里去。穆拉维约夫有十七个子女，其中有三个女儿都到了结婚年龄。米哈伊尔艳羡她们“心灵”上的特质。三姐妹个个举止娴雅、容颜美丽、聪明伶俐，远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04、113—120页，第2卷第113—114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78页。

非玛丽亚·沃叶柯夫可比。只有在观察、比较这一点的时候，他才想起了可怜的玛丽亚·沃叶柯夫。但是，米哈伊尔并不具体地爱哪一个。三姐妹都很可爱，根本无法要这一个而不要另一个。这个插曲后来不了了之。但它却似乎丰富了米哈伊尔关于情爱的想象力，因为十五年后，他为自我消遣模仿克雷比隆<sup>1)</sup>的《儿子》写过一篇艳情小说，其主题是小说的男主人公受神父的唆使糟塌了三位修女<sup>2)</sup>。

1834年初，即把雷纳打发走了几个星期之后，米哈伊尔在彼得堡的生活突然结束了。穆拉维约夫家几个女儿的吸引力虽未曾使米哈伊尔动心，但却足以分散他读书的精力。应得的惩罚在等待着他：终于以“不求上进，屡教不改”的罪名，开除出炮兵学校，派到驻扎在荒凉偏僻的靠近波兰边境地方的一个炮兵队。由于本性有点怯懦，——因为他最不能忍受被家里人看不起——米哈伊尔没有把自己的丑事写信告诉普列姆希诺庄的家人。他父亲还是从官方公报和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的一封偶然来信中才知道这件事的。这位犯过者在出发之前被准假回普列姆希诺庄探亲。然而，这次回家实在太不光彩。究竟是否回去过，已无从稽考。米哈伊尔于六月到达指派的地方——莫罗杰奇诺，明斯克省的一个小镇。在那里驻扎两个月后，炮兵队转移到维尔纽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阅兵。部队于十月份开始冬季宿营，驻扎在格罗德诺省境内的卡图茨—贝拉扎<sup>3)</sup>。

---

1. 克雷比隆（1674—1762），原名prosper Jolgot，法国剧作家。——译注

2.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20—126页。这篇中篇小说（未发表）在德累斯顿国立档案库中的巴枯宁档案卷宗里。

3.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406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27, 133, 139—140页，第4卷第102页。

米哈伊尔以后对波兰的遭遇所表示的同情，并不是这次被迫在这个不幸国家的边境逗留而引起的。波兰大起义和对波兰自由党人的镇压已经过去三年。米哈伊尔坚信对起义者采取的激烈措施“非但是可以谅解的，而且是必要的”。他在维尔纽斯参加过两次舞会，发现波兰女子“温柔、聪明、跳舞很出色，而且看上去穿戴入时”。除此以外，他和波兰社交界没有什么往来。他还注意到，在他居住地区的地主豪绅是波兰人，而人民大众无论在风俗和语言方面却是俄国化的。米哈伊尔一生都积极反对波兰地主阶级对前波兰王国东部边境的领土要求。

米哈伊尔在军队服役期间所取得的最实在的成绩是加强了他对知识进取心方面的新兴趣。“一种不知不觉的，几乎是本能的求知欲望”使他的驻防生活倒也不显得那么寂寞。他埋头读了许多他能弄到的书籍——游记、物理课本、俄文语法（和当时大多数有文化的俄国人一样，他写出来的法文要比俄文流畅准确得多。给家里人写信几乎全用法文），以及卡普菲格<sup>①</sup>的《复辟史》。他还研究过“立陶宛的历史和各种统计资料”，并打算学习波兰文。他在维尔纽斯认识一个军医，他是研究德国哲学的学者，他使米哈伊尔第一次对这门关于人类思想的新的和广阔的领域略有所知。但是米哈伊尔生来就不准备做空想的学者。他需要经常交流思想和情投意合的伙伴的激励。军营里，人们认真考虑的无非是老一套的军需事务，娱乐活动不过是喝伏特加酒和打牌，米哈伊尔觉得和这样一些人总是合不来。他经常藉给普列姆希诺庄写家信倾诉内心的苦闷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孤寂。

我在此孑然一身，万分寂寞。无穷的寂静、无尽的悲哀以及无限的乡思与我的寂寞生活为伴……。我从经验里发现那位日内瓦哲学家所宣扬的

---

<sup>①</sup> 卡普菲格（1802—1872），法国政治家和史学家，保皇派。——译注

那种独居之妙趣完全是一派最愚蠢的诡辩。人生来就离不开社会。不能没有一群知己和与他共甘苦的亲友。自甘寂寞无异于利己主义，而利己主义者又有何愉快可言呢<sup>①</sup>？

米哈伊尔几乎忍耐不住了。1835年1月，他被派到特维尔去给炮兵队养马。不知得到允许与否，他便急忙回普列姆希诺庄去探望父母姐妹。一回到熟悉的环境与最快乐的挚友之中，要再回到那偏僻的波兰驻防地，他简直不敢想象。近两年来，这位任性的年轻人对决心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纪律是为懦夫和胆小鬼，而不是为有勇气和有抱负的人制定的。他称病呆在家里不走，并提出辞呈。父亲感到有说不出的苦恼。姐妹们则又是惊讶又是钦佩地袒护着他。然而米哈伊尔就是喜欢让姐妹们吃惊，而且使父亲苦恼也满不在乎。他的这种越轨行为军队当局当然不会不管。他险些为这次开小差而被缉拿。但是家庭一出面，事情就解决了。不久就宣布了“因病经本人申请，退伍”。这时他还不到二十一岁。他父亲以前硬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军人，现在要另觅前程还不晚。他没有什么打算。但有一点他是更为确信的：那就是完全相信他的命运<sup>②</sup>。

在米哈伊尔戏剧性地回家的前一个月，普列姆希诺庄发生了另一个重大事件。二姐瓦瓦娜和一位骑兵军官、特维尔省的地主尼古拉·迪亚科夫结了婚。对她来说结婚是出自理智而不是出自感情。迪亚科夫虽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人，但却不是最明智的人。他干的最不明智的一件事也许就是和这个粗暴无礼的家庭结亲。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40—142页，第2卷第318页。

②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404—405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88—89页。

因为这家人对上门来的、即使是有聪明才智的人也是很粗鲁的。他的愚蠢行动的后果目前尚未显示出来。米哈伊尔在普列姆希诺庄住了将近两个月，以恢复在波兰边境的艰苦生活中所消耗的精力，而对于这种有逃兵嫌疑的状况却泰然处之。三月间，他同吕波夫和塔蒂安娜一起去莫斯科。

## 第二章

# 爱情与形而上学

在米哈伊尔一生中，首先对他学识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一位年龄比他大不满一岁的年轻人，名叫尼古拉·斯坦凯维奇。斯坦凯维奇和米哈伊尔一样，也是一个地主的长子。与他同时代的人都说他人格高尚，才思敏捷。从一张留存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他眉目清秀，丰姿俊雅，乌发飘垂，目光炯炯。与他相识的人无不为之倾倒。他体力不强，意志不坚，显然缺乏当领导人的素质。然而，这些不足之处正是他的魅力的一部分。和多数软弱者一样，他十分需要而且很善于博得别人的同情。兼之他天资聪慧，也同样善于体贴别人。男男女女都很自然地对他产生好感。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不曾有过一个仇人。他在俄国历史上以及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生平中则加倍重要。他是俄国第一个引人注目的浪漫主义者，为俄国思想界打开了德国形而上学这个广阔而又丰富的领域，是一位大无畏的先驱<sup>①</sup>。

俄国的浪漫主义显然渊源于德国。浪漫主义产生于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大萧条和衰落时期的德国，是十九世纪初期以抽象与理念反对此前的实利主义的革命。这在诺瓦利斯的“蓝花”<sup>②</sup>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386页。

② 德国作家、德国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诺瓦利斯（1772—1801）在其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亨利·冯·奥夫特丁根》里，描写主人公终生追求一朵神秘的蓝花，反映出作者的神秘主义思想。——译注

——浪漫主义诗人寻求的一种神秘目标——中，以及蒂克、霍夫曼和让·保尔·李希特尔<sup>1</sup>的空想与超自然的小说中都有所表现。歌德卓越地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大成，将浪漫主义的幻想世界寄托在意大利。尤其是俄国人还从《威廉·麦斯特》借用米格农的一首名歌，作为浪漫主义理想世界以及通过未知力量的魅力就能得救的象征。斯坦凯维奇和朋友们的通信中一再重复“我们的道路通向那里”，作为浪漫主义的口号。半个世纪以后，在契柯夫的三个乡下姑娘《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中得到了最后的不真实的回响。在斯坦凯维奇一代人看来，浪漫主义意味着逃避现实，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日常实际的需要产生了浪漫主义所特有的二元论，即陀斯妥也夫斯基及其后时代一直不断地萦绕着浪漫主义文学的“分裂性格”。

十八世纪是一个标榜理性的男性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口号是爱情，开始把女人捧到受人敬慕的地位（如施勒格尔<sup>2</sup>所说，女人的内在本质就如同诗歌一般）。但是，甚至这样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也异常鲜明地表现了其固有的二元论。而尼古拉·斯坦凯维奇拼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图在整个一代人中是很典型的。

聚集在斯坦凯维奇周围的年轻人中有两个女子，是一个姓贝叶尔的有钱寡妇的女儿。贝叶尔在特维尔有一座田庄，和巴枯宁家很熟。在娜塔丽·贝叶尔身上，斯坦凯维奇似乎看到了那种纯洁浪漫主义的友谊。正如他曾写过的那样，“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最神圣的人类之爱”。<sup>3</sup>但是他又一次失望了。几个月高尚感情

---

1) 蒂克（1773—1853）、霍夫曼（1776—1822）和让·保尔·李希特尔（1763—1825）均为德国作家。——译注

2) 施勒格尔（1767—1845），德国诗人，反动的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3) 《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239—244页；施勒格尔：《理想》，第127页。

的交流之后，娜塔丽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和歇斯底里。她是个血肉之躯，感情容易冲动的年轻女子，并非天生就要在精神上扮演一个圣人的角色。1834年春，正当米哈伊尔要动身到发配地波兰边境时，吕波夫·巴枯宁随母亲一起来到莫斯科。吕波夫温文尔雅，超尘脱俗。斯坦凯维奇在她身上总算看到了浪漫主义理想的化身。可是，他太胆怯，讲话毫不果断。吕波夫回普列姆希诺庄之后，斯坦凯维奇跟娜塔丽不自然的友情又继续下去。出于妒忌，娜塔丽的感情复杂化了，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她的朋友指责斯坦凯维奇玩弄她的感情，使斯坦凯维奇狼狈不堪。1835年2月，米哈伊尔、吕波夫和塔蒂安娜一起来到莫斯科时，事情就搁下来了①。

\* \* \*

米哈伊尔的姐妹走了以后，他仍在莫斯科呆了一个星期。在这一星期内，他几乎和娜塔丽及其妹妹亚历山德拉形影不离。这个星期还未结束，他就完全取代了斯坦凯维奇，成为娜塔丽狂热崇拜的偶像。娜塔丽的选择乍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任何落入斯坦凯维奇精心设置的感情圈套的人理应从米哈伊尔健壮的体格和有信心的心中找到一种脱套的方法。乍看起来，米哈伊尔倒象这样一种年轻人，即一旦产生好感，就不是斯坦凯维奇的那不形于色的浪漫主义的痴情所能干扰的。开始几次接近就很有希望。米哈伊尔刚从去年服役所受的屈辱以及在普列姆希诺庄所受的冷遇中摆脱出来，便发现娜塔丽的热诚爱慕，这使他格外高兴。他勇气倍增，精神面貌日益好转。他甚至还暗示娜塔丽说，他的姐妹们对他并不十分理解，还把他当成孩子，她们对他未来的崇高使命并不相信（尽管他自己也不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娜塔丽迫不及待地答应，她完全理解他在家里迄今尚未得到谅解。

塔蒂安娜是姐妹中最厉害、最妒忌的一个。她写信给亚历山

---

① 《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221, 254—255页。



德拉·贝叶尔，以十九岁女子所具有的粗暴态度，对娜塔丽向米哈伊尔所表示的初步爱情表示极大的轻蔑<sup>①</sup>。

在姐妹们的影响下，他对那些脾气暴躁的少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要的是精神上的交往，他要的是手足般的浪漫主义爱情。但他尤其需要的是温顺而又钦慕他的信徒。他发现这些要求和感官的独特需要是不一致的。到目前为止，他和斯坦凯维奇两人的意见是相同的，是遵循著名的浪漫主义风格的。但是，米哈伊尔对二元论却一无所知，对使斯坦凯维奇苦恼的自我矛盾也一无所知。和斯坦凯维奇不同的是，他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明明白白，不容人提出任何疑问。就是从与贝叶尔姐妹们的关系上，也可以首先看出米哈伊尔的举止有一种反常的倾向。他和玛丽亚·沃叶柯夫的童年爱情以及和穆拉维约夫家女孩子们逢场作戏，还不能说是有什么不寻常的表现。但是，米哈伊尔后来确实患了阳痿症。关于这个问题，既无诊断书，亦无其它资料可以佐证。但是，看来他无此种能力很可能始于青春时期，由于憎恨独断专行的母亲的心理而造成的。后来他提起这件事就很气愤。由于不能发泄性欲，他那激动的感情就倾泻到生活中的一切私人关系和政治关系上面，并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怪诞的和具有破坏性的个性。这种个性甚至在不相容的地方也会蛊惑人心，并在十九世纪半个欧洲留下了痕迹。

4月间，米哈伊尔给贝叶尔家的女孩子们写了两封信（这两封信虽然主要是写给娜塔丽的，但却小心谨慎地写给姐妹俩）。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直言不讳地拒绝性爱；二是为他自己的特殊使命而引为骄傲。他对收信人解释说，要是为其中一人的感情——“与感官有关而与心灵无关的炽热的冲动的感情”——所迷惑，那就会存在爱情发生变化的一种危险。但是，既然他爱她们

---

<sup>①</sup>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152—157页。

的高尚的心灵和美好的感情，那么就什么都不能损害这种“纯朴而微妙的关系”。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过去他所知道的爱情及其“不堪回首的往事”，在他心坎上打上了烙印（看来这就是对玛丽亚·沃叶柯夫的清晰回忆）。但是，这种爱情纯属双料的利己主义。

不，我的使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是一个现代的人物。上帝已经在我心上写下了概括我全部生命的圣辞：“他不应为自己而活着”。我打算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我决不辜负它。能为这种神圣的目的而牺牲一切——那就是我唯一的抱负……其他的幸福我是无份的。

这样，在确定了自己的感情界限之后，他恳求贝叶尔姐妹把他当作知己。娜塔丽一定会“向他倾诉自己的悲伤，并从中寻求力量和忠告”。但是，因为担心这种劝诫会被理解为只是对一个人说的，所以也要请求亚历山德拉“和他共享她开阔的胸怀和感情”。写上了这句既友好又保险的话以后，米哈伊尔结束了他的又一次说教。贝叶尔一家去乡间消夏，这样，前几个月不愉快的情绪也就告一段落了<sup>①</sup>。

1835年夏天，米哈伊尔主要是在普列姆希诺庄度过的。7月间他写信给斯坦凯维奇的朋友埃弗莱莫夫，他们曾在莫斯科见过面。信中写道：

如果意志是由神圣的感情和思想来表达的话，那么，它就是人的主要本质。但是，我们的意志仍未得以发展，它尚未摆脱十八世纪那种令人窒息的、充斥着放荡和诈骗的束缚，也未摆脱鄙俗和自命高尚的愚妄行为，更未摆脱对一切高尚的东西持怀疑的态度以及对地狱可鄙的恐惧。……不，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65—173页。

我们还不属于十九世纪。我们只不过处于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的转折时期，处于一种令人苦恼的境地，处于两种势不两立观点互相抵消的间歇时期……发展我们的意志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当我们能够说：“我希望的就是上帝希望的”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幸福。那时我们的苦难就会终止。只有到那时，我们才配得到它们。

这位年轻的浪漫主义者所集中的意志力量尚不足以发现其使命，但他早已将意志和神圣的目标合二为一了<sup>①</sup>。

\* \* \*

10月中旬，埃弗莱莫夫和斯坦凯维奇本人来普列姆希诺庄住了十天。斯坦凯维奇似乎曾指望会有机会使他对吕波夫·巴枯宁那种令人烦恼而又羞怯的感情有一个结局，但希望落空了。要想使吕波夫表明自己的心事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斯坦凯维奇也没有勇气采取主动。这次来访虽使吕波夫的感情受到了挫伤，但却大大地有益于米哈伊尔。他们是春天在莫斯科开始相识的，后来逐渐成为密友。虽然米哈伊尔敏捷机灵的头脑总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不是靠看书丰富起来的，但是，他却陶醉于斯坦凯维奇涉猎德国形而上学新领域的事迹。最后，米哈伊尔浪漫派的理想主义总会找到一个扎实的哲学基础。

斯坦凯维奇研究形而上学主要是研究溺于空谈与伤感的谢林。谢林把自然、人类和历史视为“绝对”的不同表现形式，并与基督教上帝是一致的。大约就在去普列姆希诺庄作客的时候，斯坦凯维奇开始意识到需要学一些更为实在的东西。于是，他就研究康德。精通这位当代哲学创始人的著作的必要性，是他在普列姆希诺庄作客十天里多次热烈讨论的主题。斯坦凯维奇回莫斯科后第一个行动就是送米哈伊尔一本《纯粹理性批判》。整个11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74—175页。

月份，这两位友人，一个在莫斯科，另一个在普列姆希诺庄，开始研究康德哲学体系。几乎每天都通信交换看法。关于这件事，只有斯坦凯维奇的信件保存下来了。

甚至连斯坦凯维奇也发现这件事不容易。“我崇拜康德，”他写道，“虽然他时常使我感到头痛。”很明显，他担心米哈伊尔由于不熟悉德国形而上学的术语而半途而废。他要他的这位学生每天花在康德的研究上不要超过三小时，加强了对其中难点的解释，又在莫斯科搜集德文和法文的注释本。米哈伊尔鼓足勇气坚持下去，并向他的朋友保证说，“不吃透康德的精神决不罢休”<sup>①</sup>。

米哈伊尔和父亲的关系又发生了一次最严重然而也是巧合的危机，使他的研究工作中断了。好几个月——自他从部队开小差——以来，家庭一直充满着安宁的气氛。亚历山大·巴枯宁是个讲究实际的人。过去的一切是不可挽回了，因为在米哈伊尔解职被正式宣布以前，不可能对将来作出什么安排。因此，他也不理会这件事情。这时，他对米哈伊尔的略有哲人风度的爱好嗤之以鼻，认为他也许会带着姐妹们一起出去跳舞，而不是象第欧根尼一样，埋头读书和吸烟。但是，当正式手续于12月办完、米哈伊尔获得自由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了，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sup>②</sup>。

亚·巴枯宁对这个问题早已胸有成竹。一个贵族兼地主的儿子不论文武总是要担任公职的，这才是唯一荣耀的甚至是保险的职业。既然习武这条路走不通，那就理所当然地要选任文职。几个月前，米哈伊尔似乎同意这种安排。但是，从那时起，他对于

---

① 《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336、576—597页。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76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404—405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89，161页。

世界使命的看法已深深扎了根。斯坦凯维奇利用他耳朵软的特点，对他灌输了治学优于仕途生涯的思想。德国哲学不仅是所有知识的总结，而且有一天会有必要到柏林去寻求这种知识。就在上个月，斯坦凯维奇还在给他朋友的信中重复了熟悉的词语“到那里去！到那里去！”其时，莫斯科的学生生活是快乐的。米哈伊尔上次去时，由于无知，只不过是稍有领略。把自己关在官吏的办公室里，审阅行政文件，而不能阅读虽然难懂，但却令人陶醉的康德的著作，那是不可想像的<sup>①</sup>。

1836年新年，全家在特维尔省城团聚时，危机到了严重的关头。这个年轻人的军旅生涯并无可以赞誉之处，但是，特维尔省的省长托尔斯太伯爵是他们家的世交，答应在他主管的部门中给米哈伊尔找个职位。对这种好意的帮助自然不好拒绝。亚·巴枯宁因为年事日高，又可能随时失明，所以性情越发急躁。米哈伊尔则避而不谈。他曾半开玩笑地说，他整整一个星期都“借酒浇愁”，甚至还想到过自杀，连身体都弄垮了。他没有勇气，也不忍心去与父亲或那位伯爵作对，甚至对他姐妹们也一言不发。他突然去莫斯科，从那儿写信给他父亲说，他拒绝选择任何仕途生涯，决心要从事哲学研究，愿在这期间当一个数学教员来谋生度日<sup>②</sup>。

亚·巴枯宁已年近古稀，体力日渐衰弱。长子应随时准备代他料理家务，分担责任。他自己认为从来就不是一个严父。他曾替儿子偿还过在炮兵学校的债款；忍受过他反对雷纳的不从父命的行为。总的来说，他对儿子尔后的冒犯行为总是宽大为怀的。但是，儿子受军事教育时搞得一团糟，竟然当了逃兵，还傲慢无

---

① 《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572、581页。

②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141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398页。

理地拒绝父亲多方尽力为他谋就的舒适职务，要在莫斯科住下去，那里既无谋生之道，又无前程，更无确定职业，这是他从未遇到过、无法忍受也是不能理解的事。

亚历山大无可奈何地提笔写信给米哈伊尔：

我已收到你从莫斯科的来信，知道你仍然鬼迷心窍，不愿回头。你的出走使我吃惊，更使我痛苦。真正的哲学并不存在于空幻的理论和空洞地文字游戏之中，而是存在于对家庭、对社会以及对国家都要承担普通的义务之中。你对这些义务满不在乎，却去胡思乱想，侈谈什么可以补偿你一切的“精神生活”，时至今日还不能自拔。你的郁闷不乐是你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和闲逸生活的必然结果；也是你良心不安的必然结果。我从来不是一个专横的人。你要是顺从我的心愿，那就值得称赞，并且对你大有裨益；若是要我附和你的心愿，同意你那不可理解的行为准则，那将是荒唐可笑的。你要是果真还能回心转意，出路还是有的，那就是：反躬自问，恢复理智，毫无二意地做个孝子。只要你再听话，可以既往不咎。还是相信你瞎眼的父亲，而不要相信你那瞎眼的……你叫它什么都行。这就是我最后的话。

亚历山大尽管雄辩，其结果也和大多数父亲的劝告一样。米哈伊尔仍然呆在莫斯科，几星期后写信给瓦瓦娜说：

爱之所在就无所谓义务，义务是把爱排除在外的。而排除爱的任何东西都是下流的和卑鄙的。对我来说，父母并不存在，我不承认我有父母，我不需要他们的爱<sup>①</sup>。

---

①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141—142页；斯切克洛夫编：

《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23页。

## 第三章

# 浪漫的盛夏

在莫斯科与彼得堡这两座新都与古都之间的竞争，一直是二百年来俄国历史的特征。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是莫斯科明显地占优势的时期之一。它在拿破仑付之一炬之后重新崛起，其壮观和威望不下当年，而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却使彼得堡成为反动势力的堡垒。莫斯科成了先进思想的大本营。那里的年轻人尚能有少许的言论自由。莫斯科大学成为知识分子活动的场所。学生们自己组织小组，即今之所谓“团体”。这些“小组”的影响迅速地超出了大学的范围，并在哲学、文学和政治等领域创立了俄国思想的新学派。其中两个“小组”颇有声望并留在人们记忆中。亚历山大·赫尔岑及其朋友奥格辽夫属第一个“小组”，致力于政治，并以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作为思想基础。第二个就是以后大家所熟悉的斯坦凯维奇“小组”，它回避政治，只是大胆而不冒险地在德国诗人和哲学家的著作中寻求真理。

米哈伊尔参加了这个年轻的狂热者所组成的“小组”。他在哲学方面的研究使他深受欢迎。第一个月，他与斯坦凯维奇住在一起，后来又跟埃弗莱莫夫住在一起。必将成为这一代伟大文学评论家的维萨里昂·别林斯基也是他的挚友。米哈伊尔好学而又更好为人师。见过他的人曾说过他如何“粗暴地对待每一个新加入的人而又怎样立即将他们引入哲学的神秘境界”。后来经常参加这“小组”活动的屠格涅夫（虽然在那里他没有遇见过米哈伊

尔)曾对夜间聚会作过一番生动的描述:

想想看吧,五条汉子、六个大小伙子,点着一支蜡烛,吃着蹩脚的茶点和变质发霉的饼干,然而你应该瞧瞧我们的面庞,听听我们的谈话。我们在谈论上帝、真理、人类未来和诗歌……的时候,眼里射出兴奋的光芒,脸上热辣辣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夜晚犹如插上了翅膀,静谧无声地消逝了。东方发白之后,我们便各自散去,虽然身感疲倦,但大家都是心情激动、高高兴兴、胸无杂念,而且头脑也很清醒(当然聚会上少不了喝酒)。在回家途中,怡然自得地走过空荡荡的街道,甚至还以亲热的眼光仰望着天上的群星,仿佛它们变得越来越近,越来越可以理解的了<sup>①</sup>。

大多数俄国思想家都比较喜欢伦理学而不太喜欢形而上学。米哈伊尔到莫斯科时,斯坦凯维奇小组已放弃研究康德学说,而研究起费希特的更为时髦的道德学。费希特的著作《幸福生活指南》是创立伦理学的唯心主义体系的一次尝试。米哈伊尔对这本书爱不释手。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书信中连篇累牍地引用和译述此书,并将费希特的讲演集《论学者的使命》译成俄文。译文刊载在当时的进步刊物《望远镜》杂志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作品,大概捞到了几个卢布。至于其他的钱从哪儿来则不清楚。他吹嘘说他匆匆离开特维尔,有如“从麦加逃到麦地那”<sup>②</sup>,使他可以独立生活。尽管他鼓起勇气声称这次逃跑已经使他成为“一位大丈夫”,但他还是一文不名。他故意虚张声势,定制了大量名片,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96,204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8卷第11页;帕纳也夫:《文学回忆录》,第239页;屠格涅夫:《罗亭》。

② 麦加,沙特阿拉伯城市,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诞生地。麦地那,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穆罕默德的坟墓所在地。——译注



上面印着“数学博士巴枯宁先生”，并向有钱的贵族、亲戚递送这些名片。直至4月，他才收了一个学生。这期间，他靠向朋友借债度日。倘若朋友无力借钱或者不愿再借，他就向放债者借贷。米哈伊尔能够心甘情愿地忍受贫困，可是一旦手头有钱，他就喜欢下馆子，请朋友进最豪华的餐馆，买各色名酒大吃大喝。他不在乎钱，更不把还债的事放在心上。于是此公逐渐名誉扫地，甚至在什么都不在乎的波希米亚人的圈子里，也认为他是个爱揩别人油的人。起初，朋友们不过是说着玩玩，后来便半真半假地给他起了个绰号“赫列斯塔科夫”，果戈理的著名喜剧《钦差大臣》中的吹牛大王和食客。

就是无其他门路，他也还有个容身之处。贝叶尔夫人的门仍然是向他敞开着。不管怎样，对象娜塔丽和亚历山德拉这样两个敬慕他的门生揭示费希特学说的奥秘，总是件愉快的事情。费希特的讲演集《论学者的使命》助长了米哈伊尔本来就爱教训人的天性。

〔他在信中天真地自我流露〕我是条硬汉子，我觉得有必要保护所爱的人。我需要有一个俯首听命于我的人。

作为那些感情热烈的少女们的导师和听忏悔的神父，二十一岁的米哈伊尔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不久，他就迫不及待地向他的姐妹们说，与贝叶尔一家来往，对他来说已成为“不可缺少”的了。而他更迫不及待的是要娜塔丽和亚历山德拉相信，“他的心和他的友情”是属于她们的。去年的情景有可能一一重现。

这个时候，亚历山德拉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贝叶尔夫人是个专横的女人，从不允许子女违抗自己的意志。她竭力提醒亚历山德拉注意，说有一个讨厌的求婚者正在追求她。而这女孩子很快就萌生出家之念，想进修道院去做修女。米哈伊尔作为家庭叛逆

的老手，插手这种局面。他要亚历山德拉把他看作“天职就是解救她并为她打开真理之门的人”。他并不过分夸大其词地将俄国的修道生活比作吹牛欺骗、毁谤中伤和藏垢纳污之所。他要求瓦瓦娜邀请亚历山德拉到特维尔来与她同住以拯救亚历山德拉。邀请被接受了。米哈伊尔又一次获得了胜利。贝叶尔夫人气得发疯，真想早该打亚历山德拉一顿。不过从此以后再也没听说过求婚者和修道院的事<sup>①</sup>。

正如几天后他给娜塔丽的信中所说，她走之后，“使他感到万分痛苦和寂寞”。斯坦凯维奇已去高加索疗养，小组由于天热而中止活动。米哈伊尔在莫斯科没有什么其他的朋友了。于是他在叶卡捷里纳·列瓦晓夫的家中成了一位受欢迎的客人。叶卡捷里纳·列瓦晓夫是一个贵族，他支持先进思想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米哈伊尔并不太喜欢那些他不能支配和指使的朋友。即使他星期天在那里吃饭很方便，他也从不放过机会“对这群缺乏信仰、爱情和思想的卑鄙家伙要大发一通脾气”。还有个姓波纳马列夫的学生，米哈伊尔正帮助他准备数学和物理考试。但是没有别的吸引人的东西，要米哈伊尔认真负起作为一位私人教师的责任而留在莫斯科是办不到的。在第一次反抗时，他曾堂而皇之地要求过“个人自由”，宣称他“不能再过家庭生活”了。但他现在明白多了。爱情和同情对他就象氧气一样不可缺少，可是既然他与贝叶尔家的尝试已遭失败，那末除了在他爱慕的姐妹之外，还能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它们呢？不管怎样，普列姆希诺庄毕竟是他的故乡。夏天的景色和声音都是他自幼熟悉的，都是他内心所不忍离弃的。5月中旬，贝叶尔一家离开两星期之后，他不能在莫斯科再呆下去了。于是他置学生于不顾，匆匆忙忙地回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09、259页，第2卷第74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78、284—285、290页。

到了普列姆希诺庄。所谓“从麦加逃到麦地那”就以这浪子归来而告结束①。

\* \* \*

1836年的夏天是米哈伊尔一生中第一个时期的顶峰。他又一次而且永远地摆脱了父母的管教和可怕的固定职业。既然团聚驱散了贝叶尔姐妹在中途所投下的妒忌的阴影，那么，米哈伊尔就可毫无拘束地进行热情洋溢的说教，他的姐妹也可毫无拘束地热烈地聆听他的说教。虽然年迈的亚历山大·巴枯宁对他长子的行为的看法仍旧没有改变，但也没有理由继续争执下去，或者仍然持优柔寡断的态度。两代人之间的论战遂告中止。兄弟姐妹也在相互敬爱中过着太平日子。米哈伊尔从来没有过这样得意的几个门生。他只在夏天离开普列姆希诺庄一次。——去特维尔住过几天；这次短暂的离别使女孩子们能有机会测定一下米哈伊尔在她们身上所激起的感情的深度。

理想化的兄妹之间的爱情在浪漫主义运动时期是屡见不鲜的。这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过，象夏多布里昂的《控制》、席勒的《墨西哥的新娘》和雪莱的《穆斯林的反叛》等特有的著作中也曾出现过。在普列姆希诺庄，这种情形本来就有。据我们所知，阿列克斯·巴枯宁是个极其正派的年轻人，他在一封信中曾写道：“对我来说，只有一种真挚的神圣的爱情，那就是兄妹之爱”。毫无疑问，米哈伊尔对塔蒂安娜的狂热的爱情，是为他不能进行正常性爱寻求补偿。几年以后，他自己也意识到这样做具有不正常的乱伦的性质。“法律认为我所爱的人是不适宜的”。这是从他刚离俄国不久写的信中摘录出来的话，唯恐这话所指不明确，他又补充说：“塔蒂安娜，这指的就是你”②。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11，249，299，301页。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93，217—218，271页，第3卷第2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77页。

\* \* \*

费希特学说纯粹是浪漫主义精神在哲学上的表现，它把康德的理想主义发展为极端的主观主义。这种学说是那个时期米哈伊尔思考的和他与姐妹们通信和谈话的主要内容。米哈伊尔研究了《幸福生活指南》以后就对他的姐妹十分肯定地说：“灵魂应该是自身的对象，它不应该有其他的任何对象”。他用下列的话给姐妹们概括了费希特学说的“基本思想”：

生命就是爱情。生命的全部形式和实质构成了爱情并始于爱情。如果你希望找到真正使你快乐的东西，那么，请你告诉我，你真正爱的是什么，你灵魂所渴望的，你所追求的是什么，你就等于向我揭示了你的人生，你所爱的就是你的生命。

他一直在考虑“精神”生活和“尘世”生活的区别，后者是“一种虚假的生活”，是建立在“处世本领和反基督教关于义务的说教的模式”基础上的——可以认为他经常听他父亲这样说过。这就是“廉价的实用伦理学和分文不值的道德经”。费希特的信徒们可以在自身灵魂的精神生活中摆脱这种尘世生活的义务负担。

〔米哈伊尔向塔蒂安娜解释道〕我也不需要它，我过着纯粹的精神生活。我仍然是自我，完全埋首其中。只有这种自我才能把我和上帝联系起来。

离开上帝似乎只差一步。他后来写道，“我感到苦恼，因为我是人，而又想成为上帝”<sup>①</sup>。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赫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09, 221, 271—275, 300页。

然而，如果说费希特为这位年轻的浪漫主义者从他自己神圣灵魂的沉思默想中提供了逃避现实的避难所的话，那末诗人和小说家则为他指出了另外一条通向梦幻世界的道路。米哈伊尔就是在斯坦凯维奇小组开始研究让·保尔·李希特尔和霍夫曼等著名的小说作家。这两位作家都证明了巴尔扎克对后者的形容是正确的——“*Le poète de ce qui n'a pas l'air d'exister, et qui néanmoins a vie*”（诗人说的似乎不在，但实际存在。）米哈伊尔的浪漫主义信念认为精神世界先于物质世界，不存在的东西是现实的，他的这种信念在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艺术表现。由于受了上述影响，这种超自然的魅力给米哈伊尔的思想和志向添上了一层色彩。斯坦凯维奇和巴枯宁一起在莫斯科时，曾记载道：“米哈伊尔对我说，每当他从外面回来时，他总希望发现一些异常的东西。”米哈伊尔自己在“给沙皇写的《忏悔书》”中，也提到他这种“天生的固有的毛病——喜爱荒诞不经、闻所未闻的冒险故事”。这类冒险故事开拓了无边无际的知识的广阔天地。这种精神上的兴奋剂又通过阅读歌德、席勒作品，尤其是蓓蒂娜·冯·阿尔宁伪造的跟歌德来往的信件而得到补充。同时代的人从这些信中看到了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美丽的花朵，而下一代人却从中看到了令人发笑的模仿。正如许多年后，米哈伊尔在回忆时所说，就是在这个夏天，他在普列姆希诺庄，“在花园里，借着烛光，坐在洞室顶上连夜翻译蓓蒂娜的著作。”<sup>①</sup>

斯坦凯维奇小组、费希特的哲学、德国的幻想小说家、夜间翻译蓓蒂娜的充满浪漫情调的作品以及与他姐妹间情感的交流——所有这一切在米哈伊尔心中是和普列姆希诺庄的影响融为一体的。对于巴枯宁家的年轻人来说，普列姆希诺庄是浪漫主义精

---

① 《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347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35页，第3卷第250页。

神的中心和实体。由于这里恬静宜人无尘世之扰，人们可以过着那种惬意的自由自在的精神生活。浪漫派的理想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贵族所信奉的，其特有产物就是懒惰。它的前提是理想主义者应有机会悠闲自在地陶冶他个人的灵魂，而这类产物在普列姆希诺庄肥沃的土地上是可以车载斗量的。米哈伊尔·巴枯宁从未发誓放弃普列姆希诺精神的长子继承权。他自始至终是一个贵族。

虽然米哈伊尔自己此后很久一直没有做过贵族，但还是有必要看一看这种似乎有理的问题的另一面。普列姆希诺庄年轻的浪漫主义者的高尚思想只限于感情上的自我放纵和相互爱慕。正象米哈伊尔后来所承认的，这种思想“充满了感情和想象，但却一点也不现实”。对于农奴——使这种精神生活成为可能的“现实”——的命运，他却从来没有想过，对人类的义务感和对个人之外的任何事的责任感则根本没有。

〔米哈伊尔后来在狱中长期反省后写道〕象我们这样抽象的精神已使思想专心致志，就象下棋的人只顾下棋一样，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动态，对我们周围人的思想、感情和印象根本不闻不问。

可是，正是那位最聪明的弟弟保罗，十年后在给瓦瓦娜的信中最恰当地总结了普列姆希诺庄所特有的弊病：

少年时代过份热烈的想象、不着边际的理论、过度的热情犹如把许多糖果和香料塞进空肚子一样。但一个人首先应该吃的还是普通的不涂黄油的粗面包。

米哈伊尔这个地道的浪漫主义时代的人物，一辈子都不愿啃严酷现实中的普通面包，却去咀嚼他自己幻想中的糖果和香

料<sup>①</sup>。

1836年的夏天是米哈伊尔浪漫主义时期的顶点。他从来没有象这样完全逃脱现实，在与亲爱的姐妹的来往中，米哈伊尔把普列姆希诺庄变成了一个他自己的想象中的梦境。这就是他一生中想一直住下去的梦境，因为他为反对现存的世界奋斗了一辈子。他一生喜欢他自己那种浪漫主义的幻想而讨厌世俗的现实。但是这种幻想此后再也不会如此令人信服，想象中的东西再也不会如此完满。夏季的这些日子是米哈伊尔一生中最后一个充满和谐的时期。不到秋季来临，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已使现实闯进了普列姆希诺庄。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7页，第4卷第220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360页。

## 第四章

### 严峻的现实

米哈伊尔1836年5月离开莫斯科之前，曾邀请他的新朋友别林斯基于是年夏天去普列姆希诺庄作客。后来又再次发信邀请。别林斯基感到左右为难<sup>①</sup>，想去而又怕去，拖了好长时间，才于8月下旬前往。

他感到左右为难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维萨里昂·别林斯基比米哈伊尔大三岁，是一个收入微薄的军医的儿子。在等级制度森严的俄国社会，别林斯基当然是与巴枯宁家和斯坦凯维奇家那样的“世袭贵族”不相称的。和斯坦凯维奇来往的人，大部分都是地主家子弟，而别林斯基却是出身于受人歧视的自由职业阶层，这在先进思想受人尊重的圈子，并无什么明显的差别。但是这里包含有背景上的大不相同。象米哈伊尔和斯坦凯维奇这些人的地位本来就不相上下，而且在阶级传统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巴枯宁和别林斯基则存在着需要跨越迥然不同的社会地位的障碍，所以，别林斯基一踏上普列姆希诺庄的土地就有隔世之感。

另一方面，别林斯基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四年前，他由于写了一个抨击农奴制度的剧本被开除出莫斯科大学。从此，他就随手写些文章，勉强糊口。给《望远镜》杂志撰稿，写俄文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332—333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84—285页。



文法，将保尔·德·柯克的小说译成俄文。后人认为别林斯基在同辈俄国人中，是个天资最聪明的人。但是，在受正规教育方面来说，他却不如斯坦凯维奇小组里的大多数人，由于不懂德语，他就不能直接阅读在他的朋友看来是一切智慧源泉的大哲学家的著作。他只有间接地和靠那些胜他一筹的人的帮忙才能对那些哲学家产生敬慕之感。别林斯基惭愧地承认，他喜欢讲究实际而不是思辨哲学，还没有摆脱现实，而这正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者追求的目标。他到了普列姆希诺庄，觉得自己社会地位和才智都不及人，而且没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为一点小事就会满脸通红，这一直使他感到苦恼<sup>①</sup>。

别林斯基是在年轻一代正陶醉于费希特的唯心主义的时候来到普列姆希诺庄的。他跟米哈伊尔一样，脾气急躁而又敏感。他很快地就改信新的学说，到普列姆希诺庄才三个星期，就在《望远镜》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费希特学说的体系进行了全面的热情的阐述：

每个人必须热爱作为意识充分发展的集中体现的人类，这就是他自己的高尚目标。因此，每个人对人类的热爱就是他自己意识的未来的发展。

因而，自我发展便成为崇高的理想；文章结尾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无限美好的憧憬：

远处的山丘背后浮现出傍晚天空的地平线，夕阳映照出万道霞光。在万籁俱寂中，内心充满幻想，思索着永恒的神秘，似乎看见了新的天地。

在别林斯基的脑海里，普列姆希诺庄仲夏之夜的幽美景色似

---

①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15—116，123页。

乎与费希特的哲学交织在一起了。他不仅沉醉于米哈伊尔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而且也沉醉于在突然来到的人间天堂之中所见到的美妙的一切。

〔他后来给米哈伊尔写信说道〕您把我从沉睡中唤醒，不是由于您的令人欣慰的新思想，而是由于将我带到了普列姆希诺庄。我的精神轻松多了，内心的痛苦消除了，并可以接受健康的思想和有益的真理。普列姆希诺庄的和谐气氛不仅有助于我的复活，而且也是我复活的主要原因。

这就是米哈伊尔和普列姆希诺庄对他同代人中最聪明的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sup>①</sup>。

别林斯基在普列姆希诺庄度过的愉快时刻到9月下旬结束了。其后同时发生了几场风波。米哈伊尔早已只研究个人的修身之道，仅仅在家庭范围内造点反。而别林斯基却在费希特那种顽强的个人主义之中，为他政治自由的信念找到了有力的思辨哲学的根据。一天，全家一起吃饭，话题转到亚历山大·巴枯宁深恶痛绝的法国大革命，别林斯基无视有一家之长在场，需要小心谨慎些，竟为恐怖时代<sup>②</sup>辩护，而且还脱口说出这样一句话：“脑袋还等着上断头台”。老亚历山大自然大惊失色。但他富于绅士气派，碍于客人的情面，不便发作，只是在碰上别林斯基向吕波夫和塔蒂安娜念《望远镜》杂志上的文章时，他才对这种用革命的毒素影响他女儿的企图委婉地表示不以为然。对客人不能发火，就只有迁怒于长子。他不能判断这些激烈的思想是由米哈伊尔灌输给别林斯基的，还是由别林斯基灌输给米哈伊尔的。但他完全知道米哈伊尔和他的朋友在莫斯科不仅在毫无价值的哲学

---

1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71—188页，第121页。

2 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1793年。——译注

研究中消磨他们的青春，而且还在公开宣传流血的革命。这与米哈伊尔过去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吻合的，而这种表现为害更甚<sup>1)</sup>。

由于招惹了主人的怀疑和不满，别林斯基自然心情不快，很快就感觉到他已引起了米哈伊尔本人的恶感。他全然不自觉地引起了巴枯宁家年轻一代情绪上的波动。

米哈伊尔虽然由于忌妒而大发雷霆，但并没有做出使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快点离开的事；别林斯基虽同时为亚历山德拉的不幸的爱情、为米哈伊尔的难以理解的侮辱、为亚历山大·巴枯宁无声的反对而感到痛苦，但还是呆到11月初才离开普列姆希诺庄。

当时，另外一种性质的事变打破了紧张的局面，驱使别林斯基急忙赶回莫斯科。前不久，《望远镜》杂志由于在政治和哲学观点方面越轨太远，遭到检察官的查封。别林斯基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正常收入没有了。这时老亚历山大·巴枯宁终于胜利了。他拿出《奥苏加》诗稿，增补几节，指责这家新杂志，为《望远镜》杂志的垮台而欢欣鼓舞<sup>2)</sup>。

\*                     \*                     \*

别林斯基离开普列姆希诺庄之前的一些日子是另一个严肃而又滑稽的插曲的高潮，使米哈伊尔万物和谐的仲夏之梦归于彻底失败和破灭。

米哈伊尔的几个弟弟中只有尼古拉步他的后尘，进入彼得堡炮兵士官生学校，学习成绩还算过得去。伊利亚是骑兵团的军官预备生。其余三个弟弟，保罗、亚历山大和阿列克斯在特维尔上学，由外祖母波尔托拉斯基照料和一位年老的家仆一起住在一幢公寓里。1836年8月初，暑假结束时，米哈伊尔带他们回特维尔

---

1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73—274页。

2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23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209—210，269页。

跟他们一起住了两星期。回普列姆希诺庄时正好迎接别林斯基，这时，米哈伊尔心目中只有费希特。他感到经常需要把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向愿意听的人倾吐。每天晚上当弟弟们上了一天毫无兴趣的课程放学回来之后，他总要跟他们一起看书，给他们讲解德国哲学中令人惊叹的思想，给他们指出自我修身之道，并安慰他们在外部世界所感到的乏味的烦恼。米哈伊尔的指点在他们敏感的心灵上产生的影响，从十五岁的亚历山大给姐姐们的信中可以看出：

我们越了解米哈伊尔，就越感到我们不能缺少他。他已把我们过去的状况中向上提高了一步，我们第一次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相互之间的坦率态度把我们愈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使我们成为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现在，我们真正懂得了人生的崇高使命。而你们却不能分享我们这种无比的幸福。

米哈伊尔一走，这种充满抒情的气氛便随告结束。学校这个外部世界无情地冲击着他们的思想。几星期之后，十三岁的阿列克斯写道，要是再这样无聊地生活下去，他就要自刎了。

带着这种失望与不满交织的心情，10月间三个男孩期中回到普列姆希诺庄。米哈伊尔和塔蒂安娜马上答应向父亲求情，允许他们离校去莫斯科，在米哈伊尔的指导下继续学习。他们回到特维尔，热烈地期望着获得自由的时刻会很快到来。米哈伊尔不久就向他父亲提出这个建议，得到的回答果然不出所料。亚历山大·巴枯宁声称，他宁死也不愿让几个小儿子到莫斯科去，“使他们有可能受米哈伊尔朋友的坏影响”。他懊悔地说，在米哈伊尔的引导下，他们已听信了“很多荒谬的观点，对他们受教育的学校采取轻蔑态度并对教育的方法感到厌恶”。这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也没有人急急忙忙写信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通知在特维尔的几

个孩子。

米哈伊尔曾在他弟弟们的容易冲动的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坚强的意志和造反的精神，对于这一点，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到。10月末的一个傍晚，孩子们叫来一辆马车，装上行李，吩咐车夫把他们送到普列姆希诺庄。遗憾的是，他们也象米哈伊尔一样认为钱无关紧要，没有准备好车费。车夫对旅程距离或是对年轻人是否会付车费产生了怀疑，因此要先付车费，遭到孩子们愤怒拒绝之后，只好嘟嘟囔囔地将空马车驾走了。女管家听见争吵声后立即赶到现场。外祖母波尔托拉斯基听了女管家禀报之后，吩咐叫人把这几个孩子带去见她。这位老妇人看来很能应付这个局势。她骂他们“少年气盛”，扬言要叫警察不让他们出城。最后，她念了一封准备给米哈伊尔的信，信中责备他“给弟弟们树立了好一个榜样”，并指责他是罪魁祸首。她大骂一顿之后，便呼的一声把门关上了。事后他们各自将上述情形报告给普列姆希诺庄。

这些报告使普列姆希诺庄非常不安。甚至连米哈伊尔也为弟弟们的放肆行为感到震惊，于是就一些常识性问题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我要跟你们谈谈关于精神自由问题，这种自由首先要求大力根除一切不良的习惯和倾向，你们想的却是另一种自由，而这种自由远非你们目前的年龄、文化程度和有限的收入所能达到的。……你们要加倍勤奋努力，学好每门功课，不要再逢人就谈人权问题。

塔蒂安娜写信对他们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象小孩一样孟浪”，使“米哈伊尔非常不快”。这个插曲的主要影响是使米哈伊尔及其教导更加丧失威信。亚历山大·巴枯宁在把儿子的违命看成是米哈伊尔教唆的直接后果，和跟着米哈伊尔走向叛逆和毁

灭道路的清证明。他因为年事日高，不能亲自处理这些家事，也不信任任何一个子女。于是只好请女婿迪亚科夫立即去特维尔，在这群逆子中重振家规，必要时还可以进行体罚。

这些严厉的训教使普列姆希诺庄的年轻一代为之哗然。他们讨厌采用严厉的方法来平息叛逆行为。他们讨厌任何外姓人插手影响巴枯宁一家名誉的家事。他们尤其讨厌迪亚柯夫其人。米哈伊尔向来公开地对他表示反感和轻蔑。他们得知要派人前来惩办的传言，都准备抵抗到底。其中一个身藏一把刻刀，以对付攻击他的人。迪亚柯夫虽是个平庸之辈，在执行这项困难差使时，却表现得老练圆滑。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利处境，所以既不使用处罚也不采取威胁的手段，而是以极友好的方式把几个年轻人领到他的庄园，让他们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并给他们时间去正确地认识他们的越轨行为。这种处理方式相当成功，年轻人的一次反抗就在认错、妥协和互谅的气氛中平息下去了。

〔这里引保罗信中的一段话，来作为这件事的结尾〕亲爱的姐妹们：来信收到，信中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深情厚意。我不大愿意随波逐流，因为我刚读到席勒的诗句：“万物听天由命，唯人有意志……。”但是，现在我已明白了在某些情况下，人也得听天由命<sup>①</sup>。

唯独米哈伊尔得不到父母的宽恕。别林斯基的来访和儿子们的越轨行为使亚历山大·巴枯宁相信长子已经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这位老人从来没有对感化最不听话和最难教育的孩子这样完全绝望。自此以后，他不得不把米哈伊尔当成迷路羔羊和死对头。这个逆子就象癌瘤一样侵入家庭的机体无法切除。唯一的希望就

---

①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252—267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354—355页。

是防止它感染别人。对米哈伊尔来说，这些事情的影响对他关系极为重大，而且也使他灰心丧气。费希特的学说经不起这种考验。可恶的现实冲破了它的堤防。米哈伊尔的狂热把所谓的和谐打得粉碎，他那些最年轻门徒的幼稚行为使得这种和谐变得荒唐可笑。在普列姆希诺庄他感到的只是耻辱和失败。几天之后，他就卷起铺盖，随别林斯基之后到莫斯科去了。

## 第五章

### 兄弟姐妹

在回顾米哈伊尔思想发展的过程之前，先叙述一下他与吕波夫和瓦瓦娜关系中两件不寻常的事情，也许容易把问题说清楚。这两件事说明他高傲的天性赋予他在家庭生活中的支配地位。这里所叙述的事情超过了我们现在所涉及的时期。不过，两件事情的高潮都发生在1837年，并且正好补充说明了米哈伊尔一生中费希特时期的一些情况。

在巴枯宁家年轻一代人中，吕波夫身体最羸弱，性格最温柔。米哈伊尔对她与对塔蒂安娜或者甚至与瓦瓦娜的关系相比，在感情上确实是淡薄些。他对吕波夫既不想占有，也不忌妒。前一年吕波夫和斯坦凯维奇由于娜塔丽·贝叶尔感情激动的提示而发生了初恋，巴枯宁曾表示赞许。

直至翌年四月，斯坦凯维奇在得到父亲的同意后，才正式向吕波夫求婚。后者马上欣然同意，普列姆希诺庄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米哈伊尔得胜了。象这样一件能使巴枯宁全家都欣然表示赞同的事情，还是多年来的头一回。然而由于命运的播弄，排除最后的外界障碍却标志着真正悲剧的开始，这是一场由个性造成的而不是由环境造成的悲剧。

三月中旬，即订婚前两星期，尼古拉曾写信给吕波夫，说他病了，并说“唯一能救他命的办法是到卡尔斯巴德去”。他确实有病，经常发烧，咳嗽不止，颈部及后脑疼痛，这些都是肺结核



的症状，三年之后就要夺去他的生命。但是，在疾病发作的同时，还发生了一次思想上的危机，而且疾病很可能部分地是由思想危机引起的。朋友们都认为，思想上的危机比单纯身体的疾病更为严重。斯坦凯维奇是一个沉思而不果断的浪漫主义者，他那优柔寡断的性格长期为“思想软弱”所支配，对于使命有一种病态意识，因而使他无法行动。别林斯基当时写道：“他把个人的幸福看作背离自己的使命的行为，把每种人与人之间的约束关系看作他行动的羁绊。”他父亲的拖延犹豫正好和他优柔寡断的心理是一致的。1837年8月，斯坦凯维奇没来得及向未婚妻辞行就只身去德国了<sup>①</sup>。

斯坦凯维奇为了治病，在德国从一个温泉跑到另一个温泉。现在，毫无抵抗能力的吕波夫也得了同样的病，俄国气候恶劣，吕波夫病情很快恶化。到了1838年春天，她已奄奄一息。米哈伊尔再次回普列姆希诺庄度暑，在她临死前几个月，他一直不曾离开。几年后，他还喜欢回忆起兄弟姐妹们一天晚上在他喜爱的树旁点燃了一堆篝火，他们还让吕波夫坐上马车来欣赏这一景象。这是普列姆希诺庄最后几次无忧无虑欢聚中的一次。6月，吕波夫给她未婚夫写了最后一封信。8月，即未婚夫出国一年后，也就是他们分别大约两年后，她便离开了人世<sup>②</sup>。

\*                     \*                     \*

吕波夫·巴枯宁的一生堪称是基督教徒的谦卑服从的高尚典范。瓦瓦娜也笃信宗教。但她的虔诚是另一种类型。快成年时，她经历了一系列宗教狂热的危机，以致她父亲曾经叫她“歇斯底

---

1)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306—309页；《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537页。

2)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317—318页，321—32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51，250页。

里的黄毛丫头”。她的信仰表现出热忱而又神秘的色彩，跟吕波夫毫不迟疑地接受正统教义毫无共同之处。她二十二岁时，和迪亚科夫结了婚，这种结合完全是男婚女嫁，根本没有爱情基础，因而更加令人感到惊异。迪亚科夫比她大好几岁，性情和蔼，相貌平常，天资愚钝；瓦瓦娜接受他的求婚似乎是为尽家庭义务而自觉作出的自我牺牲。瓦瓦娜后来对和丈夫同床表现出非常反感，由此便可推知他们初婚后的一段生活情况。1835年11月，她生了一个儿子，以此为借口，在父母身边度过了下一年的整个冬天。1836年5月米哈伊尔回来时，她仍然住在普列姆希诺庄<sup>①</sup>。

米哈伊尔最初对这门“瞎胡闹”的婚事表示反感，似乎只不过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对意气不投的、毫不出众的姐夫的一般不满。但是，既然费希特已向他揭示人生的真正意义，那末瓦瓦娜与迪亚科夫的结合就体现出更加深远的意义。这种结合就是一个范例，说明客观世界日常因袭的义务与人的内心世界在精神上更强烈的要求之间永远存在着冲突。米哈伊尔现在才明白瓦瓦娜的婚事不仅仅象他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判断上的错误，而是违反她自己高尚理想的一种过错，也是她一生中对神圣使命的背叛。她只有通过受苦受难和生儿育女才能赎回这一罪过。就在那热烈的1836年夏天，米哈伊尔在精神上支配他的姐妹已达到顶点时，瓦瓦娜完全改变了对她自己婚姻问题的看法，再回到丈夫身边已是不可能的事。

1837年夏天，米哈伊尔回普列姆希诺庄时，她出国旅行的计划已酝酿成熟，其借口是孩子的身体健康需要。米哈伊尔这时在埋头研究黑格尔哲学，正盼望去柏林一次，将和她结伴同行。

瓦瓦娜的“精神解放”（“精神的”和“物质的”这对术语

---

①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67，324页；斯切克洛夫编：

《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02页。

仍然是米哈伊尔的口头禅) 这时已完全实现了。她要获得“物质解放”，经济上的困难仍然是个主要问题。算一下就清楚了，瓦瓦娜卖掉珠宝首饰最多也不过够她本人、小孩和保姆去卡尔斯巴德的旅费，那里一年的生活费最少得花两千卢布。米哈伊尔身上当然是一文不名。亚历山大·巴枯宁虽然根本不同意瓦瓦娜对她丈夫的态度，但还可以劝他从家庭遗产中拿出瓦瓦娜那一份，每年预支一千卢布。性情温和、意志薄弱的迪亚科夫或者他的兄弟可能会帮忙支付其余一部分费用。另外，瓦瓦娜自己还可以教音乐课或写作儿童故事来谋生计<sup>①</sup>。

亚历山大·巴枯宁第一次得悉米哈伊尔打算陪他姐姐出国，据此就商讨开了。老人得知这一消息，又大发雷霆。他又一次看到，使家庭遭到不幸的每件坏事都是他长子插手干的。12月，即在米哈伊尔回莫斯科之后，他给这个儿子写了一封长信（信是他妻子的笔迹，说明他身体已日益衰弱），列举了许多使他伤心的事，如：米哈伊尔挑拨孩子们与父母的关系，破坏他们对父亲的信任；向姐妹们灌输在基督教伪装掩盖下的圣西门主义的诡辩邪说，以此来腐蚀他们的思想；唆使弟弟们逃学；扼杀瓦瓦娜对他自由选择的丈夫的爱情，并唆使她抛弃他。在信的最后，亚历山大·巴枯宁要求米哈伊尔要么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要么从此不要来普列姆希诺庄散布他的“人生哲学”。普列姆希诺庄的形势又变得紧张起来了。不管事实是否如此，女孩子们都认为父亲是在鼓动迪亚科夫反对瓦瓦娜出国，或者甚至是在鼓动他用从她手里夺走孩子相威胁，迫使她回到他身边。米哈伊尔由于看出金钱的力量可能是决定的因素，所以这一次便采取了调和的策略。除夕那天，他没回普列姆希诺庄而去科泽西诺，两个未婚

---

1)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340，351，353—355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133，144页。

的姑姑还住在那里。他在那里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原信已佚，现存的一份不全的草稿长达三十多个印刷页），信中回顾了他的生活以及小时与父亲的关系，字里行间充满感情，而且还夹杂着引用了不少基督教《圣经》中的语句。结尾时他恳求父母“恢复对子女的疼爱，帮助他们重新和好，救救瓦瓦娜”<sup>①</sup>。

同时，米哈伊尔还在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筹备出国旅费。他把希望寄托在斯坦凯维奇身上。去年8月动身去德国之前，斯坦凯维奇已答应替米哈伊尔偿还一千卢布的债务，把这笔钱作为去卡尔斯巴德的旅费；并答应在他旅居德国期间每年再给一千五百卢布。唯一使他感到苦恼的是不好启口向他慷慨的父亲要这么一笔巨款。一旦他不在俄国，就会更加作难，因为1838年2月他从柏林写信给米哈伊尔时说，他总共只能给他两千卢布“或者比这更小”，并向他提出逆耳的劝告，说“要更加节约点过日子”。3月的一封来信就说得更加明白，也更使他失望。眼下没有其他可以帮忙，所以米哈伊尔不得不暂缓实现自己的抱负<sup>②</sup>。

春天，普列姆希诺庄的情况有所好转。亚历山大·巴枯宁缓和多了，同意让瓦瓦娜出国，是米哈伊尔充满感情的要求还是他被迫放弃陪同姐姐出国的打算对此影响更大，则不得而知。迪亚科夫的兄弟慷慨地提供了大部分费用。迪亚科夫为了顾全面子，要求以陪同妻、子去卡尔斯巴德，然后回国作为条件。但是到了最后，或许是由于感到自己勉强被容许同行，作丈夫的处于这种地位未免太荒唐可笑，所以到了彼得堡就和他们分手了。6月中旬，他从那儿乘船去吕贝克。米哈伊尔没能随行，但满怀胜利的心情看到了瓦瓦娜终于获得了“解放”，但是使他感到极为失望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86—87，90，96—130页。

② 《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631，655，659—660页。

的是，他未能筹措到足够的钱陪她同去。

整整两年之后，米哈伊尔才实现了他陪姐姐去“希望之乡”的愿望。但是现在，有必要回顾一下1837年初的情形，那时米哈伊尔住在莫斯科，意气消沉，悲观失望，而这种情绪的产生，盖渊于别林斯基的普列姆希诺庄之行。<sup>①</sup>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138，148，186页；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361页。

## 第六章

# 黑格尔与别林斯基

1837年初，斯坦凯维奇小组的主要成员都表现得情绪忧郁。斯坦凯维奇正在为吕波夫之事感到良心上的内疚。别林斯基为普列姆希诺庄之行受了侮辱，以及《望远镜》杂志停刊之后不得不靠朋友的资助生活而感到伤心。米哈伊尔虽不再愁向别人借钱，但也为丧失哲学上的自信而苦恼，感到思想和行动已经失去了坚实的基础。他认识到他所说的“客观世界”只不过是“痴人说梦”，“精神生活”也无非是“贫乏空虚”。去年夏天的“无限信仰”一变而成为怀疑主义。甚至他对姐妹的感情也“微乎其微”，似乎对她们的爱也只是一种虚幻。但是，米哈伊尔并不愿长此悲观，哲学之病势必要用哲学来治疗。斯坦凯维奇小组于是由费希特转向黑格尔了①。

斯坦凯维奇早在去年11月就首先开始研究黑格尔。1837年2月，黑格尔的名字也在米哈伊尔给他姐妹的一封信中第一次出现。米哈伊尔似乎一眼就看出并断定这种新的学说启发他对现实不满，并迫切地、满怀信心地开始向他的姐妹和朋友们吹嘘这种灵丹妙药。他从黑格尔学说中懂得了人的发展过程有三个阶段——本能时期、感情时期以及思维时期。去年他在费希特学说的指导

①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09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358、386页；第2卷第18、78页。

下所经历的时期是感情时期。但是那时他成功地建立起来的感情和谐是暂时而虚幻的，因为那只是内在灵魂的和谐，完全脱离现实，相当于人受教育过程中的可塑性阶段。人必须经风雨、见世面——内在的和谐必须经受矛盾的狂风暴雨，使之破坏，人才可能在经历痛苦之后靠思维而达到再生。“思维的和谐”可以使自我和现实之间协调一致。他相信思维的力量，这在他一生中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使姐妹们相信“思考、思考、再思考，思考不可少”的道理，不过，他还是谨慎地解释说，德国的“思维”与法国“理性”完全是两回事，前者大大超过后者，就象十九世纪大大超过十八世纪一样<sup>①</sup>。

4月间，这个小组解散的时候，无论是米哈伊尔还是他朋友们对黑格尔学说的研究都很肤浅。斯坦凯维奇到他父亲的庄园消夏，准备秋季出国旅行。别林斯基得了肺疾未痊，去高加索养病。6月，米哈伊尔本人也回到了普列姆希诺庄。他在为瓦瓦娜争“解放”的同时，还坚持研究黑格尔。这一年和下一年的笔记里都详细地写下了读书心得。他在作了黑格尔《逻辑学》这本教科书的摘要以后，就从《精神现象学》开始，攻读这位大师本人的原著。结果啃不动，于是就转而研究《哲学全书》。在这本书的引言里，米哈伊尔第一次读到了在俄国和其他地方都成为人们争论焦点的著名警句：“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是他还没有读完《逻辑学》这部分，就中断了对该书的研究，另读起《宗教哲学讲演录》来了。三个月后，回头去读《哲学全书》和《精神现象学》。

这种毫无系统的研究方法充分说明这位好学的弟子已经发现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何等的艰巨。事实上，米哈伊尔虽是个博览

---

<sup>①</sup> 《斯坦凯维奇通信集》，第624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408页，第2卷第185页。

群书的人，从表面上来看，头脑也算敏捷，但天生不是个学者。他根本没有全面掌握黑格尔哲学体系，只是取其所需，以适应自己思想上的需要。费希特的浪漫主义使他吃了亏，因为它否定客观现实，而现实是不容忽视的。黑格尔不仅承认现实，而且把现实作为他全部哲学的基础，成功地把现实和理想结合起来。在本质上，它是包罗万象。与费希特的浪漫主义相比，黑格尔的浪漫主义更为精深奥妙。

〔米哈伊尔在读黑格尔著作的笔记中写道〕世上无恶，万物皆善。只有局限，对精神眼界的局限才是邪恶。一切存在都是精神之生命。万物都离不开精神。除精神以外，什么也没有。精神是绝对的知识、绝对的自由、绝对的爱，因而也是绝对的幸福。

在承认现实的同时，黑格尔还小心翼翼地维护人的神圣性这一浪漫主义的前提<sup>①</sup>。

米哈伊尔青年时期中的黑格尔阶段与别林斯基的名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别林斯基虽然赞美过他出生的那个浪漫主义时代，但他和米哈伊尔一样，生性就不是个浪漫主义者。由于他饱经人世风霜，根本无法形成把内在自我的修养当作生存的最高目标的高尚信念。所以他曾一度为普列姆希诺庄的“费希特式的和谐”所诱惑，而后来却责备米哈伊尔第一个使他沉迷于“费希特的抽象概念”之中，使他在思想上毁坏了“经验和现实的价值”。从费希特转向黑格尔使别林斯基又一次回到现实。他不懂德文只好间接地汲取作为智慧源泉的知识，但是他很快就抓住了“现实”这个黑格尔学说体系的核心。米哈伊尔出于个人所好，在黑格尔身上找到了一种更高尚的浪漫主义，而别林斯基也同样出于个人

<sup>①</sup>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389—393，396页。



所好，却在黑格尔身上找到了一座清醒的常识性的堡垒以抵挡费希特浪漫主义幻想<sup>①</sup>。

在这样两个性格迥异的人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并未马上发生冲突。别林斯基由于过份谨慎而又太不自信，虽在普列姆希诺庄逗留的最后几星期受到米哈伊尔莫名其妙的粗暴对待，也并没有对此公开表示怨恨。他们再次在莫斯科会面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关系涂上了一层阴沉而沮丧的色彩，但并没有发生过争吵。1837年6月底，正在高加索皮亚季戈尔斯克养病的别林斯基，灵机一动给米哈伊尔写了一封长信（此信没有留存下来），试图解释他们共同“跌交”的原因。别林斯基此时对黑格尔学说的认识进了一步。不管是否借助于黑格尔学说，他发现造成这种麻烦的原因在于感情过于冲动，忽视做“一个老实人”的本分。米哈伊尔却并不为之所动。别林斯基认为他们两人可以就共同的思想、经历交换意见，而米哈伊尔则抱着贵族老爷式的傲慢态度，使他非常反感。米哈伊尔对六个月的“跌交”再也没有兴趣了。拖了一些时候才给别林斯基回信，他以傲慢的口吻，告诉别林斯基说，他通过研究黑格尔哲学已经“复活”了，已经“站起来，再也不会摔倒”了，并说有些人还在怀疑的泥坑里挣扎，他比这些人要高超得多<sup>②</sup>。

这封信使别林斯基第一次对米哈伊尔的盛气凌人产生反感。他发现（去年秋季在普列姆希诺庄时他可能就有所觉察）米哈伊尔对他的态度是“蔑视而不是友好”。从这封信的口气，以及潦草不堪的字迹可以看出他很不礼貌。他立刻写信回敬米哈伊尔，对他的整个态度大加指摘。两个月后又写了一封更长的信。米哈伊尔还同研究费希特学说时候一样，仍然在过着一种“精神”生

---

①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27—228页

②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77，105—106，125页。

活，这种“极端的精神生活”使他看不见自己物质生活的“卑鄙”一面。他爱揩油和向朋友以及朋友的父亲借钱的习惯，在别林斯基看来，似乎就是这种“卑鄙行为”的例证。别林斯基向别人借钱时，总感到是一种奇耻大辱。而米哈伊尔借起钱来却既不知道羞耻，也毫无顾忌，更不打算还帐。别林斯基让他想一想他对一个名叫斯特罗加诺夫伯爵的态度。1836年初，米哈伊尔初到莫斯科的时候，斯特罗加诺夫曾托他将一部德文历史教科书译成俄文。一年多了，他一字未译。经斯特罗加诺夫提醒后，他竟把书拆成好几个部分，分给朋友、姐妹和弟弟，总之，分给只要是稍懂一点德文的人——这种应急的办法，自然不会有什么效果。米哈伊尔债台高筑，又急需出国旅费，所以就承担了这项任务。但是他从未想到要自己动手。尽管研究过黑格尔哲学，但他对现实的理解似乎仍然不够深刻。“不管你怎么说，”别林斯基写道，“现实确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向现实屈服，才能摆脱现实。”<sup>1</sup>

这两封信出乎意料地触到了米哈伊尔性格的痛处。他固然拒绝听取这样毫无价值的意见，即哲学家的严肃的品德是能把钱算得“精确”到“半便士”，但从良心上说，他对别林斯基问心有愧。于是在11月，他从普列姆希诺庄给别林斯基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忏悔”。他高兴时也承认自己的过错比别林斯基大得多。他第一次解释说，去年秋季所以那样对待别林斯基，是由于塔蒂安娜的关系而对别林斯基心怀妒忌。别林斯基听后“既感动又激动”。他一向崇拜（即使在崇敬与憎恨交加时也是如此）的人如此屈尊（别林斯基仍然自惭形秽）承认前愆，使他感动万分。米哈伊尔把他在普列姆希诺庄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解释得一清二楚（这种解释是可以得到谅解的），这使别林斯基感到莫大的安慰。最后，或许使他感到得意的是，他还被认为有能力使巴枯宁

---

①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07，117，148-149，153，173页。

家的女孩子对他产生好感，才激起了她们兄长的忌妒。开始写信时，原不抱希望，而现在却心情平和多了。“现实性”与“精确性”的问题暂时搁置一边。12月初，米哈伊尔到莫斯科时，两人就都捐弃前嫌了。此后的四个月他们已亲密无间，但这不过是风暴来临的前奏罢了。

\* \* \*

这几个月间，外界几乎没有发生什么要紧的事。米哈伊尔到莫斯科后，下榻于列瓦晓夫的豪华宅第，受聘作房主儿子的家庭教师。米哈伊尔干此营生，原为糊口，这次也和以前一样，不久就不干了。据他自己说，是因为想念普列姆希诺庄老家，不能忍受在莫斯科与朋友们离群索居。当了一星期家庭教师以后，他觉得这种生活无法忍受，就搬进别林斯基的住处，在那儿住了一个冬天。1838年1月，他住在科泽西诺，为瓦瓦娜的“解放”出谋划策。2月，去贝叶尔家的别墅作客，在那里又一次卷入了爱情纠葛，这是因为他对正常的、单个女性的需要麻木不仁造成的<sup>①</sup>。

他在贝叶尔家里大部分时间过得满不错，阅读蓓蒂娜·冯·阿尔宁和路德的作品以及歌德的《爱格蒙特》。娜塔丽三年前对米哈伊尔的那股痴情劲儿已不复存在了，但是，现在亚历山德拉又不顾一切地和他接近起来，比她姐姐更加胆大直率，在米哈伊尔临走的那天，竟公开向他吐露了自己的爱恋。

这期间除这类事以外，米哈伊尔这个冬季做的主要事情是把黑格尔哲学的奥秘教给别林斯基。别林斯基从高加索回来后一直与小组的另一成员卡特科夫一起研究黑格尔哲学。米哈伊尔一来，就别想别人来当老师了，他成功地重新建立自己的优势。这两位朋友有好几星期形影不离，埋头研究黑格尔哲学。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80页。

〔别林斯基后来写道〕那段时间，你对我真好，你品格高尚，宽宏大量，外表和内心都充满诗意与威严，这些都是我从未见过的，这一切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米哈伊尔2月写信给他姐妹说：“我的维萨里昂又复活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伟大的人。”这种赞扬固然带有屈尊的味道，但还是发自内心的<sup>①</sup>。

1838年3月，这种不相称的友谊达到了高潮。当月，一个有自由倾向的富有的出版商买下了一家要停刊的仍然持保守的或反动的观点的刊物《莫斯科观察家》，打算聘请别林斯基当主编。别林斯基自《望远镜》停刊以来，失去了新闻职业，也失去了收入，听到这消息后高兴得手舞足蹈；米哈伊尔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个正式的合作者。以前，刊物封面的颜色是桔黄色，现在改成为表示有希望的翠绿色。刊物转手后出版的第一期（日期为三月号，四月中旬才出版）刊载了米哈伊尔译的三篇黑格尔讲演录，译文前有一篇署名的序言，这是米哈伊尔第一次发表的自己撰写的文章。

这篇序言是一首对黑格尔学说的现实的赞歌，是巴枯宁生涯在这个阶段的必然产物。在他的札记以及去年给他姐妹的信件中，米哈伊尔一直十分强调黑格尔学说的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但是现在，由于受别林斯基的影响，更加热衷于“合理的现实”这一口号，使他的见解为之一新，前后判若两人。他宣称，权威在基督教改革运动中已经毁灭了。笛卡儿创建了一种以自我为基础的新的哲学。在德国，康德和费希特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们体系的最终结果是“破坏一切客观存在和现实，集中表现在自爱

---

<sup>①</sup>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93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142页。

和自私自利意义上抽象的空洞的‘自我’。”在法国，十八世纪的哲学是以自我和现实的分离为基础的，以“唯物主义即非精神的、肉体的胜利而告终”。法国大革命是这种“精神反常”的结果，因为“哪里没有宗教，哪里就不可能有国家”。序言的结尾，米哈伊尔转而谈到俄国，那里也同样流行着不讲现实的弊病：

是的，幸福不是在空想中，不是在抽象的梦中，而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反抗现实意味着自我毁灭生活的活的源泉……我们希望新一代将同我们美好的俄国现实相结合，抛弃一切自命不凡的主张，他们最终将感觉得做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是合理的需要。

这段时期，米哈伊尔对政治不感兴趣，但这篇含糊其词、远非革命的序言显然反映了政治上的极端保守主义。“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本人以一个十足的唯心论者开始，最后却鼓吹接受神圣的教会和神圣的国家而结束。1838年3月，米哈伊尔和别林斯基两人都显然在追随黑格尔的足迹，很难说（甚至当时的人也众说不一）谁是领导者，谁是追随者。别林斯基性格暴烈，意志坚定，沿着这条崎岖的道路走到底，他的激进派的朋友们对他大力捍卫俄国国家的合理的现实惊讶不已，米哈伊尔这个天生的叛逆者和浪漫主义者，从自相矛盾的命运中得救了。他信奉正统的时间很短，在这个时期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这只不过是令人发笑的巧合而已。米哈伊尔与别林斯基之间发生激烈的争吵，其起因与哲学的关系不大，却导致他们在哲学上和个人关系上的破裂<sup>①</sup>。

\* \* \*

分歧的原因并不难找出。只要米哈伊尔还披着先知的外衣，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154、163、166--178页。

而别林斯基又甘愿充当一个卑谦的门徒，那末，他们之间的友谊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别林斯基当上了编辑，而米哈伊尔却只是一个撰稿人，后者就立刻感到这种屈辱的地位是不能忍受的。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固然也很自豪，但却弥补不了这种屈辱。他想给《莫斯科观察家》更多地写些关于黑格尔的文章的梦破灭了。他告诉别林斯基说，他的结论是：在目前他们的观点不确定的情况下，“无权”出版刊物，他的全部计划必须放弃。米哈伊尔似乎认为他仍然能左右别林斯基，只要一宣布这个决定，后者马上就会接受，但是他提得太晚了。

〔后来别林斯基给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要是在一个月前，我准得手足无所措。但是，我心中已发生了极大的思想变化，我第一次意识到我自己的独立性，以及我自己的现实（是的，我自己的，米哈伊尔）。

他已意识到自身的“激情和精力”，并发现了“自力更生的能力”。受人支配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坦率地告诉米哈伊尔，他从今以后要“靠自己的才智生活，走自己的路”。米哈伊尔对这种独立宣言的态度却是轻蔑和憎恨。他的答复是，在他们共同的朋友中将组织别林斯基所说的“分离主义者联盟”：他不再为《莫斯科观察家》写稿了<sup>①</sup>。

这里要谈谈米哈伊尔·巴枯宁经历中的一个次要人物——瓦西里·波特金。波特金是一个富有的茶商的儿子。在十九世纪初期的俄国，富豪集团尚未得到承认，波特金的社会地位不仅比巴枯宁和斯坦凯维奇低，而且也比自由职业者的儿子别林斯基低。波特金没有上过大学，中学时酷爱艺术、音乐和文学，毕业后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旅行一年便完成了他的学业。1836年，经别林斯基介绍参加斯坦凯维奇小组。他的多才多艺、早年的秃顶、

---

①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78、291页。

天鹅绒的夹克衫、欢快的笑声以及彬彬有礼的言谈举止，颇能赢得别人出于各种动机的好感。1838年春，别林斯基摆脱了门徒身份的羁绊以后，米哈伊尔认为谦恭的波特金最可能成为门徒。波特金的另一个可取之处在于他几乎是小组内唯一口袋里经常有钱的人。米哈伊尔离开别林斯基后，便搬进了波特金的寓所。短时间内，波特金温顺的性格使得这种安排还算顺利。但是不久以后，米哈伊尔就变得不耐烦了。东道主和蔼可亲但学术见解肤浅，远远赶不上别林斯基敏捷的头脑。5月，米哈伊尔离开莫斯科到普列姆希诺庄和瓦瓦娜告别时，与波特金以及别林斯基的关系紧张到快要破裂的地步<sup>①</sup>。

米哈伊尔回普列姆希诺庄之后，他母亲和两个妹妹6月到达莫斯科。别林斯基见到了她们。他仍然热恋着亚历山德拉。由于他为人宽厚，而又易于冲动，他对巴枯宁家两个女孩子均有感情，所以对米哈伊尔就不能怀有恶意。他写信给米哈伊尔说，既然他本人业已自立，就没有理由再对立下去了。作为自立的人，他可以热爱、尊重和理解他的朋友。这封信的措词表明，米哈伊尔个性的魅力在他身上仍然起着多么强有力的作用：

是的，尽管你有缺点和不足之处，我现在仍然热爱你。你高兴起来，就用你那双大手在空中一挥，动作十分优美，你还生动形象地弯着一只手（我记不得是左手还是右手）的中指，来表明我没有抽象的思维能力，说：“是，一点也没有”，尽管这样，我还是热爱你。我热爱你，因为你头上长满卷发，脑子里充满智慧，嘴里叼着烟斗。米哈伊尔，你也爱我吧，希望我尽善尽美，帮助我去交好运。不要因我达不到目标就以傲慢的态度蔑视我。

---

<sup>①</sup> 皮平：《别林斯基传》，第135—137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27—128，196，271，295—296页。

当两个女孩子和她们的母亲要回普列姆希诺庄时，她们邀请别林斯基和波特金同行。但这次来访因吕波夫病危而笼罩着阴影，所以在关系上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别林斯基感到尴尬不安，米哈伊尔的态度十分冷淡。别林斯基写到当时的情形时说：“谈不上和平，只是暂时的休战。”1838年8月初，在客人临行的前几天，由于吕波夫之死，大家暂时都把别的事情忘却了<sup>①</sup>。

但是，别林斯基象雅各跟天使搏斗一样，不会宽恕他的对手。甚至现在他也没有完全从他根深蒂固的自悲感中摆脱出来。他必须设法使米哈伊尔承认他有权与之平起平坐。与其冷冷冰冰，还不如大吵大闹。“虚伪的关系不如没有关系”。9月间，别林斯基给米哈伊尔写了三封长信，他把这些信称为“长篇”。其中一封残存下来，占通信集中三十页的篇幅。这封信开头就竭力为现实辩护，说：“我已经独立地、发自内心深处地理解了‘现实’这个伟大字眼的含义……我朝朝夕夕，日日夜夜都重复地说‘现实’这个字。”他不顾一切地将黑格尔学说付诸应用。“现实就是一头长有钢爪铁下巴的怪物，倘若有人不甘心情愿地屈从它，它就会用武力抓住他吞下去。”他又谈到米哈伊尔本人情况。说有些人“在理论上很懂现实，但却脱离现实。”米哈伊尔的缺点是“唯心主义、华而不实……这是以抽象思维反对活生生现实的结果”。他还谈到了一个米哈伊尔和朋友之间都心照不宣的问题。“事实上，你根本不能算活着，你不懂得人所共知、甚至文盲皆知的事：延续生命的行为，爱情之外的一种神秘感。”米哈伊尔对其朋友的态度十分古怪，令人难以理解，而又故弄玄虚，在他的同辈人当中，似乎只有别林斯基能尖锐地把他这种态度和他缺乏性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分析。

在这封信后几段中，别林斯基大胆地谈到了更为微妙的问题。

---

①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90—192，296—299页。



巴枯宁家女孩子的周围充满着感情上的紧张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吃妒忌苦头的不仅是米哈伊尔一个人。别林斯基也非常妒忌米哈伊尔对其姐妹的重大影响。在争论最激烈时，他曾对这种影响发起过正面进攻。米哈伊尔假哲学之名把他姐妹们的现实引入歧途。他以理论代替自然的感情，毁了她们的一生：

你把她们引入了思维的领域，赋予她们新的生命。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她们很想逃脱。只有顺从天命的纯朴感情把她们从这种愿望中拯救出来以后，她们才会知道抽象思维的重要性。前者更使我满意。

他嘲笑女孩子们所谓的哲学上的造诣，说：“她们知识的基础就是‘米哈伊尔说’这几个法力无边的字。”别林斯基挖苦地希望总有一天“这件很不合她们身的思想家外衣会从她们的肩上掉下来，使她们恢复原先的庄重而逗人喜爱的纯朴作风。”<sup>①</sup>

听不得反面意见的米哈伊尔不能忍受别林斯基对他的哲学以及人身的放肆攻击。这封信使他暴跳如雷。因为它刺中了他的两个痛处——他对他姐妹们的深情厚爱和他好为人师的虚荣心。这次不留什么情面。米哈伊尔冗长的怒不可遏的反驳信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他告诉过弟弟们他曾“猛击过别林斯基背部和其他部位，够他疼一阵子的了。”别林斯基在回信中引用了米哈伊尔的反驳信的一些话，这些原话清楚地表明米哈伊尔不仅回击了他姐姐及他本人的攻击，而且对别林斯基关于“合理的现实”全部观点予以回击。米哈伊尔仍然是一个虔诚的黑格尔信徒，根据他对黑格尔学说的解释，他坚决不同意别林斯基关于“钢爪铁下巴的怪物”的说法，而又一次表示要死心塌地地信仰“唯心主义”和“自由、独立的思想”。别林斯基花了两个星期写了这封回信，

---

<sup>①</sup>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27—255，259，299—300页。

印出来近五十页。这封信实际上结束了这两个血气方刚而又性格迥异的人之间的忽冷忽热的友谊。一年后，他们的伤疤刚愈，就又狭路相逢。那种相互吸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离奇的相互影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别林斯基已经永远从米哈伊尔的监护下解放出来。因此也使米哈伊尔从根深蒂固的黑格尔的现实观的正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四年后，米哈伊尔在其他方面的影响下，而不是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完全从不同的角度解释黑格尔学说<sup>[1]</sup>。

在米哈伊尔青年时期的所有朋友中，别林斯基最有才华，或许也最热心。他的信中有对米哈伊尔性格的优缺点入木三分的评论。他对这两方面都有深刻的了解。在两个人争论达到顶点时，他写道：“跟你住在同一房间，就意味着争论。”后来又写道：“跟他在一起就意味着我的思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就是这样的人——具有交流思想的非凡能力！”矛盾从未得到解决；别林斯基依然在“近乎恨的爱与近乎爱的恨”的状况中徘徊。这种复杂的心境从以下两段书信中完全可以看出。第一段摘自1838年10月的回信，即致米哈伊尔的信：

强壮有力、滥用权力、急躁好动、心神不定、不断追求遥远的目标、不满现状……凭一时感情冲动而下判断——这就是你的性格。此外，你对周围的人也不够真诚与和蔼可亲——恕我这样直言。因此，你就很容易一再这样地说：“好吧，假如我们一定要分开的话，那么就分开吧”，或者“假如你不高兴这样的话，那么就忍耐点吧”等等。你以如此傲慢的态度使别人感到难堪，使一般的人根本无法对你产生好感。

---

[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04、212—213页；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59—307页。

### 第二段出自给斯坦凯维奇的信：

他为人神秘莫测，性格深沉、纯朴而勇敢——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他的欲望、幼稚、吹牛、缺德以及虚伪，使人无法同他交往。他爱想象而不爱人，他的性格就是想要支配人，而不是要爱什么人①。

---

①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04、287、307页，第2卷第6页。

## 第七章 出 逃

从米哈伊尔与别林斯基的争吵到他去柏林，其间相隔二十个月，在这个期间，他的思想没有多大进展，意志消沉。由于吕波夫去世以及瓦瓦娜出国，普列姆希诺庄的吸引力已失去大半。他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和贝叶尔姐妹在哲学上谈情说爱。斯坦凯维奇小组解散了（自从斯坦凯维奇离开以后），他失去了这个小组唯一可以激励他的成员，这个人就是别林斯基。他一心想为人师，甚至相信自己有能力为人师表，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

〔巴枯宁对姐妹们说〕我不像以前那样善于指教别人了。我自己也需要别人指点。当我教导别人时，一大群恶魔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的灵魂，我现在必须把它们驱走①。

米哈伊尔在心情受到这般压抑的情况下，就迫使自己研究学问。他的朋友就剩下波特金了。因而，他也不想去莫斯科了。所以，米哈伊尔在普列姆希诺庄度过这个冬天的大部分时间，而这还是自幼以来第一次。后来，他还说过，他住在家里另有考虑。吕波夫之死对普列姆希诺庄的整个一家是个沉重的打击。米哈伊尔认为父母十分需要“一个料理家务的帮手”，于是，他决定“为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94—295页。

安定父母的心情以及为兄弟姐妹的幸福而作出牺牲”。这年冬天，普列姆希诺庄建起了一个造纸厂，理所当然地由农奴生产。米哈伊尔仔细盘算一下，认为不断增加工厂的收入可以使父亲支付他去柏林的旅费，所以，他决心搞好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父亲的态度是“敬爱、尊重同时又寸步不让”。他除了“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以外，愿意牺牲一切——求知欲是我整个精神生活的根本基础和内在本质”。（着重号是他自己加的）

米哈伊尔这时期的笔记相当详细地记录了他如饥似渴读的一些资料。和别林斯基的长期争辩促使他发愤继续大量地——虽不算系统地——阅读黑格尔的著作。他的思路变得开阔了。大概是为阅读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作好准备，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刻苦钻研希腊语语法。有好几种论宗教的书籍，其中包括尼安德名扬一时的《基督教史》、一些古代史的教科书以及基佐的《法国文明史》，他都作了摘要。1839年5月他自己列的书目中还有《曼奴法典》、《可兰经》、洛克的著作、英语语法和一篇微分学论文。这些书他是否读了仍不得而知。他和别人的通信中还提到过吉本的《衰亡史》<sup>①</sup>，他是否读过这本书，同样是个疑问。也有足够证据证明他博览群书，在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米哈伊尔说他自己“从早到晚伏案攻读，有时感到非常吃力，因为我受的是军事教育，以前又懒惰成性，在知识上拉下了一大截距离”。<sup>②</sup>这种说法并非夸张。

巴枯宁在这个时期书读得很杂，反映他哲学观点上的强烈的折衷主义倾向。当他和别林斯基是极端黑格尔派的时候，他们认

---

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7—12，229、246、260、276、396、399、402页。

2) 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史学家，著有反专制性质的多卷本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译注

为席勒的作品很抽象，带有伤感情调，而现在又研究起席勒来了。他读了一本费希特传记，又一次赞颂原来的大师是“我们时代的一位真正的英雄”，称赞“他为了坚定地毫不动摇地向着自己既定目标前进，具有摆脱任何外界的干扰与摈弃世俗偏见的能力。”米哈伊尔最重大的新发现却是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这部著作是以一个历史的基督代替超自然的基督，在德国思想界中发动了一场革命。现在，米哈伊尔才第一次知道，在德国，黑格尔学派的人“分成两大派”：一派是支持施特劳斯的左翼；另一派是“一本正经地”反对他的右翼。米哈伊尔当然仍属后一派。在莫斯科的波特金订有《哈雷年鉴》，《哈雷年鉴》是公认的“黑格尔左派”的机关刊物，正是由于波特金寄了一期《哈雷年鉴》给米哈伊尔看，米哈伊尔才第一次听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名字，此人自称是黑格尔门徒，带头攻击天启教，为宗教和哲学寻找唯物主义的基础。这些观点对米哈伊尔来说实在是太荒谬了，根本无法理解。他坚定地站在黑格尔派右翼一边，并且提醒他姐姐说，在崇拜施特劳斯的时候，“切勿相信他”。至此，他才第一次意识到黑格尔的信徒还是革命主张的斗士，这在他一生中倒是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sup>①</sup>。

12月和次年3月，米哈伊尔和塔蒂安娜曾一起两次去莫斯科，但呆的时间都不长。这两次去莫斯科，他都避开了别林斯基，只和波特金在一起。除这两次外，米哈伊尔在普列姆希诺庄一直住到1839年7月，埋头学习。后来，由于外界刺激的某种需要变得十分强烈，他才动身去彼得堡。自从五年多前在炮兵学校不光彩的经历结束以来，他就一直没去那里。他这次外出原因，或者说

---

<sup>①</sup> 《格拉诺夫斯基通信集》，第2卷第377—378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32，275，306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24—525页。

是借口，是很离奇的。他提出要为瓦瓦娜和迪亚科夫离婚一事作安排，并在出发前写信给瓦瓦娜，要她相信他将“尽一切努力使她获得自由”。这个打算本身是无法实现的。根据俄国法律，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权势，离婚谈何容易。再说，米哈伊尔也不可能施加这样的影响来与他父亲作对。米哈伊尔显然没有将该计划禀告其父，所以亚历山大·巴枯宁是在他离开后才知道的，于是，他给长子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主要是谈问题问题：

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去彼得堡前根本没跟我谈你的计划和打算，这太使我痛心了。我本来可以给你提些有用的忠告的……你的努力和请求法院批准离婚不会有任何结果。我曾想写信给瓦瓦娜谈谈这件事，但是经验告诉我：我的忠告将毫无用处<sup>①</sup>。

彼得堡之行虽对他宣布的目的一无所获，但却吸引他在该地呆了整整四个月。他到彼得堡的当天，遇见一个与他同年的表兄谢尔盖·穆拉维约夫。他们以前在彼得堡时就已相识。于是米哈伊尔就同他住到一起。他发现与谢尔盖的兄弟尼古拉似曾相识。后者是在他之后进炮兵学校的。他从儿童时代起就很少再见过尼古拉，所以，穆拉维约夫家的这个成员对米哈伊尔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他拜访了彼得堡的许多亲戚，其中包括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在炮兵学校后几个月，他常常受到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的热情款待。这位老人和以前一样热情地接待他。但是米哈伊尔发现他的三位漂亮的女儿都不在家，就不再去了。他去找皇家大法官法庭第三厅主任杜贝尔特交涉过，因为他有权解决诸如离婚之类的问题。他结识了受欢迎月刊《祖国札纪》的一位有胆识的编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25、231、255—256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86—589页。

辑克拉耶夫斯基。初次见面就对米哈伊尔产生了通常的良好印象，于是克拉耶夫斯基立即请他为杂志撰写另一批有关哲学的文章。米哈伊尔又一次幻想会有一大笔收入，便马上动手写了其中第一篇文章。这第一篇文章于1840年春季发表。随后，写作的激情消失了。第二篇文章直至米哈伊尔离开俄国前夕才写完，一直未见发表<sup>①</sup>。

米哈伊尔在彼得堡逗留结束之前，不如意的事情纷至沓来。他由于瓦瓦娜所作的努力遭到挫折而感到沮丧，以致将近两个月没有给普列姆希诺庄的任何人写过信。在上文那封引用过的信中，他父亲曾讽刺过他写作的前途。他挖苦说，别林斯基去出卖他的才学倒也未尝不可，但米哈伊尔最好还是干干农活和料理家务，闲暇时搞点动脑力的工作就可以了。这种宾主关系使谢尔盖·穆拉维约夫对他表兄弟的感情变得十分冷漠。听说他抱怨苦于想不出办法把客人赶出家门。米哈伊尔终于迫不得已搬走了，先是住在一家华丽的旅馆（虽然他身无分文），后又搬到炮兵学校一位老朋友家去住。米哈伊尔正在郁郁不欢的时候，别林斯基于1839年10月和一个有钱的文艺爱好者帕纳叶夫一起抵达彼得堡。帕纳叶夫想要充当新一代文学家的保护人的角色。自他们争吵以来，刚好一年时间。这次两人见面时，别林斯基觉得米哈伊尔变得聪明和通人情多了。经过一段尴尬时间以后，别林斯基又被他以前的那种魅力吸引过去了，并把他当作“精神上的朋友和兄弟”。别林斯基比米哈伊尔更热心于和解，这种和解虽注不会会长久，但在米哈伊尔呆在彼得堡的那些日子他们没有闹翻。11月中旬，波特金发来一封急信请米哈伊尔回去。帕纳叶夫给米哈伊尔寄来四千卢布，以便还债。于是，他离开彼得堡到普列姆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57—258，371—

385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70页。



希诺庄和莫斯科去了<sup>①</sup>。

突然来信要米哈伊尔回去，原来是这么回事：他的几位朋友都一个个和他的姐妹们有感情上的纠葛，波特金也不例外。7月，当米哈伊尔还在彼得堡时，他家里人到莫斯科去了一次。波特金就是在莫斯科爱上美貌的亚历山德拉的。去年夏季在普列姆希诺庄时波特金曾见过她一面。但是，她对他爱到什么程度还不大清楚（因为她的书信没有留存下来）。波特金的社会地位并不门当户对，外表也不出众。但是，年已廿三春的亚历山德拉一定觉得是该找个配偶的时候了。她还拿不定主意，在同父母回普列姆希诺庄之前，只是与吕波夫对斯坦凯维奇的做法一样，答应跟她的求婚者私下通信。米哈伊尔被要求介入此事。岁月已经使他变得成熟了，再说亚历山德拉不象塔蒂安娜那样，能够激起他内心的感情。所以，他写了一封颇为通情达理的信劝她，说如果她真爱波特金，那就和他结婚吧<sup>②</sup>。

这些情形虽然还瞒着年迈的亚历山大·巴枯宁，但按照这些浪漫的年轻人的习惯，还得由亚历山德拉、波特金、米哈伊尔和他们在莫斯科、彼得堡的所有朋友进行仔细的讨论。这样一来，亚历山德拉的一个舅舅在10月份得知了此事，他觉得他有责任把这个消息告诉姐夫。亚历山大·巴枯宁闻讯后自然感到十分愤怒。他给波特金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既带讽刺而又不失礼，既文雅而又委婉，称亚历山德拉为“余之女眷”；称自己为“该女眷之父”，并宣称他决不能承认这门亲事。性好犹豫的波特金，早就盼望成亲，此时感到束手无策。他感到最好是赶紧请米哈伊尔回

---

①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40，567，570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2卷第1—2，10，48页。

②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25—526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58—259页。

来。后者于11月中旬动身回普列姆希诺庄，对“这个可恶的舅父”恨得咬牙切齿<sup>①</sup>。

米哈伊尔回普列姆希诺庄后的情况无可稽考。所以，他和父亲最后一次的公开争吵也一定不会有什么记载。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米哈伊尔又一次成了他姐姐的轻率行动的主要替罪羊。从尚存的一封母亲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可以看出，米哈伊尔由于没有把姐姐的秘密说出来而遭到母亲严厉的申斥。他在家只呆了几天就去莫斯科了。他独特地宣称：“他没有父亲”，并说普列姆希诺庄“由于人道、信仰和爱情丧失殆尽而腐败堕落了。”这对情侣继续进行着徒劳的书信往来。但是，波特金的优柔寡断和亚历山德拉捉摸不定的感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840年初，波特金指责米哈伊尔（也许有理）警告亚历山德拉：和波特金结婚就会使她和兄弟们关系疏远，因此他们的关系恶化了。亚历山德拉和波特金的书信来往延续了几个月。后来由于亚历山德拉病倒了，他们停止了通信，这种脆弱的偷偷摸摸的浪漫史也就结束了。像迪亚科夫和波特金那样懦弱而又不讲实际的人，竟敢于冒着失去平静心情的危险，闯进巴枯宁家的青年人特有的那种紧张而又要求过高的环境中去。

\* \* \*

1839—40年的冬天是米哈伊尔在俄国度过的最后的一个冬天，这段时间里，他在莫斯科接触了两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这两个人在他后来的生涯中注定要起重要的作用。上文已经说过，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斯坦凯维奇曾组织过一个哲学小组，同时还有一个与之相匹敌带有政治性质的小组，这个小组是由赫尔岑和他的朋友奥格辽夫领导的。1834年，警方发现这个小组有把

---

<sup>①</sup>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41—54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68页。

激进主义从理论的范围变为实际行动的倾向，就将其主要成员逮捕了，并把他们驱逐出莫斯科。赫尔岑被押送到乌拉尔的彼尔姆；危险性较少的奥格辽夫被押送到他的原籍奔萨。到1839年时，当局的愤怒平息了。11月，米哈伊尔到莫斯科时，奥格辽夫及其妻子获准在那里定居，那年冬天，赫尔岑也几次去过莫斯科。米哈伊尔和别林斯基的争吵，最终把斯坦凯维奇小组搞垮了。波特金、卡特科夫以及一些名声不大的人物仍旧呆在莫斯科。格兰诺夫斯基是一位早期的成员而且是斯坦凯维奇的密友，在柏林侨居三年，回国后颇有名声。但是，小组没有核心，也没有人领导。米哈伊尔的作用是分裂而不是团结。他对朋友的态度是喜新厌旧，认为赫尔岑和奥格辽夫是两位新的、意气相投的朋友。

当时，围绕着黑格尔学说关于现实的合理性的争论非常激烈，二十多年后，赫尔岑在回忆录里，对此作了极其生动和透彻的描述。从历史事实角度来看，他的记述并不正确，因为他其中谈到与米哈伊尔的争论，这件事发生在莫斯科；也提到他与别林斯基争论，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彼得堡。但是，就这件事的本质来说，他是正确的。别林斯基当时的立场极其保守，具有宿命论的观点，在回答赫尔岑的挑战时竟然承认：“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残暴的专制制度是合理的，而且必然会存在下去”。而起初似乎赞同这种观点的米哈伊尔开始产生了怀疑。“他的革命本能正驱使他走另一个方向”。事实上，米哈伊尔早在见到赫尔岑以前，已开始产生怀疑。他被驱使走向“另一个方向”，并非是由于“革命的本能”（从政治意义上讲，他仍然没有什么革命的本能），而是由于别林斯基试图把合理现实的学说应用于日常生活和行动（例如“半便士”的“准确性”），还由于别林斯基对他姐妹们受到的哲学教育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米哈伊尔认为，现实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思辨哲学的和伦理性的问题。他发表在克拉耶夫斯基主办的《祖国札记》上一篇论哲学的文章并没有表示要把

黑格尔哲学运用于政治的倾向。在政治上，直至离开俄国的时候，米哈伊尔保持着冷淡的正统观点。无论是在一封信中预言保罗有一天定会成为一个“模范的地主”，还是赞扬尼古拉是“对沙皇和祖国忠贞不贰的真正的俄国人”，都丝毫没有讽刺的意思<sup>①</sup>。

事实上，在这个时期的米哈伊尔的书信和文章中，根本看不出具有政治头脑的赫尔岑对他有什么影响。从他与别林斯基争吵到他出国这段时期，他的思想没有发生过什么明显的变化。从他知识成长的角度来看，在莫斯科的那个冬天完全是个空白。他在研究黑格尔学说时挤出大量的时间去下棋，比通常更加自由自在地沉湎于社交文娱活动，参加经常在奥格辽夫家举行的招待会（玛丽娅·奥格辽夫爱好交际，喜欢广延宾客，尤其是知识分子），以及在波特金家举行的音乐晚会。除夕，在波特金家吃年夜饭，有蛋黄酱、鲑鱼和山鹑等菜，米哈伊尔开怀畅饮了九杯香槟酒。饭后“体操表演”时，他大显身手。据记载，他在另一次舞会上跳得“非常优雅”。遗憾的是几个星期以后，他是否跟波特金一起参加过一次慈善募捐化装舞会尚未证实。在那次舞会的晚宴上客人们一一举杯向从“纯粹实体”到“观念”的所有黑格尔派的人祝酒<sup>②</sup>。

这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活动总要带来一些丑闻，米哈伊尔也没有幸免。玛丽娅·奥格辽夫有一个温文尔雅、长期患病的丈夫。她因而喜好卖弄风情，1839—1840年冬季期间追求她的人当中，卡特科夫算是最殷勤的了。其间确切地发生了什么事，都被体面地隐藏起来了。但是根据人们喜爱的说法，说是有一天，米哈伊

---

①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8卷第15—16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234、295页。

②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555—557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80—281页。

尔去看玛丽娅·奥格辽夫，发现卡特科夫和她在一起鬼混，就迫不及待地把他所见的一切跟所有的朋友讲了。卡特科夫写了一封信向奥格辽夫求饶。奥格辽夫原谅了他。丈夫、情夫都与这个传播丑闻的人闹翻了。性情温和的奥格辽夫竭力保护他妻子的名誉，宣布和“这个卑鄙的小人”断绝一切关系。卡特科夫早就怀恨在心，下一年就进行了报复，他采用什么方式，下面还要谈到。与此同时，莫斯科也在纷纷谈论米哈伊尔本人的名声：说他私拆别人信件；靠朋友们养活了六年；为斯坦凯维奇抛弃吕波夫索取了三千卢布；靠波特金养活整整一年，以支持波特金向亚历山德拉求爱作为报答，最后又出卖了他。这些事实和想像混杂在一起的风言风语传了好几个月，对米哈伊尔颇为不利。他感到很寂寞，越发怨天尤人。莫斯科和彼得堡此时都成了他不愉快的回忆。他可以信得过的朋友几乎一个也没有了<sup>①</sup>。

悲观主义象一团乌云压在他的心头。他已失去了责任感，失去了自信心，对伟大的前程也产生了动摇。他丢尽了面子。现在不在眼前的斯坦凯维奇是他所崇拜的人物，这人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口角，具有唤起所有朋友内心深处最美好一面的非凡的天赋，是米哈伊尔唯一可以向他倾诉苦衷的听忏悔的牧师：

〔1840年2月，他写信给斯坦凯维奇说〕我的整个生命和我的整个长处都在于一种抽象的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已为一些肮脏的日常家庭生活琐事、家庭争吵和朋友之间的争吵以及我自己的无能所破坏了。但是，我还保持着旧有的超越其他一切的需要，即要求得到当代的知识。——尽管我付出了所有的可怜的、辛勤的努力，求知欲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满足。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一切都不知道——这种需求还处于通向真知的必经的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82、485—486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87页。

过渡阶段，但是对于每一个注定有这种的需要的人来说，这仍是一个贫乏的而不能很快见效的阶段。

这段话写得非常诚恳谦虚，毫不做作，在米哈伊尔的书信中显得很突出。

只有出国旅行才能摆脱这种精神上的不愉快。德国的浪漫主义者到意大利去；俄国人却到德国去，五年来，周围舆论虽然变化无常，但米哈伊尔这一信念从未动摇：即获得知识的关键在于德国哲学。倘若他的求知欲仍然没有得到满足的话，那是因为他一直没有能够找到真正的知识的源泉。因而去柏林旅行便成为“我一生中的唯一目的……我生活的唯一意义所在”。那将是他“精神上的洗礼”。

〔当时，他给他姐妹们写信说〕啊！你们想象不到我是多么着急呀！我在这里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我能够而且必须得到知识，因为我的生命、幸福和力量都取决于神圣的知识。

他处于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危机之中。“他的精神生活的命运”岌岌乎可危了。

\* \* \*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米哈伊尔下决心作最后一次的努力，“他以前所未有的奇特和激动的心情”，给父母写了一封很长的求援信。这封保存下来的信，显示出他的文才比起他在新闻写作的试验时期的文才要出色得多。这封信把谦恭和自恃、诚实和乖巧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我们提前看到了他十一年后给沙皇写长篇《忏悔书》的缩形。米哈伊尔承认了他过去的“错误”和“败”，但并不后悔，因为它们已成为“前车之鉴”。他已经完全没有那种“使我认为人可以相安无事地离开一切社会条件的得意

心境”，他的愿望就是寻找“某种确定的、真正的外界活动”。父亲已经对他说过务农或在政府任职由他选择，他完全同意。他理解做父亲的愿望：长子应该全力经管庄园的事务。但是他求知心切，不可能去过乡绅的生活，去年冬季，他在普列姆希诺庄刻苦攻读就是无言的证明。那么另一条出路就只有在政府部门找个差使。然而，倘若他没有什么资历或大学学位，他就只能做些低下的事情，而不能为国家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贡献。此外，他在柏林住上三年，就可以得到博士学位，有资格在莫斯科大学当个教授。对这项计划的费用经过细算之后，他请求父亲答应每年给他二千卢布，“不行就一年给一千五百卢布”，最多不超过三年。他还轻率地保证说，如果这项请求得到同意，他就永远不再向父母要钱了<sup>①</sup>。

米哈伊尔于1840年3月24日把信寄出后，将近三个星期如坐针毡。他迫不及待地要姐妹们告诉他父亲对这项请求的看法，哪怕是一点点迹象也行。最后，他自己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很委婉地向他们提到上次信的事。4月中旬终于接到了回信。信是3月30日写的，显然是拖了好几天才发出。米哈伊尔好说歹说起了作用。亚历山大·巴枯宁在回答米哈伊尔关于父子之情时不禁说，“没有实际行动的爱毫无意思”，又说他认为米哈伊尔“象另一个堂吉珂德，爱上了新的达辛尼亚”。不过他还是同意了儿子的计划。他详细地解释说，庄园已抵押出去很多，伊利亚需要买一匹马；尼古拉需要添一件新制服。但他仍答应，“假如情况许可的话”每年给米哈伊尔一千五百卢布（他妻子写的附言中提到的）。难怪米哈伊尔高兴得手舞足蹈了。但是，他决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在与赫尔岑闲谈中，他曾提出过要赫尔岑和他的一些朋友借给他五千卢布，赫尔岑没有表示反对。他现在又客客气气地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392—406页。

给赫尔岑写信，要他马上给他二千卢布，以后两年每年给他一千五百卢布。在所有米哈伊尔能称他们为朋友的人中，赫尔岑是他认识时间最短的一个，见面的次数最少，而且对他有吸引力的人品的初次印象尚未忘却。这也许是意味深长的事。赫尔岑很爽快地答应了。将来怎样还未可预卜。不过赫尔岑目前愿意给他一千卢布。他肯定可以成行了。他一生的梦想实现了。

〔米哈伊尔于5月9日写信给他姐妹们说〕一条宽广的道路、一种新的生活展现在我的眼前。几年之后，我回到你们的身边时，将会成为另外一个人，一个真挚的兄弟和朋友，一个完全值得你们爱的人。

如果米哈伊尔此时已暗暗地预感到他永远不能按他自己的自由意志重返故乡；那他并没有向他可敬可爱而又悲伤的姐妹们透露<sup>①</sup>。

他在俄国最后的几星期时间一定是花在她们身上了。他于5月底回到普列姆希诺庄。他从小就很熟悉的苹果树和樱桃树，正值花落，他将再也不会看到花开了。不过，他的心情是很轻松的，没有任何东西会破坏他所心爱的家乡夏季的恬静。除了死去的吕波夫和去意大利的瓦瓦娜外，全家人都团聚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停止了。既然米哈伊尔已放弃了继承权，决心要冒险去奔自己的前程，父母也就克制其他情感，流露出祝福和惜别之情。亚历山大·巴枯宁表现得“和蔼可亲、体贴入微”。在离别之际，米哈伊尔甚至相信母亲是爱他的。由于他已获得自由，所以他忍耐一下也没有有什么关系。自从1836年美好的夏季以来，他第一次感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410、419—421，243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637—638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162页。



到与人与己都和谐一致了。

6月中旬，外界传来了两个消息，打破了这里和谐恬静的田园生活。贝叶尔姐妹俩目前住在俄国中部的家乡庄园里；米哈伊尔由于一时兴奋，似乎已经把她们忘却了。最后，还是邀请她们来普列姆希诺庄和他告别。但是，有许多实际困难：路程太远，邀请得太晚。米哈伊尔收到两姐妹很不以为然的来信，怀疑他的友谊是否真挚。亚历山德拉还特别提到，“有些人一得意就忘记了患难与共的朋友”。米哈伊尔给她们俩写了一封信，责备她们疑心太重，还狠心地说亚历山德拉是个“娇宠坏了的孩子——即使不是命运宠坏的，也是我宠坏的”。但是，他保证说，她们将与他一起生活在“广阔而又自由的永恒爱情的王国之中”，他的精神将永远“与你们在一起，永远爱着你们”。他临别时说了这样好话，谁都会感到高兴<sup>①</sup>。

大约与此同时，普列姆希诺庄收到从罗马寄来的两封信，一封是瓦瓦娜寄来的；另一封是斯坦凯维奇寄来的。斯坦凯维奇的肺病非常严重，他病得很厉害。一直住在那不勒斯的瓦瓦娜，那时正和他在一起。瓦瓦娜崇拜斯坦凯维奇，斯坦凯维奇也已经把昔日对吕波夫的爱情转到瓦瓦娜的身上。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米哈伊尔和他姐妹与其说为斯坦凯维奇的病感到难过，还不如说为斯坦凯维奇和瓦瓦娜终于结为夫妻而感到高兴。米哈伊尔写信给瓦瓦娜说，他认为斯坦凯维奇和她相结合真是“最合适不过了”。他洋洋得意地给他们俩写信，告诉他们说，他很快就要到柏林去了。

这几封信写完几天后，米哈伊尔就出发了。他离开了双亲和普列姆希诺庄；弟弟和姐妹们一起坐车先到柯泽西诺。在这里他

---

①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的青年时代》，第675—676页；斯切克洛夫编：

《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430页，第3卷第4页。

向塔蒂安娜、亚历山德拉和三个弟弟告别。当天，又和保罗和阿列克斯一起前往图尔卓克。到了傍晚时分，他们三人乘坐的马车远离了普列姆希诺庄，分手的时刻眼看快到了，都禁不住泪流满面。米哈伊尔久久不能忘记这一情景，久久不能忘记树丛里的画眉祝他们一路顺风的歌声。米哈伊尔和两个弟弟在图尔卓克分手了。一人独自前往特维尔，接着又前往彼得堡，于6月26日到达，再过三天，他乘坐的轮船就要起航了。

\* \* \*

唯一对米哈伊尔在俄国的最后三天作过详细记载的是别林斯基。他应该算是一个怀有敌意的见证人。别林斯基认为，经过多次周折，他对米哈伊尔的品性已经“摸透了”。他认为米哈伊尔对波特金不诚实。不久，他在给波特金的信中，说米哈伊尔“聪明过人，但不诚实，而且易动感情”。在这样心情下，听说米哈伊尔要来彼得堡“和他细谈并消除误会”，使他很有些不安（他仍然害怕米哈伊尔支配他）。米哈伊尔到彼得堡后，住在一家旅馆里，因为手头有钱，便挑了一间每天四个卢布的大房间。到达的当天晚上，去看望了帕纳叶夫。帕纳叶夫因为听取了别林斯基的意见，所以虽然对米哈伊尔彬彬有礼，但却十分冷淡。卡特科夫跟帕纳叶夫住在一起，因为不认识米哈伊尔，这次没有露面。但是，卡特科夫从帕纳叶夫那里得知米哈伊尔打算次日上午去看别林斯基后，便心生一计，决心要对这个在莫斯科专事诽谤的人进行报复。次日清晨，他躲在别林斯基家里。别林斯基因不是自己一个人和可怕的米哈伊尔相见，显然并不紧张。他没有把他自己和卡特科夫谈了些什么记载下来；但是，他不可能不意识到卡特科夫的出现必将预示一个很不愉快的场面。

十二点后，别林斯基心里砰砰直跳，他看到，“一个高大、笨拙、头戴一顶肮脏学生帽的人”——米哈伊尔在向他走来，便从窗口那里叫他上楼。他们在客厅里见面。别林斯基想避免和他

假客套，但是，米哈伊尔却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用他那“粗糙的嘴唇”吻了他。他们穿过卧室进入客厅。在那里，米哈伊尔突然发现自己碰到了冤家对头。卡特科夫马上发起攻击，以嘲弄的口吻感谢米哈伊尔曾好心地干预过他的事。米哈伊尔大吃一惊，退入卧室，一屁股坐在长沙发上。卡特科夫也跟着走进来，等待他的回答。“拿出证据来！”米哈伊尔终于装腔作势地说，“证据，我要证据！”“证据！”卡特科夫也学着他的腔调说，“你毁了我的名声，老兄，你是个无赖！”米哈伊尔听到这句话，就从长沙发上跳了起来，想不出什么新词，就怒气冲冲地大声嚷道：“你才是无赖呢！”。接着，卡特科夫恶狠狠地骂了最后一句：“太监一样的东西！”

别林斯基看到米哈伊尔的全身颤抖得“象触了电似的”。但是还是卡特科夫先动的手，推了米哈伊尔一下，因此不独从道义上，而且从实际上说，他是肇事者。米哈伊尔抄起拐棍向对手打去。于是两人就争夺拐棍，拐棍打到天花板上，灰泥纷纷往下掉。此时，别林斯基慌了手脚，嚷着要他们住手。米哈伊尔抡起拐棍，打到卡特科夫的后背，先占了一次便宜。然后卡特科夫向前逼近，米哈伊尔躲闪，几乎把身子缩成一团，卡特科夫向他躲闪的脸上啐了两口唾沫。卡特科夫这样侮辱了对手以后，就退入隔壁房间里去了，但是，不一会儿又回来冲着他骂了几句。在搏斗得最激烈的时候，米哈伊尔就声称：“我们俩人以后非用手枪决斗不可”。卡特科夫此时只想提醒他一下他说的威胁性的话。“老兄，你听着，”他慢吞吞地但很清楚地说道：“你要是有种，说话就要算数。”没等回话，他便昂首阔步地走出去了。

于是只剩下别林斯基和那个受了伤的狮子在一起。米哈伊尔的面颊上尽是鲜红的斑点。由于生气和受辱，嘴唇都鼓起来了，构成了一个平行的四边形。别林斯基感到很奇怪，他的姐妹们怎么会去亲他这样的两片嘴唇。一阵尴尬的沉默以及更为尴尬的谈

话之后，别林斯基借口有个约会，他们就一起走了。当天晚上，别林斯基去看米哈伊尔。这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米哈伊尔交给他一张给卡特科夫的便条，那上面说，鉴于俄国法律规定严禁决斗，最好还是把这场决斗移到柏林进行。米哈伊尔和卡特科夫都是虚张声势的人，但前者是另一种类型，比后者更胜一筹。正如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米哈伊尔确实是个懦夫。他根本不考虑什么个人的名誉。他有乐天性格，并不因去欧洲前这个不幸的前奏而感到过分沮丧；他不愿意让一个小小的、不相干的插曲阻挡他的命运之路<sup>①</sup>。

第二天，他为出发作准备工作。在与赫尔岑夫妇见面时，他受到了友好的接待，由于一些老朋友对他怀有敌意，他会见赫尔岑夫妇倒是得到了一些安慰。其他所有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朋友在他早年的经历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不为哪一个朋友感到遗憾。他“高高兴兴”跟他们告别。只有普列姆希诺庄那些亲爱的、忠实的兄弟姐妹例外。最后一个夜晚，也就是6月28日—29日的夜晚，他提笔写信一一向他们告别。尼古拉必定会接替他成为普列姆希诺庄年轻一代的领头人。有一段时期，他曾担心尼古拉会受别林斯基的影响，所以他再次提醒他要当心这种危险。

紧紧地坚定地守着我们的小圈子，记着不要让姓别林斯基的和姓波特金的来取代它。

别林斯基是个好人，但他不是我们自己人，不是属于我们这一类人。你要做我们的姐妹的朋友和保护人，教育她们，也要向她们学习。互相学习是世界上最好的事。你可以向她们学到许多东西——这是我从经验中认识到的。

---

<sup>①</sup>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2卷第124，145—149页。

接着——嘱咐其他的人。他叫亚历山德拉永远不要忘记她是她的热诚的朋友，要对他无话不说并经常给他写信；叫保罗和阿列克斯记住他们的诺言：照顾父亲和姐妹；叫亚历山大给他写信，坚持学习绘画，并且“尽量使精神生活有一种真正的和明确的内容。”最后就剩下塔蒂安娜了：

亲爱的，美丽而聪慧的塔蒂安娜：再见了，我心爱的、神圣的朋友，祝你快乐。

你生活中发生的哪怕是一点点小事，都要让我知道。望常来信

他没有给父母写信。他到吕贝克时，将给双亲写信问安<sup>1)</sup>。

写完这封信后已是翌日清晨六点。他想起了贝叶尔家的姐妹，他是由于疏忽，并非故意地得罪她们。对她们来说，过去的六年中他是很重要的。然而，反过来对他来讲，她们却微不足道。但是，在离别之际，他能回想起他们一起共同度过的那些欢乐时刻和真挚的感情。

〔他给她们写信说〕我生活当中发生的每件事，我一定会写信告诉你们的（他把给塔蒂安娜信中的说法颠倒了过来）我能希望你们也这样对待我吗？不要抛弃我，我的朋友。如果那样做，对我来说，将会是一个可怕的、不可弥补的损失<sup>2)</sup>。

他收拾好行装，仅由赫尔岑一人陪同，乘上驳船，将他送到涅瓦河，前往喀琅施塔得，一艘海轮等在那里。驳船行至涅瓦河

---

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434—436页，第3卷第1，6页

2)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2卷第436—438页

口时风浪大作，只得返航。当他们再次靠近米哈伊尔多年来没想到会再次见到的建筑物时，赫尔岑朗诵了普希金的那首四行诗，诗中称彼得堡是“一座无聊的、寒冷的、像花岗石般的城市”。米哈伊尔不愿下船，当赫尔岑告别并离开的时候，米哈伊尔一动不动地站在昏暗的雨中，身穿黑色外套，显得憔悴而又孤独。

当天夜里，驳船开到了喀琅施塔得。1840年6月30日中午轮船启航，驶向波罗的海。航途风浪很大，大多数旅客都晕船。米哈伊尔却由于见到大海中惊涛骇浪的壮观景色而感到新奇，欣喜若狂，几乎没有离开过甲板。平静的俄国海岸被抛到后面去了。暴风雨从今以后就是他选择的环境。波恩霍尔姆岛上的悬崖峭壁以及残破不全的城堡，使人对海涅和司各特的《海盗》产生了种种浪漫的回忆。天色晴朗。海上的日出日落和明媚的月夜都十分壮观。第五天，船到吕贝克港的特拉弗明德。米哈伊尔在汉堡停留了三天（他从这里写信说，“德国的女子很可爱”，张口就说“对的”）。因为还没有铁路，所以从汉堡到柏林花了四天时间。晚上六点终于到了普鲁士的首都。时间是7月13日，现在用公历代替俄历，就是7月25日<sup>1</sup>。

到了柏林，米哈伊尔得知斯坦凯维奇一月前去世了。他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名叫诺维的村子里，死在瓦瓦娜的怀抱里。他们从罗马到科莫途中在这儿停留。同米哈伊尔还保持联系的旧友本来就不多，这回又失去了一个。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个崭新的世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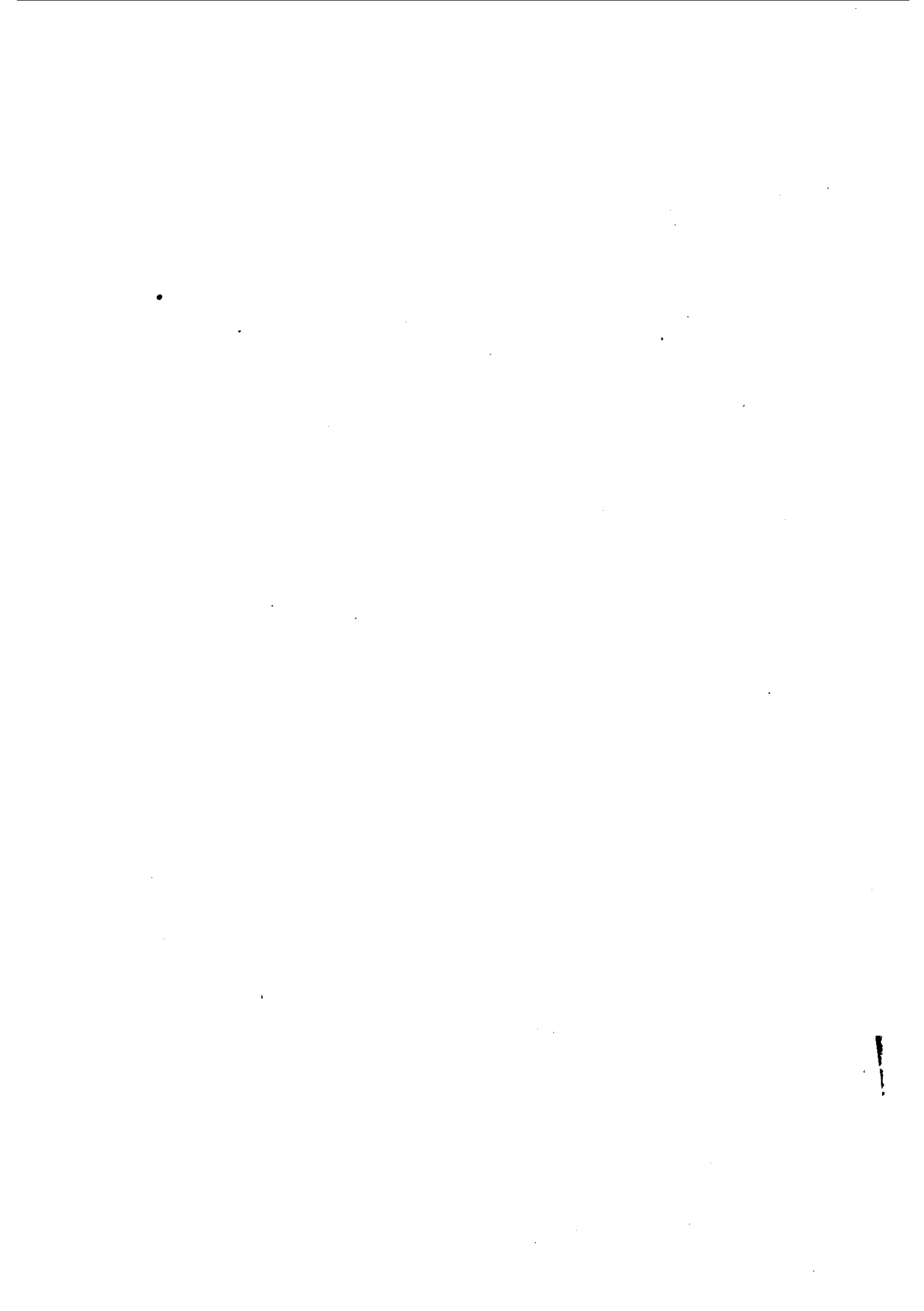
1.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6卷第469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第1—2，6—7页



## 第二卷

# 革命的冒险家





“是否会在岩石上碰得粉身碎骨，甚至会撞到沙滩上，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全速前进。”

米哈伊尔·巴枯宁致保罗·巴枯宁  
和屠格涅夫的信（1842年11月）

“象你这样生在暴风雨中的人，与其在阳光下还不如在暴风雨中成长”。

阿道夫·赖歇尔给米哈伊尔·巴枯宁的信（1850年4月19日）



## 第八章

### 两个世界之间

米哈伊尔·巴枯宁并没有因斯坦凯维奇去世的噩耗而挫伤自己坚定的乐观主义情绪。他说，这种结局是“彻底战胜死亡，是有福气，是不朽的表现。”瓦瓦娜写道，她又一次觉得充满希望、平静、爱和感激。现在，瓦瓦娜又伶仃一人，身边带个孩子，来到柏林和弟弟住在一起，他们租了间备有家具的房子住下，共同料理家务。由于年迈的亚历山大·巴枯宁不知道瓦瓦娜和斯坦凯维奇上次旅行的秘密，所以坚信瓦瓦娜与米哈伊尔在柏林会面是预先安排好的计划的一部分，故意瞒着他的，他写信严厉地训斥米哈伊尔不老实。这个老头子不起疑心时就受骗，疑心受骗时却又没有人骗他，真是命该如此<sup>①</sup>。

年轻的巴枯宁在柏林不多几天就碰见了俄国的另一位蓝眼睛的大汉，这个人就是伊万·屠格涅夫。屠格涅夫比他小四岁，日后总有一天名声比他还要大。伊万·屠格涅夫已在国外两年，知道外国大城市的那一套。巴枯宁尽管天生就很自信，但面对着一座陌生的都市还是手足无措，所以他此时此刻见到任何一个本国同胞都会去和他拥抱，哪怕是碰到和屠格涅夫比较起来吸引力较小，而又和自己更不能相比的人也是如此。不出几天——或许不

---

<sup>①</sup>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16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8，27页。

出几小时，两人就建立了终身友谊。

伊万·屠格涅夫是一个寡妇的次子。他二十岁时摆脱了母亲的束缚。廿五岁时，他却又套上了保琳·维亚多特的桎梏，这种桎梏后来继续了四十年。在这两件大事期间，他崇拜过几位名气不大的人物，其中一位就是尼古拉·斯坦凯维奇，是出国后的头一个秋天在柏林遇见的，在斯坦凯维奇去世前的那一年又在罗马见了一面。

崇拜斯坦凯维奇就表明信仰黑格尔和思辨哲学，虽然哲学在年轻的屠格涅夫的思想上没有生根。但是，他对这种时髦的东西是很称道的。斯坦凯维奇现已去世，所以他需要另找一个崇拜的对象；他遇到了斯坦凯维奇的学生和朋友巴枯宁。

〔会面后不到六个星期，他写信说道〕斯坦凯维奇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我们至死也不分开。我简直不能说，也说不出我多么感谢你。我的感情就像大海的波涛久久不能平静，不知用什么言词来表达。我在那本百科全书<sup>①</sup>的扉页上写道：1840年6月24日，斯坦凯维奇逝世。下面一行：1840年7月20日<sup>②</sup>，遇见了巴枯宁。在以往的半生中，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其他值得追忆的往事。

同样，巴枯宁对他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写信给普列姆希诺庄的姐妹们说：“除了你们、贝叶尔姐妹和斯坦凯维奇”外，屠格涅夫和他“最称莫逆”<sup>③</sup>。

---

① 显然是指黑格尔的《哲学全书》。

② 这个日期既不正确，也不是俄历（虽然斯坦凯维奇去世的日期是西历）。巴枯宁于7月13日或25日抵达柏林。

③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5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59页。

这两位朋友很快就变得形影不离了。巴枯宁觉得跟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以及跟一个愁眉苦脸的母亲一起生活有许多不便之处，于是在10月间就和瓦瓦娜分开，搬到屠格涅夫附近的一套房间里。友谊之花初开之际，这两位年轻人一夜又一夜地畅谈他们的信仰、理想和抱负。屠格涅夫紧挨火炉，巴枯宁平躺在长沙发上，或者沿着菩提树大街漫步，到他们喜欢去的咖啡馆喝咖啡，那里有外文报纸可供阅览。他们高大的身材和漂亮的、富有表情的容貌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巴枯宁爱当导师，而屠格涅夫爱做徒弟，两人一拍即合。巴枯宁感到更高兴的是，他发现屠格涅夫的钱包好象寡妇的坛子<sup>①</sup>，取之不尽，可作为贷款的来源，借多借少都行，只要含糊答应在遥远的将来还账就可以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两个人的结合是很理想的<sup>②</sup>。

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巴枯宁不认真是不行的。对于斯坦凯维奇的每一个信徒来说，柏林是哲学的故乡，尽管黑格尔已去世九年了，但是，在柏林，谈到哲学指的就是黑格尔体系。韦尔德尔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也是黑格尔的忠实信徒，他的见解大都只在课堂上发表。巴枯宁热切地盼望拜他为师。他兴致勃勃地引用《浮士德》中的学究的话说，“尽管我知道得很多，但是我还想知道所有的东西”。他求学心切，甚至连10月份大学新学期开学都等不及。他从一个学生那里借了韦尔德尔关于逻辑学的讲课笔记，不仅自己学习，而且还动手抄下来寄给弟弟保罗。新学期开始后，他经常去听韦尔德尔的哲学课，还上美学、神学和物理学课；课余，玩跳栏和骑马。巴枯宁和屠格涅夫一样，满怀信心地盼望着他们将在柏林一起度过不寻常的冬天。

---

① 典出《圣经·列王记》第17章第12节，意指取之不竭的钱包。——译注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5，40，44—45，85页；安年科夫：《文学回忆录》。

这项雄心勃勃的学习计划实际上完成了多少，已无从稽考，但是，巴枯宁正式进了大学，并获得文凭，说他是高材生；他和屠格涅夫经常去听韦尔德尔很少有人上的逻辑学后，已赢得了“热心的黑格尔学者”的声誉。后来，他偶然遇见受浪漫主义者崇拜的谢林。后者有点令人失望，巴枯宁认为他的讲座“有趣但却无聊”。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热情地参加他的祝寿活动。当学生们的火炬队伍聚集在这位老人的门前时，巴枯宁洪亮的呼叫声，在雷鸣的欢呼声中听得一清二楚。一位旁观者活灵活现地描绘说：他的整个面孔变成“一个张开的大嘴”。正象他喜欢各种自发的人类活动一样，巴枯宁为热闹而喜欢热闹，他总是情绪激昂地参加大学的活动，虽然并不经常<sup>①</sup>。

社交活动对他也有不少吸引力。一到柏林，巴枯宁氏就不乏往来的朋友。在俄国人中，有曾与瓦瓦娜一起为斯坦凯维奇守灵的埃弗莱莫夫；有巴枯宁第一次遇到的姓弗罗洛夫的斯坦凯维奇的两个朋友。还有一个生于波罗的海省的德国血统的男爵写道，他曾同巴枯宁和屠格涅夫一起度过许多夜晚，喝俄国茶，吃干切牛肉，但他谦虚，没有说出自己的大名。事隔不久，卡特科夫也来了，表面上受到了亲切的欢迎。柏林使巴枯宁感到很兴奋，使他忘记了各种不愉快的往事。只有卡特科夫还感到尴尬。多年以后，在他的回忆录里，只是以轻蔑的口气提到巴枯宁，进行报复。在德国人中，还得提一提弥勒一斯特吕宾格，整整十年，此人的行当就是把俄国旅游者引进德国的纯思想和狂饮的迷宫之中。弥勒一斯特吕宾格是个新闻记者，作家，艺术、音乐、戏剧评论家，也是一位哲学家。青年时期，他醉心于政治。这种空想使他坐了五年牢。目前，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大多数到柏林来的

---

(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0，18，32—33，37，78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0页。

俄国人都有钱，而且很慷慨；为了感谢他的效劳他们请他吃施特拉斯堡的小馅饼。除喝啤酒，谈艺术，讲思辨哲学以外，吃这种饼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此人所起的头等重要的作用也许是帮助包括巴枯宁在内的许多俄国人形成一种对典型的德国形象固定不变的看法，那就是：好谈思辨哲学、多愁善感、无所不在、仁慈和蔼、贪吃贪喝、尤其是极端荒谬可笑<sup>①</sup>。

巴枯宁和屠格涅夫圈子里最有名的德国人是万哈根·冯·恩赛。他是一位退休的外交官，有文学鉴赏力和写传记的才能。他曾参加过维也纳会议<sup>②</sup>；也曾代表普鲁士国王出使符腾堡宫廷。天生的爱好和外交的经验使他成为一个追逐名人的老手。他追到手的最有名的人物是德国浪漫派的无冕皇后拉埃尔·列文，并娶她为妻。那时正值晚年，他忙于编辑亡妻的文学遗著，详细地记日记，搜集手稿，赞助文学艺术的新运动。在三十年代后期，普希金的名字已越过普鲁士的东部边境，俄国文学成为风靡一时的崇拜对象。万哈根对此表示热烈支持，并在柏林寻找象斯坦凯维奇和格兰诺夫斯基这些在文学上有名望的俄国人，而且还请斯坦凯维奇的朋友尼维罗夫教他学俄文。

巴枯宁第一次和万哈根相识是很奇特的。一天上午，他因丢失一封尼维罗夫托他转交给万哈根的信而去向他道歉。去时，万哈根还未起床，但这并没有使他感到有伤尊严，他仍然镇定自若。他接待了这个年轻人并原谅了他。老练圆滑、消息灵通的万哈根想起巴枯宁曾将蓓蒂娜与歌德的一些通信译成俄文出版。他问那些书信是否已经全部译完，巴枯宁撒了个大谎，说已经译完，但

---

①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314—315页；《俄罗斯古风》（1884年5月）。

② 指1814年10月1日至1815年6月9日在维也纳召开的俄、英、奥、普等国参加的会议。——译注



丢失了原稿。万哈根认为他的客人是“一个正直的年轻人，心胸开阔、思想高尚”。但是，他没有把谈话的其余内容记入日记。赫尔岑曾谈到急于“投身于现实的旋涡中去”的巴枯宁和屠格涅夫如何拜访万哈根，并求他给他们介绍“一位漂亮的女演员”。但是，这些话不大可靠。这类事对巴枯宁没有用；屠格涅夫也不需要万哈根牵线。万哈根介绍给他们的这位女士实际上是一位著名的歌唱家，名叫亨利埃特·舒曼，不过，她并不年轻，长得也不漂亮；已经离开舞台进入沙龙，想竭力保持不朽的拉埃尔传统。为了去拜访她，这两位年轻人身穿上等天鹅绒马甲，一个穿绿颜色的，一个穿紫颜色的。万哈根还把巴枯宁介绍给蓓蒂娜·冯·阿尔宁。她已年逾半百。据一个同辈人说，她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女人”，“一点也不漂亮。头发是染过色的，简直没有梳过。身穿一件旧黑色丝绸外衣，随随便便，看上去很不顺眼”。巴枯宁还在青少年时，蓓蒂娜的书信曾给他留下过浪漫的印象，现在见到她本人，他的印象毫无疑问地就不那么浪漫了。不过，他还是去拜访过好几次，并且每次通常都达三小时之久<sup>①</sup>。

巴枯宁和屠格涅夫活动在一个五花八门的世界性的都市社会里，社会活动也和其成份一样各不相同。每逢星期三，人们纷纷参加贝多芬音乐会，音乐会上轮流演奏大型的交响乐。听哪个交响乐倒是大有讲究的。贝多芬那时还不是公认的第一流作曲家，只是把德国理想主义谱进音乐。用赫尔岑的话说，四十年代的年轻浪漫主义者“不把罗西尼放在眼里，对莫扎特取默认态度（虽然也认为他幼稚、软弱）对贝多芬的每一个和弦则从哲学的角度

---

<sup>①</sup> 《万哈根日记》，第1集第232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8卷第235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85—86，93，266—267。蓓蒂娜·冯·阿尔宁的“当代的报导”将在鲁西·科恩处找到，见《路特希尔德夫人和她的女儿们》（1935年）。

进行考察”。音乐会后，——其他夜晚也常常如此——他们就在瓦瓦娜的寓所碰头。她住在四层，房间舒适雅致。窗台上摆着各种花草，金丝雀在屋里飞来飞去，鸟笼里还养着一只红腹灰雀；米哈伊尔、屠格涅夫帮她给客人们递俄国茶和熏舌肉。他们晚上或者朗诵文学作品（一天晚上，朗诵了拜伦的德文译本《该隐》，或者讨论哲学、艺术。只是不谈政治，因为时事政治与永恒不变的真理比较起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大名鼎鼎的韦尔德尔本人有时也在这里露面，因为听完他的德国学生无聊的空谈以后，对巴枯宁的“直言不讳”倒觉得清新。一次，他给他们朗诵自己写的诗剧《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第一幕。有一次，他谈到形而上学可以保护灵魂不朽，这就使得瓦瓦娜完全打消了疑虑。瓦瓦娜给姐妹们写信说：“我们简直一时一刻也不平静”。这些年轻人可能发现同家里人讲他们的目的和成就是很难讲清楚的，但毫无疑问，生活是丰富的、严肃的、是非常有意义的①。

\* \* \*

尽管这些新经历使巴枯宁感到激动振奋，但在西欧，他仍是个局外人。1840年夏，他在喀琅施塔得上船，并没有想过要脱离他的国家，而且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再也不会作为一个自由的人而重新踏上俄国的土地。甚至1842年春，他仍然认为，或者使他的朋友也认为，他的奋斗目标是得到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的讲席。在他到达异国的头几个月内，他一直念念不忘普列姆希诺庄，他大量的书信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最美好的愿望是希望那些和他相亲相爱的人来分享他暂留国外所取得的精神上和知识上的一些收获。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2，43，66，86页；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8卷第14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在  
国外旅居的年代》，第16，42页。

他首先想到的是保罗。从年龄上讲，尼古拉是仅比米哈伊尔略小的一个弟弟，但思想上却与他不接近，况且他马上就要结婚了。他最喜欢保罗。保罗和他一样爱好哲学，也切望拜韦尔德尔为师。他肯定要来柏林。父母也不会反对，因为屠格涅夫会借钱给他的。保罗本人出国确定后，一定会提出把米哈伊尔所心爱的塔蒂安娜带出国的问题。1841年春，米哈伊尔给普列姆希诺庄的书信，谈的都是这些计划。

就塔蒂安娜而言，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离开米哈伊尔她就失去了战斗力。她天生太重感情，不是出于父母内心同意的事，她是不会提出来的。保罗出国的事父母很快就同意了。巴枯宁家兄弟和贝叶尔姐妹只要一见面，就会产生感情上的纠葛，保罗和亚历山德拉·贝叶尔已经陷入了这种感情上的纠葛。保罗廿一岁，亚历山德拉比他大几岁。亚历山大·巴枯宁这一次想用送儿子出国旅行的办法来转变其思想。1841年8月，即米哈伊尔出国一年零一个月之后，保罗也到了柏林<sup>①</sup>。

他走得实在太仓促，没有来得及写信告诉瓦瓦娜和米哈伊尔。他们已离开柏林到德国西部去进行夏季旅行了，也没有留下地址。保罗追踪去找，最后一直追到埃姆斯——俄国旅行者向往的避暑胜地——才找到他们。他们在埃姆斯一起玩了几个星期，游览了法兰克福，参观了鲁特岑战场和古斯塔维斯·阿道弗斯纪念碑，又前往美丽的城市德累斯顿。瓦瓦娜和保罗决定在那里过冬。这种兄弟姐妹分开的决定意味着对他们感情上有某种压力。米哈伊尔1841年10月独自一人回柏林从事哲学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

---

①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1卷第93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44—45，51—53，58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68，71页。

独自一人生活在他一生中还是第一次<sup>①</sup>。

他说独自一人生活，是因为屠格涅夫已回到俄国。他得到米哈伊尔的“完全赞同”。此时正在普列姆希诺庄进行六天盼望已久的和关系重大的访问。他是一位着了迷的，同时又是使人着迷的客人。他仪表堂堂，举止大方，使每个人都着了迷：其中包括阿列克斯，他和阿列克斯摔跤，被摔倒时，地板都颤动了；还包括亚历山大，他和他一起画过漫画；还有塔蒂安娜，她早就崇拜米哈伊尔的这位朋友，一下子就深深地爱上了他。塔蒂安娜廿九岁，或许除一时对别林斯基有过好感，只爱米哈伊尔和其他几个弟弟之外，她还没爱过任何人。但是，米哈伊尔走后，那种起支配作用的施加在她感情上的不自然的约束就不存在了。在短短的六天中，她心中充满了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激烈的感情，她已经进入了甚至连米哈伊尔也无力使她进入的境界。

他们于12月在图尔卓克相会，次年春天又在莫斯科相会。屠格涅夫对他朋友的这个姐姐颇有好感。不过，他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他可没有巴枯宁那种用高尚的情感与玄学式的学究气把简单的异性之间互相吸引的现象复杂化的天生气质。与其说他是好逢场作戏，还不如说他爱追求享乐。他回国后，曾与他母亲的女裁缝、一个金发女人私通，不久就生了一个孩子。在他生活的日程中，根本没有考虑到塔蒂安娜·巴枯宁。这个渴望得到爱情，患了相思病的女子虽整夜悲泣，但已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一封尚存的信记载着：她1842年夏天给屠格涅夫写信说，她的爱情是“无人过问、无人需要”的，是绝望的爱情，既不提什么条件，也谈不上有什么自尊心。但她还是有点自尊心的。米

---

①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73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60，65，67，69—70页；第4卷第32页。

哈伊尔居然会依赖、现在仍部分依赖屠格涅夫的周济过活，而又无力还债，这使她感到恼怒<sup>①</sup>。

此时，米哈伊尔不知道塔蒂安娜的悲剧，也不管屠格涅夫给不给钱，在柏林多罗特恩街住上了单套房间。他几乎只与德国人来往，例如弥勒—斯特吕宾格及其他一些只不过是偶尔知道名字的人<sup>②</sup>。他在听讲座的单子上又加上了谢林（“启示哲学”）和兰克（“现代历史”），为了消遣解闷，还读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勾起他对故乡普列姆希诺庄以及住在德累斯顿的瓦瓦娜和保罗的思念。他右腮上长了个疖子，弄得他一星期不能好好睡觉，后来又犯了牙痛病。他写信给普列姆希诺庄的姐妹说：“对我来说，独居总是有益的，可以迫使我自我反省”。但是在他1841年冬季期间的书信中流露出失意和悲观的情绪。很明显，他正面临生活中的危机<sup>③</sup>。

\* \* \*

瓦瓦娜和保罗返回普列姆希诺庄断绝了米哈伊尔和家乡的最后个人联系，危机也就发生在这个时候。瓦瓦娜首先回国。自去年春天以来，就一直讨论她回国的事。当时，亚历山大·巴枯宁写信要女儿回国和她丈夫和好。父母出面干涉激起了米哈伊尔的反抗激情。一匹久经沙场的战马闻到了打仗的气味。他声称，除非保证瓦瓦娜及其孩子不受其丈夫干预，否则让她回国就是一种罪过。巴枯宁根本不相信父亲，因为他完全站在迪亚柯夫一边；

---

①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75—77，115—116，222页。

② 1841年10月恩格斯来到柏林，也住在多罗特恩街，而且也听韦尔德尔和谢林的讲课。但是这两个青年在许多年之后才见面。

③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66—67，73—74，92页。

他还委托已回俄国的屠格涅夫，“与尼古拉弟弟商讨关于瓦瓦娜回国的问题”。和过去一样，瓦瓦娜在渴望自由和同情丈夫之间徬徨，这种同情和隐藏在内心的尊敬交织在一起。米哈伊尔对迪亚柯夫的态度既冷漠而又有点鄙视，对她本人的态度也很专横，这使她又一次感到不满。但她知道米哈伊尔对她有支配力量，有时还有点怕他。尽管她不愿意米哈伊尔取胜，但到头来，米哈伊尔总是胜利者。此时米哈伊尔给塔蒂安娜写信谈到瓦瓦娜“如何反抗，决计不听别人的话，每件事情上都很任性，然后又屈服了，这次又是这样”。

这场斗争一直延续了好几星期。1841年11月，瓦瓦娜从德累斯顿给米哈伊尔寄来一封给丈夫写的信，想征得他同意。他觉得这封信屈从的口气太重，便轻蔑地把它撕掉，替她另写了一封信寄去。几天后，米哈伊尔收到尼古拉的一封信，他已充当了迪亚柯夫的调解人。迪亚柯夫答应不打算见瓦瓦娜，也“决不会常常去看儿子”。有了这些条件，米哈伊尔最后“同意”瓦瓦娜回国。但是，冬天无法上路，所以她直至1842年6月才动身。在最后几个月里，姐弟之间似乎很少通信。圣诞节时米哈伊尔去德累斯顿看望瓦瓦娜和保罗，但是瓦瓦娜没有再见他一面就离开德国了。

〔瓦瓦娜回国后，他写信给她说道〕我们尽力相互了解，做朋友。可是我们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不怪我，也不怪你……我并不否认我时常是很苛刻的，伤害了你的感情。但是，相信我，瓦瓦娜，这样做也同样伤害了我。我每时每刻都深感后悔，你应当谅解我。此外，我苛刻的出发点是好的。我尽力想做你的朋友。我想用强迫去做那些不能通过强迫来做的事。我承认，这样做很幼稚。我向你发誓：我今后永远不这样做了。

但是，瓦瓦娜已经不信邪了。于是在这一家的孩子们中出了

个叛逆者，米哈伊尔又失去了一个与普列姆希诺庄的联系<sup>①</sup>。

保罗仍留在德国。瓦瓦娜走后不久，在大学学年结束时，米哈伊尔从柏林回来看保罗，8月份，屠格涅夫刚从俄国来，也到了德累斯顿。可是屠格涅夫不再象去年那样慷慨解囊了。他要用钱完全得看母亲高兴不高兴，他的母亲很富有，也很任性。她已经对儿子提供很多钱使他的朋友靠他的资助为生感到讨厌。经济拮据肯定不是令人愉快的事。“告诉父母”，米哈伊尔给阿列克斯写信挖苦道：“我们正学着靠喝西北风过日子，不过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个本事”。有一家姓耶泽柯夫的俄国人住在德累斯顿。他们第一次在埃姆斯见过面。米哈伊尔为人古怪，他对这家孩子的母亲颇有好感；而保罗则对这家的女儿更有好感。还在瓦瓦娜回国前，哥俩就向耶泽柯夫家借过钱，现在无法还债。还有一种更为干脆的强行借债的办法。要不是得到一笔意外的钱，米哈伊尔写道，他们肯定“就要坐班房了”。

一定要想办法解救危难。在国外呆了一年，保罗并没有产生研究哲学的强烈愿望。但是，这一年也没有白过。这一年使得这位年轻人对亚历山德拉·贝叶尔的深情的幻想破灭了。亚历山德拉并不把这种变化归咎于青年人的反复无常，而是归咎于米哈伊尔的影响。保罗没有理由再延期回国了。屠格涅夫将于11月份回国，米哈伊尔一定要保罗和他同行<sup>②</sup>。

作出这个决定还出于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动机。这几个月来，巴枯宁的思想和抱负逐渐有了转变。去年冬天，他洋洋得意地给亚历山德拉·贝叶尔写了一封信（这大约是他给多情的两姐妹写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55、70—73、78、92—93、117—118页。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65、108、119—120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215页。

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除非她们来德国看望他,否则“我们就不太可能再见面了”。就在同时,他还在给普列姆希诺庄姐妹写的一封信的附言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们还有见面的一天吗?天晓得!”1842年夏天,他离开柏林移居德累斯顿。他这样做不仅抛弃普鲁士的首都移居萨克森的首都,他还放弃了哲学和学术生活,开始搞新闻和政治了。这种改变的必然结果是他永远也不能回到搞政治是非法的国度——俄国了。他玩的时间够长了,现在是把抱负变为现实的时候了。在给普列姆希诺庄的信中宣布他的决定时,他引用了《浮士德》的诗句:

还要我象孩童那样玩耍,我已太老了,  
但要我去实现自己的抱负,我又太年轻。

巴枯宁仍旧深深地爱他的姐妹和弟弟们,并将永远爱他们。但是,冒险的生活使他们分道扬镳,使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要在德国再逗留一年,然后也许要去法国。奇怪的是,这封信的口气是实实在在的。他同时还给尼古拉写了一封信,恳求将父母应分给他的家产卖掉,所得款项由他自己处理。这份拟议中的应该分给他的父亲的财产就象鬼火一样,老是缠着他不放,欲得不能,一直闹了大约三十年<sup>①</sup>。

但是米哈伊尔不能无动于衷和冷静思索了。和保罗的分别从根本上使他发生了动摇。他已抛弃了祖国,这对他倒无关紧要。但是,普列姆希诺庄,普列姆希诺庄的河流、森林、姐妹们和弟弟们,这一切对他都是至关紧要的。1842年11月3日,在德累斯顿火车站和保罗告别时,他意识到,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他就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91,94,115,120—122,125—126页。



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次日，他提笔给普列姆希诺庄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他的书信中是独一无二的。如不详细引用这封信，就不能对它作出公正的评判：

保罗和屠格涅夫走了。明天我把这封信寄到柏林去，他们将在那里逗留三天。我一离开他，我就又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和你们、普列姆希诺庄、俄国以及我过去的一切告别了。保罗是我亲爱的普列姆希诺庄的最后一个知音，他走了。他不在这儿，就如同你们也不在这儿。再见吧！再见！我周围都是陌生人，听到的都是陌生的声音，听不到家乡的声音了。我现在才知道我是如此喜欢这种声音，我现在才知道我和你们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一边给你们写信，一边就象一个婴儿一样放声大哭，我多么软弱无能啊！但是，我不想对你们隐瞒这一点。我好长时间未能和你们谈话了。保罗一走，就象挖了我的心一样，我又想起你们了，为了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你们永远告别，我才想到你们的……我还是只身一人好，这样我可以哀泣，以前，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眼泪……是的，我深信这是我最后一次流泪。我再也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了，因为我已失去了一切，和一切都告别了。再见，朋友们，再见吧！

亲爱的塔蒂安娜，把我的画像挂在你的房间里吧。我是为你才画这张像的。或许它可以使你记住我。老实说，朋友们，对你们来讲，我已经变为一个你们一无所知的鬼魂了。我的画像和保罗讲的话会使我复活。瓦瓦娜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她以前不了解我，甚至现在还不了解我。

记得吗？一个秋天的深夜，我们在罗帕蒂诺和米特尼茨森林之间的一排灌木树篱里是如何憧憬未来的美景的吗？你们还记得一群白鹤在空中展翅飞翔的情景吗？现在白鹤离开你们飞向我们逗留的国家。你们还记得我们在米特尼茨森林散步的情景吗？今年夏天，你们还是沿着我所喜爱的小道散步的吗？我种在小树林里的几棵树长得怎么样了？一年春天，在复活节前一星期，我们在那里点起了一堆篝火。当时，吕波夫病危，她坐在马车上和我们一起玩……后来，我走了。上帝啊！当我跟爸爸告别时，我伤心

死了，要离开我可怜的令人尊敬的父亲时，我是多么悲痛啊。他希望我们幸福但却毁了我们的一生。这是因为他不忠于自己的信念造成的。现在，他已经完全把我忘了。他要是知道我是多么爱他，该有多好啊！朋友们，请好生照料他，他受了一辈子罪，命运本来应该更好一些的。后来，我们坐马车一起去科泽特希诺；姐妹们，你们记得那天傍晚我们是怎么分手的吗？你们当时是否认为我们不会再见了？阿列克斯，你还记得吗，我们三人乘车边走边哭以及丛林中的画眉歌唱的情形吗？……

伟大的前程还在等待着我。我不能上种种不祥预感的当。啊！哪怕我能实现我心中理想的一小部分，我就别无他求了。我不再要求幸福，我也没想过幸福。工作，为神圣事业艰苦地工作就是我的要求。摆在我面前是广阔的天地，我的作用也是不可小看的。

我还是很悲伤，但是我的悲伤将会结束的。这是我离开俄国的最后一次悲痛。现在，我又坚强起来了，无所畏惧，昂起头，整装待发。朋友们，要记住海外还生活着一个永远是你们的朋友、渴望得到你们爱的人，因为离开了你们，他在世上就无家可归……

朋友们，分别了，再见吧！招招手，我们将生活下去，决不回头。

过去，巴枯宁太年轻，不知道怎样生活。两星期之后，他兴高采烈地写信说，他参加了一次宫廷舞会，和法国驻德公使夫人跳过舞<sup>1</sup>。

---

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48—153, 161页。

## 第九章

### 告别哲学

现在，巴枯宁二十九岁。普列姆希诺庄的家庭纠纷没有削弱他的正统的政治信仰；他仍没有从黑格尔关于现实的哲学辩论中探寻任何政治含义。从俄国移居到德国时，也许可以公正地把他描写成这样一个人：按其气质来说是个叛逆者；按其家庭传统和理性主义的信念来说是个保守派。一般来说，像巴枯宁这种刚愎自用的人，气质终究比传统和理性更重要，因此有理由认为他最终转向革命事业是预料中的结局。但是他转变得如此迅速和彻底，既表现了俄国贵族的一般特点，也显示出巴枯宁特有的个性。

巴枯宁对普列姆希诺庄的强烈感情本质上还是狭隘的，并带有个人的色彩，而不是为整个国家或民族献身的传统。他热爱俄国的农村，但肯定不爱俄国这个国家。在十九世纪前半叶，甚至（或者，也许首先）在俄国的贵族中间，俄国民族的爱国主义刚刚产生，而且先天不足。浸透了新斯拉夫主义的下一代俄国人以一种愤怒、怜悯和轻蔑交织在一起的情绪看待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这在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但是对于赫尔岑、屠格涅夫和巴枯宁这一代来说，欧洲似乎是第二祖国，就多数方面来说似乎是更美好的祖国。这三个人用法语会话和写作，就象使用他们本国语那样方便，使用德语时几乎象使用本国语一样方便。他们三十多岁时，尽管在其它方面大不相同，但都首先不是把自己看作俄国人，而是看作欧洲和世界的公民。当民族主

义正在席卷欧洲其它地方时，俄国的地主阶级仍然维护启蒙时代的世界主义的文化和观点。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俄国仍然是培植世界主义人士的过时的、但却是肥沃的土地。

在这种条件下出生和成长的巴枯宁对于强大得足以阻碍他自由地发挥叛逆气质的民族传统一无所知。理智也同样无济于事，因为巴枯宁虽然才思敏捷、智力过人，但在极大程度上他的头脑却受感情冲动的支配。不加区别地反抗权威在每个正常人的成长过程中是必经的阶段。巴枯宁一生生活在对大多数人来说早在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就超越的生活阶段。在这方面与其说他掌握了永葆青春的秘诀，还不如说他享有永远是一个孩童的秘诀。确定他的反抗目标有时似乎是次要的，它往往是根据一时的形势或动机来决定的；他的理智所提供的为他这种反抗辩护的论据则更是站不住脚的。在巴枯宁身上明显地表现出，不管反抗的目的和理由是什么，纯粹是出自本能的反抗。

1842年，巴枯宁在德国经历的从家庭里的反抗到政治上的反抗的转变过程，可以简单地用德国的文学和哲学的观点来加以叙述。同大多数同时代的俄国人一样，巴枯宁在去德国之前就受到德国两种重要思潮——德国的浪漫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1840年，他到达柏林时，这些思潮在德国本土仍占主要地位；在那里，他发现知识界的气氛在本质上同他在俄国所遇到的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也许在程度上更强烈一些）。巴枯宁在柏林的第一年与其说是他欧洲时期的开始，还不如说是他俄国时期的结束。

然而，1841年是德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前一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当了普鲁士国王。他是一个顽固的、狂妄的反动分子，专门惹是生非。由于他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挑衅性的攻击，激进派给了他一个讽刺性的称呼：“德国头号革命家”。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曾经是一本遭到冷遇和诽谤的书。“黑格

尔左派”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不引人注目的小集团。但是官方的迫害强有力地推动了运动。巴枯宁在莫斯科隐约地听说过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1841年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这部著作是新兴一代思想的结晶，标志着一个哲学时代的开始。

费尔巴哈的这本书想为宗教寻找物质基础，为黑格尔左派、或者此时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派提供一个集合之点。在宗教战线上首先对黑格尔正统派发动攻击，这对充满宗教特色的时代是有深远意义的；造反者仍然躲在黑格尔的名下，并且声称不是否定他的学说而是解释他的学说，这说明他在死后十年继续享有巨大的威望。他们论证说，如果剥去那些国家崇拜的赘疣（这是这位老人晚年的成果），黑格尔体系不是反动的信条，而是革命的信条。因为，如果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那么辩证法不过证明了凡是现实的都是变化的。因此静止的事物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合理的。理性与革命成功地一致起来了。这种新的学说象野火般地传遍了年轻的一代。曾经把黑格尔主义解释为政治寂静主义的热忱的黑格尔主义者现在一头扎进了政治，确切地说，是拿黑格尔为他们作辩护。在三十年代，做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意味着接受现存的政治局面；在四十年代，除了一些职业的哲学家外，则意味着做一个政治革命家<sup>①</sup>。

巴枯宁在阿尔诺德·卢格的影响下，第一次接触新黑格尔主义。卢格是个颇有才华的凡人，人们现在记得他，主要因为他对巴枯宁和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发生过短暂影响。1838年，卢格在大学城哈雷创办了哲学和政治刊物《哈雷年鉴》，该刊成为黑格尔左派的喉舌。在莫斯科，波特金就借给米哈伊尔看过一本。刊物开始在激进派人士中引起注意，很有影响。1840年底，暴虐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插手查封该刊。卢格没有被吓倒，他转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03页。

移到气氛比较缓和的萨克森活动。1841年，该刊以一个更加普通的名称《德国年鉴》在德累斯顿重新出版，威望更高，激进派的倾向也更加鲜明。1841年秋，巴枯宁陪瓦瓦娜和保罗游览德累斯顿时，第一次与卢格见面。他发现卢格是个“有趣的、值得注意的人物”，然而他拒绝“任何哪怕带有最轻微的神秘主义痕迹的事物”，对“同宗教、艺术和哲学有关的所有事物表现了极大的片面性”。巴枯宁仍是个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卢格的唯物主义观点对他触动不大。但是，他认为卢格可以帮助德国人摆脱他们对“腐朽的、一成不变的中庸之道”的沾沾自喜的满足<sup>①</sup>。

\* \* \*

巴枯宁独自一人在柏林度过的1841—1842年的冬天似乎是他转变的决定性时期。他贪婪地阅读大量青年黑格尔派的小册子和论文，他们当着检查官的面公开在德国大量发行这些书刊。据他自己说，他甚至写了（或者他告诉卢格曾经写过）一本匿名小册子，但迄今无法考证<sup>②</sup>。到1842年夏，巴枯宁再次在德累斯顿落脚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青年黑格尔派了。卢格发现他“胜过柏林所有的老顽固派”。他低声哼着迈耶比尔的新歌剧《胡格诺》中的流行曲调<sup>③</sup>，仿照一个起义领导人的名字给卢格起了一个绰号“高利尼爸爸”。他要向世界宣布他转向革命事业。卢格的刊物由他掌握。10月，《德国年鉴》发表了《德国的反动：一个法国人的笔记》一文，署名：“茹尔·艾利萨”。

巴枯宁在这篇文章中宣称，实现自由是时代的紧迫问题，这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65—66页。

② 这个时期有一本题为《谢林与启示》的抨击谢林的匿名小册子，以前被认为是巴枯宁所作。但现在已断定是恩格斯的作品。

③ 贾科莫·迈耶比尔（1791—1864），音乐家，欧洲歌剧音乐的著名代表。——译注

个问题构成了反动与民主的根本对立。当代历史是受黑格尔的肯定（现存秩序）与否定（革命）的对立学说支配的。民主作为一种理想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步。“民主本身并不在大量的肯定中表明自己的主张，而仅仅表现为对肯定的否定。”当民主战胜了反动的时候，那时，并且只有在那时，它才不仅仅是否定，“将出现一个质的转变，一个新的、活生生的、鼓舞人的启示，一个新的天地，一个年轻的、强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目前我们所有的不协调将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在这一点达到以前，反动与民主处在势不两立的斗争中。对于相信肯定和否定之间有可能妥协的人，巴枯宁轻蔑地叫他去看看黑格尔的著作，以驳斥他的谬论。妥协与巴枯宁的性格毫不相干；妥协派（或“稳健派”）受到比反动派（或“实证派”）远为尖刻的攻击。“左派说，‘ $2 + 2 = 4$ ’；右派说‘ $2 + 2 = 6$ ’；公正的中间派说‘ $2 + 2 = 5$ ’。”反动派开始被认为是一种不合时代的人。妥协派是这样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这个时代已经感到现存秩序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这篇著名文章的结尾写道〕所有民族乃至全人类都有种种不祥的预感。每一个器官尚未麻痹的人惶恐不安地期待决定命运的未来的到来。甚至在俄国，在我们的很少被了解的、无边无际的、白雪茫茫的帝国里，也许前面有着伟大的未来，风暴的乌云正在聚集！空气闷热，将有一场猛烈的风暴！

因此我号召我们受蒙蔽的兄弟们，忏悔吧，忏悔吧！上帝的王国将要降临了。

让我们相信永恒精神吧，这种精神之所以在进行破坏和消灭，仅仅因为它是一切生活的无穷无尽的和永远创造的源泉。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sup>①</sup>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26—148，183页；

《德国的反动》堪称杰作，它用通俗的语言把尊敬的黑格尔变成革命的哲学家。这是一篇出自巴枯宁手笔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严密的作品。它使巴枯宁在进步人士中赢得了全欧的声望。没有人相信文章的作者是法国人茹尔·艾利萨；文章的真正作者很快就传开了。消息传到莫斯科，赫尔岑在日记中写道：“他洗掉了过去的罪过，——我完全同他和好了。”消息传给别林斯基，他总是很宽容，指出“米哈伊尔与他寻找上帝的道路不同，但最后相会在同一个天堂里。”他给巴枯宁写了一封热情的信，把他们以前的争吵一笔勾销。波特金也是如此。事实上，文章可以说是以丑恶而可耻的内容赢得了名声。巴枯宁不能设想他写的东西能对俄国当局长期保密；卢格也不能设想，这样一篇煽动性的文章会不引起萨克森检查机关的注意。他两人有理由认为他们在德累斯顿的处境是不安全的、靠不住的<sup>②</sup>。

这对巴枯宁的关系不大，对卢格却很要紧。巴枯宁对他的行动总是不计后果，他对德累斯顿和德国已经有点厌烦了。《德国的反动》一文不仅是他的黑格尔信仰时期的顶峰，也是他向黑格尔的诀别。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德国哲学七年来支配了他的思想。寻找新的牧场的时刻已经到来。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为宣布自己纲领的文章选择了一个法国笔名，而不是德国笔名。一年前，他偶然看到了拉梅耐<sup>③</sup>的《人民政治》，在书中发现了一种新的令人振奋的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它把整个德国的思辨哲学体系当作似乎从来就存在的东西。大约在《德国的反动》一文发表

---

第4卷第103页；《卢格通信集》，第1卷第273页。

②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3卷第96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2卷第317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48页。

③ 费里西德·拉梅耐（1782—1854），法国神父，政治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译注



时，一位名叫施泰因<sup>①</sup>的德国教授写了一本题为《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它第一次向德国人介绍了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和比埃尔·勒鲁的理论。在巴枯宁看来，这些法国著作家们的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方案同德国思辨哲学体系的抽象性相比，似乎很实际、很具体。甚至费尔巴哈本人也是“不现实的”、“纯理性的”；那些其他的德国哲学家连同他们“理论上的救世处方”，也不过是“滑稽剧”而已。新黑格尔派的激进主义是理论，法国的社会主义是实际。哲学只能否定过去，未来属于实干家。巴枯宁一旦这样把这个选择公式化，那对他的这个选择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sup>②</sup>。

\* \* \*

在德累斯顿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人物决定了巴枯宁的选择。1841年在瑞士出版了一本诗集，书名叫《一个活着的人的诗篇》。这本诗集在说德语的国家非常流行，不到两年，发行了六版。这些热情地呼吁政治自由的诗篇是一个名叫格奥尔格·海尔维格<sup>③</sup>的青年人的作品，它是十年来缓慢地赢得阵地的“青年德意志”运动的集中表现。“青年德意志运动”提出把法兰西的进步思想（在那里革命的传统还存在着）当作迟钝的、死气沉沉的、充满市侩气的日耳曼人的模范。白尔尼和海涅<sup>④</sup>是这个运动的两

---

① 罗伦兹·施泰因（1815—1890），德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译注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62—64，154，175—176页，第4卷第103页。

③ 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17—1875），著名的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译注

④ 卡尔·路德维希·白尔尼（1786—1837），德国政治家和文学家，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亨利希·海涅（1797—1856），德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译注

个最著名的代表，他们都是犹太人，流亡在巴黎。“青年德意志”运动既攻击浪漫主义的伤感空谈（虽然有时它也模仿他们），也攻击学术界的形而上学的诡秘。“青年德意志”运动的作家和诗人本身不是活动家，但在理论上他们宣扬行动高于感情和思想。在这两方面，海尔维格是运动的典型代表。

在发表《德国的反动》到保罗和屠格涅夫去俄国之间的短时期中，正值1842年10月海尔维格在德累斯顿的访问。海尔维格在德意志各邦的旅行是一次胜利的进军，受到了所有善良的民主主义者的尊敬。他在德累斯顿同民主主义者相聚了一周，同巴枯宁和屠格涅夫住在一起。这是一次幸福的会见。海尔维格似乎很适合填补由于屠格涅夫的离去随即在巴枯宁心中留下的空虚。屠格涅夫是贵族，海尔维格是旅店老板的儿子，但在外表上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这两个人都是美男子（当时有人说，海尔维格有“一双在他所见到过的人中最好看的眼睛”），并且才华出众。在性格上，他们两人都十分自负和放纵，厌恶职业、不负责任。对于他们来说，理想的朋友是这样一种人：即钦慕他们，为他们领路，并把他们的命运安置在舒适的轨道上。同海尔维格相比，米哈伊尔·巴枯宁感到象一个“俄国的乡巴佬”，他再次被保护弱者的诱惑力所驱使。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象海尔维格这样“体质柔弱”的人。这种诱惑力正是严肃的、乏味的、爱讲理论的卢格所缺乏的<sup>①</sup>。

由于巴枯宁发现海尔维格的观点同他自己的观点十分合拍，因此对他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海尔维格讥笑理论家和感伤主义者，自称是实干家。巴枯宁以新信仰的皈依者的全部热情也称自己是实干家。两三年以来，海尔维格一直指责德国政治上落后，并从

---

<sup>①</sup> 《海尔维格通信集》，第24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83—184页。

法国寻找出路。两三个月来，巴枯宁的思想也转到了这条相同的道路上。海尔维格再次把他介绍给乔治·桑<sup>①</sup>，后者的为人使巴枯宁懂得了新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意义；他们长时间地讨论她的最后一本名作《康素爱萝》。海尔维格在德累斯顿逗留一周期间，他们发誓要建立友谊并进行合作。这种合作既有其事业的一面，也有其浪漫的一面。海尔维格新近担任在瑞士出版的一家德文激进刊物《德国信使》的编辑，“茹尔·艾利萨”自然成了受欢迎的撰稿人<sup>②</sup>。

海尔维格于1842年11月2日离开德累斯顿，在普鲁士境内度过了活动频繁的八周，用十天时间同一个富有的犹太丝绸商的女儿订了婚。一周以后，即11月9日，他受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召见。威廉四世以一种执拗的激动的口气向这位民主派诗人保证，他喜欢“正直的反对派”。这个奇特的姿态的主要动机也许是出于好奇心，但这并不妨碍数天后颁布禁止《德国信使》在普鲁士发行的命令。海尔维格以为自己如同迅速地征服了他的新娘一样征服了国王，向弗里德里希-威廉递交了一封抗议信。或者是出于偶然的机会，或者是故意这样做，他听任这封信刊登在报刊上。由于这种轻率行事的结果，他接到了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普鲁士的通知。12月29日，海尔维格离开柏林。萨克森当局不允许他在莱比锡逗留，他径直去瑞士<sup>③</sup>。

巴枯宁突然地、意外地决定在海尔维格的隐居地同他合作。恶名远扬的《德国的反动》已使他忧虑重重，现在他同海尔维格的合作进一步连累了自己。他开始担心萨克森当局会逮捕他，并

---

① 乔治·桑（1804—1876），著名法国女作家，浪漫主义的民主派。——译注

② 《卢格通信集》，第1卷第284页；《海尔维格通信集》，第272页。

③ 《海尔维格通信集》，第25—37页。

把他引渡给俄国。正如他后来承认的，这是过早的担心。对于他来说，不需要象“小鸡见到老鹰”一样地逃走。如果说惊慌不安是他逃走的唯一动机，巴枯宁这次过分谨慎的行动在一生中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是还有一些其它原因。巴枯宁完全被他的新朋友迷住了。鉴于海尔维格最近的一些冒险活动，他的光辉形象更加闪闪发光。同海尔维格的分离使他难以忍受。巴枯宁后来在《忏悔书》中写道：如果海尔维格去美国，他将会跟他一起去。还有一个更为卑劣的考虑也是不能忘记的。当巴枯宁迁往德累斯顿时，他在柏林欠了一笔债务。现在他在德累斯顿时欠的债款，包括从卢格那里借的，实际总共超过二千塔勒。迄今为止，他一直用可望从他的双亲或者从屠格涅夫那里得到接济来搪塞他的债主。但是情况变得更加难堪了，他又向卢格借了二百五十塔勒。1843年1月初，他赶紧去找海尔维格<sup>①</sup>。

在德累斯顿时，也许只有两个人对巴枯宁的离去真诚地感到伤心。早在几个月前，在保罗和屠格涅夫离开前，他就认识了国立艺术学院一位年轻的音乐教师阿道夫·赖歇尔，他有一个妹妹叫玛蒂尔达。巴枯宁的为人给兄妹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去他们家听赖歇尔演奏他最喜爱的贝多芬乐曲；赖歇尔不在，就同玛蒂尔达聊天。对于玛蒂尔达来说，这些随便的聊天是“灵魂的第二次洗礼”。然而，尽管这些交谈在她看来并不太长，她仍注意到巴枯宁总是匆匆离去。不久就清楚了，命中再一次注定他激起的是一种他不能回报的热恋。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写信告诉他的弟弟阿列克斯，他“试图陷入爱情之中，但没有成功。”他写信给保罗说，他“至今没有见到过她，并且也许永远不会见到她。”可怜的玛蒂尔达没有什么指望了。但是，后来她虽然结婚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2—173，209页，第4卷第104—105页；《卢格书信集》，第1卷第307—308页。

了，但还忠实地惦记着巴枯宁，给他写了些带有虔敬情调的信，七年后还试图到狱中去探望他。毫不关心政治的文质彬彬的音乐家阿道夫·赖歇尔三十多年中一直是巴枯宁最忠实、最坚定的朋友<sup>①</sup>。

巴枯宁同海尔维格在卡尔斯鲁厄会合。1843年1月6日，他们到达斯特拉斯堡——巴枯宁在法国境内的第一站。几天后，他们抵达苏黎世<sup>②</sup>。

---

①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388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07，164页。

② 《海尔维格通信集》，第104，113页；《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2—173页（该书第461页注错了一个日期）。

## 第十章

### 逗留瑞士

当巴枯宁估量形势、到处寻找他要征服的新世界时，曾踌躇了一阵。两年半以前，他第一次到达柏林时感到过的胆怯心情在苏黎世再次出现了。柏林和德累斯顿以西的一切他都感到陌生，除了海尔维格谁也不认识。海尔维格不是政治领袖也不是组织家，当时他正在为张罗他豪华的婚礼而操心。巴枯宁单独住在苏黎世城外的一间面朝雪山、隔湖相对的房子里。他陶醉在迄今为止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瑞士的美丽风光中，他同海尔维格在湖里划船，他们“想象着，谈笑着，有时一起伤心”；他带有某种对弱者的保护性的恩赐的姿态爱他的这位同伙，“就象哥哥爱妹妹”一样。2月初，他爬上韦特利贝尔格山，发现雪莲盛开，“紫色的小花闻起来象风信子”。他把三朵花压平，装入信中寄回普列姆希诺庄。哲学被抛在了脑后，政治也暂且放下了。

〔他写信给保罗说〕我时常几个小时躺在长沙发上凝视湖面和山峰（它们在落日的余辉中显得尤其美丽）；观看这美丽景色中的最微小的一个接一个不停的变化。我觉得，想起这一切，我感到时而悲哀，时而兴奋，时而欢乐；在我面前的一切都掩藏在薄雾中。

在这种田园诗般的环境中，他一连几小时贪婪地阅读乔治·桑的小说。乔治·桑使他坚定了他的新的信念：法国思想较之德

国思想无比先进。同“伟大的、使徒般的人物”迪德娃恩特夫人<sup>①</sup>相比，他曾经钦佩过的蓓蒂娜的夸夸其谈是何等的渺小和做作！蓓蒂娜属于德国抽象的理论界的人物。乔治·桑具有法国的“实际的、生动的、真正的、朴实的”天才。她是人类的预言家。巴枯宁每次读她的作品，就感到自己变得更高尚了，他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明确。”<sup>②</sup>

自1839年那次民主派起义失败以来，苏黎世州一直在稳固的、保守的政府的统治下，不愿庇护从普鲁士和萨克森驱逐来的革命诗人。大约在2月中旬，海尔维格收到了离开苏黎世的通知。他到巴塞尔州避难，该州授予他公民权。1843年3月8日，他与恩玛·齐格蒙德在时髦的巴登小温泉举行了婚礼。巴枯宁兴致勃勃地充当婚礼的男傣相和司仪，扶着新娘从马车里走出来，进入教堂时喊道：“别了，小姐！”领着新娘出来时，又喊道：“您好，夫人！”整个说来，巴枯宁似乎从海尔维格的婚姻中得到了意外的感情上的满足。他的信中充满着对新娘的有点过分的夸奖。但是随着这对新婚夫妇去意大利而发生的一些事情，结束了创办《德国信使》的梦想。已经收集好的海尔维格及其朋友的诗文发表在一本篇幅不大的集子中，其中没有收入心灰意懒的巴枯宁的稿子<sup>③</sup>。

也是在这个春天，巴枯宁自己经历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希奇古怪的感情上的波折。在德累斯顿，他遇到了一个名叫佩斯卡迪尼的意大利歌唱家和他的妻子约翰娜，后者是个波罗的海地区的俄国人。巴枯宁向佩斯卡迪尼借钱，甚至“恳求他照应他的财

---

① 乔治·桑的本名叫奥罗尔·杜班·迪德娃恩特。——译注。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9—184，186页。

③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96页；《海尔维格通信集》，第40，222页。

务”。佩斯卡迪尼夫妇家境富裕，他们在尼翁附近的日内瓦湖畔买了一份房产，夏季期间巴枯宁打算在那里和他们一起住。他们第一次会见是在比尔湖的圣彼得岛上，那儿是用来纪念卢梭的，因为卢梭于1765年曾在那里住过两个月。1843年4月底，巴枯宁同佩斯卡迪尼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一起过了十天。在他的寂寞的生活中，这倒是一个有趣的插曲。

〔他写信给保罗说〕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地方，多么可爱的人。暂时把一切忧虑抛开，我象孩子一样快乐，散步、唱歌、爬山，欣赏大自然，翻译谢林的著作，阅读意大利文，尽情地想象，做着白日梦。

他在做约翰娜的白日梦。在德累斯顿，他认为佩斯卡迪尼具有“善良的、慷慨的意大利人的性格，十分热情、聪明，富有艺术性。”但是与情操高尚的约翰娜的交往使他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觉得佩斯卡迪尼的“意大利人性格”似乎不配有这样一个完美的妻子。巴枯宁开始把自己看作是命中注定把约翰娜从“可怕的卑鄙的婚姻奴役”中解救出来的游侠骑士。他对这个角色十分熟悉，充当这个角色也很适宜。巴枯宁再次成为妇女的良知的指导者，再次成为妇女解放和家庭叛变的倡导者。这是“瓦瓦娜的解放”在更加浪漫的背景下的翻版<sup>①</sup>。

\* \* \*

但是骑士的传奇并不能使巴枯宁逃避现实。从圣彼得岛回到苏黎世就好象是从崇高的境地跌入污秽的泥塘。金钱驱逐了感情。读者务必事先作这样的假设：巴枯宁总是负债累累，他的财务是笔糊涂帐。本传记的作者与巴枯宁本人一样，解不开他的一团乱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83，199，204，209，218，245页。



麻般的债务之迷。就一方面来说，他的资产负债表的本身的确是十分简单的，贷方总是一个空白。他把自己的债务分成两类：一类使他有吃官司的危险，一类会使他丧失信誉。其它的债务他就不管了，干脆把它们忘掉。实际上，只有在异乎寻常的紧急关头，他才考虑一下债主。1843年5月初，在他回到苏黎世时就遇到过一次。

自从他逃出德累斯顿以来，他的经济情况变得更加恶化了。他在苏黎世安身时总共才有两法郎。正如他对海尔维格所解释的，为了能完全摆脱世俗的牵挂，他把这两法郎给了一个乞丐。还在去圣彼得岛以前，卢格从德累斯顿写给他的信的口气就变得不耐烦和不自在了。作为一个债权人，卢格远不能与屠格涅夫相比。卢格不是一个富人（在巴枯宁离开的几天内，《德国年鉴》被查封，使他失去了一笔即便不多，但却是定期的收入），他期望把他自己的借款收回。卢格不是俄国人，他对巴枯宁在德累斯顿的商业借款有一个书生气十足的看法，因为债务人已经轻松地要他清理这笔债款。总计应付二千塔勒以上。3月，巴枯宁冒险向彼得堡的屠格涅夫的银行经营者开了一张二千五百塔勒的支票，并把支票寄给卢格，向卢格说明所余款子从他目前的需要来说，迟早有用。他声称，俄国书信检查制度的干涉是他的家庭不顾他多次请求一直不予理会的原因。毫无疑问，屠格涅夫将支付这笔钱，而且由他的父亲来付。如果一切办法都失败了，他“有健壮的体格和坚强的意志”，不至沦为乞丐。

〔最后，他坦率地写道〕我真心诚意地承认，我一直是个不安分的人。但是我认为现在我已经克服了。现在我才意识到经济是我个人尊严的根本条件<sup>①</sup>。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56，196—198页；瓦格纳：《我的一生》，第466页。

这些话在圣彼得岛的欣喜若狂的气氛中很快被忘记了。可是在5月初，卢格仍然吵着要他还帐；在巴枯宁返回苏黎世的途中另一封不愉快的信正等着他，这封信通知他，向屠格涅夫支取的汇票没有兑现。巴枯宁找不到别的经济来源，只得给普列姆希诺庄写一封打动人的长信。为了表明此信十分紧急，信封上写着“保罗或尼古拉收，如果他们不在，就转给我的妹妹收”。信中夹有一张他的欠帐单，总计约一万卢布。其中三分之二要求立即偿还，大概属于“吃官司”和“丧失信誉”两类中的一种。米哈伊尔恳求父亲变卖属于他的一份家产和他的姑母抵押掉她的土地，从屠格涅夫或耶泽科夫夫人那里借些钱。要把他从破产中解救出来，就得采用某种孤注一掷的措施。如果付清了他的债务，使他能维持“一、两年”的生活的话，他将永远不会再向他们要一文钱。他将把三个月期限的票据给他的债权人，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不能拿到钱，他将高兴地进监狱，他深信自己已尽了最大的努力<sup>①</sup>。

普列姆希诺庄收到这些告急信时惊恐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此事没有留下什么记载。然而，米哈伊尔“揭不开锅”的想法打动了软心肠的娜塔丽·贝叶尔，连忙写信告诫她的朋友：

把事情的全部真相告诉你的父母，告诉他们，终有一天他们也许会花掉全部财产来挽救他们的儿子。当得知由于他们自己的过失而失去了儿子，也许会导致他死去，那就太晚了。到那时，他们还能保持沉默吗？还能用他的金钱来安慰自己的懊恼和可怕的消息吗？

这是一个特别倒霉的时刻。巴枯宁家里也正缺钱用，屠格涅夫和掌管经济的母亲关系不好。塔蒂安娜出于自尊心不敢想象米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05—211页。

哈伊尔的生活是靠屠格涅夫的开支来维持的。她不顾这种自尊心，亲自写信给屠格涅夫恳求他偿付欠卢格的二千塔勒。屠格涅夫已经直接收到卢格的相同的要求，但是颇有难色。对他来说，为他所爱的人花钱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但他讨厌一个负情的女子向他要钱。他自己寄给米哈伊尔一千卢布；过了一段时间，又寄去一千二百卢布。但他给不幸的塔蒂安娜写了一封十分尖刻的信，以致刺伤了她的心；这件令人不快的金钱上的纠葛最终地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开始十分纯洁，而且带有传奇的色彩。亚历山大·巴枯宁拿出一万八千卢布把他的长子从耻辱的境地救了出来。后来巴枯宁是否又收到钱，如果收到的话，是谁给的，这些都没有记载。然而，危机暂时过去了。卢格不再闹了，欠债人没有进监狱，并再次自由地献身于更加重要的事业<sup>①</sup>。

\* \* \*

无论是感情还是财务问题都不能长期地成为巴枯宁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他的思想已转到政治活动上。他主要是通过海尔维格结识了许多瑞士重要的激进派人士，其中有二十年前从普鲁士驱逐出境的奥古斯都·福伦<sup>②</sup>， he 现在是苏黎世激进派的领导人；还有一个最近到此地的流亡者尤利乌斯·弗吕贝尔<sup>③</sup>，他出版瑞士最重要的民主主义报纸《瑞士共和主义者》。福伦同情巴枯宁在经济上的困境，建议他写一本关于俄国的书。但是巴枯宁终身对靠写作谋生这种不体面的行为怀有一种贵族式的厌恶。这时他

---

①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224，242—243，248，26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04页。

② 奥古斯特·阿道夫·路德维希·福伦（1794—1855），德国政论家和诗人，曾参加反政府的学生运动。1821年起流亡瑞士。——译注

③ 尤利乌斯·弗吕贝尔（1805—1893），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译注

还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他将很快抛弃），即反对在出版物上攻击俄国的制度。除了《瑞士共和主义者》上一篇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估计是他写的外，他在瑞士期间没有发表过什么。这个时期中，他交往不多的朋友中有一个纳沙特尔的自然史教授阿加西斯<sup>①</sup>，此人很快移居美国。在伯尔尼，他会见了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自然科学教授福格特<sup>②</sup>。福格特夫人路易莎是福伦的姐姐，她对这个无家可归的、迷人的俄国青年象母亲一样的体贴关心。他们有四个儿子，长子卡尔由于他在1848年革命中的活动和他后来同马克思的争论而在历史上出名<sup>③</sup>。三儿子阿道夫当时还是个孩子，是巴枯宁晚年最忠实的朋友。幼子古斯达夫在六十年代末与巴枯宁作对<sup>④</sup>。阿道夫·赖歇尔和福格特一家是巴枯宁所有朋友中最坚定、最持久的朋友<sup>⑤</sup>。

然而，巴枯宁旅居瑞士期间遇见了一个最重要的人，此人同他一样不是瑞士本地人，在世界上到处飘泊。1843年初，巴枯宁到达苏黎世时，他所得到的第一批书中，有一本薄薄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作者是威廉·魏特林，此书于去年12月在韦维出版。给他的印象是，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他评论说，作者

---

① 路易·让·鲁道夫·阿加西斯（1807—1873），瑞士自然科学家，反对达尔文主义，宣扬唯心主义的灾变论。——译注

② 菲利浦·弗里德里希·威廉·福格特（1786—1861），德国医生，教授，自由派人士。——译注

③ 卡尔·福格特（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五十年代末为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攻击马克思及其战友。——译注

④ 古斯达夫·福格特（1829—1901），瑞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⑤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4—175，193—194，222—231页。

第一次使用一个当时仍很新奇的字眼，“想无产者所想”。给卢格的信中，他引了该书中的一段名言：

完美的社会没有政府，只有管理；没有法律，只有契约；没有刑罚，只有教育。

这段名言对米哈伊尔思想的影响是强烈的、持久的。这里包含有二十多年后他自己精心制订的无政府主义纲领的主要论点的萌芽<sup>①</sup>。

威廉·魏特林是一个法国军官与马格德堡一个德国姑娘的私生子，这个法国军官是1806年拿破仑战役后驻扎在那里的。魏特林学会了裁缝的手艺，他所受到的其它教育都是他自己坚持和专心自学的结果。长大成人后，为了逃避兵役，他背上包裹离开了家，闯荡在上。流浪了几年后，1835年他到了巴黎，在那里，他研究社会主义学说，进行革命宣传。1839年起义后，他同布朗基的其他外国同伙一起被逐出法国。他在瑞士避难，过了四年流浪生活，建立手工业者的秘密团体，亲自印刷书籍、报刊和印刷品，宣扬他的未来的乌托邦和通过社会大变动就可以达到目的的幻想。

1843年5月，魏特林带着海尔维格的一封信来找此时在苏黎世的巴枯宁。巴枯宁热情地欢迎《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的作者。巴枯宁认为他机敏、聪颖、精力旺盛，“充满着狂热，无比的骄傲和对未来解放大多数被奴役者的信心”。至此，在巴枯宁的生活中，革命成了主要的题目，而这个题目不过是知识分子抽烟饮茶时的话题。无法想象，有什么东西会激起卢格投笔从戎；虽然海尔维格摆出一副活动家的姿态，但从根本上说，他对以作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6—177页。

诗来反对暴政比推翻暴政更感兴趣。对于魏特林来说，革命是表达个人强烈不满的更加实际的形式。他的最终理想是用当时法国社会主义所独有的半神秘的语言来表达的。但是，对于实现那些理想的手段，他不存在什么幻想，也没有什么迟疑。这个从马格德堡来的裁缝徒弟不受任何民族的、家庭的或社会地位的传统限制。他威胁每一个人，鼓吹用暴力推翻国家、没收财产。他好象是第一个提出“毫不留情地枪杀共产主义的所有敌人”。巴枯宁在这种灵魂高尚的理想主义和粗暴活动的混合物中找到了某种同他性格相投的东西。同魏特林的会见是他一生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实现了从一个纯理论的哲学家到实践的革命家的转变。这位俄国的贵族成了国际无产者的仆人。从此以后，用暴力推翻社会和政治秩序成为米哈伊尔·巴枯宁生涯中首要的和公开的目标<sup>①</sup>。

在魏特林的鼓动活动中巴枯宁与之合作的程度，或者是否参加了他的“手工业者”的团体，仍不清楚。无论如何，他们之间的合作是短暂的。魏特林刚把他的新书《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送给印刷者。书中把耶稣描写成第一个造反者和共产主义者，是“可怜的姑娘玛丽娅的私生子”，实际上，这不过是魏特林本人的原型。苏黎世当局听到了一点风声，决定利用一次同时发生的触犯政治的和宗教的正统秩序的事件。于是印刷所被搜查，书的校样被没收，魏特林被逮捕并判处六个月监禁，最后被驱逐出瑞士。他的书信文稿被送到一个由保守派法学家布伦奇里主持的委员会，他受命对这一新的、邪恶的共产主义瘟疫提出一项报告。

这些事件对巴枯宁的命运有重大的影响。他的名字出现在魏特林的文稿上，在布伦奇里的报告（已发表）上提到他是魏特林的同谋之一。瑞士当局没有对他采取行动，但是嗅觉灵敏的俄国驻伯尔尼公使馆就这个贵族家庭出身的俄国青年同共产主义者混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06页。

在一起一事向彼得堡作了详细的汇报。当局给予适当的干预。1843年11月，亚历山大·巴枯宁在普列姆希诺庄收到一份通知，要求他不要再给儿子米哈伊尔金钱上的资助，并且立即叫他回国。老人用非常谦卑的口吻答复说，他不赞成儿子的活动，从5月份以来已不再寄钱给他了，但他无法强使他回国。

然而，巴枯宁对此事一无所知，他在尼翁同佩斯卡迪尼一家一起度过了夏末和秋天。从那以后，他搬到伯尔尼，赖歇尔从德累斯顿到那里同他见面。他在伯尔尼高兴地欢度1844年元旦；2月6日，他被召到俄国公使馆，接到一张回国的官方传令。巴枯宁深知俄国政府权力所及之远。他装出了一副顺从的样子，第二天就离开了伯尔尼。然而，他的目的地不是俄国。他在巴登呆了几天，等他的从苏黎世寄来的行李。然后在赖歇尔的陪伴下，他离开瑞士去布鲁塞尔。

在彼得堡，对抗拒传讯的罪犯提出缺席起诉。诉讼按缓慢的常规进行。1844年12月，沙皇签署了一项秘密法令，褫夺“前陆军准尉米哈伊尔·巴枯宁”的贵族称号，无限期地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并宣布其财产由国家没收。当他从德累斯顿逃走时，他给自己宣布的终身流放的判决就这样由官方批准了！。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32、448、458—460页；第4卷第110页。

## 第十一章

### 巴黎的生活

巴枯宁在布鲁塞尔居住的三个月期间，第一件事，也是唯一值得提及的事，是应一位俄国朋友、大概是亚历山德拉的旧友波特金的邀请，到巴黎盘桓过几天。19世纪四十年代巴枯宁首次赴法时，巴黎酷似十年以后的伦敦，是公认的欧洲大陆各地政治流亡者的收容所，也是先进思潮的荟萃之地。在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七月王朝统治下，1789年的传统还依然存在。各种民族、各家学派的激进分子——其中德国流亡者达八万多人——都在宣传他们的主张，预示资产阶级国家的垮台。热衷于革命理想和实践的人们或早或晚都汇集巴黎。此时巴黎已成为保守派的梦魇，激进派的麦加。而这正符合米·巴枯宁的气质。

巴枯宁1844年3月在巴黎逗留的日子是丰富多采而又引人注目的。他遇见了几个熟人。除了和亚历山德拉重修旧好的波特金外，还有巴枯宁在德累斯顿结识的格里哥里·托尔斯泰，他是个开明的俄国贵族。这类人出国旅行时，总爱表白他们开明的观点，但在国内则靠占有农奴的劳动，享受舒适的生活。还有在意大利过足了蜜月刚回来的海尔维格夫妇（恩玛从她父亲那里获得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他们得以在巴黎建立了一个十分讲究的家庭。最后还有从德累斯顿移居巴黎的卢格，他对巴枯宁在经济上不讲信用还耿耿于怀，并挖苦说，这位俄国朋友的“德语生疏得开口就错，竟然张不开嘴”。巴枯宁到巴黎时，卢格刚出版了第



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德法年鉴》。这是在《德国年鉴》停刊后由卢格命名并主办的刊物。它刊载了马克思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还刊登了巴枯宁一篇短文，那是头一年五月自圣彼得堡寄出的一封信（可能是为了发表而改动了日期），信中奉劝卢格不要对革命的前景悲观失望，并且指出法国是未来的希望。卢格志大才疏，在巴黎以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自居。3月23日举行了一次庄严的秘密会议，讨论“我们自己的事务”。巴枯宁、托尔斯泰和波特金代表俄国革命派参加。法国人当中有路易·勃朗、比埃尔·勒鲁和费里克斯·皮阿。德国人中有卢格和支持卢格的一个叫贝尔奈斯的新闻记者以及卡尔·马克思。巴枯宁在德累斯顿肯定已听卢格提起过马克思的名字。他现在第一次面对面地和后来的对手坐在一起了<sup>①</sup>。

几天以后，巴枯宁又匆匆返回布鲁塞尔重过那种单调的生活了。这时赖歇尔已在音乐学校找到了一个教师职位。巴枯宁在布鲁塞尔找到的情投意合者只是几个波兰流亡者，首领是老牌的民主主义者、史学家列列韦尔。不过，波兰另一次起义的前景还远得很。而比利时的首都对巴枯宁又毫无吸引力。他既然发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都市，就心满意足、别无他求了。1844年7月，他说服了驯顺的赖歇尔和他一起移居巴黎。以后三年半时间，他一直住在巴黎<sup>②</sup>。

在一群与《德法年鉴》有来往的德国流亡者中间，他找到了第一个安身之地。自从那个倒霉的事业失败后，大部分撰稿人包

---

①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555—556页；《卢格书信集》，第1卷第318，370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64，211—215，461页。

②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555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10—111页。

括马克思和卢格本人，都转向由贝尔奈斯和另一个犹太人伯恩施太因编辑的、志向不大的单页周刊《前进报》了。有一段时间，巴枯宁离开赖歇尔，和伯恩施太因的哥哥一起住在穆兰街。伯恩施太因的哥哥发现这个不循旧习的俄国贵族所有的家当只是一只皮箱、一张折叠床和一个镀锌面盆，不觉大吃一惊。如果巴枯宁真地为《前进报》撰稿，却没有查出哪些是他的稿子。他屈尊地称这家报纸为“一张废纸”。他又和赖歇尔住在勃艮第大街，一起学习英语和法语。和往常一样，巴枯宁肯定主要还是靠朋友施舍过活。他在《忏悔书》里说，他靠“翻译德文著作”为生，此时却看不到一点迹象。同时再也听不到人们传说的应诺：“当俄国人家庭教师，每课时挣十个或七个半法郎”<sup>①</sup>。

德国的激进分子很快就把这位俄国新伙伴介绍给法国同事。巴枯宁分别见到了四十年代在巴黎被认为具有先进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拜访了其中两位，拉梅耐和乔治·桑，这两个人的作品在当时几年内都使他很受感动。但乔治·桑太盛气凌人，拉梅耐又太脱离现实生活，因而都和巴枯宁合不来，关系都不亲近。3月，他在巴黎期间，曾见过比埃尔·勒鲁，这个人几年前和乔治·桑合作创办《独立评论》，但巴枯宁以后似乎再也未见过勒鲁。因此，他想成为该报撰稿人的愿望未能实现。他还拜访了写有著名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的老作家卡贝（卡贝本人不久就在美国建立了一个“伊加利亚”侨民区），还拜访了傅立叶主义者领袖孔西得朗。但是，尽管法国共产主义者初看起来比德国人更为进步，更为仁慈，而且自由自在、庄重威严，但他很快就确信，通过发表演讲、著书立说就能实现社会革命，或关在教授书斋里根据推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36—238页；第4卷第114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09—401页；斯切克洛夫著：《巴枯宁传》，第1卷第127页。

论就能建成人间天堂完全是虚假的幻想。这些乌托邦的梦想家具备了魏特林的所有缺点，而没有他的一条优点。巴枯宁从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新闻记者身上发现了更能吸引他的东西，如《立宪主义者报》的梅吕康、《国民报》的马拉斯特、《新闻报》的艾米尔·日拉丹，尤其是《改革报》的路易·勃朗、弗洛孔和卡芬雅克。但他只写过几篇文章，就结束了他在巴黎的新闻写作活动。这些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并未起重要作用。起初，他参加了一些法国工人组织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者会议，但他又担心这样做被法国当局发现而连累自己，并被驱逐出境，所以他很快就连这种形式的法国政治生活都不介入了。在这段时间内，法国的无产者和资产阶级的激进派一样，对他影响甚微<sup>①</sup>。

巴枯宁在巴黎生活时，发生过一件事，他在《忏悔书》里或别的文章里都未提过这件事，现在搞清楚了。1845年，他参加了巴黎东方社苏格兰分社，成为一名共济会员。共济会和先进的政治思想之间存在着长期建立同盟的传统。巴枯宁曾写道，“19世纪初期的俄国，共济会员的小团体秘密地保存着人道的神圣热情”。整个19世纪，法国大部分激进分子都是共济会员，所以巴枯宁和共济会有来往毫不奇怪。但这段时间和他经常住在一起的赖歇尔却不知道这件事。联想到此时和他来往的人都未提到过这件事，这个事实说明他对共济会并不十分热情。在他一生中，关于这一空白点从无详细证据<sup>②</sup>。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60、235页，第4卷第113页。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5页。在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所藏的巴枯宁个人档案里，有一张证书，也许就是斯柯泽维斯基1848年取得的那份证书（参见原文第165页），证书表明巴枯宁曾是巴黎东方社苏格兰分社成员，为期三年。赖歇尔告诉讷特劳（讷特劳博士给作者的私人信件）说，他不知道巴枯宁是共济会员。

\* \* \*

巴枯宁在巴黎的初期，和他接触的一帮德国和法国人当中，有两个突出人物，那就是卡尔·马克思和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这是因为一来他们本来就是重要人物，二来他们后来注定要在巴枯宁一生中起作用。

1844年下半年在巴黎时巴枯宁和马克思的关系密切到何等程度是很难弄清的。他们两人都是《前进报》圈子里的人物，都是海尔维格的朋友和崇拜者，都鄙视卢格，而且大约在此时公开和卢格发生过争论。两人都忙于谴责德国人的思想不切实际。他们都期待着“高卢雄鸡”<sup>①</sup>一声高唱，发出欧洲革命的信号。但是，不管他们的关系如何密切，马克思显然是主导的一方。马克思比巴枯宁年轻四岁，而其阅历和经验给人印象之深刻远远胜过巴枯宁。马克思曾任科伦《莱茵报》编辑一年，把该报办成德国最重要、最富战斗性的激进派报刊。他在哲学和政论文方面的名声业已确立。而且，他对政治经济学也已开始作深入的研究。多年以后，在他们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巴枯宁对他们在巴黎初次相会的日子里他的对手的渊博的学识表示敬佩，这算得是巴枯宁的海量了。他所遇到的人当中，像马克思这样博学多识的人实属罕见。

那时，我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我信仰社会主义纯粹出自本能。尽管他比我年轻，但他已是个无神论者、有素养的唯物主义者、自觉的社会主义者。

---

① “高卢雄鸡”，德国民主义诗人海涅在1831年出版的《加里多尔夫就贵族问题致穆·冯·莫里特加伯爵书》一书序言中说：“高卢的雄鸡如今再次啼叫，而德意志境内也已经破晓。”“高卢雄鸡”的叫声象征着法国革命。——译注

终有一天，巴枯宁本人也会成为这样的人。也许正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他在1844年秋季计划写一本论费尔巴哈的哲学的书（这项计划后来杳无音讯），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同样没有多大成就），并自称为“真诚的共产主义者”（有点骗人）。

尽管巴枯宁对马克思的才华心悦诚服，极为赞赏，但对他并无感情。在巴枯宁看来，马克思的性格总是多少与人疏远而又冷淡，马克思既严格、精细而又深思熟虑。他奉行的科学社会主义，显然是基于纯粹的思想认识。而巴枯宁却认为，只有带有感情色彩的东西，才是好东西。这个俄国贵族和那位犹太律师的儿子之间不仅性情不能融洽，而且传统和观点亦无任何共同背景。从一开始，彼此就既不理解，也无好感。

〔后来巴枯宁在写到在巴黎的那些日子时说〕我们常常见面，一来因为我非常钦佩他的学识，赞赏他献身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满腔热情，虽然他的献身精神总是掺杂着虚荣心；二来因为我渴望聆听他的谈论，只要谈话不出自恶意，那是很有教益而又富于风趣的，但遗憾的是他的言谈常常出自恶意。我们之间总是貌合神离，彼此的秉赋不允许我们真正亲密起来。他说我是感伤的唯心论者，他说对了。我说他乖戾难处、恃才傲物、奸诈不忠，我也说对了。

但是，这些根本分歧一时尚未充分暴露出来。1845年1月，《前进报》发表了几篇不恰当的直言不讳的文章，使得法国当局应普鲁士政府的请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于是马克思带着家小移居布鲁塞尔。正如巴枯宁在《忏悔书》里所说，这件事“使我如释重负”<sup>①</sup>。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对巴枯宁这一阶段思想的发展更加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37页，第4卷第111页。

趣味相投，也许有更加重要的影响。蒲鲁东和魏特林一样，都是自学而有成就的劳动者。但他不同于魏特林的是他过着一种典型的体面的资产阶级生活。尽管他的观点属于最激进之列，但他从未投身到积极推动革命的活动中去，他的大胆的创见来源于传统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既是法国社会主义的癖嗜，同时也是祸根。他一生中重要的第一步是1840年发表的一本名为《什么是财产》的小册子，其回答是一句名言：“财产就是盗窃”。随着对财产的否定而来的是对上帝的同样强烈的否定。他不把自己称为无神论者，而是称为反神论者。他认为上帝是罪恶的化身。他说：“如果没有上帝，就不会有财主”。并且他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政治机构。和魏特林一样，他不相信立宪民主。“我投票反对立宪政体”，他在1848年国民议会上宣称，“不是因为它包含我不赞成的东西，也不是因为它不包含我赞成的东西，我投票反对立宪政体就是因为它是立宪政体。”<sup>①</sup>这种彻底否定的特点和泼辣风格，使蒲鲁东而不是魏特林赢得了“无政府主义之父”的称号。

巴枯宁同马克思的关系纯粹是单方面的：马克思从巴枯宁身上一无所获。而巴枯宁和蒲鲁东之间的关系则较为复杂。蒲鲁东的观点和巴枯宁的一样，变幻无常。象巴枯宁那样，蒲鲁东更好否定而甚于肯定。蒲鲁东不懂德语，巴枯宁竭力效劳向他介绍黑格尔的著作，这些著作尚未译成法文。盛传有这样一件事：一天夜晚巴枯宁开始给他这位朋友详细讲述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意义。第二天拂晓，他们仍然围着已经熄灭的炭火余烬在继续谈论。1846年，蒲鲁东发表了一本名为《经济矛盾的体系》的著作，其中大体上描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是以奇怪的方式被歪曲了。为该书所选的题词是“破坏与建设”，这使人联想起巴枯宁的话：“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然而，尽管巴枯宁尽了

---

<sup>①</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5—359页。——译注

这么多实实在在的义务，但他后来总说他受惠于蒲鲁东，而不是蒲鲁东受惠于他。多年以后，他曾写道，蒲鲁东“在行动上和本能上都是个革命者，胜过空谈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百倍。”蒲鲁东把圣西门派和傅立叶派的多情善感的乐观主义和奇异的白日之梦吹得天花乱坠，并大胆地抨击现存制度的三大支柱：上帝、国家和私有财产。魏特林打出了第一拳。正是蒲鲁东，而不是别人把巴枯宁对权威本能的反抗转变成正式的无政府主义信条。这个信条二十多年以后终于最后形成。但他们相交二十年后，巴枯宁仍然称蒲鲁东是他的老师和前辈<sup>①</sup>。

然而，巴枯宁对巴黎的兴趣并非局限于政治或政治理论方面。他和卢格闹翻了，马克思也走了，这样一来他和在巴黎的德国政治人物的联系也就结束了。这时他经常往访的德国人只有海尔维格一家人。海尔维格本性懒惰，而又自我陶醉，现在又第一次名利双收，觉得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索然无味，而对巴黎的花花世界却更有兴趣。他成了社交界的风流人物，一个既有文才而又出身显贵的名叫达古的女伯爵做了他的情妇。卢格和其他正派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对他这种生活方式十分鄙弃，但也不无妒忌。可是巴枯宁对贵族并无偏见，他认为卢格反对海尔维格和有产阶级女伯爵的关系是传统之见。必要的话，米哈伊尔可以忍饥挨饿，但珍馐佳肴送上门来他也会欣然领受。多年以后，他忠实的赖歇尔还惋惜地回味他们在巴贝街海尔维格的公馆里度过的许多“妙不可言的夜晚”。巴枯宁甚至还不时地在达古女伯爵举行的名士麇集的招待会上露面，自己还辩解说，那是为了“不完全脱离法国人的虚情假意的俗套”<sup>②</sup>。

---

① 《巴枯宁文集》，第2卷第311—312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453页。

② 《卢格书信集》，第1卷第374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

然而这些新朋友并不能使巴枯宁完全心满意足。五年的漂泊生活并未使他断绝对家乡的怀念。

我不得已而亡命异国，那里人情冷漠，举目无亲，既无家庭的温暖，也无活动场所；既无职业，也无前程。我远离自己的故土，又轻率地堵死了还乡的道路。但我既未取得德国国籍，也未取得法国国籍。相反，我在国外呆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我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应该永远做一个俄国人。

这些话引自他给沙皇的《忏悔书》。谈到巴枯宁这段时间的感情，这些话不完全符合实际，但却准确地反映了他的某种心境。在这样沮丧的时刻，他也许真地闪现过这样一个念头：“纵身跳入塞纳河，结束不快而又无益的一生”<sup>③</sup>。

自从他未能应传讯回国以来，就一直不曾得到俄国官方的任何消息。但是，1845年1月，巴黎《论坛报》转载了俄国官方报刊关于判处流放和服苦役的判决书。同一判决书里还对另一名移居巴黎的伊万·戈洛文处以类似的判决，这是一个不孚众望的人物，巴枯宁后来说他是“头号恶棍”。伊万·戈洛文写了一封信，发表在《论坛报》上，抗议这种判决违反了“罗曼诺夫批准的俄国贵族宪章”。巴枯宁忍无可忍，便给激进派报纸《改革报》写了一封长信，大骂戈洛文和俄国政府，他嘲讽这样的观点：即俄国贵族居然享有什么违反沙皇的意志而又能生效的宪章权利。该信的中心内容是“俄国的法律不过是沙皇的意志罢了”。结论是“不幸的和受压迫的国家，如俄国和波兰”需要民主。他雄辩地

---

第2卷第37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69页。

③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14—115页。



## 谈论俄罗斯民族的品质及其命运：

尽管俄罗斯民族受到可怕的奴隶制度的摧残，尽管蒙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打击，但在其本性和习惯方面俄罗斯民族是酷爱民主的。它没有腐化堕落，只有不幸。其粗犷的天性，如此地充满活力，如此豪放，而又如此地富有诗意、热情和才智，只要你熟知他们，你就不得不坚信，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仍然要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尽管遭受政府的敌视，俄罗斯民族正在阔步前进。局部的但也是不可低估的农民反对统治者的起义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农民起义将会汇集起来形成一场伟大的革命，这也许为期不远了。假如政府不赶快实行民族解放，就会造成大量流血事件。

这封信刊登在1845年1月27日《改革报》上。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攻击俄国政府，宣扬俄国革命。在《忏悔书》里，他说这封信是他的“第二条罪状”。第一条罪状是拒绝回国。更重要的是，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宣称他在感情上相信俄国人民的民主本质，这种民主的本质在他尔后所奉行的主义里占有突出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信念不是来自现场的观察，而是来自脱离俄国人民达四年以上、在一个异国的首都所经历的怀念故国的感情<sup>①</sup>。

但是巴枯宁怀念俄国，主要还是怀念其故乡普列姆希诺庄。他的爱国主义并不是抽象的。他认为爱自己的家乡，就是热爱整个俄国。自1843年7月，当他的名字公开地和魏特林事件联系在一起以来，普列姆希诺庄就不和他通消息了。他在1844年秋季曾写道，他已经找到了和家庭秘密通信的办法。但是，如果他此时写信的话，他的信肯定不是被检查官截获，就是被收信人出于谨慎起见而毁掉，因为在普列姆希诺庄的档案里根本找不到这些信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34—243页；第4卷第112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41页。

件的踪影。然后，在1845年春季，连续有三封巴黎来信，第一封写给保罗，第二封写给保罗和塔蒂安娜，第三封写给塔蒂安娜。这些信都是托付可靠的回国的朋友亲自递交的。米哈伊尔还誊抄了一份给《改革报》的信，附在第三封信中，并恳求她打破两年来的沉默，他随时准备和父母以及除保罗和她本人以外的兄弟姐妹们断绝关系。但他也不能不难过地感到，他和塔蒂安娜的一贯亲密情谊“也和别的事情一样都受到时间和空间法则的约束”。他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试图重叙旧情。

但是，塔蒂安娜不可能也没有回信，米哈伊尔再也未写过信。他的回忆是他和年轻时代的家庭唯一的联系<sup>1</sup>。

许多来到巴黎的俄国人还时常给他带来故国的淡淡的情趣。他在巴黎的第一个冬天，有格里哥里·托尔斯泰作伴，巴枯宁“温暖了他那已经麻木的灵魂，恢复了精力和勇气，又变得年轻了”。稍晚些的人当中有奥格辽夫，他已被妻子抛弃，东游西荡、一无所获地寻求乐趣和安慰。除了在巴黎时巴枯宁去看过他以外，他们之间的来往就无案可稽了。但他们不记旧嫌，十七年之后再见时竟成了莫逆之交。还有替他带信回国给塔蒂安娜的梅尔格诺夫夫妇。他们是“大好人，是我忠实的朋友”。1845年春（如果米哈伊尔在给保罗的信中确实隐约提到过的话）约翰娜·佩斯卡迪尼显然是单独一个人呆在巴黎；而米哈伊尔则在继续进行使她获得解放的斗争，这种斗争早在圣彼得岛和莱芒湖畔就开始了。但是斗争的结局完全和瓦瓦娜悲剧的结局一模一样。约翰娜是个笃信宗教的女人。巴枯宁狂热地鼓动她反对婚姻的束缚，这和她对丈夫和子女的责任感发生了冲突，结果还是责任感取得了胜利。她爱巴枯宁，但她又回到了佩斯卡迪尼身边。巴枯宁后来写道，他离开她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她希望他离开，他就这样做

---

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43—257页。

了，他们从此再未见过面。使刚刚成人的巴枯宁动心的唯一的女人，似乎是约翰娜而不是他的姐妹们。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感情却表现为狂热地要求斗争和反抗<sup>[1]</sup>。

这个时期的另一件风流韵事是和人们所熟悉的巴枯宁另一种生活方式一致的，这就是他和贝叶尔姐妹以及玛蒂尔达·赖歇尔倒霉的调情。在巴黎的俄国流亡者当中，还有尼古拉·萨宗诺夫，他在莫斯科时，属于赫尔岑和奥格辽夫一派。此人禀性懒惰而又放纵。自流亡国外以后，他自然而然地就一头钻到不可胜数的流亡巴黎的俄国人交际界当中去了。正如巴枯宁所说，他“饮法国美酒，亲法国女人的嘴”。由于追求这些东西，他消磨了才智，尤其消耗了他大量的钱财。1846年秋，他因欠债被关入克利希监狱。他两个姐姐从俄国匆匆赶去搭救他。

她们来得太晚了，萨宗诺夫已经出狱。但她们发现他又被一个意大利情妇死死缠住了。她们无可奈何，就去向萨宗诺夫的朋友求救，其中就有巴枯宁。对于这个微妙的问题，要巴枯宁出个主意或者帮帮忙，似乎不大可能办到。姐姐玛丽娅本是一个叫波鲁丹斯基的孀妇，却很快地拜倒在这位美男子的脚下，因为她得和他讨论弟弟的困境。这种友谊大约维持了两年，她给巴枯宁写的信有几封保存了下来。巴枯宁欣然领受她的殷勤，当然也忍不住向她伸手借钱。但看不出巴枯宁对玛丽娅抱有被约翰娜·佩斯卡迪尼所煽起的那种爱情。然而，从外表上看，这两件艳事的结局却完全一样，究竟其中哪一件给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中有名的一章提供了素材不大清楚。人们认为这部小说的男主人脱胎于巴枯宁。小说写道：

---

[1]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14-245，256页；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556页。

在异国有个女士，是俄国人，缠住了他，他颇有才情，既不年轻也不漂亮。这倒也适合于有点才情的女人。有段时间，他跟她形影不离，到头来他抛弃了她——不，是她抛弃了他<sup>1)</sup>。

1847年，就是米哈伊尔在巴黎的最后一年，他又遇到了三个熟人。

那年春天，亚历山大·赫尔岑携带妻子和三个孩子到达巴黎，离开故土，永远流亡国外，——虽然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一点。不出一个星期，赫尔岑和巴枯宁就在一条大街的拐角处邂逅，当时赫尔岑和三个朋友边走边谈话，还打着手势，走几步就停下来，发表一个论点，就象十年前他在莫斯科的举止一模一样。巴枯宁自从和赫尔岑1840年夏天在彼得堡码头分别以来，外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在思想上却大有进展。自从离开俄国以后，巴枯宁不仅对黑格尔的理论进行了革命的剖析，而且远远超过了这一步。他在欧洲革命的首都有幸居住了三年，而这种荣幸对赫尔岑来说迄今还只能是向往而已。赫尔岑目前可能把巴枯宁看成是他刚开始走上的道路上的先驱。当他在巴枯宁的住处和蒲鲁东谈话时，当他在咖啡馆里与路易·勃朗见面时，他脑子里还在琢磨谈话和见面本身就是他政治进程的里程碑。

经过进一步的思考和体验，赫尔岑改变了这种天真的想法。他发现，巴枯宁由于长期旅居国外，已不了解俄国的现实。早在《德国年鉴》上发表的署名茹尔·埃利萨的那篇文章里，巴枯宁就已宣称，他认为俄国“乌云密布”。由于巴枯宁是个乐天派，赫尔岑没法使他相信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国，一点革命气息的影子也没有，也不可能。赫尔岑此时和俄国仍保持密切的联系，

---

1)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8卷第134—137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38—41页；屠格涅夫：《罗亭》。

不能同意巴枯宁关于俄国人民具有民主天性的那样不可理解的观点（虽然他在国外呆了几年以后，也同样抱有这种幻想）。他对所见到的巴枯宁、萨宗诺夫和其他朋友在巴黎的活动印象不深。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拥挤不堪的学生住处、长期的经济困难、缺乏长远打算、咖啡馆里通宵达旦的讨论（赫尔岑把这些讨论挖苦为“一半人光听不懂、另一半人不懂光谈”），所有这些已经成了巴枯宁的第二天性，而且就他的世界观来说，这些活动又和世界革命事业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赫尔岑的思想是有条不紊的，看不出他们的活动和世界革命事业有什么联系。巴枯宁和1847年的巴黎为赫尔岑固有的怀疑论提供了充足的材料<sup>①</sup>。

赫尔岑来巴黎几个星期以后，别林斯基也来了。他此行与赫尔岑一样，目的不是为了寻求政治上的启迪，而是为了治病。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西欧。他肺病已到晚期，在巴黎逗留的后期，住在帕西的一位医生家里。他和巴枯宁几乎不吵架了。他们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那些早先标志他们之间关系进程的强烈的怨恨和违背良心的和解。别林斯基也摆脱了黑格尔现实主义的迷惑，和巴枯宁一样，他从黑格尔转向法国社会主义者，但在性格上还存在着分歧而并未弥合。别林斯基仍温和地称巴枯宁为“我们的德国人”，“我信得过的朋友”。

〔别林斯基离开巴黎时写道〕他出生时和将来死的时候都是个神秘主义者、唯心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因为放弃哲学观点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本性。

巴枯宁盲目的乐观主义使得别林斯基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者。“不管我信得过的朋友巴枯宁怎么说”，暴政和非正义总会

---

<sup>①</sup>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3卷第289, 579—580, 582页。

得胜<sup>①</sup>。

巴枯宁遇到的第三个人是屠格涅夫，他在夏末到达巴黎之前刚去过德国和伦敦，他现在既不关心哲学也不关心政治。在柏林呆了一阵以后，他已经很快地而且最终地把巴枯宁忘记了。想起塔蒂安娜，他就更加不好意思去见巴枯宁，双方都不想恢复以前的亲密交往。自1844年以来，保琳·维亚多特已经牢牢地控制住顺从的屠格涅夫。他刚到巴黎不几天，就溜到维亚多特在库尔塔维内的别墅里去了，他在巴黎的朋友就再也见不到他了<sup>②</sup>。

别林斯基于9月离开巴黎返回俄国。这样他就和他一生做朋友的许多人——赫尔岑、屠格涅夫、巴枯宁等——永别了。他回国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10月赫尔岑举行告别宴会，宴请包括巴枯宁、海尔维格在内的所有朋友，然后携带家眷离开巴黎去意大利。两个月后，巴枯宁也离开了巴黎<sup>③</sup>。

---

①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3卷第249，265，328，338—339页。

② 《别林斯基书信集》，第3卷第258页。

③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68页。

## 第十二章

### 革命的前奏

在十九世纪的自由派看来，自由来源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它的含意不光指个人的自由，也指民族的自由。民族和个人一样，有“权”不受违背其意志的君主专制和外国人的统治。在梅特涅时代，民族主义原理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认为民族主义是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虽然在十九世纪末期，卡尔·马克思和俾斯麦（一个在理论上，一个在行动上）都清楚表明他们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直至二十世纪，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争取政治上的正义的同盟军这一观点，在世界上一直处于支配的地位。直到我们这一时代才最后被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打破了。

在整个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的自由派一直把波兰的事业当成这两条原理的范例。它既体现了民族主义的本质，也体现了民主主义的本质。自维也纳会议以来，波兰的压迫者就成了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统对手。法国和英国因为在欧洲没有统治隶属民族，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通过同情受人统治的波兰人来满足自由派的感情。各国的民主主义者都一致起来猛烈地谴责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专制统治。波兰蒙受的不公正待遇给这种谴责提供了再好不过的场所。有三个参与瓜分波兰的列强，波兰成了它们当中两个列强的阿基里斯之踵<sup>①</sup>。

---

① 阿基里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传说他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握住脚

在十九世纪民主主义者手中，波兰的事业成了国际正义的象征。

米哈伊尔·巴枯宁是十九世纪所有为自由而战的斗士中的极端派，他迟早势必要在对民主主义的崇拜上再加上对民族主义的崇拜。他的崇拜在波兰找到具体的对象，这是很自然的事，但这需要有个发展过程。巴枯宁年轻时，曾在波兰边境执行过任务，所以他心安理得地和官方一样，对沙皇的这些讨厌的、半外国臣民采取轻蔑的恩赐态度。后来，他也不和在柏林和德累斯顿的许多波兰流亡者来往，他甚至认为在布鲁塞尔的列列维尔也只是作为个人而存在，而不是波兰人。但列列维尔至少也会教导他，波兰是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历史，而不只是俄国一个难以治理的省。波兰和俄国一样，是受沙皇压迫的明显一例。这种观点在巴枯宁的思想里已经扎下了根。前一章引用的1845年1月给《改革报》的信里，巴枯宁认为俄国和波兰都是“不幸的受压迫的国家”。拯救它们的唯一办法是“民主主义”<sup>②</sup>。

由于波兰人对自己所蒙受的不公正待遇长期沉思冥想，所以对于外国人的评价几乎有一种病态的敏感，对于出自一个俄国人的那句表示同情的最随便的话，感到格外新奇。波兰流亡者中的贵族派的领袖亚当·查尔托雷斯基<sup>③</sup>公爵派遣一名侍从邀请巴枯宁到他家里作客，巴枯宁应邀前往，但感到没有什么意思，以后再也不去了。几个星期以后，他收到了一个波兰民主派的来信，

---

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除脚跟外，任何武器不能伤害他的身体，后被箭射中了他的脚跟而死。“阿基里斯之踵”意为可以致命的地方，最弱的一环。——译注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42页。

③ 亚当·查尔托雷斯基（1770—1861），波兰公爵，1830—1831年波兰起义时是临时政府首脑；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是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首领。——译注



这个人名叫斯托尔泽曼，住在伦敦的萨默斯镇。斯托尔泽曼对他说，他给《改革报》的信“证明他性格的坦率和诚实，思想的开明和进步”。这封信转载在波兰流亡者办的一个刊物上，并邀请他出席11月将在伦敦举行的纪念十二月党人起义殉难者大会。巴枯宁很客气地写了回信，但未赴伦敦。他拜访了流亡巴黎的波兰诗人亚当·米茨凯维奇，但是，年迈的米茨凯维奇却深深地受到了奇怪的、新出现的波兰浪漫主义的感染，这种浪漫主义就是救世主教义，认为波兰的痛苦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象征，波兰的复活就会预告人类解救。他要巴枯宁相信，由一个波兰人、一个捷克人、一个法国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俄国人组成的公社，和谐地生活和工作，世界就会得救。现在一切俱全，就缺俄国人。他希望巴枯宁来填补这一空缺。巴枯宁也婉言谢绝了这项邀请<sup>①</sup>。

巴枯宁对波兰人的愿望采取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很快就被发生在欧洲中部一角的事件打乱了。这个地方他以前并不知道。这就是名义上保持独立的克拉科夫共和国，是波兰的一小块领土。1846年2月波兰国旗又一次在这里升起来了，并宣布波兰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普鲁士发生的起义几乎不战而败，加里西亚发生了一场激战，农民奋起反抗地主，因而决定了起义的命运，秩序一经恢复，奥地利得到俄国和普鲁士的默许，不顾英、法使团提出的不痛不痒的外交上抗议，悄悄地吞并了克拉科夫自由共和国。

这些事件轰动了巴黎，因为那里有大量的波兰人以及他们的有影响的朋友。两三天里，起义的进程似乎使乐观主义者增添了勇气。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即将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一前景，使德国的激进主义者格外受到感动。巴枯宁受到激进派朋友的感染，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12—113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300—304页。

也很激动。欧洲实实在在的正在进行一场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行动上的革命，这在巴枯宁成年以来还是第一次。他情不自禁地被这场革命吸引住了。他天生酷爱革命，就象某些人喜欢大海和高山一样。但是，巴枯宁的激情还没有变成行动，起义即告失败。于是，他愤然命笔，给《立宪主义者报》写了一篇文章，保卫波兰，谴责沙皇的镇压，这是他在巴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报刊写稿。他写道，假如奥康奈尔在英国议会上宣称世界再也没有别的民族象爱尔兰这样受到虐待，那是因为他对俄国政府在波兰的野蛮行径一无所知<sup>①</sup>。

巴枯宁这次对波兰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大为愤慨，他不能再对波兰采取先前那种冷漠的态度了。他找到了总部设在凡尔赛的波兰民主主义者组织，表示要到波兰和边境省份，为促进反对沙皇的活动效劳，其政策的目标是发动一次俄国革命，建立一个自由的斯拉夫共和国联邦。这次谈话进行了好长时间，但他的请求和方案并不如他预料的那样会自然而然地受到热情接受。他发现波兰人“狭隘、无气量而又排外”。要波兰人相信一个俄国人是很困难的。甚至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其中大部分是小土地所有者，也不可能喜欢巴枯宁的方案。经济上的差别也使谈话不会和谐一致。巴枯宁可以给人以勇气、精力、出一大堆主意，但他从事的任何事业的经费却要有别的来源才行。但是，正如他在《忏悔书》里所写的那样，假如只是因为缺乏互相信任和实际合作，他对波兰事业的兴趣还是不会消失的。和他来往的人的名单中，出现了一个曾经领导1846年在普鲁士发生的起义的波兰将军梅洛斯拉夫斯基<sup>②</sup>的妹妹，还有和这次起义有关的其他波兰人。一个法国秘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57—261页，第1卷第117页。

② 路德维克·梅洛斯拉夫斯基（1814—1878），波兰政治和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1846年参加波兹南起义的准备工作。  
——译注

密警察在1847年2月的一份报告中说，巴枯宁“在其住所接见过不少波兰流亡者”。几个月以后，他本人在写信给路易莎·福格特的信中也说过：他“几乎完全和波兰人生活在一起，已经全心全意地投身俄一波运动”。不过，暂时尚无任何行动。给《立宪主义者报》写了那篇文章以后的十八个月中，他又不得已恢复了他以往的生活：研究、清谈、逛逛巴黎的咖啡馆<sup>①</sup>。

然而，决定巴枯宁的命运、使他在以后十六年内闻名于世、使他和波兰起义的联系处于显著地位的事件，马上就要发生了。1847年11月，赫尔岑赴意大利一个月以后，有两个年轻的波兰流亡者邀请巴枯宁参加为纪念1831年波兰起义而举行的宴会。这个宴会将由法国的激进派代表瓦文主持。接到邀请书时，他生病刚见好，“剃光了头，坐在家里”。他急于抛弃长期迫不得已的懒散生活，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于是定做了假发，花了三天时间准备讲稿。他以白热化的激情在宴会上发表了演说，在坐的人都深受感染。他演说的主旨是要求俄国的和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团结起来，并以“真正俄罗斯民族”的名义，提出要与波兰联合。“因为你们是尼古拉皇帝的敌人，是官方俄国的敌人，不管你们愿意与否，你们就是俄国人民天然的朋友”。他指出沙皇本属日耳曼血统，以此来激起斯拉夫人的爱国之心，并且宣称，俄国和波兰都受治于外国人。在讲演结束时，他向所有受奴役的斯拉夫人呼吁：

如果我们仍不团结，那我们双方都无力量；如果我们联合行动，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俄波谅解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值得我们为之竭诚献身。这意味着六千万人的解放，意味着呻吟在外国桎梏下的全体斯拉夫人的解放，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63、267页，第4卷第118—119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127页。

一句话，意味着欧洲专制政治的垮台，不可挽回的垮台<sup>①</sup>！

巴枯宁这个人属于与众不同的一种类型，不能用理性的词语来解释，其志向模糊不清，而且充满幻想；其作品文风虽然活泼，但思想内容却不连贯；其作品和行动都是虎头蛇尾。他一生几经波折，无任何具体造就。然而，他的势不可当的活力和精力给他的同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他有限的成就。甚至他还在世时，在本国和其他几个国家里，他就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倘若生长在一个仍保存着政治演说传统的国度里，那他一定是个古往今来首屈一指的演说家。他的生活环境使他很少有机会发表演说，而且演说时从未用过自己本国的语言。但是，在为数很少的演说里，他那庄重的体态和火一般的热诚犹如催眠药一样，把听众给迷住了。他在波兰宴会上的演说是这个演说家能力的第一次最引人注目的表现。一千五百名波兰和法国热情的听众的疯狂喝采声传到俄国驻巴黎大使基谢廖夫伯爵的耳朵里，使他大发雷霆。基谢廖夫向基佐提出抗议，指责政治避难者滥用法国的友善态度进行反对友邦政府的宣传。他要求解散波兰人的组织，把肇事者逐出法国。波兰人在巴黎得到颇有影响的人物的同情，这就使得靠公众支持的政府不愿触犯他们。但巴枯宁是个俄国人，没有朋友的支持。巴枯宁在11月29日宴会上的演说十分轰动。为平息俄国政府的愤怒，需要有所表示。1847年11月14日，巴枯宁接到一项离开法国的命令。他向内务大臣杜沙特尔提出请求，要求知道驱逐他是出于什么动机，但被拒不理会。于是这个逃亡者又回到他三年半前离开的布鲁塞尔<sup>②</sup>。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70—279页，第4卷第118—119页。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81，291页，第4卷第119—120页。

就在巴枯宁被驱逐前后，一个奇怪的谣言开始在巴黎激进派中暗中传开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说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密探。他获得波兰人和社会主义者的信任，只是为向自己的主子出卖他们。波兰人也曾告诉过巴枯宁，说俄国大使首先传出这个谣言，目的是为了破坏他的信誉，还告诉基佐，说巴枯宁作为一个探子“已经走得太远了”，要求驱逐他。这种假想当然是不真实的，因为在基谢廖夫插手巴枯宁事件的几个月前，1847年2月，那个警察的报告中已经提到过这则谣言。谣言很可能来自那些一开头就不信任巴枯宁的波兰人。不管谁是谣言的制造者，但这个谣言却不胫而走。谣言开始传出时，在某种程度上貌似真实。俄国地主阶级中的一员竟然鼓吹赤色革命，这种现象使人大为惊异，以至不能令人相信。另一个叫雅可布·托尔斯泰的俄国人，也曾向巴黎的激进派献殷勤，这个人刚被揭露出来，原来是警察。老实说，巴枯宁有口难辩。他既无正当职业，又无确定的生活来源。他为人乖戾，按逻辑思想来说，他不适合做间谍这种要求严格的工作，这理应有说服力的，但他乖戾的习性恰恰会引起那些不动脑筋的人的怀疑。谣言一经传出，就出奇地一直传下去。经常有人辟谣，但从未辟掉。后来，在巴枯宁革命生涯的各个阶段里，这个谣言仍不时地，越来越不合时宜地重新出现<sup>①</sup>。

\*                     \*                     \*

巴枯宁第二次来布鲁塞尔，住的时间比第一次还要短暂，从1847年12月中旬到1848年2月底。列列韦尔和波兰的民主主义者给予他应得的热情的接待。但是，自巴枯宁近四年以前第一次见到他以来，列列韦尔已明显见老。他眼下是个“潦倒的政治上虚有其表的人物了”。更糟糕的是他与某个姓卢布林纳的人过往甚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19—120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27页。

密，而“这是个冒充波兰人的犹太人”（这在巴枯宁的性格中第一次表现出有反犹的倾向），“一个非常令人作呕、不能容忍、令人烦透了的家伙”。他发现“布鲁塞尔普通的波兰民主主义者对人十分冷淡”。他们把所有的流亡者特别是波兰流亡者那种无聊的敌意和专事诽谤的通病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巴枯宁怀疑的风言风语又跟着他很快从巴黎传到布鲁塞尔。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和合作只不过是徒有其表。巴枯宁在布鲁塞尔公开场合露面只有一次，那是在由波兰人组织的纪念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宴会上（这个宴会一再延期，直到2月14日才举行）。他发表了演说。据他以后在《忏悔书》里说，这次演说“是第一次演说的发展和继续”。他讲到“斯拉夫人的崇高地位和革新腐朽的西方世界的使命”。预示欧洲革命即将来临，“奥地利帝国不可避免的崩溃”。这种含糊不清的说法已无从考证，因为演说稿既未印出，也未保存下来<sup>①</sup>。

巴枯宁在布鲁塞尔又遇到了一位老相识。卡尔·马克思自1845年初从巴黎被驱逐后，一直住在布鲁塞尔。在他的鼓励和领导下，布鲁塞尔大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部的希望。这里不但有德意志工人协会，而且有一个更为松散的民主协会，民主协会的目的在于联合不同国籍的、具有进步思想的人。民主协会的主席是个比利时人，名叫若特兰，巴枯宁认为他是个“积极的、强有力的、真正讲究实际的人”。马克思和列列韦尔任副主席。但巴枯宁对于马克思的活动兴趣不大。他知道马克思还在和伦敦的英国宪章派谈判。但他从来不提就在此时起草的、几个星期以后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据记载，他在12月26日参加了民主协会的一次大会，并和一个来自科伦的德国人德斯特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82—281页，第4卷第119—120页。

尔一起被吸收为会员。他还参加了另一次大会，可能就是1月9日马克思用法语发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那次大会。自此以后，他再未参加过大会。在布鲁塞尔期间，巴枯宁在革命过程中似乎特别不能容忍同事们的不同意见。他对那批德国人怀有很深的本能的反感。

〔他在给海尔维格的信中说〕德国人，那些能工巧匠，伯恩施太德、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又在这里故技重演了。他们自高自大、居心叵测、无端争吵，理论上不容异说，实践上畏缩不前。把生活、活动、区区小事都没完没了地上升到理论，而在实践上，却又把生活、活动、区区小事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被他们重复到令人作呕的地步，虽然他们自己彻头彻尾、根深蒂固地是“资产阶级的”。一句话，除了谎言就是愚蠢，除了愚蠢就是谎言。和这帮人相处，真叫人喘不过气来。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更直截了当地写道，民主协会是“可能想像的最大的胡闹——是个毫无生气、毫无实际意义的高谈阔论的场所”。马克思“用把工人变成理论家的方法，正在把工人毁掉”。卡尔·马克思是个爱研究、讲理论的人；而米哈伊尔·巴枯宁却是个易于冲动、实干的人，他们之间存在着这种根本的、禀性上的对立，巴枯宁本人早就这样下了定义<sup>②</sup>。

在布鲁塞尔，巴枯宁只有和另外一类人来往才感到无拘无束。

---

① 卡尔·路德维希·约翰·德斯特尔（1811—1859），德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译注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82，284，287页，第4卷第120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35，679页；《卡尔·马克思，生活记事》（莫斯科，1934年），第43页。

他所遇到的所有波兰人当中，要数波兰流亡者中的极右派成员斯科尔泽尼基将军最合得来。正如巴枯宁在给一位在巴黎的波兰朋友的信中说的那样，“除了基督教，甚至耶稣教的信念和神权理论以外”，这位将军表现出“真正的波兰人和斯拉夫人的感情”。说来奇怪，这正好证明了巴枯宁对人的友谊是来自毫无节制的冲动，同时也证明这样的事实：即共同的出身和传统比共同的信仰能更牢固地把人结合在一起。斯科尔泽尼基把巴枯宁引进布鲁塞尔的保守人士和教士的社交界。结识了梅罗德伯爵，此人以前当过部长，在比利时实现独立时起过作用；还有蒙塔朗贝尔伯爵，此人是法国正统派一员——这些人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统治的法国都会被认为是反动派。

〔他后来写道〕我生活在耶稣教传播的中心。他们力图让我皈依基督教。由于女士们和耶稣教徒都要来拯救我的灵魂，所以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十分痛快。

巴枯宁并非一心扑在笃信基督的仪式上，玛丽娅·波鲁丹斯基也从巴黎来到了，在精神和物质上都给他以帮助。女性对他的崇拜和关心又一次使他在政治上失望时得到暂时的安慰。

但是，刚从巴黎来到布鲁塞尔这个“狭隘的小天地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巴枯宁是怎么也不甘心的。一次，也许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他关于英国宪章派的事，他受到了鼓舞，说起他要去伦敦。但他思想上还是惦念着巴黎。1848年2月4日，巴枯宁被驱逐一案在下院引起了责问，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基佐和杜沙特尔的回答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而且是矛盾的。三天以后，他给《改革报》写了一封公开信，向杜沙特尔提出抗议。在信的末尾，他宣称“时间会证明他们谁是谁非”。当这封信于2月10日发表时，判决不到两个星期就撤销了，连巴枯宁都未曾想到这



样快。1848年2月22日，政府下令禁止激进派举行宴会（当时政治活动的神圣形式），这项禁令在巴黎引起了一点骚动。翌日，双方就开火了。巴黎的工人住宅还筑起了街垒，路易·菲力浦解散基佐内阁，以图阻止这一风潮。这个让步非但没有平息反而助长了公众的欲望。2月24日革命达到高潮。路易·菲力浦弃位潜逃，他遭到人们蔑视，几乎没有人理睬他。起义者冲进推勒里宫，并宣布成立包括一切有识之士在内的临时政府，其成员从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到诗人拉马丁。

这些激动人心的事件，立即对巴枯宁产生了影响，而且吸引了他。巴枯宁一直生活在小小的比利时首都的一潭死水之中。他把玛丽娅·波鲁丹斯基叫来，匆匆向她告别，并对她说，他简直兴奋成疾，只等借个护照，以防万一，然后马上动身。他一到国境，就听到了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消息。铁路交通已被起义者切断。于是他就步行到最靠边境的法国城镇瓦朗西安。街道和公共建筑上红旗招展，人人喜笑颜开。巴枯宁于2月26日乘火车到达巴黎。行动的时机终于来到了<sup>①</sup>。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20—121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38页。

## 第十三章

1 8 4 8 年

赫尔岑（他并未亲眼目睹）说过，二月革命最初的几天是巴枯宁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革命是他的本行，他已将自己献身于革命事业。这回算是第一次躬逢其时，达到他生活的目的了。巴枯宁满意地看到，大街上那些乘坐高车驷马、衣冠楚楚、油头粉面的老老少少以及那些手拄着文明棍、鼻梁上架着长柄眼镜的无所事事的人，即巴枯宁眼中的巴黎的基本部分，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用石头和拆毁的家俱堆成房顶那么高的街垒，红旗招展，革命歌声此起彼伏。到处是一片热情和友好的气氛。巴枯宁那时还远远没有从幻灭的现实中觉醒过来，这使得他在晚年承认，从近处来看，革命的面目着实可憎。眼前，事事都新鲜而又壮丽，充满希望与对人类尊严及道德的信念。就连他以前不大注意的法国无产阶级如今也成了“我高尚的工人兄弟”。

革命的警察局长科西迪耶尔组织起新的工人国民军，驻扎在卢森堡宫附近的兵营。巴枯宁在那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和战士们朝夕相处。所见所闻都使他高兴不已。巴枯宁从未见过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动人的幽默感，纯朴而又雍容的举止，友好和快乐的表现，与这些粗犷人们的英雄主义结合在一起。”他自己也两腿不停，从凌晨四、五点至午夜转钟两点，“大会、小会、社团活动、操练队列、行军和示威游行”，忙得不亦乐乎。他鼓吹只要一物尚存，就要摧毁到底，即使没有造反的对象也要

造反。他对于建立新秩序的建设性工作却没有多大兴趣。临时政府成员说的两句很精辟的话仍可见之于巴枯宁的稗史。科西迪耶尔说他“真是个怪人！革命的第一天是个宝贝，第二天就该枪毙。”弗洛孔说：“如果有三百个巴枯宁，法国就无法治理了”<sup>①</sup>

在这几个精神上如醉如痴、欣喜若狂的星期里，巴枯宁几乎没有时间去想或者根本没有想过他的故交和宿敌。俄国人中，只有屠格涅夫和安年柯夫尚在巴黎，他们两人都唯恐受革命连累而不愿和巴枯宁来往。所以，屠格涅夫后来能向俄国当局保证说，那段时间他“一次也未去找过巴枯宁，只在大街上偶然遇到他一次”。海尔维格迫于其妻子要使他成为革命领袖的野心，在巴黎组织起德国军团，以便把革命的火炬传到他的祖国。已被警察卑鄙地逐出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也及时来到了巴黎，在巴黎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并嘲笑海尔维格的举动。巴枯宁认为，马克思对海尔维格的态度是出于小人之心的妒忌，故不理睬马克思。然而，现在不是争论小事的时候，凡为革命出力者均应受到鼓励<sup>②</sup>。

但不久以后，巴枯宁就发现，巴黎不是他久留之地，因为它已不再是革命的唯一中心。

〔他3月13日在《改革报》上写道〕穷凶极恶的奥地利帝国很快、也许不出一年就要崩溃，获得解放的意大利人将宣布建立意大利共和国；德国人统一德国之后，将宣布建立德意志共和国。流亡十七年之久的波兰民主主义者将重返家园。不到欧洲，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建成一个民主

---

①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424页；鲍勒：《往昔》（1907年7月），第75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21—122页；丘什科瓦·奥格辽娃：《回忆录》，第304页。

② 列姆克：《随笔》，第16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96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一卷188—189页。

联邦共和国，革命运动就不会停止。

这种大胆的预言似乎很快就要实现了。就在巴枯宁这篇文章发表的那一天，维也纳人奋起反对梅特涅政府，建立了治安委员会，向这个古老帝国的各个民族发出了起义的信号；3月17日，匈牙利成立了对匈牙利议会负责的立宪内阁；威尼斯宣布成立共和国；米兰爆发反对奥地利驻军的起义获得成功。全意大利似乎马上就要团结一致，反对外来的统治者。3月18日，柏林又发出制宪呼声，迫使惊慌失措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答应立宪。绝大多数德国的小邦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以法国为榜样掀起的革命浪潮似乎所向披靡，势不可挡。

〔巴枯宁后来写到这些光辉日子时说〕我们当时处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上帝已被赶出天堂，那儿已宣布成立了共和国”，我们人人都会相信，没有人会感到吃惊的①。

俄国是欧洲大陆唯一举足轻重的国家，但那里连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这对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俄国人的巴枯宁来说，心里似乎很不是滋味。但他的热情并没有稍减，值得他拿出勇气来的任务就在眼前：既然俄国还没有爆发革命，他就得去发动一场革命。很明显，俄国的革命必须以波兰为起点。波兰流亡者领袖如查尔托雷斯基等人，已离开巴黎返回东欧。在普鲁士当局的默许下，波兰民族委员会在波森宣告成立。当时法国革命已转向处理单调的日常事务，逐渐失去了魅力，巴枯宁再也不愿在巴黎呆下去了。他要马上动身去波森。可是又遇到了和以往一样难堪的障碍——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65、296页，第4卷第122—123页。

缺钱。这样的区区小事从来难不倒他。他向临时政府申请借款两千法郎，作为去波森进行革命工作的经费。新政府总是慷慨解囊的，弗洛孔很爽快地批准了巴枯宁的申请。怀有恶意的人私下议论说，他廉价地打发走了一个给人增添麻烦的支持者。巴枯宁记载说，弗洛孔向他提供一笔比这大得多的款项，但他拒绝了。这也许是真的，因为巴枯宁此人也总是今日慷慨大方，不管明日愁断肠的<sup>①</sup>。

热心肠的科西迪耶尔给巴枯宁准备了两张护照，一张用巴枯宁的本名；一张用杜撰的波森大公国的波兰人的假名利昂纳德·纳格林斯基。于是，巴枯宁就携带两千法郎，以两种不同的身份于1848年3月的最后一天离开了巴黎，到东欧煽动革命之火了。他乘驿站车去施特拉斯堡。在《忏悔书》里，他编造了和一个旅伴的谈话：

“你为何要在外面游历？”

发动人起来造反。

“造谁的反？”

造尼古拉皇帝的反。

“用什么方法？”

我自己也不很清楚。

“你去哪里？”

去波森大公国。

“为何单去那里？”

因为波兰人说，那里比较有生气，运动也比较活跃。在那里比在加里西亚更容易做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的工作。

“你有多少经费？”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24—125页。

两千法郎。

“还想多要一些吗？”

说不准，也许我还能弄到一些。

“你在波森公国有亲友吗？”

一个也没有。只有几个我在柏林大学时常来往的青年人。

“你有介绍信吗？”

没有。

“你单枪匹马，怎么能是俄国沙皇的敌手呢？”

革命在我这一边，到了波森，我就不孤单了。

“目前，所有德国人都在谴责俄国，称赞波兰人，正在准备和他们一起向沙俄帝国进军。你是俄国人，难道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吗？”

办不到！如果德国人胆敢踏上斯拉夫的土地，我就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鄙人此行去波森，正是为竭尽全力阻止波兰人与德国人这种反常的反俄联合。

“但是，光是波兰人不是俄国的敌手呀！”

波兰人并不孤单，而是要和其他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如果我能将波兰王国里的俄国人争取过来的话，那就尤其要联合。

“你的希望靠什么来实现？你那儿有俄国亲友吗？”

没有。我的希望是靠宣传来实现，靠目前正在席卷整个世界的革命精神力量。

这段对话合情合理地、同时也很精确地勾画出了巴枯宁那时的思想状况。他也许为了尼古拉的利益，过高地估计了他的爱国心和他对德国联盟厌恶的力量，但是，如果这种联盟能为他的目的服务，他是会充分加以利用的。然而，他对自己从事冒险活动的轻率鲁莽这一点却并没有过甚其词。他既无盟友，也无行动计划<sup>①</sup>。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29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56页。

\* \* \*

他到德国的第一站是法兰克福。他是在4月上旬到达的，当时那里正在召开一个简短的所谓国会预备会议，即由教授、新闻工作者、自由派政客组成的自命代表大会，为召开德国国民议会做准备。巴枯宁持有海尔维格给许多德国民主义者的引荐信。其他人则由议员卡尔·福格特介绍给巴枯宁。这里，似乎每个人都处于狂热活动的状态。但是，国会预备议会中的共和派和革命派被温和的自由派击败。巴枯宁见不到“这个通天塔里哪怕一点点团结的基础”。于是，他又先后到美因茨、曼海姆、海德堡等地去作了一次旅行。他在科伦闷闷地呆了几天（那儿仍无革命迹象），等待从布鲁塞尔寄来的行李。1848年4月21日到达柏林<sup>①</sup>。

消息灵通的俄国驻德公使几天前就通知普鲁士政府，说有一个名叫米哈伊尔·巴枯宁的俄国煽动分子正在来柏林和波森途中，要在波兰人中间鼓动革命。这是个微妙的时刻。自3月18日以来，普鲁士当局就采取了表面上尽可能让步，而实际上尽可能不让步的政策，以图平息舆论，延缓革命的爆发。他们讨厌民主主义者。但因标榜尊重言论自由，不便对他们进行处治。波兰问题尤其进退维谷。普鲁士曾有过三分钟的热度，答应建立波兰民族自治省，但省界尚待划定。波兰民族委员会要求标出主权界限，以致连最温和的普鲁士人也认为这样做未免太过份了。

柏林以极不寻常的方式来迎接巴枯宁，反映出上述的两难局面。他到柏林的第二天，还没来得及拜访除海尔维格的岳父、大财东济格蒙德以外的任何人，就被捕了。警察局长米努托利要他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97—299页，第4卷第130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4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56页。

用名誉担保不去波森大公国，并通知他说，如果他作出这种担保，就可以改道去布列斯劳。那儿的波兰人的宣传尽管一样活跃，但其矛头不是指向普鲁士，而是指向俄国和奥地利。巴枯宁接受了这些条件。他用本名的那个护照被警察褫夺了，化名列昂纳德·纳格林斯基的那张护照还给了他，上面特别签注“到莱比锡或波森大公国无效”的字样。同时又发给他一张写上普鲁士臣民西蒙的护照。米努托利这样取消了巴枯宁的双重身份证以后，就兴高采烈地通知俄国公使说，那个俄国煽动分子米哈伊尔·巴枯宁一到柏林就被捕了，并派人押送回到科伦。同时，对他十分关心的法国大使也接到一项保证，说巴枯宁“无论如何不会屈服于其本国当局”<sup>①</sup>。

事实上，巴枯宁的确从柏林一直被押送到莱比锡。以后，警察才离开了他。在那里停留了二十四小时，拜访了卢格。卢格正忙于参加选举会议，竞选出席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代表。巴枯宁粗鲁地拉他“出来喝瓶香槟酒，他们爱选谁选谁”。选举一点作用都没有——“只是又多了一个耍嘴皮子的场合，如此而已！”卢格半推半就去随便应付了一下。他们两人在波伦旅馆高谈阔论了一个晚上。巴枯宁滔滔不绝地谈到法国革命如何令人失望以及德国革命如何徒劳无功，还谈到东方正在出现更为光明的希望。卢格听后很不耐烦。他们正在对饮时，卢格接到落选的通知。巴枯宁倒很高兴，赌咒发誓说，“我们斯拉夫人干起革命的时候”，卢格就会因为“这些萨克森市侩们的忘恩负义”而得到足够的补偿。第二天一早，巴枯宁就匆匆动身前往布列斯劳去了<sup>②</sup>。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30—131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651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0、82、151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56、58页；斯尔科尔：《出使柏林回忆录》，第2卷第77页。

② 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57页；《卢格书信集》，第2卷第43—45页。



对于那些头脑冷静、不象巴枯宁那样容易感情激动的人来说，确有理由对西方感到失望，而对东方充满信心。5月份，巴枯宁是在布列斯劳度过的，这是他希望幻灭和停滞不前的一个月。4月底，德国西部的革命者在巴登被保皇军打得大败。前来驰援的海尔维格的德国军团一触即溃。在德国，人们只尚空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开始为乌有的德意志联邦起草一部假想的宪法，巴枯宁对德国革命从无奢求。可是，巴黎的消息却太使他痛心失望。临时政府和所有已确立的制度一样，开始出现保守色彩，竟于5月中旬，出动大军驱散在市政厅前的工人游行队伍。在波森大公国，普鲁士和自治省之间因划界分歧而发生了公开的破裂，普鲁士人和波兰人的蜜月随即告终，波兰人挖苦说，这是“第四次分家”。革命明显地在转入低潮，即使在其汹涌澎湃时期，也从未波及到俄国边界。

巴枯宁在布列斯劳的处境和他的希望与抱负是不相称的。由于从布列斯劳到奥地利、俄国、普属波兰的边界几乎是等距离，所以该地是决心起义的波兰人理想的集合地点。1848年5月，来自德国各地的波兰人、巴黎的波兰人、伦敦的波兰人、甚至波兰的波兰人都聚集布列斯劳。波兰领导人的意图是把他们派往克拉科夫，为了在俄属波兰发动起义，那里正在着手成立一个委员会。但他们和巴枯宁本人一样似乎并无什么具体的行动计划，既缺少武器又缺少金钱。毫无结果的讨论，浪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此外，波兰人虽然表面上对巴枯宁客客气气，但实际上却显然对他存有戒心。一个俄国人在布列斯劳无所事事，空谈革命，难免引起人们怀疑。到处又谣传他是间谍。巴枯宁形影孤单，孑然一身，他在给玛丽娅·波鲁丹斯基的信中说，他们被“无底的深渊永远隔开了”。玛丽娅在回俄国的途中，曾写信责备过巴枯宁，这样的信自然不能给他消愁解闷<sup>①</sup>。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31—132页；波隆

只有奥地利的革命有所进展，巴枯宁的思想很自然地转向了南方。5月15日，维也纳又发生了一次人民起义。奥皇斐迪南逃到因斯布鲁克。匈牙利实际上已取得了独立。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人都不是安分守己的。耶拉契奇<sup>②</sup>发动克罗地亚人反对匈牙利的统治者。在布拉格，捷克民族委员会承担起临时政府的职能。较进步的捷克人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德国国民议会已经开了先例。斯拉夫人是联合起来的时候了。捷克人的一个委员会公开发出邀请，于5月底在布拉格召开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斯拉夫的团结长期以来一直是浮现在巴枯宁视界上的幻象。在布列斯劳那些阴郁的日子里，它象一束耀眼的光线。他于是匆匆前往布拉格，正好赶上6月3日代表大会开幕。

\* \* \*

代表大会在波希米亚国立博物馆召开。捷克历史学家、国民委员会委员帕拉茨基<sup>③</sup>任大会主席。代表总数多达三百四十人，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大约有四十名是南部斯拉夫人。六十名波兰人和罗塞尼亚人。斯拉夫种族最大的一支却只有两名代表：一名是流落异国的米哈伊尔·巴枯宁；一名是一位名叫米罗拉多夫，属旧教派中东正教派的传教士，他来自与

---

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40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135页；斯尔科尔：《出使柏林回忆录》，第2卷第7，88页。

② 约西普·耶拉契奇（1801—1859），伯爵，奥地利将军，克罗地亚、达尔马威亚和斯拉窝尼亚总督（1848—1859），积极参加镇压匈牙利和奥地利的1848—1849年革命。——译注

③ 弗兰蒂舍克·帕拉茨基（1798—1870），捷克历史学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奉行维护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政策，奥地利斯拉夫主义思想家。——译注

俄国接壤的奥地利的一个省布科维纳。大部分代表都身着民族服装，布拉格许多开明的捷克族资产阶级分子也跟着学起样来，表示祝贺。因而，在吹毛求疵的德国观察家看来，这座古老的城市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华丽而带有粗野的景象，酷似东方国家商队的客店。远方的代表住在当地热心的斯拉夫人家里，巴枯宁则借宿在一个爱国的捷克酒商家里<sup>①</sup>。

在布拉格代表大会上，巴枯宁第一次亲身体验到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而十九世纪的政治浪漫派对这一点则有意视而不见。摆在巴枯宁面前的分歧尤其复杂而尖锐。在整个德国，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并行不悖。奥、德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占据维也纳的革命者都是狂热的泛德意志主义者，他们对于斯拉夫人的愿望毫无同情之心，而且还理所当然地认为，鉴于波希米亚有许多德国人，又具有传统的日耳曼文化，所以应该留在德意志联邦里。因此，捷克人和德国人早就在这个问题上存有芥蒂。东边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匈牙利人在摆脱哈布斯堡的桎梏以后，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理睬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臣民的民族愿望。德国人和捷克人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反感，造成了匈牙利人和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之间的不和。

在这种情况下，斯拉夫民族主义者把德国和匈牙利的民主主义者都视为死敌。既然德、匈民主主义者都起来反对哈布斯堡帝国统治，因此斯拉夫人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人就这样不恰当地联系在一起了。到处传说，斯拉夫人是地道的奥地利人而不是德国人。布拉格的捷克民族委员会已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见在因斯布鲁克的斐迪南，捷克领导人开始幻想有一个经过改造的奥地利帝国，在这个帝国内将是斯拉夫人（特别是捷克人）而不是德国

---

① 尼古拉也夫斯基：《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1931年），第2册第303—304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52页。

人占支配地位。几个月以后，克罗地亚人就要变成哈布斯堡的忠实代理人去镇压匈牙利民主主义者的起义。在摇摇欲坠的哈布斯堡帝国里，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成了互相对抗的两种力量<sup>①</sup>。

假如按照原来的意图，只邀请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所面临的问题固然不能解决；那么同时又邀请其他斯拉夫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米哈伊尔·巴枯宁在代表大会上就坐的时候，思想上的混乱和矛盾就变得完全不可解决了。调和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对波兰人来说是没有困难的，和巴枯宁一样，他们认为会从推翻沙俄帝国的革命中得到拯救。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如果没有波兰人要设法打倒的那个大国的干涉，就不要指望赢得自由。这时的俄国问题——波兰人和巴枯宁同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有不同的理解——是整个斯拉夫人的焦点。唯独占代表大会多数的奥地利斯拉夫人对这个问题漠然置之。

巴枯宁来布拉格的目的是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个新的革命温床，可是他见到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就使得他的活动转到新的方向。他在巴黎就发现了波兰人，在布拉格又发现了斯拉夫大家庭的后代。正如他在《忏悔书》中所说，他的那颗斯拉夫人的心开始跳动起来了。他发现斯拉夫人具有令人惊异的独到之处，具有远非德国人所能比拟的那种天赋的才智和精力。他深为斯拉夫人的“天真无邪的热情”所感动，因为这种热情也是他自己所固有的。帕拉茨基把波希米亚的历史描写成为一部斯拉夫人与德国人角逐争雄的斗争史，从而为捷克的民族主义打下了基础。巴枯宁认为仇恨德国人和德国的一切是优秀斯拉夫人的标志，同时也是使斯拉夫兄弟紧紧联在一起的胶合剂。一位以前的德国朋友

---

① 尼古拉也夫斯基：《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1931年），第2册第308页。

嘲弄他说，斯拉夫人连共同的语言都还没有呢。巴枯宁打起精神回击说，有一句话，从易北河到乌拉尔山脉，从亚得里亚海到巴尔干半岛的所有斯拉夫人都能听懂，那就是“Zahrabte niemce!”（打倒德国佬！）巴枯宁认为这些新的看法和他以往的信念一点也不矛盾。即使他成为一个斯拉夫的爱国主义者，也不失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在布拉格有两项任务：其一是使各种各样的、有时相抵触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融合为单一的泛斯拉夫理想；其二是利用这种理想并使之民主化<sup>①</sup>。

代表大会分成三个组即三个委员会：北方组包括波兰人、罗塞尼亚人和俄罗斯人；西方组包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南方组包括南部各族群的斯拉夫人。巴枯宁任北方组的书记，又是该组向南方组解释本组观点所选派的代表之一。他在北方组、南方组和代表会议的全体会议上都发表了讲话，讲话稿都未保存下来，不过他在《悔书》里比较详细地概括了几次讲话的内容。他恳求全体斯拉夫同志忘掉他们的“局部利益”，告诫捷克人不要相信哈布斯堡帝国，因为它一旦得到斯拉夫的援助而恢复元气，就不会对促进斯拉夫独立再有什么兴趣。他告诫南部斯拉夫人不要向波兰斯拉夫人的压迫者沙皇乞求援助。要使除俄国以外的斯拉夫人（在俄国本身赢得自由并给予波兰自由之前）团结起来，并反对奥地利。巴枯宁正确地预见到，俄国革命和推翻奥地利帝国是斯拉夫人获得解放的两个基本条件<sup>②</sup>。

在提交给代表大会的三个文件里，巴枯宁进一步详尽地阐述了泛斯拉夫同盟的构思。这三个文件后来都在报刊上发表了。在《斯拉夫新政策的基础》一文里，巴枯宁由于对心理学可悲的无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32—133页；尼古拉也夫斯基：《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1931年），第2册第305—306页。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38—141页。

知，竟解释说，斯拉夫人自身长期遭受压迫，永远不会压迫别人。他写道，“这项新政策将不是一项国策，而是一项民族政策，是独立的、自由的个体人的政策”。这预示了他后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斯拉夫联盟的基础》一文是为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委员会”作准备的。这将是自由和独立的斯拉夫民族的最高机构，用来裁决他们之间的争端和处理他们与非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关系。

《斯拉夫民族的内部法规》一文表现了巴枯宁的民主主义信念。斯拉夫民族的“新生活”将以法国革命的三项古典原则——“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兄弟般的友爱”为基础。在斯拉夫人当中，要使农奴制度、等级制度、贵族统治和特权享受无立足之地。斯拉夫委员会的职责在使这些原则得以执行。代表大会是否讨论过上述雄心勃勃的提案不得而知，但大会没有接受这些提案则是肯定无疑的。除了巴枯宁以外，恐怕不会有一个代表会真心诚意地同意这些提案<sup>①</sup>。

事实上，布拉格代表大会只发表过一个文件——一致欧洲各族人民宣言。巴枯宁是选出来协助帕拉茨基主席起草宣言的代表之一。他对一位德国朋友说：“我们正在起草致欧洲各族人民的宣言，这个宣言和法兰克福的极左派纲领一样民主”。他和一位波兰同事草拟的初稿的确可以证明此言不谬。但一经过老练圆滑的帕拉茨基定稿就连半点革命味道或者说甚至连半点民主的味道也没有了。宣言恳切地希望把奥地利帝国改造成为自由民族的联邦，希望平息俄波争端、解放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12日，即复活节星期一，一致通过了这个宣言<sup>②</sup>。

但是，在布拉格代表大会期间，这些公开活动并没有耗费巴枯宁多少精力。代表大会越是不能满足他的希望，他就越是迫切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00—305页。

② 尼古拉也夫斯基：《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1931年），第2册第308页。

地去寻求别的途径来实现他的希望。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其最终目标——俄国革命。住在俄国边界的那位俄国传教士来出席大会对他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旧教派是不信奉正教的最主要教派，两个世纪以来不时受到严厉的迫害，一直坚持反对沙皇统治和正教会。他们代表了一种俄国自发的本土人民的反抗运动，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天然场所。但米罗拉多夫原是个“十足的俄国流氓和骗子手”。巴枯宁手无分文，不久就看透米罗拉多夫是不愿对革命事业解囊相助的。于是，他只好另寻门路。他从代表大会的成员中挑出一部分跟他志同道合的人——少数斯洛伐克人、摩拉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组成一个秘密团体，以促进革命目标的实现。这是尔后巴枯宁所最热衷于建立的许许多多隐蔽的秘密团体中的第一个，除此而外，别无任何意义。其实这个团体并不真正存在，它早已和代表大会一起寿终正寝了。后来巴枯宁遇见好几个不屑参加大会的年轻的捷克民主主义者。这些人比起帕拉茨基及其友人在观点上和巴枯宁更为一致。其中三人——阿尔诺德、萨宾纳和约瑟夫·弗利契下文还要谈到<sup>①</sup>。

6月12日的大会通过了帕拉茨基提出的宣言，这是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是日，布拉格爆发了起义。参加起义的是一群与代表大会毫无联系的捷克大学生和工人，虽然大会所激起的情绪有可能对这次起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巴枯宁在《忏悔书》里说，在起义爆发的前夕，他听到了一些“模模糊糊的、众说纷纭的”传闻，曾和“别人一起”劝说学生不要铤而走险。此事无论真假，我们都没有理由相信后来流传的另一种说法：即巴枯宁是这次起义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只是在起义开始以后，大会的代表们都吓得东奔西窜的时候，巴枯宁才真心投身进去。举事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37—138页，158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14、115、128页。

成功的希望固然渺茫，但革命已近在咫尺，他岂肯袖手旁观。他从一个街垒跑到另一个街垒，给战士加油打气；或坐镇起义指挥部克莱门帝宫，面前摆着布拉格地图，和起义的领导人讨论战略。这次事件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了起义者的预料，人们已在纷纷议论要建立革命政府。但是文迪施格雷茨将军有的是军队，其中不乏唯命是从的斯拉夫人，巴不得有发射葡萄弹的机会。6月16日，市中心遭到轰炸，有一两幢房子起了火。起义者无条件投降，过后，也只有过后，巴枯宁又平安无事地溜到布列斯劳去了<sup>①</sup>。

\* \* \*

巴枯宁在布列斯劳呆了不久，又前往柏林。他在那里和对他十分有用而无往不在的弥勒·斯特吕宾格住在一起，度过了1848年的夏天。自从他第一次旅居普鲁士首都以来，转瞬之间已经六年了。弥勒·斯特吕宾格把他介绍给新一代德国哲学家和政治家。但现在的巴枯宁已不是1842年时那种无鉴别能力的狂热分子了。法国革命、德国革命和斯拉夫人革命使他一次又一次感到失望，心境已非昔日可比。柏林的民主主义者都是一些胆小鬼，很容易被反动派的优势兵力所吓倒。巴枯宁在给海尔维格的信中说，“官方革命”和官方反动派之间的抗争是愚蠢而徒劳的，德国革命已成为一场“魔鬼装人的战争”。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也并不能使他乐观多少，他的瑞士朋友弗吕贝尔从维也纳来信说，“这里德国人是民主主义者，而斯拉夫人似乎是民主的敌人”，他也只能敷衍几句，表示未必尽然。他的思想越来越转向祖国。他拜访了万哈根·冯·恩赛，跟他谈了他和俄国有千丝万缕联系，还谈到了关于解放斯拉夫人的一项俄文宣言，该宣言印了一万份（没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58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695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55—60页。



有一份保存下来)。巴枯宁情绪低落，便从幼稚可笑的胡思乱想中寻求解脱。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是越来越经常而又莫名其妙地想入非非。就象他年轻时代一样，胡思乱想已成为一种虚幻的梦境，而这位生活在铁一般的冷酷现实中的积习难改的浪漫主义者，便在这种梦境中借以自慰<sup>①</sup>。

巴枯宁有公私两方面的理由感到悲观。弗洛孔给他的二千法郎早已用罄，无法支付女房东的房租，连行李也被拿去抵债。尽管他为革命事业东奔西走，不惜牺牲，但背后却老有人诽谤他是俄国特务。1848年7月6日，这种诽谤竟在卡尔·马克思主办的《新莱茵报》上第一次公开登了出来，该报驻巴黎记者发出消息说，乔治·桑手中的文件证明，一个新近被逐出巴黎的俄国人巴枯宁是俄国的走狗。这条迄今还在不脛而走、特别是在波兰人当中流传的谣言就这样从发行范围最广的德国民主派的喉舌中传播开来了。旅居布列斯劳的巴枯宁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此表示愤怒。并写信给乔治·桑，恳求她就与她有关的问题进行辟谣。《新莱茵报》同时刊登了巴枯宁本人的辟谣声明和乔治·桑的辟谣信，并有点得意地指出，乔治·桑的信“已把整个事情都讲清楚了”。于是一直流传的谣言又再度归于沉寂。后来在巴枯宁的文稿中还发现了一些致该报的抗议信的草稿，似乎都未写完或寄出<sup>②</sup>。

多年以来，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蓄意借此事来指责马克思，而马克思是不应受到指责的。在这类事情上，《新莱茵报》和当时的政治性报刊一样，都是爱捕风捉影、吹毛求疵的。这份报道是偶然从巴黎发表的，马克思并不熟悉巴枯宁其人。俄国人总是使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16—317、320—323页

万哈根：《日记》，第五册第174页。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05—314页，第4卷第185页；

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76，91页。

人不可理解，他们当中很多人据知是特务。上述传说是真是假，皆有可能，马克思让它登出来了，同时也登了辟谣声明，他已经尽到了他的责任。当时，巴枯宁对马克思也不怀有什么特别的仇恨。马克思在往返维也纳途中，曾于8月底至九月上旬路过柏林。据巴枯宁的一篇日记记载，他们见过面，也许还不止一次，谈话很友好。1871年时，他讲过这样一件事：在那次见面时，他曾警告过马克思，说自己是一个秘密团体的首领，只要他一句话，团体的任何一个成员就会去刺杀谁。这种轶事不过是一种耸人听闻的虚构，而巴枯宁的晚年主要是在这种虚构中度过<sup>①</sup>的。

到了9月中旬，一些如狼似虎的俄国间谍又跟踪起巴枯宁的行迹。而且据传，人们很可能相信，巴枯宁竟收买了两个人去俄国刺杀沙皇。以往，只要俄国公使不知道，普鲁上当局对巴枯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而现在和五个月以前比较起来，普鲁士却是更急于为俄国政府效劳，不那么害怕国内的激进派，对于棘手的外国煽动分子也可以不必那么客气了。于是，巴枯宁被捕，文稿遭到搜查。幸而出于好心的弥勒·斯特吕宾格事先烧掉了巴枯宁不愿意烧的通讯录。俄国公使得到通知说，搜查出来的信件表明，被捕者和德国民主主义者以及波兰流亡者有联系，但和俄国没有联系。不过这帮不了巴枯宁的什么忙。他不由分说地被命令离开普鲁士。1848年9月22日到23日巴枯宁星夜兼程，在路上向一位女旅伴借了把剪刀，绞掉了胡子，赶到布列斯劳时，竟未被发觉。

巴枯宁选择去布列斯劳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他又一次希望利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19页（斯切克洛夫引用时写为“Carrière”这个名字，在德累斯顿档案馆中的原件还能清楚地被读为“马克思”）；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303页。

用这个地方作为向更东方挺进的指挥部。自布拉格代表大会以来，他一直和一个从克拉科夫来的名叫鲁卡·西维茨的波兰人保持联系。后者甚至还给他寄过钱，大概是作为革命的经费。巴枯宁在布拉格认识的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之一施土尔急切地邀请他去斯洛伐克，并提出约会地点“在喀尔巴阡山脉某地”。有个名叫安娜·李苏维斯卡的神秘人物住在俄属波兰的西里西亚边界上的梅斯罗维茨村，通过此人，布列斯劳的波兰人和俄属波兰的波兰人可以秘密地取得联系。巴枯宁计划到布列斯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梅斯罗维茨去一趟，但旅途耽搁了。他被捕后审问时，矢口否认去过梅斯罗维茨，或听说过安娜·李苏维斯卡其人。如果说他和俄国边界上的革命者取得过联系的话，那么，他一生中只有一次成功地隐匿了行踪。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有过这一类联系。他在布列斯劳短暂的逗留期间，没有什么记载，唯一见到的是他和一个拿破仑部下的波兰老兵斯科尔泽维斯基伯爵见过面。这个人的使命是充当普鲁士的波兰人和巴黎的波兰人的联络人。通过暗号，斯科尔泽维斯基认出巴枯宁是个共济会员，遂把他介绍给当地的分会，又从巴黎给他弄了一张有大东方共济会三年会龄的证书，并劝他接受长老职位，“因为你已经具备了必要的资格”。但这一切很快就被遗忘了。巴枯宁到达布列斯劳不出一星期，就被警察发觉，他的谋划和希望全都成了泡影。官方警告他说，如果再呆在普鲁士不走，就要把他引渡给俄国政府。于是给他一张去比利时的护照，他并不想离开方兴未艾的革命场所而到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去。1848年10月8日，他改去德累斯顿。这里根据俄国政府1844年的一项驱逐巴枯宁的请求书，要求他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枯宁走投无路，终于只好在安哈尔特公国的一个小镇克滕找个栖身之地。安哈尔特公国虽是普鲁士境内的一块飞地（或者说是一片飞地），但普鲁士和萨克森的法令对这个独立的

小邦都鞭长莫及<sup>①</sup>。

安哈尔特的政治地位使克滕成了当时逃离普鲁士当局的避难所。巴枯宁在这里遇到了柏林的老相识，并秘密地和其他人来往。当地有个年轻的莽汉恩诺·桑德尔经常和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的民主主义者进行密谋策划，巴枯宁和他一拍即合。这块与世隔绝的弹丸之地虽不便进行严肃的政治活动，但它位于易北河和萨勒河之间，离哈尔茨山脉东山嘴不远。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场所，因而使巴枯宁回忆起自八年前从俄国离开以来就没有享受过的田园之乐。莱比锡的一位报纸撰稿人兼发行人凯尔前来克滕访问他，并给他画了一张像。画的是一个小姑娘坐在巴枯宁的膝上，听他讲他兄弟姐妹及他自己在俄国童年时代的故事。一个在十九世纪从事世界革命的革命者，其生活道路是充满艰难险阻的。在政治活动的中心大城市里过日子，唯一的娱乐就是与当局的走狗们捉迷藏。至于说巴枯宁还有别的什么消遣，在他的通信中以及他自己和朋友留存下来的关于他的生平记载中却很少见到。秋季在克滕时，有好几个星期，他都和同伴们在乡下到处追猎“野兔和其它野生动物”，把这段经历记载下来倒是很有兴味的。也许就是在这期间，他写了一篇他所留存的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作品。六个月后他被捕时才搜查出来，这就是本书前面有一章提到的未完成的言情小说<sup>②</sup>。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08、323—325、538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1、83、94、101—104、160、686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52—55、78—79页，斯尔科尔：《出使柏林回忆录》，第1卷第366页，第2卷第138—140页。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64—166页。尼古拉也夫斯基：《苦役与流放》（1930年），第8—9册第112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63—78页。

但是，就是在这段被迫停止活动的日子里，巴枯宁奔放的思想也是不平静的。他仍然在反复考虑斯拉夫人、德国人、马扎尔人以及革命尚未解决的问题。12月，署名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俄国爱国者米哈伊尔·巴枯宁著的《告斯拉夫人书》出版。扉页上印着：“作者于1848年在克滕出版”。实际的印刷工作是凯尔在莱比锡完成的。《告斯拉夫人书》的出版对于我们考查巴枯宁生平重要转折时期的政治见解是再方便不过的了<sup>①</sup>。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45—366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33页。

## 第十四章

### 一个革命者的信念

象米哈伊尔·巴枯宁这样的人世上并不多见，他们的生平和思想对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留下来的关于他们观点的记载却又如此混乱而残缺不全。巴枯宁是个多产作家，但思想不连贯。他的秉性使他依赖于一时的灵感，靠嘴说，而不是靠手写。

〔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没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现存的制度，也没有一本写好的书能够拯救世界，我不忠于任何制度，我是个真正的探求者。

他在别处曾经宣称，革命是出自“本能，而不是出自思想”。出于这个原则，他对他的信念很少作系统的阐述，做事更是有头无尾。赖歇耳在一份报告里说，他们在巴黎一起生活时，巴枯宁曾埋头写一本“不朽的著作，他每天都写，但没有完成”。他和巴黎来往的信件可以证明他在写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虽然主题常常有变化），但该书从未问世，并且没有理由认为在写作上有什么进展。自1842年秋季写了《德国的反动》一文以来，巴枯宁没有发表什么重要的政论。那篇发表在《瑞士共和报》上《论共产主义》的文章（据说是出自巴枯宁的手笔），给人留下了一个疑团，该文只是提出问题，并无结论。在巴黎期间，他在《改革报》上发表了一份抗议书，反击对他本人的责难；一篇谴责东正教在立

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宗教迫害的短文；还有在波兰人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一篇讲演，除此以外，他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在革命最初动荡的六个月里，他无暇也不想动笔写文章。他现在在克滕过着安稳日子，即使如此，只要外界没有刺激，他就保持沉默。弥勒·斯特吕宾格是个性急的人，他从柏林给巴枯宁来信，请求他发表一份《告斯拉夫民主主义者书》<sup>①</sup>。

这项请求不可等闲视之。颇为反常的是，由于身世的偶然性，巴枯宁信奉的是那种使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特别难以统一的民族主义形式。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里，意大利的、波兰的、德国的（这倒有点不正常）民族主义者，由于要求政治上的自由，进行联合行动。除波兰以外，斯拉夫民族主义坚决反对这种联合。几乎所有的斯拉夫积极的爱国主义者都是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南部斯拉夫人。由于受上一章所提到的情况所迫，他们不得不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大多数人显然选择前者。文迪施格雷茨由于受到忠诚的斯拉夫军队的支持，又受到捷克资产阶级的欢迎，在布拉格大街上把枪口对准工人和学生，自此，斯拉夫人就和反革命的最惊人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了。克罗地亚特遣队于8月随拉德茨基开进米兰，把意大利的民主主义扼杀在摇篮里。这些暴行都归咎于“野蛮的克罗地亚人”。就在巴枯宁于平静的克滕收到弥勒·斯特吕宾格的来信时，斯拉夫军队在文迪施格雷茨和克罗地亚的领袖耶拉契奇的率领下，正在对维也纳形成包围，并于11月1日占领了维也纳，解散国会，逮捕民主主义者代表，枪杀了法兰克福的代表罗伯特·勃鲁姆<sup>②</sup>。在幕后斯拉夫人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35, 237, 317页，第4卷第98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556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20, 92页。

② 罗伯特·勃鲁姆（1807—1848），记者，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人士，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译注

的较为隐蔽的威胁就显而易见了。沙皇尼古拉感到自身很安全，就迫不及待地派遣善战的部队去扑灭中欧的革命烈火。难怪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德国民主主义者都喋喋不休地说，斯拉夫人是反革命民族，是民主的天敌。

但是，1848年秋季，给欧洲革命者造成麻烦的并非只是斯拉夫人的问题。2月和3月那种大胆的希望已经成为历史了。4月和5月的再次行动，已逐渐变成总退却——几乎是溃退了。6月，文迪施格雷茨向布拉格大街开炮这件事表明，用点军队去解决市区的无产阶级真乃易如反掌。十天以后，卡芬雅克将军旋即在巴黎也立下了同样的功勋，经过三天巷战以后，在练兵场处决了数百人，流放了数千人。士兵们从无产阶级手中拯救了资产阶级共和国。9月，法兰克福大街上筑起了街垒。极端软弱无能的国民议会由于普鲁士军队的干涉而得救。大约在同时，在科伦附近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恩格斯和拉萨尔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并升起了一面红旗，宣告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但这次行动的唯一结果是与会者都被迫逃命。9月底，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才真正在巴登宣告成立，但只存在了几天。11月初，维也纳的民主派遭到镇压，革命遭到灭顶之灾。1848年夏秋，资产阶级处处都欢迎士兵到来，以驱散他们几个月前自己招来的革命怪物。如果在反动和无产阶级之间任意选择的话，资产阶级的善良公民们肯定选择反动，因为这对他们的生命财产威胁较小。

这就是巴枯宁到克滕后不久着手起草《告斯拉夫人书》时的毫无希望的形势。但他不是那种轻易认输或陷于悲观的人。如果革命尚未成功，那是因为还革得不够，他的宗旨是需要越来越多的革命。他用法文写，因为他用起法文来比德文容易些，写得很认真。当他于六个月以后被捕时，在他的文件里找到了各种草稿或未完成稿达半打之多。大约11月初，最后一稿（没有保存下来）寄给在柏林的弥勒·斯特吕宾格，叫他译成德文。在柏林的民主



主义者却妄称他们有比翻译这些东西更为广泛的任务。就传统和爱好来说，他们自己有一半以上是资产阶级。普鲁士的地位千钧一发，民主主义者的命运岌岌可危。他们认为巴枯宁的《告斯拉夫人书》中的某些章节会被用来把胆小的资产阶级吓得跑到反动的阵营里去，因为他在其中是向整个社会秩序挑战。寄回克滕给巴枯宁的是对原稿进行过大量删改的译文。稿子被删改得支离破碎，但他却出人意料地忍受下来了。他又补充了几段，主要是谈奥地利问题，就把定稿寄给一个莱比锡的出版商凯尔付印<sup>①</sup>。

《告斯拉夫人书》及其几份初稿全面地（虽在细节上有些混乱）阐述了巴枯宁在1848年革命的冲击下和失望中产生的见解。他的观点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下面三点：第一，他认为资产阶级自我暴露出是一种反革命力量，而工人阶级则是革命的希望；第二，他认为推翻奥地利帝国、在中欧和东欧建立自由斯拉夫共和国联邦是革命的首要条件；第三，他认为农民、特别是俄国农民将被证明是革命最后成功的决定性力量。这三点看法是巴枯宁此时全部活动的基础。

\* \* \*

巴枯宁新纲领中的首要一点是排斥资产阶级。

1848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由于受到传统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口号的鼓舞，排斥贵族，但保存确保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占主导地位的君主立宪制。它不要求也不希望彻底推翻现存的社会结构。私有财产制度是资产阶级至高无上的堡垒，一旦这个堡垒受到威胁，资产阶级就会象以前的贵族联合起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45—366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78—106页。（附带说明一下，《告斯拉夫人书》的手稿由普菲茨纳出版；其余一些手稿或手稿片断至今保存在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里。）

来保卫其特权一样，起来保卫这个堡垒，其野蛮和仇恨的程度没有两样。无产阶级要继续进行革命，直到把包括资产阶级的特权在内的所有特权一扫而光为止。这种革命观点的蔓延，一下子把资产阶级变成了顽固的反革命派和特权的卫士。1848年夏秋，坚定的激进派如马克思和巴枯宁在革命中都衡量过资产阶级，发现它不够格。

此时，马克思的影响在巴枯宁的演变中起了什么作用，仍然是个谜。三年前，马克思曾作出有名的预言：“高卢雄鸡的高鸣”<sup>(1)</sup>就是欧洲革命的信号，并宣布革命的“核心”是无产阶级。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就预见到，革命的最后胜利就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不管巴枯宁读过《共产党宣言》与否，但他对这种学说肯定是知道的。然而，直到布拉格代表大会时，他也没有承认这一点。他在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纲领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这个纲领的基础仍是1789年的三个口号，只要求取消农奴制、贵族和特权。他五年前就在瑞士发现了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在他的哲学中仍然不起作用。

布拉格代表大会的结果使巴枯宁打破了对资产阶级的信念。斯拉夫的资产阶级非但不需要民族主义而不要民主主义，而且当文迪施格雷茨开枪屠杀革命学生和工人时，它竟袖手旁观。1848年6月21日，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在科伦发行。整个7、8、9三个月，当巴枯宁失望地呆在布列斯劳和柏林时，马克思却正在大声斥责巴黎的“白色恐怖”、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会迷”以及由于其反革命的倾向而使民主主义遭到失败的、胆小的、卑鄙的资产阶级。巴枯宁一定是德国最重要的激进派喉舌《新莱茵报》的读者，并于9月份在柏林见过马克思。转变本是容易的，而且也是自然的。巴枯宁总爱唱反调，资产阶级既然是

---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译注

破坏道路上前进的障碍，那必须把它列为敌人之列。事情的必然性、也许再加上马克思的强有力的宣传，很快把巴枯宁从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派。他从不宽恕资产阶级的背信弃义，至死也蔑视和仇恨资产阶级。他一次对一位善良的瑞士资产阶级教授说：“你知道为什么资产阶级世界一天天在烂下去吗？这是因为这个可敬的阶级在生理上已经死亡，它不能再……”<sup>①</sup>

1848年，巴枯宁的观点从政治革命转变成社会革命。1848年以前，革命者曾经乐于把自己和资产阶级关于成立代议制政府、取消特权的要求联结在一起，现在，这种政治纲领已成为时代的错误。在巴黎，代表制议会欢呼卡芬雅克枪杀和流放工人；在法兰克福，代表制议会则忙于讨论一部假想中的、名义上的宪法。但真正决定德国前途的问题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普鲁士军队之间的一场战争。“普选就是反革命”这个明确的警句是蒲鲁东制造出来的，马克思和巴枯宁也跟着走。立宪民主和贵族特权一样，都对革命有害，只有推翻整个社会秩序才是可行的道路。

从本性上来说，巴枯宁放弃代议制比马克思要容易一些。由于他生来是个俄国人，又是个贵族，他天性不会接受把人数多少当成发现政治智慧的手段。他酷爱自由，但厌恶平等。他认为平等只是个口号和一种理想，从来不是一种现实的信仰。从那时起，他一直对立宪制度和议会表示蔑视。

〔他8月份给海尔维格写信说〕我对议会辩论不感兴趣。议会生活、立宪和国民议会等等的时代已告结束。任何人只要扪心自问，就得承认他对这些陈旧的组织形式不再会有任何兴趣，或者说有兴趣也是被迫的、不真实的。我不相信宪法和法律，世上最好的宪法也不会使我满意。我们需

<sup>①</sup> 威卢博夫：《欧洲通报》，1913年2月号，第79页。

要的是另一种东西：激情和生活，一个新的、没有法律的，因而也是自由的世界。

他在《忏悔书》里抱着诚挚的态度反复说：

我需要的是一个共和国。但这是什么共和国呢？不是议会共和国。什么代议制政府、立宪政体、议会贵族制以及所谓的权力均衡，积极力量在那里都经过巧妙的安排而不起作用了——一句话，那种狭隘的、巧妙混杂的、令人生厌的西方自由派的政治问答课本，我从不佩服、赞同，从不同情，甚至从不关心。看到在法国、德国甚至斯拉夫代表大会上议会方式的成果，当时我就开始更加厌恶这些东西。

巴枯宁在拒绝议会民主代表人民的主张时，使用的语言在二十世纪比在十九世纪还更为人们熟悉<sup>①</sup>。

在《告斯拉夫人书》的第一稿里，写进了这种新的社会纲领：

自初春以来，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两大问题：社会问题和所有民族独立、所有人民彻底解放的问题。首先提出这两个问题，并要求立刻解决的是一些个人，而不是一个党派，并且完全出自本能。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过着悲惨的生活，被剥夺了受教育、休息和生活必需品的权利，沦为有钱有势人的垫脚石。在这个世界里，自由就是一句谎话，这是众所周知的。

巴枯宁又重弹全面毁灭的老调了。不过这次又重新强调一下，并具有鲜明的社会色彩：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17—318页，第4卷第153页。

我们必须取消当今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环境，我们必须彻底推翻这一没落的社会，因为这个社会已变得软弱无能、毫无生气，支撑或承受不了这么多的自由。我们必须净化气氛，彻底改革我们生活的环境，因为它腐蚀我们的本能和愿望，使我们心地狭窄，才智短浅。社会问题的解决要采取首先推翻社会的形式。

但是胆小的柏林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对于很快从他们手中失去的立宪的自由仍抱有幻想，对于这一为广大群众进行社会革命的有力主张毫无准备。以上的引文和有其他类似的内容均被从草稿中删去。《告斯拉夫人书》正式发表的版本里，几乎没有提及社会问题<sup>①</sup>。

\* \* \*

由于没有提到社会问题，所以斯拉夫的民族解放，也就是巴枯宁纲领的第二部分，就成了最后定稿的《告斯拉夫人书》的中心论题。

在巴黎，人们认为革命不仅要为受压迫的个人，而且要为被压迫的民族带来自由。巴枯宁却把这种观点局限在波兰，而且主要把它看成是俄国问题的一个方面。他在布拉格把这种观点扩展到要求从奥、土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其他斯拉夫民族。1848年下半年，他对斯拉夫的问题作了非常彻底的研究。他此时的文稿里充满了人种学的统计数字。他发现，在一千二百多万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居民中，土耳其人不到一百万，而斯拉夫人却超过了六百万。在一千六百万匈牙利居民中，用他最熟悉的计算方法来算，有八百万斯拉夫人。马扎尔人不超过四百万。

巴枯宁知道他的解放斯拉夫人的纲领中存在一些令人为难之处。俄国帝国主义的胜利比革命的胜利更有可能使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得到解放。他以土耳其“伪政权”马上就可能陷于崩溃而告

<sup>①</sup> 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101—102页。

慰自己。土耳其“就象一个人的躯体里带有使人致命的细菌一样不可救药”。波兰人强烈地反对东加里西亚的罗塞尼亚人的解放，因为他们在这一地区扮演了地主和压迫者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巴枯宁认定，这些地主既然是波兰人，那就假定他们“有民主的倾向性，并且受到自由精神的熏陶”。由于有了这一没有根据的实用主义的假设，巴枯宁情愿让农民任凭地主的摆布。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解放在理论上没有困难。为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正在进行斗争的马扎尔人是国内中西部的一个组织严密的集团。用不着去同情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的马扎尔人中的地主分子<sup>①</sup>。

巴枯宁在实际起草《告斯拉夫人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事件，因此最为难的部分就被删去了。只要在维也纳的民主主义者仍在台上，奥地利的民主主义者和捷克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就能使捷克投入哈布斯堡的怀抱，从而使斯拉夫纲领具有反革命的一面。但1848年11月初，维也纳的民主主义者被镇压下去了。哈布斯堡分子又一次成为德属奥地利的实际统治者以后，捷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帝国的害怕多于希望。共同的敌人一旦不存在，斯拉夫和哈布斯堡之间默认的联盟就会随之瓦解。摆脱德国桎梏的波希米亚的自由可能又一次表现为一种民主的事业。在巴枯宁的笔下，斯拉夫的解放就有了一种新的更加具体的形式。它首先意味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崩溃，正是因为这一理由，《告斯拉夫人书》就成为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公开主张推翻奥地利帝国、并在其废墟上建立新的斯拉夫联邦，还是第一次，而这距1918年11月正好七十年。

提出这个主张的在欧洲激进派中几乎只有巴枯宁一个人。中欧的斯拉夫人引起了一个新的不为人们所熟悉的问题，甚至布拉

---

<sup>①</sup>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22—23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385页。

格大会都未能使这个问题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留下印象。法国人不了解情况，保持中立，就连站在激进派一边的、除巴枯宁以外的唯一俄国人赫尔岑也持这种立场。德国人不是保持中立就是对这种提高斯拉夫地位的打算持敌对态度。坚持反对这个纲领的人当中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告斯拉夫人书》发表两个星期以后，恩格斯就以《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为题，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两篇文章，对它进行严厉地剖析和批判。恩格斯说，“把五百五十万捷克人、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组成一个国家，把五百五十万南斯拉夫人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组成另一个国家”，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荒唐的吗？这些斯拉夫民族没有一个是拥有领土的严密的集团，对在城镇占多数的德国人怎么办呢？如果波兰对波罗的海沿岸提出领土要求，那么怎样能去剥夺奥匈在亚得里亚海的领土权利呢？

除了波兰人、俄国人，顶多再加上土耳其斯拉夫人，别的斯拉夫民族是没有任何前途的，这是因为他们缺乏起码的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独立的必要条件和生存能力。

还有，这些斯拉夫人并不像巴枯宁伪称的那样，是什么革命派，而本质上却是资产阶级和反动派。耶拉契奇和克罗地亚人去帮反革命的忙，这才是斯拉夫人精神的特征。恩格斯认为，所谓中欧斯拉夫人的愿望只不过是尼古拉一世和贵族玩弄阴谋诡计中的马前卒<sup>①</sup>。

恩格斯就像巴枯宁厌恶日耳曼人一样厌恶斯拉夫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们之间的分界线是这种幼稚的种族偏见而不是任何深刻的原则分歧，但原则分歧还是存在的，并且使二者的思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03—220页。

想具有不同的色彩。巴枯宁抱住浪漫主义信念不放（直到1863年波兰起义失败后才放弃），就是相信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乃是同样推动革命的两股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相信革命的社会和经济性质，因此，他们就足以把民族主义视为反动力量。巴枯宁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支持斯拉夫民族主义，虽然他的原则不能使他对德国民族主义抱有同样的热情；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国际主义者谴责斯拉夫民族主义，虽然他们对德国民族主义的相应的现象采取比较容忍的态度。关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历史尚未作出最后的判断，同样，历史对于中欧的斯拉夫问题也尚未作出定论。到了1918年，（历史证明）巴枯宁是胜利了，但仍有人同意恩格斯的观点。

\* \* \*

巴枯宁的第三条信念是相信农民的革命力量，这一点在《告斯拉夫人书》里没有明说，而在继《告斯拉夫人书》之后，第二年四月在《德累斯顿日报》上发表的《论俄国状况》的几篇文章里有着更为明确的论述<sup>①</sup>。

马克思和巴枯宁对农民的态度就像他们对民族主义的态度一样，暴露出他们之间尖锐的矛盾。马克思居住城镇，是工业革命造就的人物。故他把农民置于革命中的最低一级。他从对革命能力的观点出发，把劳动阶级分成三类：自觉为革命而斗争的有组织的、有阶级觉悟的城市无产阶级；尚无阶级觉悟、或尚未为革命而组织起来的低一级的城市工人，或称流氓无产阶级；第三类人就是农民。无论如何，第二类人为革命提供了潜在的人力，为宣传鼓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第三类人对革命事业非但没有价值，而且的确怀有敌意。马克思在更具有论战性的文章里，乐意称农民为“天生的野蛮人”、“类人猿”，并宣称，既然他们没有形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99—426页。



成一个阶级，那就无力维护其本身的阶级利益。因而他认为乡村人口总是反革命的堡垒。

这种假设的城镇和乡村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和巴枯宁的思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巴枯宁从孩提时代起就熟悉乡村的农奴。当时俄国为数很少的工厂也是由农奴充当工人的。所以，巴枯宁一直认为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利益和感情是一致的。他在瑞士曾遇到过魏特林的主要追随者小手工业工人，甚至扬言，如果他父母不给他经济支援，他就要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他在巴黎曾称赞过那些参加科西迪耶尔国民自卫军的“高贵的工人”。在布拉格，他也曾见过捷克的无产阶级和学生联合起来，举起革命的旗帜。但是，他一想到要起来推翻资产阶级文明的工人阶级，他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农民而不是工业劳动者身上。如果法国和德国的农民迄今仍不大关心革命的话，那是因为领导人把注意力放在城镇上，犯了“大错”<sup>①</sup>。

然而，使革命成功的使命并不是取决于一般的农民，而是特定地取决于俄国农民。五年前，巴枯宁曾得意地宣称，他确信俄国“定会在神圣的民主主义方面发挥很大作用”。现在，他用卢梭的史前黄金时代和文明作用衰弱的学说证实这种爱国的信念。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一位名叫哈克斯特豪森<sup>②</sup>的德国旅行家发现了俄国土地公有制，并且断定这是唯一存在的假想的史前共产主义。和其他欧洲人相比，俄国农民受文明的破坏不大，所以他们不仅保存了更多的早期人类的活力和朝气，而且还保存了那种财产公有的原始神圣国家的遗迹。巴枯宁热情地赞成这一实用主义的理论。他据此推断，俄国农民不仅是过去共产主义黄金时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69页。

② 奥古斯特·哈克斯特豪森（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政治上持反动的农奴主观点。——译注

代的最后继承者，而且也是将来共产主义黄金时代的先驱。俄国农民的革命使命是和它的共产主义组织形式紧密相连的。“这就预先清楚地表明俄国革命的特点是一场社会革命，这一特点来源于俄国人民的总的特点，来源于它的公社组织”。<sup>①</sup>

俄国农民具有强有力的革命传统。1670年，顿河的一个哥萨克人斯杰潘·拉辛发动俄国东南部农民起来反抗沙皇阿列克塞，起义队伍在农村连续转战好几个月，放火劫夺。斯杰潘·拉辛死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传奇式英雄。大约整整一个世纪以后，一个叫普加乔夫的农民领导了一次更大的起义，反对叶卡德琳娜一世，普加乔夫还成立了革命政府，宣布解放农民，处决地主，毁坏地主财产。他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恩威并施，坚持了近两年之久。普加乔夫起义使俄帝国十分恐惧，并给俄语增加了一个新词普加乔夫精神以纪念俄国农民骚乱的本能。

巴枯宁在这段时间的著作里反复提到普加乔夫的起义。这是“农民反对压迫者的第一次大反抗”，它“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俄国农民革命”，即使在尼古拉一世比较平静的时代，据记载也爆发了许多起农民反抗和谋杀地主的事件。农民革命迟早是不可避免的，延续的时间越长，就越会造成更可怕的和更大的破坏。俄国没有西欧人道主义的传统，人类生命安危简直无足轻重。巴枯宁宣称，“人类进步的现存成果是用人类的鲜血浇灌的”，他还满怀激情地谈到“热情的俄国人民那种纯朴的、近乎疯狂的喜悦”。通过火烧莫斯科这件事——此乃真正的俄国人所为——俄国人民表示了他们反对拿破仑的决心。俄国农民很快就会放火烧毁统治者的城堡，大火将在世界范围内熊熊燃烧，文明将在火光中化为灰烬。赫尔岑叙述说，巴枯宁“在离开巴黎去布拉格的途中”，遇到一些德国农民大声呼叫，围着一个贵族城堡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9，408页。

游行，于是他就下车指点他们怎么干，当他上车离开时，他满意地看到，整个城堡都燃烧起来了。他完全可以想象“整个欧洲，连同圣彼得堡、巴黎、伦敦一起都会变成一大堆垃圾”。有一部当代历史小说对民主有一段描写，说“民主乃一座火的寺院，人类将在那里从奴隶制度的残渣中得到净化”，说这段话来自巴枯宁，这是可信的<sup>①</sup>。

大约就在巴枯宁向全世界宣布俄国人民的革命前途时，他曾在莫斯科见过的康斯坦丁·阿克萨柯夫却在详细地阐述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虽与巴枯宁观点的前提相同，并表现出许多相同的特点，但结论正好相反。在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者当中，阿克萨柯夫是最重要的一员，他和巴枯宁一样强调俄国农民独特的、未受损坏的品质，以及斯拉夫民族的独特命运。俄国农村土地公有制属于彼得大帝把俄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以前的那个时代，彼得所做的事和卢梭的“文明”一样，是现代堕落的根源。斯拉夫人的使命就是反对当代文明的唯物主义，使俄国（通过俄国乃至全世界）回到斯拉夫主义者发现的彼得俄国以前的原始的尽善尽美的状态。阿克萨柯夫的结论是反动的，而巴枯宁的结论是革命的。但二者的结论都是武断的。二者的学说在基本特征上是一致的：都是俄国农民浪漫的理论，都相信斯拉夫人特殊的世界史命。二十年以后，俄国的斯拉夫主义者已经成为与最极端的俄国民族主义相联系的强大的反动党派，此时，巴枯宁常常被马克思和其他人责骂为浅薄的、可耻的斯拉夫主义者。

但是，在1848年到1849年之交的冬季，这些令人为难的问题仍是未来的事，没有人去寻找巴枯宁纲领中的反动的潜流，这纯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406页，第4卷第23，38—39，43页；瓦格纳：《我的一生》，第468—469页；尼古拉也夫斯基：《苦役与流放》（1930年），第8—9期第127页。

粹是革命的纲领，包括政治、社会和民族革命，目的是要废黜国王和皇帝、破坏资产阶级的权力、毁坏其财产、取消人为的奥地利帝国里的种族混杂，并通过斯拉夫的解放，为成立欧洲自由共和国联邦铺平道路。这些理想再加上另一个理想，即俄国革命的理想，就可算是完美无缺的了。俄国革命有时被认为是世界革命的起点，有时被认为是世界革命的高潮，但总是被认为是其自身的顶点和精华。就他本身的革命激情来说，米哈伊尔·巴枯宁仍是个热情和俄国人。

## 第十五章

### 失败

巴枯宁对克滕闭塞的乡间生活感到厌倦，觉得无聊，于1848年12月30日到了莱比锡。他秋天被逐出德累斯顿这件事曾在议院里引起过愤怒的质询，朋友们曾迫使萨克森政府作出某种保证：如果巴枯宁回到萨克森，不应受到刁难。但巴枯宁决不冒险。他不出头露面，并常常更换住址。据说他起先住在金鸡客店，以后和一个书商施莱克住在一起，后来又和神学院的两个捷克青年学生斯特拉卡兄弟住在一起。巴枯宁首先想到的是和出版商凯尔安排好出版波兰文本的《告斯拉夫人书》，这份译稿是由德累斯顿一个名叫安德拉泽伊库维茨的波兰人翻译的。后来，他又埋头写一本大部头的关于俄国政治形势的著作。其特点是，这部著作从未完成。但其片断曾作为一组《论俄国状况》的文章发表了。本书前一章曾引用过这些文章的内容。整个这段时期，巴枯宁仍一贫如洗，他两手空空来到莱比锡。赖歇尔从巴黎给他一点钱，另外他就得靠借债和当地同情者的捐助维持生活了。因为赖歇尔也差不多生活在饥饿线上，而他在《忏悔书》里提到他每月的平均收入竟达一百塔勒，这倒使人有些吃惊<sup>①</sup>。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525页，第4卷第166—167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3，47,171,190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72页。

依靠这些微薄的收入，巴枯宁第一次试图组织一个革命的国际团体。要德国人参加是容易办到的，他有两个德国青年密友，名叫德斯特尔和赫克扎梅尔，他们刚刚创建了一个新全德民主委员会，这两个人都曾和他一起在克滕避难，他在布鲁塞尔时就认识德斯特尔。法国更困难一些，巴枯宁寄去一份《告斯拉夫人书》，还写了一封信给弗洛孔，恳求他派一名法国民主主义者代表来莱比锡。波兰人和捷克人总是可以找到的。从卢萨西亚来了两个文德族人，作为少数民族，他们在历史上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巴枯宁想到向科苏特驻巴黎的外交代表泰列基伯爵提出要求，派一名匈牙利人。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都流产了。波兰人没有反应，弗洛孔甚至信都没有回。德斯特尔和赫克扎梅尔倒是很愿意也很积极，但他们在同胞中没有很多追随者<sup>①</sup>。

只有在捷克人当中，巴枯宁才获得几分成功。《告斯拉夫人书》在布拉格发生了很大影响。捷克爱国团体的同名报纸《斯拉夫菩提树》以社论的形式几乎全文转载了《告斯拉夫人书》。在巴枯宁的心目中，捷克人开始代替了波兰人。他把斯特拉卡兄弟从善良的捷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为热情的革命者。他派古斯塔夫·斯特拉卡到布拉格去一趟，把他在布拉格代表大会上认识的两个捷克民主主义者叫到莱比锡同他会晤。这两个捷克人一个叫萨宾纳，《斯拉夫菩提树》的编辑；一个叫阿尔诺德，另一家捷克报纸的编辑。可是他们之间却发生了妒忌，两人之间剑拔弩张，势不两立。阿尔诺德单独来到莱比锡。巴枯宁近来对他的革命方案有点失望，一个真正的捷克人竟然远道从布拉格来和他谈革命问题，他高兴得和阿尔诺德紧紧拥抱起来<sup>②</sup>。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73—175页。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67—168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25，477页。

阿尔诺德在金鸡客店里呆了二十四小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同德斯特尔和赫克扎梅尔的无益的讨论上面，这两个人要在莱比锡召开德国人——斯拉夫人联合代表大会。巴枯宁反对这一“愚蠢的计划”。他曾和一些当局让存在多久就存在多久的公众大会和公开组织打过交道，一年来的革命经验使他相信（以后从不动摇），只有进行暗中破坏、秘密策划才能有效地打击现存秩序。一般性的谈话结束以后，他又和阿尔诺德单独谈了四、五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头脑里编造出遍及波希米亚的秘密团体的网，每个城镇和村庄都包括在这个革命的网里。阿尔诺德出发前往布拉格时，半信半疑，还抱怨没有钱，时常怀疑他在金鸡客店里听到的是梦幻还是现实<sup>①</sup>。

自从这次梦魇般的会见以后，阿尔诺德回到布拉格后干了些什么，并无记载。但不管怎样，他没有给巴枯宁写过信。此时，巴枯宁陷入想象而不能自拔。但他不能靠想象过日子，他一定要知道布拉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那儿是他全部希望所在。金鸡客店的常客中有一位年轻的奥籍波兰人叫海姆贝格（因为此人爱国，想把他的名字译成波兰文，叫拉苏格尔斯基）是莱比锡公立音乐学院的学生。就在巴枯宁急不可耐的时候，海姆贝格说他要到维也纳探望父母。良机不可失，巴枯宁和以往一样，毫无顾忌地把伟大的波希米亚事业的秘密全部告诉海姆贝格，并请求他从维也纳回来时在布拉格停一下，调查一下阿尔诺德在干些什么，回来向他报告。海姆贝格忠实地、迅速地办了这件事。他报告说阿尔诺德什么也没干。巴枯宁一如既往，决不气馁。他说服软心肠的海姆贝格再回布拉格一趟，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着手组织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77—178，180，

192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90页。

另一个革命团体，一是对阿尔诺德进行监视<sup>①</sup>。

这是巴枯宁一系列奇异的实有与想象参半的秘密团体中的第一个。他后半生中，脑子里想的尽是秘密团体的事，这里不妨从《忏悔书》里引用一段他自己关于此事的起因的说明：

这个团体按计划要包括三个各自独立的团体，名称不同，互不了解。一个是对资产阶级的、一个是对学生的、一个是对农民的。每个团体内等级森严，无条件服从，但在细节上和形式上与其为之奋斗的阶级的特点和力量相一致。这些团体的成员要控制在少数人的范围之内，并尽可能包括有能力、有经验、积极肯干、有影响的人物，绝对服从中央控制，也要无形地做群众工作。由中央委员会来协调这些团体的工作。中央委员会成员应由三人、最多五人组成，有我和阿尔诺德以及应由我们选出的其他人……我希望用这种方法来确立和加强我在波希米亚的影响。同时，我还背着阿尔诺德委托一个逃出奥地利、来自维也纳的德国青年学生，在波希米亚的德国人中按同样原则组织一个团体。虽然我本是这个团体秘密的指挥者，但我起初不应公开参加它的中央委员会。这样，如果执行了我的计划，所有活动的主要线索就会集中在我的手中，我就能确保预期的波希米亚革命不至偏离我规定的路线。

这是他被捕前不久第一次暴露出来的狂妄、虚荣、幼稚和诡诈的特有的混合物。因为巴枯宁在理论上主张绝对自由，现在和以后都随时准备谴责共产主义的严格的纪律。所以，他在革命活动的组织里所采用的方法，不但和他自己的原则明显矛盾，而且比起武断专横的马克思的极端野心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自相矛盾似乎从未使巴枯宁伤过脑筋，他可以一方面宣扬无限的自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80—181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90、197、421、430页。



由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原则，而另一方面却要求其门徒“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意志<sup>①</sup>。

巴枯宁在《忏悔书》中所描写的专制主义的计划确实令人厌恶和震惊，派一名负责的心腹代理人到一个地方，随后又背着第一个人派另一个人去同一个地方，以使阴谋的线索全部地、更有把握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赤裸裸的诡计。但更为令人吃惊的是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暴露出其不真实性，纯属杜撰。这种巨大的革命事业——其实际领导权由巴枯宁强加给糊里糊涂的阿尔诺德（而巴枯宁几乎不了解此人）——仅仅存在于想象之中。那个由巴枯宁和阿尔诺德充当原成员的“三到五人”的中央委员会从未成立，也从未发挥作用。海姆贝格要在德国人中建立相应组织也同样失败了。波希米亚发生了一次革命运动，或者说发生了多次革命运动，阿尔诺德、甚至海姆贝格可能都参加了，但没有证据说明巴枯宁帮了什么忙，也没有证据说明他是领导人之一<sup>②</sup>。

海姆贝格见识虽不如阿尔诺德广，但热情似乎比阿尔诺德高。和阿尔诺德不同，海姆贝格不管怎么说是个满不错的勤于写信的人，他经常给巴枯宁写信，要巴枯宁相信人们处处对他表示同情和赞扬，并预示，如果巴枯宁能到波希米亚去，定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巴枯宁经不住这种奉承，于1849年3月初到了德累斯顿，办了一张名为安德逊的英国人的护照，剃掉胡子，伪装前往布拉格。他的忠实的门徒斯特拉卡兄弟从莱比锡赶来，陪同或跟随他一起前往。

巴枯宁在布拉格的四、五天，使他的幻想破灭了，因为他虽然发现了“加速革命的全部要素”，但是，他想象中的组织却连影子也没有。捷克的革命者首先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仇恨德国人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78页。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80—181页。

和马扎尔人，比起热爱民主来，其动力要大得多。巴枯宁并不充分考虑人的秉性。阿尔诺德忌妒海姆贝格是很自然的，他在家生闷气，以致痛风病发作。在捷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中有一个真正的忠实的追随者萨宾纳并不信任海姆贝格和阿尔诺德。巴枯宁并未发现海姆贝格曾经保证过的那种对他的阴谋计划的同情，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布拉格民主主义者贫嘴薄舌，爱浮夸，不愿冒风险”。他们东传西聊，使得布拉格一半人，包括奥地利警察很快就知道巴枯宁来了。他四天就换了四次地方，后来赶紧退到德累斯顿。这一次他把斯特拉卡兄弟留在波希米亚的首都，要他们给他守摊子，并像往常一样乐观，答应给他们提供经费<sup>①</sup>。

出于对革命的热情，巴枯宁就像这样一个人：发现自己情人不忠，对她的感情非但不减退反而更加深。捷克民主主义者的缺点只能使他作出更为巨大的努力。在取道德累斯顿去布拉格的途中，他发现德累斯顿的政治生活比莱比锡更为活跃，也更为激烈，此处距波希米亚边境又近，于是就决定把他的总部设在那里。巴枯宁本能地认定此地将发生预期中最大的动乱，他在德累斯顿度过被捕前最后一个月的动荡生活。

\* \* \*

另一位天才作家在高潮到来之前对巴枯宁作了一番描写。在取道德累斯顿前往布拉格途中，巴枯宁结识了激进派周刊《人民报》的编辑奥古斯特·勒克耳<sup>②</sup>。此人前不久是国立歌剧院的一名指挥，因为有民主思想而被解职。他毫无保留地同情斯拉夫人，博得了巴枯宁的信任。在勒克耳家里，巴枯宁遇到歌剧院的另一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83—186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33—442页。

② 奥古斯特·勒克耳（死于1876年），德国政论家，音乐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德累斯顿起义的参加者。——译注

名指挥理查·瓦格纳<sup>①</sup>。除革命外，有两件事能够深深地打动巴枯宁：一是对普列姆希诺庄的回忆；一是音乐。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对瓦格纳讲了自己的生平。1849年4月1日即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他来到歌剧院，当时，瓦格纳指挥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这场演出使巴枯宁在他的普遍毁灭的学说中作了一点保留。他走上台去，对瓦格纳表示祝贺，并宣称，“假如所有的乐谱都在一场世界性的大火中毁灭掉，他们必须保证抢救这部交响乐，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抢救”。

他们之间的友谊加深了，巴枯宁成了瓦格纳家里的常客。他恭维这位作曲家，邀请他演奏他认为“妙不可言”的《飞行的荷兰人》序曲。这位客人狼吞虎咽地大块吃肉，大口吃香肠，不喝葡萄酒，说没有什么味道，用玻璃杯大口喝白兰地，这种用餐方式使敏娜·瓦格纳大为震惊，甚至连只知自我欣赏（轻易不为别人所动）的瓦格纳也被吓得目瞪口呆，觉得自己和这个超群绝伦的山野粗人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他年富力强，风华正茂，大约在30岁到40岁之间，膀大腰圆，精力充沛，我知道他从不重视与我的相识。看来他的确对知识分子并不关心，他要求的是要有冲劲的人……他讨论问题的方式一般是采用苏格拉底的问答法。他躺在主人的硬沙发上，东拉西扯地和一群各种各样的人讨论革命问题，显得从容不迫。在这些场合，他的观点一定取胜。要击败他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如实地说，他发表观点时极为肯定，而且在各方面甚至都超过了激进主义的最极端的界限<sup>②</sup>。

巴枯宁被捕前的动荡的几周里充满着许多这样的讨论。波兰

---

① 理查·瓦格纳（1813—1883），德国大作曲家。——译注

② 瓦格纳：《我的一生》，第467—470页。

人、捷克人、德国人你来我往，有时一起来，这些人都是他的听众。他时常换地方，起先与激进派报纸《德累斯顿报》的编辑魏蒂格住在一起，他们是1842年认识的；后来又和一位靠教小学生勉强为生的前波兰将军同住；后来又和勒克耳同住；最后又和《告斯拉夫人书》的波兰文译者安德拉泽伊库维茨住在一起。他徒劳地用各种化名来掩盖自己，有一次，他冒充成一个英国牧师。他不但常去民主主义者集合地点——偏僻的咖啡馆、肮脏的住所，而且也常出席一位波兰伯爵夫人和一位瓦拉赫王子的沙龙。王子对革命的兴趣也许只是纯精神性的，但巴枯宁在社交上从不失礼；贵族们常常是借钱给人的，巴枯宁本人几乎生活在饥饿线上，只是由于勒克耳的忠贞不渝（他卖掉了一些家俱），才使得巴枯宁有钱寄给他在布拉格的心腹斯特拉卡兄弟。

巴枯宁又一次做起了建立一个国际革命委员会的美梦。他遇见了曾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相识的两个波兰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海尔特曼。他们要去巴黎向波兰中央委员会作汇报，正在从故土加利西亚去巴黎的途中。巴枯宁责成他们向该委员会紧急呼吁，要求派波兰代表、波兰军官，首先是波兰的钱币，以支援即将来临的波希米亚革命。他还找到一个匈牙利将军拜尔，并通过他向泰列基伯爵发出类似的呼吁。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都成了泡影。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海尔特曼不但空着手从巴黎回来，而且随时准备取代巴枯宁，由他们自己来充当斯拉夫革命的赞助人和指挥者，这倒令人感到不安。因而，巴枯宁和这两个自命不凡的波兰人之间出现了暂时冷淡的局面<sup>①</sup>。

但是，巴枯宁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布拉格。1849年4月的整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87—190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95，197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146页。

整一个月，密探在萨克森和波希米亚之间来来往往。热心的海姆贝格回到德累斯顿以后，巴枯宁就秘密安排他住在勒克耳家里，唯恐他向波兰同胞泄露布拉格的秘密。后来，古斯塔夫·斯特拉卡回来了，接着，巴枯宁前一年在布拉格代表大会上第一次遇到的学生约瑟夫·弗利契也来了。六月起义失败后，弗利契组织了一个很小的学生兄弟会，这个组织看来是布拉格最活跃、最极端的革命团体。因为巴枯宁完全有理由不信任阿尔诺德，不相信斯特拉卡的能力，所以他热情地接待弗利契。由精选的革命者组成的小团体的想法对巴枯宁具有特殊吸引力。捷克的民主主义者中他只对弗利契一个人保持持久的敬意，但是，即使弗利契也不能使波希米亚产生一场革命。捷克的资产阶级仍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主张上分成两派。弗利契、阿尔诺德和萨宾纳之间互相妒忌给巴枯宁的雄心以致命打击。布拉格仍处于不祥的平静之中。还是德累斯顿本身表明了濒于熄灭的德国革命还有一些最后骚动<sup>①</sup>。

\* \* \*

巴枯宁埋头于他的波希米亚的斯拉夫革命的空中楼阁似的计划，全然忽视了在眼前发生的事。他在萨克森民主主义者中没有多少熟人。慷慨诚实的勒克耳很快就成了密友。是巴枯宁使勒克耳卷入了他的斯拉夫计划，而不是勒克耳把他的注意力引向德国人。巴枯宁通过魏蒂格的关系，很快取得在《德累斯顿报》的专栏上发表文章的机会。四月份，他在这个专栏里发表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论俄国状况》的论文，同时还发表了一份《告捷克人书》，告诫捷克人不要和在匈牙利的敌人俄国合作。这份《告捷克人书》后来被称为《再告斯拉夫人书》。但是这些文章或其他

---

<sup>①</sup>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50—454页；普菲茨纳：

《巴枯宁研究》，第143—144，179页。

看来出于巴枯宁手笔和灵感的文章却对正在进入高潮的萨克森民主主义者和王权之间的斗争一点也不感兴趣。1849年5月1日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者有魏蒂格、德斯特尔、法兰克福议会的一名代表以及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海尔特曼两个波兰人，会议讨论了由全德波兰人支援的协同革命问题。巴枯宁的确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如果认为这次会议对两天以后德累斯顿爆发的起义有什么影响，那是没有道理的。5月3日，第一批街垒已经筑好，并且开了火，此时，巴枯宁却正计划和他的瓦拉赫朋友、吉卡王子离开德累斯顿去马耳它。但是和往常一样，他没有钱，而吉卡此时也只有几塔勒，只好独自走了<sup>①</sup>。

导致德累斯顿起义爆发的问题，不可能使巴枯宁感到兴趣。可恶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产生了一部德意志联邦宪法，萨克森议会投票赞成。萨克森国王和大多数德国较大的邦的国王一样，不愿意和法兰克福发生什么关系。他于1849年4月28日解散了议会。其后几天之内，公众哗然。由于派遣了一个大分遣队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萨克森的军队已经削弱。5月3日，德累斯顿大街上开始出现街垒。市卫队倒戈转向起义者一方。起义者试图袭击军械库，但那里有军队把守。军队向群众开枪，打死十五人，起义军士气很高。王室当晚就逃到离德累斯顿二十英里易北河上游的柯尼施泰因。翌日，有契尔奈尔、托特、霍伊布纳尔三名民主主义者参加的临时政府在市政厅阳台上宣告成立。

从临时政府的人员组成中，可以看出起义的幕后势力的性质。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96—197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0—53，74—80，417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113—120，148—149页；尼古拉也夫斯基：《社会史国际评论》（1936年），第1期第121—216页。

三名成员中，只有当过上议院副议长的契尔纳尔算是一个激进派，并有一些煽动的本领；霍伊布纳尔和托特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代表——泛德意志主义者和宪制改良派。他们虽然对滥用特权、蔑视和反对法兰克福宪法的行为表示不满，但他们不是革命派。他们没有社会纲领，也没有那种激起来哈伊尔·巴枯宁去毁灭一切的神秘冲动。和无产阶级联合的善良的德累斯顿资产阶级，做梦也没有想到突然坐上了当权的宝座，但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手中的权力。

巴枯宁对这些事情的第一个反应是蔑视和冷淡，他根本不关心德国民族统一事业或法兰克福宪法。他在前几个星期的几次讨论会上都遇到过契尔纳尔，但瞧不起他；他和托特相识，但从无政治上的交往；他以前从未见过霍伊布纳尔。5月4日上午，他在大街上偶然碰到理查·瓦格纳，此时他还没有介入这次起义的意思。瓦格纳要到市政厅去看看那儿情况怎么样，巴枯宁就和他一起去了。临时政府刚刚宣告成立，契尔纳尔正向一群狂热的人发表长篇讲演。巴枯宁良好的意愿就被其本能所战胜了。空气中回荡着革命的气氛，他由于狂热而失去了自制，他的热情只是由于同情那些显然不知如何进行领导的领导者而镇定下来。于是他进入市政厅，就如何领导革命开始向临时政府提出建议<sup>①</sup>。

根据记载的材料来看，他的建议是正确的。萨克森当局由于手中没有足够的军队来对付起义，就很明智地采取守势，一面向普鲁士请求增援。增援部队肯定会到来。巴枯宁向契尔纳尔等保证说，决定起义命运的是大炮和步枪，而不是讲演和谈判。他请求他们竭尽全力把军队组织起来，并掌握在自己手中。指挥部队的是一位奇妙的冒险家海因茨，此人原为希腊部队的一名陆军上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99—200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9，53页。

校。巴枯宁对此人不信任。他确信只有波兰革命者当中才有具备指挥军队资格的军官，于是他进城到俱乐部和咖啡馆里四处搜罗波兰军官。他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是在第二天即5月5日，他才把曾在普鲁士和波兰军队里服役的海尔特曼带到市政厅，同时也少不了把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带来。此人指挥军队的资格就更为可疑了。这三个人在市政厅会议室的一张桌子边坐定，面前放一张德累斯顿地图，成了临时政府的顾问。这两个波兰人小心谨慎，提出应为他们准备好金钱和护照，“以防不测”<sup>①</sup>。

这种谨慎并非为时过早。当晚，第一批普鲁士军队开到德累斯顿市郊。由于铁路线被破坏，他们还耽搁了几个小时。军事顾问小心翼翼地地图上标出起义军几门大炮的位置，看来防卫计划也不过如此而已。有个传闻说，巴枯宁以普鲁士人“很有教养，不会对拉斐尔的作品开炮”为理由，建议把《西斯廷圣母》像挂在街垒上。这不过是个有趣的传说。军事顾问和总司令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忌妒。总司令不让部下执行军事顾问提出的作战方案。巴枯宁在《忏悔书》里断然认为海因茨是个叛徒，并对此人以后受到萨克森政府的谴责和监禁感到吃惊。在这种情况下，险恶的形势变得更为险恶了<sup>②</sup>。

5月6日是星期日，任何不带偏见的观察家都会清楚地看出，起义已成败局，那两个波兰人也得出了相应的结论，于是就带着钱和护照离开了。大约在同时，契尔纳尔和托特也从市政厅消失了。他们后来虽又重新出现，但临时政府的士气已受到沉重打击。到处充满了失败的气氛。只有霍伊布纳尔还顶得住，他大胆地巡

---

①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4—56页。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02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6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425页。



视街垒，对守卫者进行宣传鼓动。巴枯宁陪同霍伊布纳尔，但他不得不停止发表演说，因为他嗓子已喊哑了①。

巴枯宁在5月6日和其后的两天里，无疑是有脱险机会的。他偶然地而且几乎是不自愿地卷入了起义，对于这次起义，他并没有参与谋划、也不同意，对其要达到的目标也不感兴趣，并且也不相信能够获得成功。他在起义中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也不对任何与起义有关的人负责。那么，他为什么去冒几乎肯定要被逮捕的危险呢？他在《忏悔书》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诚实的。他留下来不走是因为他不忍把霍伊布纳尔丢在危险的地方不管。托特和契尔纳尔实际上把霍伊布纳尔扔下不管了。霍伊布纳尔就像“一只被赶往屠宰场的羊”。德累斯顿起义并非他和巴枯宁所为，这次武装冲突对生来就是多愁善感的自由派霍伊布纳尔来说实在是太严重了；而对主张全面毁灭的巴枯宁来说却是小事一端。但是，既然投身于起义之中，置身于守卫街垒战士们之中，霍伊布纳尔就不愿擅离职守，巴枯宁也不愿意离开他。巴枯宁有时纯粹是为了打抱不平。他冒着生命危险——牺牲了十多年的时间——不是为了斯拉夫革命，甚至不是为了德累斯顿的资产阶级起义，而是为了他认识还不到一个星期的人。而且，他并不了解这个人的秉性和信念，但他钦佩其英勇的行为，深为他的无依无靠的处境所打动②。

\* \* \*

起义最后几天所发生的事情，使起义一步步走向预想的结果。巴枯宁成了敢死队的队长。他这段时间“废寝忘食、烟酒全废”。5月6日，起义者放火烧了歌剧院，几个星期之前，巴枯宁还在那儿听过瓦格纳指挥的第九交响乐。大火蔓延到邻近的建筑物兹

---

①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7—59页。

②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02—203页。

维因格，焚毁了保存在那儿的文物珍藏。要说巴枯宁对此举有何个人责任，那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以后由于官方急于挑起对一个外国煽动者的偏见，就说巴枯宁曾谋划把这座城市付之一炬。萨克森和普鲁士的军队缓慢地、但确实无疑地开进市区。5月8日，海因茨被捕入狱，他还算是幸运的，因为短兵相接、鏖战格斗，被俘者无一被宽恕，不是被就地枪决，就是被扔进易北河。有组织的抵抗很快就结束了。于是，巴枯宁建议幸存者用所存炸药把市政厅连同他们自己一起炸毁。当晚，总退却的命令下达了，宣布临时政府要迁往弗赖贝格，这里是霍伊布纳尔的家乡，离德累斯顿25英里。起义的领导人于5月9日清晨悄悄撤离了德累斯顿<sup>①</sup>。

瓦格纳在起义正值高潮时离开了德累斯顿，当天下午他遇见了巴枯宁、霍伊布纳尔和一个邮差马丁，他们乘坐一辆出租马车，正风尘仆仆地前往弗赖贝格。瓦格纳向他们保证说，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克姆尼茨有大量工业人口，可以在那儿继续举行起义。这看来好象不能令人相信，但他们都想捞救命稻草。于是他们在弗赖贝格作短暂休息，巴枯宁此时还控制不住自己，向霍伊布纳尔和瓦格纳东拉西扯地谈到各种政府的形式都是无用的。他们决定出发前往克姆尼茨。瓦格纳夫妇匆匆取道魏玛，前往瑞士去了<sup>②</sup>。

巴枯宁目前所有的财产就是临时政府的几个大印、约十三塔勒现款和一大堆有关信件。他的同伴也和他一样，一无所有。他们心中并无成熟的计划，只是垂头丧气地来到了克姆尼茨。他们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03—205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8—63页。

② 瓦格纳：《我的一生》，第493—496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9页。

最后的希望——工业无产阶级——也成了泡影，镇上连一点革命声息都没有。镇长不承担任何风险。于是，1849年5月9日晚上，巴枯宁、霍伊布纳尔和其他几个可能扰乱安宁分子都在睡梦中被捕，没有采取任何特殊的预防措施，也没有动一刀一枪。巴枯宁后来回忆说，他要从逮捕他的人手中逃脱是十分容易的事，但他最近一个星期疲于奔命，身体和精神上都疲惫不堪，他一心只想睡觉，对于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似乎顾不得了，只好束手就擒<sup>①</sup>。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05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683页；瓦格纳：《我的一生》，第499页。

第 三 卷  
入 獄



“世界上最令人绝望的事就是永远与世隔绝……，  
只有生活在社会中，取得他人帮助的人，才能成为举足  
轻重的人。”

巴枯宁致玛蒂尔达·林登贝格（母  
家姓赖歇尔）的信（1850年春）



## 第十六章

### 萨克森和奥地利的铁窗生活

巴枯宁、霍伊布纳尔和其他犯人一起被移交给附近的阿尔滕堡守备队。萨克森当局接到电报后，派一名军曹和六名士兵去押犯人。1849年5月10日下午，犯人被押回德累斯顿，在古城监狱里关了两个星期。起义中被捕的人数太多，牢房拥挤，就连巴枯宁这样的要犯也不能住单人牢房。有一阵子他和一个奥地利的民主主义者屈尔恩贝格尔同住一个牢房。他对屈尔恩贝格尔抱怨说，第四等级（即无产阶级）被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出卖了。但是，这种随意安排牢房，当局不会长期不管的。5月底以前，巴枯宁和其他首要分子就被转移到城外骑兵营地去了<sup>①</sup>。

但是，即使骑兵营地也不适合长期关押危险的政治犯。尽管守卫森严，但是和市内同情者的秘密联系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很明显，已经开始的审讯要拖好几个月，必须找一个更安全、更永久性的地方。8月28日夜晚，巴枯宁、霍伊贝纳尔和勒克耳戴上脚镣，于午夜被押出德累斯顿。他们分乘马车，每辆车上两名全副武装的卫兵，在一队骑兵的押送下，通过城市。这些异乎寻常的预防措施证明是不必要的，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清晨近六点钟，犯人安全地住进了柯尼施泰因石砌的城堡——在那些

---

<sup>①</sup> 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196—197页；尼古拉也夫斯基：《苦役与流放》（1930年），第8—9期第113，120页。



令人担心的起义期间，国王的避难所。巴枯宁在这里度过了他来德国后的最后九个月<sup>1)</sup>。

柯尼施泰因的物质条件在他长期的铁窗生活中算是比较好的。他住进一间清洁、温暖、明亮的房间，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广阔的天空，这是坐牢的人很少能够享受到的优待。他每天可以在这个宽阔城堡的庭园里散步，并能居高临下，欣赏“萨克森瑞士”的美景。散步时，有两名士兵枪上刺刀，用铁链牵着他。由于从柯尼施泰因逃跑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所以牵着铁链似乎有点过份小心。巴枯宁挖苦地暗示说，这样做是一种信号，能够使他在与世隔绝时想起把个人和人类联成一个整体的无形链环。除此以外，他受到的都是宽厚的待遇，并且享有“一个明理的人所要求的一切东西”。他可以尽量吸烟，一个月供给他一千六百支雪茄；也能得到书看，虽然书籍出入城堡时，副官对每页都要进行检查，看看有无暗号；他还能收信和写信，虽然有时无限期地延期。他感到他就像一个年方十五的妙龄少女，父母对她很操心，为保持她的贞洁要对她的书信进行仔细检查。

巴枯宁能过这样奢侈的监狱生活，全靠朋友们的一片诚心。此时他尤其需要向朋友索取资助。和他最经常保持联系的阿道夫·赖歇尔及其姐姐玛蒂尔达有求必应，亚历山大·赫尔岑也如此。恩玛·海尔维格寄来一百法郎。弗兰茨·奥托本来是萨克森当局指派的巴枯宁的辩护律师，却成了掌管钱财的人，他购买书籍、雪茄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如果资金别无来源，他就自己掏腰包。他处于“委托人要律师来付钱”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克滕和莱比锡的民主主义者的捐助也是相当可观的，但都是匿名的。

---

1)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70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197页；尼古拉也夫斯基：《苦役与流放》（1930年），第8—9期第107页。

另一方面，斯柯尔泽维斯基伯爵回信中闪烁其词，对“波兰人的坚定性和感恩戴德”进行冷嘲热讽，一个曾要光复波兰、打倒德国的人，却在必要时主要蒙受德国人的恩惠，岂非咄咄怪事<sup>①</sup>。

至今仍然保存在布拉格陆军部档案里的厚厚一摞发黄的八开练习纸上，有巴枯宁的密密麻麻、但清清楚楚的手迹，这就证明了巴枯宁1849年秋季毫无目的的勤奋。他向柯尼施泰因当局首先提出的要求之一是要一部英语字典、一本语法书和教科书。他所写的英文作文所下的功夫令人钦佩，至今仍然可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证明比英文更有麻醉效果，代数和三角练习写满了一页又一页。他发明并且证明了一种新的规则：即“小数和连分数乘法规则，用以代替乘法表”。除此以外，还有一本日记的片段，记载他的读书笔记、生活中突出事件以及健康状况（他十一月份曾请医生看过便秘病），更难得的是日记里还记载着他的感情状况。当时给他读的书籍中，有莎士比亚的施勒格尔译本（他读《罗密欧与朱丽叶》时做了笔记）、唐·吉珂德和维兰特的诗歌。后来他又读了法国历史，订购了梯也尔的四卷本《执政府》以及基佐和拉马丁的历史著作。在读这些严肃读物的同时，他也读些回忆录和游记来调节一下<sup>②</sup>。

但是，用数学和历史来打发生活总不是个办法。巴枯宁从未说过他要做个学问家，这种顽强的但又是敷衍的治学方法只不过是为了打断他那无休止的奔放的思想，免得去听报时钟的声响和九点半钟的熄灯号声，这是他唯一的、也是不必要的计时工具。在柯尼施泰因只有一件事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那就是思想。

---

①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353—387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5卷第291，296页。

②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353—361页；保存在布拉格陆军部档案里的巴枯宁材料中一些未发表的文章和日记原文。

他的思想“周游世界”，直到睡着为止，但那也不是生活。巴枯宁对笛卡儿有名的格言加以挖苦嘲弄，把自己描写成为“只有思想而没有生命的人”。他有时陷入完全绝望的境地，说自己“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他完全与世隔绝，外界发生了什么事，他一无所知，这使他十分痛苦，倍感孤独。外界近在咫尺，就在几个月以前，他曾在那儿起过突出的作用。他就他与世隔绝这一点向当局提出请求，但当局却充耳不闻。自被捕以来，绝对禁止他看报。他还得感谢奥托，因为奥托给他送来了过期的1848年第一季度的《奥格斯堡总汇报》合订本<sup>①</sup>。

巴枯宁越来越心灰意冷，甚至连为自己辩护的事也不想办了。初审在被捕后几天之内已经在德累斯顿开始。他一到柯尼施泰因，就由一个庞大的委员会恢复了审讯。使用的方法是德国式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方法。对被告在过去两年内生活中已经确定的事件也不放过，对和他有联系的以及怀疑与他有联系的每一个人都不疏忽，就连巴枯宁是否在起义的某天抓住一个市议员普福登豪叶尔先生的衣领，把他赶出市政厅这类问题也要寻根究底，被告承认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但记不起来了。有个证人证明犯人曾煽动构筑街垒的起义者使用暴力；另一个证人证明说，当人们警告巴枯宁，说民房可能被炸毁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那就让它们炸毁吧！”巴枯宁对许多控告都断然否认，对其它问题，他拒绝回答。因为他不能连累同伴。但有些罪证他想反驳是毫无希望的。他并不抱怨，他和委员会长时间交锋，不管怎么说这样做总能解除孤独感。10月20日最后一次审讯以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和委员会告别时”，他“的确很受感动，因为这个委员会对我真是仁至义尽”。<sup>②</sup>

---

①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358，371，397页。

②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39—69，108—184页；保存在布拉格陆军部档案里的巴枯宁材料中未发表的日记。

\* \* \*

四天以后，起诉书正式转交给被告的辩护人，给被告三周时间准备书面辩护词。但由于经过长期审讯，巴枯宁已经心灰意懒，不能专心写辩护词，于是他拒绝写辩护词，借口是不让他看报纸。他于11月12日三周期限届满的前夕，写信给奥托说，他不得不“放弃写辩护词的念头”。忠实的奥托取得两周时间的延期，着手工作，于11月26日交上一份他自己写的辩证词。辩护词主要以法律为根据，认为被告既然不是萨克森臣民，就不可能犯叛国罪。如果巴枯宁有罪，根据法律顶多判二至四年徒刑。但此案在开始时就无希望。1850年1月14日，法院给巴枯宁、霍伊布纳尔和勒克耳定罪，判处死刑<sup>①</sup>。

三名被告均有权上诉。巴枯宁虽然仍坚信向“秘密法庭”提出为自己辩护是无用的，但这次还是埋头给奥托写长篇的《政治忏悔书》，以指导奥托去起草上诉状。但由于巴枯宁早就脱离现实，不知大难临头，对于他是主角的诉讼程序亦无兴趣，他提笔一写，就把这封信写成了一篇论文。他忘记了监狱、诉讼和判决，俨然又成了一个政治宣传家，对从彼得大帝到当今俄国的状况都作了评论，并预见俄国革命即将来临。他宣传俄国是自由的死敌，它把奥地利当成天然的盟友。他还对奥地利帝国的民族组成情况进行了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引出人们所熟悉的结论：推翻奥地利就像推翻沙俄一样是夺取自由胜利的必要条件。然而，他从未得出这种结论。但他就这个主题写了长达两万字以后，却中途停笔。所以这份《政治忏悔书》和他其他作品一样，是一份未完成作品，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竟然会写出这样的上诉状，真是闻所未闻。奥托对于从这位怪僻的委托人那里得到指导很快就不

---

<sup>①</sup>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287—302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203—205页。

抱希望了，他自己交上了一份上诉书，重复了他原辩护词的论点，但毫无效果。4月6日，巴枯宁已被关了十个月时，上诉书被驳回，维持原判<sup>①</sup>。

这几个月里，巴枯宁忧心如焚。他越来越觉得失去了和人们的一切来往。他两年前就和玛蒂尔达·赖歇尔分了手，她此时已结了婚，写信说，她和他“一起生活，历尽千辛万苦”，劝他用宗教来安慰自己。约翰娜·佩斯卡迪尼通过玛蒂尔达给他寄来了一本原属她死去的孩子的《新约全书》和《拜伦诗集》。除了这三件礼物之外，她们还寄来了一本日记本、一个烟斗和一个金别针。玛蒂尔达认为巴枯宁对她的做法会哭笑不得，她无疑是想对了。四月底，她特地来德累斯顿看望他，当局不准会见，她感到非常失望，而巴枯宁却不以为然。

巴枯宁并不怕死。他们开头就对他保证说，即使判处死刑，也不会执行。自革命爆发以来德国还没有哪一个州敢冒处决政治犯的风险。而他却认为他宁愿死一千次也不愿“在监狱里孤寞等死”。但有一件事他最害怕：那就是把他引渡给俄国。在那儿他绝无希望得到宽恕。如果要受屈辱，但愿当着外国人的面，而不愿当着本国人的面。他常常用这一点缠住奥托不放。这位和善的辩护律师向他作了保证说，“根据我所得到的消息，特别担心的事肯定是不会发生的。”<sup>②</sup>

然而，这种危险却是千真万确的，奥、俄对巴枯宁被捕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没过多久，两国都向萨克森政府多次正式提出，要求引渡巴枯宁。萨克森当局对此求之不得，因为他们既不想处决巴枯宁而招人憎恨，也不想负无限期监禁他的责任。剩下的只

---

①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222—287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205—206页。

②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353—410页。

是把巴枯宁交给谁的问题了。看来，俄国似乎有优先权，因为巴枯宁是俄国人，而且早在1844年俄国就给他定过罪。但是，奥地利的利益更为直接一些，因为巴枯宁最近的活动更直接针对奥地利而不是俄国。当时，一个委员会正在布拉格调查巴枯宁插手煽起的布拉格暴动。但是困难很快就解决了。沙皇采取高姿态，同意把巴枯宁先引渡给奥地利，条件是奥地利达到目的之后，再把他引渡给俄国。巴枯宁被捕两个月内，已经做成了这笔外交交易。一旦法律诉讼程序完毕，萨克森的面子得到满足之后，就把他先交给奥地利，最后引渡给他本国当局。除巴枯宁以外，有关方面都知道这件事<sup>①</sup>。

可怕的诉讼程序第一步先要达到预定的目标。巴枯宁被捕一年零一个月，即1850年6月6日，国王降恩，将三名犯人均改为“第二类的无期徒刑”，但减刑令并未向犯人下达。6月12日夜，巴枯宁被叫醒，奉令穿好衣服，他想他要被带去处决了。但从所乘车子来看，从走的距离来看，他发现这不过是换个监禁的地方。等到了边界以后，他才明白要去奥地利。不准巴枯宁携带任何东西。我们资料里记载的最后一项是善良的奥托写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月后写给德累斯顿法院的，信中请求准许给他前委托人“至少送一部分”内衣和衣服，因为他“急需这些东西”<sup>②</sup>。

\* \* \*

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1850年6月14日傍晚，巴枯宁住进了座落在山上的布拉格城堡——赫拉德森。他住的牢房

---

① 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207—209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80—481页。

② 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206，211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363—364页。

在原圣乔治修道院里，古斯达夫·斯特拉卡和阿尔诺德也被关在那里。牢房设在二楼，装有密密麻麻的铁条的窗子对着修道院的花园。院里总是有岗哨。窗台下斜放着一块木板，使犯人连这种阴森的景象也看不到。巴枯宁到后不久，检查团对牢房进行仔细查看，甚至连烟囱都不放心，命令装铁格子。冬季还增加了预防措施。牢房门上的挂锁有两把分开的钥匙，分别由两名军官保存。只有六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场，才能打开牢房。犯人“只有在非常急需时”，才允许每天活动半小时，而且必须在指定的走廊里。不管白天黑夜，哨兵每隔一刻钟都要透过门上的窥孔看看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戴上脚镣的巴枯宁在奥地利当局的心目中竟引起了这样的恐惧。

除此以外，和柯尼施泰因比较，那里宽容、这里苛严。巴枯宁在萨克森是民事犯，这里不然。他受军法审判。这种地位的改变在对他的法律权利和待遇上都反映出来了。他不再有法律代表来为他辩护，也不让他收发书信。但他还算幸运，找到一位和善的账目检查员弗兰茨，代替了以前称职的钱财保管人奥托。弗兰茨被指定为这个案件的负责人。他深为犯人的无人帮助的处境所感动，于是就代他收发书信。海尔维格寄来了二十五塔勒，弗兰茨回信故作庄重地说：“这个犯人犯了罪，我对他仍然很尊敬。只要对他有利而又与我职责相符的事，我样样照办”。弗兰茨和奥托一样，不得不为委托人的乖戾行为而苦恼。巴枯宁不听弗兰茨的“好心劝告”，把那二十五塔勒大部分用来买了昂贵的数学书，结果，连他爱好的雪茄烟也没有钱买了，甚至还忍饥挨饿，因为监狱里的伙食不能满足他的依然很大的食量。他衣着破烂不堪，弗兰茨报告说，他“最大的希望”是想做件睡衣，“因为那件旧的已经破得不成样子”。弗兰茨又收到了从赫尔岑、奥托和德绍的民主主义者寄来的一些钱。巴枯宁最后离开布拉格时，手头还有八十五塔勒和五十五奥地利弗罗林。这笔钱可以证明他的

朋友是很慷慨的，同时也可证明对他的东西检查是很严格的。

奥地利的军事法庭审判程序比萨克森的民事审判程序进行得更为缓慢。巴枯宁到布拉格当天，就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审讯。以后，在长达九个月里，他一次也未受审讯，因为警方对主犯进行审问之前，要取得同谋的供词。直到1851年3月，犯人的单调的生活才被突然打断。1851年3月13日，由于谣传有人要来营救巴枯宁，此说虽无根据、但听来新鲜，于是决定把巴枯宁立即转到奥尔米茨的摩拉维亚要塞。这项决定当晚就执行，十分仓猝，故第二天早上巴枯宁被押到时，要塞的司令官尚未接到通知要招待这位贵客。巴枯宁在奥尔米茨的物质待遇与布拉格有两点不同：一是不但上了脚镣，而且用铁链拴在牢房墙上；二是司令官对他的食量大表示同情，给他备了两份饭<sup>①</sup>。

巴枯宁转到奥尔米茨后，引起了最高当局的注意。一方面，陆军部的官员们仍在整理档案材料；另一方面，帝国内阁由于担心沙皇吵着要回犯人，就发出了对案件进行审理的紧急指示。结果，由弗兰茨主持的一个委员会就加紧审讯。1851年4月15日到18日之间，对巴枯宁提出了150个问题。巴枯宁的回答写进了审讯记录。问题几乎全部集中在他煽动布拉格起义的无效的努力和他同捷克革命者的关系方面。巴枯宁在审讯开始时和过程中一再声明，对于牵连他朋友的问题，他拒绝回答，因为那样做是违背他的原则的。但从提供给他的别的犯人口供来看，原来他们都已作了交待。既然一切或者近乎一切都已为人所知，巴枯宁索性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他的交待比在德累斯顿和柯尼施泰因要直率多了，并收回了他以前所否认的供词，因为坦白交待不会再失去任何东西。他在萨克森曾多少作过一些抗辩，可以对他德累斯顿起

---

<sup>①</sup> 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212—217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365页。



义中那一份责任进行狡辩。在奥地利这样做可就不行了。在《告斯拉夫人书》里，他主张把奥地利从欧洲地图上抹掉。即使毫无别的证据，也可给他定罪，所以无论坦白供认与否，事情都是一样。

委员会对巴枯宁的态度印象不坏。不容抗辩，这一点他是清楚的。他对整个事情多少采取了超然的态度。审讯结束时，问他还有什么补充，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把他留在德累斯顿安德拉泽伊库维茨公寓的衣服和留在柯尼施泰因的书籍还给他。最后，下列声明亦写进了审讯记录：

在此次审讯过程中，米哈伊尔一再声明如下：

〈1〉引渡到奥地利当局以后，他断然决定不发表声明，不回答问题。只有主持审讯的军官对他采取的态度才能使他交待，如果军官易人，他就不再说话；

〈2〉他知道可以对他采取强迫措施，但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只能使他保持沉默。总之，他表现得有勇气，有决断。也很雍容有礼。

审讯以相互有趣的称颂而告结，犯人称颂法官，法官称颂犯人<sup>①</sup>。

\* \* \*

到了5月10日，巴枯宁和外界隔绝已有两年，一年零一个月在萨克森，十一个月在奥地利。他抱怨“全身疼痛”。要塞的司令官发现他“埋头沉思”，而这是一点也不意外的。他保持住不寻常的食量这一点表明：他强壮的体格经受这种每天只有半小时受监督的活动的长期严酷的监禁达到了何等程度。要求得到数学

---

<sup>①</sup> 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217—218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14—462页。

书这件事证明他的思想仍具有足够的活力以应付这种要求严格的麻醉剂。这些明显的表现并不能掩盖他肉体和精神上的缓慢的衰退。这表现在他对事物的冷漠态度上。巴枯宁业已停止反抗，他只有一件武器，那就是保持沉默。他已经绝望，几乎毫无所求。这个衣着褴褛的犯人在奥尔米茨被用铁链拴在墙上还保持着人的尊严和外表形体。1849年5月那几天里，这位年轻的大汉曾鼓动德累斯顿街垒中的起义者进行反抗，如今却成了受折磨的落魄者，这当中真有天壤之别<sup>①</sup>。

在这令人沮丧的第二年的第五天，巴枯宁长期漂泊生涯中的决定性阶段终于来到了。指定的军事法庭于1851年5月15日对被告开庭审讯。弗兰茨向法庭提出一份作为起诉书的报告，这份报告几乎全部是以犯人的自供为根据的。案件已经审理清楚，法庭全体通过，宣判巴枯宁为叛国罪，处以绞刑。具有冷酷的讽刺意味的是，他还被判应付审讯费，但未提要付绞索费。就在公布判决后的同一天，总司令就宣布减刑为无期徒刑<sup>②</sup>。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而且全都赶到这二十四小时来了——这和前几个月无事坐等形成鲜明的对照。几个月前就曾决定：为预防万一，“这个危险的人物”应在宣布判决的当天就引渡到俄国。当晚，巴枯宁由一名军官和八名士兵押送，从奥尔米茨动身，先乘专车，后乘马车前往俄国边界，于5月16日到达奥地利的最后边界城镇克拉柯夫。稍作休息后，押送队又出发，于次日凌晨两点到达边界。六名俄国宪兵和二十名哥萨克士兵在这里等候犯人，已经等了七个星期了。俄国政府是多么迫不及待，而奥地利政府又多么拖拉。

一座阴暗的、荒无人烟的加利西亚边界哨所对这个残酷的场

---

① 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216—217页。

②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59—94页。

面来说倒是很合适的背景。奥地利的脚镣从犯人的脚上卸下来了（巴枯宁后来曾说过，奥地利人也实在太小气了，连脚镣都不当作礼物送给他），又戴上了俄国的更为沉重的脚镣，巴枯宁曾经很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但这件事还伴随着一种几乎令人高兴的感情。经过数月令人无法忍受的单调的铁窗生活以后，任何转移和活动都会给身体带来一种轻松的感觉。十一年后，他又一次站在自己的国土上，置身于说本国语言的人们当中，抑制不住感情上的自我放纵。他惊呼道：“啊，乡亲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很高兴，即使是死在那儿也好。”（这段话源出娜塔丽亚·奥格辽夫之口，是巴枯宁十二年以后告诉她的）对此，感情冷漠的官员回答说：“禁止说话。”<sup>①</sup>

未来的旅行很慢，走了近一个星期。因为那时俄国和西欧不通铁路。犯人和看守人员之间互相害怕是没有根据的。俄国官方说，巴枯宁是一头披着人皮的野兽，到处寻找他要吞食的人，但此时巴枯宁的举动丝毫也不能证明这一官方的神话是正确的。宪兵们也没有表现出革命者所说的沙皇代理人那些暴虐行为。来自华沙的报导说，“与预料的情况相反，犯人表现得十分恬静和有礼貌”，并且“似乎全然听天由命”。在给沙皇的《忏悔书》里，巴枯宁写道，看守人员对他“人道而且宽大”，这和“他预料的恐惧”正好相反。1851年5月11日（按俄历时间推迟十二天），押送队到达彼得堡，巴枯宁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的一间牢房<sup>②</sup>。

巴枯宁性格鲜明突出，这在欧洲人的意识中留下的印象就连牢房的阴影也掩盖不了。巴枯宁在柯尼施泰因时，《德累斯顿日

---

①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87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219页；丘希科娃·奥格辽夫：《日记》，第308页。

② 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219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00页。

报》写道，“巴枯宁似乎就要变成地地道道的神话式人物了”。连续几个月里，神话传得很快。忽而说他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忽而说“俄国烧炭党人”在匈牙利的帮助下，又为他的逃跑进行策划；全欧洲的贵妇人都为营救他而秘密捐款；他因拒绝交待出他的同伴每次受奥地利法庭审讯后均遭鞭答；他在布拉格绝食两周，以结束生命，直到把保尔·德·科克的小说给他看了，才复食；在奥尔米茨，他吞食硫磺火柴头以图自杀，但毒性对他的强健体格未发生效果。这就是当时的一些传闻<sup>①</sup>。

1851年5月，巴枯宁被与世隔绝的无声无息的俄国要塞所吞没。欧洲舞台对巴枯宁的记忆渐渐淡薄了。当初，拿他的名声开玩笑的谣言还不时在流传。说他是俄国间谍的丑闻在俄国要塞里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说他正在某个新的领域里为沙皇效劳。但记忆很快就模糊了，巴枯宁就象一个已经过世的人一样，只活在一些朋友的心中。黑幕已经拉上，遮住了他狂妄的、戏剧性的、潦倒的一生。没有人会想到十年后幕布还会拉开，演出另一出戏。

---

<sup>①</sup> 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213，215，219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7卷第473页；丘希科娃·奥格辽夫：《日记》，第306页。

## 第十七章

### 俄 国

巴枯宁在萨克森和奥地利曾被作为被告对待，受审判罪，其法律程序虽是强制性的，但形式上还是合乎手续的。在俄国，他的地位就大不相同了。早在1844年，他就被缺席审判，判处剥夺一切权利，发配西伯利亚服苦役，后带罪潜越俄国边界。这就足以解释彼得—保罗要塞没有重复在柯尼施泰因和奥尔米茨玩弄司法闹剧的原因。这里，用不着进一步审讯或判罪，只要执行已有的判决就行了。同样，也不急于把他发配西伯利亚。沙皇的意志高于一切法律，尼古拉一世常常喜欢把危害国家的重犯当成他自己和犯人之间的个人争端。巴枯宁被关进要塞，无限期地等待皇上的意愿。

两个月过去了，什么事也未发生。这种延宕可能是由于沙皇尚无抉择或者忙于别的事务，而并非有意采取一种手腕，使犯人受坐卧不安之苦。1851年7月的一天，沙皇的首席侍从武官奥尔洛夫伯爵来到牢房，带来沙皇口信。出乎巴枯宁所料，来人说话口气并不严厉，而是用一种讨好的口气。他向巴枯宁保证说，死刑在俄国是不存在的，叫他不用为自己的生命担忧。然后，他叫巴枯宁给沙皇写一份“他所犯罪行的完整的忏悔书”，写时，要像对神父说话那样来写，而不要像犯人面对法官那样<sup>①</sup>。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00—101，206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70—71页。

如果认为巴枯宁同意这项要求就要受到良心的责备，那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当革命在俄国已经成为具有一定规则的事业时，真正的革命者被捕时拒绝交待有关自己和同志们活动的情况，已成为一条纪律。但是，如果认为巴枯宁已经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准则，或者认为奥尔洛夫的要求会在他思想上引起坚持原则和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那就是犯了时代的错误。两年来，巴枯宁无事可做，或者说他是把时间消磨在别人不屑一顾、只有他自己才愿意阅读的书籍上面。目前，终于交给他一项任务，这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而且自己亲手去完成，也许对他的命运会发生影响，连他的虚荣心也受到感动。这项要求的来头、所用的宽和的言词以及几乎是尊重的态度使他受宠若惊。作为一个著作家（因为巴枯宁认为他具有很高的文学才华），他感到宽慰的是，他被要求写一份性命悠关的辩护词给皇上过目。不管怎么说，和萨克森以及奥地利那些冗长的、无聊的审讯比起来，这总是一种令人高兴的变化。于是，巴枯宁欣然命笔。他用两个月的时间精心写就一份约三万字的《忏悔书》，呈递沙皇。他虽然不止一处提到这项任务很难，但很明显，他写起每一页来都津津有味。就其清晰程度和表达方面来说，这份《忏悔书》在他作品中堪称杰作。

巴枯宁的《忏悔书》于1921年首次问世，恰好是写成后的七十年。这是一份不寻常的历史文件。作者在开头就得意地宣称，虽然一切都完了，但荣誉却完整无缺；而且他决不会点名出卖信赖他的任何人。接着他就详细地、大体上准确地（虽然不是面面俱到）叙述了自1840年6月离开彼得堡起到1849年5月在德累斯顿被捕时这段时期的活动，言词卑躬屈膝。巴枯宁承认他该受俄国法律最严厉的惩罚，甚至体罚。他的思想和行为“荒唐透顶，无知已极，胆大妄为，罪行累累。罪在反对陛下，吾之君父；罪在反对俄国，吾之祖国；政治上和道德上犯法，上抗天意，下悖人

情”。起先，他昧着良心，作恶多端，而现在他只能为自己被捕而感到欣慰，因为他来不及干更多的坏事就被捕了，从而结束了他“懒散、无聊、罪恶的生涯”。他在沙皇尼古拉面前，就像“一个已经疏远了的、误入歧途的浪子，回到了受辱的、面带怒容的父亲面前一样”。《忏悔书》的末尾签名是：“忏悔罪人，米哈伊尔·巴枯宁”。

但是，《忏悔书》的要害是巴枯宁对德国人的厌恶和对斯拉夫人的忠诚。不管怎么说，这是个能取得沙皇欢心的主题。文中处处都无情地嘲弄德国人。巴枯宁几乎在开头时就提出反问：“难道还有什么人比一个德国教授、或者说任何一个德国人更为可鄙、更为可笑吗？”他的蔑视所及的范围更为广泛：

在西欧，腐败、衰朽、不信仰上帝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堕落举目皆是……文明已成为堕落的代名词，成为无能的代名词；在普遍的堕落中，唯有那些法国的而不是德国的粗野的不开化的称为群氓的群众，尚保存着生气。

甚至德国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在国内主张自由，但却妒忌波森或波希米亚的斯拉夫人以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丹麦人的自由。在游荡期间，他对德国人十分厌恶，以致他“不能有耐性和德国人说话，也不能听到德语或德国人的声音”。他回忆起一次一个德国乞丐向他乞讨，他费了好大劲才忍住没打他一记耳光。

他煞费苦心地对德国人的厌恶和对斯拉夫人的火一般的热情形成了对照。甚至当他表示要联合普鲁士反对俄国时，也没有忘记，“一旦德国人胆敢踏上斯拉夫土地，他就会成为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斯拉夫人的天职是“复兴腐败的西方世界”。巴枯宁迫不及待的要求是把“所有的斯拉夫种族从外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马扎尔人、沃拉基亚人，甚至也许还有希腊人都要

归入自由斯拉夫联邦，并与腐朽的西方文明对着干，建立一个伟大的东方自由国家，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巴枯宁的计划里的确包含着俄国革命和推翻沙皇，但是关于斯拉夫伟大前程的这些见解至少表明他对俄国并无坏心<sup>①</sup>。

如果有人相信通过分析某一行动就可以把《忏悔书》分解成单一的或一连串的动机，那么《忏悔书》对这些人来说肯定是一个不能解释的谜。最简单的假设无疑是把《忏悔书》看成是伪装的杰作，旨在欺骗尼古拉，并诱使他减轻犯人的罪过。这种动机在《忏悔书》的许多地方是显而易见的。但就全文来说，也有一些理由说明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忏悔书》有些段落写得非常直率，与这种看法是完全相反的。1848年，巴枯宁对法国工人的热情表示钦佩，并不能取悦于尼古拉，这与他大胆宣称俄国的许多弊病是由于没有言论自由不能取悦于尼古拉一样。他甚至低声下气地把他的错误归咎于“哲学病”，但他还是坦白地说，他怀疑他“这种病是否已经痊愈”。最重要的是，他一再声明不泄露同伴的姓名，这也许是对自尊心的一种安慰，是同意写《忏悔书》的一个借口。但尼古拉却认为——不会有别的什么看法——此乃抗上之意。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因素，认为《忏悔书》是精心炮制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东西，这种假设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从巴枯宁的性格来看，他的天性并不是一贯弄虚作假的，在漫长的饱经沧桑的生涯中，他虽然经常骗人，但他总是先骗自己，再说，他尔后所承认的事实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他从西伯利亚写信给赫尔岑说，他详细地告诉尼古拉“我在外国的全部生活，计划、感想以及感情，当然有些保留”。自此，在他现存的书信中，没有进一步谈到《忏悔书》。在风烛残年时，他曾有一次谈到《忏悔书》，说那是“一个大错”。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他从未轻易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99—207页。



举地争辩说，《忏悔书》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的策略<sup>①</sup>。

如果把巴枯宁在彼得—保罗要塞写的《忏悔书》和在柯尼施泰因写的《政治忏悔书》放在一起，就不难看出巴枯宁思想的演变。尽管两个文件的体裁、语气和细节都不尽相同，但都是同一思想的产物，谈的是同样的问题。德国人和斯拉夫人之间根深蒂固的仇恨——国际形势中最基本的事实——几乎是用同样的字句来描写的。二者的目的只有一个：解放斯拉夫人以及建立斯拉夫人的自由联邦。但是，巴枯宁在《政治忏悔书》里把德国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仇恨当成是与德国民主义者合作实现斯拉夫自由的一种令人痛心的、暂时的障碍；而在《忏悔书》里，他却接受甚至欢迎这种仇恨，认为它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并表示要把斯拉夫人的解放寄托在发动一场俄国革命上。如果以此来说明巴枯宁被捕前的抱负，从历史上看，那是不真实的，但却正确地表明了他写《忏悔书》时的观点。在被关押的两年期间，究竟他对欧洲的趋势了解得准确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至少肯定知道革命的全面失败和反革命的全面胜利。甚至象赫尔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连牢房里面是什么样子也未见过，但却被悲观主义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巴枯宁的情绪更低沉一点的话，那是可以原谅的。和赫尔岑一样，他对西欧表示失望。失望中，他转而对俄国重新怀抱希望。自蒲鲁东时代以来，他从不相信立宪民主（在《忏悔书》里有一段，他振振有词地表示对议会和代议制政府的蔑视），在赫尔岑之前，他就禁不住考虑开明的独裁政府的种种可能性，即使不赞成，但无讨如何也是出人意料地容忍这种可能性。几年以后，赫尔岑也走上了这条路。

在《忏悔书》结尾时，他提出两项请求。他乞求不要把他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366页；罗斯：《苦役与流放》（1926年），第5期第148—149页。

“永远关在要塞里枯死”。俄国对政治犯的通常处理方式是流放西伯利亚，那里是几大充军地之一，或在矿里服苦役。单独监禁是外国的东西，德国的方式，俄国一般不用，除非作为临时办法。送他到西伯利亚去吧，苦役越苦，他越愿接受，因为那样他就更容易忘掉自己。他还哀求沙皇“不要因为他在德国犯罪，而用德国的方式来处罚他”。巴枯宁为他这句警句而得意。好象以后对朋友还重复过这句话。两个下一辈的传记作家曾从《忏悔书》里只引用这句话，似乎有点断章取义。

另一项请求同样是有意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巴枯宁和他年轻时代的家庭已中断联系。他最后几封家信是1845年在巴黎写的。信中抱怨他前几封信没有回音。此后双方都未通信。俄国人和在外国一个出了名的革命者通信是很危险的，即使这个人他们的儿子。在那些动乱的年代里，巴枯宁本人已深深陷入另外一些事务，不能多想曾经和他相依为命的那些人。牢房的寂寞和回到故土使得这些人又一次在他脑海里出现。他总是把普列姆希诺庄看成是俄国的核心和精髓。如今他这条大汉成了孤单一人，逐渐摆脱了近几年来的强烈的感情，百无聊赖，就转向甜密地、深切地怀念童年的生活。他恳求准许他“最后一次”探家，和家人告别——即使不能全见到他们，无论如何要见见“双亲以及那个我还不知道是否仍然活着的、最喜欢的妹妹”。他最后说，如果这两项请求被恩准，他会“感谢上帝因为上帝把我从德国人手中拯救出来，交到恩重如父的陛下的手中”。

《忏悔书》由奥尔洛夫的一个秘书用手书誊写出来，及时呈交沙皇。沙皇特别认真地看了《忏悔书》。易为谄媚所动乃人之本性，即使有正当理由怀疑阿谀是否出自真心，但听起来也令人快慰。这个曾经向欧洲半数的王权宣战的前炮队旗手居然如此无能地、卑躬屈膝地拜倒在沙皇脚下，使得沙皇感到手中有权是令人快慰的事。这位傲慢的、信口开河的叛逆者用卑下、悔恨和无

耻吹捧的语言给他写《忏悔书》，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巴枯宁还离开正题，带着感情回忆尼古拉一次巡幸炮校学员的夏令营时的情况，说是圣上驾临，“群起欢呼”，“肃然起敬”，这使他备感嘉慰。尼古拉对这样的恭维话虽习以为常，但这些话竟出自米哈伊尔·巴枯宁之口，还是第一次，他很开心，由于心爽意快，他读起《忏悔书》的叙事部分比预想的更为入迷。特别是读到卑劣的德国人性格和德国哲学以及西方文明的堕落的那些段落，他热烈地表示赞同。并在这些段落上加上旁批，如“正确”，“千真万确!!!”“无比正确!!!”，或者简单地写上“注意”。他读完后，在第一页上给他的继位人、未来的尼古拉二世写上眉批：“此件值得一读，新奇而又有启发”。

对巴枯宁的两项请求有待作出决定。尼古拉在《忏悔书》的旁批中简单地写道：“如果真心悔过，每个犯人均可得救”。但原则还是要坚持的。再说，巴枯宁拒不交待同伴，他是否真正悔过还值得怀疑。尼古拉认为不必草率从事。犯人目前可继续“关”在原处。但没有理由不让他见家里人。巴枯宁的奴颜卑膝得到了好感，奥尔洛夫伯爵给亚历山大·巴枯宁发一封公文，通知他说，沙皇甚为嘉慰，恩准他携女儿塔蒂安娜前来看望目前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儿子米哈伊尔。这是六年多以来家里第一次从官方得到关于米哈伊尔的消息<sup>①</sup>。

\* \* \*

最近十年来，普列姆希诺庄的年轻一代已经分散。瓦瓦娜回国后，已和丈夫和解，从而证明父母关于米哈伊尔是唆使她背叛丈夫的罪魁的看法是正确的。曾经一度使别林斯基和波特金着了迷的美貌的亚历山德拉和一个名叫沃尔夫的骑兵军官结了婚，成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99—207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442页。

了一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的良母。尼古拉也结婚了，住在普列姆希诺庄邻近的一所庄园里，过着无可非议的体面生活。伊利亚曾要求和瓦瓦娜的丈夫决斗，引起了家庭对他反感。他目前安安稳稳地在喀山种地。曾在特维尔逃离学校的三个男孩，仍是二十几岁的活泼的青年。曾经和米哈伊尔同去德国的保罗，聪颖过人，观点不落俗套，这方面和米哈伊尔最接近。朋友们都很敬畏保罗，把他看成是“彻头彻尾的黑格尔主义者”。但他在行动上却是十足的正统派。他在克里米亚的首府辛菲罗波尔任职数年。阿列克斯排行最小，也最懦弱，有一段时间只有他一个人还呆在普列姆希诺庄。亚历山大排行第九，他可算是家里的一个捣乱鬼，他放弃敖德萨大学的法学讲师的职位，和一个已婚的女人出逃。他刚刚摆脱了这个逆境以后，却又迷恋娜塔丽·贝叶尔，这样做虽引起的反感较少，但却同样损害了自己。贝叶尔一家祸从天降，亚历山大德拉死了。娜塔丽虽已三十五岁，但却像二十岁刚出头那样，易动感情，不顾后果。她先后和尼古拉·斯坦凯维奇以及米哈伊尔搞过恋爱，亚历山大还不及他们两人，但也对她急于讨好卖乖的行为很快就生厌了。

六年来，塔蒂安娜一直很不幸而且孤寡。她照顾双亲，有时还充当各自忙于事务的兄弟姐妹之间的联系人，并且时常挂念别人都乐于忘却的米哈伊尔。她认为，米哈伊尔是“这个家的台柱子，没有他，我们家就各奔东西了”。她开始信教，并动笔写了许多关于上帝和宗教的事，也写到遥远的、更为光明的未来，说道，那时她爱慕的兄弟姐妹，甚至“远离我们但仍记着我们的他”都会团聚，“充满着感情和对上帝的信念，过着我们分别前过的那种生活”。

岁月的流逝并没使塔蒂安娜减轻烦恼。对屠格涅夫的一时迷恋已经过去，但并未忘却，而且留下了无声的火一般的热情，这是一种受骗的感情，热望得到的不是激起感情的手段，而是要得

到爱情的本身。在给保罗的一封信中，她偶尔谈到了这件事：

我对屠格涅夫的爱情你是不会理解的。你可以说这是愚蠢的行为，你怎么说都行。我过去完全沉浸在爱情中。我度过了那些甚至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很快乐的日子之后，我才意识这种爱情……那时，我热切地生活着，每根血管都很有生气地跳动着，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很美。我现在为什么要抛弃这一切呢？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快乐，保罗，我告诉你我想些什么，好吗？我认为对一个女人来说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这种爱情更为快乐、更为幸福的事了。没有，绝对没有！不论知识还是思想都不能代替它，她随时随地都需要它，她所渴望的幸福将永远不会得到满足。

塔蒂安娜的健康受到了威胁。她在克里米亚住了四年，有时住在保罗那儿；有时住在阿列克斯那儿。就在此时，她最后一次绝望地希图获得幸福。她爱上了，或者说自己想象中爱上了一个有点名气的音乐家谢罗夫，谢罗夫似乎已被一个无耻的女教师缠住而不能自拔。塔蒂安娜相信自己能够用爱情把他挽回。她的感情里也许是怜悯多于热恋。但她的尝试失败了，因此也就死心了。1851年夏天，她从克里米亚回到普列姆希诺庄。三个月后，就接到了彼得—保罗要塞发来的传票<sup>①</sup>。

老亚历山大·巴枯宁时年83岁，双目失明，去首都有三天的旅程，非他力所能及。于是就让米哈伊尔的二弟代劳。尼古拉和塔蒂安娜于10月底到达彼得堡。这是十一年后他们第一次见面，谈了些什么，没有记载，但巴枯宁后来写道，这次见面“又一次使他内心感到平静和温暖”。对塔蒂安娜来说，这次见面给她“带来了新生，带来了照亮我们生活的希望”。母亲以少有的慈爱的语言给他写了一封信；老亚历山大经劝说才口授了一份祝福。

---

<sup>①</sup>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268，277—440页。

米哈伊尔和家里的正常通信有时因被扣押而中断，双方都知道书信会受到官方检查，故迫不得已，写信都很谨慎。被检查后剩下的信，只是谈谈家事，都是些老生常谈。特别是米哈伊尔的信，表现出不常有的谦恭和博爱的情绪。他向父母承认，他没有尽到一个孝子的“神圣义务”，所幸的是他的“错误”只是害了自己，未连累别人。他恳求兄弟们要把他的错误引以为戒，不要走他的路；他恳求瓦瓦娜原谅他对她丈夫的不友好行为。保罗抱怨说，他简直不能相信这些信是米哈伊尔写的。但这些信足以引起久已淡薄的记忆和恢复长期中断的联系。对米哈伊尔来说，普列姆希诺庄又变得和他孩提时代一样，对他“至关重要”。每当他提笔给兄弟姐妹写信时，就感到“更为新鲜，并年轻了许多”。他们也认为米哈伊尔不再是已被忘却的幽灵，而是个活人，虽然暂时不在眼前，但的确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一个有下落的人<sup>①</sup>。

彼得—保罗要塞是用来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在整个十九世纪，以其牢房因阴暗、潮湿、有害健康而臭名远扬。从奥地利监狱转到俄国监狱，巴枯宁在物质方面吃了苦头，但在其他方面，而且巴枯宁认为是更重要的方面，却更满意一些。他经常称赞看守人员是讲“人道”的，这并不全是假话。除了原来就给他看的小说和科学著作以外，还允许他收阅一份俄国报纸，几种俄国杂志。甚至还可以了解到《两大陆评论》<sup>②</sup>所反映的欧洲思想和政治观点。他被监禁的第二年冬天，普列姆希诺庄给他寄来了一件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07—208，222—223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447，469，478，485页。

② 《两大陆评论》，1829年起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一家资产阶级的文艺政治性双周刊。——译注

松鼠皮镶边的睡衣，还有裤子和靴子。犯人的牢房里还挂一个鸟笼，里面放两只金丝雀，以供娱乐<sup>①</sup>。

1852年7月，塔蒂安娜单独又一次来探视米哈伊尔，1854年2月塔蒂安娜和保罗同来探望。就记载来看，这第二次和第三次探监是他被捕后的转折点。他的健康第一次受到严重的损害，患有痔疮和坏血病。狱中饮食限量，他那强健的和爱动的身体所不可缺少的运动全部停止，使他身心失调。他抱怨的病状有：牙齿开始脱落，常常头痛不止，气短，耳鸣如听沸水之声。巴枯宁此时齿落嘴瘪，胡须蓬乱，面容浮肿，有气无力。他进萨克森监狱时体格强壮，是个多少带点纨绔子弟派头的青年魁梧大汉，前后一比，判若两人。他照照镜子一看，不禁吓了一跳<sup>②</sup>。

塔蒂安娜和保罗在彼得堡停留了一个多星期，获准几次见到米哈伊尔。米哈伊尔利用这几次见面的机会，把用铅笔写在从一本书上撕下的几页纸上的三封短信成功地交给了塔蒂安娜，未被发觉。第一封和第二封短信是用法文写的，第三封是用俄文写的。这三封短信是米哈伊尔整个囹圄生活中唯一畅所欲言的地方。短信透露了银铛入狱者的绝望和无能的心理以及过了数年与世隔绝的铁窗生活，常为鸡虫得失而动辄发怒的情形。

身入囹圄，终日面对四壁，这究竟是什么滋味，你永远也不会理解。我被打得一败涂地，永远失去了战斗力，变成了奴隶。即使在牢房里也能听见即将来临的战斗的隆隆之声。这场战斗将决定人类的最根本的利益，而我却无能为力，保持沉默。我思绪万千，有些想法至少是很妙的，但一条也不能实现。尽管表面上冷若冰霜，心中却仍然想着爱，是的，是爱。但这种爱却不能施于任何事物，任何人，我对神圣的事业充满了献身和英

---

①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1卷第330—332页。

②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492页。

雄主义的精神，但我的热情却在我仅有见证人、仅有的心腹朋友——光秃秃的四面墙壁里化为乌有。

这就是我的生活！但比这更可怕的念头是：这种生活到头来肯定要把人变成白痴。这就如同把一个最伟大的天才关在像我住的监狱里，几年之后，就是一个拿破仑也会变成傻子，耶稣基督本人也会变坏。我既不像拿破仑那样伟大，也没有耶稣基督那样无限仁慈，用不了那样长的时间就会变成一头野兽。

他甚至觉得塔蒂安娜也是冷漠无情，对他听任不管，她“太胆小、太偏狭”，不能替他向当局提出有力的申辩。

你已经陷入了可悲的冷漠的境地，掉进了完全属于基督教徒的那一套顺从的泥潭。当然，你会作出一些努力，但第一次失败后就会把你吓倒。除了相信上帝，别无任何希望。我不是基督教徒，我不信顺从。

在第三封短信中，他骂自己是个利己主义者，并宣称他确信“他对普列姆希诺庄的美好命运不再麻木不仁了”。他第一次注意到塔蒂安娜面带病容、有气无力，就请求保罗带她找位彼得堡名医看看<sup>①</sup>。

\* \* \*

几个星期后，即1854年3月，巴枯宁从他呆了近三年的彼得—保罗要塞转移到拉多加湖畔的什吕谢尔堡监狱。这是因为克里木战争迫在眉睫，得知英国舰队要轰炸彼得堡而采取的防预措施。但是，巴枯宁家里当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此事与国家大事和什吕谢尔堡的犯人都无关，那就是亚历山大·巴枯宁于12月去世，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43—248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275页。



终年88岁<sup>①</sup>。

亚历山大·巴枯宁的妻子成了寡妇，她虽然一直忠实于丈夫，丈夫的去世早就是预料中的事，但丈夫一死却把她从终身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了。在四十四年的婚后生活中，前三十年尽心竭力养儿育女，后十四年忙于照顾多病的、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瓦瓦娜·巴枯宁已年逾花甲，但却发现了新的力量的源泉。在整个婚后生活中，她最远就到过特维尔和莫斯科，多年未离开普列姆希诺庄。丈夫去逝三个月后，在阿列克斯的陪同下，她乘新通车的火车去什吕谢尔堡看望米哈伊尔。她那颇为高傲的长子，现在却备受屈辱，唤起了她的母爱之心。在其后两年中，她始终不遗余力地向当局为儿子辩护，以减轻他的罪过。

时运似乎还算亨通，1855年2月瓦瓦娜去彼得堡的前一个月，尼古拉一世驾崩，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按照传统，新君登基，就要大赦天下；亚历山大·巴枯宁去世不久，儿子们志愿参军，五个兄弟为沙皇服役对于犯人请求赦免是很有力的；再说，亚历山大的侄女、米哈伊尔的同房堂妹叶卡特琳娜·巴枯宁已当上前线医护机构的首长，她以这种身份在宫廷里颇为得宠。她被请求出面为堂兄周旋。

瓦瓦娜·巴枯宁探监后在彼得堡立即写了第一份请求书，请求沙皇恩许米哈伊尔“和弟弟们一起，站在陛下英勇的军队前列，光荣死去；或者用鲜血来争得配做我的儿子的权利”。但没有答复。她暂时感到满足的是，她从普列姆希诺庄给米哈伊尔带来了干酪和蘑菇。1856年她又一次来到什吕谢尔堡，她为儿子的健康急剧衰退而吃惊，请求给他做点事，为他锻炼身体提供方便，在牢房里放上一条木工条凳。这份请求书是写给沙皇本人的，但又遭拒绝。然而这个倔强的母亲并不灰心，她于8月份又第三次来

---

<sup>①</sup>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275页。

到什吕谢尔堡，提出一项新的释放她儿子的请求，这份请求书是写给多尔哥鲁科夫公爵的，他继奥尔洛夫为沙皇的侍从武官。她用其余五个儿子的生命来担保米哈伊尔的从善行为。这五个儿子有“三个都当了孩子的父亲”，他们无疑都忠于皇上。最后一次探监是在11月份，阿列克斯和叶卡特琳娜·巴枯宁来探望米哈伊尔。母亲再一次向新任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公爵提出请求。米哈伊尔后来告诉赫尔岑说，由于他不堪忍受牢狱生活，曾求阿列克斯给他带毒药来，肯定就是这一次。阿列克斯说，如果他们的努力再次失败，他就这样做。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这次见面，米哈伊尔设计了一套暗号交给阿列克斯带走，这样，请求书的结果就可以在无害的家信的伪装下透露给他<sup>①</sup>。

米哈伊尔从不爱母亲，母亲在他年轻时对他亦无一般母爱，而最终却多亏母亲救了他，这一点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她全力以赴，尽可能动员各种影响，这些影响都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点是很清楚的。1857年2月初，巴枯宁获准给沙皇写一份请求书，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如果请求书措词得体，不会没有答复。他对这项任务的确感到紧张，对多尔哥鲁科夫说，由于他受到长期监禁，变得很迟钝，实在难以动笔。他既怕写得过头，又怕写得不足，因而十分苦恼。但是，一旦动起笔来，写得却相当流畅。他的一生就此结束了，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不愿死在囚牢里；他已经蒙受了极大的屈辱，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他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他以前还未这样做过。他绘声绘色地写到前沙皇的宽宏与仁慈，写到他的错误和罪行，并且由于这些错误和罪行，以致他不能像弟弟们那样拿起武器来证明他对沙皇和国家的忠诚，他

---

<sup>①</sup>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276—281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69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505—562页。

从未像现在这样诅咒自己的错误和罪行。他虽然年岁不大，只有四十四岁（实际上还不到四十三岁），但他知道他活不长了。他只有一个愿望：“让我自由地死去，看一看晴朗的天空和新鲜的牧场，看看我父亲的房子，到父亲墓前祭拜，以余生来孝敬为我历尽千辛万苦的母亲，然后死得其所”。

犯人的请求书写于1857年2月14日，正好一个星期后，他接到通知，说沙皇龙颜大悦，降旨由他自己选择，或仍坐牢，或终生流放西伯利亚。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出路，并请求允许他在去西伯利亚途中，在普列姆希诺庄停留一天，和以后再也无望见到的家人告别。请求获准。于是，他被押到彼得堡，由一名上校和两名宪兵押着，坐上挂在去特维尔运货列车的一个特备的装货车箱里。第二天，仍由宪兵押送，坐雪橇到达普列姆希诺庄<sup>①</sup>。

米哈伊尔·巴枯宁离开他称之为家乡的地球上的那块地方已将近十七年了。他去世前十九年中从未回来过。弟弟姐妹全部都来迎接他。他们近来都梦想全家团聚这一天，共同回忆他们孩提时代的最神圣的往事，这种梦想就像奇迹一样，终于实现了。米哈伊尔获准探亲，就把这个场面戏剧化了。家人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等待着他回来的。但现实的本身却有其更完全的戏剧性的效果。米哈伊尔一踏上这块圣地，就失去了勇气。这次探亲和年轻时探亲之间形成了鲜明的、惨痛的对照。年轻时，他是才华横溢、踌躇满志的青年叛逆者，而现在，却是个在别人监视之下的、颓丧潦倒、未老先衰的囚徒，他在压迫者面前忍气吞声，并为虚幻的躯体的自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家里人以前把他当成领袖和英雄，他们在他们的心目中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巴枯宁见到这些人，一下子就变得麻木不仁了。他不随便、也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70—279页。

冷淡地看着那些可爱的面孔和曾经很熟悉的场面。大部份时间都用来和女佣人打纸牌，成了“呆子”。他早就预见到这一点是长期监禁的必然结果。第二天早晨，押送人把他带走时，他仍然冷漠不语<sup>①</sup>。

后来，亚历山大去伦敦看过米哈伊尔，保罗去意大利看过他。家里其余的人都是最后一次和他见面。他们看着雪橇慢慢地消失在雪地里。

---

<sup>①</sup> 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563页。

## 第十八章

### 西伯利亚的冒险

这队人马乘驿站雪橇行进在去西伯利亚的大道上，走了八天到达西西伯利亚的首府鄂木斯克。卫兵们在这儿离开犯人回彼得堡。临走前，巴枯宁托他们带两封信，一封给多尔哥鲁科夫公爵，一封给他母亲。第一封信谀词连篇，这已成了他第二天性。对公爵为他作“有力的调解”表示“真诚的、深深的”感激。第二封信抱怨说给他的路费不够用。然后，巴枯宁前往托木斯克。他被关了八年，第一次成为自由的人。他被发配去居住的地方是托木斯克省一个偏僻之处。但是到了托木斯克镇时，他就称病，并据此获准留住这个镇上。巴枯宁不失时机地得到第一次减刑<sup>(1)</sup>。

十九世纪中期的西伯利亚社会分为三种人：官员、商人和政治流放犯。此地因人烟稀少，地方又十分偏僻，因而不可能有排外性。这三部分人自由相处，而且因为流放犯往往是些有才有德之士，故受到破格的、但也是普遍的尊敬。他们虽是政治流放犯，但却是西伯利亚文明的精华。巴枯宁从容地进入了这个光怪陆离、逍遥自在的社会。他在西伯利亚的头两个月是体力上和精神上的恢复时期，受了伤害的、麻木的驱体和灵魂又开始有了生气。

但是，由于恢复了生气，随着牢狱里的往事逐渐淡薄，眼前

---

1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296，310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79—280页。

的生活条件也就越发令人厌倦了。更为难忍的束缚肉体的限制代替了囚笼。他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所能寻得支持的范围实在小得惊人。政治流放犯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巴枯宁不可能指望无限期地靠普列姆希诺庄的资助过活。有一点他是怎么也不会改变的，那就是他仍坚定地相信，只要境遇改变，他就发财致富。当时勒拿河的金矿正在大力开发，金子是西伯利亚人开口就谈的话题。巴枯宁很快就相信，对他这样正直的人来说，这个新的工业是一种谋生之道。但他住在千哩以外的托木斯克，而且活动范围严格地控制在三十俄里之内，勒拿河采金地对他又有什么用处呢？8月，他提出申请取消三十俄里的限制，要求允许他在西伯利亚自由行动，以便减轻家庭负担。申请书提交到彼得堡，并附有当地警方长官的证明书，证明申请人已“真心诚意，洗心革面”。但多尔哥鲁科夫认为“不便”照准这项请求。“至于说家里出钱维持他生活一事”，他随便断言说，“那倒也不会使他们破产”。巴枯宁只好安下心来，准备在托木斯克这个小天地里度过在西伯利亚的第一个冬天<sup>①</sup>。

还有一个能挣碗饭吃的手段，他在莫斯科曾经采用过，但那时没有成功，那就是他可以教书。巴枯宁和一个叫托尔的波兰流亡者开始交上了朋友，这个人常借酒消愁，以排解西伯利亚单调的生活，他就是靠教书来维持生活的。托尔的学生中有两名是一个长住西伯利亚的波兰人克萨维里·克维特科夫斯基的女儿。巴枯宁提出教这两个女孩子法语。这是个和睦的家庭，住在托木斯克郊区一所小房子里。巴枯宁一有空就身不由主地向这所小房子走去。因为他很少有什么事情要做，所以便成了一位常客。这是巴枯宁近十年来第一次和人亲热相处，第一次和女人接触。

---

<sup>①</sup>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298，427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82—284页。

米哈伊尔·巴枯宁一生中已经习惯女性对他的崇拜，这是他天性不可缺少的。年轻时，他足足享受过一番，虽然因为阳萎使他没有把感情倾注在某一个女子身上。出狱后，他成了一个十分孤独的人，被抛弃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小镇上。他完全有可能爱上同情他的遭遇的第一个漂亮女子。克维特科夫斯基姐妹中年长的安冬妮正好符合这些条件。冬天还没有过去，巴枯宁就向安冬妮求婚，女方果然同意了<sup>①</sup>。

安冬妮·克维特科夫斯基年方十八，十五年后依然容颜不衰，十分迷人。但是一旦把她的相貌记载下来，要描写得完美无缺，那就太难做到了。她说过的话没有人记得起来；她写过的东西（除了一封无关紧要的信以外）没有保存下来。她思想感情又不随便外露，许多人都怀疑她是否有深刻的思想和深切的感情。结婚一年多以后，巴枯宁吹嘘说“他俩志同道合”。一个没有偏见的旁观者记载道，“她对社会思潮没有多大兴趣，却醉心于时装”。巴枯宁自己一次曾开玩笑说，她一生中读过的唯一的一本书是《轰动的审判》，而且只是为了看看插图。晚年，有些人看到这对夫妇在一起，实在想不出作何解释，只好杜撰出一些无稽之谈：说巴枯宁和安冬妮结婚是为了“把她从一个不怀好意的、无耻家伙的纠缠中解救出来”；或者说是为了消除当局的怀疑，为他出逃铺平道路。实际上，即使单从安冬妮一方来说，他们的结合也不是不可解释的。天性顺从的女人只是要个男人来决定她们的命运，而决不是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安冬妮就是这样的女人。托木斯克适龄的求婚者甚少，巴枯宁虽已中年，不修边幅，牙齿脱落，但仍保持引人的魅力，况且，他还是个俄国名门的长子。安冬妮的特长，包括爱情方面在内，是有限的。但尽管如此，只要有人看中了她，她就会把那些特长发挥出来，使人高兴。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84-285、367-368页。

婚期逼近了，可又一次出现了紧迫的经济问题。当局为了帮点忙，愿意任用巴枯宁在行政部门当个“第四等级的办事员”。担任这个职务虽然有可能把他调到他想去的西伯利亚的首府伊尔库茨克，但接受这样的条件来混碗饭吃，对一个姓巴枯宁的人来说未免有失尊严。因此，巴枯宁拒绝了这一任命，于1858年夏末和安冬妮结了婚。岳父和巴枯宁的弟弟们给这个新婚家庭多少资助，至今无案可稽。他们家不会增加吃饭人口这件事，安冬妮是否知道也还是个疑问。但是巴枯宁真是乐不可支。

〔婚后半年时，他写道〕她无忧无虑，快乐得像个孩子。我要保证使她成为我晚年最好的伴侣<sup>①</sup>。

\*                     \*                     \*

现在，一个新的、显要的人物出场了，这就是巴枯宁的远房姨表兄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将军。这位将军在东西伯利亚当了十年总督。他在阿穆尔河河口创建了尼古拉耶夫斯克港，用以开展俄国的对外贸易，还于1858年初和中国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攫取了这条河流北部和西部的全部领土<sup>②</sup>。他

---

①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428页；鲍勒：《往昔》（1907年7月），第75—76页；阿尔诺德：《新评论报》（1891年8月），第594页；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108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300、368页。

② 指1858年5月28日穆拉维约夫迫使清朝黑龙江将领奕山签订的《璦琿条约》。该条约是沙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巴枯宁站在沙俄侵略者的立场上，曾吹捧穆拉维约夫是一个“真正天才的行政长官”，把他的侵略行径称之为“伟大的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译注



为国立下了这些功劳，使他形成了某些怪僻的性格和见解。为庆祝他对中国人的胜利，穆拉维约夫将军启奏沙皇，要求赦免四名政治流放犯，其中包括巴枯宁。即使他的威望也未能使奏章免遭驳回。1858年底，穆拉维约夫巡视托木斯克，巴枯宁和他第一次见面<sup>①</sup>。

年迈的瓦瓦娜·巴枯宁一定为不幸的儿子向她的表侄、有权有势的总督求过情，这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光是家庭影响并不能解释这两个人之间所产生的那种不寻常的互相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后来受到他们朋友们的强烈指责。一个是刚刚吞并一大片领土的、独断专行的帝国主义分子，一个是毕生反对一切政府的、一刻也不能安宁的革命者，在西伯利亚的那种不正常的条件下，他们之间居然能找到即使是暂时的几分共同点，这件事可以部分地用当时的政治状况来解释，也可以部分地用他们都具有轻率举动的禀性来解释。

尼古拉一世已在丑恶的克里木战争时很不光彩地归天了。在军事失败的刺激下，俄国开始朦胧地感到民主的愿望。亚历山大二世优柔寡断，一心急于取信于民，表示倾向于满足这些新的愿望。宫廷和知识界从沙皇那里得到暗示，开始讨论诸如解放农奴、重分土地和实行地方自治的宏伟方案。穆拉维约夫很自然地站在这—时兴思潮—边。即使在统治集团中间，俄国一直不乏开明人士。叶卡特琳娜一世曾就改良刑法问题和伏尔泰通过信；亚历山大一世曾起草过模范宪法。穆拉维约夫和他们一样，不让理论打乱他意志的实现。但他却发表了受人尊敬的一些原则。因为他不能容忍除自己以外的暴君，不能容忍除执行自己命令以外的任何官僚，所以他自然地被认为是反对专制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只要

---

①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308页；斯切克洛夫编：

《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368页。

政治流放犯不和他作对，他就会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而赢得有主见和宽宏大量的名声。他姨表弟那些臭名昭著的罪行使得这位保护人更为引人注目，穆拉维约夫喜欢摆出戏剧性的姿态。

巴枯宁所处的地位使他对这种保护所带来的好处很敏感。他自我欺骗的性格并没有因为吃苦头而有所收敛。他的老友赫尔岑现在住在伦敦，在那儿办了一份俄文杂志《钟声》。当《钟声》开始攻击穆拉维约夫时，巴枯宁就跳出来为其保护人辩护。写了三封信，足足可以编成一本小册子。他认为穆拉维约夫“克己为人，毫不自私，慷慨大方”，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朴素的民主派”、痛恨特权阶级、专于博爱的“革命者”。他向赫尔岑保证说，穆拉维约夫是“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毫不夸张地、不折不扣地称之为我们的人的唯一在俄国掌权的人”。

但巴枯宁这种糊涂观点用轻信和感恩来解释都是不充分的。穆拉维约夫体现了巴枯宁政治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明确的阶段。在写给沙皇的《忏悔书》中，巴枯宁大胆地向尼古拉一世提出要尼古拉担任可使欧洲更新的、革命的斯拉夫联邦的领导职务。他现在又同样急躁地、毫无根据地把这一非凡的使命从尼古拉那里转交给穆拉维约夫。克里木战争激起了斯拉夫人的爱国之心。卑鄙的西方列强从俄国人手中骗走了君士坦丁堡——斯拉夫联邦的未来首都。自1848年以来一直是每个善良革命者视为可怕的地方的奥地利帝国，因俄国危急的时刻抛弃俄国而受到俄国爱国者的憎恨。革命者和爱国者可以因共同的仇恨而团结起来。巴枯宁写信给赫尔岑，站在总督的一边，断定“穆拉维约夫和我们一样痛恨奥地利人”。还说穆拉维约夫不但是俄国而且是欧洲天生的救星，把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归他指挥，向可恨的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进军。他不会和“立宪的、空谈的贵族议会”打交道，他使用的手段是“临时的铁一般的专政”，他确信“只有这一合理的专政才能拯救俄国”。这就是巴枯宁革命理想现在所采取的独特形式。他已

经永远抛弃了西方议会民主的概念。革命的专政和泛斯拉夫狂热的奇妙的混合就是他的纲领<sup>①</sup>。

1859年春，穆拉维约夫巡视托木斯克四、五个月之后，巴枯宁获准携妻子一起搬到伊尔库茨克。他在那里被分派在阿穆尔公司工作。这个公司是在穆拉维约夫的赞助下由一位名叫贝纳达希的富商创立的，目的是在新吞并的省内发展贸易。夏季，他为公司的事务走遍东西伯利亚。自由活动是很适意的，工资每年为二千卢布。但是，巴枯宁很快就发现“干这个差事无利可图”，便于11月辞职，请贝纳达希另外分派职务。贝纳达希本来对他当旅行推销员从未抱过幻想，但是任何懂行的商人都不会失掉满足全权总督需要这样的机会。巴枯宁未被另分职务，但工资照拿。

巴枯宁就是在这种相当低下的地位上，在伊尔库茨克又度过了两个冬天。然而，既然已经恢复了健康和精力，他就再也不愿在这荒远的地方度过余生。车到山前必有路。瓦瓦娜·巴枯宁又两次恳求宽恕儿子，穆拉维约夫再次写信给多尔哥鲁科夫，并且很自信地向巴枯宁保证说，半年就可回俄国。但彼得堡仍然置之不理。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既然俄国对他紧闭大门，巴枯宁就迫不及待地想到了相反的方向。1861年初，穆拉维约夫退休，但有点好兆头的是继任人科尔萨科夫将军的表妹娜塔丽娅刚和保罗·巴枯宁结了婚。真是吉星高照。因为穆拉维约夫远征的功劳已经打开了阿穆尔河去太平洋的通道，正如巴枯宁意味深长地说的那样，伊尔库茨克比托木斯克离欧洲更近了。只要有一个条件，那件事就能行得通，办事少不了钱呀<sup>②</sup>！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303—365页。

②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308—312页，第2卷第506，510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314，358—378页。

就在这个时候，巴枯宁对他和贝纳达希之间的关系感到异常不安。他从贝纳达希那里拿了两年薪水和出差费，一共五千多卢布。他必须承认他没有为雇主做什么工作。用了不是自己光明正大挣来的钱，良心上说不过去，不把欠贝纳达希这笔帐还清，他不能安心。但既然钱已花光了，要还帐只能向别人借债。因此，米哈伊尔就满怀信心地给普列姆希诺庄的弟弟们写了一封信，向他们要钱。他这样做不会感到羞耻，因为父母家产未分，他从家里要的一切东西都可以记在他假想的那一份上。人们认为，米哈伊尔向家里要钱并非出自要还贝纳达希债务的离奇的愿望，而是希望得一大笔现款，为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怀疑未免刻薄一点，但人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这就是他的目的，那也落空了，因为他的弟弟们为他的请求所感动，把那笔钱直接寄给了贝纳达希。

巴枯宁处于困境，就转向意想不到的方面去了。几个月前，他写信告诉他的宿敌卡特柯夫，说他已经结了婚。写这封信的动机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明白的。但“属于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派”的人在俄国所剩无几了，卡特科夫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他成了一位成功的记者，是一家颇有点名气的月刊的编辑，又很有钱，这次写信还是为了借钱。卡特柯夫是个玩世不恭的人，他还记得巴枯宁在经济方面的名声，故对巴枯宁的请求置之不理。巴枯宁只好又干起旅行推销员的差使了。1861年春，一位恰克图的商人萨巴什尼柯夫给巴枯宁一千卢布和一笔预支工资，请他到阿穆尔河口出趟差。科尔萨科夫要他拿名誉来担保，在航线关闭以前回伊尔库茨克。巴枯宁接受了条件，又从自鸣得意的总督那里得到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指示阿穆尔河及其支流的所有船只的船长，在需要的时候，发给巴枯宁通行证。出发前，他把自己的真正意图告诉了几个亲人，就和妻子、岳父分手了。他什么也没有给安冬妮留下，只留给她一笔债务和模糊的希望：即如果他的企图得

以成功的话，而俄国政府又让她走，那她就可以在某个时间和他团圆。巴枯宁于1861年6月5日从伊尔库茨克出发了<sup>①</sup>。

\* \* \*

巴枯宁的第一站是恰克图，他在那里不光收到了萨巴什尼柯夫答应给他的一千卢布，而且还从另外一些托他办事的商人那里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现款。如果官方的统计数字可靠的话，这笔现款是二千五百卢布。他从恰克图起程前往斯列坦斯克，乘轮船前往阿穆尔河口的港口尼古拉耶夫斯克。巴枯宁整整旅行了四个星期，行程达二千英里，于1861年7月2日到达尼古拉耶夫斯克。

他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度过的七天，是他冒险的关键时刻。表面上，他的旅行已达终点。再向前迈一步，哪怕是在这个边远地方徘徊一下，都很容易引起怀疑，会被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科尔萨科夫给阿穆尔及其支流各船船长的公开信，也不能使他前进一步。但远洋船只很少来尼古拉耶夫斯克，远洋船通常停的港是在东西伯利亚沿海的卡斯特里。一艘政府轮船斯特莱鲁克号订于7月9日离开尼古拉耶夫斯克去卡斯特里。巴枯宁劝滨海省省长的参谋长阿法纳希也夫向斯特莱鲁克号船长提出请求，把“旅行家巴枯宁”带到卡斯特里。这位旅行家将通过陆路由另一条路回来。7月9日，巴枯宁乘上斯特莱鲁克号，按时驶入公海。在把大陆和萨哈林岛分开的海峡里，这艘船拖带一艘美国到日本港口做生意的维克利号。这对巴枯宁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艘美国轮船解缆以前，他已经准备好要换上这艘船。斯特莱鲁克号船长并未接到不准乘客换船的指示，因此没有理由干涉。维克利号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89—297，302—303，369—373，380—382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321—322页，第2卷第497—514页。

停泊的最后一个俄国港口是奥尔加港。轮船停泊期间，巴枯宁进行最后一次冒险，和一个俄国指挥官住在一起。巴枯宁终于在8月4日到达第一个日本港口函馆。他向一位热心的俄国领事保证说，他一定取道上海和北京回伊尔库茨克。他于8月24日到达横滨<sup>①</sup>。

巴枯宁必须尽快离开这里。1861年9月17日<sup>②</sup>他乘上美国轮船卡林顿号前往旧金山。在船上他与一个名叫科伊的年轻英国牧师交上了朋友，科伊携带一个很有钱的门生周游世界。他发现巴枯宁比起“我长期以来所交的朋友来更像朋友”，他的日记里还记载着关于这次航行的许多有启发性的见闻。在横跨太平洋的长时间空闲的日子里，巴枯宁谈起了他的生活和坐牢的经历，说他的两“大目标”是建立斯拉夫联邦和消灭奥地利，还唱俄国歌曲，并对一个从中国回国的传教士和一个美国女乘客之间的初恋进行说合。为投合科伊的职业所好，他们谈了许多关于宗教的事情。巴枯宁谴责他的朋友赫尔岑的“狂热的无神论”，预见到他们在伦敦见面时，一定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场“大辩论”。巴枯宁表示同情新教，甚至认为他妻子是个波兰人，是个罗马天主教徒，应“好意劝说”她改信新教（这样说可以很得体地宽慰这位年轻的牧师，因为他打算和一个信天主教的女人结婚）。最后，在到港的前几天，他们还谈到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科伊在10月10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发现我得借给他到纽约的路费，大约要二百五十美元。”

卡林顿号于1861年10月14日安全到达旧金山。巴枯宁从科伊那里借了三百美元，还给赫尔岑写了一封信，求他寄五百美元到

---

①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320，325，358，378，388，430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1卷第278页；列姆克：《短评》，第134页。

② 自此改用西历。

纽约，以支付渡过大西洋的费用。一个星期后，他乘船取道巴拿马城，穿过巴拿马海峡，前往纽约，于11月18日到达。科伊在远东已经呆了一段时间，就从陆路去纽约，两个星期后，他们又在纽约见了面<sup>①</sup>。

关于巴枯宁在美国的短暂逗留，可惜没有什么可写的。他在纽约碰到两个德国流亡者：一个是他1843年在苏黎世认识的索尔格，一个是曾当过赫尔岑儿子家庭教师的卡普。巴枯宁到波士顿去过一次，拜访了动物学家阿加西斯，他们是在瑞士认识的。阿加西斯当时是哈佛动物博物馆馆长，也是朗费罗的朋友。巴枯宁还想最远去趟华盛顿，但不知他去了没有。他对正在把美国弄得四分五裂的南北战争只有最肤浅的看法。但是他注意到，“这个以民主方法兴邦的国家的结局和我国用专制的方法所取得的结果同样悲惨”。他还发现美国“普遍地、无条件地同情俄国，相信俄国人民的未来”。作出这一令人满意的发现以后，巴枯宁准备作最后一段的旅行，他于1861年12月14日离开纽约，12月27日上午到达利物浦，又马上动身前往伦敦<sup>②</sup>。

巴枯宁这样戏剧性的、轻而易举地逃走显然是得到西伯利亚最高官员的资助和怂恿的。这件事使得不熟悉俄帝国对边远地区行政管理那么马虎的西方人来说，真是迷惑不解。巴枯宁和两届西伯利亚总督的友谊，本身似乎就是暧昧的。说巴枯宁是俄国间谍这一旧有的传闻加深了这些怀疑。晚期和马克思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巴枯宁的敌人不止一次地暗示说，俄国政府有意释放巴枯宁，让他来到革命的欧洲，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对。当这些

---

①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75页；列姆克：《短评》，第134页；F·P·科伊牧师未发表的日记。

②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76、79页；列姆克：《短评》，第134—135页。

离奇的谣言同时消失时，那就必定是官员个人纵容的问题了。官方对这个“要犯”逃跑事件的调查拖延了两年半时间。既然这个事件的实质部分是由科尔萨科夫掌握的，而他不揭露自己的过失，又无法责怪下级，所以这个事件不会得出预期的结果。最后只有两人判刑，而且判得最轻。1864年5月，阿法纳希也夫由于不适当地请求斯特莱鲁克号船长让巴枯宁上船，被判两个月徒刑。一个海军准尉被关一个月营房，因为他未能及时从伊尔库茨克发份电报把巴枯宁是政治犯这件事告诉滨海省省长。其他被告均平安无事<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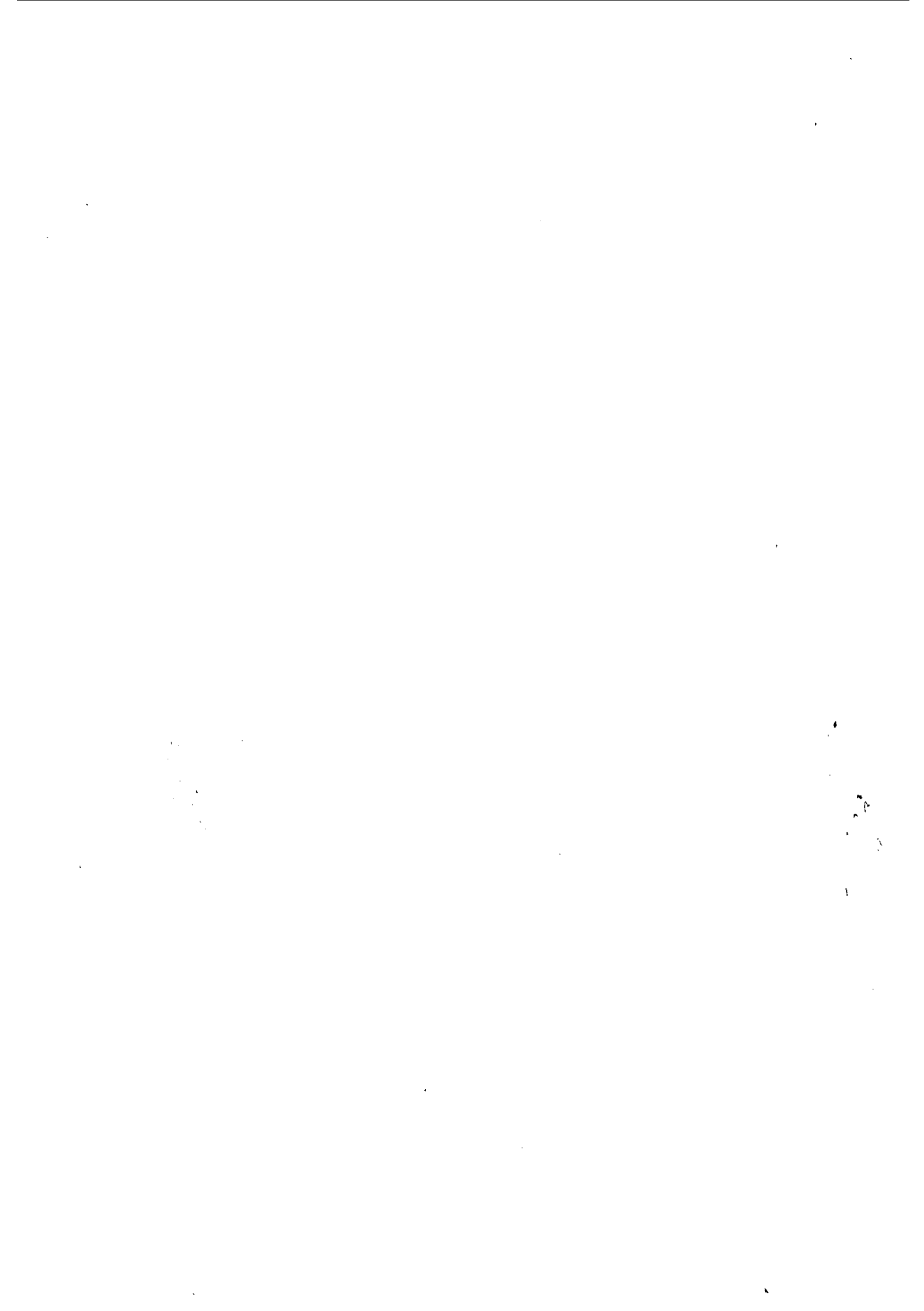
---

①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321，347—388页。关于巴枯宁从西伯利亚出逃的情况，作者在《斯拉夫评论》里有详细论述，参见《斯拉夫评论》1937年1月号，第377—788页。





第 四 卷  
复 出



“只要那些正人君子仍做正人君子，我还要做个不安分的人。”

巴枯宁给奥格辽夫的信

(1868年6月14日)



## 第十九章

### 初到伦敦

1861年12月27日傍晚，米哈伊尔·巴枯宁闯入奥塞特公寓。这所公寓在韦斯特伯恩·特雷斯街，赫尔岑近一年来住在这里。当时，赫尔岑和奥格辽夫正准备吃晚饭，奥格辽夫的第二个妻子、赫尔岑的情妇躺在这个房间的睡椅上，她刚刚生下双胞胎。巴枯宁开口就问：“喂！有牡蛎吗？”然后，他走向娜塔丽娅，大声说：“躺着不好，快好起来吧！我们必须干事，而不是躺着。”过了一会儿，凯尔谢也夫来了，他是个穷困的俄国流亡者，此时靠赫尔岑的资助为生。经介绍他和巴枯宁这位老资格的革命者相识了。巴枯宁迫不及待地向赫尔岑询问关于政治形势的发展情况。

赫尔岑说：“只有波兰有些示威游行，但波兰人也许会觉悟过来，懂得沙皇刚刚解放农奴，决不能在这个时候举行起义。乌云渐渐布满天空，但我们却偏偏希望会云消雾散。”

“意大利呢？”

“没有动静。”

“奥地利呢？”

“没有动静。”

“土耳其呢？”

“到处都是片平静，毫无希望。”

“那我们干什么呢？”巴枯宁愕然地说，“难道我们要去波斯或印度

去煽风点火吗？真会把人急成疯子。我们不能坐着什么也不干哪。”<sup>①</sup>

性格不合、意见分歧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这一点赫尔岑无论如何还是有能力看穿的。巴枯宁如今四十八岁，从外表上看已经上了年岁，皮肤变得粗糙了，几乎叫人认不出来了。身材魁梧的大汉，变得异常粗大，体重达二十石<sup>②</sup>。在赫尔岑看来，巴枯宁像头巨兽；而在更为平凡的马克思看来，他却像头公牛。巴枯宁牙齿全掉光了，满头浓厚的卷发，下巴长满胡须，不加修剪。只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那对浓眉，才能使人记起他是赫尔岑上次在巴黎见到的那个三十三岁的、漂亮的花花公子。但在思想上，米哈伊尔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他给在巴黎的乔治·桑写信说〕我觉得我很年轻。我的年龄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样大，浮士德说他“老得只是不能玩耍，年轻得不能没有欲望”。脱离政治生活十三年，我渴望行动，并认为除了爱情以外，行动是幸福的最高形式。

反动派长时间地、慢慢地占了上风，使赫尔岑的幻想破灭了，他曾受到异常痛苦的家庭悲剧的打击。自上次和巴枯宁分手以来，赫尔岑已过丁年，到了中年晚期，而巴枯宁身上仍充满着年轻人的激情。如果说，坐牢毁了他的身体的话，但并没有制服他那不可改变的乐观主义。1847年，巴枯宁和赫尔岑同是青年人，而如今巴枯宁却在他同时代人的身上觉察到过早地进入老年的、令人痛苦的特征；赫尔岑却认为巴枯宁是个天真的、任性的孩子<sup>③</sup>。

① 图奇科瓦·奥格辽夫：《回忆录》，第305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3页。

② stone，石，英国重量名，表示体重一石等于十四磅。——译注

③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11页。

他们在政治上也不再属于同代人了。巴枯宁不但在精神上而且在见解上都保持着四十多岁人那股狂热劲儿。他就像前世的幽灵一样又回到了人间，像一个从长时间沉睡中醒来的人一样，努力恢复入睡前的活力，并希望看到周围的一切都和入睡前一模一样。他和赫尔岑都没有亲眼看到那次革命失败的情况，也没有见到全欧大陆的政治自由最后遭到可耻扑灭的结局。巴枯宁徒劳地询问十年前已经停止的那场斗争的消息。他叫嚷打倒奥地利帝国，这在1848年似乎是件迫在眉睫的事。他还得知，泛斯拉夫联邦的理想早已成了被人遗忘的一件可笑的往事。他痛斥亚历山大二世的暴虐，因为在这个暴君的魔掌下，他几乎逃不出来。他使用的言词和人们通常责骂尼古拉一世的一样。使他迷惑不解的是，正是这个亚历山大解放了农奴，成了进步和改革的赞助者，复兴俄国的希望之星。十二年来，时间对巴枯宁来说好像是停滞不前的，而对他以前的伙伴说，时间却完全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和见解。

此时，住在奥塞特公寓这家人中，有赫尔岑及其嫡出的三个孩子：亚历山大（或简称萨沙）、娜塔丽娅和奥尔加；有奥格辽夫及其妻子娜塔丽娅；有娜塔丽娅·奥格辽夫的三个孩子（赫尔岑是他们父亲）：三岁的丽莎和孪生的两个婴儿；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英文女家庭教师丽维小姐。一位名叫特霍尔泽夫斯基的波兰流亡者，是这所公寓的公认的食客，他为赫尔岑办事，在索霍区开了一个书店，出售赫尔岑的著作。此外，还常有俄国人来来往往。巴枯宁多次变动住处，先是在圣约翰区的格罗夫·特雷特找了个住处，后又住在靠奥塞特公寓更近一点的地方——帕丁顿·格林街10号。他在这儿住了将近一年，这里的房东韦尔奇太太和干杂活的女仆格雷斯很快就对巴枯宁俯首帖耳。忠实的格雷斯竟全然不顾英国风俗，深夜里还一壶接一壶地往巴枯宁的房间里送开水，端糖钵，倒水沏茶。巴枯宁为人毫不做作，平易近人，这就使他赢得了劳动人民对他的爱戴和信任。他离开后很久，这



家人还谈论这位迷人的外国绅士的怪僻习惯以及他的那些更为古怪的客人<sup>①</sup>。

奥塞特公寓好景不长，巴枯宁靠什么来维持生活是刻不容缓地要考虑的问题。他到伦敦后欠了一大堆债（包括欠赫尔岑二千法郎），自己又一无所有。唯一可以得到的经济来源就是朋友们的资助。在巴黎的波特金寄来二十三英镑，还谈到每年可助五百法郎；赫尔岑每月供给十英镑；屠格涅夫答应每年给一千五百法郎，并开始在巴黎募捐二百法郎；一位富有的波兰人戈林斯基送给他一千法郎。甚至还制订一项在莫斯科进行募捐的计划。但是巴枯宁自己对这个使朋友们烦恼的问题却一点也不在乎，他已经借遍了全世界，并且决心运用他原来给自己规定的特许权：除了不还那些债就得“坐牢或丢脸”以外，他一律不还债。尽管他不愿意，赫尔岑还是提醒他自谋出路。巴枯宁耸人听闻的逃跑事件使他成了全欧洲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三、四个国家的报社都愿出高价来得到他关于坐牢和出逃的经历。大布洛斯(the great Buloz)想在《两大陆评论》杂志上发表这件事。赫尔岑肯定巴枯宁可以毫不费力地弄到二万到三万法郎，巴枯宁对此未加驳斥。他在英国报界宣布，说他不久就要发表关于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事件的概要”。后半生中，巴枯宁常常谈到要写回忆录，但从未动笔。根深蒂固的阶级传统使他觉得为钱写作有失尊严，他还是愿意靠朋友的资助为生<sup>②</sup>。

赫尔岑对巴枯宁这种满不在乎的表现越来越生气。赫尔岑为人慷慨，多年来，他一直资助奥格辽夫。到奥塞特公寓来的穷困的俄国人没有一个是空着手离开的。但是，他喜欢把他的资助用

---

①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9卷第429—430页。

②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1卷第51—52，54，78，220页；第16卷第206页，第21卷第412，417页。

在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他在经济上那种井井有条的资产阶级优越感和巴枯宁那种视金钱如粪土的轻率观点是格格不入的。在他的回忆录里，关于巴枯宁这个伟大的革命者在这个时期的生活有如下辛辣的描写：

巴枯宁在我们中间从九年的沉默和孤独中恢复过来了。他争论、宣传、发号施令、大叫大喊、作决定、做准备、组织、出主意，整天整夜二十四小时没完没了。有点间隙时间，他就伏在写字台上，吹掉烟灰，腾出一小块地方，开始写五封、十封、十五封信。写往塞米巴拉金斯克、阿拉德，写往贝尔格莱德、君士坦丁堡，写往比萨拉比亚、摩尔达维亚和白俄罗斯。写信时有时还搁下笔，反驳某个反动的达尔马提亚人，话还没有说完就拿起笔来继续写下去。当然这样做一点也不误事，因为他写的和说的都是一码事。此公的活动、闲暇、胃口以及其他一切特点——甚至他巨人一般的身材和不断出汗——都是超人的。他和以前一样，仍是个头上长满狮子般毛发的彪形大汉。

五十岁时，他仍然是个流浪汉，是个无家可归的布尔戈尼大街上的波希米亚人，今朝有酒今朝醉，鄙视金钱，有钱时大手大脚，无钱时不分青红皂白东挪西借。借钱时就像孩子向父母要钱那样直截了当，从未想到还要还帐。自己又同样的直截了当地随时准备把最后一文钱给别人，只留下必要的买烟和买茶钱。他这样过日子从未感到难为情，他生来就是个大流浪汉，无家可归的大游民。如果有人问他对产权有何看法，他准会用拉兰德<sup>①</sup>回答拿破仑关于上帝的话来回答：“陛下，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发现有一点点必要去相信上帝”。

在赫尔岑家里，事事都对巴枯宁不利，就是他那种粗俗的吃喝方式也是如此。这种进餐方式曾使敏娜·瓦格纳甚为吃惊，监狱

---

① 约瑟夫·日罗姆·拉兰德（1732—1807），法国天文学家。——译注

的生活习惯也没有把这种方式改掉。家庭成员中唯一毫无保留地欣赏巴枯宁的是三岁的丽莎，孩子能够理解孩子，从此，在奥塞特公寓里，“大丽莎”就成了巴枯宁的绰号<sup>①</sup>。

每个人，包括有关方面似乎均认为巴枯宁一定会成为《钟声》的正式合作者，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双人同盟就要成为三人同盟了。头年11月，就是《钟声》首先向世界宣布巴枯宁出逃的消息的。新年里，这家刊物用大写字母带着得胜的口气宣布：巴枯宁安全到达伦敦。下一期还发表了长篇社论，社论结尾宣称：“巴枯宁和我们都是俄国人民的代理人”。一个月以后，《钟声》又在副刊上发表了巴枯宁十三年来的第一篇宣言——《致我的俄国、波兰和其他斯拉夫族友人书》。这篇宣言试图根据他1848—1849年的经历重新修改他关于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旧纲领。巴枯宁宣称，他过去在外国浪费了精力。但是，他在法国和德国都没有扎下根来。在即将来临的“伟大的时代”里，他要专心为自己的亲人效劳，决心把自己的有生之年投入到“为俄国自由、为波兰自由、为所有斯拉夫人的解放和独立”的斗争中去。这篇文章本身并不新鲜，也无惊人之处，但文章的发表证明《钟声》已经接受了巴枯宁的纲领，巴枯宁已成为同盟中的第三名成员<sup>②</sup>。

这篇文章并非全文，因为文章结尾说还要发表一篇，但下篇文章还没写完，第一次重聚的激情就冷却了。革命的三人同盟的梦想也不自觉地解体了。大约在1862年3月底，巴枯宁又写了一篇文章，及时送去排印，这篇文章究竟是那篇《致我的俄国、波兰和其他斯拉夫族友人书》的宣言的续篇，还是单独成篇，那就不清楚了。但无论如何，当赫尔岑看到校样时，拒绝在《钟声》

---

①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240页。

②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1卷第346页，第15卷第11，17—21页；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392—395页。

上发表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只存下了巴枯宁对拒绝发表的答复。

〔巴枯宁在给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信中说道〕如果可以通过牺牲虚荣心，那怕是牺牲次要的信念而达成一项一致协议但没有设法去达成这样的协议），那么，我认为，有反对你们的行动、哪怕是背着你们行动，都是一种罪过。既然看来我们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也许只是在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这样做就越发是个罪过，不单单是罪过，而且纯属愚蠢。我一点也没有失去我到伦敦来所抱的信念，我一点也没有放弃要不惜一切代价成为你们同盟中第三名成员的决心。有了这样的条件，联合才有可能，不然，我们就还做伙伴，如果你们高兴的话，就称朋友吧，但要从此分道扬镳，彼此毫无干系。

但是情况使他们无从作出段然的决定。

可能简单地同意各走各的路，谁也不管谁。他们思想上的联系实在太密切了，世人认为他们分手一定会有痛苦和为难之处。除了两封不重要的短信以外，《钟声》再也没有刊载过巴枯宁的文章。到了5月，赫尔岑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定为“友好的、观点接近的往来”，这种说法乃是不祥之兆。巴枯宁接受这种说法，以示“我们之间将不会再有什么个人辩解了”。但是这种希望没有达到。下一章要论述政治上的分歧，政治分歧起长效刺激剂作用，加剧着从开头就明显存在着的性格上的差异。同样，这种性格的差异也加深政治上的分歧。6月，相互指责又开始了。于是不断地进行争吵和“辩解”。巴枯宁认为赫尔岑“目中无人”、“傲慢轻蔑”。赫尔岑写信予以尖锐的反击，信中似乎暗示（此信没有保存下来）要劝说巴枯宁迁往巴黎居住，并在那儿开展活动。巴枯宁回信表示歉意，信写得既干脆又得体：

赫尔岑，是我的不是，还望海涵息怒为盼。我生来笨嘴拙舌，虽无恶意，却不慎出言不逊。但是，倘若你命中注定收到你给我的这些来信，你将怎么办呢？你应该说，你早就希望我在加尔各答，而不是在巴黎。说正经的，赫尔岑，你不会不知道，我对你是无限尊敬的，我忠心地热爱你。我心悦诚服地认为你能力比我强，知识比我多。你对每个问题的看法对我都有巨大的影响。即使我们在次要的问题上偶然有分歧，你为何非要把我赶到巴黎不可呢？

从现实的观点来看，赫尔岑是完全正确的，和巴枯宁一起工作是不可能的。但同情还是在“大丽莎”一边。巴枯宁发脾气就像可爱的孩子生气一样，转瞬即逝。而赫尔岑怨恨起来就会因种种原因而加深，而且一旦产生了怨恨，时间就只会加深而不会减轻原有的痛苦<sup>①</sup>。

巴枯宁在伦敦的生活经历给人的印象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是支离破碎的。他和当地人接触很少，很少或者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但他取得的成就和忍受的痛苦却使他在英国的激进派中出了名。到达伦敦几天以后，一个工人代表团就来到奥塞特公寓拜访他，对他出逃成功表示祝贺。代表团给他的贺词发表在一家不大出名的、很快就停刊的激进派周刊《世界评论》上。巴枯宁和当时还处于初创时期的英国工人运动还有些什么接触，没有留下记载。工联主义的创始人既讲究实际而又固执，而巴枯宁却是个反复无常、富于幻想的普遍革命的鼓吹者，在他们之间的确很难找到许多共同点，或者找到许多互相了解的地方。巴枯宁既没有也不去寻求英国生活和政治方面的知识。他认为英国贵族政府的政权几乎和俄国专制政府的政权同样有害。当他得知（他从未到

---

①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79—83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5卷第194页。

英国乡村去过)英国“农民”很少或从不占有土地时,他表示同情说,他们的地位还不如解放前的俄国农奴<sup>①</sup>。

在其他一部分英国人的心目中,巴枯宁这名字就不那么亲切了。因而产生了他在伦敦逗留期间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插曲。他在伦敦遇到一些最不愉快的事,下面谈的只是其中之一。1853年8月,那时他在彼得——保罗要塞已经平安地住了两年多,伦敦《广告晨报》的一名“外国记者”、实际上是俄国流亡者、戈洛文<sup>②</sup>无意中把巴枯宁称为“沙皇的受害者之一”。几天以后,这种说法却惹得有人在这家报上发表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个所谓的“受害者”根本没有被关在俄国监狱里受折磨,而是在高加索的俄国军队中服役,因为他是“大有价值的工具,不能关在牢里”。写这封信的人名叫弗兰西斯·马克思,是有名的英国亲土仇俄分子戴维·乌尔卡尔特<sup>③</sup>的追随者。他没有引用什么证据来证明他这种奇怪的说法。但这和五年前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诽谤是相似的,名字又是那么奇怪的巧合,还有卡尔·马克思又是人所共知地左袒乌尔卡尔特,这一切在流亡者中间——也许赫尔岑也是这样认为的——产生了错误的印象,即认为卡尔·马克思对这一陈旧的诽谤的重新出现要负一定责任。这种印象并没有因为马克思本人相当勉强的否认而消除。这件事不久就消失,而且被人遗

---

①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5卷第15页;萨特伦德·爱德华兹:《在国内和国外的俄国人》,第2卷第26页。

② 伊万·加甫利洛维奇·戈洛文(1816—1886),俄国自由派地主,侨居英国,政论家,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同赫尔岑和巴枯宁接近。——译注

③ 戴维·乌尔卡尔特(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1855—1865年在伦敦出版《自由新闻》。该报曾发表过马克思抨击帕麦斯顿政策的一些文章。——译注

忘了。巴枯宁到伦敦后两个月，即1862年3月，乌尔卡尔特自己办的报纸《自由新闻》发表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又一次宣称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间谍。

巴枯宁本人并没有见到过这篇文章，但他在一个星期内就从两个来源注意了这篇文章。一是正式退休住在布赖顿的老相识阿尔诺德·卢格；一是他在奥塞特公寓接见过的工人代表团团长。巴枯宁给这两个人都写了信，恰如其分地表示了愤慨。下一期的《工人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巴枯宁在伦敦》的颂扬性文章。有了这篇文章，再加上赫尔岑在《自由新闻》上发表文章表示抗议，谣言又一次消失了。但是，在整个事件中最成问题的、而且从发展观点来看也是最重要的则是巴枯宁对卡尔·马克思的态度。赫尔岑不喜欢马克思，对1853年的事件又耿耿于怀，所以在他给赖歇尔的私人信件中，把这次新的攻击看成是“德国人和一个英国狂人”干的勾当。如果仇视德国的巴枯宁不同意赫尔岑的怀疑，那倒是很奇怪的事。然而，如果他同意赫尔岑的说法，那他对马克思也无恶感。在尚存的这个时期的信件中，巴枯宁对这次诽谤除了责备乌尔卡尔特以外，没有责怪其他任何人。而且两年半后他会见马克思时，完全是很热诚的。很久以后，当他和马克思的争吵变成很刻毒的公开论战的时候，巴枯宁还描述他在伦敦“是如何受到一家英文小报一组文章的欢迎”，“这些文章明显是出自那些可亲可敬的朋友、德国共产主义者领袖们的手笔，或由他们授意而写就的”。因此，把马克思说成是这个事件的同谋，一点证据也没有<sup>①</sup>。

至于说其他方面，巴枯宁和英国生活的其他接触，都是些小

---

<sup>①</sup>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7卷第303—306、314—316页，第15卷第71，126—127，129—131页；《卢格通信集》，第2册第218—219页。

事，而且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发生在举办国际博览会那一年，这次博览会想在南肯辛顿重现十一年前在海德公园举行的大博览会的盛况。但巴枯宁对此并不感兴趣。说到伦敦的娱乐活动，只有一件事有所记载，即特霍尔泽夫斯基一次带巴枯宁去埃尔多拉多音乐厅去观看那些“栩栩如生的雕像”。他既没有英国朋友也很少有英国熟人。他肯定登门拜访过住在布莱克希思的科伊，因为那年年底他使用那个地址接收外国寄来的信件（韦尔奇太太的帕丁顿·格林街的地址不再使用了）。另外有段时间，他要求把信件寄给大英博物馆的罗尔斯顿<sup>①</sup>先生。此人是个学者，后来因把屠格涅夫的著作和其他一些俄国古典文学作品译成英文而出了名。这是唯一存下来的巴枯宁和这位学者有联系的证据。关于巴枯宁和其他英国人的接触，知道得也不多。威廉·林顿<sup>②</sup>是为数不多的参加国际民主运动的人士之一，他是个木刻家，曾接待过许多国家到伦敦的政治流亡者。在赫尔岑请客吃饭时，他遇见了巴枯宁，林顿发现巴枯宁是个“健壮无比的彪形大汉（身高六英尺二、三），尽管吃了不少苦头，但还是很快活和幽默”。萨特伦德·爱德华兹是个新闻记者，由于职业的爱好的，对俄国的东西颇有兴趣。但对巴枯宁这位新来的人却并不赏识，因为这个人“对什么东西都大力反对”。但很明显，这种不赞赏并没有妨碍他们某种程度的个人接触，因为巴枯宁在伦敦逗留期间的那件最生动的轶事正好是住在爱德华兹家里时发生的。热心的女房东看到客人老是穿着一件不干净的红色法兰绒上衣，而且明显没有带替换的衣

---

① 威廉·罗尔斯顿·谢登·罗尔斯顿（1828—1889），英国作家，六十至七十年代多次访问俄国，写有俄国文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译注

② 威廉·詹姆斯·林顿（1812—1897），英国雕刻家、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参加宪章运动。《英格兰共和国》杂志的出版者。——译注



服，于是，趁巴枯宁还没有起床的空儿，叫女仆清早偷偷到他的房间去，把那件衣服拿出来洗干净，到他起床时再送回去。但是这个计划到了关键的时刻却失败了，原来这件红色法兰绒衣服还当睡衣用①。

\* \* \*

巴枯宁不大会讲英语，所以很自然，他在伦敦会见外国人的次数和得到的好处就比会见本地人的次数和得到的好处要多。自1848—1849年的大动荡以来，伦敦除了住有许多外国流亡者以外，那次博览会也从外国吸引来大批有政治头脑的、或纯粹出于好奇的游客。在这些人当中，地位最高的要数拿破仑三世的堂兄弟日罗姆·波拿巴亲王。他三年前和国王维克多·厄马努埃尔②的女儿结了婚，这门亲事使拿破仑三世和卡富尔③订立了那项条约④。在参观博览会期间，日罗姆亲王把法国官方对波兰的同情和关于自由原则的装模作样的自我表白混为一谈，表示希望会见一些波兰的头面人物及其同情者。巴枯宁、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应邀出席一次午宴。这是一次私人宴会，可惜宴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没有记载下来。不过，据出席宴会的凯尔谢也夫说，米哈伊尔对各种“经济和革命理论”都加以发挥。这位尊贵的客人还轻率地提出

---

① 列姆克编：《短评》，第36，75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96页；林顿：《欧洲的共和主义者》，第276页；萨特伦德·爱德华兹：《在国内和国外的俄国人》，第2卷第26页；有关睡衣这件事是吉尔伯特·莫雷教授从萨特伦德·爱德华兹那里得知，又告诉作者的。

② 维克多·厄马努埃尔（1820—1878），撒丁国王（1849—1861），后为意大利国王（1861—1878）。——译注

③ 卡富尔（1810—1861），1852年11月出任撒丁王国首相。——译注

④ 指1858年卡富尔和拿破仑在普隆比埃尔缔结的反奥军事同盟。——译注

要为法国驻东欧的领事馆效劳，以传播革命文学和革命主张。如果他许下了这个诺言的话，他并没有履行。这次宴会没有影响历史的进程和巴枯宁的主张。几个月以后，巴枯宁参加了在1857年企图谋杀拿破仑三世的奥尔西尼的同谋西蒙·贝尔纳<sup>①</sup>的葬礼，并发表了赞扬这个死去的同谋者的演说，此时，他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有什么不适合的地方<sup>②</sup>。

1862年夏天，来伦敦找米哈伊尔·巴枯宁的人当中，绝大部分是斯拉夫人，这是很自然的事。这些俄国人和波兰人中有许多都深深地陷入了俄国和波兰革命的幻想，这些幻想再次在巴枯宁一刻也不能平静的脑子里萌芽了。其他一些来访者使他想起了他长期以来极为关切的事业——解放中欧的斯拉夫人。这是他1849年被捕前的最后几个月里考虑的主要问题，也是他逃出西伯利亚时首先想到的问题。

〔巴枯宁从旧金山写信给赫尔岑说〕消灭奥地利帝国，彻底消灭奥地利帝国，这是我最后的一句话，我不说这是我最后的一次行动，那样就会显得太自负了……接着实现光荣的、自由的泛斯拉夫联邦。这是俄国、乌克兰、波兰和所有斯拉夫人民的唯一出路。

在巴枯宁想象中的1849年的世界上，奥地利帝国的结构显然已是摇摇欲坠了，推翻它并不是什么毫无道理的奢望。这一着一旦实现，巴枯宁要解决的那些复杂问题就迎刃而解了<sup>③</sup>。

1862年，巴枯宁在伦敦有好几个星期一直念念不忘他十三年

① 西蒙·弗朗斯瓦·贝尔纳（1817—1862），法国共和党人，1848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58年被法国政府控为奥尔西尼刺杀拿破仑第三的同谋犯，但被英国中央刑事法庭宣布无罪。——译注

②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5卷第366，505页。

③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75—76页。

来的理想。捷克民族运动的那些贵族式的领导人已经“完全德国化了”，所以必须抛弃。民族革命必须以“青年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合作为基础。革命完成后，实现包括俄国在内的泛斯拉夫联邦的时机就成熟了。巴枯宁又一次见到了他的老伙伴阿道夫·斯特拉卡。1849年那些灾难以后，他逃到了伦敦，靠教书和写作为生，而且成了英国公民，也许不再是斯拉夫民族主义的非常热诚的斗士了。约瑟夫·弗里契也是个流亡者，他还在巴黎和日内瓦做捷克民族主义的宣传工作。巴枯宁通过斯特拉卡得知弗里契的一个兄弟维亚切斯拉夫仍在布拉格，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维亚切斯拉夫·弗里契，信里还附一封给约瑟夫的公开信，公开信阐述了上文提到过的斯拉夫纲领，目的显然是要在波希米亚本身复活革命民族运动。但这两封信并没有送到收信人手里。

这样做希望的确不大。即使是巴枯宁这样积习很深的幻想者，也能看到世界已不是1849年的世界了。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已经稳稳当当地登上了奥地利皇位。他已经度过了在维拉法朗加所受到的打击，和拿破仑第三就意大利问题达成了协议。很明显，斯拉夫人已成为他最忠实的巨民。在伦敦，人人都热情地支持意大利自由。但却没有人听说过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他们的愿望。维亚切斯拉夫来伦敦参观博览会，巴枯宁可能遇到过他，但这次见面的情况没有记载下来。人们根本没有见到捷克革命民族主义的复活。随着1862年的过去，巴枯宁越来越深深地陷入了波兰的事务，从而把中欧斯拉夫人抛到脑后去了<sup>①</sup>。

巴枯宁专心于斯拉夫事业，这就大大地影响了他对伦敦的两

---

<sup>①</sup> 列姆克：《短评》，第88—89，485—495页。有关弗里契兄弟和阿道夫·斯特拉卡搞民族运动一事是布拉格的采奇安（Czechjan）博士告诉作者的。

部分最重要的民族主义流亡者的态度，即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他初到伦敦的几个月中，排德浪潮冲击着他，出现了一个奇妙的心理上的问题。入狱前，这个问题尚无明显的迹象，在《忏悔书》里第一次突出地表现出来。为取悦尼古拉一世，巴枯宁着重强调了这个问题。他在《忏悔书》里表现出仇德情绪，虽说动机不纯，但摆出的那付姿态却和他的禀性完全一致，甚至当这个问题已经过时、失去作用时，仍和他感情藕断丝连，因为这种情绪是那份半真半假的《忏悔书》最能说服人的部分。巴枯宁在伦敦丝毫不掩饰他态度的变化。他在1862年5月写道，“现在我不能像1849年那样想让斯拉夫人和德国人和解了”。就在同一天他给弗里契的公开信中也宣称：“从反面来说，泛斯拉夫主义的意思就是仇视德国人”。一个月以后，在给他弟妹娜塔丽·巴枯宁的一封信中，他的态度更为明确：

我只是为波兰、俄国和泛斯拉夫的事业奔忙，并且有系统地、满怀信心地宣传仇视德国人。和伏尔泰说到上帝一样，我认为如果没有德国人，我们倒要虚构出德国人，因为除了仇视德国人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成功地使斯拉夫人团结起来。

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哪一个阶段他是如此发泄种族仇视的。后来由于和马克思以及吴亭<sup>①</sup>的争吵所引起的反犹太人的言论也没有这样厉害和激烈。这种仇视德国情绪的多次爆发究竟多少应该归因于赫尔岑的影响，还很难推测。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受到赫尔岑十分尖刻的抨击，他们对赫尔岑的这种嫌恶态度也予以充分

---

① 尼古拉·伊萨柯维奇·吴亭（1845—1883），俄国革命活动家，1863年起流亡英国，后迁瑞士，第一国际俄国支部的组织者之一，曾站在马克思一边反对巴枯宁集团。1880年回到俄国后脱离革命运动。——译注

的反击。好多年来，他们之间断绝了一切往来。赫尔岑很可能鼓动巴枯宁去怀疑马克思插手《广告晨报》和《自由新闻》的那些诽谤。据我们所得到的资料，注意巴枯宁来到伦敦的唯一德国人就是阿尔诺德·卢格。巴枯宁很客气地但也是正式地和卢格通信。他们是否见过面就不清楚了。在一封尚存的写给诗人弗莱里格拉特<sup>①</sup>的信中，卢格试图半心半意地为巴枯宁辩护，理由是巴枯宁虽然支持泛斯拉夫主义，但并不是俄国的爱国者<sup>②</sup>。

巴枯宁和意大利人交往中，泛斯拉夫热情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沉默寡言、坚定不移的狂热者马志尼在伦敦住了二十多年，他不但是伦敦政治流亡者的老前辈，而且也比其他流亡者更接近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后来，巴枯宁和这位意大利领袖的半民族、半宗教的神秘主义发生了冲突。但是狂热的民族主义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巴枯宁“常常”见马志尼，“喜欢并且尊敬他”，很明显，他也得到马志尼相应的同情。

〔在给弗里契的公开信中，巴枯宁写道〕意大利是奥地利唯一不可调和的敌人。意大利民族虽然古老，但却比其他西方民族年轻得多。它自己本身就有着充满活力的未来，这就使它不自觉地倾向于斯拉夫民族。据可靠的消息说，意大利开始特别地、专门地关注斯拉夫民族，真心要和我们团结一致，意大利是我们在欧洲的唯一朋友。

与此同时，他还写信给加里波第说，“斯拉夫人仇视德国人正象意大利仇视奥地利一样。正象意大利仇视奥地利大大有助于

- 
- ①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德国诗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五十年代后半期脱离革命。——译注
  - ② 列姆克：《概论》，第90，490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8页；《卢格通信集》，第2卷第218，221页。

意大利统一一样，仇视德国人就会使斯拉夫人团结起来”。在给另外一个通信人的信中，巴枯宁写道，他打算到意大利去一趟，可以在那里“进行工作，把意大利人和斯拉夫人联合起来”。这一有趣的计划没有实现。巴枯宁最后离开伦敦，那是到别的地方去了<sup>①</sup>。

\*                     \*                     \*

巴枯宁虽然沉浸在伦敦的新生活中，但他不可能忘记过去旧有的私人联系。弟弟们对他的命运不太关心，大概是有特殊理由的。米哈伊尔出逃时，他的五弟亚历山大正好在西欧。亚历山大是家里的不肖之子，仍在走下坡路。他陷入了一场极不体面的风流韵事，并在佛罗伦萨企图自杀。1862年1月，他来伦敦看望哥哥，但这次团聚却不是一次成功之举。米哈伊尔后来写道：“我们见面了，但彼此却不知心。”赫尔岑发现亚历山大谈吐“极为迟钝”。于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骆驼巴枯宁”，并问屠格涅夫，在他以打猎为生的那段时间里，是否见过比骆驼“更加令人讨厌的动物”。不管怎么样，亚历山大不能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因为几个星期以后，他在意大利经济发生困难，连回国的路费都不够了。同时，更为可怕的命运落到了米哈伊尔其他弟弟的头上。尼古拉和阿列克斯由于自由主义激情一时冲动，参与特维尔省的十三家土地所有者给沙皇写请愿书的行动，这些地主竟敢对解放农奴的条件表示不满，提出要承担据法令应加在他们庄园农民身上的那些经济负担。这种冒昧的陈辞很明显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都被送入彼得—保罗要塞关了好几个月。只有保罗安然无恙地呆在俄国，他出于谨慎或者无所谓，没有给米哈伊尔写过信。瓦瓦娜已不在人世，

---

①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292页；列姆克：《概论》，第86—88，492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277页。

亚历山德拉结了婚，塔蒂安娜保持沉默。米哈伊尔和普列姆希诺庄保持联系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保罗的妻子、科尔萨科夫的侄女娜塔丽<sup>①</sup>。

娜塔丽·巴枯宁是米哈伊尔唯一没有见过面的家庭成员，在米哈伊尔给她写的无数信中，有一封信最为委婉动听。他在信中要求得知姐姐们和母亲的消息，因为他长期以来从未指望她们给他写信。他感到“和他一生中所热爱的东西隔绝了，注定要过着孤漠的生活”。他讨厌“理论”，由于流落异国，他渴望“爱情，活生生的爱情”。对他来说，爱情现在就体现在那个被他留在西伯利亚中部的波兰女子身上。

[1862年4月，巴枯宁在给娜塔丽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弟弟、妹妹：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请求，请帮忙把我妻子先从伊尔库茨克接到普列姆希诺庄，再从那儿送到伦敦。我看你们见到她就会喜欢她的，她对此也当之无愧。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爱她，我少不了她。

7月，巴枯宁给安冬妮本人写信说：

我非常想念你，日日夜夜想到的只有你。你一到这里，我们就一起去意大利，那里一切都会使人愉快和高兴的，并有许多事要做。亲爱的，你用不着担心，我们将雇个女仆，生活不成问题，你就来吧！

在托木斯克促成他做这门不可思议亲事的那种感情在伦敦仍支配着他<sup>②</sup>。

---

①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5卷第48—49，54页；列姆克：《概论》，第23，124，127，128页。

② 列姆克：《概论》，第26—27，120，127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20页。

一个上了年纪的、潦倒的、出名不能行人道的人居然和一个尚未成人的波兰小商的女儿在不正常的情况下结了婚，难怪米哈伊尔的弟弟和朋友们对这门亲事都不赞成。普列姆希诺庄这家人对安冬妮并不关心，更不想给她路费。赫尔岑对巴枯宁的打算从不放在心上。即使为人宽厚的屠格涅夫也认为巴枯宁不先看看“周围环境”，就要把妻子接来，简直是发疯了。安冬妮自己也认为，在她要去的那个陌生而遥远地方的物质方面不能得到保证以前，要横跨两个大陆，进行长途跋涉，自然有些顾虑。巴枯宁整个夏天都为扫除这些障碍操心劳碌。1862年5月，屠格涅夫曾去伦敦住过几天，巴枯宁说服屠格涅夫“借”给他弟弟们二百卢布，一个名叫纳尔班迪扬的亚美尼亚人提供三百卢布，他从赫尔岑手里又花言巧语地弄到了八十英镑。赫尔岑为人虽然多疑，但仍然慷慨大方。另外的开支就必须由弟弟们提供了。米哈伊尔向他们保证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请求。他们也许不相信他，但巴枯宁缠着不放，他们终于同意了。安冬妮于12月份接到了普列姆希诺庄的邀请，并收到了她第一段旅程的路费<sup>①</sup>。

即使到了此时，事情还有些耽搁。巴枯宁本人曾于5月份写信给科尔萨科夫将军，请求允许妻子和他团聚，但将军到阿穆尔河消夏去了。巴枯宁有一种看法，认为“有了妻子的男人比没有妻子的男人危害性要小得多”。彼得堡当局对巴枯宁这种看法是否同意尚不能断定。巴枯宁宣称，如果不发护照，他就要托朋友把安冬妮秘密劫去伊尔库茨克。但是采取这种激烈的方法证明是不必要的。安冬妮于11月起程，她在普列姆希诺庄度过了圣诞节

---

①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5卷第52，110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93—94页；列姆克：《短评》，第25，165—166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52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21页。



和新年，于1863年2月在一位警官的小心护送下，到达边境，离开俄国。出境时，要她在—项声明上签字，声明她没有携带任何文件，并且永远不回俄国<sup>①</sup>。

---

<sup>①</sup> 列姆克：《概论》，第26，78，171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54页。

## 第二十章

### 政治野心

巴枯宁于1861年底到达伦敦，此时正是俄国历史的紧要关头。上一年春天宣布解放农奴使长时期来的要求达到了高潮的顶点。自从克里木战争失败和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以来，国内外俄国人的舆论界在必须改革这一点上联合了起来。五年来，改革派节节胜利，反动派无声无息，只能暗中阻碍改革。但是一旦达到顶点，农奴解放成了既成事实，就意味深长地停顿下来了。人们还没有来得及高高兴兴庆祝一番，双方的批评家就开始估量局势了。有些人认为，改革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下一代人都可稳稳当当坐享其成；另一些人要求民主的胃口很大，未能满足，他们认为，独裁政府正节节败退，现在要一鼓作气，争得新的让步。俄国舆论界又一次分成保守和激进两派。1861年夏，一些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建立一个秘密政治团体。秋季学生闹学潮，导致彼得堡大学的关闭。胆小的自由主义者吓破了胆。警方采取了一些新的警戒措施。于是，鼓动和密谋为一方，怀疑和镇压为另一方，双方进行较量。这两股互相对立的力量正聚集在由来已久的反动和革命两面大旗下面。五十年代后期的自由派已经寿终正寝了。

巴枯宁到达伦敦时，还看不出这一新的阵线的征兆。赫尔岑的自由主义和新一代的激进主义或民粹主义（这个术语刚刚时兴）之间的分裂尚不明显。巴枯宁和赫尔岑本人一样，仍然相信，赫尔岑和革命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其后发生的一些事件使这个问

题早日明朗化了。1862年春，彼得堡发生毁灭性的大火灾，政府认为这是“民粹主义者”干的（几乎肯定没有什么根据）。一个新的秘密团体出现了，其名称很不寻常，叫做“青年俄国”，并以“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继彼得堡火灾之后发生的混乱，使赫尔岑无论如何也洗不清自己的嫌疑了。由巴枯宁的宿敌、变节的自由主义者卡特科夫主办的官方报刊，第一次攻击赫尔岑是民粹主义的真正的罪魁祸首。一个刚从彼得堡来的女学生到奥塞特公寓来访，寻问首都的纵火事件是否真的是赫尔岑干的。赫尔岑对这样的批评极为敏感，故谴责“青年俄国”的宣言是不适时宜的，“不合俄国”国情，企图以此来寻求平衡，表明他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是，这种中间道路既疏远了革命者，也未能安抚保守派。《钟声》的发行量急剧下降。赫尔岑怀着沉重的心情看着右派和左派的危险信号。赫尔岑是个温和派，所以在紧要关头，他和温和派的命运是一样的。8月份，他给一位和他有通信联系的人写信，忧闷地说：“自由派将在两个车轮中被碾得粉碎。”<sup>①</sup>

当赫尔岑还处在十字路口，裹足不前的时候，奥格辽夫却胆怯地转向左翼。巴枯宁不知道什么叫忧闷，也不知道什么叫犹豫，更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当他1861年12月的一个傍晚闯进奥塞特公寓时，赫尔岑就把他看成是来自前世的不合时代的人。从那时起，巴枯宁的立场就完全改变了。坐牢的岁月已经从他生活中抹掉了整整十年时间，他跳过了整个自由主义的时期，这个时期与赫尔岑的名字及《钟声》是紧紧联在一起的。他越过了革命的四十年代，直接跨入了革命的六十年代，只知道这两个时代之间的继续性。到了1862年秋季，赫尔岑仍然迈着沉重的步子在宪制改革的死胡同里徘徊，成了一个过时的人物。而巴枯宁认为只有革命才

---

<sup>①</sup>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1卷第226页，第14卷第382页，第15卷第391页。

是进步，成了新的前进道路上的先锋。这种困境把赫尔岑吓得目瞪口呆，而巴枯宁却一点也不害怕。正象赫尔岑是个不可改变的温和派一样，巴枯宁是一个不可改变的革命派。他对中间道路恨之入骨。一旦革命派和温和派之间有了明确的分界线，他站在哪一边就毫无疑问了，因为现在是1862年，而不是1848年。

关于巴枯宁和赫尔岑之间的争端，在大方向上的根本分歧由于方法上几乎同样存在根本分歧而加深了。赫尔岑不但是个温和派，而且是个时事评论家。在巴枯宁到伦敦前的四年多时间里，他一直通过舆论的工具进行工作。工作稳定，而且总的来说也很有效。他没有网罗党羽，没有建立党派，除了发表观点以外，没有从事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这四年多来，通过国内的旅行者和邮局把数百份《钟声》偷偷送到俄国。赫尔岑对搞秘密活动深恶痛绝，认为建立任何秘密联系系统都是不必要的。他听任给他提供情报的人和希望得他著作的人去寻求他们自己这样做的途径。

巴枯宁认为这些做法纯属外行。他瞧不起这位主张宣传是慢功夫的自封的实干家。说这位时事评论家只能受到贵族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欢迎，因为世界人民——特别是俄国人——大部分都是文盲。米哈伊尔在1848年就摒弃所有形式的公开革命组织，认为那样做一点用也没有。被捕前的几个月，他已经在密谋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试验。现在是1862年，他又打起精神，干起了在十三年前不得不放弃的事了。1848年，他曾希望在波希米亚全境都布满革命的阴谋分子，现在他的野心又转向俄国本土这个更广大的领域。巴枯宁不仅相信革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还是搞阴谋诡计的能手，他喜欢搞阴谋诡计，是个阴谋诡计至上主义者。他想把秘密代表派到各地方去，其最终目的是组织革命，其当前的任务是散发赫尔岑的俄文刊物。巴枯宁本人就是这个行当的总经理，赫尔岑是出版物的作者。

遗憾的是，巴枯宁为实现这项图谋的计划和这项图谋本身的

概念的形成一样，很不成熟。有许多俄国人来伦敦参观那年举行的国际博览会，这些人碰到米哈伊尔就可能被吸收为他的代理人，他们对此事几乎一无所知。这些人才干各不相同，有些人，像曾为米哈伊尔妻子资助过路费的纳尔班迪扬，他们真心同情革命事业，因而受到鼓舞，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其他一些人，像特拉维希侯爵和其他许多俄国游客，他们去拜访流亡者，纯粹出于好奇心。一个名叫沃罗诺夫的青年记者断言，他来伦敦是看博览会的，和巴枯宁相遇纯属偶然，但他们都是巴枯宁要捕捉的对象。巴枯宁对他们不进行了解，就吸收了他们，有时他们几乎不愿意。他不听反面意见，一意孤行，托他们办事，给他们发指示，给他们一些违禁的印刷品，要他们带回俄国，还和他们约定秘密联系的代号。这些无忧无虑的、有时是很轻率的密使接受任务后，就落入精心组织的、无情的俄国秘密警察网的魔掌。

巴枯宁设计的代号现在还存下一些。这些代号极为简单。起先，赫尔岑称为“隐士先生”或“隐士”，赫尔岑的儿子叫“后生”；奥格辽夫叫“诗人”，连最没有受过训练的警官也能识破这些伪装。后来代号就稍微深奥一些了。赫尔岑叫“蒂森豪森男爵”，奥格辽夫叫“柯斯特罗夫”，监狱叫“咖啡馆”，土耳其人叫“鞋匠”等等。在另一个代号里，巴枯宁称自己为“伯拉卡罗夫”，写信用第三人称。关于盐价下跌和麦价上涨这些不相称的句子被写进信中，是想把信件表面上伪装成一封商业信件。但是，巴枯宁忽视了干这一行的基本规则。他应该用密码写信，把密码附在信里。他开始用普通文字写，接着再用密码，在转折时加上一句：“不，我最好还是用密码写”。这些幼稚的做法，说明巴枯宁根本就不是个熟练的阴谋分子。“大丽莎”玩密码，三岁的同名小孩玩布娃娃，同是出于无知，装模作样<sup>1)</sup>。

和巴枯宁通信的人也都受到了损害。自亚历山大即位以来，

---

1) 列姆克：《概论》，第28、75、78—81、106、115—116、130页。

俄国当局对流亡伦敦的人采取宽容的态度，最近几个月在这方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钟声》的编辑人员从此以后被当作公敌来对待，其中增添了一个刚从彼得—保罗、什吕谢尔堡、西伯利亚来的怨气冲冲的鼓动者，一名警特被派到伦敦，报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同伙。这个特务轻而易举地打入了赫尔岑每星期三、星期日在奥塞特公寓举行的什么样人都可以参加的招待会。通过这些方法，俄国当局得知，一个叫维托施涅柯夫的商人到了伦敦，要在7月初回彼得堡，身边带有流亡者给他们在俄国同情者的一些信件。这个商人按时于1862年7月5日越过国境，当即被捕<sup>①</sup>。

维托施涅柯夫被捕是警方进行长期调查的起点，调查结果有三十二人受株连。在查抄这个商人的信件中，发现巴枯宁给纳尔班迪扬两封密码信，巴枯宁给娜塔丽·巴枯宁的一封信，还有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给《土地和自由社》的主要组织者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的几封信。“土地和自由社”是当时最严肃的秘密政治团体。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和纳尔班迪扬旋即被捕，还查出后者保存的、巴枯宁用不同密码写就的五封信，还有一封屠格涅夫写的信。这些信中提到的传送秘密信件的人当中，有沃罗诺夫和特拉维希侯爵，这两个人也先后被捕。搜查侯爵公寓时，又发现了巴枯宁给不同收信人的一批信件——给他妻子的、给娜塔丽·巴枯宁的、给纳尔班迪扬的和给屠格涅夫的。还有一封是巴枯宁妻子写给巴枯宁的。这位无忧无虑的侯爵曾经乐意地把这些信收下来了，但是，他并没有采取什么步骤把信发出去<sup>②</sup>。

与此同时，俄国当局还得到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1862年5月底，巴枯宁同样毫无顾忌地委托两个俄国旅游者把一包信件带给他在北意大利和奥地利的通信人，这两个旅游者要取道这

---

① 列姆克：《概论》，第20—21页。

② 同上，第24—28、75—83、92、120—135页。

两个国家回国。这些信件当中，有几封是巴枯宁写给加里波第及其秘书的，还有几封是写给上一章提到的弗里契兄弟的。这两个旅行者一个名叫尼契波伦科，另一个叫波特金，他们安全地到达奥地利边境的佩斯瑟里。但是，就在这里，保存信件的尼契波伦科忽然神经过敏。他设法叫他同伴接过这些可能引起牵连的信件，但没有成功。于是，他急急忙忙地把信件扔到海关的长凳下面，就上路了。他这件事干得再愚蠢不过了。几天后，奥地利当局发现了那些被丢弃的信件。经过调查，很快就查明信件的性质，查出了携带信件的人。8月初，奥地利当局把这些信件的抄本转交给彼得堡的俄国警察当局，存入了现存的一宗档案材料里。尼契波伦科很快就加入了其他被告的行列，被捕入狱<sup>①</sup>。

这么多的证据给俄国当局提供了需要几个月考虑和调查的材料。从所有被捕人那里都取得了供词，还发了一份询问书给住在巴黎的屠格涅夫，他的回答被认为是不充分的。1863年春，屠格涅夫被召回彼得堡作进一步传讯。在盘问过程中，屠格涅夫表现得胆小如鼠，急于和老朋友的观点划清界限。德·特拉维希因受折磨而疯了，死在一个军医院里，临死时还责备妻子不忠，指责沙皇和巴枯宁有秘密联系。可怜的尼契波伦科大约在同时也死在狱中。直到1864年，三十二名被告中的大多数都被关了两年多时，法院才宣判。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被判服二十年苦役，后来又被永远流放西伯利亚；维托施涅柯夫被判永远流放西伯利亚；纳尔班迪扬被判受警察监督，住到一个边远的小镇；屠格涅夫和沃罗诺夫以及其他人被判无罪。

巴枯宁第一次企图在俄国建立革命组织就遭到了如此不幸的结果。好几个月以后，这些消息才慢慢地传到伦敦。赫尔岑责备巴枯宁“多嘴多舌，坑害了他的朋友”。但巴枯宁那时正埋头于

---

① 列姆克：《概论》，第85—92，108—112页。

其他事情，对赫尔岑的责备不予理会<sup>①</sup>。

\* \* \*

但是，巴枯宁并没有因为这些阴谋的失败而停止鼓动俄国革命。他来伦敦的头六个月期间，又搞了两次试验，证明他做事忽冷忽热，没有条理，也说明他和赫尔岑的关系日渐紧张。

第一件事出于一次奇怪的巧合。巴枯宁到达伦敦前夕，赫尔岑曾接见过俄罗斯一支旧教派的主教帕弗纽季尤斯，这个主教来伦敦的目的是要在异教徒和流亡者之间建立联系。在谈到旧教派的革命功绩时，主教提到他们的一位教士曾出席布拉格代表大会。赫尔岑对这件事兴趣不大。而巴枯宁听说这件事时，却非常激动。自从在彼得—保罗要塞写《忏悔书》以来，他很可能没有想到过代表大会的老同事、狡猾的米罗拉多夫。现在他忘记了对米罗拉多夫的蔑视，只记得在布拉格时产生的那一线希望，即利用旧教派在俄国农民中鼓动革命。巴枯宁又回到了1848年那些不平凡的日子。闲置了十三年没有使用的革命才能现在又有用武之地了。于是，他决定开导帕弗纽季尤斯。

这位主教和凯尔谢也夫一起住在富勒姆。凯尔谢也夫对于巴枯宁和帕弗纽季尤斯的第一次会面有一段带有讽刺性的描写，说巴枯宁迈着缓慢和沉重的步子走上楼梯，用有力的低音哼着俄国教堂的赞美歌：“上帝，当你在约旦受洗礼时”。这种逢场作戏般的自我介绍并没有感动这个精明的主教，他发现这种做法有点江湖骗子的味道。但巴枯宁要讨好人，一点也不气馁。他在海轮上曾经使那个英国牧师科伊相信他同情新教。现在他要使这位脱离正教的俄罗斯主教相信，他对于旧教派和东正教在教义上的不同点有着强烈的兴趣，并暗示说：不用多加劝说，他就可以加入

---

<sup>①</sup> 列姆克：《概论》，第142，182，221—223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492页。



旧教派这一支。巴枯宁以深信不移的口气说，拯救灵魂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他憧憬金光灿烂的未来，那就是拯救灵魂和革命成为孪生姐妹，旧教派推翻东正教，沙皇宣布自己为旧教派的教徒。

尽管表面上有这样和那样的分歧，但在性格上这对奇怪的同伴却有相似之处。他们两人都知道，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他们为人都是既天真又狡猾，并把这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双方为达到各自的目的，都企图支配、利用对方。很明显，在这两个人中，主教更为世故一些，不会轻易上当。他没有在伦敦再呆下去，去听巴枯宁那些阿谀奉承的话，就离开了。但是，凯尔谢也夫于1862年春天秘密回到俄国，经过他在俄国调查的结果，决定出版《钟声》增刊，专谈旧教派的事。增刊由奥格辽夫编辑，不间断地出了两年。巴枯宁在这些活动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抓住一切机会发表文章和谈话，说旧教派是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sup>①</sup>。

赫尔岑还是采取他那一贯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他为人十分多疑，在理性上寸步不让，所以他不大容忍俄国的宗教派别。但是，把《钟声》作为俄国各个受压迫阶级诉苦的论坛，他又感到自豪。赫尔岑或许认为，只要在他的庇护之下，这种愚蠢行为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不同意凯尔谢也夫到俄国执行任务，但他很可能提供了必要的经费。巴枯宁用热忱、奥格辽夫用温和的方法诱使赫尔岑同意使用他的名义和金钱来从事一项他不赞成的冒险事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两年后，才有了报应。很可能由于和沙皇政府达成了协议，旧教派的大主教于1864年初发表了一封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谴责那些“住在伦敦的万恶的无神论者”是“撒旦、伏尔泰那类最邪恶的人”的代理人，并清楚地表明，组成“自由思想家”这个词的那些俄文字

---

<sup>①</sup>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5卷第342—353，398页。

母就是指反基督教者。这场喜剧已经演完了。奥格辽夫编的《钟声》增刊停止出版。巴枯宁再也不提旧教派的革命价值了<sup>①</sup>。

\*                     \*                     \*

如果说旧教派在巴枯宁的革命生涯中只是个插曲的话，那么，下面谈的这件事与其说是个插曲，还不如说是越轨。这件事不仅说明他的热情是轻率的，而且说明他极无定见。1861年秋天，有个叫马特亚诺夫的俄国农民曾来拜访过赫尔岑。此人本来是个农奴，他靠着自己的经营才能，积攒了一大笔钱，赎了身，但原来的主人欺骗了他，撕毁了协议。他在俄国得不到公平待遇，憋了一肚子气，就来到伦敦，向奥塞特公寓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伦敦流亡者还很少有幸接待一个“俄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后来巴枯宁也来到伦敦。马特亚诺夫通过和赫尔岑及巴枯宁的接触很受鼓舞，他很快就把自己个人的痛苦和整个俄国人民的痛苦联系在一起了。1862年4月，他写了一封很不寻常的信，通过邮局寄给沙皇。这封信在下几期的《钟声》上登出来了。马特亚诺夫仍然保持着本阶级忠于王朝的传统。尽管对不给他公平待遇的国家深恶痛绝，但他还不能够想像除了姓罗曼诺夫的人以外任何人来主宰俄国人的命运。他强调指出，俄国人民热爱沙皇，但是罗曼诺夫必须成为“俄国民族的沙皇”，而不是“帝王”（冷酷的、外国的称号）和“专制君主”。他呼吁亚历山大召集俄国国民代表大会<sup>②</sup>。

巴枯宁和赫尔岑都称赞他这种勇敢行为，但他们各自的反应是根本不同的。赫尔岑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马特亚诺夫，而巴枯宁却完全被这个天真的、正直的俄国农民搞得心醉神迷，除了

---

①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5卷第342—353，338页，第16卷第470—471页。

② 列姆克：《概论》，第335—350页。

像赫尔岑和屠格涅夫这些知识分子以外，任何像马特亚诺夫这样满身散发着乡土气味的人都能触动巴枯宁的心弦。巴枯宁和同时代的激进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他固有的、天真的思想和行为。赫尔岑把俄国人民理想化，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理想化，但是不可能想像赫尔岑会采纳一个农业工人的意见，或者马克思会采纳一个工厂工人的意见。只有贵族老爷巴枯宁这个完全脱离阶级意识的人才能无拘无束地和一个农奴出身的人拉关系，并且认为他和马特亚诺夫应该互相感化乃是自然的事。

这两个人在帕丁顿·格林街的公寓里喝茶、抽烟，情投意合。巴枯宁诚心诚意地赞同这位新相识的意见，并着手征集别人在一份给沙皇的奏折上签名，要求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他给《钟声》写了长篇文章，清楚地表明他受到马特亚诺夫的影响。文章题为：《人民的事业：是罗曼诺夫、普加乔夫还是彼斯节里<sup>①</sup>》。他写道，俄国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如同1825年12月由彼斯节里发动的一场知识分子革命；一是如同叶卡德琳娜大帝统治时期由普加乔夫领导的一场农民暴动；一是亚历山大二世发起的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巴枯宁和赫尔岑不同，他不相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领导革命，只有在亚历山大方式和一场新的普加乔夫方式中选择一个。

我们要说真话，如果罗曼诺夫果真能够、而且会把自己从一个彼得堡的皇帝改变成为一个国民的沙皇，我们就应当高高兴兴地跟着他走。我们应该兴高彩烈地聚集在他的麾下，这是因为俄国人民仍然承认他，也因为他已积聚了力量，随时可以行动，只要这种力量能为人民所用，那就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应当跟着他走，才能使俄国人民或斯拉夫人不流一滴血来

---

<sup>①</sup> 巴维尔·伊万诺维奇·彼斯节里（1793—1826），俄国十二月党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译注

进行和完成一场伟大的、和平的革命<sup>①</sup>。

这篇文章和巴枯宁所主张的基本原则一点也不矛盾。多年以来，他一直在玩弄革命的独裁者的概念。在《忏悔书》里，他提到把革命领导权让给尼古拉一世；在西伯利亚，他又选中了穆拉维约夫；现在，他理所当然地可以把领导权交给亚历山大二世。但是，赫尔岑由于不知道巴枯宁写了《忏悔书》，对巴枯宁拥戴穆拉维约夫感到莫明其妙，所以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巴枯宁把罗曼诺夫提高到革命英雄的地位，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像巴枯宁这样精明的人怎么能成为一个无知农民的追随者。他认为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是赤裸裸的机会主义的表现。赫尔岑是个民主主义者，如果他暂时可以与亚历山大妥协的话，那只能在君主立宪制这个范围内。巴枯宁的革命专政这个概念模糊不清，但无论如何，这种专政和君主立宪制毫无共同之处。赫尔岑认为，巴枯宁决不是个民主主义者。很明显，他要求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也不是议会制民主的机构。赫尔岑称这篇文章是“巴枯宁主义蛊惑宣传的大杂烩”，奥格辽夫比较温和一些，指责这篇文章主张“混乱的沙皇专制”。马特亚诺夫由于巴枯宁已经呼吁他当“公断人”，很自然地赞成这篇文章，并向赫尔岑的嘲笑提出挑战，声称应当让巴枯宁“不受外界影响”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赫尔岑不为所动，拒绝这篇文章在《钟声》上发表。他和巴枯宁素有芥蒂，这下子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不和的因素<sup>②</sup>。

关于巴枯宁和马特亚诺夫之间的关系就简单地谈到这里。1862年秋天，《人民的事业》这篇文章在伦敦单独出版。因此，

---

①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396—418页。

②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5卷第354，549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48页。

巴枯宁和赫尔岑间的不和昭然若揭，有目共睹。年底，马特亚诺夫发表了题为《人民与国家》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把以后包含在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哲学里的某些思想预先透露出来了。1863年4月，巴枯宁已经离开了伦敦，马特亚诺夫不听赫尔岑的劝阻，决定回国，一个俄国农民远离自己国家，不可能长期生活下去。马特亚诺夫为人太耿直、单纯，他不相信沙皇能够怀疑他的一片忠诚，或者对他的坦率表示不满。当他在边界线上被捕，并发配西伯利亚做五年苦工时，他的确大为惊讶。此人在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于1866年去世<sup>①</sup>。

\*                     \*                     \*

俄国的政局此时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地下组织遍及全国，其中最主要的是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的《土地和自由社》。非法的秘密团体不会留下多少记载，这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有关《土地和自由社》的许多轶事至今还不为人所知。但是，在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1861年9月访问伦敦时，似乎已经为这个组织奠定了基础。《土地和自由社》这个名称是由赫尔岑最喜欢的两个口号组成的，直接从奥格辽夫在《钟声》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得名的。这篇文章开头说：“人民需要什么？那很简单，人民需要土地和自由。”很明显，奥格辽夫一开始就是这个组织的热情支持者。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使得赫尔岑不能不表示同情和支持。他们起初不大相信巴枯宁，认为他对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承担义务，有所不便，因为俄国革命者对奥地利斯拉夫人的事业没有兴趣<sup>②</sup>。

这个组织刚刚成立时，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就被捕，这肯定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活动并没有停止。到了1862年，俄国绝大

---

① 列姆克编：《概论》，第350--356页。

②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77，83页。

多数的大城市成立了小组。活动情况的报告传到了伦敦，使沉不住气的巴枯宁进行了新的努力。他已经丢掉了对中欧斯拉夫人的幻想，对旧教派、对马特亚诺夫的“混乱的沙皇专制主义”都不满意，故急于对《土地和自由社》表示热烈的欢迎。《钟声》必须对这个新的运动给予支持，赫尔岑必须派遣代表到合适的、有利的地方去，以保持和俄国的联系——到俄属波兰的边界、加拉茨、敖德萨、君士坦丁堡。必须在高加索、格鲁吉亚、沿伏尔加河到下诺夫戈罗德、直到顿河流域进行宣传。赫尔岑发现一个刚从俄国来的年轻人，名叫尼古拉·茹柯夫斯基。只要赫尔岑提供他必要的经费，这个人很愿干这项冒险的差事。巴枯宁本人负责为茹柯夫斯基办一张护照。他通过一个没有提及姓名的保加利亚人（他很可能在伦敦遇到过此人）的关系，办了一张土耳其人的护照<sup>①</sup>。

赫尔岑对《土地和自由社》开始阶段很冷淡，对巴枯宁为促进这个组织活动的努力很不信任。他强烈地预感到，这个组织的下场将是“可耻的或愚蠢的”。他认为，政治宣传是一个慢功夫，其效果要在几年、数十年以后才能表现出来，巴枯宁总是仓促行事，总是认为革命可以一蹴而就，“误把怀孕三个月当成九个月”。奥格辽夫为了劝人多忍耐，发明了另外一个更为有趣的比喻。他写道，巴枯宁就像一个人爱上一个尚未成人的女孩子一样，爱上了革命。对于一个好心肠的情人来说，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即使这种等待意味着不能活着得到她。但是，巴枯宁和《土地和自由社》的年轻人都没有等待他们新媳妇的心境。1863年1月，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的朋友、这个团体的执行委员会成员斯列普卓夫来到伦敦，邀请《钟声》的编辑人员做团体的在外国“代理人”。流亡者第一次面临必须正式确定对《土地和自

---

①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90—92页。

由社》的政策<sup>①</sup>。

在过去一年里，赫尔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进退两难，此时，他不能摆脱这种困境。奥格辽夫的态度使赫尔岑尤其感到痛苦。奥格辽夫和巴枯宁一样，为人热心，这就使得他不可能像赫尔岑那样对那些年轻的革命者持不友好的、怀疑的态度。赫尔岑如果要攻击巴枯宁，那又要得罪奥格辽夫。为了逃避这一困境，他就和往常一样，采取嘲笑和批判的态度。他说，他发现斯列普卓夫态度傲慢，并表现出屈尊俯就的样子。赫尔岑冷冷地问，《土地和自由社》在俄国有多少人，斯列普卓夫回答说，“在彼得堡有几百人，地方有三千人”。斯列普卓夫走了以后，赫尔岑以挖苦的口气问奥格辽夫和巴枯宁，他们是否相信斯列普卓夫，奥格辽夫感到为难，一声不吭，而巴枯宁却很轻快地回答说，如果说现在人数不多的话，很快就会多起来的。巴枯宁一旦下决心做一件事，就我行我素，即使是合理的反对意见他也全然不顾<sup>②</sup>。

赫尔岑天生是个聪明人，他已经看透《土地和自由社》的主张是虚伪的，前途是渺茫的。但他的敏锐的判断力并没有使他得救。不但两个同伙的结合在一起的热情使他成了受害者，而且环境所迫也使他成了受害者。他不能单枪匹马地既反对政府又反对革命者。除了毁掉他的地位和名誉以外，他是不可能与政府妥协的。他不得不和革命者站在一起，即使放弃他的反对意见，加入秘密组织和阴谋活动，他也得这样做。他的屈服实在出于无奈，心情很沉重。于是，他就当上了“《土地和自由社》在外国的首席代表”。1863年3月1日，《钟声》发表了一篇有说服力的宣言，宣布新组织的诞生，并对其成员表示欢迎，说他们都是“志

---

①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68，90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89页。

②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440页。

同道合的兄弟”。巴枯宁的活力、奥格辽夫的软弱以及事情的必然性迫使赫尔岑违反自己的意愿，从改良主义者变成了革命者，从评论家变成了同谋者<sup>①</sup>。

但是就在这时——大约在《钟声》发表那个宣言的前一个星期——巴枯宁已离开伦敦赴瑞典。后来发生了更为引人注目的波兰起义，《土地和自由社》就默默无闻了。

---

<sup>①</sup>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7卷第107--108页。



## 第二十一章

### 波 兰

波兰在巴枯宁的生涯中起过重要作用，波兰的事业曾使他有机会第一次表现出对民族自决的热情。1847年秋，波兰的事业激发他第一次公开发表演说，使他被驱逐出巴黎；1848年春，又把他引向东欧。布拉格代表大会使波兰问题在更为广泛的斯拉夫人的问题中消失了，从而使它在巴枯宁的思想上不占重要地位。但是，他以往和西伯利亚波兰人的联系以及和一个波兰女子结婚（虽然他妻子对波兰人的愿望满不在乎）却使他忘不了波兰。在《致我的俄国、波兰和其他斯拉夫族友人书》的宣言中，宣布俄国、奥属各斯拉夫族和波兰的三重解放纲领，波兰就是其中之一。波兰问题的核心是俄属波兰问题，这个问题近来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波兰不能放进保险箱，也不能使之不受那些自由愿望的影响，这些愿望在亚历山大二世在位的最初几年里遍及俄国。波兰人的愿望复活了，沙皇的一些较为开明的谋士也开始玩弄给这个被压迫行省以“行政自治”的把戏了。

由于波兰阵营中存在两个对立的派别，情况就复杂了。华沙成立了两个平行的组织，一个是地主贵族（Szlachta）委员会，另一个是中央民族委员会。前者希望“解放”后，贵族成为新波兰的主人；民族委员会则主张既摆脱外来的俄国统治，又摆脱同样凶恶的波兰地主的专制，从而获得自由。目的和利益不同，政策就有根本差异。波兰贵族倾向于和俄国当局合作，如果有可能合作

的话；而波兰民主主义者则在俄国激进派和革命者中寻求天然的盟友。

基于这些情况，俄国政府理所当然地要挑动波兰贵族反对民主主义者，但执行这项政策却遇到了一些困难。在过去漫长的年代里，波兰很顺利地越过东欧，自波罗的海入黑海，占领大片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从而，波兰地主统治了当地的农奴，许多波兰大地主的祖先的产业就是这样获得的，波兰贵族要建立的就是包括这些非波兰领土在内的“自由”的波兰。俄国承认波兰是可能被准许“行政自治”的地区，称为“议会”波兰，其东部边界和种族范围相当一致，符合波兰民族愿望。波兰地主阶级的领土欲望使俄国政府和贵族委员会的合作总是不稳定；而民族委员会和俄国革命者的关系却更加密切了，因为双方都认为，领土问题从属社会问题，他们至少在理论上愿意解决领土问题，含糊地谈谈当地人民的意愿。但是，有许多人一遇机会就支持贵族扩张领土的苛刻要求，即使在民主主义者中也不乏其人。

1862年夏天，巴枯宁在伦敦重整旗鼓，而波兰历史此时也处于紧要关头。5月，亚历山大封其兄弟康斯坦丁大公为波兰总督，此人向来以持自由派观点而闻名；又封波兰贵族维洛波勒斯基为行政总督，此人是亲俄派。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调和。但随后制订的地方自治纲领，甚至对贵族都加以嘲弄，使民主主义者走投无路。一个波兰裁缝向大公开枪，两名印刷工人向维洛波勒斯基开枪，但都未击中，这些未遂的杀人犯都被处决。双方剑拔弩张，公开的冲突不可避免。整个夏季和秋季，民族委员会忙于准备斗争，秘密使者频繁来往于华沙和彼得堡之间，穿梭于华沙和西欧的波兰流亡者之间，各地的波兰人顿时振奋起来。

这些激动人心的事件重新唤起了巴枯宁心中原有的热情。造成波兰爱国者分裂的那些有争议的问题被抛到一边去了。作为革命者，他不可能同情贵族和地主维护和农奴制近似的社会制度的

愿望；作为俄国人，他又不能同意波兰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土要求。这些污点必须从波兰的光荣历史上抹掉，他要求波兰人“抛弃过去的历史，宣布成立农民的波兰”。但行动时机已经到来，这些考虑似乎毫无实际意义。巴枯宁热情欢迎前来谈论即将来临的起义的各种各样波兰人，并不管他们可靠与否，也不管他们持什么观点，都将他们介绍给持挑剔眼光的赫尔岑。1862年6月，一位从华沙来的俄国军官波捷勃尼亚说，波兰的俄国驻军极为不满，决不会向起义者开枪，还说他正在组织俄国军官委员会，在起义爆发时和波兰人合作。波捷勃尼亚表现出明显的诚实和勇气，甚至连赫尔岑都动了心，开始对波兰的前途稍有乐观的看法。7月，在为日罗姆·波拿巴亲王举行的宴会上，巴枯宁又有一次机会当着波兰人的面表示他对波兰事业的热情<sup>①</sup>。

8月中旬，巴枯宁去巴黎，他此行的本意和细节并无记载，但其间最突出一件事是他会见了波兰将军梅洛斯拉夫斯基。梅洛斯拉夫斯基少年时参加1831年波兰起义，后流亡巴黎。1846年曾为遭到失败的普属波兰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因而在普鲁士监狱里关了两年。他是波兰的职业军人，这些军人的军事天才很受革命发起人的赏识。他曾在西西里岛参加反对那不勒斯国王的斗争，是巴登起义的指挥官之一，又曾服役于加里波第军团。此人还不到五十岁，正在巴黎等待时机，以施展其才华，特别希望祖国爆发革命。他是日罗姆·波拿巴亲王的至交。巴枯宁在巴黎会见梅洛斯拉夫斯基很可能是在伦敦为亲王举行的宴会的成果之一<sup>②</sup>。

梅洛斯拉夫斯基将军无疑是个人才，他和巴枯宁一样，把极端的激进信念和贵族以及独裁者的个人偏见结合在一起。他心目

---

<sup>①</sup>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81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5卷第364，366页。

<sup>②</sup>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173，179页。

中的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而是一次由他自己计划和指挥的惊天动地的冒险。

〔他曾说过〕宣传乃是胡说八道。当你们看到我跨上战马，那些亲王、伯爵、达官贵人分立两旁，刺刀、大炮随我移动的时候，那完全是两码事。转瞬间，在二十四小时内，我会为你们发动一场经济革命……大炮最有说服力，比狄摩西尼<sup>①</sup>更雄辩。

总之，梅洛斯拉夫斯基和巴枯宁同样精力充沛，同样妄自尊大，同样蔑视思想的一惯性，同样有无视客观事实的能力。但是，这些气质上的相似之处决不能保证协调一致，在波兰问题上，他们之间的分歧点就多于共同点。梅洛斯拉夫斯基持有极为先进的观点，甚至把民族委员会也当成反动派。但他也不向贵族屈服，极力主张保持波兰的“历史边界”，并且扬言，那些认为波兰不包括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人都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此外，他虽然支持俄国本土的革命，但认为在他所主张的波兰边界之内，鼓动革命是对民族事业的背叛<sup>②</sup>。

巴枯宁见过梅洛斯拉夫斯基两次，从他们后来所写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巴枯宁的热情甚至顶住了将军的片面的主张。梅洛斯拉夫斯基说他自己对巴枯宁的缺点完全可以迁就，他相信“拉多加湖的湿气吞没了他半个狂热的头脑”，但他也还愿意承认，“他那不幸的头脑也许会在与我们那些头脑健全的爱国者接触中逐渐恢复”。波兰起义爆发时，巴枯宁正式同意发表宣言，“命令”俄国驻军“撤回斯摩棱斯克，撤回第聂

---

① 狄摩西尼，古希腊的大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译注

②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5卷第561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174，184页。

伯河以南”。梅洛斯拉夫斯基非常重视“《钟声》的编者对1772年边界明确承认”这一点，他在朋友们的劝阻下，才答应对巴枯宁的“无知妄说”不进行“过份批评”。巴枯宁对这一奇妙的诺言保持沉默，但是，他谈到梅洛斯拉夫斯基如何警告他以及他的朋友不许和波兰革命者来往，因为“除了他（梅洛斯拉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以外，没有正经的波兰人”。梅洛斯拉夫斯基还特别警告他不要和民族委员会的使者来往，因为他根本不承认该委员会。这里所叙述的（可以互相补充，并不矛盾）只是猜测，不一定可靠。但十分肯定的是，巴枯宁向梅洛斯拉夫斯基借过两本书，把一名来自波兰刚到巴黎的俄国军官介绍给他，然后回伦敦<sup>1</sup>。

巴枯宁喜爱交游的本性，当然不会受梅洛斯拉夫斯基所称只有他才代表波兰事业的影响。9月下旬，又有三个波兰人——希勒帕德列夫斯基和米洛维茨——来到伦敦，他们给《钟声》编辑带来华沙中央民族委员会的一封信，建议波兰和俄国民主义者实行“兄弟般联合”，以解放波兰。他们和大多数来伦敦的波兰人一样，先拜访波兰的知名而又可靠的朋友——巴枯宁，巴枯宁又带他们去见赫尔岑。此时，波兰历史处于重要关头，巴枯宁和《钟声》编辑之间关系也进入了又一个关键时刻。

巴枯宁和赫尔岑出于信念和传统都深深地卷入了波兰的独立事业，但此事迄今为止都是空谈。然而以武力裁决的时候肯定就要到来，民族委员会向他们求助，第一次把问题实际化了。巴枯宁出自真诚的热情欢迎代表们的到来，并充当他们的保护人。一旦决定采取行动，意见分歧即刻化为乌有，对待为神圣事业而战的斗士，就要开诚相见，握手言欢，解囊相助（如果还未囊空如洗的话）。但赫尔岑的看法不同，他以惯有的怀疑的眼光看待波兰的前途，他预见，如果这次冒险失败，那将意味着支持者的毁

---

1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175--176、180页。

灭。对这份特殊礼物挑剔一下是完全有理由的，对于要用《钟声》名义进行担保的某个运动的来头进行严格审查，是他的权力，也是他的义务。

赫尔岑曾经提到，在奥塞特公寓进行关键性的会谈时，巴枯宁如坐针毡，“就象一个应试者的亲属，或象一个律师，担心当事人说走了嘴，把事情弄糟”。赫尔岑发言时，先宣读了他即将在《钟声》上发表的《致驻波兰的俄国军官书》，呼吁不要对波兰兄弟使用武力。米洛维茨接着宣读从华沙带来的信，与会者开始进行冷静而又客气的争论，而不是握手言欢。赫尔岑表现得（如同巴枯宁后来告诉他那样）“如同维也纳代表大会上的外交家”。双方都有些不满意。赫尔岑认为，那封信虽然谈到了波兰的政策，但大谈波兰失去的省份，很少谈到把土地分给农民。如果将信修改一下，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居民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他就将这封信在《钟声》上发表，再加上适当地表示同情的答复。波兰人建议将赫尔岑的《致俄国军官书》进行某些修改，以示反驳。与会者暂时休会，第二天继续开会。

次日上午，巴枯宁提前到达奥塞特公寓，责备赫尔岑不够热情，缺乏信心。他也许还记得和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冲突，恳求赫尔岑不要“损害已经激起的民族感情”。巴枯宁说，赫尔岑表现得不是个“实干家”，而是咬文嚼字的先生，似乎当前讨论的问题纯属新闻学或“文学”。但是，巴枯宁也极力劝说波兰人；他们在第二次会谈中，事先就准备好按赫尔岑的要求作出让步。结果却有点自相矛盾，因为那封信最后定稿时，仍继续宣称“我们认为只有一个波兰，它包括波兰、立陶宛和罗塞尼亚组成的联盟”，另一方面，又承认其居民“完全有自由决定留在波兰联盟之内，或者根据自己的意愿脱离联盟”。赫尔岑把这些很难协调一致的自相矛盾的声明留给波兰人的良心去解决。他把这封信发表

在《钟声》1862年10月1日这一期上，答复发表在下一期上。巴枯宁要求在答复的末尾署上他、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名字，遭到了拒绝<sup>①</sup>。

与此同时，巴枯宁也没有忘记梅洛斯拉夫斯基，后者发表文章提出和“三位一体”缔结“严肃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又一次警告巴枯宁不要和“任何人”都来往。《钟声》发表民族委员会那封信的第二天，即10月2日，巴枯宁对此作了答复。他有苦难言，只好称赞梅洛斯拉夫斯基是位“精力最充沛、最有教养的人”。他解释说，他不可能和民族委员会断绝关系，但他希望这不会妨碍“伦敦人”和梅洛斯拉夫斯基之间的关系。

这个温和的要求却引起了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愤怒。他写信回答说，如果民族委员会存在的话，那它现在也会由于《钟声》发表那封信而自取灭亡了。他给好几家法国报纸写信，谴责这个“所谓的委员会”“把三分之一波兰领土拱手让给新复活的俄国”。巴枯宁无意就此罢休，1863年春季波兰起义开始时，他发表一本小册子，摘引了这次通信内容，并不怀好意地希望这位将军能“及时地”赶到波兰，看看那些为波兰解放而战斗的俄国人。梅洛斯拉夫斯基足智多谋，他仍呆在巴黎写文章反击巴枯宁，又一次“要求恢复1772年的波兰”。争论到此并未结束。五年后，这位努力不懈的斗士又重返沙场。他在巴黎发表一封公开信，谴责巴枯宁插手那次近乎被人遗忘的起义；这就激起巴枯宁在日内瓦写文章反击，文章的标题倒很得体，叫《向梅洛斯拉夫斯基敬最后一言》。此时，除了这两位斗士和亚历山大·赫尔岑（他在《钟声》上发表了一篇很长而又悲观的自我辩白文章）以外，恐怕没有什么人对这一过时的争论还有什么兴趣<sup>②</sup>。

---

①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503—505，508—510页。

②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181—186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20卷第231—239页。

1862年底至1863年初的冬季，波兰正值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巴枯宁经历了又一次有趣的冒险，也又一次说明他很容易上当受骗，也很容易产生乐观情绪。12月中旬，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巴黎的信，寄信人署名“胡言乱语”，信中对他为波兰事业所作的努力表示祝贺，也提醒他特别注意梅洛斯拉夫斯基的阴谋。巴枯宁对此很得意，回信要求写信人赐告姓名，表示急于和他深交。但那位神秘的写信人不愿透露身份，只说他是出生在俄国的波兰人，以前和巴枯宁一样，是曾被发配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犯，现在亡命巴黎，并说他喜欢巴黎，因为巴黎“气候温和，有民主的和社交活动场所，消息灵通，还有轻浮的女人”。他声称“他的地位和社会联系不允许他知道很多事”，但他反复强调他不信任梅洛斯拉夫斯基，并希望巴枯宁给他提供波兰时局的情况。这种增进友谊的通信持续了两个月。如果说“胡言乱语”没有得到什么重要情报的话，那并不是巴枯宁没有诚意，而是因为除了人所共知的波兰日益动荡不安以外，别的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终止通信的原因不明。巴枯宁从未猜想到那位“胡言乱语”者原来是俄国秘密警察的特务<sup>①</sup>。

\* \* \*

波兰起义筹划和宣传了很长时间，对它的前途也争论多时，但最终爆发却是完全出人意外的。俄国当局确认他们对这次起义最有准备，于是决定对起义者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迫使起义爆发。俄军在波兰尚未实行征兵制。1863年1月15日，颁布了选征兵役命令。首先征集城镇无产阶级，这是个反叛阶级，起义者可望得到这个阶级的支持。征兵军官立即投入工作。这种做法迫使民族委员会采取行动。经过一个星期的紧张准备，起义于1月22

---

<sup>①</sup>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5卷第596—604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08页。



日夜里爆发，开始向俄国在波兰的驻军发动总攻。

巴枯宁（甚至赫尔岑也一度）对俄一波合作寄予的奢望立刻成了泡影。起义的突然爆发不但出乎伦敦的流亡者所料，就连彼得堡的“土地和自由社”的领导人也不知所措，后者曾劝说民族委员会把起义推迟到5月份。同情起义的驻波俄国军官也措手不及，他们事先没有得到他们愿意当作同志的那些起义者的通知，就受到他们的攻击，并被解除武装。俄军没有一将一卒倒戈，在俄国本土一切都很平静。波兰居然能单枪匹马取得成功，实在不可思议。游击战在波兰全国展开，强烈的骚动席卷激进的欧洲。自1848年和1849年失败以来，十五年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马克思迫不及待地给恩格斯写信说：“可以肯定，革命的时代又一次全面展开了。”<sup>①</sup>

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巴枯宁不能在伦敦呆下去了。他总是宣称，不管起义何时爆发，也不管其成功前景如何，他一定要参加。他不是那种能劝别人为自由而战而自己却不参加战斗的人，正如他11月写给他的胞弟亚历山大的信中说的那样，“宣传是必要的——要他人付出代价”。赫尔岑是个文人，他静静地坐在书斋里，在《钟声》上发表文章，祝贺起义者旗开得胜，谴责俄国当局的暴行，呼吁俄国士兵不要向他们的波兰兄弟开枪，私下却流露出悲观情绪，认为事情的结局不会美妙。他能这样做也算不错了。而巴枯宁是个实干家，爱捅马蜂窝，他必须赶赴现场。波兰着了火，他必须去煽风，以助火势。

但去波兰要比他预料的复杂得多。物质上的困难很顺利地克服了，他弄到一张很合适的护照（使用的手段不得而知），护照上的名字是法籍加拿大教授赫里·苏利埃；他曾在巴黎结识的一

---

①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19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4页。

位富有的波兰人布腊尼茨基伯爵准备支付路费。这些问题解决以后，巴枯宁就断定自己定会受到波兰人的热烈欢迎。他一封接一封地给华沙的民族委员会写信，自愿效劳。他要通过煽动来转向反对俄国政府本身；他要策动立陶宛和乌克兰的农民起义；他会收编俄军的逃兵，让他们倒戈；他和他的朋友会“挺身而出，站在起义者和俄军之间，以便使你们不遭到极大的不幸，我们不遭到极大的屈辱，如果时间还来得及的话。”

但是，巴枯宁很快就被迫作出令人烦恼的、难堪的结论：人家不要他。波兰人不信任所有俄国人，这是根深蒂固的；而怀疑巴枯宁的判断力，也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勉强地同意巴枯宁来效劳。巴枯宁前几封信如石沉大海。后来，民族委员会通知他最好还是留在伦敦。但是巴枯宁不是那么容易被回绝的，他犹豫了一下，便于2月21日乘船从伦敦起程，和他同行的是民族委员会驻伦敦代表茨韦尔查凯维奇，还带上了一份他的有名的密码，以供将来通信使用，为此，他得到了显影墨水的配方。临别时，巴枯宁要求委员会的负责代表（他还刻薄地补充说，不是“傻子”或“半傻子”）在哥本哈根接他，安排他下一步旅程。赫尔岑只有这一次迁就了巴枯宁搞神秘活动的癖好，写信给他在意大利的女儿说，“米哈伊尔叔叔已起程去布鲁塞尔，也许会一直到佛罗伦萨”。<sup>①</sup>

如果认为巴枯宁想孤注一掷，以牺牲自己而有意去挽回名誉，那就想错了。巴枯宁离开伦敦时，波兰起义胜负未定。几天前，连谨小慎微的赫尔岑也写信给奥格辽夫说，“波兰的事业还是不

---

①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201，205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103，375—377，491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99—101，107—109页；《红色档案》，第7卷第113页。

顾一切地坚持着，事实上是走上坡路”。人们普遍希望英、法会在外交上、甚至在军事上进行干预，支持波兰。直至4月，赫尔岑那个冒失的儿子还认为，“霍尔施坦-哥托尔普<sup>①</sup>王朝的覆没是不可避免的”。1863年2月，巴枯宁有资格把波兰起义看成一项正在进行中的事业，其成功的可能性如果不是由于他的计划，也是由于他的威望而加强了。此外，他还另有准备。如果到不了波兰，他就呆在斯德哥尔摩，“煽动那些野心勃勃的瑞典爱国者在芬兰发动起义”，定会使处于波兰危机的俄国政府大为困恼。到了哥本哈根以后，他等了四、五天，民族委员会也未召唤他，于是，巴枯宁于3月初起程去瑞典<sup>②</sup>。

在从哥本哈根去哥德堡的船上，他遇见巴西驻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代办塞诺尔·布里托，两人就海阔天空地谈了起来。他们一直同路到斯德哥尔摩。在旅途中，保持加拿大人赫里·苏利埃的身份很困难，也没有意思，于是巴枯宁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并叫塞诺尔·布里托誓不泄密。他谈了他的计划，向他的同伴保证说，只需农民起义就能推翻俄国政府。塞诺尔·布里托认为他的同伴很有意思，但并不把他的观点看成一回事。这位巴西的外交家猜不出究竟什么兴趣吸引着这位名叫巴枯宁的俄国同伴。

\* \* \*

巴枯宁刚刚离开伦敦，一个他会举双手赞成的机会出现了。那位给他提供路费的富有的波兰人布腊尼茨基成了一位要人，他正在巴黎招募和资助增援波兰起义者的波兰远征军。这支远征军

---

① 十九世纪的沙皇罗曼诺夫氏全是女沙皇，叶卡德琳娜一世的丈夫、沙皇保罗的假定之父是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哥达年鉴》总是称在位王朝为“霍尔施坦-哥托尔普-罗曼诺夫王朝”，使俄国宫廷极为恼火。

②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68，103—104，225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10页。

由波兰人、法国人、匈牙利人、唯一的一名俄国人以及少数其他国家的人组成，共二百多人，将从水路去波罗的海，袭击立陶宛沿海地区。远征军的指挥官是拉品斯基上校，此人原为波兰海盗，曾在高加索与俄国人作战。副指挥官是个犹太人，叫斯蒂芬·波莱斯，别名蒂冈多尔德，还有一位随军的“文职专员”德蒙托维茨，代表在华沙刚成立的临时政府。1863年2月14日，就在巴枯宁起程前一个星期，远征军从巴黎秘密开往伦敦，候船开拔。但等候和准备了五个星期，远征军就无法保密了。沃德·杰克逊号轮船受租运送远征军去波罗的海，当轮船准备起航时，俄国大使得知此事，向外交部提出抗议。海关当局发现，货单上委婉地列为“五金器具”的货物原来是武器弹药。3月21日晚，部队登上沃德·杰克逊号时，此事仍在考虑之中。远征军担心再等下去一切都会告吹，就劝说船长罗伯特·韦塞莱不等拿到出港证就起航。

巴枯宁已起程前往哥本哈根，不知道这项大胆的计划。远征军的组织者要么忘记了他，要么——更可能——不相信他的判断力。现在保密的有利条件已经失去，就要首先考虑巴枯宁参加进来所能带来的威望。沃德·杰克逊号起航那天，赫尔岑和茨韦尔查凯维奇都打电报到斯德哥尔摩，请巴枯宁在第一个停靠港赫尔辛堡上船。后来，巴枯宁向赫尔岑发牢骚说，他这样一个年近半百的汉子却被象一个孩子一样蒙在鼓里，象一个差僮一样被随意使唤。但是他的第一个反应还是感到高兴，因为发挥积极作用的机会终究到了。他3月22日星期日下午收到那两份电报，次日上午8点，他不但自己准备好动身，而且还诱使他在斯德哥尔摩认识的波兰人卡林卡和他同行。过了哥德堡就没有铁路了，他们乘长途车，3月26日傍晚才赶到赫尔辛堡。沃德·杰克逊号已经在港等了24小时。船长韦塞莱和远征军的高级军官已经舒舒服服地住进了当地的旅馆<sup>①</sup>。

<sup>①</sup>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11—116，119页；关于沃

他们一到达，出现了双方都不愉快的气氛。波兰人看到巴枯宁带来的那位不速之客，很不高兴，因为卡林卡属贵族和教士派，是查尔托雷斯基的忠实追随者；而巴枯宁则对波兰人感到失望。拉品斯基智勇双全，但巴枯宁很快就得出结论说，此公“没有良心，或者至少是良心易变”，还说他憎恨所有的俄国人。波莱斯-蒂冈多尔德是犹太人，因而必是间谍。那位唯一的无害的俄国人叫莱茵哈德，外号“莫斯科人”，同伙们都明显地不信任他。但所有这一切对行迹可疑的船长韦塞莱来说，都无关紧要，他的话题总是转向他因无出港证出港会受罚五百英镑以及流放西伯利亚和处以绞刑的危险。当远征军又一次准备出航时，船长推说气候恶劣，又让他们在赫尔辛堡耽搁一天半时间。巴枯宁肯定这个英国佬是受俄国政府雇用的。他急切地希望他们驶入波罗的海，那时，他就能用手枪对着韦塞莱船长的脑袋，迫使他就范<sup>②</sup>。

与此同时，有一条不好的消息传到赫尔辛堡，消息看来和那个豪侠的船长不肯开船有关。1863年，北部的春天来得异常的早，雷维尔军港已经解冻，俄国巡洋舰可望随时进入波罗的海。想个应急办法从来难不倒巴枯宁。他给在巴黎的布腊尼茨基写信，请他买一艘装甲巡洋舰，“配备四门口径最大的大炮”，在波罗的海挂波兰国旗。他连零头都算得很精确，估计要一百八十万法郎。信的结尾（如果我们相信波莱斯-蒂冈多尔德的生动描写）冠冕堂皇地呼吁：“你出钱，我卖命！”布腊尼茨基根本不理这种要求，但巴枯宁这个新兵倒给远征军士兵露了一手。士气恢复了，1863年3月28日下午一点，沃德·杰克逊号终于从赫尔辛堡起航，需要另一条船将巴枯宁和他的行李物品送上船。旁观者感到纳闷，

---

德·杰克逊号轮船的英国外交部档案局未发表的文件（作者摘要发表在《浪漫的流放犯》一书中，附录E，1933年）。

②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12—113，116—119页。

不知以前是否有过一个士兵带着八件行李出征<sup>①</sup>。

沃德·杰克逊号的公开目的地是波罗的海瑞典海岸的哥得兰岛，从那里可以直达立陶宛沿海地带，但韦塞莱船长却另有打算。他肯定听说俄国巡洋舰要来的消息，也许听说巴枯宁要用手枪威胁他的事。他身边只有少数几名英国水手，在巡洋舰出没的海里，身处这帮鲁莽的异国亡命之徒之中，只好用计策而不公开来反抗。人们抱怨饮用水的质量不好，含有白垩，色如牛奶。韦塞莱船长宣布，他要去哥本哈根取得淡水供应，只用两个小时就够了。轮船安全进港，他直截上岸，去拜访英国大臣奥加斯特斯·帕吉特爵士。

这次会见无记载可查，但韦塞莱船长当晚未返回沃德·杰克逊号，次日，他通知说，只要船上有一个波兰人，他就不上船。因此，其他船员也离开了，只剩下远征军士兵，总工程师和一个丹麦引航员。巴枯宁在拉品斯基手下一名军官的陪同下，急忙去英国公使馆，奥加斯特斯·帕吉特爵士非常热诚地接待了他们。他同意他们受到了无礼的对待，但他认为，他们低估了遇到俄国巡洋舰所能引起的不良后果。他否认韦塞莱船长是受俄国雇用的，他无论如何不能强迫船长和船员开船。他只能请他们去求助于沃德·杰克逊号船主在当地的代理人。他还说，这些代理人碰巧也是俄国舰队的代理人，当时正准备为一艘即将来港的俄国巡洋舰加煤。这次会见使巴枯宁大为高兴，他认为奥加斯特斯爵士是个“正人君子”。代理人乐于帮忙，建议找丹麦船员把沃德·杰克逊号开到最近的瑞典港口马尔默，只有两小时的航程，远征军在那里还得再一次尽量自己想办法<sup>②</sup>。

---

① 《红色档案》，第7卷第132，134页。

②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13—114页；《红色档案》，第7卷第134—137页。

他们不得已接受了建议，3月30日，即从泰晤士河光荣出航九天以后，远征军就在马尔默安营了。当地人不知底细，他们欢迎远征军，高呼“波兰万岁！”，随后拥进远征军领导人下榻的旅馆的院子里，边欢呼边唱爱国歌曲。一会儿，巴枯宁露面了。说来也很奇怪，一个俄国人居然被一批波兰人推选出来代表波兰向当地人表示感谢。但很少有易于冲动的人——如果有时间考虑一下，情况就不同了——会对巴枯宁想当领头人的要求提出争议。这样做也有实际的好处，巴枯宁的嗓音可以压住那群人的呼喊。他感谢大家对远征军的热情接待，并说波兰人和瑞典人“一向同样热爱自由，彼此深切同情”。群众又一次为瑞典和波兰欢呼，又唱起爱国歌曲，当晚在旅馆里举行了一个宴会，才算结束<sup>①</sup>。

然而，这些现象并不能掩盖远征军所遭到的不光彩的下场。1863年4月1日，巴枯宁和德蒙托维茨去斯德哥尔摩，两个星期以后，拉品斯基和其他波兰人也去了。远征军士兵在马尔默等待，希望找到另一只船把他们送到波兰。但是，沃德·杰克逊号航行的可笑结局是：海路通行希望不大。领导人物纷纷自我辩护和互相指责以求保护自己。斯德哥尔摩总的倾向是指责不在场的茨韦尔查凯维奇，说他安排不当，耽搁了行期，致使远征军泄密；茨韦尔查凯维奇则反过来断言罪在巴枯宁，因为他介绍了不受欢迎的卡林卡，又主动提出“不恰当的、有害的建议”；巴枯宁现在又随时准备骂卡林卡，因为卡林卡原来是“耶稣会的弟子”，“与其说他是波兰人，还不如说他是个耶稣会成员”。不过，巴枯宁诱使德蒙托维茨和拉品斯基签署了一个证明，证明卡林卡的到来“对远征军的成败没有影响”；证明他本人提意见不是主动的，也不是有害的；还证明失败的罪责是最初在伦敦的耽搁，是“选错了”韦塞莱船长，因为他“存心出卖”远征军。赫尔岑得到这

---

<sup>①</sup> 《红色档案》，第7卷第114，137—138页。

个宝贵的文件后，宣称茨韦尔查凯维奇是头“蠢猪”，巴枯宁是“胆小鬼”，说“此事是集阴谋之大成”，撒手不管了。德蒙托维茨最后反驳巴枯宁，说他“一事无成”，“坑害了波兰”。此事到此了结。德蒙托维茨、拉品斯基和波莱斯-蒂冈多尔德对这件事都留下了解释，这些解释一个比一个不可靠，但却不能掩盖这次惨败的真相<sup>①</sup>。

\* \* \*

沃德·杰克逊号事件，本身是小事一端，对历史的进程毫无影响，但在1863年波兰起义中却很典型。起义经过周密计划，反复思考，专心致志的准备。但为确保成功，需要选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但起义一开头就失误了。第一个挫折是波兰人和俄国人之间以及波兰人不同派别之间由来已久的忌妒和反感。马尔默登陆并非事情的结束。7月初，拉品斯基召集远征军残部，弄到了一条轮船，实际上到达了梅梅尔附近的东普鲁士沿海，但有一条用来登陆的小船沉没，死亡惨重，幸存者垂头丧气地返回瑞典，等待遣散。此时，波兰起义本身几乎覆灭，有组织的报复行动很快就开始了。波兰又被迫平静了四十年。

这件事对巴枯宁晚年的生涯是有影响的。16年前在巴黎时，激起了他对波兰民族主义就是革命力量的信念，1863年的失败永远打破他这种由来已久的幻想。巴枯宁不能再无视这样的事实，即波兰的民族主义搀杂着强烈的领土贪求；波兰想获得民族自由，又要把波兰的统治强加给别的民族。他终于看出，绝大多数波兰人根本就不是革命者，他们对俄国革命事业的关注，目的在于用它作为推行自己政策的工具。他长期反对的波兰和俄国人之间的

---

<sup>①</sup> 《红色档案》，第7卷第123，140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19，120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226，229—230，234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225页。



天生的反感又一次表现出来。巴枯宁还发现，“我们可以与之推心置腹共事的波兰人很少，几乎没有”。“每个波兰人或多或少地既憎恨俄国政府，又憎恨俄国人民”。对波兰的幻想走上了对奥地利斯拉夫人的幻想的老路；令人目眩神迷的斯拉夫民族主义在巴枯宁的政治抱负中已不占主要地位。然而，奥地利当局还不放心，不幸的远征军失败几天后，奥地利各边防哨所接到通知说，“出名的俄国鼓动家巴枯宁”于去年年底或今年年初到达波兰，如果他出现在奥地利边界，要立即逮捕，押送布拉格<sup>①</sup>。

正当巴枯宁带着八件行李登上沃德·杰克逊号时，一个美貌的年轻女子来奥塞特公寓找他，谨小慎微的赫尔岑想到了间谍，好不容易经人劝说才相信来人确是安冬妮·巴枯宁。这个情况使他很恼火。巴枯宁结婚一事就够荒唐的了，他无法养活的一个年轻女子居然跑遍世界来找他，这就更为荒唐了。赫尔岑认定来人就是安冬妮后，给她安排了住处，但对她很冷淡，认为不值得把她的来的消息打电报告诉巴枯宁。巴枯宁很少为自己利益而对他人怀有恶意，他妻子风尘仆仆来到伦敦，却受到了赫尔岑的冷遇，他终生对此耿耿于怀，想起来就很愤怒。

沃德·杰克逊号到马尔默，巴枯宁下船后，才知道安冬妮到了伦敦。起初，他也想赞成赫尔岑明确的意见：安冬妮暂时留在伦敦，他还写信给娜塔丽娅·奥格辽夫，托她多多关照。然后——自于他本人的计划也不明确——他觉得长此分居似乎无法忍受，就打电报给赫尔岑，急切要求安冬妮来斯德哥尔摩和他团聚。赫尔岑进一步考虑后，觉得他本来就乐意这样做。于是，安冬妮即刻起程，于4月28日到达斯德哥尔摩，次日，巴枯宁写信给赫尔岑说，他“非常高兴”。夫妻从伊尔库茨克分别至今正好一年

---

<sup>①</sup>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24页；未发表的通知存布拉格内务部档案馆。

零九个月<sup>①</sup>。

---

① 图奇科瓦·奥格辽夫：《回忆录》，第323—324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18，122页；鲍勒：《往昔》，（1907年7月），第77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204—206页。

## 第二十二章

### 瑞典插曲

巴枯宁用假名到达瑞典，与其说是掩盖了他的身分，还不如说有效地提高了他的地位。他来的时机也有利。瑞典人过于关心迫在眉睫的危险，以致他们像无动于衷的、自鸣得意的英国人那样，对俄国问题漠不关心。波兰起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快就成为瑞典国内的政治问题了。当时，小心谨慎的保守政府特别注意和其强大的邻邦保持恰当的（如果不是热诚的）关系。但充满热情的激进主义者却公开地为波兰起义拍手叫好，希望瑞典和自由的传统敌人——沙皇倒台。作为俄国专制主义的受害者、奇迹般地逃脱俄国的羁绊的英雄而赢得名望的巴枯宁，成了瑞典激进派的宝贝。激进派有一位领袖叫布朗克，能说点法语，在同伴中高人一头，把巴枯宁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巴枯宁要求把自己介绍给瑞典革命委员会，然而，由于瑞典人不想革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组织，当时窘态可想而知。但此乃区区小事，并没有减少他们的相遇所激起的共同热情。巴枯宁在伦敦是无名之辈，到了斯德哥尔摩却成了要人<sup>①</sup>。

他可从瑞典通过边界向东眺望。在芬兰；由于这个接壤国家在1809年被俄国从瑞典手中夺去，正酝酿着发生变化。亚历山大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224页；《红色档案》，第7卷第122页。

二世自登基以来，和在别的地方一样，也在这里玩弄向自由派让步的把戏。巴枯宁没有看出，芬兰的资产阶级大都属瑞典血统，他们的着眼点与其说是社会革命或者推翻沙皇，还不如说是恢复亚历山大在他们眼前炫耀的宪法。他在芬兰看到了另一个波兰——俄国的天然敌人，抱着这个幻想，他从意想不到的方面受到了鼓舞。芬兰诗人埃米尔·冯·康坦无疑是由于他的政治观点，前些年从芬兰移居瑞典；他在瑞典出版了一本书，主张芬兰从俄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瑞典和芬兰之间建立个人的联盟，瑞典国王任芬兰大公。查理十五世对这一颇具雄心的计划很得意。他和他的谋士们不同，对俄国深恶痛绝，随时准备支持俄国的敌人。埃米尔·冯·康坦成了他的首席私人秘书。

情况既然如此，难怪1863年起义的波兰领导人接近康坦这样的很有影响的俄国政府的敌人。很可能通过他的波兰朋友的介绍，他和巴枯宁认识了。巴枯宁通过康坦，得到了极高的荣誉。查理十五世私下召见他，谈话内容没有记载。国王一时心血来潮，居然召见一个举世闻名的革命者，这事要保密，也是理所当然的。更令人吃惊的是，巴枯宁在这种情况下居然也能谨慎从事，而在另外的情况下，这一点和他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他肯定意识到，严格的革命原则和向王权让步之间存在某种不一致的地方，所以他没有象往常那样，急于向朋友们炫耀这次功劳。他本人晚年还以讽刺的口吻谈论加里波第对君主的好感<sup>①</sup>。

驻瑞典宫廷的俄国使臣达什柯夫伯爵的情报部门的工作似乎十分笨拙，因为直到沃德·杰克逊号停止航行，又从马尔默返航以后，他才无意中从他的巴西同行那里得知加拿大教授赫里·苏利埃的真实身分。瑞典外交大臣孟德斯托姆得到达什柯夫的通知后，欣然同意“发布命令，监视这一最危险的革命者”，保证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222、224页。

“尽力把这个死硬的革命者驱逐出瑞典”。然而，他又解释说，瑞典是靠民主来治理的，遗憾的是瑞典的民主主义对俄国不利。孟德斯托姆进行调查后，在下一次会见时，他告诉俄国大使，舆论不允许把巴枯宁驱逐出境。“在受到波兰事件影响的时刻”，情况尤其如此。他还安慰说，他正在查阅1848年的电报和报纸，目的在于使公众对巴枯宁的过去有所了解。5月初，《新闻邮报》发表文章，直言不讳地评论巴枯宁以往的生涯，文章的真正作者众说纷纭（事实上，文章是出于首相巴伦·德·盖尔的手笔）。但官方的意图还是不难发现的。激进派报刊很快出现一场风暴，巴枯宁本人在激进派的《晚报》上连续发表三篇文章，于是围绕着对他本人的争论使他的名声达到了高峰<sup>[1]</sup>。

孟德斯托姆草率地发动了一场在报上敌视巴枯宁的宣传，在俄国引起了热烈的（虽说迟了一点）反响。对付舆论可悲地影响政务执行的国家，最有成功希望的办法是使巴枯宁的支持者们对他产生怀疑。在支持他的《晚报》的专栏里，巴枯宁不加思索地宣布，“在他过去的经历中没有发生过一件丢脸的事”。彼得堡当局觉得，收集和发表“巴枯宁罪行录”可能会有用，再适当地加进一些巴枯宁本人的《忏悔书》的摘录。书名将为《米哈伊尔·巴枯宁自述》，作者可署名为“一个瑞典人”，此人神秘地得到机会见过俄国档案，这本书将在斯德哥尔摩出版。十二年前写的《忏悔书》很可能真的使那个“死硬的革命者”“丢脸”。但是，看来俄国当局业已断定，他们原先轻而易举地上了巴枯宁的当这件事，不会给他们的脸上增光，所以初稿于1863年6月12日呈沙皇审批时，由于种种原因，全盘计划都废止了。《忏悔书》

---

[1] 《红色档案》，第7卷第116、119—122、124—125页；路易·德·盖尔：《爱情》，第1卷第243—244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256页。

在秘密档案里又保存了六十年，巴枯宁也无须去为他图圉生活的这一梦魇辩解<sup>①</sup>。

\* \* \*

巴伦·德·盖尔的文章点起了一把火，使巴枯宁名声大震，就在因此得意之时，年轻的萨沙·赫尔岑从伦敦来到斯德哥尔摩。这个年轻人易受女色勾引，其父正好有理由希望他离开英国。赫尔岑的宿愿是想让儿子进入政界。如果赫尔岑主动这样做，巴枯宁则表示赞成。所以，几个星期以来，巴枯宁一直迫不及待地等着萨沙的到来。他向来喜欢交往，再说，有赫尔岑的儿子当自己的心腹，不但会满足自己的自尊心，而且会加强他在瑞典激进派（而不是革命派）中的地位<sup>②</sup>。

萨沙在斯德哥尔摩逗留期间发生的第一件事是瑞典的激进派为款待巴枯宁举行一次宴会。1863年5月28日晚，一百四十人在凤凰饭店聚会，“瑞典人民对他献身于自己的祖国而历尽苦难表示同情”。参加宴会的人是符合条件的，但人员也很杂，有政治家、商人、牧师、军官、官吏，甚至还有三、四名贵族。在这一群人当中，巴枯宁吃起来津津有味，且身着奇装异服，显得与众不同，人们都顺口称他的服装为“人民装”。他蔑视服装程式，很可能并无政治象征，而是由于他一惯不修边幅。没有发生什么破坏大家的一片热情的事情。宴会的祝酒词以忠于国王而干杯——据说这是应巴枯宁的特殊要求——开始，接着布朗克提议为“青年俄国”干杯，并把它和宴会的首席宾客联系在一起。他猛烈地攻击俄国的独裁政治，称赞巴枯宁是“光明和自由的使者”，他还朗诵了专为宴会而作的诗歌，使他的祝酒词达到了高潮。

---

①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256—262页。

②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263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22页。

巴枯宁用法语致答词，不懂法语的听众只好在第二天看登在《晚报》上的译文了。但言词无关紧要，使用外语既没有降低听众的热情，也没有影响演讲人的灵感。巴枯宁感谢瑞典对他“盛情款待”，“也许除了大英帝国以外”，没有任何国家能如此自由而又慷慨地为受政治迫害的人提供避难所。但是，决不要认为“彼得堡政府”得到俄国人民的支持和同情。俄国政府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呢！因为正是这个政府在立陶宛和乌克兰放任农民起义，反对波兰地主，毫无顾忌地“冒着把整个欧洲置于大火和血泊之中的危险，求助于可怕的秘密武装部队，激发公众情绪”。（这种谴责出自米哈伊尔·巴枯宁之口倒有些奇怪，然而，他的用意是利用那些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听众的恐惧和偏见。）巴枯宁宣称自己远远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和他的朋友甚至谈不上是无条件的共和主义者。“‘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这些术语无关紧要，只要心里想着的不是别的，而是人民的真正的自由”。他有幸作为代表的“土地和自由社”就是一个“爱国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广泛的联盟”，其成员包括“俄国社会各个阶级，不分阶层和地位的一切善良的俄国人，全体将军和军官、大小官吏、贵族地主、商贾、牧师和牧师的后裔、农民以及成千上万持不同观点的人”。这个团体已经成为某种国中之国，它正在自己筹集资金，自施行政，编组警察，不久——演讲者希望——它会有自己的军队。它已经和“现在称为波兰民族政府的华沙中央委员会”结成“正式同盟”。米哈伊尔代表这个团体和新俄国，向“瑞典的爱国者”表示友好，为“斯堪的纳维亚大同盟联邦”未来的繁荣干杯。

这个不寻常的演讲是宴会的一大特色，它不仅把“土地和自由社”和君主立宪制混为一谈，而且把数以百万计的俄国社会各阶层的人都送给由一群莽撞的学生组成的小小的团体。巴枯宁讲完后，萨沙·赫尔岑接着讲话，他谈到他父亲和奥格辽夫的工作，

还谈到了在伦敦出版的俄文报刊。他欢呼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联盟的未来的团结。最后，一个不知名的人物费利克斯致答词，此人是唯一愿意为招待巴枯宁的宴会增光的唯一波兰人，他感谢大家为波兰祝酒，并为那些为波兰事业献身的俄国军官们祝酒。这些人都是很称职，但为数不多<sup>①</sup>。

这次难忘的聚会产生了重大的后果。巴枯宁和他老朋友的孩子发生争吵的确切情况至今仍是谜，他给赫尔岑写过一封长信，详述自己的苦衷，但这封信仍未发表。然而，决定性的原因是双方的虚荣心。巴枯宁认为他的年龄和威望无疑有资格居领导地位；而一个二十四岁的缺乏经验的年轻人理所当然地应居于次要地位。萨沙吃亏就在于他的傲慢，言行失检，处事无方，即使是年轻人，这些都是说不过去的。赫尔岑和《钟声》是“土地和自由社”在伦敦的代表，萨沙似乎认为，该团体在别处就应据此王法设立代表制度。他轻率地假定，巴枯宁在斯德哥尔摩所享受的荣誉（这种荣誉在5月28日的宴会上达到了顶峰）是对事业而不是对某个个人所表示的敬意。他妄想把这些桂冠都加到自己的头上。

巴枯宁和萨沙·赫尔岑两人，究竟谁是“土地和自由社”在斯德哥尔摩的委任代表之争，正如赫尔岑后来所说的那样，真是可笑到了极点。这是一场争名气而不是争实权的斗争。萨沙不过是一个无名之辈，而巴枯宁自有其成就和苦难，无需什么证书，所以巴枯宁的虚荣心比起萨沙来就更为荒唐可笑。但是萨沙一旦坚持他的要求，而且遇上了对手，其行为就变得不可原谅了。他从奥塞特公寓的闲谈里，早就熟知巴枯宁的缺点，他也十分了解他父亲私下对他这位所谓的同伴的想法和说法。现在，他充分利用他所了解到的情况，背后和当面都骂巴枯宁；巴枯宁同样进行

---

<sup>①</sup>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34—138页；《红色档案》，第7卷第124—125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225页。



回击，骂萨沙是个盗贼。瑞典激进主义者一直在听这两位俄国领导人对骂，直至他们骂累了为止。所幸的是萨沙不喜欢斯德哥尔摩，抱怨那里天气寒冷，便于6月底回伦敦，这件丑事才告结束<sup>①</sup>。

\* \* \*

凤凰饭店的宴会标志着巴枯宁在斯德哥尔摩的声誉达到顶点，和萨沙·赫尔岑的争吵是他声誉下降的起点。巴枯宁没有理由在瑞典首都再继续呆下去了，波兰的事业已告失败，波兰人已经离散。亚历山大二世发布诏书，订于9月15日召开芬兰国会，自1809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从而把芬兰人引入歧途。巴枯宁与康坦之间发生争吵（他说这是萨沙·赫尔岑引起的）：“土地和自由社”行将灭亡，年初去伦敦的使者斯列普卓夫没有返回彼得堡，他患精神分裂症，退居瑞士。另一名执行委员会委员尼古拉·吴亭于1863年5月逃出俄国，整个团体分崩离析。团体的代表们甚至不给巴枯宁回信，巴枯宁向他们保证，他已通过芬兰的中间人偷偷运入阿尔汉格尔斯省七千份各类宣言书，但代表们却无动于衷。巴枯宁遇见一个“诚实、有能力、商人模样”的年轻人，名叫斯特拉帕，此人愿在俄国出售赫尔岑的出版物，条件是有人给他四千到五千法郎的贷款，但赫尔岑反应冷淡。最激进的瑞典人对瑞典出现暗示革命的迹象也置若罔闻。不久，通常的经济问题又出现了。巴枯宁的瑞典朋友都深知他东挪西借、不写文章而向编辑预支稿费的手法，他们对巴枯宁把公共财产运用于实际的理论都很反感。他留在斯德哥尔摩既令人厌烦，又毫无用处。于是，他于7月份决定在入冬前动身<sup>②</sup>。

---

①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268、282、491—493、539页。

②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25—129、131—132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90、98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226、256页。

他起初认为当然要返回伦敦，但经思考后，觉得伦敦的前景渐渐失去了吸引力。英国的气候或英国的生活都不能使他年轻的妻子安于脱离她所熟悉和喜爱的一切。英国给予他本人的东西也甚微小——只是客客气气的容忍而已，况且，往深处一看，这种容忍简直就是冷漠。十八个月前，使他来伦敦的那种吸引力，也因为和赫尔岑关系的恶化而消失了。到底到哪里去，还是定不下来。奥地利和其他德属的邦都不准他进入；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变化莫测，也不可靠；瑞士尚未成为半个欧洲政治流亡者的理想集中地。选择的余地实在不多。巴枯宁以前在伦敦时，发现意大利人是那个曾使他恐惧的国家——奥地利帝国的积极的、最坚定的敌人，因而也是斯拉夫人天然的盟友。巴枯宁见过马志尼，又与加里波第有通信关系。在意大利至少还有革命的萌芽——这场运动没有被窒息，也没有停止。但是，他到意大利定居的这些政治因素也许还是第二位的。意大利是温暖、友好、不令人生畏的国家，那里的生活费用不高，他和安冬妮可以过上一段安静而又舒适的生活。巴枯宁希望过上哪怕是短暂的隐居和平静的生活，在他的生活中还是第一次。于是，他决定在意大利住一阵子，“坐等事变”<sup>①</sup>。

1863年10月8日，巴枯宁夫妇离开斯德哥尔摩，一群波兰人和瑞典人给他们送行，激进派报上也登载了他们离开的消息，但是开头几个月那样的热情消失了。巴枯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使朋友们为难，当他终于在哥德堡搭船去伦敦时，大家都松了口气。一个星期以后，俄国大使“高兴地”向彼得堡报告巴枯宁离开的消息。只有奥地利政府仍很恐惧，又向各边界当局发布通告，说巴枯宁已离开瑞典，“去向不明”，各边防哨所必须对他进行严

---

①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265页；《红色档案》，第7卷第126页。

格监视<sup>①</sup>。

\* \* \*

说到巴枯宁自1861年底到伦敦后的两年的生活，不能不提到亚历山大·赫尔岑，因为他对巴枯宁这段生活起了最大的、最突出的作用。巴枯宁刚到伦敦时，《钟声》的声誉和力量仍处于高潮，发行量达二千五或三千份，可是，不到两年光景，能出售五百份就算走运了。赫尔岑感到失败得冤枉，因而痛心，他回想每一步的失败都有巴枯宁插手。是巴枯宁与凯尔谢也夫合伙把《钟声》拉进“旧教派”事件中去；是巴枯宁说服没有主见的奥格辽夫将《钟声》拱手交给年轻的革命者，诱使赫尔岑本人与徒有虚名的“土地和自由社”建立了同盟；又是巴枯宁用“土地和自由社”作为幌子，和瑞典人、芬兰人大搞阴谋，使这个团体变得滑稽可笑；更糟糕的是，还是巴枯宁说服赫尔岑用《钟声》来为波兰的革命事业作担保，从而遭到俄国爱国者的痛恨。两年前，某些俄国团体曾把《钟声》当作代表开明的俄国人的观点的喉舌，如饥似渴地阅读。甚至在这些团体中，赫尔岑如今也成了叛徒和恐怖分子的朋友。一系列的事件连续发生，紧密相联，以致赫尔岑弄不明白自己已经成为非人所能控制的形势的牺牲品，也没有意识到《钟声》曾荣耀一时地代表的那个俄国自由主义的短暂的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赫尔岑找到了替罪羊，他以一个受人引诱而误入歧途的弱者的复仇心理，和巴枯宁翻了脸。大约在巴枯宁离开斯德哥尔摩的时候，俄国新闻界以得胜者的姿态援引了一项未署名的波兰人的声明，说“赫尔岑及其一伙诱惑波兰人发动起义，鼓吹自己是行将席卷全俄国的一个庞大阴谋集团的领导人”。赫尔岑恼羞成怒，宣布他将利用《钟声》的专栏公开拒绝

---

① 《红色档案》，第7卷第126—127页；布拉格内政部档案馆所存未发表的通告。

对巴枯宁承担责任<sup>①</sup>。

个人的怨恨加深了政治上的苦痛。巴枯宁和萨沙的争吵又加上了新的纠纷。赫尔岑虽然公开表白自己不偏不倚，不光责怪那位年长者的虚荣和多嘴多舌，也责怪自己的儿子“无礼”。但是很明显，在他的内心深处，却认为儿子的过错比他朋友的过错轻得多。另外，巴枯宁视金如土也对赫尔岑有刺激，这是“小节”，赫尔岑不好意思提及，但仍在他那井井有条的头脑里引起了反感。他曾被催付巴枯宁在伦敦的债款，7月份又寄到斯德哥尔摩五十英镑，他的忍耐到了限度，实在害怕再有那样一次毫无结果的讨论：先是孩子一样地对过去的错误表示道歉，到头来又象孩子一样地提出借钱的要求<sup>②</sup>。

巴枯宁虽处于被告地位，但他埋怨多于惊慌，盼望和赫尔岑见面。巴枯宁永远不会回首往事，他情愿将过去的一切行动，不论是个人的还是别人的，都一笔勾销，正象他毫不在乎勾掉过去的债务一样。他虽不钦佩赫尔岑的处世哲学和怀疑主义，但他诚心诚意地崇拜赫尔岑的才华。他认为赫尔岑在琐事上十分正确，而在精神实质上却是大错特错，令人生厌。他如同赫尔岑一样，没有意识到《钟声》已经没有力量了。他仍然坚信，凭着他那一贯的乐观主义，还可以利用《钟声》的影响来为革命服务，但对赫尔岑不抱幻想。

〔巴枯宁此时写道〕赫尔岑已在全欧洲人面前庄严地代表并将继续代表俄国革命事业，但是，在国内政策方面，他是个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者。他对国内政策的影响不仅没有鼓舞作用，反而有削弱作用。他首先是一个

---

①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491—492，516页。

②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267，492，539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23页。

天才的作家，他把自己的职业的优点和怪癖结合在一起。如果有朝一日俄国实现了自由，或者开始实现自由，他将无疑是一位得力的记者，或者是演说家，政治家，甚至是一位行政官员，但是他绝对不具有一个革命领袖应当具备的素质。

这段文字对赫尔岑的优缺点作了较为恰当的评价，而在赫尔岑描述巴枯宁的文章里却看不到这一点<sup>①</sup>。

巴枯宁夫妇到达伦敦时，赫尔岑正在意大利看望女儿。由于他不在伦敦，他们暂时算不了老帐，紧张气氛也缓和了。奥格辽夫是个彬彬有礼、热心肠而又易受感动的人，他怀着同情心听了巴枯宁叙述事情的经过。关于金钱问题，他和巴枯宁一样，认为那是无关大局的小事，没想到却成了老朋友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原因。关于和萨沙的争执，奥格辽夫认为，赫尔岑肯定由于考虑到“家法”而产生偏见，他至少应该告诉萨沙去向这位年长者赔礼道歉，承认自己粗暴无礼。关于政治问题，奥格辽夫认为在方式方法上和策略上，双方肯定略有分歧，但这与献身自由事业的愿望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撇开私人的感情不说，奥格辽夫在性格和爱好方面更接近易于冲动的巴枯宁，而不同于头脑清醒、谨小慎微的赫尔岑。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但愿他们为了神圣事业而共同努力。“否定”巴枯宁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奥格辽夫写信给赫尔岑，既有辩护，又有责备，说明他已相当坚决地站在巴枯宁一边<sup>②</sup>。

在伦敦住了六个星期以后，巴枯宁夫妇于1863年11月底到布鲁塞尔和巴黎去了。在巴黎，12月的第一个星期，巴枯宁和赫尔

---

①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230—231页。

②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538—539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48、150页。

岑总算见面了。“我要见见巴枯宁”，赫尔岑在见面前夕写道，“虽然我感到前景并不美妙，因为我嫌恶说假话。”表面上他们的会见进行得比预想的要好。双方都强烈地希望避免难堪的问题。赫尔岑由于厌烦和羞愧，不愿提起“私事”。在政治方面，他发现巴枯宁“一心一意希望和解，而且决心不搞诽谤活动”。至此，巴枯宁可算饱尝了冒险的滋味。他从来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别人比自己明智。斤斤计较的赫尔岑对于巴枯宁如此驯顺感到惊奇。这种状况是不会长久的，但它使这两位老朋友分手时，表面友谊并未破裂。巴枯宁可能相信，他们已经完全地真诚地和解了，但是赫尔岑不可能不念旧恶。赫尔岑的事业结束了，他的谨慎和良知使他被遗弃在一堆枯燥无味的、毫无意义的垃圾上，使他一筹莫展。而革命与反革命的洪流同时从他身边奔腾而过。巴枯宁一味蛮干，充满年轻的活力，顶着浪头向前。赫尔岑意识到，他自己那井井有条的天赋在这般巨大的、毫无约束的力量面前相形见绌。二十五年前，他在日记中对巴枯宁的评价是“废物”！如今，他又大谈巴枯宁敌人能轻而易举利用的明显缺点，从而得到了某种满足。他们的关系再也不会亲密无间了。两年来的经验使赫尔岑对巴枯宁产生了半是轻蔑半是妒忌的愤怒情绪<sup>①</sup>。

见面后的第二天，赫尔岑返回伦敦。几天后，巴枯宁夫妇又南下了。他们在日内瓦作短期的逗留，与曾任“土地和自由社”领导人的斯列普卓夫在韦维过圣诞节。但斯列普卓夫神经紧张得近乎“发狂”，必须“成桶成桶地给他头上浇水”，才能使他不打扰别人。巴枯宁从韦维到伯尔尼去拜访老朋友福格特一家。路易莎·福格特和巴枯宁在瑞士一别二十年，她搂着巴枯宁的脖子，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巴枯宁还得知他们的大儿子卡尔成了

①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541—543页；斯切克洛夫：  
《巴枯宁传》，第2卷第283—284页。

“笃信拿破仑之星”的牺牲品。巴枯宁说服他们一家改变主意，支持波兰的事业，把妇女们组成一个委员会，为穷苦的波兰人募捐。

1864年1月11日，巴枯宁夫妇越过边境，到达意大利<sup>①</sup>。

---

①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283—284页。

## 第二十三章

### 佛 罗 伦 萨

巴枯宁作为一个意大利民族主义的热烈信徒来到了意大利。在都灵作了短暂停留以后，他和安冬妮在热亚那受到了加里波第在北意大利的主要代表贝尔塔尼的接待。他们在意大利的第一件事是去卡普里拉岛朝圣，意大利自由运动的那位领导人（现在几乎成为传奇式的人物）退居该岛，同为数不多的忠诚的支持者住在一起。

拜访卡普里拉岛是短暂的，但却是他特有的崇拜狂热的高潮。在短时间内，加里波第似乎要完美地扮演巴枯宁的理想主义的革命英雄的角色。在1849年的光辉岁月里，他在罗马竖起了共和派的旗帜，占据该城好几天，反抗以腐朽的教士和法国雇佣军为代表的反动势力。1860年，巴枯宁在西伯利亚就焦急地注意“千人军”<sup>①</sup>。这次进军解放了南意大利，推翻了反动王朝。的确，加里波第成功的最后结果不是建立了共和制，而是加强了君主政体。但是巴枯宁在得意时常把让步作为权宜之计，打算建立人民君主制。加里波第真是奥地利<sup>②</sup>的灾星，又是意大利的救星。斯拉夫

---

① 1860年4月西西里爆发反抗西班牙波旁王族统治的农民起义，加里波第率领千人红衫志愿军前往支援。9月，在西西里人民的支持下，推翻了波旁王族的统治。——译注

② 此处指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匈帝国。——译注



人的解放、奥帝国的崩溃和社会革命的事业在巴枯宁的下意识中是混为一体的。他为其中的一个目标而努力，必定会促进其他两个目标的实现。

退居卡普里拉岛期间，这位领导人遇到种种颇带浪漫色彩的事。在都灵，安冬妮差点冻死，而在这里，一月底的气候和俄国夏天一样。巴枯宁同其他四个旅行者（一个英国男子和三个英国妇女）结伴而行，渡海到达卡普里拉岛。曾在阿斯普罗山受过伤的加里波第走起路来有点轻微的跛脚，他在简朴的石屋里接待了他们，石屋四周是栽着橄榄树、葡萄树和南方果树的花园。在这里他同他的年轻的出身农家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政治秘书和十二个忠诚的支持者生活在一起。使一名英国妇女感到讨厌的是加里波第对自己的妻子十分敬重。他们穿着亚麻布的裤子和红衬衣在田间耕作，或者在磨坊里碾玉米，或者别有风味地靠在山石上休息，这种小集体的生活对巴枯宁来说似乎是“民主社会共和国”的原型，使他想起了拜伦《海盗船》中所描写的海盗居住的岛（因为在十九世纪的思想界浪漫主义仍没有消逝）。巴枯宁觉察到了东道主心中“深深地隐藏着哀愁”。加里波第要来访者相信，他有点厌世，他愿愉快地为祖国的利益，或者为了“所有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曾想去波兰援助起义者，但是他们送来的消息说，他在那里将会利少弊多。巴枯宁想起了自己有完全相同的经历；共同的经历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相信在他们之间有天然的联系。三天的访问结束后，当巴枯宁夫妇返回大陆时，米哈伊尔承认自己“爱上了意大利”，对他的妻子发誓说，一个月内他将学会说意大利语<sup>①</sup>。

他们在佛罗伦萨住了下来。这个选择反映了巴枯宁的心情。虽然佛罗伦萨很快被指定为意大利新的国家的临时首都，但是它

---

①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284—286页。

从来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工人阶级的人数很少，而且没有组织起来，革命的密谋和宣传无人知晓。佛罗伦萨主要居住着有教养的意大利资本家和大批外国侨民，他们在这里寻求便宜的、寂静的、风景如画的环境。巴枯宁愿意在这里逗留一年以上，尽情地享受一下悠闲自得、轻松自如的新奇生活。

当时巴枯宁的生活和为人在佛罗伦萨的俄国旅游者和居民的记忆中留下了奇特的印象。著名的画家盖注意到他呼吸短促、“食量惊人”。他在画家心目中的印象是：“一条没有桅杆、没有舵的大船毫无目的和方向地随风漂荡”。一个正在撰写关于塔西陀<sup>①</sup>的学士学位论文的青年蒙德斯托夫惊讶地发现，巴枯宁“希望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成为革命者”。青年科学家梅契涅科夫由于政治观点的缘故逃出俄国，曾在加里波第军团中作战，他对巴枯宁夫妇每星期二晚上邀请朋友在“家庭聚会”有一段生动而带有讽刺意味的描写：

客厅布置得资产阶级气派十足。这位令人生畏的革命家身穿黑礼服，不过，他成功地使这件礼服看上去颇为别致，但又邈邈得叫人讨厌。他与安冬妮安静地玩跳棋……一个头发灰白、面容慈祥的老人正在自弹自唱，有点像鸟鸣似的歌声中带着浓重的日耳曼口音：

前进吧，祖国的孩子们，

光荣的时刻已经到来……<sup>②</sup>

富于战斗性的革命的赞歌在他嘴里唱起来像甜蜜的、多情的小调。

原来，这位唱歌者不是德国人，而是瑞典人，巴枯宁的斯德哥尔摩的朋友，他与革命有某种神秘的关系，向往革命，或者参加了革命。

客人们逐渐到齐。这是一个各种服饰、各种面孔、各种人种、各种语

---

① 塔西陀（约55—120），罗马著名的史学家。——译注

② 马赛曲歌词。——译注

言和各种阶级的混合体！除了几个经常出现的人以外，你在这些“晚会”上很少可以看到两次出现的同一个面孔！

巴枯宁皱着眉头望着他们，向你解释说，这些人是安冬妮的客人，那些人是为了使某个可疑的非法的事情成功必须会见的人。下星期你就听不到这位大人物在上星期讲过的一句话。如果他仅仅是失踪了，这倒是十分幸运的，更为经常的是这种失踪是由于某个丑闻或多或少地被公开的结果。

在参加这些聚会的人中，仅仅有几个人是从任何方面来说都值得注意的。来佛罗伦萨大学里求学的萨沙·赫尔岑同随和的米哈伊尔讲和了，并且（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父亲的警告）成了巴枯宁寓所的常客。但是萨沙对政治的兴趣，只是建立在个人自负的基础上，而没有别的牢固的基础，从此时起，革命在他的生活中已不起任何作用了。科苏特的著名的助手普尔斯基的出现使人们想起了巴枯宁从前对匈牙利民族愿望的支持，尽管匈牙利人从未对巴枯宁的革命抱负表示相应的同情。万哈根·冯·恩赛的侄女柳德米拉·阿辛格对先进的政治思想向来都有兴趣。但是她当时的主要精力用在追求一位漂亮的意大利青年贾纳列上，此人在巴枯宁的小组里活动。巴枯宁对做媒的兴趣简直不亚于他对革命的热情。他对男女恋爱的强烈兴趣，引起了某些旁观者对他的反感<sup>①</sup>。

巴枯宁仍然断断续续地、半心半意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着手进行的工作是：找到一些意大利人作为中间人，通过他们把《钟声》和赫尔岑的其它俄文刊物从加拉茨和君士坦丁堡偷运进俄国；这件工作无疑促使他向赫尔岑再借六百法郎，——赫尔岑勉

---

<sup>①</sup> 盖：《北方通报》（1894年3月），第235页；蒙德斯托夫：《历史通报》（1883年12月），第122页；梅契涅科夫：同上（1897年3月），第807—834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53页。

强地给了他二百法郎。但是，巴枯宁在1864年夏主要关心的似乎是恢复他对共济会的兴趣。佛罗伦萨马志尼主义派的领导人面包师多尔菲也是共济会分会的首领。共济会的秘密活动和仪式对于巴枯宁有吸引力。他恢复了他的长期停止活动的成员资格，第二年当他离开佛罗伦萨时，他随身带了一份佛罗伦萨“苏格兰礼拜大会”的推荐书给意大利共济会的“所有弟兄和最高机构”。幻想很快破灭了。两年后，他写信给赫尔岑说，共济会“作为一个伪装，或作为一种手段，也许是有用的”，但是“想在共济会中寻找哪怕是一点正经的东西，那就如同从酒里寻找安慰”。但是后来与共济会脱离关系并不能勾销他早期对共济会的诚意。1864年，巴枯宁同他在四十年代一样认为共济会变成革命的主要支柱；他本人也在一个重要方面受到了共济会的很大影响<sup>①</sup>。

在定居佛罗伦萨之前，巴枯宁还没有感到有必要明确表明他对宗教的态度。早年，他就放弃了东正教的信仰与活动。他敌视基督教；虽然他“不相信现存的各种宗教”，但他又坚决主张宗教“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必要的”。他不断谈起他相信上帝。在有的场合他宣称，他正“在革命中寻找上帝”；在另一个场合，他大胆地断言，“上帝即自由”。有时，他把他对音乐的爱好归因于宗教的感情。1862年5月的一个月光普照的夜晚，他同屠格涅夫在伦敦的街头散步，沉浸在“一种老式的浪漫的意境中”，断言他信仰人格化的上帝，批评赫尔岑缺乏信仰。他访问卡普里拉岛时，满意地注意到加里波第相信“上帝和人的历史使命”。但是此刻，由于受共济会的影响，他的思想带有明确的反宗教色彩。共济会在天主教国家里，特别在意大利，长期以来一直受到

---

<sup>①</sup>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50—151，156—164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7卷第135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539页。

教会的禁止和迫害。很自然，共济会反过来就成了反教士的和教条式的无神论组织。巴枯宁参加共济会时期的主要成绩是写了一篇文章（显然不是为了发表），他在该文中第一次阐述了这样一个著名的公式：

上帝存在着，所以人是奴隶；人是自由的，所以没有上帝。谁能逃脱这个困境！

这篇文章末尾附一份《共济会教义问答》草稿。《问答》宣称，信仰人格化的上帝同理性与人类自由是不相容的，这种信仰用对人的崇拜来代替对“造物主”的崇拜。

这是巴枯宁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在五十五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成了一个坚定的、热忱的无神论者。从此以后，无神论将列入他的一切政治纲领的首位<sup>①</sup>。

\* \* \*

巴枯宁对于这样一个革命色彩如此淡薄、他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如此低下的角色的组织是不可能长期感到满足的。夏末之前，他对受共济会的训练过着死气沉沉的生活感到越来越不耐烦了。一个丹麦书商斯特劳贝要同彼得堡建立秘密的通讯联系，继康坦之后作为他在芬兰人中的主要代表是个叫福克斯托的人，巴枯宁收到他们寄自瑞典的被耽搁的信，这些信怂恿他去重访他上一年看到的戏剧性胜利和同样戏剧性失败的场面。他此行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并不清楚。波兰的起义现在已成为历史。“土地和自由社”已经瓦解。俄国的反动派更加强大，宣传活动比以往更加困难。

---

①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11，370页，第4卷第19，232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1卷第332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285页。

但是巴枯宁并不沮丧。1864年5月1日，他写信给仍在斯德哥尔摩的德蒙托维茨，通知他将要去那里，并向这位过去的同事的“兄弟般的帮助”表示“兄弟般的信任”。9月6日，他抵达斯德哥尔摩<sup>①</sup>。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非常令人感兴趣的经济上的引诱或前景，巴枯宁是不会作这样一次费用巨大的旅行的。他从斯德哥尔摩写信给他的普列姆希诺庄弟弟们，说他已经“妥善地安排了自己的工作”，瑞典的编辑答应采用他的文章和通讯，每年稿酬达四千法郎。然而宣布这个惊人的消息显然是为随后要求立即借一千卢布以支付某些“麻烦的”债务而策划的一个诱饵。虽然他在1864年12月从佛罗伦萨就写信说，他为瑞典报刊撰写通讯每周挣一百法郎，“有时更多一些”，但是这个时期在《晚报》上能够查找到有他署名的文章只有一篇。巴枯宁提供他的稿件，并从各种瑞典报刊那里收到预付稿酬，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末他答应写的文章没有写或没有发表。这第二次访问在其它方面没有什么收获，既没有盛大的接待，也没有欢迎的宴会，更没有公开发表演讲。如果巴枯宁试图再次把瑞典作为对俄国进行宣传的基地的话，他必须迅速地抛弃这种幻想。到1864年10月中，他最后一次默默无闻地离开了斯德哥尔摩<sup>②</sup>。

在返回意大利途中，他在伦敦呆了两个星期，这是他最后一次访问那个城市。他访问了赫尔岑，赫尔岑发现他比过去“老实多了”。他去找个裁缝添置衣服，这个裁缝名叫列斯纳，是德国人，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马克思的一位亲密同事。列斯纳把这位新顾客的情况告诉马克思。这个名字勾起了他许多回忆。

---

①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59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302页。

②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302—303页。

巴枯宁住在帕丁顿·格林区时，他们之间由于互不信任而分手，尽管如此，马克思对这个剽悍的革命者还是感到有点好奇，他最近一次和他见面是十六年前在柏林。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成立大会开后正好一个月，马克思是该会的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正在起草协会的章程和成立宣言。他也许想起了巴枯宁可以在这个新组织里做些有用的工作。也许他知道巴枯宁与赫尔岑之间的不和，猜想巴枯宁现在也许更加能接受他的影响。总之，他写信给巴枯宁提议在第二天会见。巴枯宁回答表示赞成。1864年11月3日——巴枯宁离开佛罗伦萨的前夕，他们见面了。

这次会见是米哈伊尔·巴枯宁与卡尔·马克思的最后一次会面，许多年后这次会见成为这两个领导人和各自的追随者之间激烈争论的主题。叙述这次会见的现存的大多数材料是几年后写下的，那时偏见已掩盖了这个问题的真相。仅有的记载是会见的第二天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件，其中所说的话是严肃认真的，被认为是准确的。这个记载虽然简短空洞，但却证明，巴枯宁几乎是能对异常不动感情的马克思施加奇怪的不合逻辑的迷惑力的独一无二的人。马克思写道：“我应当说，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他是“十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中的一个。”<sup>①</sup>谈话自然会引起对往事的回忆。马克思很有感触地谈起了“乌尔卡尔特的诬蔑”。至于对巴枯宁的荒谬的指控，虽然第一次发表在《新莱茵报》上，但是由于近来弗兰西斯·马克思和《自由新闻》的行径，现在可以归之于恶劣的乌尔卡尔特了。他们谈起了去年波兰的起义。巴枯宁解释说，这次起义的失败是由于波兰贵族拒绝宣布“农民社会主义”。他宣称，“现在，在波兰起义失败后，他只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了”。

---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11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7—18页。——译注

记载到此结束。会见结束时他们还寒暄了一番。

这个记载的最令人奇怪的特点是一点没有提到第一国际，在同一封信的前半部分马克思详细地谈到了国际的事务。五年后马克思写的这次会见的说明充分弥补了这个省略。按照后一种说法，马克思在谈话过程中“接受”巴枯宁加入国际，巴枯宁“答应不懈怠地为国际工作”<sup>①</sup>。但是这种说法是大可怀疑的，目的是强调他对国际的职责，显然是设法夸大巴枯宁后来攻击国际的卑劣行径。由于对给恩格斯的信中只字未提此事，要人相信巴枯宁这次被“接纳”加入国际是困难的；1868年夏，当他最终加入国际时，似乎没有人提起四年来他已经是国际的成员。正如巴枯宁自己承认的，他读过并赞赏马克思起草的成立宣言。出于他惯有的对新思想的热情，他一定会表示赞同，提供援助。正是由于那种援助的性质，引起了误会。马克思从来既有条理，又很精确，不喜欢和不忠诚、不服从的人的合作。本质上缺乏修养的巴枯宁只可领导别人，从来不能追随别人。他愿意帮助国际，但是只能按照他的方式、根据他的意愿来帮助<sup>②</sup>。

1864年11月3日的会见幸亏很短，没有暴露出他们之间的性格上的差别。两个人分手时彼此都很满意，对他们之间合作的前景也很满意，当然在这种合作中彼此都心照不宣地把自己当作是居支配地位的角色。返回佛罗伦萨后，在不到三个月中巴枯宁收到了三封马克思来信，寄给他一些成立宣言，请他送一本给加里波第，并设法译成意大利文。巴枯宁1865年2月7日的复信现在

---

① 马克思：《机密通知》（1870年3月28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65页。——译注

②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7卷第36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10—221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305页。



还保存着。他对马克思说，作为他的亲近的朋友热烈地接受委托给他的任务，表示讨厌意大利人的懒散与畏缩，这种懒散和畏缩是进行革命活动的障碍。他指出，“只有开展持久的、有力的和热情的社会主义宣传，才能恢复这个国家的生命与自由。”在信的末尾，表示吻马克思夫人和女儿们的手，建议交换家庭照片。此后没有再通过信，在这两位未来的对手之间四年多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马克思有时仍然希望利用巴枯宁来削弱马志尼在意大利的地位，并为国际吸收“一些有活动能力的意大利会员。”<sup>①</sup>

\* \* \*

在马克思和巴枯宁这次著名的会见中没有讨论到的许多问题之一，就是革命组织应该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马克思与赫尔岑一样，毕生主张公开性组织。巴枯宁早从1849年起就根深蒂固地相信对于严肃的革命工作来说，秘密性组织是必需的。从伦敦回佛罗伦萨途中，他在巴黎停了一下，并在这里（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记录，这是第一次）为建立一个秘密的革命“兄弟会”而进行游说。他这样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与马克思的谈话的鼓舞，或是受到他要帮助新成立的国际的愿望的鼓舞，仍然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巴枯宁返回佛罗伦萨后，兄弟会就以他在当地的信徒们组成小组的形式出现了。但没有迹象表明，哪一个“兄弟”知道兄弟会和国际之间的联系，或者真的听说过国际这个组织。巴枯宁创立的任何一个团体的成员都不大可能仰赖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任何权威。

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巴枯宁自己后来的声明的不可靠，要清楚地说明兄弟会的目的或者想象它的作用是不可能的。后来他时常

---

<sup>①</sup>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136—13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73，276页（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113，344页。一译注）

谈起，似乎他所主持的秘密团体仅仅是1864年的佛罗伦萨兄弟会的延续。它主要由或全部由不满现状的意大利的知识分子组成。梅契尼柯夫以挖苦的字眼把这些“兄弟”描写成是一些无职业的人，他们被一种好奇心所诱惑，或者被一种混水摸鱼的可疑的愿望所诱惑，而巴枯宁出现在哪里，就把哪里的水搅混。……他们是退休的加里波第志愿军的士兵，法院里公务轻闲的律师，以及各种类型的人。”但是，对这些活动最了解的目击者是一个名叫古贝那茨的年轻教授。一天晚上他在普耳茨基的寓所偶然见到了巴枯宁。在他们经介绍认识之前，巴枯宁就盯住了他，“他似乎试图用他的目光把我迷住”。古贝那茨是个热情的易动感情的人。他的叙述具有某种明显地与他的性格相吻合的天真。然而，巴枯宁自己扮演的角色肯定更加天真。

巴枯宁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我身边，握着我的手，用一种神秘的神态问我是否是共济会员。我答道，我不是、也不想成为共济会员，因为我不喜欢秘密团体，……他回答说，我是正确的，他自己也不把共济会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把它作为接触其他事务的一种手段。然后他问我是不是马志尼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我回答说，追随某一个人不合我的性格，不管这个人多么伟大。我也许是个不错的共和主义者，但从来不是一个马志尼主义者，虽然我也承认马志尼为自由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我看来，共和制本身似乎是一句空话。……现在需要的是改造社会，所有的人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诸如分配面包这样一些问题上都应平等的。现在面包分配不均匀，因为一些人多得吃不完，而另一些人却没有。说到这里，巴枯宁热烈握着我的手说：“好，你是我们的人；我们正在为此而斗争。你必须参加我们的活动。……反动派是共同行动，而自由的支持者是分散的，分裂的，并且是有分歧的；他们在国际范围内达成一个秘密协议是必要的。”

巴枯宁的雄辩迷惑并说服了犹豫不定的古贝那茨。这位年轻的教授感到他的新的信念与担任政府职务是不相容的，便辞去职务加入了兄弟会，很快成为小组里的一个主要人物。巴枯宁到处说他是“最优秀的意大利人”，把他的照片放在相册中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相片之间。可是古贝那茨很快觉察到，这些兄弟们对革命谈得很多，但什么也没干。他要求工作。他准备讲授人民运动史或为革命事业周游全国进行宣传；为了表现他的忠诚与能力，他创作了一首题为《社会曲》的赞歌来代替缺乏国际性的《马赛曲》。但是他发现，别的兄弟们显然干劲不足，巴枯宁的想法似乎只是一种孩子般的游戏：每周创造一种新的暗号，兄弟们用这个暗号相互联络。古贝那茨的幻想彻底破灭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苦恼地注意到，巴枯宁似乎“全部精力都用来募捐，表面是为了穷困的波兰人，实际上是为了他自己，为了那些更贫困的兄弟们。”画家盖证实了巴枯宁对此类事情采取令人惊异的若无其事的态度。他曾看见巴枯宁接受了一个瑞典人捐赠给波兰人的一块金子，就在当时当地，当着捐赠人的面，他派了一个佣人去兑换，然后买烟。

机灵的巴枯宁还使用另一种计谋使犹豫不定的古贝那茨保持忠诚。他承认古贝那茨是兄弟会员中少有的热心人和大公无私的人。与巴枯宁家有远亲关系的一个姓别佐勃拉佐夫的俄国姑娘正巧在佛罗伦萨；巴枯宁成功地安排了他的这门远房女亲戚与这位年轻的意大利门生的婚姻。然而，这桩婚事并没有达到它的倡议人的目的。古贝那茨对兄弟会越来越失望，不久就离开了佛罗伦萨。他最后说：“在我离开以前，我作了一次尖锐的演说抨击兄弟会，迫使米·巴枯宁解散这个秘密团体。如果这个团体继续存在，我也许会把命送掉。”轻信的古贝那茨对巴枯宁散布的对于违背诺言的成员将给以可怕的惩罚的谎言信以为真<sup>①</sup>。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76—77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

古贝那茨要求在他离开之前解散兄弟会是否确实，或者是否完全解散了，至今仍不清楚。但不管怎样，1865年底，巴枯宁同安冬妮去索伦托避暑时，兄弟会实际上结束了活动。巴枯宁没有返回佛罗伦萨。虽然不能完全肯定，但有可能有一些佛罗伦萨的兄弟属于后来由他创立的团体，但是佛罗伦萨兄弟会就这样于1865年夏消失了，以后也没有留下什么踪迹。

## 第二十四章

### 那不勒斯

无论如何，巴枯宁不愿在死气沉沉的佛罗伦萨再呆下去了，但他的南下却是出于个人的动机。保罗和他的妻子娜塔丽正在意大利旅行，米哈伊尔曾从伦敦同这位未见面的弟妹娜塔丽热情地通过信。年初，他们去过佛罗伦萨。1865年5月，他们在索伦托，米哈伊尔和安冬妮在那里与他们相聚。但是家庭的联系越来越减弱了。现在，米哈伊尔已年过半百，保罗也四十来岁了，不可能重新建立起儿童和青少年时代的亲热关系。无疑，米哈伊尔继续就他的那份家产纠缠着他的弟弟。共同回忆以往的情景也不能补偿共同利益的缺乏。这次会面不但没有恢复亲密的关系，反而显得更加疏远，但还是产生了短暂的效果。它一时使米哈伊尔回想起过去：保罗和娜塔丽走后几天，他写信告诉他们，他开始写回忆录。象米哈伊尔大多数的文学创作计划一样，这回灵感的爆发也是昙花一现。一份现存的出自他的手笔的自传片断（也许是，也许不是这个时候写的）只写到十七岁<sup>①</sup>。

在索伦托夏天的令人困倦的日子里，他们坐在凉台上眺望海湾，饮茶，安冬妮看小说，巴枯宁漫不经心地写他的回忆录。另一个过去的回声在萦绕着他。他回忆起二十多年前他所崇拜的格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313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5—37页。

奥尔格·海尔维格，写信要求这位诗人“为党起草一份明确的纲领，向人民阐明它的原则，指出目前需要什么样的行动”。海尔维格体面地退出政治舞台已达十五年，如果他对政党和原则的意义有某些怀疑，那是可以原谅的。他青年时代的热情和精力已经消失，同赫尔岑（他的妻子很漂亮但很软弱）的激烈争论使他十分讨厌同俄国人打交道。他简单地回信说，他是一切政党的敌人，拒绝了巴枯宁的奉承的、意外的请求<sup>①</sup>。

10月初，巴枯宁迁往那不勒斯。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大概除了较近以外，没有更深刻的原因。在那不勒斯，除了上了年纪的里夫小姐以外巴枯宁不认识任何人。巴枯宁在伦敦时她是奥塞特公寓的女教师，现在在那不勒斯开办一所不大的英语学校。里夫小姐的地址用来进行秘密通信（如果有人想给他写信的话）。她没有别的政治上的用处。巴枯宁独自一人在那不勒斯时，突然对这个英国老处女产生了真诚的爱恋。巴枯宁发现她是“那不勒斯唯一有活力的人”。五周以后，里夫小姐突然因霍乱死在安冬妮的怀里。巴枯宁写了一封信给赫尔岑，信中的措词是他后来的书信所无法相比的：

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我都少不了她。每当我读到某个值得注意的材料或有了一个想法，我就赶快去同她谈谈并讨论一番。我几乎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令人愉快的、聪明的、富于同情心的人了。

活了半辈子的巴枯宁对于这个过于贫困而不能给他以物质援助、过于胆怯而不能分担他的政治抱负的人，竟仍然能这样表达激动的天真的诚意<sup>②</sup>。

---

① 《格·海尔维格书信集》，第8页。

②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61—163页。

从政治上说，那不勒斯的初次印象是很不好的。来此一周内，他写信给赫尔岑说，“在这里，反动力量不是在一天天增长，而是在一小时一小时地增长。”在冬季过去以前，他想返回佛罗伦萨。他断言，“除非在欧洲发生出人意料的、预见不到的事件”，否则，在意大利的生活很快将变得无法忍受。从革命的观点来看，欧洲依然是令人沮丧的平静。但在冬季，那不勒斯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巴枯宁在那里遇见了一位不寻常的俄国女人，她向巴枯宁提供经济援助，这笔钱是以使这个最反动的国家成为一个理想的居住地。从1865年秋到1867年秋的两年中，巴枯宁在那不勒斯安了家。

奥鲍连斯基公爵夫人的出身和婚姻，属于两个最古老和最显赫的俄国贵族家庭之一。1865—1866年冬，她与孩子们一起在那不勒斯安了家，有一群家庭教师、女管家和仆人，过着豪华的生活。不喜欢他丈夫的社交，宁愿居住在国外，这种罕见的现象的本身尚不足以使卓尹·奥鲍连斯基惹人注目。关于她的流言蜚语不是起源于她的行为的怪僻，而是起源于她的非正统的政治观念。她不放过任何机会夸耀极端的激进观点，她在那不勒斯把一群意大利和外国的烈性汉和革命者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们的政治热情得到了她的慷慨的酬偿。在她的仆从和受惠人中有两个斯拉夫人：一个是机灵的姆罗茨柯夫斯基，此人现在或以后成了她的情人；另一个是米·巴枯宁。巴枯宁与公爵夫人的合作，两个人都得到了充分的好处。他的革命声望把她提高到一个真正的密谋家的地位；她的财产保证巴枯宁夫妇能过上舒适、豪华的生活，这是他二十五年前第一次离开俄国过着流浪生活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两年后，巴枯宁估计欠公爵夫人的债款达七千法郎。无法猜测这个数字同她实际给他的资助有什么关系<sup>①</sup>。

---

①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59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354页。

那不勒斯的政治形势不利于革命的鼓动工作要比巴枯宁担心的小一些。实际上，反动派的老巢正是他所向往的地下阴谋活动的肥沃土壤。那不勒斯王国的“解放”和六分之五意大利半岛的统一实现五年以后，给意大利留下了日益增长的不满的后果。性急的意大利人期待黄金时代的到来，但失望地发现当时的“黄金”并不纯，不过是掺进大量贱金属的混合物。民族的事业已经胜利，但是它的胜利并没有消除社会的不满。正是在这些不满的民族主义者中间，奥鲍连斯基公爵夫人找到了她的奉承者，巴枯宁找到了他的新门徒。他们大部分是自由职业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医生弗里西亚、建筑师和工程师法奈利，他们两人都参加过1848—1849年革命；还有一个律师卡洛·甘布齐，此人成为巴枯宁最亲密的朋友之一<sup>①</sup>。

在这种比佛罗伦萨有利得多的环境下，巴枯宁重新或继续进行他在佛罗伦萨人中做过的试验。他把被吸引在奥鲍连斯基公爵夫人这位出色人物周围的一群人作为核心，建立了一个新的秘密团体。他狂妄地称它为国际兄弟会<sup>②</sup>。巴枯宁为这个团体起草的章程现在还保存着，作为他后来建立其它团体的样板。兄弟会分成两类：国际兄弟社和民族兄弟社<sup>③</sup>。国际兄弟社将成为兄弟会的核心或指挥部，具有公开的和秘密的两重性质。作为一个公开组织，它将从事合法的宣传；作为一个秘密组织，它将从事革命的地下准备工作。整个组织具有严格的纪律；甚至当巴枯宁公然宣扬无政府主义原则时，他仍然坚信独裁是个惯用的手段。每一

---

1)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77页。

2) 原文是an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译注

3) 原文是the International Family, the National Family, 亦译作“国际兄弟会”、“民族兄弟会”。——译注



个民族兄弟社的成员有义务无条件地服从民族委员会<sup>①</sup>或执行委员会，每一个民族委员会接受国际中央理事会的指导，但它与国际兄弟社的关系仍不清楚。正式会员和“名誉”会员（后者是一些同情者，“尤其是一些有钱人”，这些人不参加实际工作）都要宣誓忠于兄弟会。誓词放在匕首上，并威胁说，任何违背誓词的人要受到“严厉的报复”（就象可怜的古贝那茨在佛罗伦萨担心遭到的报复那样）。最后，这样制订的章程将被看作是临时性的；因为当兄弟会达到七十个成员时，将召开代表大会，制订该组织明确的章程和纲领。

最后这条令人注意的条文有助于弄清兄弟会的人数。虽然，巴枯宁起草这个文件时，它的成员还不到七十名，民族兄弟社或民族委员会还只是纸上的东西，并不存在。实际上，国际兄弟会也许不比佛罗伦萨的纯粹是意大利人的兄弟会大；“国际的”这个标签似乎仅仅由于公爵夫人、茹柯夫斯基和另一个名叫察可斯基的波兰人的存在才算合适的。但是，巴枯宁用华丽的伪装来弥补它的不足。1866年夏，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中用令人不解的词句描述这个新组织：

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我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结果。在瑞典、挪威、丹麦，有我们的朋友；在英国、比利时、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我们有波兰人，甚至还有几个俄国人。在意大利南部，马志尼的组织神圣长枪会中的大部分人已经靠近我们……全体人民，特别在南意大利，正在成批地加入到我们中间来，我们在物质方面并不缺乏，而是缺乏能使这种物质具体化的有信念、有能力的训练有素的人。

---

① 原文是the National Junta，Junta原意是控制一个政党、组织的核心集团。——译注

事实上，散布在欧洲各国的朋友同大批意大利的支持者一样，不过是一个神话。新近的一些报告提到了一些西班牙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是国际兄弟会会员。但是除了一、两种情况外，这些报告看来不是巴枯宁的不断空想的结果，就是把国际兄弟会和他后来建立的团体混为一谈了<sup>①</sup>。

\*                    \*                    \*

这个新的兄弟会享有的可观的资助使它的成员看不清它缺乏政治内容。1866年夏，奥鲍连斯基公爵夫人搬到伊斯基亚岛上的卡萨米西奥拉。在那里，她为她的全家、仆人和客人预订了一家大旅馆的一间侧厅。巴枯宁夫妇是这个大家庭中的固定成员。在这种类似皇家生活的环境里，巴枯宁〔用一位孔德的俄国青年信徒威卢博夫<sup>②</sup>的话来说，——此人是带着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介绍信去找他的〕

进行筹划，布置舞会和野餐；他指挥大家、管理大家，发号施令。这些并没有妨碍他用各种文字向国际兄弟会的各个支部书写大批冗长的指导信。大家对他言听计从，以敬畏的心情崇拜他。实际上他在其周围的一群人中，是出类拔萃的。尽管他很和气，但仍有军士教官的气质。

巴枯宁夫妇有一艘帆船，两个水手，供他们使用。威卢博夫参加了他们的“大型动植物和矿物考察队”，在沿海和那不勒斯海湾群岛里活动<sup>③</sup>。

---

① 威卢博夫：《欧洲通报》（1913年2月），第51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327—328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71页。

② 格里哥里·尼古拉也维奇·威卢博夫（1843—1913），俄国结晶学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1864年起侨居巴黎，和平和自由同盟盟员。——译注

③ 威卢博夫：《欧洲通报》（1913年2月），第47，53—54页。

但是这些令人愉快的消遣并没有长期地转移巴枯宁对更重大的事业的注意力。

〔威卢博夫叙述道〕在我们相识之初，巴枯宁像一个真正的密谋家，对我不信任。晚上九、十点钟，他常常接待一些陌生的、神秘的人物的来访。他向我解释说，他们有要事商量，要我去同安冬妮坐在一起，她通常坐在阳台上。

然而，此时巴枯宁吸收新成员的心情过于迫切，顾不得猜疑了。他把兄弟会的纲领和章程交给威卢博夫，“下令严禁外传”。

〔威卢博夫继续写道〕第二天，我把这份古怪的文件还给了他，并告诉他我不能参与政治阴谋。虽然我是一个思想最激进的人并准备用我的全部力量来捍卫兄弟会，但是我只能面对面地、而不是用秘密的手段去捍卫它。但是巴枯宁是不会轻易地放过他的注定的牺牲品的。

“你已经知道我们有一些同情者，我们不要求他们参加任何阴谋活动，只要用文字宣传我们的观点就行了。我们必须吸收你到他们中间去。”

“好吧，就照你说的办。不过我不大喜欢那些放在匕首上的誓词。”

“喔，那并不是非要不可的。那是为意大利人搞的。我们同意你说的。你同意吗？”

“根据这些条件，我同意。”

他站起来，一本正经地宣布，他接收我为国际兄弟会的成员，拥抱了我，并说：

“现在作为一个新的兄弟，你得缴二十法郎。”

这就是这次谈话的实际结果。我禁不住笑了。他也和善地、高兴地笑了。

这就是留给我们的巴枯宁在那不勒斯建立国际兄弟会活动的

仅有的一份详细报道。兄弟会的活动方式是滑稽可笑的，其成就等于零。但是它在巴枯宁的一生中是一个突出的标志。巴枯宁自己对此也很满意。它成了巴枯宁后来搞的组织的样板。他为兄弟会写的纲领《革命问答》是他政治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sup>①</sup>。

自从巴枯宁到达意大利、恭敬地去卡普里拉岛朝圣以来的两年中，他走得很快、很远。由于民族的缘故，他第一次被意大利吸引住了。他对意大利民族主义的热情似乎顷刻间补偿了他在波兰的雄图方面所遭受的挫折。但是这种补偿证明是虚假的。民族主义的胜利远不是随之而来的革命的胜利，社会问题原封未动地留了下来。解放了的意大利并不是在“繁荣和伟大”方面超过别的国家，只是在乞丐方面超过别的国家。伟大的意大利领导人焕发出他们革命的神采。加里波第在卡普里拉岛接见巴枯宁后三个月，访问了伦敦，受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在水晶宫<sup>②</sup>里，他要欢呼的群众相信，他是多么羡慕他们对“亲爱的女王”的忠诚。巴枯宁认为这是“法国人所称的傻事，在加里波第方面，……这是致命的傻事。”马志尼更危险。巴枯宁新确立的不妥协的无神论思想不能容忍马志尼带有神秘色彩的民族主义，马志尼把他在意大利建立的组织取名为神圣长枪会，竭力在民主与宗教之间搞平衡。所有这一切纯粹是机会主义。像加里波第和马志尼这样的人根本不是革命者。为了追求狭隘的民族主义理想，他们双方互相耍手腕。所有国家真正的革命者被迫采取反对他们的“爱国的资产阶级的华丽词藻”的时刻即将到来<sup>③</sup>。

巴枯宁在《革命问答》里第一次宣布他拒绝承认民族主义是

---

① 威卢博夫：《欧洲通报》（1913年2月），第51—52页。

② 建于伦敦郊外锡德纳姆的游乐场地，1936年烧毁。——译注

③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315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57，171页。

一种革命的力量，清楚地阐明了他的无政府主义信条的要点。《问答》以真正的巴枯宁的格调，开头就提出要“彻底摧毁一切现存的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机构”，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以自由、理性、正义和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它否认人格化的上帝的存在，宣称人的理性和人的良心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政治上，它主张“废除和消灭起监护作用的、超自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使其在道义、政治、司法、官僚统治和财政方面破产；国家与教会是一对孪生子，因而是人民的贫困、受欺骗和受奴役的永久的根源。”《问答》奠定了无政府主义的带根本性的先决条件，然而仍然害怕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此时，在巴枯宁形式上谴责国家的同时，仍然把民族作为他的基本单位，甚至准备建立民族议会。民族由“绝对自治”的公社联邦组成；“革命的民族”进而形成“国际联邦”，“国际联邦”将作为一个“对抗反动国家联盟的紧密同盟”发挥作用。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主张人人完全平等，废除继承权，阶级和阶层将消失。平等的情侣之间的“自由婚姻”将代替“宗教—法律”的婚姻。单个民族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有社会民主革命的纲领才能够把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鼓动起来，激奋起来<sup>①</sup>。

1866年夏，他最后地从革命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混乱中摆脱出来（他是在1846年波兰人的推动之下滑进民族主义的），这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时刻。他识破了真相，觉察到现在只存在“两个阵营，两个祖国：一个是革命，另一个是反革命。”他还发现，正如马克思1848年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sup>②</sup>，民族主义能够轻易地成为革命的同盟者，也能够同样轻易地成为反革命的同盟者。“弥赛亚—民族”的时

---

①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337—342页。

② 《共产党宣言》的原文是“工人没有祖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译注

代已经过去了<sup>①</sup>。从此以后，革命事业摆脱了民族主义的羁绊，在新的、更加坚实的前提下继续前进。在巴枯宁的一生中，意大利的这一段插曲标志着他从中年时的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晚年时的革命无政府主义<sup>②</sup>。

\* \* \*

1866年至1867年冬注定要成为巴枯宁在意大利的最后时期。三年多的时间，意大利的狭小天地开始使他腻烦了（其间只有一次去瑞典旅行）。1865年3月，赫尔岑和奥格辽夫随着他们自己的迁居也把《钟声》杂志从伦敦迁到日内瓦；从那时起，巴枯宁的思想不止一次地急切地转向瑞士境内。另一些动机也促进了最后的决定。直到1867年春，意大利当局对巴枯宁在意境内的居住和活动表示采取中立。现在一些谣言开始流传，说他参与伪造意大利钞票，鼓动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颠覆活动。出于偶然的巧合，曾经主谋把巴枯宁驱逐出巴黎的俄国外交官基谢廖夫现在是驻佛罗伦萨维克多·艾曼纽埃尔朝廷的俄国公使。巴枯宁深信基谢廖夫是这些新的攻击的制造者，并试图诱使意大利政府把自己驱逐出境。官方的档案不能证实确有此事。但是巴枯宁的不安是合情合理的。他威胁说，要同一个反复散布这些令人愤慨的谣言的无辜的教授提出决斗。后来几年里，他总喜欢讲述自己受警察迫害被赶出意大利的经过。实际上，并未发生这类事。疑虑和恐惧足以使他坐立不安<sup>③</sup>。

最终使巴枯宁下决心离开意大利的原因是慷慨地资助他的那个女人离开了。1867年5月，为了寻求国际兄弟会的新成员，姆

---

① 弥赛亚是犹太人所期望的复国救主。——译注

②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57—158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142页。

③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64，204—205，208—209页。

罗茨柯夫斯基到瑞士、法国和比利时去了一次。他在日内瓦拜访了赫尔岑，赫尔岑一开始就拒绝同巴枯宁的团体打交道。但是姆罗茨柯夫斯基至少吸收了两名新成员：一个是巴枯宁在伯尔尼的老朋友的儿子艾米尔·福格特，另一个是比利时医生塞扎尔·德·巴普，此人后来是国际中的著名人物<sup>①</sup>。然而，姆罗茨柯夫斯基此行的真正目的也许是与公爵夫人的事件有关。她与姆罗茨柯夫斯基的私通此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他的政治观点更加臭名昭著。奥鲍连斯基公爵的愤慨是可以理解的。大约这一次他成功地不让公爵夫人得到到那时为止她一直得到的宽裕的收入；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比较节制的生活方式，于是移居瑞士。夏天，公爵夫人和她的情人在日内瓦湖边韦维附近的查普尼亚尔的一个别墅安了家。

于是，巴枯宁跟随他们同去的好机会很快出现了。普鲁士与法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成为欧洲和平的明显威胁。1867年6月，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委员会向“自由民主的所有朋友”普遍发出邀请，于9月在日内瓦召开代表大会，大会的目的被含糊地规定为“维护自由、正义与和平”。巴枯宁决定参加这个大会。1867年8月中旬，他离开意大利去瑞士，在日内瓦公开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开始了他生涯中一个新的、活跃的时期<sup>②</sup>。

\* \* \*

这里还得叙述一下巴枯宁在意大利的家庭生活。他的年轻的妻子从亚洲到欧洲去同他团聚，这证明她对丈夫还是有感情的。但由于他的政治活动日益增多，妻子对这些事情的冷淡也更加明

---

① 塞扎尔·德·巴普（1842—1890），比利时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比利时第一国际支部的创建人，1885年比利时工人党的创始人。——译注

②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194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332页；《日内瓦代表大会年鉴》（1868年，日内瓦）。

显了。凡是见过他俩的人都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丈夫与妻子之间缺乏任何共同的兴趣与爱好。梅契尼柯夫叙述道：在佛罗伦萨，他们在不同的圈子里活动，除了当他们在同一个晚上招待各自的不同类型的朋友外，几乎看不到他们在一起。在那不勒斯，威卢博夫描绘了一幅略为不同的巴枯宁家庭环境的画面：

他住在该镇尽头的高地上。从他宽敞房间的窗口望出去，真是赏心悦目：你能看到那不勒斯全城，沿着海湾有一溜狭窄的、连绵不断的、名称各不相同的居民区，背后耸立着圆锥形的宏伟的维苏威山。他深居简出，也从不隔窗远眺。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吸引不了他，他没有时间欣赏大自然，整天训导某人或给四面八方写信。与此同时，他的默默寡言的、富于幻想的、比他年轻四分之一世纪的安冬妮从早到晚坐在阳台上观赏风景。这是一门奇异的婚姻，更正确地说，只是所谓的婚姻。……

他以自己的方式疼爱妻子，对她充满柔情。只要其它更关心的急事允许，他关心她的幸福；但在他的激烈动荡的生活中，她完全是一个次要的因素。

“请看看我的安冬妮”，一次当她坐在隔壁房间里时巴枯宁对我说，“她真傻，与我没有一点共同的信念；但她非常好，脾气非常温和，她能很好地抄写我的重要手稿。当我的笔迹不能辨认时，就必须请她誊写。”

然而，无论和蔼的、没有头脑的、浪漫的安冬妮在佛罗伦萨寻求她自己的社交乐趣，或者在那不勒斯靠在窗口坐在那里幻想她的生活前景，他们在体格上、智力上和精神上的不一致是绝对的。安冬妮才二十七岁，在他们结成这门所谓的婚姻十年之后，她不再像她的丈夫对她那样，对比她的年龄大得多的丈夫抱更多的幻想。她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年轻女人，正如一个好献殷勤的法国人说的那样，“除了雪白的皮肤外，她从她的国家的白雪中什么也没有得到。”恰恰是国际兄弟会里巴枯宁的一名助手夏洛·



甘布齐终于占有了她的空虚的心灵。此事是早就预料到的必然的结局，几乎没有引起什么风波，没有人留意去记下此事是何时或如何发生的，甚至巴枯宁自己也许也不清楚。很早以前，巴枯宁曾为塔蒂安娜对别林斯基的想象中的倾慕十分妒忌，大发雷霆；他对政治上的对手仍会表现出刻骨的仇恨。但是，这并没有引起他对自己的妻子和她的情人的妒忌。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他声称他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加以干涉。当巴枯宁夫妇离开那不勒斯时，甘布齐为了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也随同他们到了瑞士<sup>①</sup>。

---

① 梅契尼柯夫：《历史通报》（1897年5月），第810页；威卢博夫：《欧洲通报》（1913年2月），第47—48页；阿尔努：《新闻评论》（1891年8月），第594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10—411页。

# 第五卷

巴枯宁和马克思



“政治鼓动对他来说像呼吸一样不可缺少。”

波斯特尼柯夫给第三厅的报告

(1870年9月17日)



## 第二十五章

# 和平和自由同盟

1867年8月巴枯宁离开意大利时，他的政治信念的主要轮廓已经最后牢固地形成了。他认为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导致取消“集权制国家”，并可以用一种组织得更为松散的社会来代替国家，而这种社会是以模糊的自由、平等和正义观念为基础的。他移居瑞士不仅带来了他信念上的变化，而且带来了方法上的改变。在意大利时，巴枯宁故意不出头露面，不写任何重要的东西，仅仅局限于秘密宣传和组织活动。在瑞士的自由国土上，则需采用别的策略。他没有摒弃从事阴谋活动的强烈爱好，同时也不放过机会通过演说或发表文章把他的信念公诸于众。从1867年9月到1872年9月这五年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在这段时间内（除了在法国短暂逗留外），他从未隐瞒身份，也不掩盖自己的观点。他以革命导师或领袖的身份公开出现，他的大部分著作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这五年的头一年，巴枯宁作了一次试验，试验证明只是幻想。日内瓦代表大会向“所有自由民主的朋友”发出邀请；根据组织委员会发布的纲领，这次代表大会旨在组成：“欧洲民主同盟”。但是民主一词含意之广，足以包括多种政治观点。从发出邀请到召开代表大会期间，有一万人报名参加。英国有著名的约翰·布莱特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意大利有加里波第；瑞士有詹姆斯·法济（他多年来是日内瓦政界权威人士）；法国移民中有维

克多·雨果、路易·勃朗和埃德加尔·基奈；俄国人中有赫尔岑和奥格辽夫。从主要发起人的名单来看，这次代表大会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是自由主义和和平主义性质的，肯定不是革命的。当时，它为巴枯宁重返国际舞台提供了讲坛。但是，一个辨别能力更强的革命者决不会真正希望利用它来作为宣传自己政策的工具，哪怕只有一年时间。

巴枯宁去日内瓦的第二个动机是希望与赫尔岑和奥格辽夫恢复老关系，但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奥格辽夫真的在那里接待了他，他住在珀蒂兰西郊区，和他的英国情妇玛丽·萨特兰德、儿子亨利以及小亚历山大·赫尔岑的私生子住在一起。他仍像过去那样有魅力，那样充满希望和信心，那样认真地热心听取那些最广泛而又最不现实的纲领。奥格辽夫在其后几年内依然是巴枯宁最忠诚的朋友和最经常的通信人。但是，过度饮酒和癫痫病近来严重地损害了他虚弱的身体和头脑，即使巴枯宁这样盲目乐观的人也能看出奥格辽夫的精神已经耗尽了。只是传统关系以及与赫尔岑的长期联系才使他在革命事业的老前辈中占有一席之地。

赫尔岑已经离开日内瓦，《钟声》并没有因为从英国迁往瑞士而停止走下坡路，而于1867年7月停刊。赫尔岑到尼斯与娜塔丽娅·奥格辽夫团聚，以后他不常去日内瓦，去了停留时间也不长。他得知巴枯宁再次出现时，也无动于衷。他写信给巴枯宁，很勉强地请他来管理日内瓦的一套房间，这套房间只是“空空四壁，几把椅子，特霍尔泽夫斯基公司的所在地”。但他听说巴枯宁在那不勒斯结识的日内瓦动物学家克拉巴雷德也来献殷勤时，他倒希望巴枯宁接受邀请，因为克拉巴雷德将为此“终身难忘”。赫尔岑更为勉强地授意奥格辽夫借给巴枯宁一百法郎，“如果他的确需要的话”，——巴枯宁无疑是很需要的。赫尔岑对巴枯宁已不热心，也不想再见他。虽说赫尔岑是第一批报名参加代表大会的，但他毕竟没有去日内瓦出席大会。只有巴枯宁、奥格辽夫

以及年轻的实证主义者威卢博夫代表俄国出席首届“欧洲民主同盟”代表大会<sup>①</sup>。

1867年9月9日下午两点，代表大会由组织委员会主席、一名日内瓦教授巴尔尼<sup>②</sup>主持，在选举宫开幕，在他右边就坐的是名誉代表加里波第，是大会组织人网罗来的最大人物。与会者估计共有六千人，其中多半来自日内瓦州。大会推选瑞士政治家若里圣为主席，随后又任命一个执行委员会，还一致通过决议：出席大会的每个国家派两名代表参加执委会。巴枯宁和奥格辽夫是俄国委员。与会者都听说过这位俄国暴政的最大敌人和受害者的成就和苦难，但很少有人见过他。当宣布巴枯宁名字时，会场引起一阵轰动。

巴枯宁迈着沉重的、笨拙的步伐登上通向委员们就坐的主席台台阶。他还像往常那样不修边幅，身着灰色上衣，未穿衬衣，只穿一件法兰绒内衣。人们大声传呼：“巴枯宁！”加里波第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和他拥抱。两位久经磨练的革命老战士隆重相会，令人十分惊讶，给人留下很深印象……全场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

巴枯宁就这样在欧洲民主派领导人当中占据了正式的地位<sup>③</sup>。

代表大会的预备声明中指出，大会的目的是要“确立各国之间保持和平的政治、经济条件，尤其是要建立‘欧洲联邦’”，但一般性的辩论却离开了这个颇具雄心的纲领的范围。加里波第在开幕词中提出了宗教问题，他的演讲表明，他只能当一名战士，而不配做一名外交家。他攻击教皇制度是“最有害的教派”，吁请代表大会“信仰上帝”。这一着打击面很广，既触犯代表中的

---

①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9卷第443页，第20卷第1、3、5、12页。

② 茹尔·巴尔尼（1818—1878），法国政治活动家，唯心主义哲学家，1872年起为议会议员。——译注

③ 威卢博夫：《欧洲通报》（1913年2月），第54页。



少数天主教徒，又得罪了许多无神论者。国际工人协会在洛桑举行的应届代表大会上刚刚通过一项决议（这项决议是由一位名叫詹姆斯·吉约姆<sup>①</sup>的年轻的瑞士人转交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赞同日内瓦纲领，条件是把“解放工人阶级，将工人阶级从资本的权力和影响下解放出来”这一条写进日内瓦纲领。翌日，国际的另一名代表杜邦<sup>②</sup>进一步阐明这一主题，直截了当地宣布把社会主义作为代表大会的目的之一，这使许多保守的代表深感不安。加里波第关于“信仰上帝”的主张把人们吓得喘不过气来，也使左派发生了意见分歧。但总的来说，代表们是来表示祝贺与捧场的，不是来品头论足的。他们毫无例外地都以热烈的掌声向每个演讲人致意。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巴枯宁第二天下午在大会上发言，博得全场“长时间鼓掌”和委员会同事们的“热烈祝贺”。他的发言稿后人无法知道。他用法语发言，讲得很快，速记跟不上。他说，当时关于他发言的报导“不仅不准确，而且有错误”。四个月后，他根据回忆（因没有发言稿）写了一份很长的发言的要点，供大会年刊登载。这份印刷稿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他的口头发言，现在无法确定，但它很有说服力地阐明了巴枯宁的纲领。他声称自己是“俄帝国的最不忠顺的臣民”，他抗议这个帝国的存在，希望“帝国的军队将在由它发动的未来的战争中吃败仗”。他宣称只有联邦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俄国。他还猛烈地谴责民族主义（但他自己也曾一度带着这一观点参加革命）是反动派的主要工具。

---

① 詹姆斯·吉约姆（1844—1916），瑞士教师，无政府主义者，第一国际会员，巴枯宁控制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者之一，1872年第一国际海牙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译注

② 欧仁·杜邦（1831年左右—1881），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年巴黎六月工人起义参加者，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译注

我们必须断然抛弃这个虚伪的民族原则，这项原则是法国、俄国和普鲁士的暴君们为了扼杀自由的最高原则在近几年捏造出来的。民族并非原则，它和个人一样是个合理的事实，每个民族，无论大小，都有其无可争辩的生存权利，按照它本身的特性生存下去，而这种权利仅仅是自由的普遍原则的产物。

和平的首要条件是用国际正义来代替民族利益。

从这些抽象概念出发，巴枯宁谈到他最喜爱的主题——谴责“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些国家不消灭，就不可能建立欧洲联邦。谁能设想有这样的联邦，在这个联邦里，法国作为一个单位与巴登大公国并存，或者俄国与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并存呢？

只要现今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有普遍的和平。我们必须希望这些国家瓦解，以便在这些自上而下地用专制和征服组织起来的人为的统一体的废墟上，建立起自由的统一体，这种自由的统一体必须自下而上地组织，由公社自由联合成省，省联合成民族，民族联合成欧洲联邦。

尽管他开出了联邦和社会主义作为他拯救国家的两副药方，但值得注意的是，巴枯宁的整个讲演实际上谈的这两副灵丹妙药中的第一个药方，社会主义在他的纲领中仅占次要地位，宗教只是在这个场合下顺便提一下而已。

大会开了两天以后，加里波第离开日内瓦，大会的气氛就恶化了，开头那种热情消失了。原来在较有名气的代表发言时还处于潜伏状态的批评，此时已开始抬头，尤其在宗教和社会问题上引起了尖锐的交锋。第三天，发言者常常被打断，宗教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携手合作，企图阻挠代表大会尚未进行的议程。第四天和最后一天，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用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一项谨慎地排除一切有争议问题的决议，即建立每年都要举行年度

代表大会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任命一个常设中央委员会。此外，大会只限于表达一些模糊的、善良的希望，赞同消除无知和偏见，取消常备军和改善“工人和无产阶级”的命运。代表大会闭幕时，举行了宴会。在闭幕会上的激烈气氛又在宴会上表露出来了，有几名代表退席，抗议某些祝酒词中的激进和革命的语气。巴枯宁在祝酒词中说，“同盟及其将来举行的年会要阐明它的原则，越来越紧密地团结分散在全世界的共和主义者，以加速联邦、社会主义和反神学主义的真正民主的到来”。

这就是这个短命的但意图良好的团体——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极为不祥的开端。巴枯宁这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却很高兴，他给威卢博夫写信说，这次代表大会取得的成绩比他预料的要大得多。要发现他满意的原因是很困难的。大多数激进的观察家都认为，同盟已经暴露其资产阶级的和保守的性质。如果说同盟还没有转而接受联邦、社会主义和无神论的原则，那巴枯宁却十分相信自己有力量使同盟信奉这些原则。第一步是使中央委员会（他已被任命为委员）信奉，而且他乐于承担这项任务<sup>①</sup>。

\* \* \*

委员会决定在伯尔尼开会，因而，巴枯宁就没有理由再享受在日内瓦的“厚待”了。奥鲍连斯基公爵夫人及其情人已在韦维城附近的一个可爱的地方定居，巴枯宁随后也迁往韦维，在那里度过了平静的冬天和春天，偶尔也到伯尔尼去，就是在韦维，巴枯宁再次成为围绕着革命的公主转的那个集团的一员。

奥鲍连斯基公爵的干预，严重地削减了公爵夫人的慷慨捐助。简陋的别墅代替了那不勒斯和伊斯基亚的宏伟的住宅。姆罗茨柯

---

<sup>①</sup> 《日内瓦代表大会年鉴》，（1868年，日内瓦）；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41—56页；威卢博夫：《欧洲通报》（1913年2月），第72页；作者在《国际的事件》（1935年11—12月）中，对日内瓦代表大会作了详细介绍，第837—844页。

夫斯基以摄影为业。这个集团的人员组成已经发生变化，意大利人中只有甘布齐，他现在几乎成了巴枯宁的正式管家。但是，空缺很快地、令人满意地由一批俄国青年补上了。彼得堡纵火事件和波兰起义在俄国引起了反应，造成政治移民的新浪潮，日内瓦湖畔成了这新一代俄国流亡者最喜爱的避难之地。在这些青年人中，奥鲍连斯基公爵夫人找到了革命拥护者的新场所，巴枯宁也找到了他的国际兄弟会的新会员。

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对巴枯宁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最突出的是尼古拉·吴亭，他是1863年夏天从彼得堡逃出来的犹太大学生，他的出逃是“土地和自由社”崩溃的表现或原因之一。在过去的两年内，他住在日内瓦和蒙特勒。巴枯宁1863年秋天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他，四年后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再次和他相遇。这位青年在代表大会上对巴枯宁的思想和为人表示出过份的热忱。他也一定在那里和那位公主初次相见。其次是尼古拉·茹柯夫斯基，他1862年和“土地和自由社”有过短暂的联系，现在和妻子阿达以及已婚的妹妹奥里珈·列瓦晓夫住在韦维附近的克拉伦斯的一座别墅里，妹妹热情地支持他的激进思想。茹柯夫斯基本人的财产不多，但奥里珈·列瓦赫夫却有足够的财产向那个团体提供资助，以弥补失去奥鲍连斯基公主捐助所造成的损失。无疑正是这种资助使吴亭夫妇以及巴枯宁一家得以在茹柯夫斯基的别墅里安家。这个团体有些人 and 巴枯宁的关系不甚密切，最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他是“土地和自由社”的鼓动家和主要受害者的兄弟，此人易于冲动，又有点神经质，是这个团体中的好斗者和坚硬派（他在日内瓦避难所住过一段时间，后来自杀了）。另一名是米哈伊尔·艾尔皮金，他主要由于在日内瓦创办一家印刷厂而占有重要地位。最近被吸收加入这个团体的是一名自修的法国青年工人贝努瓦·马隆，他有志于政治和文学，依靠一位不太年轻的法国女谋士尚普塞夫

人的赞助而生活，尚普塞夫人曾用安得列·莱奥的笔名写小说<sup>①</sup>。

这些新的同伴对巴枯宁与赫尔岑的关系是一个沉重的、致命的打击。1865年，赫尔岑从伦敦迁往日内瓦，那时，他希望在日内瓦日益增加的俄国移民中找到新的追随者，为《钟声》找到新的读者。这是天真的想法。六十年代的激进派是些十分活跃、心明眼亮的青年，他们不愿向五十年代那种陈腐的、信誉扫地的自由主义低头。赫尔岑在日内瓦找到的不是追随者，而是毫无恻隐之心的无情的批评者，他们的信条和策略无情到了赫尔岑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公开嘲笑赫尔岑的中庸之道，嘲笑他对亚历山大二世所表示的虚伪的尊敬，嘲笑他对俄国立宪民主的前途所抱的感情用事的信念。1867年春，亚历山大·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发表一篇长文，粗鲁地指责赫尔岑及其所有作品，赫尔岑写信给在意大利的巴枯宁，对此表示愤怒，巴枯宁回信却对新一代大加赞扬，称赫尔岑的愤怒未免“有点敏感”。现在巴枯宁正公开地与这些冒失的、头脑发热的青年人交往，赫尔岑对此并不惊讶，他用嘲弄来回避问题，以鄙视的态度谈论“韦维的哥萨克和阿特曼<sup>②</sup>米哈伊尔”。他在日内瓦遇见过巴枯宁一两次，但避而不谈重大的争论，以免引起争吵。有一次他见过巴枯宁之后，写信给奥格辽夫说：“巴枯宁还是老样子，但是他裤子上的扣子都掉光了，只是由于习惯的力量和共振的引力才使裤子保持原状。”<sup>③</sup>

---

① 巴枯宁：《人民的事业》，第1卷第2页；第6卷第269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6卷第439页，第20卷第276页；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133，183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409页。

② 阿特曼（Atman），哥萨克酋长。——译注

③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20卷第21，182，274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206页。

与此同时，巴枯宁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中央委员会中不懈地努力工作。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是古斯塔夫·福格特，他是二十多年前以年轻人著称的“四兄弟”<sup>①</sup>中的老四，他常到伯尔尼去，肯定有很好的机会来恢复他和赖歇尔夫妇（赖歇尔现在和一个俄国妇女结了婚）与福格特一家的个人之间亲密关系，但他去伯尔尼只是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里才有记载。委员会的章程很特别，同盟是以民族为基础的，委员会的投票是以民族为单位进行的。俄国代表团由巴枯宁、茹柯夫斯基组成；波兰代表团由姆罗克兹科夫斯基和扎戈尔斯基组成。在巴枯宁领导下的这两个代表团是委员会的左派，瑞士、法国、意大利代表团（甘布齐是意大利代表团成员）代表了曾经控制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稳定的资产阶级多数派。两名出席过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英国工联主义者被选为委员会的英国代表。但由于路途太远和缺乏资金，他们不能到会。德国代表团虽然出席了，但他们之间分歧太大，几乎不能发表意见。

巴枯宁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大会的程序。他以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宴会上的祝酒词为蓝本，向委员会提交了一篇题为《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学主义》的长篇论文，要求作为同盟的纲领。这篇文章散发给委员会，甚至准备用这样的副标题付印：“致和平和自由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合理建议。巴枯宁于日内瓦”。但当巴枯宁写到这个题目的第三部分时，他的笔不听使唤了。他用相当于其他两个“主义”所占的篇幅来谴责宗教，随后就停笔不写了，这一作品既未完成也未发表。巴枯宁起初就没有使委员会的大多数同事信服，他的确诱使委员会抵制宗教信仰，声明道德“应建

---

<sup>①</sup> 福格特四兄弟是：卡尔·福格特（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艾米尔·福格特（1820—1883），瑞士法学家；阿道夫·福格特（生于1823年），瑞士医生；古斯塔夫·福格特（1829—1901），瑞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译注

立在人类本身固有的正义思想基础之上”，但是，关于同盟应把“彻底改变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写进它的宗旨的动议，却由于古斯达夫·福格特的决定性一票而被否决了，福格特强烈地谴责巴枯宁的“诡计”。有人要求在“同盟”这个名称前加上“民主与共和”这两个特称形容词，这项建议一下子就被否决了。巴枯宁这个最坚定的乐观主义者要使同盟摒弃天生的资产阶级偏见，他一定因为此举没有成功而感到绝望<sup>①</sup>。

然而，巴枯宁还是坚持下去，他的努力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这使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868年5月31日和6月1日，委员会在伯尔尼又开了一次会，主要议程是为9月份在伯尔尼召开的下届年会作出安排。自上届代表大会以来，阵营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现在，委员会的大多数都顺从地跟着巴枯宁走，并通过了一项极为激进的纲领，日内瓦代表大会或去年秋天举行的委员会会议都会赞同这个纲领的。这个纲领明显地出自巴枯宁的手笔，主要段落如下：

同盟确信，宗教、政治和经济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三个绝对不可分割的基本方面，因而确认：

（1）作为个人信念问题的宗教必须从政治机构、社会教育中清除出去，使教堂不能束缚社会的自由发展；

（2）欧洲联邦只能以联邦方式统一起来的人民机构的形式组成，而不得以任何别的方式组成，并以人人权利平等、各公社和各省根据自身利益实行自治为其基本原则；

（3）必须彻底改变现存经济制度才能得到财富、劳动、休息和教育的合理分配，这是工人阶级解放和无产阶级消亡的基本条件。

---

<sup>①</sup> 《巴枯宁文集》，第1卷第1—205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386—391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20卷第128页。

巴枯宁当然为他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理论得到承认而感到高兴。他以得胜者的心情，于1868年6月14日写信给奥格辽夫说：“我们终于达到目的了！”<sup>①</sup>

纲领的最后一段也是最有异议的一段证明存在一种新的、重要的影响。不管巴枯宁四年前在伦敦向马克思作过什么帮助国际的事业的保证，但他早就抛在脑后。他听到了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的国际的演说词；他也听到了杜邦代表国际所作的激动人心的讲话，但他都不感兴趣。他本人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根本没有——如果记录准确的话——提到国际以及关于国际的事务。此外，在大会期间，他收到了马克思寄来的新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赠书，当时他无动于衷，或者忙于其他事情，竟然忘了写信感谢赠书人。但是在冬天或春天某个时期，他摒弃了赫尔岑民主自由主义的最后残余，开始把他的革命希望越来越专门地寄托在工人群众的不满上，他的思想转向国际工人协会，因为只有协会才正在努力为了革命的目标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1868年3月，日内瓦建筑工人罢工，罢工者在历史上首次寻求并取得了国际的支持。显然，国际开始成为有影响的团体了，当时巴枯宁接近的那个团体中的艾尔皮金或其他人都参加了国际。巴枯宁又一次研究国际的文件，当他着手为“和平和自由同盟”中央委员会起草声明时，他发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和无产阶级的消亡”这一要求显然是马克思关于“解放工人阶级”和“取消一切阶级统治”这一公式的释义。巴枯宁走得太远了，他采取一个合乎逻辑的重大步骤。1868年6月或7月，他由艾尔皮金介绍加入了国际日内瓦支部，成为国际会员<sup>②</sup>。

---

①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71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17页。

②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305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395—396页。



如果巴枯宁认为革命事业的前途在国际一边,那么对他来说,最直的道路就是离开“和平和自由同盟”,但他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国际的许多会员都曾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经他劝说,“和平和自由同盟”打算采纳的纲领与国际的纲领相同,既然如此,那就没有理由认为这两个组织之间双重会籍是不相容的。此外,巴枯宁活跃的头脑中又出现了新的愿望,这一愿望的产生部分是由于真诚希望推进国际的事业,部分是出自于个人野心。假如他现在献身于国际,这不仅与他的性格不一致,也与他要满足于扮演一个普通会员的卑微的声誉不相符合。他加入国际一定是个富于戏剧性、有意义的事件。他设想同盟和国际之间建立联盟的大胆计划,这种联盟会使他——同盟的主要发起人——与马克思——国际的灵魂平起平坐。这样,同盟就可以作为他登上国际中这种地位的垫脚石,而他的为人和经历使他有资格占据这个地位。

巴枯宁以其常有的冲劲开始工作。8月,委员会再次举行会议,他诱使委员会通过一项通告,并把通告和参加代表大会的邀请书一起发出,通告建议成立“和平和自由同盟”与国际之间的联盟,通告结尾异乎寻常地声明同盟忠于国际。

为了成为一种有益的积极的力量,我们同盟应该在纯政治上体现伟大的社会经济利益和原则,目前,伟大的欧美国际工人协会正在胜利地发展和传播这些利益和原则。

有逻辑头脑的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国际不能够“在纯政治上体现”自己的利益和原则?为什么要另一个组织来体现?唯一的理由是要给巴枯宁找个体面的位置。委员会通过其主席向9月初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并邀请国际会员出席即将召开的同盟代表大会。巴枯宁本人向将要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

会的贝克尔游说（贝克尔是参加1848年革命的德国老革命家，马克思的朋友，国际日内瓦支部成员），又给比利时的德·巴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了，信中对他不能亲自来布鲁塞尔表示遗憾。他甚至还给代表大会秘书处递交一份文件，阐述他的观点，说这份文件是“俄国民主主义的纲领”。他至少可以认为，他已经想尽办法，可以坐等事态的发展了<sup>①</sup>。

事态的发展并不像巴枯宁所希望和预见的。说实在的，他干得并不聪明，而是太过份了，他过份地玩弄手腕，这种强求与自负的奇怪结合离间了他极力争取的许多人。去年，国际的力量壮大了，马克思的观点又进了一步，他直率地称“和平和自由同盟”是“日内瓦空谈的场所”。9月初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拒绝派正式代表去伯尔尼，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只有三名代表（德·巴普是其中之一）投反对票，决议结尾直率地声明：

国际代表认为，从国际的工作来看，和平同盟没有理由存在下去，他们邀请这个团体参加到国际中来<sup>②</sup>，其成员可申请加入国际的一个支部。

这对巴枯宁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向自信，总是不能估计他的行为对别人产生的影响，他使同盟遭受毁灭性打击，现在只好面对经他劝说而违愿地走上这条灾难道路的同事们的谴责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反驳确实是无法回答的。巴枯宁为了说明同盟的目的与国际的目的是一致的，走得太远了，以致给后者提供了同盟是多余的这一结论性的证据。古斯塔夫·福格特以懦夫的复仇心理写信给巴枯宁，谈到“他的国际的朋友们”，并询问他下一步打算干什么。巴枯宁在长篇辩解书中把这一不幸归咎于“某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71—72页。

<sup>②</sup> 见报的原稿写得更为刻薄：“解散它”。

个集团”，并说“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你我无疑都能猜到”（尽管马克思事实上并不在布鲁塞尔）。他还大胆宣称，他将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上“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来答复这一蛮横的提议”。显然，他必须想个办法，因为他要使同盟依附于国际这个泰斗的计划失败了，而且也关系到他个人在革命运动中的威信<sup>①</sup>。

\* \* \*

1868年9月21日，“和平和自由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士的首都如期召开。它不像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样，是个大众演讲的讲坛。出席大会的只有一百名代表，但他们与日内瓦的代表不同，都有自己的主见，不容易为言词所说服。大会开幕时，同盟固有的资产阶级特性再一次表现出来。巴枯宁以其坚韧性和十足的毅力，使委员会不由自主地赞同发表声明，要“对现存的经济制度”实行“彻底变革”。但他只是凌驾于委员会之上，而没有凌驾于代表大会的一般成员之上。他对“和平和自由同盟”的革命潜力不再抱什么幻想，他已准备好要谴责国际的“傲慢态度”，他也等待着在同盟里受到挑战的夹击。

代表大会的第三天，危机开始了，那天就社会问题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决议案。巴枯宁提出的动议如下：

考虑到值得我们注意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各个阶级和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平等问题，代表大会声明，没有这种平等，即没有正义，自由与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代表大会要把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提到日程上来。

措词故意很温和，而且几乎是学究式的。出席大会的威卢博夫认为，要是巴枯宁不发表那两次雄辩的演讲来作辩护的话，决议本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67，72—74页。

来是有可能通过的。这两次演讲实际上引起了所有资产阶级人士的恐惧和偏见，虽然决议的内容似乎想要消除这种恐惧和偏见。首先，巴枯宁公开宣称他拥护无产阶级事业和国际的原则。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遗憾地表明自己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如果我们由于自己的利益和偏见不能广泛而又真诚地了解正义的原则（这种正义的原则以它的不可避免的结局、以它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运用在当今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表现出来），如果我们像奸商那样，只向工人们提供正义的某些部分，那么，他们必将拒绝与我们或与我们的成就发生任何关系，他们反对我们就是一千倍正确，也就没有人来当我们的和平战士了，我们已经承担的整个工作都会由于缺乏力量和支持而落空。

巴枯宁以挑战的口吻（看来只能招致失败）对他的听众们说，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工人阶级的事业，那就等于“承认我们有权告诉工人，你们‘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代表大会将不会满足他们的需要和合法要求”。

第二次发言是对批评者的答复，明显地预示着巴枯宁与马克思之间必然产生的实质性争论。就在巴枯宁将要公开宣布效忠国际时，他却决意——无疑是很不明智的——宣布他与国际最有权力的领袖之间的根本分歧。有人曾经指责巴枯宁是共产主义者，其实他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集体主义者。

我憎恨共产主义，因为它否认自由；我认为，人类没有自由是不可想像的。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为了国家的利益，集中了并且吞没了所有的社会力量，因为它必然导致把财产集中在国家手里。而我则要废除国家，根除权威和国家监护的原则，这一原则直到现在还在给人以德性和使之文明的借口下，只是对人进行奴役、迫害、剥削和腐蚀。我要看到社会和集体的或社会财产通过自由联合的形式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

而不是通过任何权威手段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在希望废除国家的同时，我也希望废除个人财产继承权，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国家制度、国家原则的直接结果。先生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一个集体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

用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来概括巴枯宁与马克思的分歧是否适当，还是个疑问，然而，尽管无政府主义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巴枯宁却在这个场合第一次阐明了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他把自己的余年都用来宣传这些原则。

在这个发言以后，代表大会在巴枯宁的决议案问题上分裂了。俄国代表团、波兰代表团、大多数意大利代表以及一名美国代表支持这一决议案，大多数代表团，包括法国、德国、瑞士、瑞典、西班牙和墨西哥代表团反对这一决议案。这是一次惨重的失败，足以使提案的倡议者不能再进一步有效地参与同盟的活动了。巴枯宁本来会立即离开，但他的朋友们劝他呆到大会结束。他又作了两次发言，谈宗教和民族主义，前一个发言是老生常谈，值得一提的是他声明，为了使人类从宗教的幻觉中解脱出来，光有“知识性的宣传”是不够的，“社会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关于民族主义的讲话更为重要，是巴枯宁在代表大会上最长的一次讲演。接着是波兰人姆罗克兹科夫斯基的发言，他代表波兰“向俄国社会主义者伸出兄弟般的手”，巴枯宁报以掌声。在一片使巴枯宁回忆起在斯德哥尔摩宴会上的表演的热烈气氛中，他声称在俄国有四、五万革命者，人民群众敌视沙皇帝国主义。他代表俄国人民承认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波兰和乌克兰的独立，并表示相信，总有一天甚至连大俄罗斯也会放弃“强迫性的集中制”，在“自由联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他向德国的代表们挑战，要他们以同样明确的措词放弃德国对波兰若干省份、对石勒苏益格和的里雅斯特城的主权要求，因为这个城市“与其说是意大利的，

不如说是斯拉夫的；与其说是德国的，不如说是意大利的”。这是尖锐的挑战，因为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不管他们如何进步，却很少愿意表示要给德国统治下的附属种族以自决权。但在国家问题上，巴枯宁现在再也不能克制自己了，他在演说结尾时，又谈到了关于消灭国家的最有吸引力的观点：

如果我们希望像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已经表示的那样建立国际间的正义、自由与和平，同时又希望保留国家，那将是可怕的矛盾和荒唐的幼稚行为。要迫使国家改变本性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正是由于这种本性才成其为国家的。一旦国家放弃了这种本性，国家也就不存了。因此，不可能有良好的、正义的、有道德的国家。从构成国家的性质，即构成国家为之存在的目的条件——绝对否认人类的正义、自由和道德——这一意义上来说，一切国家都是坏的。在这一方面，不管怎么说，在野蛮的俄罗斯帝国和欧洲最文明的国家之间没有很大的区别。沙皇帝国可笑地干着其他国家在虚伪的幌子下干的事，在它公开的、暴虐的、蔑视人类的态度中，表现了一切欧洲政治家和官僚们所企求和嗜好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只要公众舆论，尤其是新的但已很强大的工人阶级的团结对它们不加阻止，所有欧洲国家将会把正在干的事干下去。工人阶级的团结本身就是废除国家的开端。只有弱国才可能是个有道德的国家，即使如此，它的思想和愿望也是坏的。

因此，我的结论是：谁希望与我们一道建立自由、正义与和平，谁希望人类胜利和人民群众彻底解放，他就必须和我们一道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并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一切国家的自由的生产协作社的世界联邦。

这就是巴枯宁向“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告别辞。他在同盟里呆了十二个月，对同盟起了很大的扰乱作用。在代表大会的闭幕会上，他递交了一份题为《脱离代表大会的成员们的集体抗议书》，签名者有十五人；包括他本人在内。抗议书的内容如下：

鉴于“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大多数成员激烈而又明确地声明他们反对各个阶级和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平等，鉴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即和平和自由的一贯忠实的朋友们不能接受任何不是旨在实现这一原则的政治纲领或行动，下列签名者认为他们有义务离开同盟。

签名者有茹柯夫斯基、姆罗斯兹科夫斯基、扎戈尔斯基、甘布齐以及其他巴枯宁在意大利的追随者、著名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埃利泽·勒克律<sup>①</sup>、阿里斯蒂德·雷和一名来自里昂的工人阿尔伯·里沙尔<sup>②</sup>，这位工人在代表大会上头一次遇到巴枯宁。其他三、四个人，包括吴亭在内，当时没有签名，但后来也签署了这份文件。

〔巴枯宁后来写道〕在大多数人当中，曾一度发现一种对立的思想 and 资产阶级的感情倾向，因而，同盟很快变成了可笑的组织。严肃的、诚挚的革命者在同盟中没有地位。这个工具经试验证明不合用，不得不把它扔在一旁，只好另找工具，而国际工人协会正好就是这样一种工具。

此后四年内，国际成了巴枯宁的讲坛<sup>③</sup>。

---

① 让·雅克·埃利泽·勒克律（1830—1905），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第一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参加者。——译注

② 阿尔伯·里沙尔（1846—1925），法国记者，第一国际里昂支部负责人，1870年里昂起义参加者，后追随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阿列曼派。——译注

③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74—76，78页；巴枯宁：《人民的事业》，第5卷第106—115页，第6卷第27页；里沙尔：《巴黎杂志》（1896年9月1日），第119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403—410页；《埃利泽·勒克律书信集》，第1卷第279—288页。

## 第二十六章

### 同盟的诞生

当巴枯宁退出“和平和自由同盟”时，已经当了两个月的国际会员了。他在同盟的讲坛上宣称他忠于国际；一般的观察家也许以为现在他最终地把他的无穷的精力无条件地、无保留地献给了这个组织。但是，他并没有想走这条简单的路线。他依然不愿以一个地位低下、不引人注意的新会员的资格置身于国际的队伍中。他应当像将军那样站在队伍的前列。由于“和平和自由同盟”拒绝向他提供一支部队，他的希望落了空。他必须建立一支自己的部队。在他向伯尔尼代表大会递交退出同盟的声明的同一天，他在自己的周围集合了一批忠诚的追随者，建立了一个“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同盟的成立是巴枯宁与马克思之间长期斗争的开始。这场斗争四年以后在海牙以马克思付出了重大代价得来的胜利和国际的分裂而告结束。但是巴枯宁采取这个重大步骤并不是出于敌视国际，而是想保护国际。他决不是想要破坏国际，他要把国际置于他的庇护下。同盟将从“最忠诚地献身于国际的事业和原则的会员”中吸收新成员（不用说，这些人就是指巴枯宁及其支持者）。同盟的目的是“训练鼓动者、宣传者和组织者”。总之，同盟将为工人运动提供领导人或参谋部<sup>①</sup>。

---

① 《巴枯宁文集》，第4卷第246页。



从这个观念出发，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同盟应该是一个秘密组织。正如巴枯宁后来所说的，他建议他的党羽“集体加入国际，同时在他们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以秘密社团的形式发展社会革命者的同盟。”然而，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对巴枯宁搞秘密团体没有兴趣，决定把同盟变成一个公开的团体，而不是秘密的团体。急急忙忙起草的这个新团体的纲领反映了巴枯宁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上宣布的观点。它要求“从废除继承权开始，实现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平等”，号召“在各自国家里把政治权威的国家政权越来越变成管理公共事务的简单职能”。纲领的另外一些地方宣布同盟主张无神论，要求一切人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利，否认“所谓的爱国主义和民族间的敌对行为”<sup>①</sup>。

如果巴枯宁继续住在韦维这样的平静、孤僻的环境里，远离政治中心，同盟也会像他建立的其它组织一样，只是纸上谈兵。但是，在同盟诞生的两周內，与它没有关系的环境决定了它的命运。去年夏天，奥里珈·列瓦晓夫被劝导从她丈夫的财产中拿出一千卢布投资给巴枯宁和他的姻兄茹柯夫斯基编辑的一家俄国月刊。《人民事业》这个名字几乎可以肯定是巴枯宁提出的；因为1862年他在伦敦出版的那本小册子就叫《人民事业》。可以推测，巴枯宁是此事的倡导者。1868年出版的第一期专门用来阐述他的观点，全部文章都是由茹柯夫斯基和他本人撰写的。但当他不在伯尔尼或忙于代表大会的事务时，他的地位突然被破坏了。尼古拉·吴亭是个年轻的、漂亮的、不大严肃的人，巴枯宁抱怨说，吴亭的成功在于他的能够轻易征服女人的魅力。

[1871年他写道]这个矮小的犹太人似乎对女人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女人们就像苍蝇追逐糖一样地追逐他。他在女人中间就像一只公鸡在母鸡

---

①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79，132—133页。

群中一样趾高气扬，得意洋洋地啼叫。

第一期出版后，吴亭很快对易动感情的奥里珈施加了足够的影响，诱导她把《人民事业》的管理与编辑工作移交给他。巴枯宁从伯尔尼回来后，唯一使他满意的是在第2期上刊登了他的信，通知读者他已停止为该刊撰稿。几年后，吴亭把报纸的易手归因于不赞成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但是这种说法似乎没有多少根据。巴枯宁自己认为这场争吵不是“思想上的不可调和的分歧造成的，因为确切地说，吴亭没有什么思想，有的只是难以容人的感情、性格和目的。”这全部是出于个人怨仇的刻骨之恨。巴枯宁后来有理由感觉到吴亭的强烈的报复性的敌意的份量。这种决裂的直接后果是巴枯宁发现自己失去了生计的来源，这是他留在韦维的唯一动机，因为他近来一直依靠奥里珈·列瓦晓夫的慷慨施舍为生，正像他过去依靠奥鲍连斯基公爵夫人的施舍生活一样。一个较大的中心对于他新建的同盟肯定方便得多；1868年10月中，他与安冬妮再次在日内瓦安家<sup>①</sup>。

同盟的总部迁到一个已经有几个大的、兴盛的国际支部的城市，对这个新团体的性质产生了带根本性的影响，尖锐地提出了一个它同其它较大的组织的关系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从伯尔尼大会上退出“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十五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跟着巴枯宁到了日内瓦，就是波尔·察柯茨基；无论此刻还是以后，此人都无足轻重。他到达日内瓦时，巴枯宁已经自行吸收了国际日内瓦支部的五名成员，建立了同盟中央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德国人贝克尔，他是马克思相当尊重的少数几个革命家之一；还有一个沙尔·佩龙<sup>②</sup>，他是在布鲁塞尔投票反对谴责“和平和

<sup>①</sup> 《巴枯宁文集》，第6卷第271—273页。

<sup>②</sup> 沙尔·佩龙（1837—1919），瑞士珐琅彩绘工，国际会员，社会主义同盟中央局委员。——译注

自由同盟”的“可耻”决议而赢得巴枯宁好感的三个代表之一。中央局将成为同盟的直接指挥部。然而，还须有普通的成员。1868年10月27日，在日内瓦一家咖啡馆里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成立了同盟的一个地方分部。会上八十五名男女成员登记入册，后来声称有一百多名正式成员。此时正在日内瓦的赫尔岑写道，“巴枯宁四出奔波，满身大汗，大叫大嚷正在组织一个工人协会”。但是，赫尔岑以其特有的性格远离这个组织。在这些自己登记加入同盟的人中间，一些人后来杳无音讯，另外一些人后来出现在敌对阵营中。尽管巴枯宁作了一切努力，同盟的日内瓦小组除了他自己和一些亲信外，就一无所有了<sup>①</sup>。

这里我们有必要记住，巴枯宁所建立的组织都具有不公开和不真实的性质，吸收成员的办法也是惊人的草率。在谈到国际兄弟会时已经评论过的这些办法，在同盟的早期可以再次明显地看到。

〔此时巴枯宁再次给茹柯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每天我都遇到一些新的极好的朋友。我单个结识他们，同他喝一杯葡萄酒，——这样，事情就告成了。在铁匠中间我已经有了许多朋友，……现在他们正在石匠中间开展工作。

但是，茹柯夫斯基意味深长地记载道，这些经常通宵进行的密谈往往是巴枯宁滔滔不绝地说；谈完后，他沉默一会儿，希望对方赞成，把受他迷惑但没有表态的旁听者吸收进同盟。此外，十分清楚的是，虽然同盟的建立完全不同于国际兄弟会，在巴枯宁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一个方案，按照这个方案，正如同盟成为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92—93页；《巴枯宁文集》，第4卷第182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21卷第146页。

国际工人协会中的一个秘密集团一样，国际兄弟会也将成为同盟中的一个秘密集团，同时在国际兄弟会的核心中，将设有一个进一步精选过的理事会，由巴枯宁自己和一两个亲密的同事组成，这些人最终地控制着整个革命运动。

在短时间内曾得到过巴枯宁完全信任的佩龙，留下了一份同巴枯宁就这个问题进行交谈的特别记录。1868年秋，他应刚认识的巴枯宁的邀请去拜访他。巴枯宁要他相信，国际本身是一个极好的组织，但是还有一个更好的组织——同盟，佩龙也应该参加这个组织。佩龙表示同意。然而，巴枯宁说，即使在同盟里，也会有一些并非真正的革命者，他们是同盟进行革命活动的累赘，因此在同盟的后面有一个“国际兄弟会”是一件好事。佩龙再次表示同意。几天后当他们再次会面时，巴枯宁告诉他，“国际兄弟会”这个组织太松散了，在它的后面还必须有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理事会或执行局，佩龙将是其中的一员。佩龙高兴地笑了，再次表示同意。谈话结束后，佩龙再也没有听到有关这些神秘组织的音信。这样一些方案没有、也不可能落实。这些都是巴枯宁为了实现其野心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却是他经常考虑和谈话的重点，甚至同佩龙这样的新近结识的人的谈话也是如此，而这种人的革命诚意是很可疑的<sup>①</sup>。

同盟的创建者希望在欧洲各地建立许多小组，在每个国家成立一个民族局。这个计划的执行情况仍然是模糊不清、残缺不全的。在里昂和马赛建立了若干支部，阿尔伯·里沙尔<sup>②</sup>是里昂支部的倡导者，科西嘉人巴斯特利卡<sup>③</sup>是马赛支部的倡导者。至于

---

①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420—421，426页。

② 阿尔伯·里沙尔（1846—1925），法国记者，第一国际法国里昂支部领导人之一，巴枯宁秘密同盟的成员。——译注

③ 安得列·巴斯特利卡（1845—1884），法国和西班牙的工人活动家，第一国际会员。——译注

谈到巴黎支部，只知道它存在过，却没有任何记载。在意大利，甘布齐在那不勒斯建立了一个相当活跃的分部；1868年11月，巴枯宁在意大利的另一个同伴法奈利去西班牙，利用刚刚推翻伊萨伯拉女王的革命骚动，在巴塞罗纳和马德里建立了分部。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国际从未扎下根。在这些地区，同盟也许可以正当地自称先锋<sup>①</sup>。

但是同盟不可能也不希望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长期存在。它的宗旨和目标是要和国际溶为一体，使巴枯宁取得更大的成功，从而成为这个更大组织的支配者和参谋部。1868年12月中旬，同盟的中央局终于向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提出申请，递交了几份纲领和章程，并建议同盟的地方分部应该成为国际的支部，但应该保留他们自身组织的存在。同盟将保留其设在日内瓦的中央局；同盟的成员作为国际的成员参加国际每年召开的代表大会，他们还将在同一时间和地点举行自己的会议。纲领巧妙地解释道，同盟将作为思想上的“指导者”发挥作用，总委员会将实现这些思想。申请书由贝克尔签署，估计他与马克思的私人关系会使马克思接受这项申请。

巴枯宁沉浸在他自己的雄心勃勃的目标里，似乎从未料到一个如此奇妙的申请会遭到断然拒绝。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国际这个有纪律的组织及其总委员会的秩序井然的权力的人来说，这种想建立一个国中之国的建议是不明智的。恩格斯主动解释说：“西伯利亚、肚皮和年轻的波兰妻子使巴枯宁笨得象头公牛。”<sup>②</sup>马克思对局势有更精确的分析。

---

① 《巴枯宁文集》，第4卷第180页；里沙尔：《巴黎评论》（1896年9月），第122页。

② 参阅恩格斯致马克思（1868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21页。译文略有出入。——译注

〔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巴枯宁先生堕落到准备把工人运动置于俄国人的保护之下。……我认为它是一个死胎，为了老贝克尔，我曾想让它自然地死去。但事情变得比我想的更为严重。为了尊重老贝克尔而默认这个文件是不允许的。总委员会今晚决定在巴黎、纽约、德国和瑞士公开宣布拒绝这个混进来的团体。……由于老贝克尔，我对这一切感到遗憾。但我们的协会不能为了他的利益而自杀。”①

总委员会决议的执行延迟了一周；马克思认为更准确地了解一下形势的发展更好。既然贝克尔转向敌人那边，他在日内瓦就没有可靠的代理人了。但马克思偶尔也同显然不属于巴枯宁阵营的亚历山大·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通一下信。他在给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的信中找到了一句托词，在信中提了一个没有恶意的、难以觉察的问题：“我的老朋友巴枯宁（不知他是否仍然是我的朋友）目前在做什么？”谢尔诺认为回答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这封信转给巴枯宁。巴枯宁打破了近四年的沉默，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

除非把巴枯宁看作是一个老奸巨滑的伪君子，否则，他的这封信是他忠诚地转向国际的方针的有力证据。他承认了过去的错误，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献给无产阶级的事业。他提出的条件是：应该允许他为事业做一些显著的、激动人心的贡献。

〔他写道〕我的老朋友，谢尔诺把你信中有我的部分给我看了。你问我我是否仍是你的朋友。是的，亲爱的马克思，我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你的朋友，因为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好地懂得，你选择了一条经济革

---

1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7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47—14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218—219，221页。

——译注）

命的大道，并要我们所有的人都沿着这条道路走；你痛骂我们之中那些在民族的或纯粹政治活动的小道上迷路的人，你是多么正确。我现在正在从事的就是你在二十年前开始做的事情。自从我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上郑重地和公开地宣布与资产阶级分手以来，除了工人世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朋友，其它的世界。现在我的祖国就是国际，而你是国际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因此，亲爱的朋友，你可以看出，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以此感到骄傲。

他继续解释说，虽然他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发表在最近复刊的《钟声》杂志的最后一期上，但从1863年以来他同赫尔岑没有政治上的联系，“现在，甚至我与他之间的私人关系也破裂了”。这种说法有某些夸张，但是为了纠正马克思认为他与赫尔岑具有共同的资产阶级和斯拉夫倾向的看法，这是必要的。

马克思不是这种“动人的言辞”所能打动的人，即使这种辞令来得很及时。就在写这封信的同一天，1868年12月22日，总委员会就同盟的申请作出决议，指出，“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本协会之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国际性组织的存在，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开创这样的先例很快会使国际成为“任何一个宗派和民族的阴谋家手中的玩物”。决议回顾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决议，宣告与国际的目的和原则相同的组织没有任何理由存在。据此，总委员会一致决定“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分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sup>①</sup>。马克思想公开否认同盟但没有被采纳。这项决议是秘密的，仅仅传达到有关人员<sup>②</sup>。

---

①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83—384页。——译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27页；《巴枯宁文集》，第4卷第186—189页。

同盟的中央局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对这种拒绝作出答复。这样拖延是由于还没有确定下一步怎么办，还是由于（如巴枯宁后来声称的）必需同别的分部商量，抑或是仅仅由于巴枯宁忙于其他急事，这仍然是一个谜。最后这个假设也许是合理的。这是他一生中最忙的时刻。这两个月不仅表明旧的国际兄弟会的瓦解，而且赢得了一个新的、拥有支持者的重要团体。

\* \* \*

国际兄弟会中兄弟般友爱的性质在新的环境里逐渐淡薄了。巴枯宁被排挤出《人民事业》杂志的领导地位打击了他在韦维集团中的威信。他退居日内瓦进一步削弱了他的权威。国际兄弟会从这个时候起到最后的挣扎阶段的历史就无从知晓了。但在1869年1月，其成员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不到十个人，这表明国际兄弟会的积极分子似乎大为减少了。在这些成员中，从那不勒斯幸存下来的只有姆罗茨柯夫斯基，也许还有一个名叫屠西的意大利人，其余的都是在韦维和日内瓦吸收的新成员。这次会议的公开目的是修改兄弟会的章程。但是，它似乎开成了一个反对巴枯宁的独裁手段的会议。因为巴枯宁把兄弟会当作他个人的财产，把它的各项决议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会议进行了两天以后，移到韦维去开，巴枯宁由于经费问题或者其它原因，不能跟着去。面对这种挑战，巴枯宁给这些反叛者写了一封题为《致全体先生们》的措词严厉的信。他写通，他苦苦干了四年（从佛罗伦萨第一个兄弟会成立以来过去了四年），终于可以休息一阵了。他准备辞去领导兄弟会的全部工作；他以嘲弄的口吻希望这个提议将不致被看成是追求独裁的又一个证明。这个威胁足以使这些反叛者就范。他对兄弟会的控制是如此地专横，以至（正如与会者在复信中可怜巴巴地说的那样），在他缺席时，“既没有消息，也没有发言，更没有搞文件”。但是伤口并没有愈合。两个月以后，国际兄弟会解散了。像“和平和自由同盟”



一样，国际兄弟会成了没有价值的工具而被扔掉了。现在巴枯宁深深地埋头于社会民主同盟的事务。国际兄弟会的解散只有一个具体的结果——巴枯宁同韦维的侨民最后决裂了。他挖苦他们的“软心肠的、彩虹般的乐观信念”，借以发泄自己的仇恨。他宣布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厌恶女性者，忘恩负义地提到了公爵夫人，列瓦晓夫太太和尚普塞太太，而她们当中至少两个人曾经是他的慷慨的女恩人。唯有茹柯夫斯基仍然忠于巴枯宁，他是个软弱的、温和的人，“心地纯洁，但缺少个性”<sup>①</sup>。

也许还有一个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这次决裂。巴枯宁写的《致全体先生们》一信中隐约地提到了对他的“兄弟和朋友卡洛·甘布齐”的“指空”，此时他已返回意大利。这些指控是一些推测。但在1868年秋，恰恰是在巴枯宁夫妇离开韦维前夕，安冬妮生了个女孩。巴枯宁的朋友们都知道，甘布齐是这个孩子的生父<sup>②</sup>。

\* \* \*

此时巴枯宁交了好运，足以弥补国际兄弟会的背叛所造成的损失，这就是他又得了一股更为可靠的力量。1869年元旦，国际瑞士法语区第三支部的代表在日内瓦集会，旨在建立他们称为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地方联合会。此时巴枯宁夫妇住在蒙特布里勒恩特的一套房间里，这里是日内瓦单调简陋的地区，离火车站不远。他提出接待来访的代表，并选定莱洛克莱小镇的代表、小学校长吉约姆作他的客人，这个年轻人曾经把国际的决议递交给和平和自由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

---

①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17—221页；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131页；威卢博夫：《欧洲通报》（1913年2月），第78—79页。

②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261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3卷第410页。

代表大会成功地成立了罗曼语区联合会，创办了新刊物《平等报》，由佩龙任编辑。但是，在巴枯宁生涯中有意义的是他与这位易动感情的客人结成了莫逆之交。这位客人正值丁年，怀有与他的年龄相称的政治革新热情。正如克鲁泡特金后来所描绘的，他“矮矮的、瘦瘦的个子，有罗伯斯庇尔式的严峻的外貌和刚强性格”。年轻的吉约姆认定国际是先进的激进主义组织，他是故乡瑞士汝拉地区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具有纯朴的山里人的优点和局限性。他没有见过多少世面，除本民族外，认识的人不多。在日内瓦逗留的两天里，主人鲜明的个性把他完全迷住了，他欣喜若狂。他感到第一次遇到了一位使人醒悟的导师与先知。在后来的五年里，他忠诚地为这位新的主人效劳。

对于巴枯宁来说，这种结合也同样是重要的。如果说，迄今为止他使出了全部的灵感和创造力，只取得了很小的成就，这是因为他的信徒们像他一样，都是方法简单、不能进行有条有理的活动。因为没有人在那里引导和组织，他的人马都失散了。吉约姆具有这种小小的、但却是必要的大部分才能。在后来的三、四年中，吉约姆不倦地为巴枯宁的公开露面进行安排和宣传，充当巴枯宁的代言人，校订他的手稿，召集他的追随者，痛斥他的敌人。他有时甚至对巴枯宁本人进行有益的批评；因为他具有严肃的和耿直的气质，不愿同他的令人敬畏的老师的轻率的机会主义作妥协。吉约姆从巴枯宁身上看到了战士的热情，但缺乏明确的理想。巴枯宁喜爱吉约姆这个理想的学生；后人发现，吉约姆是巴枯宁以后几年生活的最完整、最细致的记录者<sup>①</sup>。

罗曼语区支部果真顺利地建立起来了。吉约姆回到了故乡小镇莱洛克莱。他利用各种机会坚定地向着汝拉的山乡同胞宣传他为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105—108页；克鲁泡特金：《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2卷第196页。

之献身的新的目标。几天后，他写信邀请巴枯宁访问莱洛克莱。巴枯宁被国际兄弟会中出现的危机缠住了，没有立即答复。但在1869年1月26日，他发出了最后通牒《致全体先生们》，第二天给吉约姆写了一封信（吉约姆骄傲地把此信称为“我收到他的第一封信”）。也许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他要抛弃一批追随者，吸收另一批追随者，这也未尝不可。他借口“有许多急事要办”，未能对邀请作出及时答复，但对这些事情的性质未作详细说明。他提出由吉约姆选择一个日子去莱洛克莱。后来又推迟了一些天，访问定在2月21日，星期六。访问前几天，巴枯宁又写信说：

如果你方便的话，我将在星期天、星期一同你住在一起，因为我确实想和你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话，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成为你的亲密朋友。我必须说，你已经完全把我征服了，我感到自己被你吸引过去了，我坚信被这种吸引力所征服并不是错误。我们将有许多事情要互相交谈、讨论和安排。

尽管有这些亲密的表白，巴枯宁认为没有必要向吉约姆谈到国际兄弟会的背叛。直到大约三十年后巴枯宁的信件发表时，吉约姆才知道此事<sup>①</sup>。

这位伟大的俄国革命家的来访在莱洛克莱这个小镇上引起了轰动，这正是吉约姆所希望的。星期六晚上，当地国际支部举行宴会。为了向巴枯宁表示敬意，也是为了迎合他的特殊习惯，宴会延长到凌晨三点。第二天晚上，他在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讲，谈到了宗教信仰的愚蠢、资产阶级的奢侈与堕落和无产阶级即将到来的胜利。演讲结束后，年轻人去跳舞，聪明的莱洛克莱人到另一间屋子去聆听这位伟人谈论激动人心的问题，直至深夜。他的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120页。

古怪的令人莫测的个性给人留下了久久难忘的印象。很久以后人们还记得，巴枯宁在他们中间逗留的整个过程中，不停地抽烟。他还阐述了人类幸福的七条原则：“第一，为争取自由而牺牲；第二，爱情与友谊；第三，艺术与科学；第四，吸烟；第五，饮酒；第六，吃饭；第七，睡觉。”迄今为止，在莱洛克莱的平常的小镇上和山区周围，人们是不习惯于这样谈、这样想和这样做的；由于米哈伊尔·巴枯宁出现，在这些热心的然而却是呆头呆脑的国际民主朋友的见识范围中升起了一颗新星。

还有一些时间同吉约姆进行了几次机密的谈话。巴枯宁谈了许多关于同盟的事情（尽管总委员会已经拒绝同盟加入国际，对此他也许略而不谈），要求莱洛克莱国际支部的成员加入同盟，吉约姆天性执拗，直率地加以拒绝。他并不反对同盟的纲领（虽然他暗中认为这个纲领有些方面相当浮夸），但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思想单纯的同胞都看不出在国际组织内部存在一个有其自己的章程的单独组织有什么用处。巴枯宁同他私下谈了其它更为诱人心的计划。他谈到“几年前有一个秘密组织，把各个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些人联合在革命兄弟会中”。他宣读了这个“革命兄弟会”的纲领，问吉约姆是否愿意参加该组织。莱洛克莱地区的社会主义前辈孔斯坦·梅隆也收到了邀请，他想起了烧炭党<sup>①</sup>的时代，欣然接受了加入革命兄弟会的邀请。但是给吉约姆的印象是巴枯宁的兄弟会同“传统类型的秘密团体（其成员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似乎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巴枯宁的组织不过是一个“联合起来进行集体活动的人们的自由组织，没有什么手续，也没有什么仪式或神秘的教规”。吉约姆似乎没有询问这个兄弟会的其他成员是谁，它的总部在哪里；也许他问

---

① 十九世纪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国中以推翻王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秘密政治组织。——译注

了，但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巴枯宁离开莱洛克莱时，吉约姆虽然表示过愿意加入这个秘密团体，但不能断定他是否已经参加了。

很快就出现了另一次误会。任何一个思想和行动精明的人不得不与巴枯宁打交道时，是很容易出现这些误会的。莱洛克莱一批忠实的国际会员创办了一个名叫《进步》的双周刊，专门宣传国际的宗旨。巴枯宁的来访给邀请这位颇有名望的革命家为该刊撰稿提供了机会。这个大人物欣然答应定期撰稿。然而，这并不是他能提供的唯一的帮助。《进步》只在当地发行。实际上一直希望能有一、两份送到日内瓦那样远的地方去。巴枯宁不仅有国际声望，而且有国际联系，他返回日内瓦后不久，吉约姆写信询问他，同盟中的他的一些朋友也许愿意成为《进步》杂志的撰稿人，在“某些邻国”也许会找到新订户。回答是令人惊讶的，表现了巴枯宁自欺欺人的了不起本领。

〔他立即回信说〕信收到了，我们都愉快地接受你的建议。是的，让《进步》成为同盟的刊物。只是“莱洛克莱民主派机关报”这几个字应改为“社会民主派机关报”。然后，你们或者保留《进步》这个刊名，或者给它取一个诸如《社会革命》的新刊名，这个名字也许太露骨、太不成熟了；或者取名叫《前卫信使》，无论如何，让圣灵来指引你们吧！

第二天，“根据公民巴枯宁的提议”，同盟的日内瓦支部决定“尽一切可能使莱洛克莱的《进步》成为同盟的机关报”。吉约姆虽然对于这种热情地采纳这个他从未提出过的建议感到惊讶，他还是冷静地对待这件事。然而，圣灵既没有指引他改换报纸的名称，也没有指引他在《进步》杂志与同盟之间建立正式的关系。巴枯宁对此没有任何怨恨。1869年5月底，他去莱洛克莱和附近的拉绍德封作了一次成功的访问。三、四个月来，他出人

意料地经常为《进步》杂志撰稿<sup>①</sup>。

\* \* \*

1869年2月底，同盟中央局向伦敦总委员会回了一封信。巴枯宁出于无奈，只得爽快地宣布服从总委员会。由中央局秘书佩龙签署的这封信提出同盟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将予以解散，它的支部作为国际的支部加入国际。国际的章程规定接纳“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互助、发展和彻底解放的所有工人团体”入会。在这些条件内，每一个地方支部有权制订自己的纲领，用自己的方式确定其目标。同盟的纲领中只有一点能加以合法地否定，但这是措词问题而不是实质问题。1869年3月9日，总委员会要求同盟把模棱两可的“阶级平等”改为“消灭阶级”，并通知说，只要作此修改，“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止同盟各支部变成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然而，总委员会尚须了解各支部的名称及其成员的数字<sup>②</sup>。

如果马克思能够预见到接纳同盟支部加入国际会产生种种后果，凭着他的精明本来很快就会找到理由加以拒绝。但他尚未真正预感到将来的麻烦。他满足于巴枯宁顺从的姿态，以轻率的得胜的心情起草了总委员会的决议。他想到能迫使巴枯宁披露他的“队伍”在人数上的弱点尤为高兴。恩格斯认为，要求得到同盟的支部和人数的名单，“好像是给这些头脑空虚的空谈家泼了一桶冷水”。<sup>③</sup>

巴枯宁的“队伍”仍有时间去履行这个投降的协定。4月底，

---

①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138—140，161—163页。

②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2—283页。——译注）

③ 《巴枯宁文集》，第6卷第192—194，200—210页；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140—14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71—172页（恩格斯致马克思，1869年3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57页。——译注）

同盟日内瓦支部修改章程，以满足总委员会的要求，承认自己是国际的支部，选举一个包括巴枯宁、贝克尔和佩龙在内的委员会。但是，直到6月份，同盟中央局才最后宣布自己和同盟不再是独立的组织。1869年6月22日，佩龙终于以日内瓦支部的名义通知总委员会，说总委员会的要求已经照办。同盟的其他分部自行解散，自此，“同盟”这个名称只用来指日内瓦支部。同盟只有104人；向伦敦正式缴纳了十法郎四十生丁作为当年的会费。经过六个多月的艰难的谈判，巴枯宁虽然比他所希望的要少得多，但仍带了一小帮自己的追随者，闯入了这个无产阶级运动的中心组织。木马终于进了特洛伊城堡<sup>①</sup>。

---

① 《巴枯宁文集》，第4卷第202—205，209—212页。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270页。

## 第二十七章

# 巴塞尔代表大会

巴枯宁达到第一个目的以后，把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统统抛到脑后，埋头于日内瓦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他在国际内部发动的第一场战斗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上，这些问题与他以后同马克思尽人皆知的斗争中那些存亡攸关的问题完全是两码事。国际的日内瓦各支部分成两派。钟表匠和珠宝匠都是土生土长的日内瓦人，是那些与众不同的瑞士工匠的典型代表，他们属于右翼；建筑工人、木匠和壮工中绝大部分都是法国和意大利的移民，他们属于左翼。前一部分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改善工作条件和其他实际措施的改革上；后一部分人希望彻底变革社会。巴枯宁到来之前，那些在文化和组织上都很优越的钟表匠，一直成功地控制着中心支部（两派的共同阵地），决定日内瓦国际总方针，巴枯宁决定改变这一切。那些钟表匠有守秩序的资产阶级本性，和巴枯宁格格不入，于是，巴枯宁就在建筑工人中煽动反抗情绪，谴责右翼领导人“专横的、秘密的寡头政治”，简单地把他们之间的争端说成是革命和反革命的争端。有趣的是，自1869年春季至夏季以来，同盟在这场运动中似乎没有起过什么作用。同盟每星期六开会，据巴枯宁自己估计，平均到会的只有“二、三十人”，上一年秋季参加中心支部的那些人中，甚至有几个人（其中包括佩龙本人）不参加会议了。巴枯宁所以能在日内瓦国际中取得支配地位，完



全由于他的人格，而不是同盟这个濒于垮台的组织<sup>①</sup>。

巴枯宁仍然精力旺盛，他成了报刊的积极撰稿人，这在他一生中还是头一次。自3月份以来，他每周都为佩龙主编的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的机关报《平等报》和吉约姆主办的《进步报》写稿。1869年7月初，佩龙离开日内瓦两个月，其间由巴枯宁代替他的工作。7月和8月，《平等报》上的文章几乎出自巴枯宁一个人的手笔。1869年期间，他在《平等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有一篇谈日内瓦罢工的事（罢工期间，他令人吃惊地鼓吹放弃暴力，警告罢工者不要采取挑衅行动）；另一篇谈的是老问题，即用革命武装打垮奥地利帝国；还有一组谴责目前已经濒于死亡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文章；一些谈普及教育的文章；几篇谈国际政策的文章。此时巴枯宁的写作和他一生中其他阶段相比，如果不能说是多产，那倒也是经常不断的<sup>②</sup>。

但事隔不久，巴枯宁这个爱惹是生非的人又成了出乱子的中心人物。国际的年度代表大会将于9月在巴塞尔召开，8月里，日内瓦各支部为确定纲领和推选代表，在日内瓦召开大会。大会议程中最重要的是讨论废除土地私有制和继承权的提案。对于钟表匠来说，这些是头痛的问题，他们都赞成财产权，认为讨论这些空想的方案纯属浪费时间。巴枯宁则完全支持废除论者，强烈谴责温和派，使废除派在日内瓦各支部里占绝大多数。但当指派日内瓦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三名代表时，妥协气氛却又占了上风。结果，选出了两名多数派成员和一名少数派成员，巴枯宁在候选人名单中只是个第四名。《平等报》发表公告说，这次巴枯宁落选是因为已经安排他当其他支部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甘布齐从那不勒斯给他弄了一张代表资格证，阿尔伯·里沙尔从

① 《巴枯宁文集》，第6卷第219—220页。

②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80页；《巴枯宁文集》，第5卷第13—218页。

里昂又给他弄了一张。那些谨慎小心的日内瓦人不愿意选派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作为他们的代表，这种看法似乎是合理的。本来无意为同盟的日内瓦支部单独指派代表，但到了最后一刻，一个名叫散蒂尼昂<sup>①</sup>的西班牙医生，作为国际的巴塞罗那支部代表前往巴塞尔，路过日内瓦，此人马上被吸收加入了同盟，并被授予同盟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证<sup>②</sup>。

\* \* \*

代表大会于1869年9月6日在巴塞尔召开。这是国际的第四届年会，也是巴枯宁参加的唯一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国际的力量和影响的高峰，是国际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大会。人数可观的德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两、三年后造成国际分裂的派别尚未形成。七十五名代表中，顶多有十二人（并非没有保留）可以看成是“巴枯宁分子”。他们是日内瓦两名多数派的代表亨格和布罗塞，瑞士汝拉区的吉约姆和另外四个人，来自里昂的两名法国人阿尔伯·里沙尔和由里沙尔吸收加入同盟的一个裁缝帕利克斯，散蒂尼昂和另外一个西班牙人，还有一名来自那不勒斯的意大利人卡普卢索<sup>③</sup>。巴枯宁影响和支配了这次代表大会，不是通过其拥护者的票数，而是自己的人格。他自始至终都很积极，在每个重要问题的辩论中，他都起主导作用。马克思还是照例没有参加大会。

出人意料的是，大会第一项议程就很棘手，把大会的日程推迟了三整天。德语区瑞士支部的代表建议把“直接立法”（现在通

---

① 加斯帕尔·散蒂尼昂（卒于1903年），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秘密同盟的领导成员，1873年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将其开除出国际。——译注

②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183—189页。

③ 斯蒂凡诺·卡普卢索，意大利裁缝，无政府主义者，第一国际那不勒斯支部创建人之一。1870年由于盗用公款被开除出支部。——译注

称公民投票)的问题列入议程,这是苏黎世州最近采用的一种制宪的新花样。巴枯宁和汝拉区的代表死抱着完全反对国家的政策不放,说“直接立法是资产阶级的政策,与工人阶级的解放毫无关系”。这种讨论浪费了好些时间,这样,大会就不能详细研究已经列入议程的问题了。情况很清楚,“直接立法”这项正式动议未经投票就增补到议程里了。大会于第四天继续开会,讨论其他事项。

大会对废除土地私有制的提案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巴枯宁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激烈的、别具一格的讲话,他宣称不但对土地而且对所有的“社会财产”都要实行“集产主义”,他把话题轻易地一转(如果说转得不很切题的话),呼吁废除国家,说国家是“现存财产的唯一保障”,对此没有强烈的反对意见。马克思主义者虽不相信巴枯宁关于国家的见解,但对他反对私有财产这一点却表示同意,于是,这项提议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只有四名法国代表大胆地投票赞成保留土地私有制,有十三名代表弃权,他们都是法国人或瑞士人。

对于废除继承权问题辩论的时间更短,但却轰动了代表大会。废除继承权问题是巴枯宁提交给“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纲领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从那以后,废除继承权在他思想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一年里,这个问题在他的公开言论里显得十分突出,有时似乎使他的废除国家的纲领也快黯然失色了。现在,他又应邀参加代表大会指定的一个委员会工作,就这个问题起草一项决议,委员会在巴枯宁的指导下很容易就起草了一个决议,决议说,“应该完全彻底地废除继承权,废除继承权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要不是其间出现了一种情况,代表大会本来会很顺利地通过这项决议的。马克思对私有财产问题的看法和巴枯宁的看法很难区别开来,但马克思的看法更为抽象,也更合乎逻辑。他论证说,

继承权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很自然，废除继承权只能在废除私有制之后，而不是在之前。单单废除继承权就等于承认不是由继承权造成的私有制是正确的、合法的。如果采取在资产阶级制度里也可以取得成功的局部措施就是理想，那最好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诸如征收继承税或限制遗嘱权的实际改革上，这比把注意力集中在象废除继承权的空想上要好多了。马克思的这些观点都记录在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里，这份报告由总委员会的首席发言人、旅居伦敦的一个德国裁缝埃卡留斯<sup>①</sup>交给大会。

以马克思和总委员会为一方，巴枯宁和那个委员会为另一方的分歧说到底不是原则的分歧，而是策略的分歧。就其某个方面来说，这种分歧就如母鸡和鸡蛋相比一样，差不了多少。如果马克思亲自到巴塞尔，他肯定会把那些动摇不定的人拉到自己一方。如果这一着不成功，他就会转移阵地，而不会在这样的问题上吃败仗。但是，马克思不在场，忠诚的埃卡留斯以德国人一丝不苟的态度执行马克思的指示。巴枯宁坚持委员会的“完全彻底废除”的提案，他为自己辩护的言词既十分雄辩又直截了当，有强有力的号召力。由于时间有限，这个问题就不再辩论了。讨论结束后，委员会的提案和总委员会的报告就在相当混乱的气氛中进行投票表决，一些代表对二者都热情地投赞成票，另一些代表弃权，结果是足有32票赞成，23票反对，13名代表弃权，根据大会程序规定，弃权票算作反对票，这项决议被否决了。批准总委员会报告的决议由于大多数票反对而遭否定。代表大会没有发表公告，但这次投票表决的意义不在这里。国际的一次代表大会断然否决

---

①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1818—1889），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总书记。1872年以后成为英国工联主义活动家。——译注

具有一切权威的总委员会提交的提案，还是第一次。一个与马克思本人不相上下的人物在国际里出现了，这个反叛人物既未被马克思吓倒也未受马克思的影响，并且轻松愉快地准备好以平等的地位和马克思交手。在大会的最后几天里，人们听到埃卡留斯痛苦和不安地说：“马克思将大为不满”。

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另一项决议也很重要。在大会通过的一些“行政决议”中，有一项是赋予总委员会一些权力，即在历届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总委员会有权开除不服从的支部以及裁决相同的或不同的民族组成的敌对支部之间的争端。巴枯宁极力赞成这一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提案，强烈反对把这些权力交给各个民族联合委员会的可供选择的建议。此时，他对总委员会的独断专行还不放在心上，这一点以后很快就成为他所恐惧的东西了。巴枯宁认为，总委员会是国际反对那些地方派别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的革命原则的坚强支柱。他似乎认为，敌人不是总委员会，而是那些日内瓦钟表匠。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和总委员会有分歧，但是，他还是想加强总委员会控制下属组织的权威。他此时的野心是想夺取而不是毁掉总委员会。他谴责总委员会的专制是后来的事<sup>①</sup>。

\* \* \*

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使国际内部的这两个大人物之间的斗争显然近于公开化了。马克思认为，巴枯宁蔑视总委员会是暗箭伤人，不可等闲视之，也是不能原谅的。一件在代表大会前后和大会期间都被人遗忘的事又一次引起了巴枯宁对马克思旧有的怀疑。大约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个月，一个名叫威尔特迈的德国犹太人来到日内瓦报告说，他本人和别人都听说，德国社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190—204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322页。

会民主党人威廉·李卜克内西曾谴责巴枯宁是亲俄分子，是国际的敌人，并公开说过，贝克尔承认上了“这个狡猾的俄国佬”的当。从贝克尔嘴里说出的李卜克内西或威尔特迈具体说了些什么，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但是，巴枯宁常常胡思乱想，对这一点有着病态的敏感；认为这种指责听起来就像二十年前说他是俄国政府的间谍的诽谤一样又复活了，看来，这次指责又是马克思引起的。李卜克内西此时是马克思在德国的主要支持者。他之所以出了名，不是因为自己的才能和首创精神，而是因为他忠于自己的领袖，这是尽人皆知的。人们一提起李卜克内西，就想到马克思。

巴枯宁想通过贝克尔来为自己申冤，但没有成功，所以他就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诉说自己的冤情。会上，他所采用的手段在19世纪的革命者中间是很流行的。真正的革命者采用资产阶级国家法庭的手段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看来是不合适的、与他们的原则是矛盾的。革命者只能接受与他们地位相同的人的裁决。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惯例，即把这些争议提交给“荣誉法庭”，争论者保证接受“荣誉法庭”的裁决。应巴枯宁的要求，为调停他和李卜克内西之间的分歧，争论双方各选五名代表，在巴塞尔组成了这样一个“荣誉法庭”。工作进行得出人意料地顺利。李卜克内西当即声明，说他把巴枯宁说成是俄国代理人的说法纯属误解。他承认曾指责巴枯宁通过成立同盟来破坏国际，用欺骗手段把贝克尔引入歧途。但是，这些指责由于埃卡留斯很得当的调停而得到解决了。埃卡留斯既是“法庭”的成员又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处在这种位置，他评断说，既然总委员会已经接纳同盟加入国际，那么，所有关于同盟的成立所引起的争论都应当是无谓的争论。根据这项声明，巴枯宁收到了“法庭”的一份书面裁决书，他已经称心如意，其愤怒也就烟消云散了。于是，原告和被告公开和解。巴枯宁点火烧着裁决书，用来点上一支香烟，这一戏剧性的高雅举动使子孙后代都无从知道，那十位多少还算公正

的法官对这次奇怪的、转瞬即逝的争吵真正有些什么看法<sup>①</sup>。

但是，即便没有“法庭”的裁决书，要把这件事的主要轮廓再现出来也是不困难的。马克思究竟是否唆使李卜克内西去攻击巴枯宁，此事仍然不能肯定，但是，马克思为这次攻击提供材料却没有疑问。马克思在这段时间的书信中一再指责巴枯宁破坏国际和引诱诚实而又正直的贝克尔。李卜克内西也不可能从别的来源知道巴枯宁的情况（他从未见过巴枯宁）。另一方面，自1849年以来，马克思从未相信或散布过巴枯宁是俄国间谍的谣言。他的确相信的（虽然这种说法不再有什么根据）是巴枯宁同意赫尔岑亲斯拉夫的观点，希望俄国青年人去复兴衰老的、反动的欧洲。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卜克内西可能说过巴枯宁是俄国的爱国者，粗心大意的听话人就会和巴枯宁一样地认为，李卜克内西把巴枯宁看成是俄国政府的间谍，这种推测是有点根据的。据巴枯宁自己说，李卜克内西不但声明说自己的话被曲解了，而且为了回答叫他提供证据的要求，还补充说，他只有“一个证据”，即波克罕<sup>②</sup>在普鲁士民主党的主要喉舌《未来报》上发表一些中伤性的文章以后，巴枯宁保持沉默<sup>③</sup>。这些文章不管中伤与否，

①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210—213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179—181页。

② 西吉兹蒙特·路德维希·波克罕（1825—1885），德国新闻工作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译注

③ 1869年2月25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已写信给波克罕谈了巴枯宁的情况，促使他考虑一个问题：当这帮泛斯拉夫主义恶棍宣扬他们的斯拉夫霸权的时候，总的说来，我们这些西方人是否可能同这些家伙进行任何合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44页）1869年7月30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又写道：“他（指巴枯宁）不要存在幻想，以为可以在工人面前扮演一个世界主义的共产主义者，而在俄国人面前扮演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泛斯拉夫主义者。现在波克罕正好在对付他，给波克罕一些暗示，是极为适时的”（同上，第334页）。1870年1月6日，《莫斯科新闻》第4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巴枯宁在1851年7月被囚波得—保罗要塞期间给尼古拉一世写的《忏悔书》，波克罕曾及时把这篇文章抄录给马克思。——译注

并没有指责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间谍，只说他是个相信由俄国来拯救欧洲民主的亲俄分子。巴枯宁的沉默如果能证明什么的话，那只是证明他对这一指责未作回答。换句话说，这就是李卜克内西承认是他所作的指责。只有巴枯宁那种反常的敏感性才会把对他政治活动的批评歪曲成对他个人名誉的诽谤。

巴枯宁已经到了老年，他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开始变成受迫害的妄想狂，由李卜克内西事件直接造成的一次新的争吵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巴枯宁在巴塞尔重新结识了一个名叫莫泽斯·赫斯<sup>①</sup>的人，他二十多年前在巴黎结识此人，由于时间过久，他们彼此都认不出来了，贝克尔又把他们重新作了介绍。赫斯是李卜克内西提名的“荣誉法庭”的成员之一，他在代表大会上曾投票反对废除继承权。巴枯宁说（虽然这种说法不对）赫斯和马克思是穿一条裤子的，但是，赫斯对巴枯宁的印象也同样不好。他回到巴黎后，在一家激进派报纸《觉醒报》上发表一篇题为《论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的共产主义和集产主义》的文章，文章的一大部分是攻击巴枯宁的。赫斯还特别声明说，他没有诽谤巴枯宁的“革命名誉”，但是，他又说，作为“俄国共产主义领袖”，巴枯宁正在不自觉地、为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利益效劳，并用“蛊惑的手段”暗中破坏国际的威望<sup>②</sup>。

这篇文章使巴枯宁暴跳如雷，他对法国报刊的攻击比对德国报刊的攻击更为敏感，因为他在操德语的国度里既不寻求也不想找到支持者。他以给《觉醒报》编辑写信的方式，作了长篇的、

---

① 莫泽斯·赫斯（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六十年代是拉萨尔分子，第一国际会员。——译注

② 《巴枯宁文集》，第5卷第260—261页；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220—222页。



使对方无言以对的回答。和他的别的作品一样，这封信在他不受约束的笔下写成了一篇论文，似乎由论文又扩大成一本书。巴枯宁表示出俄国贵族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情绪，接着又全面地谴责犹太人。他也另眼看待犹太族中的某些人——如历史上的耶稣基督、圣保罗和斯宾诺莎，当今的马克思和拉萨尔。但是，除了这些“巨人”以外，剩下的是“一群低等的犹太人”，赫斯就是其中一个。他像以前谴责李卜克内西一样地谴责赫斯，因为赫斯说他是俄国间谍。巴枯宁写道，赫斯的种种非难“只能是一个意思，即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间谍”。他离开正题写起自传，又回到他在意大利居住的四年，开始论说意大利政治，但刚说一半，文章突然结束了。巴枯宁把这篇佳作命名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信念的自白，关于德国犹太人问题的研究的引言》，又给《觉醒报》写了一封信，把这个文件给他在巴黎的两个朋友阿里斯提德·雷伊和亚历山大·赫尔岑<sup>①</sup>。

赫尔岑着手处理这件事。他既不喜欢《信念的自白》，也不喜欢那封信，他很生气地对奥格辽夫说，“为什么空谈种族和犹太人？”于是，他去找《觉醒报》的主编德勒克吕兹<sup>②</sup>，德勒克吕兹根本不想发表巴枯宁的任何“苦心的著作”，但他同意发表赫尔岑为巴枯宁辩护的信，并加上按语，大意说没有人打算攻击“巴枯宁的政治名誉”。按语的内容并没有超过赫斯本人文章的内容。巴枯宁此人容易生气，息怒也快，声明说，他对“诚恳的声明”感到心满意足。赫斯事件和李卜克内西事件一样，来得突然，结束得也突然，这两个事件的唯一永久后果是加深了巴枯宁

---

① 《巴枯宁文集》，第5卷第239—294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30—231页。

② 路易·沙尔·德勒克吕兹（1809—187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71年巴黎公社委员。——译注

对马克思的怨恨。

但是，有一篇具有重要意义的附言倒是值得引用一下。赫尔岑给巴枯宁写信，说明他做了些什么事。信中责备巴枯宁攻击了学生赫斯，而没有动老师马克思的一根毫毛。巴枯宁的回信奇怪地、突出地表现出宽宏大量，但也表现出幼稚的虚伪：

关于马克思，我的回答是这样：你我都知道，马克思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应当受到责备，他发动并唆使他人把所有秽言恶语都一股脑儿加到我们头上，我为什么原谅他，甚至称赞他是伟大的人物呢？赫尔岑，这里有两个理由。第一是出于公道。撇开他对我们那些不公正不谈，人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如何，我是如此——他为社会主义事业做了大量工作，自从我认识他这二十五年来，他一直极尽全能、精力饱满、诚心诚意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工作，他无疑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他是国际的创始人之一，而且差不多是主要的创始人。我认为这是个巨大的贡献，不管他怎样反对我，我将永远承认这一点。

第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且我认为这是绝妙的策略……

毫无疑问，马克思是国际里举足轻重的人。他一直是国际中社会主义的最有力、最能干、最有影响的拥护者之一，也是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倾向和思想对国际进行渗透的最大障碍之一。如果我出于报私仇的动机，破坏或减弱他无疑是有益的影响，那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也许会发生，而且很可能将会发生这样的事，即不是由于触犯了个人，而是在原则问题上，在他和以他（不管他作为德国人还是英国人）为首的党热烈支持的国家共产主义问题上发生冲突，那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但这个时刻终究尚未到来。

我原谅他并且称赞他，是出于策略，是出于个人考虑，所有这些大人先生统统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方阵，为了更容易地破坏这个方阵，一定要拆散它，分裂它，难道你还看不出这一点吗？你比我见多识广，因而比我更了解我首先所说的分而治之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现在向马克思

宣战，国际里有四分之三的人都会反对我，我就会陷入困境，失去我唯一可以立足的地方。如果我向他那些乌合之众开战，大多数人都会站在我一边，甚至马克思本人都会因为我咒骂和谴责他的朋友而感到高兴，因为正如你所了解的那样，马克思喜欢幸灾乐祸……

赫尔岑发现这种杂乱无章的、自相矛盾的解释一点也不符合自己的口味，这是毫不奇怪的。他回信说，“你的分而治之说决不会把你造就成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政治家”，他劝巴枯宁“对原稿冷静地进行修正”，“不要亵渎麦克比兹民族和路特希尔德家族<sup>①</sup>”。但巴枯宁不愿反省，也不能修改稿件，他对这件事已经厌倦，所以《信念的自白》这份稿子就被抛在一边不管了。此稿仍放在他的文件里，他死后多年才第一次发表<sup>②</sup>。

巴枯宁给赫尔岑的信尽管混乱不堪，矛盾百出，但还是说出了一个很清楚的事实：他已承认他和马克思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突部分是由于政治上的分歧，部分是由于个人之间的抗争。马克思同样意识到麻烦就要来临了，也相信自己有力量去对付它。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之前，马克思曾写信给恩格斯说：“这个俄国人显然想当欧洲工人运动的独裁者。让他留神点。不然，他将被正式革出教门。”<sup>③</sup>然而双方都没有急于挑起争吵。由于巴枯宁突然宣布退出现实斗争，所以这场斗争就推迟了。1869年10月30日，即给赫尔岑写那封信的两天以后，巴枯宁离开

---

① 麦克比兹 (Maccabees)，公元前二世纪犹太爱国者中的一族。路特希尔德家族 (Rothschilds)，金融世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译注

②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21卷第504—506、509页；《巴枯宁文集》，第229—230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33—239页。

③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9年7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331页。——译注

了日内瓦，没有说他到哪里去。

巴枯宁决定离开日内瓦并不突然，但许多朋友都不知其动机是什么。1869年春，安冬妮·巴枯宁曾带着孩子去看望孩子的生父甘布齐，不久，安冬妮告诉丈夫说，她又怀孕了，打算在分娩前的秋季和他团聚。头年冬天，人们对巴枯宁家庭问题的真实情况一直说长道短。安冬妮和米哈伊尔本来都不喜欢预期的怀孕和在日内瓦生孩子。8月份，巴枯宁通知同盟的日内瓦支部，说巴塞爾代表大会以后，他要离开日内瓦，并建议由支部书记亨格继任主席。同时还写信给甘布齐说，他“急于要和安冬妮一起到冷僻地方生活”。10月3日，他写信给吉约姆说，他想到瑞士意大利语区的湖畔小镇卢加诺过冬，他还补充说：“我将告诉每个人，说我要到意大利去，到巴塞罗那去或者到法国去。”<sup>①</sup>

如果说家庭情况是保密的原因，那么，从日内瓦迁到瑞士意大利语区还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两年来，巴枯宁一直得到奥鲍连斯基公主的资助，公主失意时，奥里珈·列瓦晓夫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公爵夫人，又资助他一年。但是，当他和吴亭在《人民事业》杂志问题上发生争吵，离开韦维赴日内瓦时，这个经济来源就中断了。想不到家里又要添人进口，这给巴枯宁增加了新的负担。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三年来他相当富裕的生活结束了。甘布齐虽然定期给以资助，但巴枯宁生活还是每况愈下，渐致过着贫困的生活，靠临时借钱、来路不明的权宜经济手段过活，这种生活就像他有幸得遇那位公主以前的生活一样。1868年至1869年冬，他三次给威卢博夫写信讨钱，并很精确地提出三百法郎这个数目。第一次写信要钱的借口很奇怪，说是要发表一本批驳威卢博夫实证观点的小册子，干这件事没有钱当然是不行的。后来他放弃一切借口，老老实实地恳求说，他“非常需要”那笔钱。

---

①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219，261页。

1869年5月，巴枯宁第二次访问汝拉区的时候，主人们还得凑三十法郎来支付他的生活费。他搬到日内瓦郊区一个便宜一点的住处，但他很快就弄清楚了，在日内瓦生活，不管怎么简朴，对一个无明显经济来源的人来说是太贵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在附近找一个最便宜的住处（瑞士意大利语区的生活费只是日内瓦的一半），以写文章为生。巴枯宁为人一向乐观，他写信给甘布齐，谈到他“一年沉默、研究学问、大有裨益的隐退生活”；说到他要翻译二十个印张的书，每印张七十五法郎；还说到为一家未指名的杂志写稿，“收入不错，而且可靠”。赫尔岑对此持怀疑态度，并简单地评论说，“米哈伊尔不想工作”。但眼下经济紧张，每逢这种时刻，巴枯宁就很轻率地想到要从事文学创作<sup>①</sup>。

1869年10月底，巴枯宁离开日内瓦，途经伯尔尼时，看望了老朋友赖歇尔一家。到了卢加诺以后，他把奥格辽夫给他的两封介绍信交给住在那里的两个意大利人夸德里奥和斯佩拉菲科，这两个人都是忠实的马志尼主义者。巴枯宁从这两个人那里得知，卢加诺已经成了马志尼主义者的总部，马志尼本人也经常到那里去。入乡随俗，况且这个地方又是在意大利进行观察和搞密谋的前哨所在。但这样一个小镇装不下像马志尼和巴枯宁这两个闻名而又互相敌对的人物。那两个马志尼主义者很友好地接待了巴枯宁。但他们很快就发生了“一点不大激烈的争论”。巴枯宁意识到要小心一些，不要太深地陷入“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棘手的问题”，最好是及时离开这里。于是，他决定动身去马乔列湖的源头洛迦诺。

他在一个名叫佩德拉志尼的寡妇家里住了下来，这家有一个

---

<sup>①</sup> 威卢博夫：《欧洲通报》（1913年2月），第75，77—78页；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156，219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28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3卷第412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21卷第412页。

花园，还可观赏这座湖的壮丽景色。膳宿费每月只要五十五法郎，再花十五法郎还可雇个佣人。

〔到洛迦诺的第二天，他写信给奥格辽夫说〕简直就像进了天堂，想想看，离开了枯燥无味、令人生厌的日内瓦以后，来到了热情好客而又美丽的意大利，来到了古老而又幼稚得令人高兴的意大利，是多么令人欣慰啊！

这里气候宜人，费用“低得惊人”，对长久住在日内瓦不愿移动的奥格辽夫都有吸引力。洛迦诺并非与世隔绝，“欧洲”每天有二班邮件送来，意大利则有四班。从资产阶级观点来看，这里的确没有什么社交活动，但巴枯宁已经交上了一个朋友（他交朋友从来不用多久），是个名叫安吉洛·贝托里的军械工人，此人可以很安全地为巴枯宁收发信件。在这个人间天堂里只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买不到茶叶。因为“俄国人没有茶叶就活不了”，所以他写信给奥格辽夫，求他赶紧寄两磅宝贵的茶叶来<sup>①</sup>。

---

<sup>①</sup>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28，244页。

## 第二十八章

### 涅恰也夫事件

在叙述巴枯宁退居洛迦诺的生活之前，必须追述他前几个月的情况；又因有一个新的人物要出场，巴枯宁和马克思之间慢慢加大的裂痕这件事也暂且不谈。1869年春季和秋季，巴枯宁并不是全力投入上文谈到的那些公开的、半公开的活动的。同年3月初，一个名叫谢尔盖·涅恰也夫的俄国青年来到日内瓦，此时，巴枯宁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这段生活时间不长，但却很重要。

涅恰也夫精力充沛，观点十分激进。他在二十一岁时就显得与众不同，甚至在彼得堡的持激进观点的年轻革命者中间也是如此。他个性突出，很快成了彼得堡大学一批青年极端派的首领；同时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于是，他被警察拘留，审问关于搞颠覆活动的事。他想还是离开俄国为好。涅恰也夫颇有点小聪明，他忽然心生一计，用突然失踪的办法，来为自己挣得个英雄烈士的荣誉。他给同伴们写了一封短信，说他已经被捕，要被押送到一个“不知名的要塞”。声称此信是他从警车的窗口扔出来的，一个不知名的学生碰巧捡起了这封信，就把信发出去了。这件事并非绝对不可能有的，他的那些学生伙伴也很容易就会相信。等到学生组织群众大会要求释放他的时候，他已经南下了。1869年3月，涅恰也夫持一张假护照，越过国境，前往革命烈士的精神故乡——瑞士去了。

涅恰也夫那种极为激进的特点，并不是六十年代俄国革命派

的典型。六十年代的人时兴采取暧昧和中间立场，具有四十年代那种天真幼稚的激情——赫尔岑对于民主制度的不切实际的信念，以及巴枯宁对于不受约束的、未经开化的人类本性的不切实际的信念。至于马克思提出的革命信条的科学基础是什么，尚未发现。这一代人的信念既然没有什么肯定的因素，他们就在纯道德和政治否定中寻求安慰。这种立场和巴枯宁的以无限相信人类本性为基础的否定现存秩序的不切实际的观点是有根本区别的，后被称为民粹主义。但从表面上来看，这两种观点有共同之处，这就足以使巴枯宁认为，这些青年革命者远远超过了他自己同时代的浪漫派赫尔岑；同时也使得巴枯宁能够得到比他们革命前辈中的任何人都要高的荣誉，还没有一个年轻人敢于把否定推向合乎逻辑的、最终的结论。实际上，没有人敢于否定和藐视道德和政治义务。涅恰也夫采用了极端手段，向现存的尽善尽美的东西发起革命，否定其他任何道德义务。他的勇敢达到了蛮干的地步，把无耻也当成了一门绝妙的艺术，他随时随地像欺骗敌人那样来欺骗朋友。他是个狂人、暴徒、无赖，是这三种人令人不解的混合物，这就是他留给同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形象<sup>①</sup>。

涅恰也夫到达日内瓦后要找的第一个人就是巴枯宁，这并非巧合。巴枯宁这位老革命的威望吸引了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他希望有朝一日他自己也有这样的威望，但他目前除了精力、自信和丰富的想像力以外，却一无所有。涅恰也夫和巴枯宁的其他来访者一样，对这位沙场老将的巨人般的身材和磁铁般的个性有着深刻的印象，他也下决心给巴枯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编造说，他刚刚从彼得——保罗要塞逃出来，他是被当成学生革命运动的首领而被捕入狱的；他是作为一个俄国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来到瑞士的，这个委员会的总部设在彼得堡，并正在全国发起革命。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3卷第418—429页。



巴枯宁从未遇到虚构的才能超过自己的人，尤其没有遇到过有这种爱好的人：即爱捏造以他为首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只不过是他的想象，根本就不存在。但是骗人者自己最容易受骗，这种事说来虽不合情理，但也是天意。巴枯宁从不怀疑（这是他的秉性），他完全相信涅恰也夫的话。这个年轻人和巴枯宁一样，有一种才能，即能迫使新相识的人崇敬和信任自己。巴枯宁一见到涅恰也夫就被迷住了，这正如其他人也常常被他自己迷住一样。他开始亲切地称涅恰也夫为“小老弟”（他在伦敦呆过一年，还记得几个英语单词），两人成了莫逆之交。后来在瑞士的俄国移民中流传着一则奇怪的传闻，说巴枯宁给涅恰也夫立了字据，答应完全服从他，“甚至伪造钞票也在所不辞”，他在字据上签了一个女人的名字“玛特兰娜”，作为完全服从的证据。据说这个字据是在涅恰也夫被捕后在他的文件里发现的。这一传闻是完全不可信的，如果存在有这样签字的文件，那么“玛特兰娜”很可能是巴枯宁爱用的天真、神秘的代号名字的一个例证，而没有谣传所指的那个意思。

不管这个谣传是真是假，但能够流传开来就足以说明涅恰也夫的地位优于那个老革命。巴枯宁之所以鬼迷心窍，可以部分地用他所处的环境来解释。他长期和俄国本身失去联系，与赫尔岑不和，和在韦维新相识的朋友们争吵，再加上国际兄弟会的瓦解，使巴枯宁甚至和国外的同胞都失去了联系。和他仍然保持来往的人当中，茹柯夫斯基心地善良，但能力低下；奥格辽夫常常喝酒，醉得不省人事。涅恰也夫给他带来了祖国的气息，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他再也不会看到祖国了，但在忙于国际事务的同时，他还常常梦见祖国。现在，他为朝思暮想的祖国的革命事业效劳的机会来了，其他国家都不能如此合他的心意。巴枯宁性格中带有感情的那一面连同他对故乡和童年的怀念似乎早就死去了，现在来了这个危险的、有诱惑力的俄国“小老弟”，他的感情又复活

和开放了。

巴枯宁很自然地表示急于要为涅恰也夫的俄国革命委员会效劳，并分享其荣誉，他自己也提供一点东西作为报答。不管签有“玛特兰娜”名字的字据存在与否，但他给涅恰也夫另外一份证件却是确定无疑的，这个证件本身就很特别，其签发日期是1869年5月12日，内容如下：

持证者：世界革命同盟俄国支部委任代表；编号：2771。

证件签发人是米哈伊尔·巴枯宁，上面盖的印是“欧洲革命同盟中央委员会”。巴枯宁并没把他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里的朋友们介绍给这位新的门徒，甚至也没有把他和吉约姆以及佩龙谈到过的同盟中的那个秘密内部集团介绍给他。这种事虽说很独特，但也很奇怪。据我们所知，他甚至没有告诉涅恰也夫这个集团是否存在。他一时心血来潮，禁不住又捏造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世界革命同盟或欧洲革命同盟。对于那些愿意相信这种事的人来说，巴枯宁签发的这个证件的编号暗示，至少还有2770个代理人在欧洲各个角落执行同盟的使命。自称为（很可能不存在的）俄国革命委员会代表的涅恰也夫接受了巴枯宁的委任，当上了不存在的欧洲革命同盟俄国代表。这种情形实在妙不可言，恐怕在喜剧里或历史上都很难找到。有趣的是两个人是否都受骗了，我们还没有证据<sup>①</sup>。

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大笔一挥，建立了各自的组织，接着就着手为组织起草文件。1869年4月至8月间，他们在日内瓦发表了七本小册子。一本是巴枯宁署名的《致俄国青年书》；另一本是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147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343页；拉里：《往昔岁月》（1908年10月），第158—159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3卷第430—440页。

涅恰也夫签名的《致大学、学院和工艺学院的学生书》，并宣称是从莫斯科发出的（弥天大谎）；第三本是1869年夏季第一期《团体刊物“人民裁判”文章汇编》，也说是发自莫斯科，其中有两篇文章署名为“俄国革命委员会”；第四本是《致高尚的俄国贵族书》，落款是“柳里克<sup>①</sup>后裔及独立贵族党”；其余三本——一本是《告俄国学生书》，另外两本分别为《革命问题的提法》和《革命原理》——没有署名。除了这些公开发表的小册子以外，涅恰也夫还有一本用密码写就的《革命问答》，规定了秘密革命团体的守则及成员的义务，看来就是这个时期写就的。巴枯宁应对他签名的那本小册子负责，那是不成问题的。那本《告俄国学生》的小册子写得最短，措词也很温和，被认为是奥格辽夫写的。其余那些小册子的作者是谁，这在与巴枯宁有关的全部文件中是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sup>②</sup>。

从这些小册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涅恰也夫那些非道德性原则是什么，这方面最极端的要算《革命问题的提法》、《革命原理》和《革命问答》。在《革命问题的提法》这本小册子里，首先谈到俄国农民反抗政府压迫的“传统方式”是逃到森林里去当强盗，然后就对强盗行为大加赞扬：

抢劫是俄国人民生活最光荣的形式之一……，强盗是俄国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是既不空谈也不浮夸的革命者，确实是不妥协、不动摇、不屈服的革命者……，谁要在俄国认真地搞密谋，搞普遍革命，谁就必须走这条路……，时机已经到来……，斯杰潘·拉辛和普加乔夫的纪念日快到了，

---

① 柳里克王朝，罗斯公爵世家，后为俄国沙皇的王朝（912—1598），即基辅大公伊戈尔后裔的王朝。据传，伊戈尔是瓦利亚基军队统率者柳里克的儿子。——译注

②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461—474，477—478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21卷第365页。

纪念这些人民英雄的时刻已经来临,让所有的人都为这个节日做准备吧。

《革命的原理》讲得就更无情了:

除了斩尽杀绝以外,我们不承认其它活动,但我们承认斩尽杀绝的活动方式可以各不相同——如毒药、匕首、绞索等等。在这场斗争中,革命高于一切。

《革命问答》说:

革命者蔑视和仇恨当今一切形式的、出自任何动机的社会道德,并认为有助于革命胜利的一切都是合乎道德的……,革命者必须抛弃交往、友谊、爱情、感恩、甚至幽默等所有那些软弱无力的感情,而代之以对革命事业的严肃的热情……,革命者梦寐以求的只有一件事、一个目的——无情的破坏。

这些文件发表后的几个月内,马克思主义者发起了一场运动,说这些文件都出自巴枯宁的手笔,以此来损害巴枯宁的名誉。巴枯宁主义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否认巴枯宁插手这些文件或把他的插手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方法,来解救他们的首领,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现在。历史地来看,究竟谁是谁非必须由马克思主义者来裁决。巴枯宁此时无限信任涅恰也夫,他不顾一切地采纳涅恰也夫的观点。本身就擅长写小册子的巴枯宁竟会委托一个没有经验的学生来把这些观点写成文字,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再说,内在的证据是确凿无疑的。那几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通篇都表现出巴枯宁文风、技巧以及与众不同的用词造句的口吻(如“不是空谈的革命者”、“时机已经到来”等等)。《革命问答》是巴枯宁拿手的写作方式的样板。甚至涅恰也夫署名的小册子也有巴枯宁写

作的特点，因为本书用原文引用了巴枯宁年轻时最喜欢的黑格尔的名言：“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可以肯定地说，涅恰也夫没有研究过黑格尔，也不懂德文<sup>①</sup>。

上文已经提到，涅恰也夫这些小册子中有一本是奥格辽夫写的。此时，奥格辽夫由于失去了赫尔岑思想的指导，已经越来越成了巴枯宁手中的驯服工具。有一段时间，巴枯宁甚至又一次怀着恢复“三人同盟”的宿愿，希望赫尔岑、奥格辽夫和他本人联名发表那份致俄国学生的呼吁书，赫尔岑当即表示要打消这个念头，他把奥格辽夫写的小册子说成是“报刊的骂街”文章，连一个人签名都不值得，更不用说三人联名了。赫尔岑1869年5月来到日内瓦时，对巴枯宁倒还宽宏大量，但对涅恰也夫却产生了出自本能的厌恶。那几本小册子定会造成“大害”，但巴枯宁却穷凶极恶地要搞全面破坏，他就像“那些老妈子和老老少少的牧师一样，明知无狼来、却叫‘狼来了’。”赫尔岑在日内瓦住了五、六个星期（这是他和巴枯宁最后一次见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离开时还在考虑：一定是他的脑子不好使了，因为他的老朋友、老伙伴很清楚的那些问题，他却不甚了了<sup>②</sup>。

但是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想向赫尔岑和奥格辽夫要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光是合写文章或利用他们的名字这些精神财产。要完成那项新的计划，就迫切需要钱。巴枯宁发现了一项意想不到的、很有希望的财源。1858年，一个名叫巴克哈米蒂也夫的很富有的古怪的俄国地主改变其原来的信仰，开始信仰共产主义，此公具有俄国理想主义者那种一成不变的狂热性，前往太平洋的某个岛上去建立一个模范村社，途中拜访了住在伦敦的赫尔岑和奥格辽夫。他发现钱带多了，除了实现其计划所需经费外，还有剩

---

①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472—474，482，494页。

②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21卷第365，377—378，403，443页。

余，于是，他就给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留下八百英镑，当作在俄国进行革命宣传的经费。巴克哈米蒂也夫做了这件慈善事业以后，就消失在太平洋里，从此杳无音信了。要不是有一张在伦敦一家银行里存八百英镑、写着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名字的存折，他也许会成为神话中的人物。这两个人一向小心谨慎，把这笔钱的利息用于宣传就心满意足了。到了1869年，“巴克哈米蒂也夫基金”的本金仍分文未动。巴枯宁可能从奥格辽夫那里得知有这笔款子，提出要是把这笔钱用于他和“小老弟”主持的革命事业岂不更为合适吗？奥格辽夫已经没有主见，很容易被说服，答应了巴枯宁的请求，不断给赫尔岑写信，表示支持这项建议。赫尔岑有一段时间表示反对。他一生多疑，对涅恰也夫持有偏见，对巴枯宁也不信任，这一切都有增无减；但他身患疾病，体力不支，经不住奥格辽夫的再三纠缠。1869年7月底，他同意把这笔基金分掉，并同意奥格辽夫有权处理一半款项；他仍然要求最好把钱用来维持日内瓦的印刷厂。他很尖刻地说，这个厂也许会使巴枯宁的生计更有保障，不同意把钱用来让涅恰也夫到俄国进行冒险活动。这项请求被当成耳边风，这笔一万法郎（折合四百英镑）的钱落入了巴枯宁的腰包，然后——也许数目减少了一点——又装进了涅恰也夫的腰包<sup>①</sup>。

取得了这一最大胜利以后，涅恰也夫认为在瑞士呆下去已无必要。由于巴枯宁的帮助，他此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已经弄到了欧洲革命同盟的委任状，不管他自己对这份委任状的价值有什么看法，但它毕竟可以用来唬住他那些追随者——俄国学生；他还弄到了一笔巨款，可以随意支配。搞到了这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又有成包成捆的小册子和宣言之类的材料，他便于8月底回到俄国。他将利用冬季进行组织工作，并向巴枯宁保证革命

<sup>①</sup> 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411—421页，第21卷第408—409页。

必将在解放农奴九周年纪念日——1870年2月19日开始。

涅恰也夫曾被立过案，又怀有这些企图，居然能进入俄国，能在那里过三个月，犯下了臭名昭著的罪行，然后又能从容不迫、安然无恙、顺顺当当地返回瑞士，这说明俄国警察的无能或者毫无警觉，但事实就是如此。涅恰也夫在莫斯科设立总部，其组织的名称似乎时而叫做“人民裁判协会”，时而又叫“斧头协会”，是按照《革命问答》中所阐明的路线、仿照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欧洲的各秘密团体的样子组织起来的。这个组织以五人一小组或宣称以五人一小组为基础，小组成员绝对服从组长领导，组长又要服从中央委员会的指令。警方随后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但并未发现这个奇怪的组织有什么具体的革命计划。中央委员会看来只有涅恰也夫一人组成，实际有多少小组也不得而知。这纯属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而这正是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所有革命活动的特点。然而这个新的组织却取得了一项具体的成绩，即1869年11月，一个名叫伊万诺夫的学生被涅恰也夫谋杀了。这个学生是五人小组一个小组的成员，不知有何根据怀疑他企图告密，这一谋杀行动是得到他所在小组成员默许的，死尸是在一个小池塘里发现的。这个谋杀案的细节很快就传开了，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涅恰也夫感到不能再靠警方的迟钝来混下去，就准备逃跑。他大约在12月中旬离开俄国，1870年1月初又回到了瑞士<sup>①</sup>。

\* \* \*

巴枯宁在洛迦诺已住了两个月。为使其隐居生活有“价值”而又有时间“用功”，他制订了一些计划，其中只有一项付诸实施。一个名叫柳巴文<sup>②</sup>的俄国人在日内瓦见过他，对他经济困难

---

①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3卷第487—495页；坎特：《往昔》，第8页。

② 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柳巴文（1845—1918），俄国化学家，六十年代曾参加革命大学生团体的活动，曾参加《资本论》俄文版的准备工作。

——译注

表示同情，给他找了个差使，即为彼得堡一家出版社把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俄文。稿费为一千二百卢布，还可以立即预支三百卢布。这三百卢布足够还清巴枯宁在日内瓦急需偿还的债务，还可以解决去洛迦诺的交通费用，以便及时赶到那里开始和马克思的那些艰涩的文句打交道。他对《资本论》的主题以及枯燥的翻译工作都没有兴趣，所以工作进展断断续续。起先，他在12月给奥格辽夫去信，说他一天顶多能译三页（全书共784页），而现在每天可译五页，并希望最后每天可达十页。他不知道日内瓦的阿达·茹柯夫斯基是否能帮他誊清稿子。十二月内，他把译好的两小部分稿子寄给柳巴文，但到了年底他所译的稿子尚不足以抵消他收到的预支款项，当然也就不能再拿到钱了<sup>①</sup>。

此时，巴枯宁又遇经济困难，使他十分苦恼。12月中旬，怀孕八个月的安冬妮从那不勒斯前来和他团聚。从海上去热那亚的旅途又慢又累；巴枯宁前往阿罗纳去接她，在那儿等了两三天，“心中万分焦急”。他身无分文，又不能和甘布齐联系，因为后者对安冬妮决定和其丈夫团聚感到很生气。巴枯宁只好转向唯一可以借到钱的人，他请求奥格辽夫向赫尔岑立即借三百法郎，以后三个月内再借五百法郎，这笔钱“不要赫尔岑掏腰包，而是从基金中提取”。赫尔岑欣然同意，寄给他三百法郎，当然不是从“基金”中提取的。巴枯宁给赫尔岑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870年1月初，信中对他的善良行为表示感谢，三个星期后，赫尔岑在巴黎溘然去世<sup>②</sup>。

当涅恰也夫还在俄国时，巴枯宁对于他的消息一无所知。但在十二月份，一些离奇的传闻传到了瑞士的俄国人居住区。有说涅恰也夫在逃，也有说他已被捕。巴枯宁对涅恰也夫及其许多同

---

①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47，249页；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324—326页。

②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46—247，252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21卷第539页。



伙在俄国被捕的传闻感到很焦急，有好几天他的心里希望和恐惧交织在一起。1870年1月12日，奥格辽夫来信说那个“小老弟”已经到达日内瓦，巴枯宁“高兴得跳了起来，跳得头顶天花板，差点把头碰破”。他想立即动身前往日内瓦，但由于手头拮据，安冬妮又临产，没有成行。于是他立即写信请求涅恰也夫去洛迦诺见他。在那里他弄到了“一条毯子，一张床，”“准备膳宿，还有最重要的是找到极其保密的住处”。这里人人都忠于巴枯宁，没有传播流言蜚语的人。得到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和发出那封信两天后，安冬妮生下了一个女儿<sup>①</sup>。

一月底，涅恰也夫到了洛迦诺。做好隐蔽工作十分迫切，因为俄国政府一旦发现他的行踪，就会把他当成普通犯人要求引渡，瑞士政府也许会拒绝避难。巴枯宁还记得，就在几个月前，瑞士政府应俄国警方的要求，捉住奥鲍连斯基公爵夫人的孩子们，并将他们转交给她的丈夫。他在为其亲爱的“小老弟”担心。涅恰也夫把他在俄国的冒险活动告诉巴枯宁多少，巴枯宁又相信什么，至今不得而知。但涅恰也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详述他如何由于一位同志的粗心大意而把他出卖给警察的；他如何被押送到西伯利亚矿山；押送人路上又如何接受命令要谋杀他的；他的朋友警惕性很高，又是如何及时救了他的，等等。这封信发表在《进步报》上（吉约姆认为他从稿子中看出巴枯宁插手了这封信），也发表在一些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杂志上。巴枯宁在给里昂的里沙尔信中又一次提到了这件事（不管他相信与否）。他有时还添油加醋，在一篇文章里提出一种推测，说这位涅恰也夫是个神话式的人物，这篇文章碰巧和涅恰也夫的信发表在同一天的《进步报》上，实在有点难堪，此时，涅恰也夫在俄国政府中和报刊上正引

---

<sup>①</sup>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48—249，251，253，255页；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260页。

起轩然大波。更为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他还给伯尔尼的里沙尔和阿道夫·福格特多次写信，都提到这种推测。他据这些假线索进行扩展；为马赛一家报纸刊登的关于赫尔岑逝世的一篇无害的讣告写了序言，提到他自己进行一次“长途旅行刚刚回来，所到国家的报纸都遇到了困难”——目的在于暗示读者他本人刚刚到俄国进行一次秘密访问。这完全是故弄玄虚，要寻求这样做的合理动机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巴枯宁热衷于装腔作势，不会受成年人有限的常识的约束<sup>①</sup>。

涅恰也夫在洛迦诺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但却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更为具体的成果。首先是出人意料地打消了巴枯宁翻译《资本论》的打算。由于受到涅恰也夫的怂恿，巴枯宁轻而易举地相信，一个有才华的人应该投身于更为直接的推动革命的工作，而不值得去做这种枯燥无味的卖文工作。那三百卢布尚未挣到手就花完了，这事似乎不大好办，但是涅恰也夫负责处理这件事。其方法很简单，他要等回到日内瓦以后再办。2月底，他以人民裁判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给柳巴文写了一封命令式的信，责令他不要和巴枯宁纠缠，并威胁说，如果他不服从命令，那么后果是不会令人愉快的。这封信后来被马克思用来破坏其对手巴枯宁的名誉，这一点下文还要讲到。巴枯宁为摆脱这笔讨厌的债务，把这件棘手的事交给毛手毛脚的涅恰也夫去办，实在是轻率的举动。按常理来说，巴枯宁对钱财之事实太不慎重了。但是，这封信是涅恰也夫离开洛迦诺以后在日内瓦寄出的，还没有证据证明巴枯宁要对写信这件事负责，或者说他知道信的内容<sup>②</sup>。

---

①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280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57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258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519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21卷第564页。

②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3卷第496—470页。

巴枯宁既然摆脱了不合他志趣的翻译工作，那就得赶快想办法弄到完成翻译后就可到手的那九百卢布。又是涅恰也夫（或者是他和巴枯宁一起商量）想出一个办法。赫尔岑死后，巴克哈米蒂也夫基金就可以结算，而奥格辽夫是唯一的受托人，有权处理这笔钱。这个主意想得正是时候，要刻不容缓地对基金进行结算。巴枯宁迫不及待地向奥格辽夫提出：向赫尔岑的遗产执行人要那笔钱。

〔他急切地写道〕这不但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神圣的义务。对待神圣的义务，决不允许有什么个人为难的想法。你做这件事必须有罗马人那样的决心，你必须当布鲁土斯<sup>①</sup>。

巴枯宁并不满足于写信，经过思考以后，觉得此事似乎至关重要。他向女房东的儿子借了八十法郎当路费，于1870年3月中旬去日内瓦，以便当场采取行动。

罗马人的决心证明是多余的。奥格辽夫急于了结这个公案，给小亚历山大·赫尔岑写了信，后者欣然同意，承认这项债务，并亲自去日内瓦交出那笔钱。当时场面还很隆重，除小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外，在场的还有巴枯宁、涅恰也夫、娜塔丽娅。奥格辽夫、赫尔岑的长女娜塔丽娅以及其他两三个俄国人。钱数是基金的一半，计一万法郎，由小赫尔岑交给奥格辽夫（后者开了收据），奥格辽夫交给巴枯宁，巴枯宁再交给涅恰也夫，涅恰也夫连收据都没有开，只是以“革命荣誉”向朋友们作担保。几个星期后，当奥格辽夫想要张收据时，涅恰也夫草率地回答说，他的委员会没有开收据的习惯<sup>②</sup>。

---

① 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公元前85左右—42），罗马政治活动家，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尤利乌斯·凯撒的策划者之一。——译注

②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63，535—536页。

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在洛迦诺会见期间，并非只想独吞巴克哈米蒂也夫基金，因为革命所需经费是个无底洞。他们还谈到了赫尔岑的女儿及其财产。娜塔丽娅和她兄弟一样，继承一笔相当不错的财产。所不同的是她还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虽说是莫名其妙的、但却是很真诚的革命热情，巴枯宁和涅恰也夫认为她的财产和热情适合用来为革命服务，亚历山大·赫尔岑及家里其他人起来反对，并试图使娜塔丽娅免受来自日内瓦的诱惑，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巴枯宁对于娜塔丽娅的财产和巴克哈米蒂也夫基金都毫无顾忌，他和往常一样向奥格辽夫提出强烈要求，要把娜塔丽娅留在日内瓦，并谴责她家里人要使她免受革命诱惑的想法是“无意识的、本能的利己主义”。巴枯宁3月中旬到达日内瓦，急匆匆地为得到巴克哈米蒂也夫基金而奔忙。同时，他第一次把娜塔丽娅介绍给涅恰也夫，印象不错。涅恰也夫仗着自己的魅力来达到他追求的目标，主动而又坚决的巴枯宁和既被动而又顺从的奥格辽夫都参与了这件很不光彩的事。当娜塔丽娅问及她怎样为革命事业出力时，巴枯宁说，“年轻美貌的女子总会有用的”。他还暗示说那些富人，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可以转向为革命出力。三个月后，当他和涅恰也夫绝交时，以通常少有的坦率的口气写道：

如果你把他介绍给你的朋友，他首先要在你们之间进行离间、造谣、捣鬼，使你们发生争吵。如果你朋友有夫人或女儿，他就会千方百计勾引她，使其怀孕，目的在于使她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身不由己地卷入对社会的反抗。

说来也很奇怪，这种谴责出自一个坚决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人的手笔，更为奇怪的是出自一个最近才极力把自己老朋友的女儿变成涅恰也夫工具的人之口。在这件事情上，很难把涅恰也夫道德

上的无耻行径和巴枯宁道德上不负责任的行为有效地区别开来。

然而，涅恰也夫的阴谋并未得逞。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在洛迦诺策划的那些阴谋有一项是要恢复《钟声》报，为此目的，娜塔丽娅·赫尔岑的名字（既然得不到她兄弟的名字）将是很宝贵的。但是，涅恰也夫对付受过闺房教育、满脑子传统道德观念、举止不离传统观念的妙龄女郎还缺乏经验。这个女孩子起先迷惑不解，后来又很害怕，她拒绝把自己的名字登在新出版的报纸上。有一项看来可靠的记载说，在一次奇怪的场合里，涅恰也夫和巴枯宁要求她无条件地、绝对服从“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当娜塔丽娅表示犹豫时，涅恰也夫暴跳如雷，说她是个“书生气十足的毛丫头”；而巴枯宁却叫他息怒，说，“别急，别急，小老弟”。但是，如果说对付娜塔丽娅有困难，如果和赫尔岑家里人公开吵起来，奥格辽夫还是个驯服的工具。4月2日，新复刊的《钟声》丛刊第一期刊世了，从而涅恰也夫得以实现其一项计划。头版刊登的是奥格辽夫署名的声明，宣布《钟声》易手，并答应终身合作。但《钟声》的新形式却证明是张令人生厌的、毫无特色的报纸，出到第六期周刊就很不光彩地停刊了，报纸这一短暂的生涯可能是靠巴克哈米蒂也夫基金维持的<sup>①</sup>。

\*                    \*                    \*

由于《钟声》复刊，涅恰也夫的声望和成功达到了顶点，什么时候开始下降并无明显的事件作为标志。但从这一点开始，由于某种不可捉摸的原因，他样样事情都不顺利。他在俄国的一个伙伴、俄国革命者洛帕廷<sup>②</sup>来到日内瓦，此公是亲眼看到涅恰也夫在俄国和瑞士所作所为的唯一见证人，他尽其所知，和盘托出。他第一次说出了谋杀伊万诺夫的真相；证明涅恰也夫大言不惭地

<sup>①</sup>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63，535—536页。

<sup>②</sup> 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1845—1918），俄国革命家，民粹派，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译注

说他从彼得—保罗要塞逃出以及去西伯利途中从宪兵手中脱险都是无耻的捏造；俄国革命委员会及其庞大的组织根本就不存在，全是涅恰也夫的臆造。他的话并非人人都信，但由此而产生的怀疑却正在损害涅恰也夫的信誉，同时俄国使馆和瑞士警方都在加倍工作。1870年5月，一个年轻的俄国流亡者谢列布廉尼柯夫<sup>①</sup>被警察误认为涅恰也夫，被拘留了几天，弄清身份后才被释放。涅恰也夫本人仍在日内瓦或附近乡下躲藏，频频更换地方，从不留下地址。娜塔丽娅·奥格辽夫和娜塔丽娅·赫尔岑曾把他藏在家里一个星期，但这段时间很快就结束了，她们一点也不掩饰不耐烦的情绪，对这个令人为难的客人下了逐客令<sup>②</sup>。

涅恰也夫在瑞士的冒险以和巴枯宁闹翻而告终。这个结局的原因不明，而且很复杂，可能与经济、心理、政治、甚至道德都有关系。涅恰也夫的其他方面的一大堆材料都不能系统地说明他们决裂的原因，但是要把最重要的头绪理出来还是可以的。

巴枯宁一生所处的境地是，他不可能从事任何不能赖以糊口的革命事业。眼下，他已为资助涅恰也夫出了不少力，因而他有资格认为，他本人的、并不过份的需求亦不可忽视。涅恰也夫还在洛迦诺时，这一点是否讨论过，现在无可稽考，但一个月以后，巴枯宁给奥格辽夫写信说，他已“战胜了不白之耻”，并向涅恰也夫提供他可以全力投身革命事业的一些条件。他甚至把具体钱数都列出来了：如果他留在洛迦诺，每月一百五十法郎；如果他去日内瓦，每月二百五十法郎。但是涅恰也夫已不像一年前刚来日内瓦那样孑然一身了。他踩着巴枯宁的肩膀向上爬，在革命的圈子里享有某种显要的地位；又由于拿到了巴克哈米蒂也夫基金，

---

①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谢列布廉尼科夫（约生于1850年），俄国大学生，由于参加彼得堡的学生运动而被捕，后逃亡英国和瑞士，涅恰也夫的拥护者。——译注

② 格尔辛索恩：《奥格辽夫档案》，第275—277页。

在物质上已无需依靠他人，他不再需要巴枯宁了。他摸准了这个老革命的虚荣心和无能，断定自己对他不再抱一点希望，也不怕他。本来不付出代价就可以得到的有价值的支持，如果要为之付出代价，那可就不合算了。感恩堪称美德，涅恰也夫却不承认。他悄悄地把巴枯宁的要求扔到脑后。这个老头的惑溺使其自尊心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巴枯宁天性专横，很少顾忌，但他却发现自己不是这个飞扬跋扈、肆无忌惮的“小老弟”的对手。

《钟声》复刊又一次可耻地证明，涅恰也夫根本不把他的恩主放在眼里。巴枯宁曾经认为，他本人或者是他和奥格辽夫一起会担任该报的主编，因为曾经梦寐以求的“革命的三位一体”如今就剩下他和奥格辽夫了。但涅恰也夫取得了奥格辽夫的同意来办这件事，把巴枯宁轻蔑地抛到一边去了。他要自己挑选合作者。当报纸出版第一期时，巴枯宁写信批评其纲领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这封信发表时所加的编者按指出，“只有那些妄自尊大的人……才能借口不同意这一点或那一点细节以脱离实际工作”。巴枯宁又一次忍受耻辱，埋头写一本题为《伯尔尼的熊和彼得堡的熊》的小册子。“伯尔尼的熊”指的是强行拐骗奥鲍连斯基公主孩子们的瑞士联邦当局；“彼得堡的熊”当然指的是晓谕这次犯罪行动的亚历山大二世。（既然巴枯宁早就不把那位公主放在心上）写作的动机是防止同样的罪行降到涅恰也夫头上。

但是，到了5月份巴枯宁对其屈辱忍无可忍，就到日内瓦去了几天，向涅恰也夫下达他自己所谓的“最后通牒”。经济的需要无疑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但是看来他也要求出了六期刚刚停刊的《钟声》应在奥格辽夫和他本人的控制下复刊。涅恰也夫由于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迟迟不作答复。他不习惯别人威逼他，老头子可以再等一等答复。6月14日，当巴枯宁仍在等待的时候，从洛迦诺给奥格辽夫写了一封信，措词哀婉动人，说和“小老弟”的决裂看来“不可避免”。他债台高筑，身无分文，又由于和柳

巴文之间发生了不幸之事，翻译之事也搞不成了。几天以后，涅恰也夫虽未表态，却也写信约见巴枯宁，巴枯宁又一次顺从地来到日内瓦<sup>①</sup>。

巴枯宁在那里住了三、四个星期，此间，最后的决裂发生了。涅恰也夫气急败坏，他榨光了奥格辽夫的钱，《钟声》停刊，他成了被瑞士警察追捕得东奔西逃的猎兽，实在烦透了。于是，他决定离开瑞士到伦敦去活动。巴枯宁陈述成了下列事情的唯一来源。涅恰也夫在逃跑时，盗窃了巴枯宁、奥格辽夫、娜塔丽娅·赫尔岑以及其他同伴的一些书信和文件，以便必要时敲诈他们。当他正在打如意算盘时被人发觉了，他却厚着脸皮说：“是啊，那是我们的规矩。我们把那些‘三心二意’的人都当成我们的敌人，不得不进行欺骗和打击。”尽管被人发觉，他还是把满满一箱有潜在危险的文件带到伦敦。涅恰也夫逃走那几天，巴枯宁一直给他各国的朋友们写信。他曾把“小老弟”当成自己的宝贝推荐给他们，如今却写信谴责涅恰也夫，告诫自己的朋友。他“三个星期内”向奥格辽夫借了四百五十法郎，这笔钱仍从巴克哈米蒂也夫基金中提取。1870年7月底，他返回洛迦诺<sup>②</sup>。

涅恰也夫出逃后，巴枯宁一生中这段不平静的时期随告结束，他可以关起门来想出适当的方法发泄义愤。没过多久，他已经信心十足，并向朋友们夸口说，他“毁弃”了涅恰也夫，目的是不让他玷辱革命事业。要是巴枯宁能够拿出证据，证明在别的因素造成不可避免的决裂之前，在涅恰也夫使用那些方法与巴枯宁作对之前，他已经对这个青年所使用的方法在道义上表示厌恶，那么

---

①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61，281—282页；《钟声》（1870年4月—5月。1933年莫斯科全新发行影印本）第4—5页；《巴枯宁文集》，第2卷第13—67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3卷第534页。

②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84—290页。



他唱起上述这种高调就会更有份量了。但是，他长期以来默许涅恰也夫那样干，这使得他的义愤没有说服力，而且荒唐可笑，成了马后炮。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大不相同，首先巴枯宁对同伴们既慷慨又和气；其次他只是在口头上冷酷无情。重要的是自相矛盾这一特性在他身上表现得很突出；即诚心诚意地宣扬那些自己办不了的事。他的同代人中很少有人能解释他的复杂的、迷惑人的性格。在他的作品中——不管是在感溺涅恰也夫以前、其间还是以后所写的东西——很容易发现，他天真地求救于他猛烈谴责并弃之不拜的偶像“马基雅弗利主义”和“耶稣会教义”。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毫不费力的发现涅恰也夫的非道德信条和巴枯宁是一致的。

从表面上来看，涅恰也夫事件给巴枯宁的一生所造成的重大后果是他的敌人可以利用这个事件。除此以外，它还在巴枯宁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二十年来，他第一次毫无保留地相信一个人，也就是说把自己的感情倾注在一个同伙身上。如今他只能向奥格辽夫倾诉和忏悔这次背叛行为造成的痛苦。

〔他回到洛迦诺后写道〕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都是傻瓜。如果赫尔岑还在世，他会怎样嘲笑我们啊！他臭骂我们一顿也是完全正确的。现在还能做些什么呢？吞下这丸苦药吧，我们以后会更明智一些的。

巴枯宁不愿在无效的后悔中消磨时光，他继续勇敢地、泰然自若地从事他要布满半个欧洲的、细密而又复杂的政治阴谋活动。就在这个时候，他不由产生了一种厌倦情绪——这种迹象并不说明他怀疑其纲领的正确性，而是反映他对于外界看法的冷淡。按这次屈服的口气来看，是由于别的原因，而不是年龄关系（他时年56岁，看起来比他年龄大十岁），那么很可能是始于涅恰也夫的可耻下场所造成的屈辱<sup>①</sup>。

<sup>①</sup>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99，303，341页。

## 第二十九章

### 里昂的惨败

1870年7月16日普法战争爆发。涅恰也夫恰巧就是在这个时候逃出瑞士的。两个多星期以来，巴枯宁一直为和“小老弟”决裂这件事而感到屈辱、有失体面，因而对于这场战争这一更为重要的事件反而很少注意。但是，他不可能长时间对这场战争的潜在的革命因素视而不见。8月11日，他从洛迦诺写信给奥格辽夫说：“他已被不断发生的大事件搞昏了头”，又说他近三天内写了二十三封信。即便在眼下，他的思绪还是乱得很。他心满意足地欢呼“普鲁士的无情的科学战胜了法国的大吹大擂”，并为卡列班<sup>①</sup>（俾斯麦）正给予罗伯尔·马凯尔<sup>②</sup>（拿破仑<sup>③</sup>）以痛击”而感到高兴。他认为，只要普鲁士在梅斯城下再打一次大胜仗，就可决定拿破仑和欧仁妮夫人的命运。后来，他希望“所有的灾难都落到波美拉尼亚<sup>④</sup>英雄们的头上”。无论如何，这将是实现他革命计划的“良机”。

巴枯宁在8月11日给奥格辽夫的信中宣称，他“已经制订了

---

① 卡列班，莎士比亚的喜剧《暴风雨》中的一个丑陋、野蛮而残忍的奴隶。——译注

② 罗伯尔·马凯尔，著名法国演员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所塑造的和奥诺雷·多米耶画笔下的一个狡诈奸商的典型。——译注

③ 这里指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译注

④ 波美拉尼亚即旧时普鲁士北部土人。——译注

一项计划”。他对意大利抱有真诚的希望，并毫无根据地让里沙尔相信，战火已在米兰烧起，那里正在构筑工事。甘布齐和法奈利从那不勒斯给他的报告令人鼓舞。8月底，法奈利亲自来到洛迦诺。但此时由于普鲁士节节胜利，巴枯宁已经对战局失去兴趣，又表现出他对法兰西的本能的忠诚和对条顿的憎恨。他成了一位坚强的法兰西爱国者，谴责法国政府的欺骗行为，主张用最纯正的国民意识将它推翻：

〔他给里沙尔的信中说〕要记住丹东<sup>①</sup>的话：“在向前线敌人进军之前，必须置后方敌人于死地”。丹东说这种话的时间和危险性远不及目前的可怕。从内部消灭普鲁士人是为了能够有把握地从外部消灭普鲁士人。

他开始书写为日后发表的长信，题为《致法国人书》（假托的收信人为里沙尔的合作者加斯帕尔·勃朗<sup>②</sup>）。他在信中说，现已证明法国的正规军是无能的。拯救法兰西的唯一方法是“全体法国民众的起义，这种起义是暴风雨式的、声势浩大的、坚强有力的、无政府主义的、毁灭性的而且是不加任何限制的起义”。<sup>③</sup>

巴枯宁对洛迦诺湖畔的死水一潭越来越感到不安，真是祸不单行。他写信给里沙尔，遗憾地说，如果他还年轻的话，他决不满足写信，他会亲身参加他们的行列。色当的消息终于在9月4日传到洛迦诺。巴枯宁还不能知道共和国就在这一天在巴黎宣告

---

① 若尔日·雅克·丹东（1759—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译注

② 加斯帕尔·勃朗，巴枯宁的法国追随者，职业是养路工，1870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译注

③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300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22—23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271—272，276页；《巴枯宁文集》，第2卷第81—134页。

成立，但是在战场上俘获拿破仑和消灭最后一批法国军队之后，成立共和国是预料中的事。巴枯宁的眼睛不再盯着巴黎了。整个国家机器已被摧毁，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将不是一个新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是他久已向往的理想——自由公社联邦。此事发起于里昂和马赛，说来也很幸运，只有在这两个法国城镇里，巴枯宁有一小撮忠实的追随者。就在这关键的一天，他写信给里沙尔说：“如果里昂和马赛的工人不立刻举行起义，法国以及欧洲的社会主义就完了”。巴枯宁听从他们的意见，两天以后，就做出了决定。

〔他写信给阿道夫·福格特说〕我在里昂的社会主义革命派朋友邀我到里昂去，我决定把我这把老骨头挪到那里，去担当也许是最后一次的那个角色。但是，和往常一样，我一个钱也没有，你能——我不说借——给我五百或四百或三百或二百或者甚至一百法郎当旅费吗？如果能给我，那就给我吧。你要不给，那就算了。

回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还是有利的。因为巴枯宁于9月9日从洛迦诺出发前往伯尔尼途经纳沙特尔、日内瓦和里昂。但是当他在卢塞恩下马车时（戈特拉德尚未开凿，还没有通向瑞士意大利语区的铁路），不意发生了一次巧遇，这件事的性质不能直接讲清楚<sup>①</sup>。

\* \* \*

当涅恰也夫在1869年底自俄国出逃时，有名的第三厅就指示其在瑞士的最有效率的秘密间谍要找到他。这个间谍就是卡尔·阿尔乌德·罗曼，他已在日内瓦住了一段时间，用的假名是同情革命的退休俄国上校波斯特尼柯夫。他用这种伪装没有费什么力

---

<sup>①</sup>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276，278页；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90页。

气就取得了善良的、轻信的奥格辽夫的信任。此人从未见过米哈伊尔·巴枯宁。但关于巴枯宁其人却在日内瓦广为流传。现在叫波斯特尼柯夫的罗曼就以此为根据向其主子编造了下述的报告：

巴枯宁不久于人世了。他的水肿病已到后期，水肿已进入大脑。听人说，（更有甚者）由于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又无力满足自己的性欲，已经变成了像一头野兽一样的人了<sup>①</sup>。

在日内瓦的奥格辽夫和其他人都不能提供关于涅恰也夫下落的任何线索，因为这个机灵的年轻人经常改变住所，对他最好的朋友也不透露地址。波斯特尼柯夫正在搜寻的时候，巴枯宁1870年4月初从洛迦诺来到了日内瓦。4月11日波斯特尼柯夫在奥格辽夫家里第一次和巴枯宁见面。此时日内瓦仍然传说涅恰也夫和巴枯宁住在一起。第二天，波斯特尼柯夫乘机去巴枯宁住处拜访，“向他致意”，并打听涅恰也夫的下落。就其第二个目的来说，这次拜访一无所获。很清楚，涅恰也夫并不在那儿。但波斯特尼柯夫印象也很深。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为这位满头粗发、牙齿脱落的老手的魅力所倾倒。从此，在他的报告里再也没有提到巴枯宁无能和堕落一类的事情了。巴枯宁无疑是波斯特尼柯夫遇到的在瑞士的俄国革命者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个。他不仅是有关涅恰也夫消息的最可能的来源，而且从第三厅的间谍观点来看，也是值得密切注意的对象。

但是，这种印象决不是单方面的。巴枯宁也没有忘记这位来访者的谄媚态度和对革命的公开的同情。所以当他又一次来日内瓦时，他就迫不及待地拜访这位“英勇的上校”。那时，他正和涅恰也夫发生争吵。由于涅恰也夫的过错，巴枯宁失去了唯一与

---

<sup>①</sup> 坎特：《追踪涅恰也夫》，第53页。

祖国直接接触的渠道。波斯特尼柯夫来填补这一空缺似乎很合适。巴枯宁认为，波斯特尼柯夫虽是个热情的革命者，但他和国内尚无牵连，可以自由进出俄国。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巴枯宁向他保证，创办新的“俄文月刊”正是时候——月刊可取名为“社会主义者”或“俄国公社”，用以取代《钟声》。奥格辽夫当然是要合作的。他们只需要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到俄国去，把那里革命行动的可靠消息带回来。这位退休俄国上校波斯特尼柯夫正是可以担当这一使命的人物。波斯特尼柯夫越是犹豫，巴枯宁和奥格辽夫就越坚持。于是友好的争论带来了他们之间的亲密无间。一个星期以后，巴枯宁对这个新的同盟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了。除了搜集情报以外，他还建议委托这位勇敢的上校在俄国以更微妙的使命。波斯特尼柯夫是否能到他普列姆希诺庄老家去一趟，帮他带一封私人信件，设法从家人手中取得他应得的而又长期未得的那份父母的遗产呢？但是，波斯特尼柯夫仍然犹豫不决，直到巴枯宁月底回到洛迦诺，事情还没有定下来<sup>①</sup>。

波斯特尼柯夫犹豫的原因是很简单的。他愿意干这件事，但罗曼得打电报给彼得堡获准和取得费用。电报中他也没有忘记提出借此良机向主子作书面报告，并求得到新的指示。必要的许可终于得到了，奥格辽夫打电报到洛迦诺通知波斯特尼柯夫马上就要动身的好消息。巴枯宁从晚年时常写给他弟弟们和塔蒂安娜的那些枯燥无味的信中挑出一封来寄给奥格辽夫，托波斯特尼柯夫投递。除了流露出对普列姆希诺庄的黄金时代的感情以外，这些信读起来不禁令人悲痛。年事日高的米哈伊尔要唤起的不是“已经被你们扼杀掉的我们旧日的友谊”，而是“你们的正义感和诚实感”、他“坚决要求”立即付给他那“合法的一份”。

---

<sup>①</sup> 坎特：《追踪涅恰也夫》，第50，55，59—60页。

我对你们的同胞之情和最明显的事实之间长期来就在斗争着，我把这种情谊推到了愚蠢的地步，你们终于扼杀了它。我由于急需，给你们写过数封信，知道你们已经收到。起初你们给我回信，进行令人迷惑不解的争论以及模糊不清的计算，结论是 $+1 = -1$ 。近年来，你们干脆一封信也不给我写，断绝书信是摆脱居住在远方人的一种很便当的方式，况且这个人由于政治立场的关系，而无能为力。断绝书信有时也是受了伤害的自尊心的一种标记。但是当它和扣留别人的财产结合在一起时，那就另当别论了。

信的下面一段不禁令人惨然失笑，因为米哈伊尔不自觉地回忆起三十五年前的那些日子。那时他向姐妹们宣扬过真正的黑格尔学派的信仰。

我把这一点主要归咎于你们对哲学的研究。形而上学扼杀了你们的生活、扼杀了你们纯洁的感情，也扼杀了你们的正义感和公正感。你们沉浸在你们的绝对的思索之中，以致没有时间去考虑眼前的需要以及你们曾称之为朋友和兄弟的那个人的生活贫困。

信中的最后一句话近乎在表示感情。作为一封公事公办的、用尖刻的、正规的语言写就的信，信仍保持了其应有的特色。普列姆希诺庄这个名字曾经像音乐一样拨动他的心弦，现在只不过意味着有多少公顷土地，把土地卖掉可以供给他物质生活所需。但塔蒂安娜呢？她还能够想到她最后看到米哈伊尔被人押着在雪地里上路的情形吗？她还能够想起更远的过去，他们自豪的、热情洋溢的、满怀欲望的年轻时代那些日日夜夜吗？当她回忆起这一切的时候，难道年已花甲的塔蒂安娜也会以同样冷酷无情的态度去读米哈伊尔的信吗<sup>①</sup>？

---

① 坎特：《追踪涅恰也夫》，第62—66页。

波斯特尼柯夫回到彼得堡，受到了主子的夸奖，然后，他就按预定的那样，按时到普列姆希诺庄去了一趟。可惜这次来访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是，波斯特尼柯夫却达到了他称之为“解决与巴枯宁兄弟有关的事务”的目的，并给巴枯宁带回七十卢布。这笔微不足道的款项与其说是承认某种权利的要求，毋宁说是一种吝啬的慈善行为。说是还答应——或者说是希望——还会多寄来一些钱，但三个月以后也未见一个钱。波斯特尼柯夫回到日内瓦。在1870年9月初的几天里，他决定接受巴枯宁六个星期以前对他的恳切的邀请，到洛迦诺去一次。他已到达卢塞恩，兴致索然地期待乘公共马车通过戈特拉德隘口的长达八小时的旅程。正在此时，他看到巴枯宁在旅馆门前正走下马车。巴枯宁赶紧把两个旅行包扔在地上，扑到波斯特尼柯夫的怀里，和他拥抱三次。就在这种奇特的情况下，巴枯宁从俄国秘密机构的一个间谍口里，得到了近十年杳无音信的兄弟姐妹们的第一次祝贺。波斯特尼柯夫无事可做，只好顺原路返程，他和巴枯宁一直到达伯尔尼。第三厅给他的经费是乘坐头等车，他的同伴手头没有他富裕就坐了二等车厢。也许是由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巴枯宁得到启示，这是向波斯特尼柯夫借钱的合适机会。他张口借二百五十卢布。他开诚布公地说，他是个“正人君子”，虽不能说准哪天还钱，但有钱就还，波斯特尼柯夫回避这个问题，他拿不准第三厅是否会替他报销这笔款子，但是，当他们一起在一个小站的站台上行走，准备回到各自车厢时，巴枯宁坚持要借钱，波斯特尼柯夫无奈，只好同意了。他手头没有这么大一笔现款，但他答应一到日内瓦就把钱交给奥格辽夫，由他转交给巴枯宁<sup>①</sup>。

巴枯宁和波斯特尼柯夫在伯尔尼分手，他照老规矩到福格特和赖歇尔府上拜访，以后，就去纳沙特尔会见吉约姆，他眼下手

---

<sup>①</sup> 坎特：《追踪涅恰也夫》，第67—71，83页。



头有钱，就住进了滨湖大旅社，9月11日那天整个晚上，他在那里就《致法国人书》的发表问题和吉约姆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吉约姆业已收到这份奇特的文件的六个部分（共约三万字），前几部分由于事态的发展已经过时了，而后面的部分重复连篇而且前后矛盾。巴枯宁把这一整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股脑儿塞在吉约姆手里。由于他没有能力修改，对细节又无耐心去琢磨，就委托这位细心的青年人全权处理，加以删节和重写，并付给他五十法郎印刷费。第二天，他又起程前往日内瓦。于是吉约姆就在那一堆材料里取其可用部分，分编成六个部分，按惯例写了个前言，用修改过的标题《致法国人书信集》发表了。巴枯宁的手稿还在，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经过吉约姆的修改，小心地从正文里删去了如下的那些段落，在这些段落里，巴枯宁乞求于“邪恶的激情”，“全面的无政府主义……以排山倒海之势吞没和毁灭一切，包括敌人和普鲁士人”。经过吉约姆的修改，巴枯宁至少应该摆脱涅恰也夫造成的污点，而这正是他的敌人急于在他身上找到的。

巴枯宁在日内瓦停留的时间足以和他的朋友波斯特尼柯夫再见一面。1870年9月1日傍晚，在一个俄国人奥捷罗夫和一个年轻的波兰人梁格维奇的陪同下，开始作最后一段的旅行。第二天上午到达里昂<sup>①</sup>。

\* \* \*

里昂的混乱局面已经结束。拿破仑第三倒台以后，共和国宣告成立，公安委员会设在市政府，其名称听来调子很高，并具有革命的传统精神，但其政治色彩却很杂。究竟这个委员会要拯救什么一点也不清楚。有人说是拯救革命，又有人说要成立各个党派的“神圣同盟”，把法国从俾斯麦手中拯救出来。委员会的第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90页；《巴枯宁文集》，第2卷第81—131，135—266页，第4卷第7—12页。

一个行动是派出三个代表，阿尔伯·里沙尔就是其中一个。他被派往巴黎和新的甘必大共和党政府谈判。委员会和共和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确定。巴枯宁到达里昂那天，市政府选举终于举行了。那个短命的、莫名其妙的公安委员会让位于新的市政会。

巴枯宁又一次处于适合自己活动的范围之中了。二十年来他第一次尝到了令人陶醉的革命欢乐。这里的情况和他在1849年在德累斯顿遇到的情形没有什么两样。自发的民众起义已经取代了掌权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府。那些激进派分子相当害怕把权力塞到他们手中的革命，几乎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巴枯宁这个矮子里面选出来的将军，掌握了局势。里沙尔不在时，他和帕利克斯住在一起，这套房间就成了狂热活动的指挥部。巴枯宁指责当地的同盟支部随时准备放弃革命原则，并和十足的激进派分子携手联合，他决定创建一个新的革命机构，其名称极不合适，称为拯救法国委员会。9月17日是星期六，召开庆祝新的委员会成立的群众大会。其成员除巴枯宁本人以外，有奥捷罗夫、梁格维奇、勃朗和里沙尔（他在那天从巴黎回来）、巴斯特利卡（他从马赛回来）还有一些其他法国人。巴枯宁乐不可支。

〔他给奥格辽夫写信说〕要做的事太多了，我的脑子乱成一片。这里虽说还没有真正的革命，但将来一定会发生。我们正在为真正的革命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我豁出去了，成败在此一举。我希望早日取得胜利<sup>①</sup>。

然而巴枯宁满怀激情地做的准备工作，很快却暴露出委员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和气质上的差异。有逻辑性的、头脑清醒的法国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90—92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304--305页；里沙尔：《巴黎评论》（1896年9月1日），第147页。

人发现他们不能接受巴枯宁的方法和目标。他们知道法国工人和农民的顽强的个人主义倾向，他们当中没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很诚实的帕利克斯也不同意巴枯宁关于“人民”天生善良这一信念），有些人根本就不是革命者，他们不懂也不同意巴枯宁乞求于“邪恶的感情”的欲望。有一个巴枯宁的新伙伴很气愤地反驳说，“如果不克服对放火、放毒和使用匕首的偏见”，他们就会一事无成。这种说法被认为“太卡尔梅克”了<sup>①</sup>。总的倾向是不走极端。此外，曾经责备同盟成员和激进分子合作的巴枯宁，现在却轻率地力图把安德里厄克斯算作支持者，此人是激进分子，刚刚被甘必大政府任命为里昂的联系人；还有克吕泽烈<sup>②</sup>将军，此人是冒险家，他把革命信念从属于其个人野心（虽然他参加了国际）。这样一来，事情就复杂了。这些联系使巴枯宁疏远了朋友，并进一步证明他选择工具一贯是良莠不分的。这些人似乎对形势从未有过什么影响<sup>③</sup>。

另一方面，失败的耻辱以及政府的无能，激怒了群众，他们干起革命来比领导者更为成熟。在下星期六即1870年9月24日，举行了集会，通过决议，要求如下改革：实行对富人征税以及通过自由选举来任命军官。巴枯宁受到这一公众示威的鼓舞，把一项长篇公告强加给他的同事，这项公告包含了他的大部分观点，以“拯救法国联合委员会”（因为原来的委员会在巴枯宁的脑子里已经成倍地增加）的名义发表如下原则：

1) 卡尔梅克 (Kalmuk 或 Kalmyk) 原为俄国一部族名，此处借用，表示“极端”。——译注

2) 古斯塔夫·保尔·克吕泽烈 (1823—1900)，法国政治和军事活动家，曾参加解放意大利 (1860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1861—1865年)，获将军衔。第一国际会员，1870年里昂和马赛起义的参加者，1871年巴黎公社委员、军事代表，后流亡比利时；大赦后回到法国，1888年起是众议院议员，参加社会主义运动。——译注

3) 里沙尔：《巴黎评论》(1896年9月1日)，第147—153页。

1. 国家的行政和政府机器业已失去作用，予以废除。法兰西民族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

2. 所有刑事和民事法庭一律停止活动，代之以人民的审判制。

3. 停止交税和支付抵押金，取消税收，代之以联邦公社的纳款，根据法兰西安全之需要向富有阶级征收这些纳款。

4. 国家业已不复存在，故不得干预私人债务的支付。

5. 所有现存的市政机构一律停止活动，由拯救法国委员会在所有联邦公社内行使职权，该委员会在人民的监督下行使一切权力。

6. 各个省会的委员会将委派两名代表参加拯救法国革命公会。

7. 该公会即将在里昂市政厅召开，因为里昂是法国第二大城市，其地理位置又能为法国的安全提供有力保证。该公会受到全民的拥护，定能拯救法国。

公告结尾用大写字母发出呼吁：“准备战斗!!!”签名者有二十人（其中包括巴枯宁、里沙尔和帕利克斯）。公告在另一次集会上向热情洋溢的听众宣读了，次日上午在全城张贴<sup>①</sup>。

巴枯宁此时确信，行动的时刻即将来临。他赶紧写信给波斯特尼柯夫，求他向特霍尔泽夫斯基借五百卢布，以供革命需要。他还安慰说：“要么我们死了，否则，我们一定很快还钱。”随后又打了一份电报，大意是安冬妮要求妹妹朱丽叶即来里昂，并把瑞士评论带来。这里用的是简单的密码：“安冬妮”是巴枯宁；“朱丽叶”是波斯特尼柯夫；“瑞士评论”是吉约姆刚刚发表的巴枯宁的《致法国人书信集》。同时巴枯宁还向委员会建议，当夜就逮捕“我们的主要敌人”。在这一片混乱和不安的情况下，采取果断的、计划周密的突然袭击本来是很容易成功的，但巴枯宁的那些法国同事们，虽然在他的强大压力下在公告上签了字，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93—95页。

却在执行把语言变成行动的计划时又一次畏缩不前。在动乱中，这些行动都宣告停止，他们又被迫接受来自另一方面的挑衅。

已经停止工作的公安委员会曾一时心血来潮，效法存在时间不长、但却很有名的1848年的先例，把地方工厂改为国立工场。市议会有幸把这件事也继承下来了，但发现这种试验对其有限的资源消耗极大，于是选择这个不吉利的日子降低工人工资，从每天三法郎降低为两个半法郎。这种做法足以引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愤慨，对革命连抽象的兴趣也没有了。因此，群众计划9月28日在市政厅举行示威。拯救法国委员会前一天晚上开会，讨论局势。巴枯宁主张全面诉诸武力。他坚信，人民的激情一旦爆发出来，战斗一打响，武装部队就会倒向人民一边。他甚至制订一项计划，要给顽固不化的国民自卫军服用麻醉药，这使得同事们很尴尬。他们已经在公告上签了字，公告甚至在全城张贴了，其结尾有激动人心的呼吁“准备战斗”！但到头来却成了无人承担义务的一纸空文。巴枯宁处于压倒的优势，委员会只好决定参加游行示威<sup>①</sup>。

到了第二天中午，有好几千人在市政厅前面的广场上集合。市议会成员有意安排了别的事务，不在楼里。得知这个事实以后，包括巴枯宁和拯救法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内的一百来人强行进楼，委员会的一名法国成员从阳台上向外面的群众宣布，市议会一定要召开会议，要么接受9月26日的公告，要么辞职。由于无组织的群众骚动所造成的混乱，以后发生的事件的过程就不清楚了。有一连国民自卫军开到现场，进入市政厅，以逮捕或驱逐肇事者。群众随后也冲了进去，并解除了自卫军的武装，委员会又一次控制了局势，这连他们自己也有点吃惊。委员会仓卒地自命

---

① 坎特：《追踪涅恰也夫》，第74—75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305页；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95—96页；里沙尔：《巴黎评论》（1896年9月1日），第155页。

为临时政府，并开始考虑和颁布政令。只有巴枯宁——如果他本人的话可信——在市政会议厅外面还表现得现实一点。他向来足智多谋，建议逮捕省长、市长以及部队指挥官，但用什么力量去逮捕却一点也不清楚。特别是那位被任命为委员会军事指挥官的克吕泽烈不知去向——后来又回来了，他忙于和对方进行和平谈判。当天下午，国民自卫军有好几个连开向广场集合。不久，正在从市政会议厅向窗外观看的委员们发现他们被包围了，包围他们的人不再是狂热的支持者，而是手持后膛快枪的国民自卫军。等到被撵走的市议会壮着胆子回到市政厅时，委员会已经很不光彩地解散了。于是，9月28日的革命宣告结束。

还有一次小小冒险等待着巴枯宁。他比同事们更莽撞一些，又不害怕受到伤害，当市长及其保镖进入市政厅时，他仍然呆在楼里不走。于是，他被抓进地下室，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口袋里的一百六十五法郎也被拿走了。他受到了“野蛮的、胆小的资产阶级”的侮辱，之后，人们似乎已经把他忘却了，一个小时以后，奥捷罗夫和几个同事前来营救他。当晚和第二天大部分时间，他躲着不出来。他躲得很好，就连刚刚赶来盯他的梢的波斯特尼柯夫也没有发现他住在哪里。波斯特尼柯夫还带来了三百份《致法国人书信集》，他没有完成任务，只好回日内瓦了。1870年9月29日傍晚，巴枯宁偷偷乘火车去马赛。后来据说安德里厄克斯在签发逮捕证，已经下达秘密指示，不要找巴枯宁了。这可以解释他轻易出逃的原因。这种说法不会得到充分证实，但和这次无力的革命的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对政府的不满是千真万确的，但善良的里昂人对阶级斗争没有兴趣。巴枯宁用尽所有的精力和雄辩才能也不能引诱他们互相残杀<sup>①</sup>。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96—99，108—109页；里沙尔：《巴黎评论》（1896年9月1日），第156—157页；坎特：《追踪涅恰也夫》，第76页；威卢博夫：《欧洲通报》（1913年2月），第58页。

\* \* \*

巴枯宁在马赛的巴斯特利卡家里住了三个星期，闭门不出。他身无分文，不得不卖掉他剩下的最后一点财产——左轮手枪。他写信给意大利的政治流亡者贝勒里奥，此人在洛迦诺和儿子埃米利奥住在一起，求他照顾安冬妮的生活；又给在日内瓦的波斯特尼柯夫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求他尽可能为“共同事业”作出贡献；第二封信里夹带一封给他弟弟们的信，请他“极其小心”地寄给他们。这封信虽未保存下来，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信里有要钱的内容。罗曼把这封信及时寄给他的主子，由他们再寄给收信人。这件事使三厅的秘书不禁暗自发笑，提笔在罗曼的报告上批注如下：

这位老革命不会想到三厅对他如此关照，还在他给弟弟们的信上贴了邮票。

在马赛休息了好几天，这有利于恢复巴枯宁轻快的乐观主义。他认为，9月28日的惨败应归咎于克吕泽烈的“背叛”和里沙尔的“胆小”。只要重新作出更为坚定的努力，就可在里昂发动革命。那位陪同或者说是跟着巴枯宁来到马赛的波兰人梁格维奇自愿要求回到里昂探听底细。他是个热情很高但经验很少的年轻人，对侦察巴枯宁的那些间谍所能给他造成的特殊危险一无所知。他带着一封巴枯宁给勃朗和帕利克斯的信，还带有一份有名的密码，里面不仅有巴枯宁主要联系人的姓名，还有诸如“暗杀、抢劫、纵火等容易招致祸害的词语”。梁格维奇被当局抓住，并在他身上搜出了这些宝贵的文件。勃朗立即被捕，帕利克斯因病漏网。巴枯宁的其他朋友都面临危险。国际和同盟的各个支部都因9月28日的种种事件而遭到破坏，已经不复存在了<sup>①</sup>。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98—99，108—110，114页；坎特：《追

这是最沉重的打击。看来巴枯宁在马赛再呆下去是危险的。地方当局自鸣得意，但设在图尔的中央委员会由于甘必大从遭到围攻的首都逃出而得以加强，正准备严厉地对付社会主义者。当巴枯宁得知其宿敌梅洛斯拉夫斯基现在追随甘必大时，他确信对他进行新的迫害就要开始了。他得知法国资产阶级报刊谴责他是俄国间谍，大吃一惊。他想去巴塞罗那看望他西班牙的支持者，但经过再三慎重商议，或者是由于没有钱，未能成行。马赛的朋友们给他凑了一百法郎，当回家的路费。马赛和热那亚之间有定期船运，有个富有同情心的船长愿意带他，港口的一个官员偷偷地把他弄上了船。巴枯宁还多加小心，剃去了他茂盛的头发和胡须，戴上眼镜，持着瑞士假护照。经过这样乔装打扮，他便于1870年10月24日离开法国，以后再也没有回来<sup>②</sup>。

他于月底回到洛迦诺，情绪极度低沉。

〔离开马赛前夕，他写道〕尽管我设法从相反的方面来说服自己，但我还是相信法国已经完了。资产阶级的无能、胆小和贪财把法国出卖给了普鲁士人。普鲁士人的军国主义、官僚政治、贵族老爷的架势以及新教耶稣会的教义与我那亲爱的全俄国的皇帝陛下的皮鞭携手联合，将长时间赢得欧洲，究竟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再见吧，我们即将获得解放的所有梦想。

他此时着手写一本小册子（次年4月发表，题为《德意志专制帝国与社会革命》），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把法国的种种不幸归咎于普鲁士和俄国帝国主义的罪恶同盟，充分表现了他敌视条顿

---

踪涅恰也夫》，第78—79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313页；里沙尔：《巴黎评论》（1896年9月1日），第159页。

②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111—115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281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31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78页。



人的偏见。严厉地谴责“德国资产阶级一惯的奴颜婢膝”。但是，巴枯宁失去了他天生的自信，这在他一生中还是第一次。他感到他正在打一场敌众我寡、不能取胜的仗。在充满敌对力量和反革命的世界里，他几乎孑然一身。一旦奥格辽夫去世，他将成为“死去一代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sup>①</sup>”。他的经济处于绝望境地，毫无疑问，这也是他沮丧的原因之一。1870年12月，他又一次使出令人讨厌的一着：给朋友写信，拚命讨钱<sup>②</sup>。

1871年1月，巴枯宁和他最忠实的一位朋友——退休的俄国上校波斯特尼柯夫——诀别了。罗曼没有找到涅恰也夫，被雇主招回彼得堡。巴枯宁从洛迦诺动身，准备在波斯特尼柯夫途经伯尔尼时和他见面。自7月份以来，波斯特尼柯夫就未见过巴枯宁，这次见面，巴枯宁变化很大，使他大吃一惊。由于里昂起义的失败，又由于出逃时旅途辛苦，这位老人的身体衰弱不堪。他喘气都很吃力，抱怨腿肿、腿疼，饮食大减，但精神有些恢复了。他已把目光从法国转移开，兴致勃勃地谈论奥地利帝国的崩溃（这是他三十年来的理想），谈到全欧战争，这使得在俄国本土进行宣传成为可能。他认为战争迫在眉睫。他特别恳请波斯特尼柯夫到俄国后，要研究一下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进行宣传的方式、方法，并认为这两个地区是此次使命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地方。他还请波斯特尼柯夫到普列姆希诺庄去看看他的弟弟们，最后，他提出最后借款六十法郎。于是，这两个人拥抱、告别。波斯特尼柯夫知道，巴枯宁也猜想他们不会再见面了。巴枯宁像孩子一样地哭起来了。他和奥格辽夫无意中招待了这个三厅的间

---

① 莫希干人，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东南部的印第安人。这里借喻其稀少。

——译注

②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112页；《巴枯宁文集》，第2卷第287—455页；坎特：《追踪涅恰也夫》，第83—84页。

谍，他们两人都没有发现这个人的身分和职业<sup>①</sup>。

六十法郎可以勉强应付巴枯宁的急需。就在1871年1月，他开始粗略地记一下收支流水帐，其中还偶尔地夹杂着一些别的情况。他1月份的记录充分说明他当时家庭情况：

1月2日：给安冬妮五法郎，无钱；3日：无钱，向玛丽借四十五法郎〔玛丽·欧莱泽诺是当地熟人〕；5日：给安冬妮二十法郎；9日：给安冬妮三法郎；11日：无钱；13日：无钱；14日：向玛丽借四十法郎；16日：收甘布齐寄款二百法郎；18日：付给肉店六十法郎，付给〔辨认不出〕十七法郎；19日：付给面包店三十法郎，尚余六十七法郎；21日：尚有五十三法郎七十生丁；24日：尚有二十法郎；25日：茶叶用完；28日：写信给弗兰泽尼夫人，明天可能回信。回信说什么？是一个钱也没有？二百？三百？四百？29日：收弗兰泽尼夫人寄款三百法郎。巴黎方面于28日投降，布尔巴基<sup>②</sup>入瑞士。付给妮娜〔女管家〕二十五法郎（到2月1日结欠二十法郎），还玛丽四十法郎（到2月4日结欠二百零八法郎）；还贝托里五十五法郎（结欠二十五法郎），买柴用四十一法郎五十生丁，尚余八十八法郎。

这份枯燥无味的流水帐也许可以用安冬妮在同一时期写的一封信来加以补充：

米哈伊尔的境界十分沮丧。他说：“我能干什么呢？我老了，不能挣钱糊口。我不久于人世了。”经济问题使他如此失望，以致他正失去精力和道义的力量，他献身于人类解放事业，从不考虑自己。他的弟弟们对他

---

① 坎特：《追踪涅恰也夫》，第86—87页。

② 沙尔·布尔巴基（1816—1897），法国将军，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先后任近卫军指挥官、第十八军军长和东方军团司令。——译注

总是不闻不问。米哈伊尔希望能够迫使弟弟们给他那份应得的财产。

2月，情况仍然没有好转；3月中旬，巴枯宁仔细地在记帐本里记道，他口袋里还有“九十九生丁”。他向女房东借了一百一十法郎，前往佛罗伦萨去见在意大利旅行的俄国人卢威宁。这次访问历时两个星期，回洛迦诺以后，他说见到卢威宁很高兴。甘布齐答应4月份再借一千法郎，他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巴枯宁，还不如说是为了安冬妮和孩子们。大约就在同时，安冬妮家里开始每月寄给她五十卢布生活费，这些飞来之财使1871年夏天如久旱逢甘雨，这在巴枯宁晚年时还是少有的<sup>①</sup>。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132—133，146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318页。

## 第三十章

### 同盟的势力

涅恰也夫和普法战争这两个戏剧性的事件转移了巴枯宁对他一生中这段时期的根本问题的注意力——他和马克思之间为控制国际的命运的战斗。1869年秋天召开的巴塞尔代表大会曾宣告这场战斗的开始。自此以后，尽管多次中断，巴枯宁的活动又一贯缺乏系统，但他却干着破坏马克思在国际里支配地位的事。从这个时期开始，马克思也进行密谋和反密谋，直到把他的对手在1872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完全打垮为止。不过，他干得更有系统一些，但也曾多次中断（因为他也有别的事）。自1870年秋天那次倒霉的、最后一次法国之行以后，四个月以来，巴枯宁除了一次短期去意大利以外，一直呆在洛迦诺。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在国际内部反马克思主义小团体的组织（就组织存在而言）工作；对他用以对抗马克思的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学说进行详细的阐述（就其能够系统阐述而言）。

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分裂、国际总委员会和同盟之间的分裂逐渐表现为英、德（巴枯宁在那里从来没有追随者）和拉丁语系国家（马克思在那里影响很小，或者没有什么影响）之间的分裂，瑞士在这两个阵营之间分成两部分。第一次公开冲突发生在瑞士，甚至在普法战争爆发之前，冲突已经很严重。因此，必须先谈一谈瑞士发生的事件，然后再谈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巴枯宁主义者的势力。

促成这次国际内部在瑞士发生争端的关键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巴枯宁的宿敌尼古拉·吴亭。此人于1869年秋季在日内瓦定居，那时，巴枯宁正好不在日内瓦。巴枯宁退居洛迦诺，对日内瓦的工人运动的士气产生了不良影响。他离开日内瓦时，把同盟的领导权交给了已经不太热心的佩龙和年轻的法国政治流亡者罗班<sup>①</sup>，罗班在佩龙的工场里失了业。这两个人由于性情和传统的关系，立场更靠近运动的右翼，而不是左翼。他们很快就把同盟的事务交给了奥格辽夫情妇的儿子亨利·萨特伦德。巴枯宁很气愤地说，这个人“简直是个不动脑筋，不会动笔的毛孩子”。同盟的成员实际上徒有虚名。国际别的地方支部都陷入了无休止的日内瓦内部政治的争论，《平等报》上充斥着他们争论的文章。巴枯宁的威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吴亭以其习惯的自信心，以接班人选的身份出现。1869年末，吴亭在奥里珈·列瓦晓夫的魅力和金钱的支持下，很快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他谈到巴枯宁的短处时十分雄辩，诸如他的阴谋、独裁的方法，在金钱上不讲道德等。谈这方面的事很多人都爱听。1870年1月，吴亭通过使用手腕和碰运气，当上了《平等报》的实际编辑（其他两名编辑形同虚设）。3月，他参加了同盟的一次会议（他不是成员），提出了一些对章程的修正案，在贝克尔的支持下，这些修正案通过了。后来，也在一个月，他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的第一个俄国支部，并给在伦敦的“德高望众的马克思博士”写信，邀请他在总委员会里担任“俄国支部书记”。通过讨好马克思，吴亭提出把反对泛斯拉夫主义和“公开揭露巴枯宁的真面目”作为新支部的任务<sup>②</sup>。

---

①. 保尔·罗班（1837—1912），法国教师，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领导人之一，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译注

②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225—229，279，287—288，298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45—246页；《巴枯宁文集》，第5卷第245—249，275页。

自从巴塞尔代表大会以来，马克思一直不知道巴枯宁的下落。他错误地把那年冬季《平等报》上刊载的批评总委员会的一些文章归咎于巴枯宁。四个月以后，一直到1870年1月，他才知道巴枯宁退居洛迦诺。然而，他总是想随时听到对他对手不利的事。所以，吴亭信中预示的事态新发展是可喜的。他欣然应允，当上了“俄国支部书记”<sup>①</sup>。马克思不信任俄国人，在给吴亭的回信中，他认为“只字不提巴枯宁更为合适一些”。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得出自己的结论。几天以后，他在国际的德国支部（相信他们痛恨俄国人）散发一份“机密通知”，毫不留情地、但也并非总是完全准确地剖析了巴枯宁近来的活动。在信的末尾，他提到吴亭俄国支部的成立，毫不掩饰地对此表示满意。他写道：“因此，这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的手法，至少在国际的范围内，很快就要完蛋了。”<sup>②</sup>

吴亭迫不及待地证明马克思对他的信任是正确的。1870年4月，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即在瑞士操法语的国际各支部的联盟，在汝拉的小镇拉绍德封召开年度代表大会，大会议程上争论的焦点是同盟日内瓦支部申请加入联合委员会一事。吴亭取得了其他日内瓦支部的支持，提议把这项申请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很明显，这个争端是对个人的攻击。吴亭得到了一个舞台，又有听众，就放肆地对不在场的巴枯宁进行猛烈的攻击。这次指控主要是根据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去年夏天联合发表的那几项俄文声明。吴亭知道这些声明，而国际的非俄国人成员却不知道，所以，他下决心尽量利用这一点。他向听众保证说，巴枯宁在几本小册子里“大声宣称，在他的所谓革命活动中，他既不承认善良的信仰，

① 马克思于1870年3月担任国际总委员会的俄国通讯书记。——译注

②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292—29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360、405—407、630—632页；马克思：《机密通知》（1870年3月28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3—316页。

也不承认法律、正义和道德，和耶稣会成员一样，他认为对付敌人可以不择手段”。另一位演说者宣称，同盟主张无神论，主张废除家庭。在日内瓦的各种机构盛行着加尔文教的气氛中，显然，这些都是严重的指责。

会上没有真正的辩论。吉约姆虽然挺身而出为其主子辩护，但他不知道涅恰也夫的那些声明，所以只能说那些声明与此事无关。但是，证据不足就用强烈的感情来补偿。当同盟加入联合委员会以二十一票对十八票通过的时候，处于少数派的日内瓦人拒绝接受决议，退出代表大会。然而，其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意外事件，是多数派没有预料到的。那就是代表大会的会场的房主是个少数派，因而，多数派就不得不另找地方来谈判，而日内瓦人仍然留在原来的地方，声称是反对派退出会场，他们召开的才是合法的代表大会。这两个代表大会都着手以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的名义通过决议，都向总委员会提出请求批准他们。这些做法已经成了闹剧。但是，拉绍德封代表大会是个里程碑。巴枯宁深信，这个代表大会“是我们即将在下届国际代表大会上发动战斗的先导”。同时，他还虚张声势，把涅恰也夫编的《钟声》前五期寄几份给马克思<sup>①</sup>。

吴亭迫不及待地寻求对他有利的条件。1870年4月16日，也就是拉绍德封代表大会十天以后，他建议把那些既是国际日内瓦中心支部成员又是同盟成员的人开除出中心支部，他们是巴枯宁、茹柯夫斯基、佩龙和亨利·萨特伦德。巴枯宁脑子里尽想涅恰也夫，对这些举动不予理会。第一道命令于中心支部委员会开会前发出，没有回答；第二道命令激起巴枯宁提出一项要求，即要

---

①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3—11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2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70—471页。

求书面告知对他控告的内容以及起诉者名单。但已经太晚了，吴亭已经开动了工作机器。8月初，公布了一项正式宣判，把这四个不肯就范分子以藐视法庭罪开除出去<sup>①</sup>。

与此同时，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的分裂以及给总委员会的呼吁迫使马克思摊牌。形势很尴尬，因为正如恩格斯勉强承认的那样，巴枯宁主义者在“形式上”还是正当的<sup>②</sup>。然而，如果总委员会完全按照法律根据，支持不忠实的巴枯宁主义者而反对忠诚的吴亭以及同样忠诚的（虽说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日内瓦人，那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能够对付这个局面。1870年6月28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如下：巴枯宁主义者在拉绍德封代表大会上取得的多数只是“名义上的”；设立在日内瓦的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一直在正确地行使职责，总委员会“无权取消其名称”；在拉绍德封多数派建立起来的那个机构应当改用别的名称<sup>③</sup>。总的来看，多数派轻而易举地过了这一关，他们没有被开除，仍允许他们保留国际委员的资格，保留其当地组织机构，条件是他们把“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这个有争议的名称让给他们的少数派同胞。但事情不会这样了结。双方都知道，他们还得更大规模地交手，以取得更为决定性的结果。总委员会通过那项决议两个星期以后，由于普法战争爆发，他们被迫休战。但从此以后，瑞士的国际内讧，发生了尖锐的、无可挽回的分裂。汝拉各支部成了巴枯宁和同盟原则的狂热支持者，吴亭领导下的日内瓦各支部追随马克思

---

①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19，75—76页。

② 恩格斯在1870年4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日内瓦人不管怎么说还是有点迷糊，否则不会落到如此倒霉的地步，让巴枯宁分子在形式上比他们有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70页）——译注

③ 参阅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的决议》（1870年6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0页。——译注



和总委员会<sup>①</sup>。

\* \* \*

在法国，主要是在巴黎，国际从一开始就拥有数量可观的支持者。这批法国人自称蒲鲁东的门徒，声言不搞政治鼓动（在拿破仑第三统治下的法兰西，这种谨慎是明智的）。总的来看，他们是反对马克思的政策和学说的。但是，由于巴枯宁1864年以后再也没有去过巴黎，所以，他和这些人没有来往。他在1868年吸收加入同盟的那些法国人都是和他一起在伯尔尼代表大会少数派宣言上签字的那些人，他们是：埃利泽·勒克律（其弟埃利不久也加入）、阿里斯提德·雷伊以及阿尔伯·里沙尔。这些人中，雷伊和勒克律兄弟都是资产阶级激进分子，而不是革命者，几个月以后，国际兄弟会解散，他们就脱离了巴枯宁。两年多来，阿尔伯·里沙尔仍然是巴枯宁的忠诚支持者。有一段时间，里昂成了巴枯宁主义运动在法国的中心。

1869年期间，里沙尔经常去日内瓦拜访巴枯宁，巴枯宁甚至把他介绍给涅恰也夫，这是厚爱的表示。他还得到一份巴枯宁的有名的通讯密码，后来密码落入警察手中，成了对法国的国际组织进行迫害的证据之一。1870年3月，国际法国各支部在里昂召开代表大会，巴枯宁没有亲自参加，他寄去一份发言稿。在发言稿中，他主张避开资产阶级政治，鼓吹“所有革命派的集体专政”。巴枯宁1870年夏季对于即将来临的法国革命充满乐观主义。同盟的前景在法国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要光明一些<sup>②</sup>。

战争的灾难以及巴枯宁自己参加的里昂起义的失败，使他有

---

①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55—5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470—471页。

②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244—245页；里沙尔：《巴黎评论》（1869年9月），第139—143页。

希望有信心的心境变得失望了。1871年3月爆发的巴黎公社起义也没有使他摆脱苦恼。他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遇到的那个法国工人瓦尔兰就是公社成员，他们从那以后一直有通信来往。马隆当上了区长，埃利·勒克律当上了国立图书馆馆长。但是，巴枯宁从未说过公社的成就应归功于同盟的学说和组织。从一开始，他就以不寻常的悲观主义的情调，预言公社会失败。公社使同盟在法国的直接影响丧失殆尽，里沙尔和勃朗的行动使人对同盟的名称都产生了怀疑。这两个人曾谒见流放在奇泽尔赫斯特的前皇帝，并从他那里得到资助，还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呼吁工人阶级把拿破仑请回来。但是，和马克思比较起来，巴枯宁的思想在法国找到了更为适宜的土壤，根扎得也更深。公社的流亡者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巴枯宁通过伦敦的巴黎公社支持者，第一次得到了没有预料到的英国的支持。在日内瓦，马隆和另外几名流亡者参加了日内瓦国际中心支部，他和吴亭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使巴枯宁完全与他和好。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那些站在马克思一边的法国代表，由于怕警察迫害，不能透露他们的姓名。他们的身份是很容易引起严重怀疑的<sup>①</sup>。

巴枯宁主义者在意大利取得的成功更为突出。同盟那不勒斯支部是甘布齐于1868年秋季建立的，曾派巴枯宁作为代表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这是巴枯宁支持者最为活跃的团体之一。包括甘布齐和法奈利在内的几千意大利人也被吸收加入同盟的日内瓦支部。巴枯宁退居洛迦诺使他又一次有机会和意大利有直接的接触。1870年春天，他去米兰会见甘布齐（首要的动机肯定是讨论经济问题），引诱一些意大利激进分子在那里成立了国际的一个支部。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248，256—257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318，32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21—322页。

他希望意大利在普法战争之际能发动一场革命，但很快就失望了。但是，1871年3月，他去佛罗伦萨会见卢威宁时，在其意大利的支持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又起草了一个有名的“方案”。到了这时，意大利有两个或三个团体自称国际支部，虽说他们当中是否有人正式参加国际或承认总委员会还是值得怀疑的<sup>①</sup>。

巴黎公社起义是在巴枯宁去佛罗伦萨的前夕爆发的，这次起义对他在意大利的地位有重大的影响。1867年前，他在意大利居住期间，和马志尼分道扬镳了，因为他反对马志尼两个最心爱的理想——宗教和民族主义。然而，迄今为止，这两个人还没有互相攻击过。有一次，马志尼实际上还去洛迦诺看过巴枯宁。巴黎公社迫使他们之间发生了争端。马志尼看到了意大利统一的成果，所以，他在晚年就越来越不是一个革命者了。他在题为《人民的罗马》的文章中，强烈谴责公社是反民族反宗教的运动。1871年，他的攻击扩展到国际，警告意大利工人阶级要反对这个无神论的、不道德的、和公社狼狽为奸的组织。

这对巴枯宁来说太过分了。他赶紧起来支持公社和国际，在米兰一家杂志上发表题为《一个国际会员对朱泽培·马志尼的回答》的文章。巴枯宁对把国际说成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指责表示欢迎。

〔他发问道〕不久前，我们在哪里发现了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在巴黎公社。唯心主义者和信奉上帝的人又在何处？凡尔赛国民议会。巴黎公社要什么？要工人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得胜的凡尔赛议会要什么？要人类在教权和世俗权力的双重桎梏下退化……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尚的巴黎人民，为了保卫史无前例的、最人道的、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59页；讷特劳：《格鲁伯家族档案》，第2卷第302—303页。

最正义的、最崇高的事业——全世界工人的解放——正在遭到数以万计的屠杀，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各种形式的肮脏的反动势力的可恶的联合把种种只有肆无忌惮的、臭名昭著的人才能捏造出来的污蔑一股脑儿向他们的头上泼去。正是在这样的时刻，马志尼——那位伟大的、清白无瑕的民主派马志尼，却抛弃了无产阶级事业，死抱住自己预言家和传教士的使命不放，开始辱骂他们。

巴枯宁已经完全陷入了这场争论，他写起文章来精神抖擞。这篇文章完成后，他又着手写一篇长篇论文，还是谈同样的问题，他一反往常的习惯，完成了这篇论文，由吉约姆在年底以《马志尼的政治神学和国际》为题发表。同时，有几名反对马志尼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到了洛迦诺，向这位新的猛士致敬，并拟订一项反攻计划。1871年11月，马志尼主义者在罗马组织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巴枯宁写了一份《给我的意大利朋友的通告》，印发给与会代表。当表决一项提议批准马志尼的原则时，三名代表发表声明说，他们认为这些原则“违背了工人阶级的最大利益，与人类的事业是背道而驰的”，并退出了大会。这三名代表之一是一位严肃的、富有的青年人，名叫卡菲埃罗，他最近到过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见了，把他当成国际事业的前途无量的新兵。但是，他眼下被巴枯宁的雄辩才能说服了（虽说未见过面），成了巴枯宁热心的门徒<sup>①</sup>。

于是，马志尼和巴枯宁之间展开了一场旨在控制意大利工人运动的战斗。从此，洛迦诺和意大利左翼社会主义者之间不断有书信往来。马志尼用意大利文发表了赫尔岑的遗著回忆录节选，回忆录嘲弄了巴枯宁在1863年波兰起义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227，247页；《巴枯宁文集》，第6卷第109—128页。

马志尼主义者占了一点便宜。但是，更有分量的却是罗马代表大会以后加里波第发表的那项充满激情的声明，声明称国际是“未来的太阳”。1871年12月，一个新的团体“工人社团”在波洛尼亚成立，各主要城镇还有地方社团小组。社团和国际之间的关系甚至连成员们也不清楚。1872年1月，巴枯宁想把这些过失推给马克思，促使其意大利友人参加国际，承认总委员会，在报刊上避免对总委员会直接论战。但是，到了春季，社团仍在辩论他们是接受总委员会的领导，还是接受汝拉联合委员会的领导，还是自治。这些组织上的问题在意大利既没有人懂，也没有人赏识。国际与同盟的关系似乎也没有分清楚。同盟的秘密方案只有去过洛迦诺、被巴枯宁吸收为成员的、那些他最亲密的人才能知道。意大利工人忠心耿耿，那纯属个人的事情。马志尼于1872年3月去世，此时，意大利人很少见过的巴枯宁成了意大利工人的圣贤。在海牙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那个夏天，巴枯宁的影响达到了顶峰<sup>①</sup>。

在西班牙和在意大利一样，巴枯宁派成了国际的开路先锋。意大利人法奈利接受巴枯宁的建议，于1868年秋天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建立了国际的第一批分部。巴枯宁后来指责法奈利“把国际和同盟混为一谈”，“用同盟的方案建立国际”似乎不是本质问题。如果把这些分部都建成同盟的支部，他们就失去其特点，而变成国际的支部了，因为1869年夏天，公开的同盟已经不存在了。事实上，西班牙形式上的局势比别的地方更为明朗。到了1870年6月，西班牙分部之多足以成立西班牙联合委员会。同时，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两名西班牙代表散蒂尼昂和佩利塞尔不但被巴枯宁吸收为同盟的日内瓦支部成员，而且还被介绍加入其秘密同盟。由于不大了解巴枯宁，他们比其他大多数成员对这个半神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268—290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312，345，580页。

话式的组织都认真得多。他们回到巴塞罗那后，就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其成员都是从国际委员中挑选出来的，章程和巴枯宁制订的章程差不多。巴塞罗那小组的已知成员有十四名。国际西班牙其他支部里也有同盟的类似秘密组织。整个1870年和1871年，巴枯宁和散蒂尼昂、佩利塞尔以及其他两名西班牙同盟成员一直保持着联系。当马克思1872年初采取反击措施时，那里的情况就是如此<sup>①</sup>。

\* \* \*

上文对“同盟”这个名称用得随便，也不确切，巴枯宁本人也是这样用的。这些年中，巴枯宁似乎时而用它来指1869年解散的、公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时而指比前者存在时间更长的同盟日内瓦支部，时而又指他1864年以来一直主持的秘密团体或一系列的秘密团体。同盟的存在及其特征是和马克思决裂的最后的關鍵所在，因而，尽可能找出关于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组织的确切性质是很重要的。

这个名称的历史只是把同盟的所有事情都搅得混乱不堪的一个因素。巴枯宁在那不勒斯曾建立秘密的国际兄弟会。后来，他不仅称国际兄弟会为“同盟”，而且把他以前在佛罗伦萨建立的意大利兄弟会也称为“同盟”。但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个名称同时使用。1871年，巴枯宁把兄弟会带到了瑞士，虽然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变化。兄弟会在瑞士一直存在到1869年初正式解散为止。巴枯宁于1868年秋季退出“和平和自由同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同盟将在国际机构内部发挥作用。他本意要把这个同盟建成一个秘密组织，但由于其支持者一再坚持，他才使这个同盟公开化。尽管他对同伙的意见作了让步，但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54，270—271页；《巴枯宁文集》，第6卷第203页。

是，他还是把他的亲信（包括佩龙，此人的情况上文已引述过）拉进秘密组织中去了。他毫不在意地称这个组织为“同盟”或“兄弟会”。1869年初，旧的国际兄弟会已不复存在，但这个名称仍在继续使用。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巴枯宁从那时以后还为之吸收成员的组织就是他根据朋友们的意见放弃了的那个秘密同盟，但这个秘密同盟在他的想象中仍然存在。公开的同盟已经按照总委员会的要求，于1869年7月解散了。从此以后，为人所知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唯一的团体就是仍然保留那个名称的行将瓦解的日内瓦支部。但是，巴枯宁在谈到或者写到——他经常这样做——“同盟”时，他想到的不是日内瓦支部，而是他梦境中的秘密同盟。他继续邀请朋友们——有时甚至是陌生人——参加进去，他为其起草章程、制订计划，并且不吸取在伦敦的经验教训，在新成员中散发通信密码。寄给阿尔伯·里沙尔的密码就是其中的一种。现存的还有几份巴枯宁的纲领草稿，随着他一时想法的变化，内容上略有不同，使后人迷惑不解。

同盟是否存在的问题使海牙代表大会发生了分歧，也使大会无所适从。这个问题也使后来的评论家发生了分歧，大多数评论家出于他们的政治观点，都满足于武断的回答。实际上，这个问题不能用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来回答，巴枯宁本人提供的证据也是十分矛盾的。他有一次在洛迦诺说：“我坐在一角，静静地织我的蜘蛛网。”但蛛丝太细，他自己有时也看不清楚。他给自己的意大利朋友打气说：“我们亲爱的同盟扩展得很广泛。”但是，在与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发生争论时，他竟能同样郑重的声明：秘密同盟“根本就不存在，是他们想象出来的”。这一结论性的声明当然不是真实的。秘密同盟存在于巴枯宁本人的想象中，也存在于那些把巴枯宁说的和写的各种情况都看得很认真的朋友们的想象中。既然他的西班牙朋友们属于这一类人，那同盟也就作为西班牙的一个地区性组织而存在。很难说同盟在别的地方也

是客观存在的。

〔多年以后，吉约姆在评论巴枯宁的一封西班牙文信件时说〕巴枯宁给莫拉哥<sup>①</sup>写信，就象给国际兄弟会成员（莫拉哥不是成员）写信一样，充分发挥想象，把那个只在理论上存在于巴枯宁脑子里的组织描写成一种美景，并且很高兴地在香烟的烟雾所形成的妄想中纵情享受这一美景<sup>②</sup>。

吉约姆是个讲究实际、缺乏想象力的正人君子，他提供的证据肯定是很关键的。在公开的同盟存在的时候，吉约姆就在莱洛克尔国际内部组织了“有识之士”的秘密团体。1869年至1872年，他是巴枯宁最热心的崇拜者和密切的合作者之一。人们（包括巴枯宁在内）都不止一次地称他为那个所谓秘密同盟的领导人之一。然而，吉约姆在海牙代表大会上以及大会以后都否认同盟的存在。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他是对的，因为既没有关于成立秘密同盟的记载，也没有成员名册；既没有一致赞同的章程或纲领（因为巴枯宁所起草的无数方案都由他自己负责），也没有干事职员、文书档案及例行会议。一个没有这些标志的政治社团只能是个神话<sup>③</sup>。

总之，秘密同盟主要是巴枯宁晚年在其中度过许多岁月的虚构的境界。但是，他自己的想象给同盟规定了什么任务呢？在国际组织的内部隐藏着秘密同盟的目的何在？巴枯宁永远也不会忘

---

① 托马斯·莫拉哥·冈萨勒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雕刻工，西班牙的秘密同盟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第一国际会员。1873年5月30日被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开除出国际。——译注

② 吉约姆：《国际》，第1卷第76—77页。

③ 坎特：《追踪涅恰也夫》第83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371—372页；《巴枯宁文集》，第6卷第202页；讷特劳：《格鲁伯家族档案》，第4卷第289页；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12—13页。



记他从1848年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公开的煽动本身不可能推翻现存的秩序，必须同时用密谋来暗中破坏其基础。他在1872年春季给他的西班牙拥护者写信说，在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中，国际为社会革命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但它还“不是一个能够组织和领导那场革命的组织”。同盟的目的是“给国际提供一个革命的组织”。国际提供革命军队；同盟提供总参谋部。而巴枯宁本人呢？正如他有一次对波斯特尼柯夫说的，则是“总督一类人物”。

巴枯宁给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和对同盟所规定的任务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可以用来解释人们经常指责他的自相矛盾之处。在国际内部，他要求个人完全自由，谴责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专制主义，因为马克思想把“国际变成一个巨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所代表的单一官方意见来支配”。他声称“国际的统一、强大和意志不是在上层，而是在下层；不是在已经变成了政府的总委员会，而是在所有支部的自治和自愿的联合”。然而，这些原则一点也不适用于成员都是精选的秘密同盟，因为同盟成员要和“在公众的激情中来无影去无踪的领航员”一样。革命“不能由任何看得见的力量”来领导，而是要由同盟全体成员的集体专政来领导。为此，同盟的成员必须自愿地以个人自由服从像耶稣会一样严格的纪律（巴枯宁不止一次地作此比较），耶稣会的力量在于“在集体意志、组织和活动面前忘记个人”。巴枯宁要求国际成为尽可能松散的组织形式，要求同盟成员保持尽可能的最严格的纪律，他看不出这两者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他似乎从未想到过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可能早就认为，他们行使总参谋部的职能同样合格，对革命力量实行“集体专政”也同样可以胜任<sup>①</sup>。

---

①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3卷第100—102，105页；坎特：《追踪涅恰也夫》，第55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259，268页。

## 第三十一章

### 马克思和巴枯宁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在第一国际里的斗争由于普法战争的爆发停止了六个多月。1871年3月，斗争又在日内瓦展开了。吴亭在确知巴枯宁及其朋友被开除出日内瓦中心支部以后，就宣称同盟的日内瓦支部从未正式得到总委员会的承认，着手一并将他们开除出国际。于是，日内瓦就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同时，这个问题又提交到伦敦。总委员会不愿意支持同盟，但又不能否定其会员资格，一直等了三个月，才批准他们的会员资格。这种延宕证实了巴枯宁的怀疑，即吴亭的行动是受马克思指使的，但这种怀疑证据不足。不过，同盟的问题急待解决。总委员会认为欧洲的形势尚不稳定，不能公开召开国际代表大会，便决定于9月份在伦敦召开秘密代表会议<sup>①</sup>。

退居洛迦诺的巴枯宁看出，危机的时刻就要来临了。

〔巴枯宁8月初在给同盟成员的信中说〕我们在日内瓦的卑鄙的敌人和德国的独裁共产主义者结合在一起，事先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就要发动一场疯狂的进攻了，其矛头所向不仅仅是同盟，而且是整个汝拉联合会，其目的是把唯一在瑞士代表国际精神的联合会从国际工人的大家庭中开除出去。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157—160，174—177页。

1871年7月，巴枯宁开始起草关于同盟的一个历史性的长文件，但这个文件的计划十分庞大，写了一百四十一页停下来时，仍在前言上徘徊，尚未提到同盟。目前，他又开始写关于同盟的另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把同盟一直追溯到巴塞尔代表大会，但报告既未发表，也未写完。因为其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情证明，如果他本人不在场，失去了他的鼓励，同盟的力量是很薄弱的，地位也是很很不稳定的<sup>①</sup>。

巴枯宁退居洛迦诺快两年，离最后一次去日内瓦也有一年光景。在平庸的茹柯夫斯基的领导下，同盟已经减少到只有一小撮精神不振的人了。他们无意进行斗争。即将在伦敦召开的代表会议的消息虽然唤起了巴枯宁的好战精神，但却使他们感到沮丧。1871年8月6日，这些吓破了胆的革命者悄悄地在日内瓦开了一次会，决定解散同盟，以避免麻烦。巴枯宁间接地得知这项提议时，当天就写信表示抗议；当他得知这已是既成事实时，就大发雷霆。巴枯宁的暴怒比总委员会所造成的恐惧更为灵验，这些玩忽职守的人取得了一些法国流亡者的支持，又开了一次会，匆匆忙忙组成了一个新的支部，取名“宣传及社会革命支部”，这种做法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仅仅取消同盟这个名称是不能使马克思主义者满意的。况且，这个新的支部还没有像其前身那样得到总委员会的正式承认<sup>②</sup>。

1871年9月中旬，伦敦代表会议终于开幕，此时，圈套已经确定无疑地做就了。吴亭和巴枯宁的另外一个死敌代表日内瓦出席会议。汝拉支部由于不服从总委员会的决议，并且拒绝取消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名称，因而未受邀请，就写信来表明他们的立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坚强领导下，代表大会奋力发起反对巴枯宁主

---

① 《巴枯宁文集》，第6卷第17—99，161，171—280页。

②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177—186，218页。

义者的运动。再次肯定要参加能够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任何政治活动的原则。代表会议禁止任何支部或支部“用宗派的名称来命名……或者用‘宣传支部’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妄想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会议还批准了总委员会的决议，承认拉绍德封少数派及其日内瓦委员会为合法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并责成多数派委员会，如果要取得总委员会的承认，就得改名为“汝拉联合会”。最后，会议指示总委员会公开否认涅恰也夫的活动，并就此事起草一份报告。这项决议交给愿意而且能胜任的吴亭去执行<sup>①</sup>。不信任巴枯宁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国际对涅恰也夫其人从来没有丝毫兴趣<sup>②</sup>。

巴枯宁主义者立即对伦敦代表会议对他们的行动作出了答复。1871年11月，他们在汝拉的桑维耳耶召开代表大会，巴枯宁没有出席，参加大会的除吉约姆外，还有汝拉的两个钟表匠施皮格尔和施维茨格贝耳。新成立的日内瓦“宣传支部”派出两名代表，一名是茹柯夫斯基，另一名是茹尔·盖得，此人后来在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曾起过突出的作用。其余代表均来自汝拉。为了使总委员会在将来的国际会议里没有任何借口把其会员拒于大门之外，大会的第一项决议就是要和总委员会的决定正式保持一致，取消引起人们不满的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名称，改称汝拉联合会。但是，大会不承认伦敦代表会议为国际的合法机构，并谴责总委员会滥用权力，独断专行，大会还决定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但根据上述原则成立的委员会只不过是起着通讯中心机构的作用。

大会的主要工作是起草一个在国际历史上很有名的文件，即《桑维耳耶通告》，这个通告印发给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的各

---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1—460页。——译注

②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202—214页。

个国际的支部，巴枯宁主义者要求立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正式向总委员会的独断专行发起进攻。

〔通告说〕必须承认已为千百次经验所证实的事实：权力会败坏所有掌握了它的人……。总委员会委员的职能已经被当成某些个人的私人财产……。在他们看来，总委员会已经变成一个政府，它便十分自然地把自己个人的学说当作国际的正式的、唯一权威的理论。其他集团所提出的与这一理论有同等价值的有分歧的一切思想，似乎都不再是合法的，都是异端邪说。

通告还说，解决办法是剥夺总委员会的专横权力，将其变成和汝拉联合会的联合委员会一样的“简单的通讯和统计局”<sup>①</sup>。

很清楚，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要求不能再拖了，自1869年以来，就未召开过国际代表大会。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不可能召开大会，1871年召开了伦敦秘密代表会议，1872年9月必须召开全体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之间要决一死战。双方都利用会前的时间磨刀擦枪。为了反击《桑维耳耶通告》，总委员会于5月份发表了题为《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小册子，这篇文章出于马克思的手笔，用马克思最拿手的批评风格写成。巴枯宁说，“达摩克里斯头上的那把剑架到我们的脖子上了，但这不是一口剑，而是马克思惯用的武器，一堆破铜烂铁”，并且看得很清楚，这本小册子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死死地支配着总委员会”。在巴枯宁主义者方面，处事认真的吉约姆却坐下来起草《汝拉联合会的大事记》，到下一年9月才写完第一部分<sup>②</sup>。

---

①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232—241页。

②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294—296页。

比这本冗长的正式的小册子的写作更为重要的是双方都试图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得到多数票。《桑维耳耶通告》不但在意大利而且在西班牙都为人接受，得到同情。马克思在不大出名的德国和美国的各国际支部进行游说，请求这些无力派代表出席大会的支部给他以空头委托，算作他可靠的支持者。但是，马克思不单单是依靠多数，他不但要在投票中占优势，而且要使其对手威信扫地。在代表大会上对抗巴枯宁的事实主要是马克思经过不懈努力所得到的两点证据。

马克思在西班牙获得了重大成就。他早就怀疑在国际内部存在着巴枯宁建立的秘密同盟，并且很清楚，如果这一组织存在的话，其力量是在西班牙。马克思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出生在古巴的法国人保尔·拉法格。拉法格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可以冒充西班牙人。1871年底，马克思派他到西班牙去秘密调查和组织反对巴枯宁派的运动。于是，拉法格就把自己的名字翻译成西班牙语的形式，称为帕布罗·法尔加，他把这件差事干得很漂亮。他在马德里成立了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分部，这个组织还选派他为出席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不但弄到了几个西班牙秘密同盟章程，而且还弄到了巴枯宁给他西班牙追随者的一封信。这些文件就足以使马克思相信，他的怀疑是完全有根据的，他反对巴枯宁这件事被证明完全是正确的。1872年7月，拉法格从西班牙回来后，总委员会便于9月2日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sup>①</sup>。

除了拉法格得到的西班牙文件以外，马克思在其武库里还有另一件武器，那就是关于涅恰也夫给柳巴文的一封信。这封信曾使巴枯宁停止了把《资本论》译成俄文的工作，此信在瑞士的俄国人侨居地区流传颇广。吴亭肯定在某个时候把这件事告诉了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503—504页；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272—277，289页。

马克思。现在，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马克思认为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得到这封信，那就是反对巴枯宁的一件强有力的武器，因为完全有理由认为巴枯宁和这件事有牵连。马克思在俄国只有一个通信者，是研究经济的学者，名叫丹尼尔逊。1872年8月中旬，马克思写信给丹尼尔逊，要他从柳巴文那里把那封有牵连的信借出来<sup>①</sup>。这样看来有点玄，但却成功了。柳巴文曾受过巴枯宁的怠慢，对此耿耿于怀，就把那封有牵连的信交出来了。于是，马克思口袋里装有有关的文件，得意扬扬地前往海牙，信心十足，定能制服对手<sup>②</sup>。

事情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种种手段虽使巴枯宁主义者吃了苦头，但是巴枯宁主义者自己所犯的错误却使他们吃了更大的苦头。1872年8月初，意大利二十个国际支部在里米尼召开代表大会，目的是成立意大利联合会。意大利人全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写信向巴枯宁热烈致意，并用只有巴枯宁才能赞同的字眼来谴责总委员会的专制。于是，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巴枯宁不走运的是，这些愣头愣脑的意大利人被自己善辩的才能搞得昏头昏脑，他们竟不支持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其他巴枯宁主义者，以取消总委员会的专横权力，而是和总委员会断绝关系，根本不派代表参加海牙代表大会，并作出决议，和汝拉联合会联合起来，立即在瑞士成立一个新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这个为时过早的决议使巴枯宁主义者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不但使他们不能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形成一个巩固的集团，而且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指责巴枯宁不是试图改进、而是分裂国际提供了足够的

---

①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1872年8月15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513—514页。——译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513—514页；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13，323页。

理由<sup>①</sup>。

1872年9月2日，代表大会在海牙按期召开，会场设在一座被称为协和大厅的楼里（这似乎有点讽刺的味道）。巴枯宁因为没有路费或者因身体不佳没有出席，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大会。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国际代表大会，说明这次大会的重要。大会首先审查代表资格，这项工作交给一个委员会去执行，整整搞了三天。因为这项工作既艰苦而又争论不休。有关代表大会代表权的条例理所当然地要含糊一点，并要有伸缩性，不同国家情况还有所不同。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法律禁止成立正式的、公开的国际支部。来到海牙的六十六名代表中，六十四名都合格，他们大都来自除意大利和俄国（吴亭已经离开日内瓦，脱离了革命事业）以外的各个主要的欧洲国家；有四名来自美国，一名来自澳大利亚。包括全部德国代表团和几个不知是否是法国的代表团在内的四十名代表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总委员会肯定是多数。其余代表中，严格地说，只有来自汝拉的两名代表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以及西班牙的四名代表是巴枯宁主义者。其他包括英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代表团的成员对巴枯宁的为人及其学说兴趣不大。他们只同意巴枯宁主义者反对马克思的专断这一点。代表日内瓦“宣传支部”前来的茹柯夫斯基是两名被取消代表资格中的一个。

马克思在代表大会上虽保住了可靠的多数，但情况尚不乐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革命运动还全部掌握在巴枯宁主义者的手中；瑞士的汝拉联合会公开起来反抗；由于吴亭的背叛，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失去了斗志。在过去一年里，反对派已扩展到比利时、荷兰，更糟糕的是已经扩展到总委员会的所在地——英国。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每况愈下，政治形势又不允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311—313页。



许把总委员会迁到法国或德国，也不能迁到其他国际已经扎下根而巴枯宁派的影响占优势的欧洲国家，于是马克思就迅速地、未经警告地采取了行动。大会似乎开得很正常，指派一个五人委员会调查同盟反对国际的所谓阴谋，强调无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重要性，以相当多数否决了巴枯宁主义者把总委员会变成“通讯和统计局”的提案，并授予总委员会以更为广泛的惩戒权力以对付那些敢于反抗的国际支部。在大会闭幕的前一天，马克思突然提出建议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到纽约，使人大吃一惊。无论如何，在美国巴枯宁主义者的威胁总要小得多了。总委员会即便无能但至少是正统的。这项建议使得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都陷入混乱状态。通过反复投票，才以勉强多数通过。四个巴枯宁分子弃权。实际上，这项决议不会使他们得到或者失去什么东西。马克思扼杀了国际，但也从巴枯宁主义者手中拯救了国际<sup>①</sup>。

大会还有一项议程，那就是指控同盟。由一个德国人、三个法国人、一个比利时人组成的委员会工作认真努力，以便公正地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委员会听取了恩格斯的意见，恩格斯把从西班牙收到的文件交给了委员会，还听取了总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意见。另一方面，委员会也听取了吉约姆、施维茨格贝耳、茹柯夫斯基以及那四个西班牙人的意见。证据是互相矛盾的，而且十分混乱。恩格斯凭借手中的文件和证据，说巴枯宁建立了秘密同盟，其宗旨是和国际的宗旨相对抗的，这个同盟一直存在，不但在公开的同盟解散以后，而且直到目前仍然存在。吉约姆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秘密同盟，那四个西班牙人承认以前是有个秘密同盟，但他们已经退出这个同盟了。

就是对有关证词的法律具备更为广博的知识、更为深刻了解巴枯宁心理的人也都会被这个问题难住，何况海牙委员会的成员

---

①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321—343页。

并不具备那样的条件。所以这个委员会——那位比利时的成员持有不同意见——提交给总委员会的报告既天真又文不对题。报告说，第一，秘密同盟以前是存在的，其章程和国际的章程是完全对立的；第二，巴枯宁试图建立或许已成功地建立了称为同盟的团体，其章程和国际的章程不同。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无力的。但是根据拉法格所得到的文件，还有那四个西班牙人说他们已不再是任何秘密组织的成员的声明，委员会所能做出的结论最好也不过如此而已。第三条结论的性质却有所不同，似乎已经超出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因为这条结论与指控同盟无关。但这条结论却很清楚而又显眼，这就是“巴枯宁为了侵吞别人的全部或部分财产曾使用过欺骗的手段，这就构成了欺诈。除此以外，巴枯宁为了赖账，他自己或代理人曾使用威胁手段”。虽未列出具体事实，但很清楚是暗示涅恰也夫那封信。根据这些结论，委员会提出建议（虽然其职权范围只是根据事实作出报告而不是建议采取行动）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还建议把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也开除出国际，因为“他们仍是那个称为同盟的团体的成员”——刚才已经说过这个团体目前是否存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委员会建议对西班牙代表暂免处理。

可巧的是，解开这封令人惊异的信这个谜并不困难。吉约姆和马克思都写下了看来似乎有理并且可以互相印证的声明。星期三晚上指派的委员会于星期六晚上向代表大会提出报告。星期六下午，在委员会听取了所有受到指控人的意见以及包括恩格斯在内的几个总委员会成员的意见以后，吉约姆约见了委员会的三名成员，此时，委员会已经签署了那份报告（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已经退出，第五名成员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告诉吉约姆说，他们并未取得“重大成果”。在和吉约姆谈话以后到提交报告之前的那同一个晚上，委员会听取了最后一个证人马克思的意见。三个月以后，马克思写信给丹尼尔逊，说他给委员会读了涅恰也夫给

柳巴文的信，但“严守秘密，未提及收信人的名字”，还说“那封信已起了作用”。这些话很有意义<sup>①</sup>。马克思手中掌握着王牌，即那封毫不相干的、但却可定罪的信，他把这张王牌一直保存到最后。他本来应该提出给巴枯宁定政治罪，本应用其常用的策略躲在幕后，而不是亲自出马去见委员会成员。不过，在那个事关重要的星期六下午，他一定和吉约姆一样，得知委员会尚未取得“重要成果”。唯恐其对手滑过去，马克思决定打出他的王牌，在这场争论中施加个人的影响。

有了这些因素，剖析这份有名的报告就容易了。前两条结论很可能是委员会在听取马克思的意见之前就起草好了，这两条结论就是委员会的成员星期六下午告诉吉约姆的那两条，不是什么重要的成果。第三条结论的内容含有指控巴枯宁欺骗和威胁的内容，很明显是马克思授意写成的，按照第三条开除巴枯宁的建议，按照和第一条相矛盾的理由开除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的建议肯定是听取马克思意见的结果。头两条结论是委员会单独完成的，而报告的其余部分实质上是马克思的作品。委员会由于没有时间或者缺乏情报，尚未来得及把这两部分协调起来，但关系不大。大会收到这份报告以后，立即开始表决，以大多数票通过把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议。这些决定满足了代表大会大打出手的欲望，开除施维茨格贝耳的动议也险些儿成功。第一国际历史上最后一个重要的事件——海牙代表大会宣告闭幕<sup>②</sup>。

\* \* \*

米哈伊尔·巴枯宁和卡尔·马克思是两个对立的领导人，19

---

① 马克思1872年11月25日和12月12日给丹尼尔逊的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542，547—548页。——译注

②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343—351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27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542页。

世纪后期的革命运动是围绕他们的名字和学说来分派别的。他们的学说都是在同样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都是以黑格尔为基础。两种学说都认为革命是黑格尔的肯定和否定、保守和进步之间对立的学说的产物，相信用后者来破坏前者，一种新秩序的综合就会形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定能百分之百的同意巴枯宁的名言，“破坏的欲望就是创造的欲望”，时代的（或许还有他们自身的气质的）政治需要使得他们两人都把破坏放在他们纲领的首位。

但是，就在这一点上，他们对黑格尔学说的解释上存在分歧。马克思自始至终都和青年黑格尔派观点一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并且发现阶级斗争和经济上的阶级利益的冲突是前进的动力。巴枯宁在有名的《德国的反动》一文中，把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当做自己的老师。但就在这同一篇文章里，巴枯宁给历史下了定义，用的纯粹是黑格尔学派的口气，说历史是“一种自由精神的自由的、必然的发展的结果”。他本质上仍是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如果他超过了黑格尔的范围，那也不是受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而是受到极端唯心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麦克斯·施蒂纳的影响。巴枯宁所鼓吹的绝对自由在性质上不但和马克思所主张的自由（即一个阶级反对其他一些阶级的自由，而不是那个阶级的成员互相斗争）完全不同，而且和西方自由派所主张的自由（即在穆勒的经典性的解释的意义上为资产阶级所谨慎地规定的自由）也不一样。说到底，巴枯宁的自由概念就是极端个人主义。这是浪漫式的学说的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一结论和爱走极端的气质完全一致，其发泄的途径就是个人的一意孤行。巴枯宁在理论上最疯狂地鼓吹自由，是古往今来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sup>①</sup>。

个人主义是巴枯宁社会和政治体系的本质，也是他反对马克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28，146页。

思的本质。但他的思想前后并非完全一致，即使在1867年后的几年中，他的思想并未发生本质变化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在一篇文章里否定自由意志，说善恶是“自然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绝对产物”（虽然使用“自然”这个词似乎是以假设为根据的一种狡辩）。总的来说，他承认卢梭的假定说，即如果人类未受社会和政治权威的影响，那人类本是善良的。越是原始的人，就越接近这一理想。在当今世界上，最原始的人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些“靠得住的、尚未开化的人”注定是拯救社会的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巴枯宁把他最天真的希望寄托在欧洲最不文明的俄国农民身上。和马克思一样，他相信革命必须使用暴力。但马克思相信在经过训练的、有纪律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有组织的革命，而巴枯宁却相信农民暴动或者愤怒的城镇群众的自发起义。

〔他在1870年秋季写道〕那好吧，就用无政府状态来拯救法国吧，在乡村和城镇打开深得民心的无政府主义的闸门，并将其扩大，使它像排山倒海一样滚动起来，吞没和摧毁敌人和普鲁士人。

他喜欢谈论“这些邪恶的激情，这些社会主义的激情”（特别是和涅恰也夫交往那段时间），还喜欢谈论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如果他想证明他是正确的，那他用下面的思想来证明就更合乎逻辑了：因为破坏也是创造，故这些“邪恶的激情”就其本质来说也是好的。用一位旁观者的话来说，巴枯宁的目的是“激起狂怒”，但他本人却是最和善最文雅的人。他时常能够绝对地超脱，甚至把自己置之度外。他曾对波斯特尼柯夫说，“革命者不想流血，如果他们发表文章谈到流血问题，那只是希望吓唬君主政体，逼其让步”<sup>①</sup>。

---

<sup>①</sup> 《巴枯宁文集》，第5卷第160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

巴枯宁敌视国家，直接来源于他对个人的天性的信念。他说：“行使权威必堕落；屈从权威必受辱”。他认为国家是“对人类的最恶毒的、最冷酷的和最彻底的否定”，这是因为“任何国家和任何神学一样，把人类看成根本上是坏的、邪恶的”。巴枯宁和马克思的分歧正是因为前者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而后者则是以共产主义为基础。马克思在理论上认为（因为他和巴枯宁一样，都受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派的影响）国家总有一天要消亡的；但是巴枯宁认为废除国家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不起主要作用，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马克思要夺取国家机器，而不是毁掉它，马克思的政策是通过国家“自上而下地实行解放”；而巴枯宁却认为唯一的真正的解放必须通过个人“自下而上”地取得。巴枯宁在破坏和分解中寻求自由，这对于思想上有条不紊的马克思来说简直就是极度的疯狂。马克思要用纪律和整体来寻求自由，这对巴枯宁来说似乎根本不算什么自由。巴枯宁认为，“通过国家的最高的保护性行动”不可能实现自由。他曾引用过魏特林的话，说“用武力把一群动物赶到一起，专门追求物质目的，对精神生活一无所知”，巴枯宁一定把这些话运用于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了<sup>②</sup>。

巴枯宁一心否定国家的必然结果是他否定作为推动革命前进手段的政治行动。1848年的失败使他相信，革命必须是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巴枯宁和马克思都想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但他们在方法上存在根本分歧。

---

第3卷第283页；鲍勒：《往昔》（1907年7月），第77页；坎特：《追踪涅恰也夫》，第50页。

② 鲍勒：《往昔》（1907年7月），第77页；《巴枯宁文集》，第1卷第150、158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298页；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160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23页。

〔巴枯宁在去世前几年写道〕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发展和组织工人阶级特别是城市无产阶级……的政权来达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目的。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却认为只有发展和组织城乡劳动群众的非政治的、社会的、因而也是非政权的方式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严格地说，使用政治手段去摧毁政治机构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和别的问题上一样，巴枯宁说的话前后不完全一致。1868年，他给一家法国杂志写了一封信，攻击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回避政治活动，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为政治上的胆小。一些紧紧追随他的意大利人，包括甘布齐和法奈利都成了意大利议会的议员。但在实践上，在内心深处和思想上，巴枯宁从不动摇。他和蒲鲁东一样相信，所有的政府制度都是坏的，都应加以抵制，直至把它们摧毁。自1848年以来，他一直特别厌恶资产阶级民主<sup>①</sup>。

极端个人主义也有两面性，一方面是造成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也会发展成为个人绝对论。个人主义哲学家施蒂纳的结局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唯我论者。巴枯宁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和流放西伯利亚时，曾沉溺于一些离奇的梦境，先说要把革命的专政交给沙皇，后又要转交给穆拉维约夫。现在要把这一些作为一时的过错而忘掉，那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如果说巴枯宁固执而又专横的本性不喜欢代议制政府的话，那么绝对的专政就符合他的性格了。他的确是很诚恳地否认他有当个著名领袖人物的野心。

〔他写信给阿尔伯·里沙尔说〕你对我说，我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加里波第，我不愿意当加里波第，扮演一个古怪的角色。亲爱的，我总要死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161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145页。

的，蛆虫总要把我吃掉，但我要想我的思想得胜，我想要使人民大众从所有的权威下、从当今和未来的所有英雄好汉的统治下真正解放出来。

但是，他的这些看法和他对同盟的看法一样，也是很混乱的。对于“人民大众”，巴枯宁鼓吹走向极端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自由；对于革命政党，他又要求“在集体组织和行动中绝对不能考虑个人和意志”。虽说不是在理论上，而在实际上他每时每刻都把自己放在革命政党的独裁者地位上。马克思有足够的力量取胜，他完全可以这样写道，“无论如何，无政府在他头脑里占支配地位，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清楚的概念——那就是他巴枯宁必须身居首位”。再说，1869年初，国际兄弟会内的反叛明显是由巴枯宁的独裁方法引起的。这样看来，巴枯宁的体系在根本上是前后矛盾的，这和马克思在根本上前后矛盾是不相上下的。因为马克思希望通过阶级仇恨的方法来创造一种博爱的制度。巴枯宁是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而闻名于世的。人们不大记得他还是个建立一个经过选择的、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这种想法的首创者，参加这个政党的人不但要有共同的理想，而且要无条件地服从一个绝对的革命独裁者<sup>①</sup>。

无论是米哈伊尔·巴枯宁还是卡尔·马克思，死后都没有留下一个发誓要在世界范围内贯彻他们革命原则的国际组织，因为海牙代表大会后，从其母体里分裂出来几个意见不一的“国际”存在的时间都不超过五年。马克思主义派或巴枯宁主义派虽都或多或少有点组织，但并不强大，都在除英国以外的各个主要欧洲国家里继续存在。未来的革命者究竟会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还是打起巴枯宁主义的旗帜，要预见这一点为时尚早，但是和其对

---

<sup>①</sup> 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259—26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41页。



手比较起来，马克思占有不可忽视的优势。他给他的拥护者留下了清楚的、教条式的学说。马克思主要的名著确实没有完成，但他生前出版的第一卷却包含了他的学说的精华部分，他又有恩格斯这位有能力的编辑，把他未完成的两卷的笔记整理成书。巴枯宁的学说须得从其一系列的文章、论文和小册子里摘取，而这些作品大都是为特殊场合或目的而写的，并且大都没有完成。几乎所有的这些作品都前后矛盾而又有许多难解之处，在最后修订本里（如果巴枯宁还有能力修订文章的话）也许都删去了。有些人对同时代人的影响靠嘴说，靠称之为人格的那种难以捉摸的天赋，巴枯宁和这些人有着同样的命运。那些在巴枯宁生前了解他的人总不会忘记压倒一切的力量是什么意思，要把这一点传给后代人是不可能的。

巴枯宁对后来历史的影响远远没有马克思大，而且这种影响很难精确估计。巴枯宁这个名字在俄国长期受到革命派的尊敬，但是和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共同承担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革命党人并非巴枯宁主义者。他们在思想上当然更接近巴枯宁而不是马克思，因为他们把重点放在冒险行动上，而不大重视哲学理论，并且相信，革命可以通过一群坚定的阴谋者来完成。但是，他们不接受无政府主义的纲领。他们鼓吹暗杀君主和大臣，巴枯宁却不同意这一点，以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为最著名代表的俄国理论方面的无政府主义学派倾向于把无政府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结合起来，巴枯宁肯定会敬重这种学说的。巴枯宁的影响在西班牙比在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影响都持久得多，在这个国家里，无政府主义乃是最有效的、最具爆炸性的信条。1936年西班牙内战前夕，无政府主义仍是工人运动最有力一派所遵循的学说。巴枯宁死后许多年，意大利工人运动继续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但是在意大利革命理论中的个人主义的传统不是以无政府主义，而是以革命的专政而告终的。如果巴枯宁在意大利历史上有地位

的话，那就是他是法西斯的一个方面的无名的鼻祖之一。聪明的政治理论家可以在法西斯专政的国家和巴枯宁在西伯利亚认为是穆拉维约夫创造的“合理的”、“铁一般”的专政之间发现奇妙的类似之处，并且还会争辩说，当代无产阶级专政和法西斯专政之间的斗争是卡尔·马克思和米哈伊尔·巴枯宁在历史上的斗争的最新表现形式。

使第一国际分裂的那种争吵的确比两种对立革命理论之间的争论更带有普遍性。这种争吵说明人类精神的对立和相互补充这两种表现形式之间的悬殊。马克思以政治家和管理者的眼光来看人，他所关心的不是个人，而是群众。他把迄今一直是政府特性的秩序、方法和权威引入革命理论和实践中去，从而为有纪律的革命的国家打下了基础。巴枯宁是个幻想家和预言家。他所关心的不是群众，而是个人，不是制度，而是道德。他一生没有具体的成就。他的朋友威卢博夫说：“他终身扮演了西西弗斯的角色<sup>①</sup>，不断地为政治和社会革命作准备，但这些革命却又不断地在他肩上滚下来”。但是，说他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又几乎是不恰当的。因为整个成就这个概念与他的性格和目的是不相容的。赖歇尔曾问过他，如果他成功地实现了他的计划，创造了他想要创造的一切，那他将干些什么呢？巴枯宁回答说，“那我将立刻开始又一次摧毁我所创造的一切”。巴枯宁是自由精神在历史上最完美的化身之一。这种自由既不排除放纵行为，也不排除怪诞的念头，它不容忍任何人类制度，是没有实现的，也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但却被普遍地认为是人类最高的表现和抱负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sup>②</sup>。

---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西西弗斯，是个暴君。死后堕入地狱，被罚推一巨石上山，而每当推到山顶时，巨石就滚回山下。“西西弗斯的角色”，意即徒劳无益者。——译注

② 威卢博夫：《欧洲通报》（1913年2月），第48—49页；伊尔：《北方通报》（1898年4月），第179页。



第 六 卷  
第 六 年



“只有一个安慰：死期将近。丧钟已经敲响——走出钟楼吧。”

巴枯宁给奥格辽夫的信

(1874年11月11日)



## 第三十二章

### 最后的计划

关于巴枯宁私人生活的轶事一直传到1871年初夏，那时，他的经济状况暂时好转，但持续时间不长。经费的短缺妨碍了《德意志专制帝国与社会革命》第二部分的发表。1871年上半年几个月的绝望情绪在同年10月的日记中反映出来了。10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最后十个法郎用于购物。没有收入，怎么办？结欠三法郎三十五生了”。到11月24日为止，全家人已经两天没有肉吃，蜡烛和火柴快用完了。很明显，此时巴枯宁考虑的是米珠薪桂，而不是那些马克思急于要归咎于他的反对国际团结的阴谋。

家里别的烦恼也接踵而来。1871年11月1日，安冬妮得到她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唯一的弟弟去世的消息。据她丈夫的日记记载，她“近乎发狂了”。她胡思乱想，担心其双亲和妹妹的安危。丈夫“最后的二十五法郎”都用来给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打电报了。此刻，她的悲痛变成了无法抗拒的欲望，想重新回到她离别九年的遥远的故乡，叙叙天伦之情。整个冬天都忙于安排和准备。1863年初离开普列姆希诺庄赴伦敦时，她曾受命答应不再想回俄国，但俄国政府对她这次归国没有表示反对，这种目鸣得意的态度也许表示俄国政府不再把巴枯宁当成严重危险了。1872年6月的最后一天，安冬妮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洛迦诺赴俄。巴枯宁一直陪她到巴塞尔，7月3日在那儿告别。在巴枯宁记得很简要的日记里，颇带感情的写道：



3. 分别，分别多久？一年还是永远？安冬妮上午八点四十五分去法兰克福（持经卡塞尔去柏林的通票）。

老头孤身一人，他忍受不了回到洛迦诺后的孤漠，去湖畔城市苏黎世住了几个月。这是他三十年前和海尔维格来瑞士时的第一个住处。但是他目前住在苏黎世不是出于感情上的回忆，而是由于下述原因<sup>①</sup>。

1870年夏天与涅恰也夫的争吵以及半年后豪侠的波斯特尼柯夫上校返回俄国使巴枯宁完全断绝了和祖国的联系。在他的俄国朋友中，老朽的奥格辽夫和懒惰的、头脑迟钝的茹柯夫斯基流亡时间太长，对当代俄国情况一无所知。自从里昂失败以来，他没有见过奥捷罗夫，曾在头年秋季拜访过他的扎伊采夫是无足轻重的年轻一代革命者。这些人物都已成为过去。看来巴枯宁好像永远不会再和本国人和操同一语言的人有什么积极的政治联系了。但是正当近乎绝望的时候，一群刚刚到达的俄国的青年人闯入了他的生活，并于1872年夏天，中断近两年之后，又一次把他拉入俄国革命的密谋中去了。

这些新来的人中最最重要的一个是在涅恰也夫事件最后几天在日内瓦第一次见到的那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巴枯宁认为用他来填补涅恰也夫留下的空缺似乎再合适不过了。这个人的真名叫米哈伊尔·萨任，但他去过美国，化名阿曼德·罗斯，他的革命同伙都这样叫他。罗斯有坚强的性格和支配一切的欲望。对巴枯宁似乎有着特殊魅力，因为他自己的精力日渐衰退。具有魅力的神秘的面纱掩盖了罗斯所有的活动。他常常身负神秘使命，数月不见人影，然后又突然不告而归。他去过伦敦，去过巴黎（巴黎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228—230，301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325页。

公社时期，他在那里），去过巴尔干半岛诸国，甚至还到俄国去过一次。在1871—1872年那个令人沮丧的冬天，他和巴枯宁联系最多。还常常借点钱给巴枯宁。在以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他仍然是巴枯宁生活中影响最大的人<sup>①</sup>。

但是，使巴枯宁重新从事俄国活动的直接动力来自另一个方面。1871年夏，有两个名叫霍尔施坦和奥尔施尼茨的激进派青年学生，由于参加政治示威被彼得堡大学开除，前来苏黎世就学。1872年3月，霍尔施坦来到洛迦诺，拜访这位久负盛名的革命老战士。次月，奥尔施尼茨由另一名青年学生拉里陪同，来到离湖只有几个小时行程的临近小城阿罗纳，拉里曾和涅恰也夫有过联系，刚刚刑满，从彼得—保罗要塞出狱。奥尔施尼茨和拉里通过霍尔施坦收到了巴枯宁恳切的邀请，要求去见他。1872年4月22日，巴枯宁的日记里记载了他们的到来<sup>②</sup>。

巴枯宁孤身一人，安冬妮和孩子们已经去缅甸的姆罗克兹柯夫斯基去了。由于他很孤独，新客人备受欢迎。近两个星期以来，这三个年轻的俄国人是家里的常客。开始时，出了一点小小的不快。拉里天真地谈到他和涅恰也夫有过联系，巴枯宁面带怒色反驳说，他必须在和涅恰也夫的友谊与和他的友谊中选择一个，因为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据拉里自己解释说，他并非特别想和涅恰也夫再保持联系，因为他不同意涅恰也夫所采取的方法。然而，他对巴枯宁的最后通牒也很反感，在上床睡觉时，大声说他次日就要离开洛迦诺。但是，第二天早晨他还没有起床，巴枯宁的“巨大体型”，在霍尔施坦和奥尔施尼茨的陪同下出现在他房间里了。他们讲和了。那个争论不休的涅恰也夫问题很明显并没

---

① 罗斯：《苦役与流放》（1926年），第5期第10—12，18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25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114页。

②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205—206页。

有解决。唯一的障碍就这样消失了。巴枯宁把这三位客人吸收加入“新成立的巴枯宁派无政府主义者团体”。他又一次享受了几乎被忘却的快乐。他起草纲领和章程，并念给这三位对他钦佩备至的客人听。当三位客人终于提出要离开时，整个头天晚上都花在制订密码上，以便他们将来互相联系。毫无疑问，要探求“这个新成立的团体”和同盟或国际是什么关系是徒劳无益的。拉里声明说，巴枯宁把他们都“当作国际兄弟会的成员，而我们的罗斯同志就是搭桥人”，要了解这个声明的意思是什么也是不可能的。

拉里、霍尔施坦和奥尔施尼茨刚走，另一位不速之客从苏黎世来了，他是塞尔维亚的革命者，名叫赫尔瓦查宁<sup>1</sup>。自1848年以来，巴枯宁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土耳其斯拉夫人的解放事业。但是，他倒是很愿意听听这个吸引人的陌生人讲些什么，也愿意重温一下把受压迫的斯拉夫弟兄编入革命事业队伍的旧梦。他的思想很自然地从小塞尔维亚人转向波兰人，因为波兰人还他记忆犹新。在现存的文件中还没有波兰人去过洛迦诺的记载，但是，1872年6月8日，巴枯宁在日记里记道，他正在起草一份“波兰的纲领”。他内心深处的回忆正在唤起他以往的精神，对其暮年尚存一线靠不住的希望。这些奢望只有在苏黎世才有可能实现。既然安冬妮已经离开他，又无确定归期，他就去苏黎世了<sup>2</sup>。

\* \* \*

70年代初期，俄国大学里对革命者和激进派的迫害达到高潮，数以百计的俄国男女学生逃往国外，当时，苏黎世大学威望尤高，故苏黎世可与日内瓦相匹敌，并且超过日内瓦，成为青年流亡者避难的天堂。大学附近的奥伯兹特拉泽区是“俄国区”，在那里

---

1) 曼努伊洛·赫尔瓦查宁(1849—1909)，南斯拉夫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加入巴枯宁派在苏黎世的斯拉夫人支部，曾参加1875年起义。——译注

2)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206—207页

用俄语比别的地方都多。巴枯宁身材与众不同，夏天戴一顶配有红色飘带的宽边大草帽，人们都认得出他。他的年轻同胞和他完全合得来。他所到之处都会听到人们急切地谈论革命的前途，整个气氛都鼓舞着他的雄心勃勃的希望。巴枯宁和赫尔岑一样，从不轻视和反对新一代人。他欢迎这些年轻的革命者，把他们当成他年轻的好动时代的同志们的可靠接班人，他们很乐意地把他奉为神明和楷模。他刚到不久，有一天和他一帮拥护者到穷学生经常光顾的一家饭馆去吃饭，其中有个年轻的俄国女子，她对巴枯宁被人们簇拥着、当成英雄来崇拜的气氛有一段生动的描写：

门大开着，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的巨大身影出现了，顿时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巴枯宁。引人注目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面对着那些挑战的目光，他落落大方；他神态自若、步履稳健地走到房间尽头就坐。全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谁也没有注意那些跟随他的法国人、西班牙人、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

他很潇洒地一会儿和这个说话，一会儿又和那个寒暄，时而用德语，时而用意大利语，时而用法语，时而又用西班牙语。但总的来说，还是俄语用得最多……

他今天兴致勃勃，回忆他的年轻时代，回忆莫斯科，回忆和别林斯基的友谊。每个人都在倾听他那流畅的、高雅的谈吐。不但和他同桌的人保持庄重的、甚至有些讨好的肃静，就是我们这桌人也默不作声，虽然他们都为自己没有勇气开口而内心有些自咎。

饭后，巴枯宁转向写这篇回忆录的作者，请求允许他吸烟，这一陈旧的客套当场使得较为先进的人士甚为惊异。使人更为吃惊的是巴枯宁竟责备在场的一位女士喝酒，说他不能容忍女人喝酒和抽烟。要是别人这样做，这些有见识的年轻人本来不会容忍这类事情——普列姆希诺庄仅存的这些不合时宜的遗俗，但他们

唯独容忍巴枯宁这样做<sup>①</sup>。

巴枯宁也许从未享有这样高的声望和受到如此崇敬。但他制订的宏伟计划一条也没有实现。他刚来苏黎世时和那个塞尔维亚人赫尔瓦查宁住在一起。来到苏黎世三天以后，他在日记里提到：“成立了斯拉夫支部”之事。三年前，在涅恰也夫还没有走的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里，他曾在日内瓦会见过保加利亚革命派的代表团。1870年，一个名叫卡拉维罗夫的保加利亚人去洛迦诺拜访过他，但这个新支部里却没有一个保加利亚人。苏黎世最大的塞尔维亚人团体里的成员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什么作为，推动力只有来自巴枯宁，支部的纲领是由他一手炮制的。拉里估计支部有六、七个“多少有些觉悟的成员”，他本人、奥尔施尼茨和霍尔施坦当然也包括在这个少得可怜的人数里。甚至巴枯宁对支部也一直不抱幻想。

〔他不久给拉里写信说〕我们必须有一个斯拉夫支部，尽管它不不合理想。以它作为我们在斯拉夫人中开展工作的核心；再说，我们在苏黎世得就地取材。

斯拉夫支部和巴枯宁创建的许许多多组织一样，除了他自己的乐观主义想象之外，根本没有生命力。他人一走，支部就无影无踪了<sup>②</sup>。

---

① 克鲁泡特金：《一个革命者的回忆》，第2卷第51页；伊尔：《北方通报》（1898年4月），第174—176页。

②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301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49，499—503页；拉里：《往昔岁月》（1908年10月），第158—159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223—231页。弗尔柯夫在《克里斯托·波第夫》（索非亚，1921年版）里所收集的关于巴枯宁和保加利亚革命者的接触的证据是没有说服力的。

巴枯宁和波兰人打交道同样没有成功。虽然原因不同。在苏黎世有个相当活跃的波兰社会民主团体，书记是个画招牌的匠人，名叫阿道夫·斯特姆普柯维斯基。巴枯宁认为，要是把这个团体改组成汝拉联合会和国际的一个支部，倒是个好主意。于是，他就按照巴枯宁主义的路线给这个团体起草了新的纲领。他提议创办一份波兰杂志，他理所当然地是杂志的赞助人，甚至还写了一篇文章，并且表示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给文章命题为《请君命题》，文章开篇的风格可与1847和1863年那些非凡的日子相媲美：

贵族统治的波兰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民的、农民的和工人的波兰将从废墟上建立起来……但是，只有农民革命，劳苦大众的大起义，而不是贵族的反叛，才能使波兰获得自由。

遗憾的是，固有的困难情况又发生了，而且还是一些无情的、基本的历史事实，这些困难情况曾使他在1847年与波兰的第一次接触没有成功，并且破坏了他对1863年波兰起义所作的努力。苏黎世的波兰人以及巴黎、伦敦和斯德哥尔摩的波兰人都一样，不愿埋葬“贵族的波兰”，也不愿把阶级斗争的原则运用于波兰的解放事业。巴枯宁不承认那些“历史权利”，而波兰人正是以此为基础，对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提出领土要求。他宣称，“波兰领土不超过波兰民族承认自己是波兰人或希望成为波兰人的那些地方”，这时，波兰人觉得应当提出抗议。那份新杂志出刊了，但没有刊登巴枯宁的文章或者说是纲领。巴枯宁及其三名代表不但退出了团体，而且要求索回他们捐献给该团体的六十法郎。这件事在互相指责中结束了。巴枯宁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受到教训，即波兰民族主义和世界革命原是同床异梦。从此，波兰问题就和土耳其斯拉夫人问题一样永远从他的脑子里消失了<sup>①</sup>。

<sup>①</sup>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332—340页。

1872年8月中旬，苏黎世的斯拉夫人聚居地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两年来杳无音信的涅恰也夫在苏黎世被瑞士警察发现，并且逮捕了。他是被斯特姆普柯维斯基出卖的，此人原是俄国政府的特务。三个月以后，巴枯宁告诉奥格辽夫说，他本人知道涅恰也夫在苏黎世，并曾通过中间人警告他离开苏黎世，因为警察在跟踪他。涅恰也夫轻蔑地说：“巴枯宁分子企图把他赶出苏黎世”，而无视这个警告，仍旧做他的黄粱美梦，直到警察来把他抓走。就在逮捕涅恰也夫的时候，巴枯宁正要动身前往拉绍德封，汝拉联合会要在那里召开代表大会，选派代表出席海牙代表大会并起草指示。他在伯尔尼停留一下，向古斯塔夫·福格特（这时已当上了联邦议会议员）恳求不要引渡涅恰也夫，但没有成功。早在两年前，瑞士当局认定涅恰也夫不是政治避难者，而是罪犯。十月底，涅恰也夫被引渡到俄国，他的命运和巴枯宁以前所遭到的命运很相似，这使老人很悲伤。

〔他给奥格辽夫写信说〕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给我造成——而且是有意识地——这样大的伤害，但我还是为他难过。此人有非凡的精力，我和你初次见到他时，他对我们备受苦难的民族充满热爱，为我们民族的长期痛苦而担忧……哎，他完了。

涅恰也夫在彼得堡受审，坚贞不屈，十年后死于彼得—保罗要塞<sup>①</sup>。

正当涅恰也夫的命运安危未定的时候，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传到了苏黎世，这并非完全出人意料。但是，开除巴枯宁和吉约姆以及对同盟的谴责需要进行激烈的反击。于是，巴枯宁分子开

---

<sup>①</sup>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340—341页；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316页，第3卷第53页。

始在苏黎世集会，出席里米尼代表大会的几名意大利人已经到达，四名西班牙代表已于1872年9月11日从海牙回来，此后三天一直进行讨论。巴枯宁在日记中又提到建立另一个“秘密国际组织”的事，通过了无疑是他自己起草的章程。还订于9月15日在汝拉的圣伊米耶召开代表大会，处理公共事宜。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将出席大会。

代表大会按预定日期召开。苏黎世代表团成员中除巴枯宁本人以外，有五名意大利人和四名西班牙人，其他代表中有代表汝拉的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三名法国流亡者，其中一名不可思议地代表国际的两个美国支部。代表们一致反对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组成自由国际联盟联合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像总委员会那样的官僚机构，而是“友谊、团结和相互保护的条约”。他们大胆地宣称：“消灭一切政权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并通过了一系列阐述这一基本原则的决议。这一持有不同意见的无政府主义国际就这样正式成立了。巴枯宁插手大会的决议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并没有什么争议，议程都正规而又平常。第二天晚上，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代表们都从容不迫地回到苏黎世，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又在那里各自回国<sup>①</sup>。

但是，巴枯宁和海牙代表大会的关系并没有结束，因为他多年来越来越感到受到了人身攻击。对于指责他诈骗他人财产一事，不能不作出答复。从圣伊米耶回到苏黎世以后，他召集俄国朋友开会，帮助他们起草一份维护自己荣誉的抗议书。抗议书回顾他从西伯利亚回来后，一直进行着一场针对他的系统的长期的“马克思一伙的诽谤”运动。目前对他的指责明显地是这场运动的顶峰。当时由于涅恰也夫陷入“不幸的境地”，与会者未能详细讨论这次对巴枯宁的新的攻击，但是，他们确信，对于“如此下流的阴

---

①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1—10页。



谋，如此公然地违背正义的最基本原则的行为”，每个正直的人都会深恶痛绝；他们还坚信，无论怎么说，在俄国“巴枯宁极为受人崇敬，又极为有名，决不会受到诽谤”。在抗议书上签名的有：拉里、奥尔施尼茨、霍尔施坦、旅居苏黎世的一个俄国人斯米尔诺夫以及特地从洛桑赶来的罗斯。然后抗议书又寄到日内瓦，让奥格辽夫、奥捷罗夫和扎伊采夫签名，1872年10月4日发往布鲁塞尔《自由》杂志，这家杂志曾发了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份抗议书还刊登在汝拉联合会的月刊《简报》上<sup>①</sup>。

巴枯宁为自己辩解的欲望尚未得到满足。在“马克思、吴亭以及他们一伙德国犹太人”对他进行诽谤性攻击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含沙射影地说他从巴克哈米蒂也夫基金中捞了一笔。马克思曾写信给恩格斯说（而且很可能相信），巴枯宁从赫尔岑的遗产中，“每年获取二万五千法郎的宣传基金”。巴枯宁当时又起草了一项声明，他恳求奥格辽夫当着证人的面签字，说他奥格辽夫已把巴克哈米蒂也夫基金转交给涅恰也夫，巴枯宁一个钱也没有拿，而且还要说明涅恰也夫收钱时巴枯宁甚至不在场。这后一点声明显然不是事实。巴枯宁一旦气愤起来，记忆力就不好，再说，也不能再把奥格辽夫看成是个负责任的人。附有奥格辽夫签名的、巴枯宁起草的声明的手迹还存在奥格辽夫的档案文件里。目前已无法证明巴枯宁是否收到过声明的副本，如果收到了，是否起过作用也不清楚。

巴枯宁的俄国朋友发出的抗议是他旅居苏黎世的最后一次公开行动。一个星期以后，他回到洛迦诺过冬。他年事太高，又很劳累，不适合过一个政治活动家的生活。洛迦诺和苏黎世相比，环境安静，气候温和，生活费用也低。但这次回到洛迦诺，退居意大利这座湖滨小镇，意味着他实际上退出了政治舞台，虽然他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12—13页。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已经消亡了。在圣伊米耶代表大会上成立的那个替代性的组织也没有成功，他最后一次进行的波兰试验也是一败涂地，“斯拉夫人”支部还称不上是场闹剧。一年来，他并没放弃斗争，还在虚张声势地为革命事业进行狂热的活动。但这最后一年只给他带来了痛苦，而且一事无成。

\* \* \*

自1872年10月至1873年9月，巴枯宁在洛迦诺过着很平静的生活，他先住在阿尔伯果德尔加罗，后来扎伊采夫一家人在洛迦诺定居，他就住进了他们租下的一幢房子的底层楼中。他重新开始（后来又放弃了）写《德意志专制帝国与社会革命》的第二篇。他和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追随者大量通信，并常常接受意大利追随者的来访。但他的重点仍然集中在俄国事务上，他继续从洛迦诺指导他在苏黎世的代理人的活动。他离开苏黎世不久，一位有名的俄国流亡者彼得·拉甫罗夫来到此镇。拉甫罗夫时年五十岁，是位数学教授，于1867年作为危险的激进者被放逐出彼得堡，三年后逃出俄国，移住巴黎。他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个革命者，其观点和赫尔岑一样，属于很有教养的折衷主义，不喜欢走极端，他没有赫尔岑那样的文学才华，但他的主要抱负是要仿效评论家赫尔岑，创办杂志，以代替《钟声》，作为开明的俄国观点的喉舌。1870年夏，米哈伊尔有一阵子想自己重办《钟声》，此时，协商成功，拉甫罗夫参加进来。拉甫罗夫深知苏黎世当时有很大的、政治上也很活跃的俄国人居住区，于是就在1872年到了那里，进行实地考察。

拉甫罗夫很快发现，此时苏黎世每个俄国青年都口不离米·巴枯宁。他本人有条不紊的本能根本没有沾上无政府主义的污点。但是，为了回答那些说他的纲领还不够激进的人的反对意见，他重新起草纲领。他这样做了，那么，他和在苏黎世有影响的巴枯宁派妥协，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随后进行的谈判的细节至今尚不

能弄清罗斯、拉里和拉甫罗夫本人的那些矛盾的报告。电报不断地来往于苏黎世和洛迦诺之间，12月，罗斯去找巴枯宁讨论和拉甫罗夫合作的条件。在杂志的方针上，无论如何的口头上双方都似乎表示要作出让步，但在更为关键的经营管理上，不可能达成谅解。拉甫罗夫所寻求的是助手和撰稿人，而不是合作者；罗斯所要求的是在编辑部中谋求一个职位，作为巴枯宁派支持杂志的代价。在这一点上谈不上有什么妥协。1872年12月19日，巴枯宁在日记中满意地写道：“罗斯的信写得好：和拉甫罗夫决裂”<sup>①</sup>。

尽管这次有点扫兴，拉甫罗夫还是把杂志办成了，第一期于1873年4月出刊，苏黎世的俄国青年分裂成巴枯宁派和拉甫罗夫派，双方在一个俄文图书馆的所有权问题上争吵得很厉害。巴枯宁在洛迦诺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场争论的命运，并于1873年2月写信给拉里暗示说，拉甫罗夫派的成员大都是“亚洲佬”和间谍以及“诸如此类的可疑人物”。至于说拉甫罗夫本人，巴枯宁以前就认为他是头驴，现在又把他看成是头猪。4月里，一个鲁莽的酒鬼——年轻的巴枯宁分子索科洛夫和以前是巴枯宁的信徒现在是拉甫罗夫的秘书斯米尔诺夫动手打起来了，于是引起轩然大波。苏黎世俄国人居住区里的大多数人都站在斯米尔诺夫一边。还有传说要向当局提出申请，把不守秩序的巴枯宁分子驱逐出苏黎世区。巴枯宁被罗斯请到苏黎世，拜访了住在斯米尔诺夫公寓里的拉甫罗夫，据罗斯（他并不在场）说，拉甫罗夫对巴枯宁派不参加他的杂志工作提出反诘；巴枯宁则以他那“灵活的”头脑嘲弄拉甫罗夫。敌对的两派的名义上的领导人的会见，似乎暂时减轻了对立。但拉甫罗夫和巴枯宁格格不入，会见不会使这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52—54页；罗斯：《苦役与流放》（1926年），第5期第14—15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233、244—252页。

两个人之间产生什么友好的感情。拉甫罗夫在学识上自我满足，不可能受巴枯宁那种粗暴的、混乱的夸夸其谈的影响；巴枯宁则认为拉甫罗夫是个目空一切而又令人讨厌的书呆子<sup>①</sup>。

巴枯宁派最终在苏黎世垮台了，其原因不是拉甫罗夫派的反对，而是由于内讧。巴枯宁于1872年秋天返回洛迦诺，标志着在他的主要代理人之间互相妒忌的爆发。罗斯此时似乎很欣赏巴枯宁的十足的信心，他性格的力量和很强的个人野心结合在一起，认为巴枯宁不在时，他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发号施令。这一派的其他人无疑都屈服于巴枯宁的权威，但并不准备把罗斯当成巴枯宁麾下的督军而对他顶礼膜拜。巴枯宁对这里的局势很熟悉，写信安慰带头起事的拉里，1873年3月初，拉里被请到洛迦诺。他一到达，就得知，“国际兄弟会俄国支部”（这个名称通常是不稳定的，亦无确切含意）要再次组织起来，成员包括巴枯宁本人、刚从俄国来的无政府主义者莱蒙托夫、罗斯和拉里。因为霍尔施坦和奥尔施尼茨对医学比对革命兴趣更大，被入了“另册”。莱蒙托夫计划回俄国去，在那里从事这项工作。拉里任联络员，负责和苏黎世的“成员们”联系<sup>②</sup>。

通过提升拉里，或者说让他以为他已被提升到运动内部等级之中，来使他保持忠诚的天真的企图，虽然推迟了但并没有阻止运动的瓦解。莱蒙托夫回到俄国后，马上和瑞士断绝一切往来。他认为罗斯是个背信弃义、自高自大而又自私自利的人；拉里、霍尔施坦和奥尔施尼茨不适合做革命工作；“老头子”本人虽说过去的功劳令人崇敬，但现在完全受罗斯左右。同时，在苏黎世建立印刷厂的那帮人成了争吵的原因。这三个人断言罗斯不让他

---

①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80—81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252—259页。

②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502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231—234页。

们插手印刷厂。1873年8月初，奥尔施尼茨代表他们三个人给巴枯宁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等于是最后通牒，把老头子弄得十分痛苦，进退维谷。要是在他精力充沛、情绪冲动的那些岁月里，他定会暴跳如雷，针锋相对。现在他年岁大了，图求安乐。他的温和的回信使朋友们都很吃惊。

〔他给奥尔施尼茨写信说〕你把问题已经讲清楚了，你、拉里和霍尔施坦将和罗斯断绝关系。你警告我说，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是徒劳的，并叫我在你和罗斯之间作出选择，你要我作出选择，无疑已经预见到我的答复是什么。我不可能并且永远不会和罗斯分手……但是，既然你我的决裂已经不可避免，让我们尽可能不让这种决裂妨碍我们的共同事业，因为我们仍为共同的事业工作，纲领和目标都是一致的①。

但是决裂也不是那么容易。拉里及其朋友建立了一个新的团体，称为“俄国无政府主义革命公社”。他们取得另一个印刷厂的使用权以后，发表了一项宣言，几乎逐字逐句照抄巴枯宁的国际兄弟会的纲领。正如奥尔施尼茨所辩解的那样，这个宣言的内容只不过包含了“无政府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纯原则”。但巴枯宁认为这些分裂主义者窃取了思想，便在罗斯的怂恿下，给他们的行动加上了叛逆的罪名。1873年9月，在伯尔尼开了一次争论十分激烈的会议，巴枯宁也出访到伯尔尼。因为其间又发生了一场有关经济责任问题的很不光彩的争吵，并且拖了好几个月，那场争论才渐趋消失。巴枯宁的老朋友茹柯夫斯基以及苏黎世的大多数巴枯宁分子都加入了这个新团体，使它成了俄国无政府主义宣传的最重要的核心，继续兴旺了好多年。除了盛气凌人的罗

①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502页；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94—95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234—238页。

斯以外,所有的人都抛弃了巴枯宁,所以巴枯宁仍然无依无靠,孤立无援,无党无派。在他的年轻的同胞的心目中,巴枯宁的名字仍然令人敬畏,但他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已经结束了<sup>①</sup>。

\*             \*             \*

巴枯宁去伯尔尼的主要目的(他9月和10月份一部分时间都抱有这种目的)是找他的朋友阿道夫·福格特治病,福格特有一段时间是他的医疗顾问。1873年5月是他六十岁生日,他那曾经是强有力的机体由于呆过五个监牢而受到了损害,再也不能适应他毫无规律的生活方式的需要,也承担不了他那丝毫也没有减弱的食欲。自从他住在瑞士意大利人居民区以来,除了吃他最爱吃的牛排以外,又增加了当地的通心粉或浸透油脂的煨饭。甚至在临死前几个月,他还能像小吃一样吃下一整罐头沙丁鱼,他用调羹一次整整吞下两条沙丁鱼。他的体型变得极为臃肿,外表和步态和大象近似。当他在小镇的大街上漫步时,定会引来一场轰动,他却感到很得意。同时,他也喜欢有一群顽童跟着他,大声叫喊“万岁,米哈伊尔!”铁灰色的头发仍然飘挂在他那端庄的前额上,灰兰色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但眼睛下部深度凹陷,整个面部肌肉松弛、肿胀。几年前,他患有心脏脂肪变性症,医生给他服用土的宁和马钱子。来访者都注意到,只要他有一点劳累就气喘吁吁,弯腰穿鞋时脸色发灰。安冬妮走后,他生活更没有规律了。慢性气喘病闹得他夜不能寐,整夜坐着和朋友们一起喝咖啡、伏特加和混合甜饮料,不愿意躺在床上受苦。阿道夫·福格特所开的药物对他患病已久的身体和积习已深的性格不会有什么疗效<sup>②</sup>。

---

① 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504—511页;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141—142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238—244页。

② 阿尔努:《新评论报》(1891年8月),第503页;威卢博夫:《欧洲通报》(1913年2月),第59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302—307页。

但是，巴枯宁所以希望见到福格特，健康状况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去年秋天涅恰也夫被捕和引渡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这位在1849年和1863年不顾一切地去自投罗网的人现在却开始招来某些想像中的恐惧。他相信真正的危险是瑞士当局把他交给俄国警察，让他在俄国监狱里度过晚年。要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一恐惧，使他在地球上永远有个安全的栖身之地，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取得瑞士公民权。重要的是取得像福格特那样的人的支持，因为这些人涉足伯尔尼官场，如果有危险，他们会充当保护人；当时机成熟把他吸收为瑞士联邦公民时，他们又可充当主办人。

巴枯宁急于求得他自己的人身安全，同样很自然地会通过激烈的宣传来保护别人的安全。他无疑接受了福格特的劝告，决定此时正式声明退出政治斗争。随着1870年秋季里昂和马赛失败，他活动的生涯实际上已告结束；由于国际的分裂，他和马克思之间的长期斗争已经结束；上一年他在苏黎世策划的俄国、斯拉夫和波兰的阴谋已遭到无可挽回的失败。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内确实还有一些影响，那里有可能爆发革命。1873年夏天，他想去西班牙，他在那里有许多追随者，但从未去过。他在西班牙的朋友甚至还为他筹集了一千五百法郎的旅费。要是在以前，给他买张车票他就会去，但是现在他拒绝了，说给他这点钱不够用，还是安静地住在洛迦诺。由于和马克思决裂以及无政府主义国际的建立，他在意大利的声望大大提高了。他在意大利的追随者最多，对全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来说，米哈伊尔·巴枯宁是神圣的艺术大师，是半传奇式的人物。他有一次甚至谈到要定居马耳他，因为那里是在大陆进行革命活动的合适的根据地。但是这项计划落空了，意大利仍是令人沮丧地一片平静。革命的前线再也没有巴枯宁可呆的地方了，这位沙场老将该是结束戎马生涯的时候了<sup>①</sup>。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141页；罗斯：《往日之声》，（1914年5月），第202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3卷第229页。

决定一经作出，宣布决定的机会马上就来临。1873年9月中旬，在伦敦和法国出现了一本匿名的小册子，题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大体上出自恩格斯和拉法格的手笔，内容是维护海牙代表大会关于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的决议，发表前就给国际新闻署寄出几份，9月19日《日内瓦报》发表了长篇摘要。小册子中所引的《日内瓦报》在重新引用的文件中，有几段引文出自《革命问题的提法》，这是1869年巴枯宁和涅恰也夫合作时那些忙碌的日子发表的。上述那本小册子在拥有广泛读者的瑞士一家保守派日报上发表，谈到不久前巴枯宁那些轻率的言行，对于这位无害的资产者新姿态的尊严至少是不便的，也是不利的。他写了一篇长信发表在9月26日《日内瓦日报》上，作为答复，一方面对过去进行辩解，同时也为将来进行解脱。

巴枯宁对马克思开始正面攻击，把马克思（从实质上看，并非不公正）当成伦敦小册子的作者。马克思身处三重地位：即共产主义者、德国人、犹太人，成了巴枯宁天然的敌人。他“伪装同样仇恨俄国政府，同时在和我交往中却表现出和俄国政府一拍即合的样子”；海牙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捏造”；这本新发表的小册子表明马克思准备“担当警察的密探、告密者和诽谤者的角色”。巴枯宁满怀义愤地提到《日内瓦报》前些时候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他是近来西班牙革命动乱的发起人。他说他根本不知道那本列为引文出处的《革命问题的提法》小册子，并恳求说今后有他署名的文章才能算数。说明这一原由以后，巴枯宁接着写道：

我向你们承认，所有这些使我深深地厌恶社会生活。这对我已经足够了，我整个一生都在斗争中度过，我已经疲倦了。我已经六十多岁；我的心脏病一年比一年恶化，这使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让其他更年轻的人去承担工作吧；至于我，我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力量，也可能没有必要的信心，



来继续推息法斯的石头，反对得胜的反动势力。所以我要退出斗争舞台，我只向亲爱的同代人提出一个要求：把我忘却。

从今以后，我不去打扰任何人的安宁；也让其他人不要破坏我的安宁。

这封信在瑞士引起了轰动。很少有人意识到时间的推移在这位一往无前的老鼓动家身上所引起的变化。许多友人都相信这封信是个计策，其目的在于掩饰重新发起革命活动。这位疲倦的老兵的呼吁被当成了伪装。几天以后，为了消除这些幻想，巴枯宁又给“汝拉联合会的同志们”写信，声明退出联合会和国际，这封信发表在1873年10月12日联合会的简报上，主要内容如下：

在没有向你们表示最后的谢意和同情之前，我不可能也不必要退出社会生活……

你们的胜利，自由和国际对权威主义阴谋的胜利是充分的。如果说在昨天，当这个胜利看起来还不确定的时候（虽然我自己对它从不怀疑），谁都不许可离开你们的行列。那么现在，当这个胜利已经变为既成事实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收回按他的个人的方便而行动的自由。

亲爱的同志们，我利用这个机会请求你们同意退出汝拉联合会和国际……

按照出身和个人地位来说（当然不是按同情和趋向），我仅仅是资产者，因而我在你们中间只能从事宣传工作。我深信发表有关理论问题的长篇演说（不管是在报上或在口头上）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思想可以拯救世界，最近九年来在国际内发展起来的思想已经超过了拯救世界的需要，我倒要看看有谁还能发明更新的理论。

现在已经不是思想的时代，而是行动和实干的时代了。现在最重要的是组织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如果我还年轻，我会到工人中间去，和自己的兄弟一起过劳动生活，同他们一起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这种组织应当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的年龄和我的健康不允许我这样做……

亲爱的同志们，我在离开你们的时候，对你们深表感谢，并且对你们的伟大的和神圣的事业——整个人类的事业，满怀同情。我将以兄弟般的关心注视着你们的步伐，并高兴地欢迎你们的每一个新的胜利。

我至死都是属于你们的……

写好和发出这两封信以后，巴枯宁还要做一件事，他找个裁缝，添置样式适合令人尊敬的资产者身份的服装。1873年10月中旬，他离开伯尔尼回洛迦诺，一些新的麻烦事情在等待着这位想当瑞士联邦公民的人<sup>①</sup>。

---

<sup>①</sup> 波隆斯基：《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432—438页；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142—148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333页。

## 第三十三章

### 巴郎娜塔

巴枯宁开始为取得瑞士国籍奔走时，有人告诉他，如果他成为一个房产主，成功的机会也许会大些。对于一个在理论上否认私有财产制而在实际上常常一贫如洗、难以糊口的人来说，这个建议似乎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但是巴枯宁以惊人的认真态度采纳了这个建议。他开始同朋友们商量使他在瑞士成为房地产主的途径和手段。1873年夏，使这个出人意外的奢望得以实现的天赐良机出现了。

1872年访问过洛迦诺的热情的革命信徒中有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卡洛·卡菲埃罗，此人在1871年罗马代表大会上加入了与马志尼对立的巴枯宁派。卡菲埃罗的父亲是巴列塔的一个商人，去世时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由儿子们分享。此时，卡菲埃罗已经被巴枯宁完全迷住了。他情愿用这笔横财来为他的政治思想上的老师效劳，同意用这笔钱以巴枯宁的名义在洛迦诺附近买一幢房子。这幢房子起两种作用，对于身份可疑的巴枯宁来说，它将提供一个表示他的社会地位的理想的标志，同时它将提供一个集合场所，在出现麻烦时，可以用作国际革命者的隐蔽所。严格地说，这两个目的几乎是不能并存的。但是巴枯宁和卡菲埃罗不是那种考虑周密的人；这项计划似乎是一箭双雕的高明之计。1873年夏，卡菲埃罗去意大利时，巴枯宁挑选一幢巴郎娜塔的旧宅，这幢住宅座落在从洛迦诺去贝林佐纳的路上，带有一片通向湖泊

的田地。8月，卡菲埃罗重新露面，付清了买房子的钱。巴枯宁和卡菲埃罗开头对他们刚到手的房屋象孩子一般激动，但他们发现现有的房子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它没有足够的房间供一群预期在那里集合的革命者隐蔽。厚厚的墙壁看上去像一座昏暗的碉堡，而且又破又潮。兴致很浓的买主拿不定主意，是修缮这些房子，还是在地势较高的地方新造一幢房子，犹豫了一阵之后，作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决定。及时陪同公爵夫人来访的姆罗茨柯夫斯基拟订了计划。1873年9月初巴枯宁去伯尔尼拜访福格特时，卡菲埃罗本人也已返回意大利，一个名叫纳希鲁齐的意大利革命者留下来负责建造工作<sup>①</sup>。

10月中旬，巴枯宁从伯尔尼回来后，“巴郎娜塔”的悲喜剧开场了。纳布鲁齐已经安置好了巴枯宁称之为他的“神圣家庭”的房子，这个“家庭”由他的母亲和一个声誉不佳、来历不明的年轻女士，以及两个意大利人与两个西班牙革命者组成。正如纳布鲁齐自己所讲的，他的职责是保持一份可靠的支出记录，但不是限制支出。此时所有的人，卡菲埃罗本人也不例外，仍然认为卡菲埃罗的遗产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因而任何节约的打算都是多余的，甚至是可笑的。当巴枯宁到达时，一些女信徒离开了，但是另外一些浪费十分随便。曾经考虑过，“巴郎娜塔”将能达到自立，靠农业生产供养其居住者。栽种果树花了五千法郎；另外还买了两头奶牛，两匹马，一辆四轮马车，一辆两轮马车和一艘小船。养奶牛需要一名挤奶女工；有了马不仅需要雇用一名马夫，而且要重新修理一个旧马厩和车棚。有了马车还必须修建马路，花了六千法郎。最后，为了使这个地方更加舒适，决定开凿一个人工湖。巴枯宁还考虑挖一个带有秘密通道以便逃跑的地下隐蔽所。现在没有修建巴郎娜塔实际支出的可靠帐目。但是看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96—102、181页。

来似乎用去了五万法郎；1874年4月，当卡菲埃罗拿出另一笔同样数目的款子后，巴枯宁高兴地向他保证说，这笔钱足够花到7月份<sup>①</sup>。

几个情况的结合使这个荒唐计划更糟糕了，而只得赶紧收场。巴枯宁深情地想起了不在身边的安冬妮。他从来没有甘心与她永远分离。“巴郎娜塔”为他提供了一个相称的家以便接待她。他一再对卡菲埃罗说，他“正在为安冬妮准备一个乐园”（他以某种天真的想象以为卡菲埃罗将会分享他的欢乐）。依靠卡菲埃罗的经费他更加宽宏大量了。巴枯宁唯恐安冬妮不愿离开她的年迈的双亲，建议他们参加到这个集体中来。情况含糊不清。“巴郎娜塔”是如何到手的内情除了两三个人外，对所有的人仍然是个秘密。包括安冬妮在内，人们普遍相信巴枯宁终于从他的弟弟们那里得到了他那份遗产，“巴郎娜塔”就是用这笔收入买得的。到达西伯利亚后不久生了第三个孩子的安冬妮答应同她的丈夫重新团聚，她对这笔所谓的飞来之财信以为真了。1873年10月，巴枯宁给她寄去了二千法郎作为路费（当然这是从卡菲埃罗那里拿来的钱）；由于途中耽搁太久，以为这笔钱没有希望收到了，因此又寄去四千法郎。1874年春，安冬妮收到了这两笔钱。5月底，她带着三个孩子和双亲，以及已婚的妹妹索菲娅·罗索夫斯卡踏上了从克拉斯诺维尔斯克去洛迦诺的漫长旅途<sup>②</sup>。

\*       \*       \*

在此期间，卡菲埃罗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去年冬天，他来洛迦诺时，爱上了巴枯宁的朋友扎伊采夫的弟妹奥林比娅·库图佐夫。1874年春，奥林比娅去俄国探望她的生命垂危的母亲。当她想返回时，俄国当局得悉她与革命者有联系，拒绝给她重新签发

①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102、181—183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332页。

②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181—183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332页。

护照。只有一个办法：卡菲埃罗去彼得堡，同奥莉比娅结婚，从而使她成为意大利的公民，把她带回洛迦诺。7月初他们到达洛迦诺，大约也在这个时候，在伦敦呆了六个月的罗斯也出现在那里。巴枯宁利用卡菲埃罗不在的机会买了邻近的一块地。他解释说，这块地树林茂盛，单是木材就值这个价钱。在随后的讨论中，罗斯（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解释的话）第一次要他的两个朋友注意包括巴郎娜塔在内的巨大开支。巴枯宁估计，要完成这件事，并在巴郎娜塔最终达到经济自立之前的两年间使它能维持下去，还需要五万法郎。毫不气馁的卡菲埃罗前去清理父亲的田产<sup>1</sup>。

巴郎娜塔这场戏的最后一幕就这样开场了。七月初，甘布齐在维也纳接待了安冬妮一行人，并把她们领到了米兰。罗斯被派到米兰去照顾她们的最后一段路程。1874年7月13日她们到达洛迦诺。自从巴枯宁在巴塞尔与他的妻子分别以来，正好两年过去了。他曾在日记里以疑惑的心情写道，这次分离究竟是一年还是永别。当晚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欢迎这些远方的来客。正当欢庆的时候，卡菲埃罗和他的妻子从巴列塔回来了。

现在事态正在迅速地发展。在从维也纳去米兰的路上，甘布齐怀着喜悦的心情告诉安冬妮说，意大利有谣传说，巴枯宁利用卡菲埃罗的年轻幼稚攫取他得到的遗产，并使之破产。一直相信“巴郎娜塔”是用从普列姆希诺庄得到的钱买下的安冬妮在到达的翌日，愤怒地向丈夫详细复述了这些谣传。巴枯宁立刻去找卡菲埃罗，当着罗斯的面，请求他出来否定这些不体面的风言风语。卡菲埃罗答应了，当日无话。但是第二天清晨，即7月15日，他找到巴枯宁，板起脸孔解释说，谣传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事实上他已经破产。他父亲的最后遗产绝不是用不完的，总计不

---

<sup>1</sup>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187、198页；罗斯：《往日之声》（1914年5月），第203页。

过十万法郎。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已经花掉，他既不愿也不能在“巴郎娜塔”上再多花一文钱了。他想起浪费掉大量的钱财感到怨恨，责备他的伙伴太愚蠢了，他们合伙办的事业太轻率了。巴枯宁在日记中写道：“他扔掉了友谊的伪装，大放厥词。”<sup>①</sup>

这对巴枯宁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巴郎娜塔的破产，美妙之梦的破灭，使他十分痛苦。但是更为痛苦的是他与安冬妮的处境。他不知如何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她。他曾经谎称自己现在有了一个家，有一笔收入可以养活她，她的前程有了保障，这样诱使她带着全家从西伯利亚赶来同他团聚。实际上，他无家可归，身无分文，正处在他生平最倒霉的时刻。他痛苦地沉默了十天，忧虑地思考局势。然后他作出决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他不能再体面地保持对“巴郎娜塔”的哪怕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了。7月25日，

（也许是在罗斯的压力下，罗斯是明确地站在卡菲埃罗一边的），他签署了一份字据，把“巴郎娜塔”的所有财产，“包括几头奶牛和几匹病马”，移交给卡菲埃罗。但他仍然不敢告诉安冬妮，因为安冬妮正生活在“巴郎娜塔”的愚弄人的“乐园”里，安置她的一家和家什，打算安排未来的生活。两周之后，巴枯宁写道：“15日以后的日子是真正的地狱。”<sup>②</sup>

出路只有一条，巴枯宁“下决心去死”。在他面前正好出现了英勇牺牲的机会，使他能从这种困境中及时地解脱出来。清理“巴郎娜塔”的财产不是卡菲埃罗目前呆在洛迦诺的唯一目的。他的意大利朋友委托他为预定在8月初从博洛尼亚开始并扩展到全意大利去的起义采购炸药。实际上，罗斯在瑞士买了大量炸药，奥林比娅·卡菲埃罗把炸药缝在围巾里，缠在身上偷运进意大利。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199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341—345页。

<sup>②</sup>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200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346页。

巴枯宁参与了这些谋划，也许实际上一开始就参与其事。现在他宣布，他打算亲自去博洛尼亚参加这次起义。在最后时刻，他似乎失去了勇气，在胆怯的瞬间他对朋友贝勒里奥透露，他将违背自己的意愿。但是巴枯宁最终说什么也不愿把“巴郎娜塔”的真相告诉安冬妮。甚至此时他又一次欺骗她，说他将去苏黎世访友。直到他的意大利之行结束后，她才知道此行的底细。1874年7月27日，正是在为庆祝安冬妮的到来而燃放鞭炮之后两周，巴枯宁在罗斯的陪伴下离开“巴郎娜塔”和洛迦诺去意大利。他们越过“白雪皑皑的斯普吕根”隘口，二十年前坦尼森<sup>①</sup>在那里“采了一朵雏菊”，还为此写了一首诗。这是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但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免被警察识破。

巴枯宁和他的同伴为了等候交通员把他们带过边境，在斯普吕根的小旅店中呆了两天。在这里他写下了关于“巴郎娜塔”事件的长篇报告，上面讲的这些故事就是来源于这篇报告以及其他目击者偶然的证明。这份长篇报告题目为《主要是为我可怜的安冬妮而写的申辩报告》。他把这份材料寄给贝勒里奥，要他交给卡菲埃罗，并要求他读完后再交给安冬妮。其中几处已经引用过了，最后几段是这样写的：

从洛迦诺去贝林佐纳和从贝林佐纳去斯普吕根的路上，我通宵未眠，一直考虑卡菲埃罗的事。我考虑的结果是，我不能再从卡菲埃罗那里接受什么东西了，甚至也不要他答应在我死后照料我的家庭。我不能，也不愿再欺骗安冬妮了。她的尊严和骄傲将会告诉她怎么办。对她的打击将是十分可怕的，但是我相信她的坚强而勇敢的性格会使她挺住，——或者说我坚定地希望如此。为了使我的家庭的前途至少部分地有所保障，我已经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我已经给我的弟弟们写了一封信，一封告别信，他们

---

<sup>①</sup> 坦尼森（1809—1892），英国诗人。——译注



从来不否认我有权分享属于我们共同所有的遗产。他们经常向我提出，为了把我们这份遗产变卖成现款，把这笔钱交给一个我所信任并有全权代我接受它的人。迄今为止我尚未找到这样一个人。现在通过附上的委托书，我把全部权力授予安冬妮的姐姐索菲娅。她是最合适的人了，她有主见，聪明，对安冬妮无限忠诚。

我的朋友们，现在留给我的只是死亡。再见了……。

安冬妮，不要诅咒我，原谅我吧。我将在对你和我们亲爱的孩子们的祝福中离开人世。

巴枯宁还从斯普吕根写信向吉约姆告别，因为他“正在去意大利参加一场九死一生的战斗”。巴枯宁也许忘记了，他上次给这位老朋友的一封信中宣称他打算退出革命活动，并力劝吉约姆也这样做。他安全地越过边境，于1874年7月30日到达博洛尼亚。他不指望、几乎也不愿意再回去。

在博洛尼亚，罗斯离开了他。巴枯宁在日记中写道：“罗斯行为下贱，我送他去见魔鬼！”在他们离开洛迦诺之前，他觉得罗斯站在卡菲埃罗一边。在博洛尼亚一定发生了一些争吵，但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录。巴枯宁被孤单地留在他几乎不认识的意大利革命者中间，很可能十分恼怒。更可能的是，争吵集中在经济问题上，巴枯宁期望罗斯能接济他，但并未拿到钱。争吵十分激烈并持续得很久；在随后的很少几个月中，在巴枯宁的日记中“恶棍”这个叫法经常用在这位以前朋友的身上<sup>①</sup>。

巴枯宁以泰姆布里尼的名字，以一个“多病、耳聋的靠利息生活的人”的身份在博洛尼亚秘密地住了一个多星期。他的身份未被警察识破。他的房间被用作首要的密谋者们的集合地点。起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200—204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365页。

事的时间安排在8月7日至8日的夜里。博洛尼亚的革命者预定在城墙外边的两个地点集合，来自意大利其它地方的革命者也将在那里会合。联合部队将在凌晨两点从两个城门攻入博洛尼亚，夺取各个有利的据点，包括军火库，指望在黎明时拿下整个城市。

这个精心制订的计划全部失败了。8月5日晚，一个名叫科斯塔的青年、起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被警察逮捕。原定的时间到来时，从其他城镇来的增援部队的人数没有达到原来应允和期望的数目。出现在指定集合地点的博洛尼亚人大为震惊，大多数人解散回家了。较为胆小的或声名狼籍的人隐蔽到山区，想逃往瑞士。全部计划流产的唯一后果是警察看清了危及博洛尼亚法律和法令的种种危险。巴枯宁独自一人坐在屋子里，在这决定命运的夜里没合眼，他意识到计划失败了，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把手枪装上了子弹，但他克制了自己，没有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三天以后，他的意大利朋友偷偷地把他顺原路送出了这个国家。

巴枯宁伪装成一个年老体衰的乡村教士，在一个意大利革命者的护送下从博洛尼亚到维罗纳，又从维罗纳到斯普吕根，他剃了头，戴上黑色眼镜，手里提着一篮鸡蛋，拄着拐杖艰难地走着。离开博洛尼亚之前，他给贝勒里奥发了一封短信：

我的朋友与兄弟：我惶恐地向你打听安冬妮和她父亲的消息。请告诉她，在折磨着我的一切痛苦中，最令人痛苦的是想起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离开了她。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读了我的长信（即《申辩报告》）之后，你也会像我一样地说，我没有别的选择。

旅途平安。这群旅客没有遇到什么麻烦。1874年8月14日，巴枯宁抵达斯普吕根，并把他到达的消息打电报给洛迦诺<sup>①</sup>。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204—206页。

\* \* \*

巴枯宁不在期间，“巴郎娜塔”的局势十分紧张，更加令人痛苦。他的离开切断了和妻子、家庭以及政治上的朋友仅有的一点联系；双方都肆无忌惮地相互攻击。巴枯宁的婚事中有许多情况使他的朋友们感到震惊与困惑。然而，安冬妮那种莫明其妙的性格也是激起他们深刻的本能的反感的原因。当她第一次来到伦敦时，赫尔岑怀着怀疑和轻蔑的态度接待她。吉约姆只见过她一次，但也能发现她不配巴枯宁的“过分的和盲目的慈悲心肠”。他不说安冬妮的好话。卡菲埃罗对她一点也不客气。贝勒里奥不曾伸出一个手指帮助她。罗斯则是她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安冬妮对革命事业毫不关心（或如巴枯宁的朋友们认为的那样），她常常使巴枯宁的某些注意力分散。本来应该为革命事业服务的卡菲埃罗的大笔款子却花在为安冬妮修建“乐园”上了。即使从婚姻的意义，她也从来不忠于丈夫，她对丈夫的和善和容忍是无法同她对甘布齐的温情相比的。尽管这些理由都是合理的，也不足以说明全部的事实。安冬妮对同自己家庭无关的一切事情采取冷漠、轻蔑和反对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引起了巴枯宁政治上的朋友对她无比憎恨<sup>①</sup>。

此时，这个不幸的女人处境确实是悲惨的。如果说，巴枯宁由于把安冬妮和她的一家从西伯利亚诳骗到洛迦诺来，有理由把她看作是“巴郎娜塔”事件的主要的和无辜的受害者，那么他的同事们则把她看作是首犯，不愿意放过任何机会在她身上出气。受到丈夫的蒙骗和丈夫朋友们厌恶的安冬妮，在巴枯宁出走后的两周内继续生活在虚幻乐园中，她仍然相信这房子是她丈夫的财产，而那里所有的人都把她看作是一个非法的闯入者。戏剧性的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203页；鲍勒：《往昔》（1907年7月），第77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342—343页。

局面的种种可能性很快就产生了。

7月30日贝勒里奥收到了《申辩报告》。不知什么原因促使他重抄了一份，在原件被毁掉很久以后（这份原件从未送到安冬妮的手里），这个抄本在她的文件中被发现了。贝勒里奥把原件交给卡菲埃罗，按照巴枯宁的要求，卡菲埃罗应该把它交给安冬妮。卡菲埃罗读完这个材料之后，断然拒绝照巴枯宁的要求去做。他的理由是，这份材料涉及到革命的活动，不宜泄露给像安冬妮这种没有参加革命活动的局外人，然而事实上巴枯宁非常谨慎，在《报告》中一处也未提到他即将参加的这次意大利的远征。这个问题好几天都定不下来，而安冬妮依然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住在“巴郎娜塔”。然后，贝勒里奥求助于罗斯，因为罗斯同意向这个不幸的女人披露事情的真相，但文件不给她看。唯一知道随后那次谈话内容的权威人士就是罗斯本人。他留下了两份互相矛盾的说明，一份在1904年给了吉约姆，另一份记录是他十年之后写的回忆录。第一份材料是可信的，原因是提出在先，并且具有内在的可能性，因此，这里将选用这份材料。但是其细节肯定不太确切。

安冬妮与罗斯的谈话是在1874年8月6日，贝勒里奥在场，并且是在他家的花园里。为了贝勒里奥，开始用法语交谈，可是当谈话人十分激动时，他们自然而然地用俄语对话。留下的印象是，罗斯饶有兴味地向他所嫌恶的女人揭露使她痛苦和丢脸的事实真相，这倒是个令人愉快的任务。他直率地告诉她，她无权住在“巴郎娜塔”。她反驳说，她是住在她丈夫的房子里。罗斯坚决认为“巴郎娜塔”是“革命的财产”。作为回敬，她愤然谴责他和卡菲埃罗窃取她丈夫的财产。他逐渐使她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她从愤怒陷入了麻木的痛苦之中。巴枯宁动身前签署的字据再也没有可怀疑的了。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巴郎娜塔”是卡菲埃罗的财产。安冬妮走向“巴郎娜塔”时，被这个打击惊

呆了。但是她并没有丧失勇气，甚至也没有丧失某种尊严。她很快向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屈服了。三天之后，她和她的一家带着所有的行李离开洛迦诺，前往座落在意大利境内湖边的阿罗纳。没有迹象表明罗斯是否向她说明她丈夫当时的下落<sup>①</sup>。

巴枯宁通知他安全返回斯普吕根的第一个电报既不是发给安冬妮（这个期间他十分内疚，不敢同他的受欺骗和受伤害的妻子直接通信），也不是发给贝勒里奥，而是发给他的俄国朋友扎伊采夫。接着他打电报和写信给贝勒里奥，请求卡菲埃罗到斯普吕根来见他。他身无分文，要是没有人捎给他或借给他钱，他就不能离开他的临时隐蔽所。他的信没有立即得到答复。直到8月21日，在他焦急地等了整整一周之后，罗斯出现在斯普吕根。他既没有带来现金，也没有带来卡菲埃罗的消息。他的来访毫无意义，只能使这个老人更加恨他。两天后，索菲娅·罗索夫斯卡和贝勒里奥两人来看他。在阿罗纳的安冬妮刚得到她丈夫回来的消息，就派他们来找他。确实，安冬妮对革命漠不关心，也不忠于她的丈夫，但是她与巴枯宁的冷淡关系没有排除她对这个刚愎自用的大人物的真诚而怜悯的感情<sup>②</sup>。

然而，巴枯宁仍然不能下决心回去。他的革命雄心即使在此时也没有完全消失。他轻松自在地谈到，他要再次在意大利碰碰运气。他在斯普吕根消磨空闲时光时，制订新的计划和通讯密码。他的情绪变化无常。有时他谈起想移居美国，在那里加入美国国籍；但是当他听到安冬妮想去那不勒斯与甘布齐一起生活时，似乎又想阻止妻子采取这个决定性的步骤。上个月精神上的折磨使他六神无主，思绪繁乱。他一心想见到卡菲埃罗。他的脑子仍然

---

①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209页；罗斯：《往日之声》（1914年5月）第208—209页。

②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206—207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373页。

没有理解在卡菲埃罗的财产与他的感情之间发生的急剧的变化。他的全部希望是从这位过去的朋友那里得到为实现他的计划所必须的资金<sup>①</sup>。

8月25日，他终于收到了罗斯的一封信“粗俗的信”，其中有二百五十法郎，还说卡菲埃罗9月初将在瓦莱州的锡尔见他。挑选这样一个偏僻的约会地点必须直穿瑞士境内。次日清晨，巴枯宁动身了，他永远不会再光顾斯普吕根的这个小旅店了，他在此度过了那么多令人痛苦的时光。他慢慢地走着，但是当他终于到达锡尔时，卡菲埃罗和罗斯都还没有来。一年前，米哈伊尔·巴枯宁被瑞士的青年革命者奉为名人，公认是他们的领袖和导师。现在他不得不在这两个青年朋友的命令下从瑞士的一角走到另一角，卑谦地等候他们，直到他们想来见他时为止。

撒克逊·拉·贝恩温泉离此不远，那里有一家赌场。几年前，陀斯妥也夫斯基赌瘾大发时经常出入那里。巴枯宁在过度劳累的情况下，也经不住这种诱惑，输掉了一百法郎。这对他的兴奋的神经是一种麻醉剂。

在这同时，卡菲埃罗和罗斯取道纳沙特尔而来，在那里他们拜访了吉约姆。吉约姆从他们那里第一次了解到“巴郎娜塔”的全部情况。他们把《辩护报告》的原稿交给了他（后来他毁掉了这个原稿）。不久吉约姆就表态反对他的老朋友。他断定巴枯宁在“巴郎娜塔”事件中表现出“软弱和问心有愧”。他向卡菲埃罗和罗斯保证，他赞成他们所做的一切。这样取得了吉约姆的赞成，卡菲埃罗和罗斯动身去锡尔。9月2日，他们会见了巴枯宁。卡菲埃罗给了这个老头三百法郎以备急用，并答应借给他五千法郎，期限两年，利息百分之六，条件是由安冬妮的妹妹或其他有

---

①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207、209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374页。

经济偿付能力的保证人在借款单上签名。条件并不苛刻，附带条件也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但是这次会晤必然是令人痛苦的。巴枯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冷若冰霜，我们之间的一切都过去了”。现在似乎没有什么可使他苦恼的了<sup>①</sup>。

巴枯宁在锡尔又呆了三周。在他知道安冬妮愿意收留他以前他不能回去。他用许多时间给她写了几封长信。她们全家已经从阿罗纳迁往洛迦诺，目前又在瑞士境内。如果说她曾经有和甘布齐同住的念头，那么她现在已经放弃了。然而毫不奇怪，她仍在是否同她的丈夫恢复家庭生活问题上踌躇不定，因为近来她有太多理由怀疑丈夫的诚意和明智。她给丈夫第一封信是“反常的，模棱两可的”。索菲娅·罗索夫斯卡断然拒绝充当向卡菲埃罗借债的保证人。巴枯宁突然冒出一种旧有的乐观主义。那就是靠写回忆录来挣得“几千法郎”，或“迫使”他的弟弟们支付一笔不少于四万法郎的遗产。但是，他也明白自己是个潦倒的人。如果安冬妮拒绝收留他，他决心自杀。在等待安冬妮的决定的时候，他阅读一些在锡尔能得到的法国小说，从中得到一些思想上的安慰。其中一本的书名听起来意味深长又不吉利：《我明天将自杀》。不久被巴枯宁看作是死敌的罗斯来看他，并答应在他与安冬妮和索菲娅之间进行劝解。巴枯宁在他的日记中记载有：“同罗斯一起过了一整天。完全一致。”在这几周里，他的情绪动摇不定，表现出颓唐低沉的样子。

盼望已久的请他去洛迦诺重聚的安冬妮的信终于来了。1874年9月23日，他满怀喜悦地动身了。在纳沙特尔他停了一下，去看了看卡菲埃罗和罗斯。他们会面时吉约姆和斯皮希勒尔在场。巴枯宁显然对争取汝拉的老同事的同情还抱有某种希望。他一定

---

<sup>①</sup>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376页；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209—210，223页。

已经知道卡菲埃罗和罗斯已经胡说一通。但是当吉约姆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时，这对他是当头一棒。此时巴枯宁几乎失去知觉。但是他辛酸地注意到，四个人中最受感动的是对他了解得最少而且从来也不是他的密友的那个人。当其他三个人冷眼相待时，斯皮希勒尔站在角落里，为一个老战士所蒙受的耻辱而无声地落泪。他们每月向他提供三百法郎的津贴，这笔款项由他的过去的瑞士、意大利和俄国的朋友们分担。他仍然不敢接受他的对手们的惠赠。但是他的自尊心（尽管已经遭到伤害的）使他不拒绝“贷款”。他谢绝了他们提供的津贴，请求卡菲埃罗再借给他三千法郎。卡菲埃罗重申，接受他以前提出的有一个合适的保证人的条件才同意借钱给他。巴枯宁不得不承认，他的妻妹拒绝在借据上签名，但是他仍然希望贝勒里奥会同意充当保证人。然后，他们分手了。这样他同吉约姆的五年多的友谊结束了，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sup>①</sup>。

在抵达洛迦诺以前，他在伯尔尼逗留了一个多星期。他开始出现耳聋的症状，阿道夫·福格特答应为他订购一副耳机。一位名叫申克的联邦议员接见了，以同情的心情听取了他想取得瑞士国籍并最终在世界上有一个合法地位的要求。尽管有他的朋友们的努力，瑞士没有一个州愿意接受这个声名狼籍的冒险家为它的公民。米哈伊尔·巴枯宁活着和死后都是一个无国籍的流亡者。

1874年10月7日凌晨，他抵达洛迦诺。安冬妮、索菲娅和年迈的卡萨维利·克维特科夫斯基以及两个大孩子在等候他。他以十分宽慰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一间极好的房间，温暖而真挚的友谊。”过去几周的打击已经摧毁了他对人类友爱的信念，他曾怀着胆怯的心情盼望会在家庭里受到欢迎。他的“奥德赛”<sup>②</sup>

---

①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235—237页。

② 奥德赛是著名的荷马史诗中的主人公，他曾经历了十年流浪生活最后返



已经过去了。他的狂热的激情和旺盛的精力终于耗尽了，现在只要求在平静中死去<sup>③</sup>。

---

回故乡。后转喻为长期流浪、漂泊和冒险的生活。——译注

③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258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387页。

## 第三十四章

### “房产主”之死

朋友般的接待与洛迦诺的宁静气氛，对于巴枯宁备受伤害的心灵是一个安慰。他那天生的乐天性格立即恢复了。回来两天后，他的思路就十分敏捷，给贝勒里奥写了一封信，开头就自我解嘲地引用了贝朗瑞的几行诗<sup>①</sup>：

我又回来了，忠实的人民，  
正是他们给了我一个假期，  
原谅我吧，无情的命运  
夺走了我那点思想。

经过一番思索，他把自己最近的不幸公平地归之于自己的“愚蠢”，卡菲埃罗的“木头脑袋”和罗斯的“极端卑劣”。他给罗斯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谴责他“千方百计从肉体上、道义上和社会上把我毁掉”。卡菲埃罗不过是罗斯的工具。三周以后，罗斯秘密访问俄国归来，试图再次与这位老友接触，巴枯宁直截了当地作了答复，其中提到他“在洛迦诺的和平、安宁的生活，远离了一切肮脏的阴谋和卑劣的阴谋家”。他已经把他一生中不愉快的那段经历置之脑后，但是他对那个他认为应负主要责任的

---

<sup>①</sup> 比埃尔·让·贝朗瑞（1780—1857），法国著名诗人。——译注

人恨之入骨<sup>①</sup>。

社交是巴枯宁的基本需要之一，安冬妮和她的一家从未能完全满足他的这种需要。1874年11月20日，也就是旧俄历的圣·米哈伊尔节日，他举办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宴会，贝勒里奥父子特地从洛迦诺赶来。但是他不能信任这些外来的客人。他六十一岁时，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的十八个月中，他不得不为自己寻找一批新朋友。现在在洛迦诺聚集在他周围的朋友中有个名叫彼德绍列的教授，他是马志尼的追随者，从意大利被驱逐出来后，以教意大利文为生；另一个是纳布鲁齐，他在“巴郎娜塔”悲喜剧中扮演过为时不长的角色，巴枯宁对这个事件中的其他参加者怀有敌意，但对他却不记仇；还有一个叫阿尔图尔·阿尔努<sup>②</sup>，是巴黎公社的流亡者。1875年他接受了一个名叫克拉夫钦斯基<sup>③</sup>的年轻俄国革命者的访问，此人后来以“斯捷普尼亚克”的笔名在许多国家闻名。1876年1月，贝努瓦·马隆<sup>④</sup>在洛迦诺定居（自1871年以来巴枯宁没有见到过他了），很快与尚普塞夫人同居。但是这些人都不过是萍水相逢，同他们的友谊不再像他鼎盛时期那样一见如故。巴枯宁在他生前最后的几个月中，内心十分孤独。

甘布齐常来常往，总为他准备了一间房间，但是他的到来不能给安冬妮的丈夫以多少安慰。最使巴枯宁感动的是一批当地的意大利工人的忠心，当巴枯宁向他们谈起革命事业的时候，他们听得

---

①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389—391，395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351页；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256页。

② 阿尔图尔·阿尔努（1833—1895），法国政治活动家、作家，蒲鲁东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译注

③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克拉夫钦斯基（1851—1895），俄国作家，七十年代革命的民粹派著名活动家。——译注

④ 贝努瓦·马隆（1841—1893），法国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后成为法国可能派的代表人物。——译注

入了神；当他患病时，这些人来照顾他，把一些他自己买不起的美味食品带给他吃。巴枯宁在这些用双手劳动的人中间毫不拘束。这些人也许现在是仅有的一些不是带着怜悯与轻蔑相结合的心情看待他的人，他们是他的最后一批信徒<sup>①</sup>。

法国巴黎公社社员阿尔努这时拜访过巴枯宁，留下了巴枯宁在洛迦诺的生活方式的最完整的记录。八点以后他就起身，去镇上中心广场的咖啡馆。他在这里用早餐，读报、写信、会客。身边无钱时就赊帐，甚至向女店主借钱。然而当他欠帐过多时，有时不得不转到另一家咖啡馆去。他两点钟回家用午餐，倘若有钱或赊得了帐，就带些糕点和糖果给孩子们。四点至八点睡觉。然后他常出现在安冬妮的客厅里，讲他过去的英雄事迹，以使安冬妮的客人们高兴。午夜，他回到房中，常常读书或写作到深夜，准备在第二天再一次开始同样的活动。他常常睡在木板床或行军床上。有传闻说，那顶有名的灰帽子从来没有离开他的脑袋，他总是带着它出现在公共场所<sup>②</sup>。

巴枯宁仍然随时对新结识的工人朋友宣讲无政府主义，或在安冬妮的客厅中讲他过去的伟大业绩和更大的苦难。但是他已经没有精力或无意从事政治活动了，他一生保持着的乐观主义终于消失了。

〔他在给埃利泽·勒克律的信中写道〕对于我这个完全绝望的人来说，我已经发现并每天重新发现，群众中已不存在革命的思想、希望或热情；在这些东西都不存在的地方，尽管你做了许多工作，但你不会得到什么结果。

---

①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245，300，314，321页。

② 阿尔努：《新评论报》（1891年8月），第597—598页。

甚至在那些巴枯宁的信徒最多的国家里，1875年似乎证明了他的最坏的估计。在西班牙，阿尔丰索十二世在热烈的气氛中复位。在意大利，加里波第在皇宫里向维克多·艾曼努尔表示敬意，甚至还同罗马教廷讲和。就在这一年，巴枯宁向贝勒里奥承认“恶棍们的普遍胜利”。他甚至对人类天性的善良本质也失去了信心。一天，他对彼德绍列说：“如果整个世界上只有三个人，其中两个人将会联合起来压迫第三个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对教会的仇视似乎超过了对国家的仇视。他关注德国文化斗争事件<sup>①</sup>的发端，半真半假地宣称，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俾斯麦党人”。

退出积极的生活，对政治失去兴趣后，他只剩下一种支配一切的感情——“极大的好奇心”。他写信给奥格辽夫（此人同他的英国情妇再次在伦敦定居），向他的老朋友推荐科尔希<sup>②</sup>的《人类文化史》（此书对希腊“联邦主义”政府制度的赞扬和对罗马人“集权化”的机构的谴责吸引了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自传》和叔本华的著作，这些书现在成为他每天的读物。几个月后，他请阿道夫·福格特寄他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清楚他是否收到并想再次阅读他的这位老对手的杰作；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对给奥格辽夫信中所列举的著作的研究进展得如何。关于他的作品也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他死后从他的手稿中找到的一些次要的政治文稿的片断也不能断定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正像许多年来他不断地对他的其他朋友说的那样，他对奥格辽夫说，他“正在写回忆录”。但是也没有根据推测他此刻正在把他

---

① 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政府为了削弱在天主教会支持下的分立主义倾向与反普鲁士倾向，打着为争取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采取了一系列反对天主教教会文化专制的措施，史称“文化斗争”。——译注

②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科尔布（1808—1884），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政论家。——译注

的由来已久的打算付之实施。他在洛迦诺定居后，自然地、毫无痛苦地陷入了老年人的碌碌无为的闲事堆中<sup>①</sup>。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并没有什么变化。他仍然需要钱，在设法弄钱方面他仍像一个孩子一样不切实际和随随便便。他仍不相信卡菲埃罗既不能、也不愿向他提供更多的资助。贝勒里奥到洛迦诺来参加圣·米哈伊尔节日聚会时，巴枯宁急切地恳求他帮忙从卡菲埃罗那里借一笔钱。事情过去以后，从来不想劝说丈夫的安冬妮徒劳无益地乞求贝勒里奥向他说明这种要求是“同他的尊严不相容的”。巴枯宁不想听到这种议论，他有自己的逻辑。他宣称，“在卡菲埃罗方面，帮个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一个公平合理的字据”。由于卡菲埃罗在“巴郎娜塔”上的行为，他对于把巴枯宁置于这样一个“可怕的绝境”上是应该负责的。借给他一笔钱帮助他摆脱这种困境，只不过是卡菲埃罗的责任。巴枯宁独出心裁地说，六个月内还清这笔钱“差不多是有把握的”。其它方面要钱的来源他都没放过。一天他对阿尔努大声地说：“让我们做弟兄吧，你有钱，就给我；我有钱，就给你”。但是这个狡猾的法国人看出，后一种机会未必能出现，对这个建议并不感兴趣<sup>②</sup>。

就像他每一次遇到经济危机时一样，巴枯宁又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心爱的提欧斯—爱克斯—曼克纳<sup>③</sup>——他的那笔难以捉摸的

---

① 吉约姆：《国际》，第2卷第155页，第3卷第284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398，402，411页；德拉哥马诺夫：《巴枯宁书信集》，第347—348页。

②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254—255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394，414页；阿尔努：《新评论报》（1891年8月），第592页。

③ 古希腊、罗马戏剧中用舞台机关送出来参与剧情发展的神仙，喻指在紧要关头突然出现解围的人。——译注

遗产上。

1874年11月，索菲娅·罗索夫斯卡离开洛迦诺返回俄国，巴枯宁没有忘记委托她办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情——到他弟弟那里去。她确实在12月访问了普列姆希诺庄，虽然她没有拿到现金（没有理由怀疑米哈伊尔弟弟们关于他们没有钱的声明），不过一片森林明确地作为米哈伊尔的一份遗产留了出来。这片森林估计价值十万法郎。究竟是索菲娅还是巴枯宁本人，要对这个乐观估计负主要责任，还不能肯定。然而十分清楚，由于受到来自普列姆希诺庄的索菲娅提供的消息的鼓动，巴枯宁以异常的热情相信，现在他将终于能得到他的那笔确实存在的遗产了<sup>①</sup>。

这种想法表明巴枯宁既没有改变他的性格，也没有从以往的经历中得到任何教益。他比口头承认的更喜欢“巴郎娜塔”，其灾难性的结局不单单是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找到某种安慰，才能完全平静下来。将要装进腰包的来自普列姆希诺庄的财产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没等多久，1875年2月，他花二万八千法郎（其中三千法郎是现付的，三千五百法郎在4月份支付，余额在10月份支付）买下了以布雷索别墅著称的一座带有花园的漂亮别墅，这座别墅座落在洛迦诺的郊区，面向萨尔瓦特山。他为这种过份的做法找了一些惯用的借口。如果他耽搁得更久，这所别墅将被别的购买者抢购，洛迦诺周围的房产价格一定会在春季看涨，特别是由于从米兰到这里的铁路正在修建。他借了一笔押金，其中一部分好像是向甘布齐借的。他毫不怀疑，到10月份他将会拿到他的财产。3月，他写了一封急信给他的弟弟们，催促“偿付”他的财产。他又采取了已经太迟的预防措施，请求索菲娅再次去普列姆希诺庄，以便“用公事公办的办法办好一切”。他的弟弟

---

<sup>①</sup> 阿尔努：《新评论报》（1891年8月），第599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397，428—429页。

们不能抱怨他这种书呆子式的精确办事方法，因为“对他来说，这么大的年纪做个空想家是可笑的”。

1875年3月的这封信是巴枯宁写往普列姆希诺庄的最后一封记载下来的信；仿佛预感到他将不能再写什么了，他呼吁他们“在他临死之前来和他们年迈的哥哥见最后一面”。塔蒂安娜已经去世。他和亚历山德拉是“普列姆希诺庄的古老世界中的最后两个莫希干人”。

如果我们能见面，将会回想起许许多多的往事——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吧？是的，我想看到你们所有人，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爱来拥抱你们所有的人，——来吧，……我不仅邀请你们大家，而且也邀请我的未见过面的侄甥女们——凡是来的人都欢迎。但是，尤其是你们几个人必须来：保罗、阿列克斯和尼古拉，你们能对房子和花园的安排给我出出主意。我要把这里建成一个小小的天堂——土壤、气候，一切都很好。这里将会有一大片果树、菜园和花卉，我们将回想起父亲在世时家里的往事。

巴枯宁死后在他的文稿中发现有一份题为《给我的弟弟们的告别信》的手稿。这份手稿没有保存下来<sup>①</sup>。

\* \* \*

像巴枯宁其他的大多数幻想一样，在异国重温普列姆希诺庄的光辉之梦是不现实的。布雷索别墅的历史纯粹是“巴郎娜塔”命运的拙劣的翻版。巴枯宁给自己准备了一个藏书室，收有关于精耕细作和如何使用肥料的教科书，他研究化学，选购各种种籽；他砍掉桑树当柴火，在上面栽上一排排果树，树间还播下各种作

---

① 科尔尼诺夫：《往昔》（1925年），第3卷第51—57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433页；鲍勒：《往昔》（1907年7月），第71页。



物的种籽，在它们周围挖渠撒肥。这些准备工作使他感到骄傲和欢乐。正如他在8月写给贝勒里奥的信中所说，他发现自己“到了天堂的大门前”<sup>①</sup>。

但是到了秋天，光景暗淡多了。巴枯宁想起，进入天堂之前必须穿过炼狱。美好的遗产仍然迟迟不来，购买别墅的最后一笔款子只得通过甘布齐从一位那不勒斯银行家那里借款来支付。1875年10月，巴枯宁从普列姆希诺庄得悉，他将得到的钱不会多于他曾期望的数目的三分之二，而且这笔钱将在两年里分批支付。过于精耕细作，肥料施得过多，布雷索别墅的整个园子形成了一片寸草不长的贫瘠之地，11月反常地过早下了一场雪，巴枯宁感到“一切都在同他作对”。12月，多亏彼德绍列的借款，终于办完了移交手续，布雷索别墅变成了巴枯宁别墅。但是1876年元旦刚过两周，巴枯宁写信给贝勒里奥，说他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家里没有一文钱，他正到处二十法郎、三十法郎地借钱，安冬妮才能买点吃的<sup>②</sup>。

巴枯宁的健康在急剧恶化。体力的衰竭使他的思路更加狭小，更顾不得琐碎的日常生活的烦恼。加上气喘病和三、四年来的心脏衰弱，十二个月来耳聋的折磨，一些新的病症现在都出现了。他开始断断续续地失去记忆力，腿部出现了水肿，使得一切活动都感到吃力。最苦恼的是小便失禁，使他在夜间十分痛苦，有时白天惹孩子们讨厌。当地的一个意大利医生就其医学知识所及，起先把他每次病痛归之于受了风寒，嘱咐用海狸香油涂抹患处，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是严重的膀胱炎。请来了一位德国医生，但他只是添了一个诊断——前列腺肿大，不能治愈。有时，躺着和坐

---

① 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429，433页；阿尔努：《新评论报》（1891年8月），第600—601页。

②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300，313，320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429，433—434页。

着一样难受，常常发现，巴枯宁睡着时弯着身子躺在桌子上，只有这种姿势能使他暂时忘记痛苦。有两名意大利工人，一个是皮匠桑坦德利埃，一个是博洛尼亚起义的逃亡者马绍帝早晚轮流来帮助他穿衣和脱衣。正像他对待经济上的拮据一样，他常常以一种忍耐、蔑视的态度对待身体上的这些折磨，不得已时就忍耐一下，暂时好一些就立即忘记病痛，以他旧有的热情，而更多的是以他那旧有的不连贯的思想，给他的疾病的医学名称上加一个粗鲁的双关语，说说笑笑，或研究问题，或宣讲理论。用彼德绍列的话来说，他同时是“一个孩子，一个野蛮人，又是一个学者”<sup>①</sup>。

当他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本能地同这个世界讲和了。1875年9月，正好是在关系破裂一年之后，罗斯来到洛迦诺。经过最初的一段“冷淡”以后，罗斯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在该镇呆了整整一个星期，然而为了避免与安冬妮发生冲突，他只是在咖啡馆中会见巴枯宁。大概与此同时，一件偶然的交易使他与卡菲埃罗和解了。正要离开洛迦诺去意大利求业的卡菲埃罗，以大方的条件向巴枯宁提供“巴郎娜塔”的一些家具，以供布雷索别墅之需。为了办这笔交易，巴枯宁实际上去了“巴郎娜塔”。两周以后，卡菲埃罗携同妻子作了回访。他们甚至还乐意会见安冬妮，因而重新建立起了“最好的关系”，——仅仅是由于卡菲埃罗回意大利去才永远中断了联系。更多的旧有怨恨也消失了。一天有人提起涅恰也夫，巴枯宁否认对他有任何敌意，因为“他的动机是好的”。此刻已没有时间去纠缠过去的个人恩怨了<sup>②</sup>。

\* \* \*

1876年春，一个俄国女学生亚历山德拉·维伯来到洛迦诺。

---

①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254，287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435—437页；鲍勒：《往昔》（1907年7月），第68—69页。

② 罗斯：《往日之声》（1914年5月），第211页；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301—302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424页。

她向彼德绍列学习意大利文，彼德绍列很快地向她介绍了这位著名的同胞。几天之内，亚历山德拉·维伯就成了巴枯宁别墅的常客。青年人的魅力和祖国的吸引力一直对巴枯宁有影响。这个在彼得堡已经染上革命狂热的青年姑娘很快就对这位老前辈着了迷。这个不相称的一对成了亲密的伙伴。亚历山德拉比其他任何人都成功地充当了巴枯宁晚年的朋友与知己的角色。她留给我们的记载提供了巴枯宁临终前几周的最详细的情景。

巴枯宁的家分成了两部分，在不同的地方居住与活动。一边是巴枯宁与他现在的稀有的来访者；另一边是安冬妮与她的一家。巴枯宁常常同孩子们、特别是同两个女儿一起玩，给她们巧克力，帮他们在园子里拣木柴，点篝火。但是巴枯宁同安冬妮说话时，她常常非常冷淡地转过她那“精心梳妆过的头”。巴枯宁在一个单人房间居住、会客。门旁一张长桌上时常放着一套还在用的俄国铜茶壶和茶具，一小堆用来卷纸烟用的烟草，一张摊开的报纸上放着一瓶墨水，还有一些孩子们的玩具零件和几块巧克力。另外两张桌子和大部分地板上高高地堆放着许多国家和多种文字的报纸，以及各种手稿和纸张；到处放着药瓶，并和纸张混在一起。报纸常常堆在床上，这张床是一个铺着一条羊毛毯的简单的铁架子，其宽度几乎躺不下这个老兵的粗大的身躯，稍一动弹床下面就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而且摇摇晃晃。亚历山德拉·维伯气愤地注意到，在为甘布齐准备的房间里，床上铺着柔软的床垫，亚麻布的床单和丝床罩。

巴枯宁仍然常与年轻的客人和最后一批追随者——意大利工人谈论革命。他的目光显得“有神、严峻而狡黠”。但是他更多地谈论的是过去而不是将来。他常常想写回忆录，这个念头此时仍在纠缠着他，但他已没有精力写了。他对亚历山德拉说，他将把材料口授给她，她务必把它译成很好的法文，为此需要改进她的文风，巴枯宁要求她阅读巴斯噶的作品，他认为巴斯噶是最伟

大的法国古典作家。他有时有失检点，被保尔·德·科克的作品诱发起来的无害的情欲在他的人生道路临近结束的时候又出现了<sup>①</sup>。马隆和尚普塞夫人正住在洛迦诺，是他家常客。除了出神地听马隆的臭名昭著的不贞行为的故事外，没有什么能使他更高兴的了。他给马隆起了一个绰号叫“走私犯”，把他的伴侣叫作“海关官员”，当“走私犯”不法的越轨行动被发觉时，他高兴得抿着嘴直笑。亚历山德拉·维伯从自己的情趣和严肃的标准出发，无法掩盖她对这位崇拜对象的有失检点的行为的失望。

然而最重要的是，此时死亡已经临近，巴枯宁喜欢谈起他的童年以及曾使他感到如此亲近的俄国。他喜欢别墅花园里的青蛙，因为他想起了夏天夜晚在普列姆希诺庄草地和池塘里青蛙的呱呱叫声，认为它们是“极妙的音乐生灵”。此刻，“他眼中露出严峻而狡黠的目光，脸上布满了悲哀的皱纹，好像有一团阴影挂在他的唇边”。他常要亚历山德拉·维伯给他谈谈祖国的情况。她常同他说起哺育她成长的俄国田野和牧场上的熟悉风光和声音；当她停止说下去时，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恳求她再讲一遍同样的故事，所以她时常对他讲着或念着，使他入睡。在他临终时刻，有一个本国人在身边，这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他大声说：“没有一个意大利人懂得如何正确地念给我听”。有时他想念他的妹妹，但是很少想到他曾热烈地爱过的塔蒂安娜和曾为她而热烈地斗争过的瓦瓦娜，而更多地想起温柔的吕波夫。吕波夫临终躺在床上时，他曾见过她。她躺在那里时曾对他说：“啊，米哈伊尔，即将离开人世是多么幸运啊！一个人能够伸直身子是多么幸运啊”！现在他回想起并理解了这句话的含意，他也有这种感觉。他向这位最后的和最年轻的朋友只提出了一个请求：如果她看到自己即将死去，“不要忘记在他的嘴里插上一支烟，这样在他死之前可

---

① 保尔·德·科克（1791—1871），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译注

以再抽一口烟。”<sup>①</sup>

但是这个永不停脚的流浪者在没有经受另一场大难之前是不许他伸直身子去死的。1876年5月初，随着索菲娅·罗索夫斯卡娅从俄国回到洛迦诺，最后的一场危机开始了。她终于变卖了米哈伊尔的弟弟们分给他的那份遗产——一块森林地。两个月前，先寄出了一千卢布，——这就是米哈伊尔的全部的、盼望中的财产。严酷的现实给了他一棒，打消了他可以得到十倍于此的财产的虚幻之梦，使他成了一个绝望的、无可挽回的破产者。在家庭会议上，巴枯宁如果还有知觉的话，他一定吞下了这颗羞耻的苦果。为了不致被赶出别墅，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决定向债权人提供一万卢布来结算他的全部债务，尽管弥补他已有的七千卢布与他答应要付的一万卢布之间的差额的计划像往常一样也许是兑不了现的。这个提议遭到断然拒绝。主要的债权人是甘布齐的朋友、那不勒斯的银行家；可以设想，甘布齐能利用这个逼使安冬妮和她的孩子到那不勒斯同他结合的机会是不会不高兴的（巴枯宁也得陪着去）。债权人一旦取得洛迦诺别墅的所有权，这就成了唯一的选择<sup>②</sup>。

巴枯宁与其说是参与，还不如说是默认迁往那不勒斯的决定。实现这个决定取决于意大利政府同意接纳他去该国。此时意大利的内政部长是尼柯特拉，他从前在那不勒斯结识巴枯宁，甚至曾经涉足于他的密谋团体。安冬妮力劝丈夫写信给尼柯特拉，请求允许他在意大利定居，答应回避一切形式的政治活动。富有年轻人的英雄崇拜的不妥协精神并对安冬妮十分敌视的亚历山德拉·维伯认为，对于巴枯宁来说，写这样一封信将是“对过去的背

---

① 鲍勒：《往昔》（1907年7月），第67—87页。

②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313，320页，第4卷第26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434—435页。

叛”。但是巴枯宁再也没有力量也不愿反对安冬妮的要求。巴枯宁瞒着亚历山德拉，写了一封信。6月的第二周，安冬妮离开洛迦诺去意大利向尼柯特拉提出申请，并在甘布齐的帮助下为迁居那不勒斯作了一些其他的必要的安排<sup>①</sup>。

离开瑞士前，巴枯宁想再次拜访一下他在伯尔尼的老朋友，并找阿道夫·福格特看一下他的多种疾病。在忠厚的皮匠桑坦德拉的陪同下巴枯宁于1876年6月13日从洛迦诺动身，第二天到达伯尔尼。阿道夫·福格特在车站接他，并把他送到医院。当夜他离开医院去拜访赖歇尔（显然这是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在他家里，巴枯宁吃力地斜靠在瓷炉上，赖歇尔在演奏他心爱的贝多芬乐曲。从此以后，赖歇尔夫妇天天去医院看望他。他们大都谈论音乐。巴枯宁说：“一切都将成为过去，世界将会毁灭，但是第九交响乐将会永存”。也许第九交响乐使他回想起瓦格纳，1849年他曾在德累斯顿听过瓦格纳指挥演奏这支曲子。他表示不赞赏他过去的起义伙伴的音乐作品。他要听叔本华的作品。他解释说，一切哲学家由于把人当作单个的人而不是当作集体的一部分而走入歧途。他不愿写回忆录了，因为谁会来读它呢？一些民族已经失去了革命本能，它们如此地害怕失去已经得到的东西，以致变得十分驯顺，毫无生气。如果他恢复健康，他将写一篇论以集体原则为基础的伦理学的论文。

阿道夫·福格特为巴枯宁准备了一个减轻主要疾病给他的体力上和精神上带来苦恼的器具。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恢复已经损伤的机体。他脑子有时还清醒，但他的体力在不断地、迅速地衰弱。6月28日，他的身躯停止了正常的活动，进入昏迷状态，只能唤醒他一会儿。除了玛丽娅·赖歇尔不时为他准备的几匙养

---

<sup>①</sup> 鲍勒：《往昔》（1907年7月），第83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475页。

麦粥或俄国麦片粥外，他拒绝一切饮食。1876年7月1日，星期天的早晨，当赖歇尔夫妇与往常一样来医院探望他时，他的病情尚无明显的变化。但是他极度的痛苦来得很快，持续了一小时。中午，米哈伊尔·巴枯宁去世。晚上，当玛丽娅·赖歇尔拿花圈来时，尸体已开始变色<sup>①</sup>。

星期一，7月3日举行了葬礼。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白雪皑皑的群峰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闪着银光，空气中飘逸着玫瑰花香。在等候送葬人到来的时候，挖墓人就棺材的尺寸和重量开玩笑，遵照吩咐，他们得给这个狂暴的叛乱者挖一个特别深的墓穴。棺材后面跟着三、四十人，他们代表瑞士的各个国际支部，但是来不及通知在外国的朋友与追随者。墓穴填好后，由参加葬仪活动的唯一俄国人茹柯夫斯基，还有吉约姆、施维茨格贝耳、埃利泽·勒克律，最后由伯尔尼的一名工人致悼词。吉约姆致词时控制不住感情，抽搐地哭泣着。玛丽娅·赖歇尔凝视着远方，眼中充满着泪水。但是整个葬礼给旁观者的印象是十分简单、敷衍了事、也不大适当。这个骚乱与造反的象征竟这样平淡地长眠在这个和平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在他的暮年给了他一个栖身之地），如此结局实在有些不相称。葬仪的次日，急于要办完登记手续的警察向阿道夫·福格特调查死者的职业或谋生手段。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福格特没有现成的别的回答，只是含糊地低声说，他的朋友是瑞士意大利语区一座别墅的所有者。这对警察来说似乎是一个完全符合要求的解释。在官方档案上，死者被登记成：“米哈伊尔·巴枯宁，房产主”。

几天以后，从电报中得悉丈夫去世的安冬妮从那不勒斯到达伯尔尼。巴枯宁的朋友们冷淡地接待了她。玛丽娅·赖歇尔待她

---

<sup>①</sup> 吉约姆：《国际》，第3卷第32—35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437—441页。

很好。福格特太太只是问她是否喜欢伯尔尼,她是否去看过熊<sup>①</sup>。

---

① 伊尔:《北方通报》(1898年4月),第181—182页;吉约姆:《国际》,第4卷,第36—37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4卷第441—444页。鲍勒:《往昔》(1907年7月),第87页。



## 参 考 书 目

巴枯宁的传记资料是十分丰富的，但散落在各处，而且往往很难找到。

### 手 稿 资 料

---

维也纳的麦克斯·讷特劳博士收藏的巴枯宁手稿是最多的一处<sup>①</sup>，这些手稿近年来已成为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的藏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该收藏处保存了巴枯宁去世时留下的全部政治性文稿。这些手稿尚未分类，也没有被研究者所利用。然而，讷特劳博士在他写的三卷本巴枯宁传记的手稿（写于1896—1900年）中，已经利用和引用了其中的许多资料，该手稿复制了五十本，作者把这部不易阅读的复制品赠给了世界各主要的图书馆（其中一本在大不列颠博物馆）。这部传记中还包括讷特劳博士从了解巴枯宁的人的嘴里得到的许多消息。这三卷中的大部分资料散见于下面列举的各种资料中（绝大部分译成了俄文）。

巴枯宁去世时留下的有关私人事务的手稿落到了他妻子手中，均未出版，也不知是否被保存下来。他家中仍然健在的成员对此未提供任何消息。

---

① 麦克斯·讷特劳（1865—1944），奥地利历史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写有许多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著作。——译注

1896年发表巴枯宁给赫尔岑的书信时，其中一封信未被发表，此信后为赫尔岑长女所有。1936年她去世时，这些书信大概交给了布拉格的俄罗斯国外档案馆，但是这些书信下落不明，其中也许包括一些其他未发表的巴枯宁资料。

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保存了巴枯宁在1849年被捕时的所有手稿，连同他在萨克森监禁和审讯时的一大堆卷宗。这部分资料仅有一小部分发表过。

布拉格陆军部档案馆保存了巴枯宁在柯尼施泰因关押期间所保存的日记以及他在奥地利关押和审讯时的许多文件。日记和其他一些文件尚未发表。

## 出版资料

已出版的最重要的巴枯宁文集有以下几种：

《米·亚·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尤·米·斯切克洛夫编，四卷集，莫斯科1934—1936年版。这部文集计划包括迄今为止已在俄国和国外出版的巴枯宁的全部书信、其他著作以及在俄国的手稿。国外还没有对此进行研究；原文用外文写的书信和其他著作被译成了俄文。已经出版的四卷（计划出十二卷）收集了1861年以前的著作和书信。据悉还有两卷准备出版，但尚无及早出版的迹象。而且遗憾的是，还不能肯定这个十分有用的版本是否完成。

《米·亚·巴枯宁致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书信集》，米·彼·德拉哥马诺夫编，日内瓦1896年版。这是首次出版的巴枯宁书信集，其中除一两封外，均是巴枯宁写给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信。这些信的原件现大部分在布拉格的俄罗斯国外档案馆，该馆极为慷慨地把其中一些被德拉哥马诺夫删去的段

落给了我。该集中也包含有少量的、被十分武断地删节过的巴枯宁的政治性著作和某些传记材料。遗憾的是，由于不能准确地辨认巴枯宁的手迹，其中有许多细微的错误。

《米哈伊尔·巴枯宁文集》，第1卷，麦克斯·讷特劳编；第2—4卷，詹姆斯·吉约姆编（巴黎，1895—1913年版）。这部文集收有从1867年到巴枯宁去世时的较重要的政治著作和一些先前未出版的手稿。该书的后几卷计划要出，但从未问世。

《米·亚·巴枯宁传记资料》，V·A·波隆斯基编，莫斯科，第1卷1923年版；第2卷1933年版；第3卷1928年版。这几卷收录有内容广泛而有价值的文献（其中包括巴枯宁的许多手稿），这些资料来自俄国、萨克森和奥地利的官方档案馆，来自讷特劳博士写的传记手稿，也来自一些不易得到的报刊资料。美中不足的是该文集许多地方誊抄粗心、无知，编纂疏忽大意。

《巴枯宁研究》，约瑟夫·普菲茨纳著，布拉格1932年版。这部论述巴枯宁在1848—1849年活动的论文集是在彻底研究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的档案的基础上写就的，其中全文或摘要发表了许多先前没有发表过的巴枯宁手稿。

《六十年代解放运动概论》，M·K·列姆克著，彼得堡1908年版。其中收有1862年巴枯宁从伦敦发出的、并被俄国警察截获的许多信件，并附有对随后事件的说明。

有关巴枯宁的重要资料还见诸下列各书：

《米哈伊尔·巴枯宁的青年时代》，A·N·科尔尼洛夫著，莫斯科1907年版。

《米哈伊尔·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A·N·科尔尼洛夫著，列宁格勒1925年版。

这两部著作是在普列姆希诺庄的档案（现在列宁格勒俄国文学研究所）的基础上写成的，包括的范围直到1857年巴枯宁被流

放到西伯利亚时为止。其中所引的许多巴枯宁书信的全文，可在斯切克洛夫编的《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中找到。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本书中还包括一些在别处尚未发表的重要材料以及巴枯宁家与贝叶尔家的其他成员间的信件。保存在普列姆希诺庄档案馆中的1857年以后的巴枯宁书信刊登在1925年第3期《往昔》杂志第49页以下。

《亚·伊·赫尔岑著作和书信集》，M·K·列姆克编，共二十一卷，彼得堡1919—1925年版。除了赫尔岑给巴枯宁的信件和提及巴枯宁的信件与其他作品外，该集还有一些对巴枯宁的传记作家很有价值的资料。

《第一国际：文件与资料》，詹姆斯·吉约姆著，四卷集，巴黎1905—1910年版。吉约姆的回忆录是巴枯宁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的第一手资料。这几卷中还有在讷特劳博士的文稿中未曾发表的巴枯宁手稿的引文（吉约姆接触到了这部文稿），同时还包含有他自己占有的巴枯宁手稿的引文（这些手稿后来被他销毁了）。

《追踪涅恰也夫》，R·坎特著，彼得堡1922年版。这本有用的小册子收有俄国保密档案馆的有关特务罗曼·波斯特尼柯夫活动的资料。

下列文集或巴枯宁同时代人的通信中收有写给巴枯宁的书信或提到过他的著作：

《斯坦凯维奇通信集》，斯坦凯维奇编，莫斯科1914年版。

《别林斯基书信集》，E·A·拉茨基编，三卷集，彼得堡1914年版。

《阿尔诺德·卢格的通信和日记（1825—1880）》，P·奈尔林奇编，两卷集，柏林1886年版。

《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书信集》，斯图亚特1895年版。

《格奥尔格·海尔维格与他未婚妻的通信》，斯图亚特1906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八卷本，莫斯科，1928年起出版。本书作者主要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俄译本全集，而不是该院远未出全的原文版全集。

尤·米·斯切克洛夫编著的四卷本巴枯宁传记（而不是纳特劳编著的传记手稿）是仅有的一本具有重大价值的巴枯宁传记。这不是一本受人指使而写的著作。该书往往缺乏同情和谅解。苏维埃正统的原则迫使作者在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每一个争端上都站在马克思一边反对巴枯宁。但是如果仅仅作为一本有用的资料汇编，本书对研究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有些难以得到的原始资料在本传记的脚注中都注明出处（如纳特劳的传记或不出名的刊物）。

俄文和德文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论及巴枯宁生平某些事迹的文章，当时许多回忆录中与巴枯宁有关的资料散落在各处。这些资料的题目都在相应的脚注中引有全名。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